

張九如著

# 和波覆轍在中國

知難行易在美國

孫科



和談覆轍在中國 目次

另名：知難行易在美國

第一編 殷鑒不遠……………一

第一章 導論……………一

    第一節 警世語……………一

    第二節 血淚話……………四

    第三節 答客問……………七

第二章 鷹鴿式的共存……………一〇

    第一節 國共第一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一〇

    第二節 國共第二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一二

    第三節 國共第三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一四

第三章 人鬼般的和談……………一七

    第一節 國共七次和談的內容與結局……………一七

    第二節 中共要求和平共存的作用……………一九

第三節	中共的和談連環套	二二
第四節	政府是否必須和談	二五
第五節	政府接受和談的原因	三一
第四章	政協前夜廿幕對話劇	三七
第一節	險惡的背景	三七
一	背景在華萊士三見蔣主席	四一
二	背景在魏德邁報告國務院文與回憶錄	六二
三	背景在董顯光著蔣總統傳	六六
第二節	公演出全本鬧劇	七〇
一	惡鬼伸手	七一
二	旭日當頭	七三
三	邪正昭彰	七四
四	鍾進士揮筆直書	七八
五	如此鬧劇如此逼宮	八〇
六	鬧出一個怪物——政協	一四二
第二編	源流濁亂的政治協商會議	一四六

第一章	匪氛沖天……………	一四六
第一節	中共的陰謀暴行……………	一四六
第二節	馬到不成功……………	一四八
第三節	杜魯門弄巧成拙……………	一五五
第四節	政協會議亦竟難產……………	一五七
第二章	場外鑼鼓齊鳴……………	一五九
第一節	中外一致殷望……………	一五九
第二節	各報代達輿論……………	一六一
第三章	幕內裝扮辛勤……………	一六五
第一節	千呼萬喚始出來……………	一六五
第二節	各黨各派各式樣……………	一六六
第四章	兩支前奏曲……………	一七〇
第一節	達成停戰……………	一七〇
第二節	停戰令與執行組……………	一七三
第三節	會員茶話……………	一七七
第五章	會議隆重開幕……………	一八三



第一節	開幕盛況	一八三
第二節	蔣主席貢獻三點意見 準備實行四事	一八五
第三節	各方面代表致詞	一八九
第四節	重慶的霧散了	一九一
第五節	衆會員形相畢露	一九四
第六節	漁陽鼙鼓動地來	一九七
第六章	各次會議實況	一九九
第一節	先有媳婦 後有兒子	一九九
第二節	各報舊帳	二〇一
第三節	在議程外打岔	二〇四
第四節	竟說出下流話外行話	二〇六
第五節	纔論及軍隊國家化大問題	二〇九
第六節	國民大會問題上場	二一一
第七節	疲勞轟炸國大問題	二一四
第八節	討論憲法怪論百出	二二二
第九節	三次延長會期繼續分組討論	二三一
第十節	愛國學生大遊行	二三四

第十一節	決議案產生了	一二三六
------	--------	------

第七章	會議隆重開幕	一二四一
-----	--------	------

第一節	毋忘這一月份的末日	一二四一
-----	-----------	------

第二節	蔣主席贊佩和平建國綱領	一二四三
-----	-------------	------

第三節	一個公正會員的正確觀感	一二四八
-----	-------------	------

第三編	坦途與陷阱	一二五三
-----	-------	------

第一章	中共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一二五三
-----	------------	------

第一節	政略性的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一二五三
-----	--------------	------

第二節	戰術性的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一二五五
-----	--------------	------

一	欲取姑予	一二五五
---	------	------

二	力爭重點	一二五六
---	------	------

三	巧護主軸	一二五九
---	------	------

四	虛構事實	一二六二
---	------	------

五	慣佈烟幕	一二六五
---	------	------

六	倒栽賊證	一二六七
---	------	------

七	得寸進尺	一二六九
---	------	------

八	無限鬥爭·····	二七二
九	吸擴外國·····	二七三
一〇	威脅辱罵·····	二七五
一一	鑽隙奇襲·····	二七七
一二	玩弄諾言·····	二七八
一三	偽裝讓步·····	二八〇
一四	化整爲零·····	二八一
一五	分合運用·····	二八三
一六	將計就計·····	二八五
第三節	鑾出陷阱的一條繩索·····	二八七
第二章	中共一貫的看法與整套的作法·····	二八九
第一節	毛製馬列史眼鏡裏的越南·····	二八九
第二節	毛製馬列史眼鏡裏的美國·····	二九二
一	民好和平官喜戰爭的矛盾·····	二九二
二	不瞭解共黨的厲害·····	二九四
三	橫衝直撞向原地轉·····	二九五
四	僅對直接刺激起反應·····	二九六

五	人人都喜新奇驚人……………	二九七
六	共黨正歡迎美國那樣的民主自由……………	二九九
七	把經營公司方式塑造他國政府……………	三〇〇
八	民間猶存血濃於水的意識……………	三〇三
九	腦子裏攔不下歷史教訓……………	三〇四
一〇	小生意經的對越政策……………	三〇六
一一	反感來自優越感……………	三〇八
一二	不懂政治戰……………	三一〇
一三	對天下事都求標準化制度化……………	三一三
一四	全體美國人鬥不過一個越南和尚……………	三一五
一五	富紳最怕窮光棍……………	三一七
一六	核子傘變成紙老虎……………	三一九
一七	美國人的思想源流與共產主義一脈相通……………	三二〇
一八	共黨的喜歡冤家是和談……………	三二二
一九	美軍必敗於越南的地形與共黨的戰術……………	三二四
二〇	美軍根本違反戰爭原則……………	三三〇
二一	美國最不得人和……………	三三四

### 第三章 美國應有的對策……………三三六

#### 第一節 改進人民思想陣地……………三三六

##### 一 六種心理缺陷已累及外交鬥爭……………三三六

##### 二 五種心理因素又攪糟外交技術……………三三八

##### 三 三大特性又織就自縛羅網……………三四〇

##### 四 舊習性更不能適應今後新形勢……………三四三

##### 五 四種攻心戰術的回顧與前瞻……………三四五

##### 六 迅速充實鞏固思想戰的後勤司令部……………三五〇

#### 第二節 肅清中共在美國開闢的戰場……………三五二

##### 一 記取華盛頓與耶穌的戰爭觀……………三五五

##### 二 猛悟共黨的成敗、關係美國的盛衰……………三五六

##### 三 注意軍閥尙須民團配合……………三五八

##### 四 認識反共性的世界戰爭是已經存在的事實……………三六〇

##### 五 戳破共黨政治鬥爭七種方式……………三六四

##### 六 列舉真確事實、碾碎虛浮現象……………三六七

##### 七 紹述理想主義、裁正現實主義……………三七〇

##### 八 當心自毀黨德的後果……………三七五

##### 九 提防過度民主自由的反動力……………三七八

一〇	驕誇最易傷害其他民族的自尊心	三八〇
一一	拯救宗教的迷失	三八三
一二	勿再吞食聯合政府的糖衣毒藥	三八五
一三	最須鞏固南越戰時政府	三八七
一四	應隨時與國內外人民計較勝負之數	三八九
一五	休再放棄雷霆萬鈞的主動力	三九七
一六	細說美利堅民族勇於義戰的歷史	四〇三
一七	新亞洲助產士的本領如何	四〇八
一八	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本質	四一一
一九	認清中共是流寇結合	四一九
二〇	認清中共經濟敗落的主因及其事實	四二八
二一	認清中共經濟破產的近因及其趨勢	四三八
二二	認清中國民衆已瞭解如何反共並正在反共	四四五
二三	認清中共軍隊倒戈的事實及其結局	四五五
二四	中共絕對不敢同時在南北東內四條戰線上作戰	四六四
二五	論斷制毛無須聯俄 亦不可聯俄	四六七
二六	應知制俄不宜聯毛 更無可聯處	四七三
二七	今日制中俄共的上策是聯華	四七七

二八	今後安定亞洲及全球的上策亦是聯華	四八五
二九	提供和談前的十六個歷史教訓	四九〇
三〇	提供和談時的五個歷史教訓	五〇一
三一	中共問題專家的程度如何	五〇五
三二	中共問題專家的性格如此	五〇九
三三	中國通的思想言論不够通	五一四
三四	難道他們是中共的議員	五二二
第三節	詹森總統的時代使命	五二八
一	一舉而成七種劃時代的關鍵工作	五二八
二	以心理建設永絕十六幕悲劇	五三二
三	速利用稍縱即逝的大好時機	五三九
四	向著越過國際港汊的唯一捷徑開步走	五四六
五	勉爲一言興邦的巨人	五五二
六	改造地球尤急於登陸月球	五五八
七	必須爲萬世開太平	五六三
八	至少應以殺止殺 勿再被敵謀殺	五六九
九	發展智勇貞信心力 解決軍事外交難題	五七六
一〇	比拿破崙所說三M更重要的三S C	五八四

# 和談覆轍在中國

另名：知難行易在美國

## 第一編 殷鑒不遠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警世語

在一九六七年國內外人共慶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十日的國慶節這一天，我適寫畢歷時二年餘的這本書，不能不乘歡欣鼓舞之餘，在書端寫上三節，使本書能「開門見山」，讀者能「開卷有益」。誰都認定各民族的膚色雖異，而其基本的心理則大致相同，所謂「東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因此，我可以料定：

、如果你是聰明人，當你看完本書第三編的全文以後，決不會說這僅是作者站在其本國的立場，純爲其本國利害打算的說辭；而會堅決承認這全是根據第一編第二編的歷史事實，及美國的國情民性與政策作風，歸納而成的客觀敘述。

如果你是聰明人，僅在看到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節「國共商談紀錄」時，並看完第二編第六章「各次會議實況」以後，就會立刻發現：

共產黨說和平，要的一定是繼續鬥爭；



共產黨說戰爭，要的一定是暫時和平；

共產黨說政治解決，做的一定是武裝叛亂。

總之，共產黨說東，實際是西，所以它「不是東西」。我們對共產黨的表現，必須從相反的至少是別種意義的方面去看，纔是認識共產黨的唯一法門。

有此認識，你自然又會瞭解：

共產黨一刻不隱蔽真面目，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刻不說謊話，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刻不製造問題，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刻不和他入鬥爭，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刻不幹出完全違反人性的事，就不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刻不施展其整套謀略中一種或數種的戰術，就不是共產黨。

總之，共產黨先天的本質上，就是個「幻形黨」「扯謊黨」「問題黨」「鬥爭黨」「造反黨」，也就是個「惟恐天下不亂」的「亂黨」，永遠是個「亂黨」，決不是普通的政黨。

有此瞭解，你自然又會醒悟：

這是它的辯證法，是它所謂「正、反、合」的辯證法，也就是祇有反，而沒有正與合，三反，五反，反理性，反倫理，反宗教，反歷史，反美，反蘇，反日，反英，反印，反泰，反越，反聯合國，普遍的不斷的反，甚至反自己的「同志」，完全玩弄其「否定律」「否定的否定律」的唯物辯證法，「唯反辯證法」。

它們的唯物辯證法，從其所表現的方面看，實際是「唯惡辯證法」，是叛竊國家，慘屠民族，侵略世界，奴役人民，逼毀家庭，倡導逆倫，禁絕輿論，毒斃思想，厲行剝削，縱容驕淫，獎助詐偽，坑陷善良，發展人類社會向所未有之極惡大罪的「妖孽法則」。在它這種辯證法中，一切可以不斷否定，只有這類罪惡永遠不容否定。從其發動的方面看，又是「唯意辯證法」，它總想使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受其私意惡意支配。故可總名之爲「唯惡意辯證法」。

各國共產黨要的祕方，都是這套「唯惡意辯證法」，產生各國共產黨的嫡母，也就是這個「唯惡意辯證法」。

中國共產黨是在這個「唯惡意辯證法」上愈演愈烈，愈趨愈下的一羣匪幫，更不是普通的政黨。總之，中國共產黨被叫做「中共匪幫」最是名符其實的稱呼。（本書仍稱「中共」，則與本書敘述年代時常用公曆的用意相同，都只在便利國際人士的閱讀）。

有此醒悟，你自然又會警戒：

你要不能如此這般地了解它的辯證法，你一定是個蠢材，一定是最被它歡迎的蠢材，它一定會自鳴得意地說，「天下蠢材，盡入我彀中了」；這個「彀」，自然就是它特製的這個辯證法。

你要不能警戒它如此這般地玩弄這套辯證法，你一定會犯最重大的罪惡，犯了更大於它自身的罪惡，正如西諺說的「他人騙你一次，是他人的罪過，他人能够騙你兩次，是你的罪過。」

你要不能在上文指出的「一刻」時間之內，就戳破它的幻形，看透它的惡性，立刻想定對策，給它當頭一棒，你就會併犯害人誤國禍世三重大罪。

總之，有此發現、瞭解、醒悟、警戒，你纔有耐心來看其中的「國共會商紀錄」，及本書的全部

特別是第三編的全文。

有此耐心看紀錄及全書的人，自然會在「商談紀錄」這部份中，就會像孔子看少正卯那樣的完全看出：

這紀錄，暴露着中共更過於少正卯那樣的「言偽而辯，順非而澤」，同時也反映出爲國家者的苦口婆心。

這紀錄，暴露着中共更過於少正卯那樣的「心逆而險，行僻而堅」，同時也反映出爲國家者的動心忍性。

這紀錄，暴露着中共更過於少正卯那樣的「撮徒成黨，飭表焚衆」原是它的本質，同時也反映出爲國家者的容量、殷望、忍耐、堅苦。

這紀錄，暴露着中共更過於少正卯那樣的「反是獨立」，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論，盡是邪狠暴橫的飾詞，同時也反映出爲國家者的「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並反映出各國民衆和部份知識人士或若干政府人員被它狐媚蠱惑的由來。

總之，中共儘管集這套辯證法的大成，使出渾身解數，却没有被它套入彀中的，是中國國民黨，尤其是中國國民黨的總裁，中華民國的總統蔣先生。他在距今三十八年前，早就有此發現、瞭解、醒悟、警戒了。其真憑實據，已載在他著作的「蘇俄在中國」裏。在你看這份紀錄前，最好先讀這本著作，亦必須先讀這本著作。

## 第二節 血淚話

你要是無暇讀這本巨著，我願意破工夫首先摘釋這本著作裏和這份紀錄有關係、可以互相印證的真憑實據，互相發明的至理名言，並且是痛苦的經驗話，供你參考。

我相信你看過摘釋以後，會生兩大疑問，那就是：（一）從民國二十九年起到三十五年止，（一九四〇——一九四六），七年中的七次商談，中共代表嘮叨不停，糾纏不休的，究竟是那些話？他們又是怎樣說的，其目的何在？（二）美國大使級代表與中共代表在華沙的祕密會議，從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今已經談了一百三十三次，究竟談的什麼？又是怎樣談的？這兩大疑問你如要得到答復，我保證你僅在三萬餘言的「國共商談紀錄」中就可隅反。且不祇如此，在此以前，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到重慶以後，政府代表會與中共代表舉行過五次會談，談到十月十日，纔發表「會談紀要」，究竟是怎樣得出這個「要一點」的？當時中共代表在這四十多天裏，說些怎樣的連篇鬼話，雖沒有紀錄在「蘇俄在中國」內，但保證你可在「商談紀錄」部份取得樣本。更不祇如此，你不待看本書第二編，已可由此想出在此以後的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開幕的政治協商會議中，中共代表說的是那一套話。並無須查考書報，亦可由此了解中共竊據大陸至今對內對外所說的是那些濫調，所謂「毛澤東語錄」是什麼貨色了。

尤其可以憑此斷定四點：一是，鬼既要求和人攀談，必有它的鬼作用，人和鬼打交道，決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二是，在這十年以後，山姆大叔又不惜與鬼同席，在日內瓦及華沙已經談了一百三十三次，即使再談「一千零一夜」，亦不能和山羅薩德一樣的有效，其結果如不是被鬼迷，上鬼當，就必然是夜長夢多，自討苦吃。三是，遠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返美述職之時，即曾指責國務院內職業外交家因左袒武裝叛亂的中共，隨時予以掣肘之故，致其無法執行外交政策，並憤而辭職，現在美國的

政府議會學府社會中，不但有像張治中那樣諂譽毛澤東，邵力子那樣迷戀中共「朝氣」的人在內，亦顯然有像以前的「職業外交家」那類人，正在與其政府同牀異夢，而與共黨異牀同夢。四是，十多年來美英兩國政府最高首長的眼光手法，似乎都不及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所以羅邱能等到軸心國家敗局將成的時間，纔開始發表世界和平建設的大西洋憲章宣言，而現在美英等國當局則竟在共產集團鴉張如故之際，便想和解越戰，彼此傳染了「和平思想早熟症」，既不知「同病相憐」，也就不能「疾病相扶持」。

因爲如此，則我由發表「國共商談紀錄」，連帶發表其他部份的有關資料，及批判美國對越共中共俄共政策和作法的長文，並總名之爲「和談覆轍在中國」，絕不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當爲世人所共信。

蔣總統曾自述其發表「蘇俄在中國」的目的，在於：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

「我以爲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爲時已晚。」

「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略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爲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蘇俄在中國七頁）

「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的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

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爲藍圖，因此我認爲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蘇五七）

「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略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的事實，我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蘇六）

「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責任了。」（蘇七）

「我發表這一紀錄之時，衷心充滿着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着堅強不移的信心，……所以這些紀錄的字裏行間，遍灑着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蘇六）

我發表三十四年九月三日至三十日的「國共商談紀錄」，及由此產生的數十萬言血淚文字時的悲痛情緒與堅強信心，亦正是如此。

### 第三節 答客問

客問：蔣總統著作的「蘇俄在中國」已經文富理明，例證俱足，你爲什麼又摘釋其著作？

我說：現在反共非共國家的高官策士，爲解決越戰問題，正求越共坐下來談，他們忙亂如此，那有工夫坐下來讀一下蔣著，我只有望他們看一下比較簡短的摘釋，或者不無裨益。

客問：既如此，那你一併發表「和談覆轍在中國」，不是又弄成長文了麼？

我說：蔣先生爲國家元首，不宜對美國政府議會及各界人士多所批評，我則爲代表民意的立法委

員，不妨暢所欲言。並且在蔣著發表之時，尙未見美國部份官員議員學者記者的忙於求和如此之殷，我則已逢此噩耗，怎能不憤慨陳詞？我未嘗不知文已過長，但比較美國國會已由各人發表的數十萬言證詞，及各方面求和的言論，尤其一百數十次的華沙會談，尙簡短的多，美國人並未對它感覺厭煩。要是獨認爲我太囂囂，甚至認爲不值一顧，則其過失決不在我。若待到全人類認爲我的話不幸而中之時，我纔正式發表一事後有先見之明」這種言論文字，則其過失我就無可推諉了。

若誠如客所慮，最無耐心的美國人，決不歡迎如此的長文，則亦有一個以簡馭繁的辦法，那就是「各取所需」，政府決策人僅看第三編，研究共黨行爲的學者僅看第一編，欲知政治協商會議史實者則僅看第二編，也就够了。好在第三編中，爲了每個問題都須從每一方面去看，已在某些部份重複使用同一史料作爲證解；並已避免使用「附註」方式，全在正文中發表，實已幫助了賢勞於國事者的抽閱。

客問：「蘇俄在中國」這本書裏，爲什麼沒有發表這類的商談紀錄呢？著此書者歷次和中共代表及與毛澤東面談的話，必數十倍於這份對話錄，他爲什麼不和盤托出？

我說：這亦自有其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均有其苦心深意，並爲天下之至公。其所以削之者，欲使天下萬世人共厭棄之也，其所以筆之者，欲使天下萬世人共鑒戒之也，著者削去其歷次的對話紀錄，意亦與孔子的削奪相同。我則因爲著者雖已「誨爾諄諄」，世人依然「聽我藐藐」，不得不將全篇鬼話露佈出來，望世人不再被鬼捉弄。

客問：這份紀錄你是怎樣得到的？爲什麼到現在纔發表？

我說：「這是當時張岳軍先生準備發表商談公報，要我根據商談紀錄擬就文稿，我除照辦外，並請同事謝泌兄照原紀錄騰寫一份，其後在魔掌血腥污遍神州的三十八年間，我幾乎拋盡了一切，只隨

手捲帶幾件衣、幾本書從南京逃出。這份紀錄的沒有跟大陸一併淪陷，全靠當時的神定心懸眼明手快。距今六年前，我整理書櫃，發現這份鈔本，由於戰時蜀紙粗薄，台北氣候潮溼，霉積不易分開，只得對此斷爛朝報太息。近因越局將陷禹甸覆轍，即送請岳軍先生代為補殘，他除感覺恍如一夢以外，急由其自己覓到原本後，並不其慣在幕內做「政治補釘」工作的留侯張字房經驗，成功了一文獻補訂」這件事，也促成了我亮起紅燈的工作。

客問：你爲什麼在書中獨稱張羣爲張岳軍，甚至尊爲先生，而直書張治中邵力子之名？

我說：在這十次商談中，始終心口如一，真正代表國家民族利益，而爲政府說話的，僅岳軍先生一人，其所以或尊稱或直書其名，聊示褒貶而已，是亦趙匡論春秋體例之四「變文以示義」，之七「示諱以存禮」的筆法也。

客問：尊著第三編佔全書文字的過半，十九都是批評美國對中俄越共的政策，痛惜其太不認識共產黨，太不敢使用其全力，如名此書爲「知難行易在美國」，不是更貼切麼？

我說：「尊論甚是，我亦曾作此想，只因開始寫稿時就用此書名，美國至今亦仍想與越共和談，就沒有決定究用什麼名稱。且蔣著既名「蘇俄在中國」，又旁書「中國與俄共三十三年經歷紀要」，我今師其意旁題爲「知難行易在美國」實已兼顧及此。



## 第二章 鴿鷹式的共存

### 第一節 國共第一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

中國會有三次與中俄共和平共處，第一次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的聯俄容俄，當時的目標是在厚集內外力量，內求國家的統一，外求民族的獨立。第二次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國共合作，當時的目標是在團結各方，致力於抗禦日本的侵略。第三次是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的國共苟合，當時的目標是在實行憲政，和平建國。在這三個時期中，雖明知中俄共都有野心，不足深恃，正如兇暴鷹隼的終不能與和平鴿子共患難，尤知它們「和平共存」的鳴聲，只是一「藏鋒待時」的姿態，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就只得與之攜手。假使當時它們勢已鴟張，或國力充實，便決不會走此險路。又假使當時各國不利用中國軍閥內亂以圖私利，或不強迫中國政府與共黨合作以圖苟安，亦上策可行。這種情勢，都與美國今日的處境絕對不同。這部痛史，蔣總統曾在「蘇俄在中國」的名儘有著裏說明其結局，「三十年來，中俄與國共之間三度和平，三度決裂，最後的結果，是中國大陸關進鐵幕，作為蘇維埃帝國征服亞洲侵略世界的基地。」（蘇一二九）這部動心忍性，求全萬一的痛史，不待「毛語錄」中刊出「以武力奪取權力，以戰爭解決問題，乃是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方式，」這樣毫無和平共存氣息的話，就早已料到。

茲分述三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如次。而其第一次的情形則為：

中國國民黨與中俄共商談和平共存的第一時期是開端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孫中山先生與俄

共代表越飛的協定，實行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其目的「是爲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蘇二四）其立場「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認爲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爲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挾，或對共黨有所姑息。」（蘇三五）當時俄共願派代表來商談，中共願提出其加入國民黨的「申請書」，表面上固均與力量集中，意志統一的目的相符，實際則不然。

它們在這期間的陰謀是：「五年來共產國際指使其中國支部的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民革命，以圖接近羣衆，煽起鬥爭，顛覆本黨，然後再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由他來領導北伐，獨佔中國。」（蘇五五）

它們在這期間的戰術是：首先設法接觸民衆，滲透中國國民黨：「乘本黨改組，在統一戰線的口號之下，與我們合作，並使其黨員加入本黨。」（蘇三八一）「假借本黨的組織與機構，來與一般革命民衆取得接觸，以便利他的滲透。而最後的一着，就是假借國民革命來建立其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其赤化中國的目的。」（蘇四〇四）「俄共對我國國民革命的援助，就是他對我國國民革命滲透和顛覆的張本。」（蘇三九六），其次是製造矛盾：「民國十三年以後，共匪對我們本黨內部製造矛盾，在打擊其所謂右派的時候，右派固然受了他的打擊，而左派亦受了他的控制。」（蘇三九八）再次是製造目標：「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本黨與共匪的聯合戰線的共同目標，原爲北洋軍閥，但是共匪爲了要對本黨滲透和操縱，企圖假冒本黨的名義，劫持本黨的組織，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工作，乃在本黨內製造其各種目標，即指其所謂右派爲資產階級，而聯合左派之小資產階級來打擊他，使我們抹煞其原定目標，而自啓紛爭，以供其利用。民國十五年，共匪在武漢，首先聯合左派即其所謂小資產階

級，來反對南京的政府，造成寧漢分裂。他再進一步，又以其所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來打擊左派小資產階級，而演成武漢的悲劇。」（蘇三九九）爲貫徹他這套陰謀詭計，一切出之以偽裝：「民國十三年一月，共黨份子聲明其加入本黨，是服從國父的領導，爲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來奮鬥，但在實際上，乃是假借三民主義來宣傳馬克斯主義。」（蘇四一六頁）

它們這套陰謀與戰術，就在開始聯俄容俄這一年的冬季，已經被當時黃埔軍校的校長蔣先生清楚地看出，「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の後患，將不堪想像。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蘇二三）

因爲有此認識，所以纔能有十四年的廣州制共定亂，十六年的全面清黨對俄絕交，亦纔能使「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遲延了三十二年。」（蘇五五）

## 第二節 國共第二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

中國國民黨與俄共商談和平共存的第二時期是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停止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最著的如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政府五次圍剿勝利後，中共陷於絕境，只得利用國情，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策略性的要求。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僥倖於全國人民擁護政府最高領袖的熱烈真誠，只得提出可以被政府接受的四項原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博取共同禦侮的美名，便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同年南京淪陷，並呈送

「兩黨長期合作」「中華民族統一團結」的函件。三十年（一九四一）德軍攻入俄疆，又與蘇俄都向我政府強調和平共存的口號。

它們在這期間的陰謀是：「民國二十四年，他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得以死灰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的。」（蘇五七）

它們在這期間的戰術是：首先以退為進：「二十五年二月以後，匪軍困處陝北，無法生存，乃自延安發出停戰議和的通電，此後就要求與國民政府和平商談。這就是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要求，來掩護他的退却最明顯的實例；」（蘇三七六）。同時也是他部署進攻所採取的步驟。再鼓吹統一戰線，擺脫孤立：「民國二十三年，國民政府五次圍剿已告成功之後，共匪與我們不斷的接觸，屢次要求停戰協議。」（蘇四〇四）。同時透過其外圍救國會，組織人民陣線，打破其政治孤立狀態。」（蘇三八二）。「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共匪和平共處的要求，在戰略上是爲了防禦我們對其殘餘的部隊繼續圍剿。所謂國共合作，就是這個戰略防禦的口號。而其所組織的人民陣線，就是他這戰略防禦中的一種反孤立戰術。」（蘇三八四）。並鼓吹中立主義，使我孤立。「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以後，所謂抗日救國同盟的各種活動，就是中共對國民政府施展其中立戰術。」（蘇三七九）。「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結束之後，共匪通過其外圍民主同盟，以中立主義的偽裝，對我政府施展其孤立戰術。」（蘇三八三）。且製造壓力，逼我接受其要求：「民國二十五年，共匪與我們取得聯絡之後，就借此機會，在社會上發動其所謂抗日救國同盟的組織，聯絡各省地方軍隊，煽動大城市的學生羣衆，遊行示威，製

造一種壓力，企圖迫使國民政府聯俄容共。」「抗戰期間，共匪雖派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但是他屢次以退席或拒絕出席爲要挾，對我政府使用壓力，並企圖引起參政會對政府的責難，製造一般國民對政府的誤解。」（蘇三九〇、三九一）。更利用偽裝，以遂行其策略：「民國二十六年以後，共匪參加我們抗戰陣營，最初是利用民族的偽裝，後來却爲了轉變民族戰爭爲階級鬥爭，而改用民主的偽裝。」（蘇四一七）

他這套陰謀與戰術，蔣委員長早看清楚。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九月，周恩來到武漢送呈「毛澤東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蘇八九）。所以「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蘇一二八）

### 第三節 國共第三次共存的真相與惡果

中國國民黨與中俄共商談和平共存的第三時期，始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絕望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當時政府的期望，是實行民主憲政，和平建國，並以「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蘇八三）爲根據。但是中共的企圖則完全相反。

它們在這期間的陰謀是：重調和平共存的舊調，便利其武裝叛亂的佈局，以武裝叛亂助長其政治的攻勢，使政府陷於內外交逼的孤立地位，和戰兩難的尷尬局面，達成其盜竊國家的一貫目的。所以「抗戰結束以後，共匪對我國民政府的和談，改變爲戰略的攻擊與戰術的防禦。換句話說，他的和平

共存，在戰略上是爲了瓦解我們反共的勢力，束縛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雙手，以便利他的進攻。但是他在戰術上，却採取防禦的態勢，並提出和平的要求，……博得一般社會的同情，和一般投機取巧、隨風轉舵的人們之鼓掌與喝采。」（蘇三八五）

它們在這期間的戰術是：一方面利用美國的調處，發展其中立主義，使國內外短視者誤認其宣傳的中立主義爲自由主義，相率以中立自重。同時誤認其標榜的「新民主主義」爲民主思潮，其叫喊的「統一戰線」爲民主運動，其主張的「聯合政府」爲民主政治，由此附和他們，孤立政府。他方面利用停戰協定，以束縛政府的戡亂行動，並掩蔽其武裝叛亂。利用得最惡毒的，是反對政府先解決軍事再談政治的主張，以造成政治軍事同時解決的糾葛局勢，掣肘政府的戡亂行動。而其鼓吹的中立主義與聯合政府，則更爲其攻守咸宜的兩大樞軸。在其力量不足，或不便公開活動時，便指使中立者代他活動。在其潛力充實，並可以公開正面活動時，便唆使中立者襲擊政府的側背，助長其活動的聲勢。甚至唆使中立者誣蔑美國偏袒，反對美國調處，以配合蘇俄要求我政府在外交上採取中立的政策，讓蘇俄代替美國調處國共問題，以實現莫斯科併吞中國的詭計。

它們實行此種戰術的步驟是，首先求得蓄力圖進的機會：「喘息戰術是俄共慣用的一種方法，他爲了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不祇與敵人和平談判，並可與敵人簽訂一個停戰協定，甚至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共匪與我國政府簽訂停戰協定，最後一次是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他利用這一協定對我政府所加的約束，而他自己不受其中任何條款內一個字句的約束，於是他在政治和軍事作戰上，處處都能保持其主動，隨時都可施行其攻擊。」（蘇四三〇、四三一）。再離間各方，使我孤立：「民國三十四年以後，共匪爲了分化我們政府及本黨，乃製造其所謂頑固派和民主派的名詞，當他對其所

謂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時候，而所謂民主派也就被他麻醉和操縱，最後也就不能不向他靠攏了。」（蘇三九九）。「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史達林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同時亦就是孤立戰術，他企圖離間中美的合作，使中國陷於孤立的地位。」（蘇三八三）

又運用各種偽裝，欺騙各方：「抗戰結束以後，共黨對我政府所施用的政治戰術，更是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偽裝之下，來進行其顛覆工作的。」「國際共產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替中共製造其偽裝，以掩蔽其控制農民，全面動員，來建立其武裝叛亂的最後決勝之根基。」（蘇四一八）。「共黨與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三度和平共存的時期，都是以三民主義隱蔽其共產主義，而在三民主義的偽裝之下，宣傳其共產主義。」（蘇四一五）。復鼓動羣衆反戰，以張其聲勢：「共黨爲了破壞我們勦匪戡亂的政策，乃提出反共即是法西斯的口號，使一般人誤信共黨要民主要自由，甚至誤信他們是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派，反而指我們的反共是獨裁，是法西斯。」（蘇四二四）。並威脅政府及美國，以貫徹其企圖：「他的宣傳，常爲狂妄的武斷，且帶有猛烈的威脅性，……他一面與你和談，而另一面對你威脅。這種威脅的宣傳戰，最顯著的實例，就是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間，本黨中央在廣州時，一般黨員幾於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共的話，而本黨中央到後來也就幾於完全被他控制。又如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之間，一般政治和社會人士，幾於沒有人敢反對和談，也沒有人敢提倡戡亂動員了。」（蘇四二五）。「抗戰勝利結束之時，共匪一面實行武裝叛亂，而一面推行其反內戰運動。國際共黨誇大宣傳我政府製造內戰，同時指責我國內戰是國際和平的威脅。在這種氣氛與環境之下，我政府不能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並接受美國軍事調處。」（蘇三九三）。「美國軍事調處期間，爲了張家口事件，共黨的代表即以全面決裂爲威脅，而對馬歇爾特使和我政府施用

壓力，企圖迫使我政府接受其無理要求的條件。」（蘇三九一）。最後且散放烟幕，使我自毀其領導中心和支柱，以便利其赤化整個大陸的行動：「到了他宣傳奏效，一般人相信國家非和談即無出路的時候，他又散放烟幕，說 蔣總統要下野，纔有和談了。」（蘇四二三）。「三十五年十二月北平發生沈崇案，中共即藉口發起所謂抗暴運動，來煽動羣衆，使其反對美國在華駐軍。」（蘇四一三）

中共這套陰謀詭計，我國元首是始終看清楚的，曾經指出，「在蘇俄及共匪的思想上，認為和談與停戰乃是戰爭的否定，而破壞和談與停戰協定乃是他否定之否定。」（蘇四三二）。「三十年來，共匪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抗戰而破壞北伐抗戰，其所用的戰術，對於一般羣衆就是轉變經濟鬥爭爲政治鬥爭，和轉變其合法運動爲非法鬥爭；而其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就是其所謂轉變民主革命爲社會革命，和轉變國際戰爭爲國內戰爭。我們對於他這種辯證法的變質戰術，不僅目覩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蘇二一六）

### 第三章 人鬼般的和談

#### 第一節 國共七次和談的內容與結局

三十年來，中俄與國共之間，三度和平，三度破裂，既如前述，則中國國民黨及政府前後與它們七次的和談，自然都是空談。

第一次和談是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自南京淪陷後，編爲第十八集團軍、調入抗戰行列的中共武力，已自由行動，破壞抗戰，統帥部制止無效，乃於二十九年作成提示案四點，商經同意，但



未被遵行。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協定，亦被蘇俄粉碎。

第二次和談是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是年毛澤東派代表向蔣委員長表示擁護抗戰建國的「誠意」，既全屬欺騙。周恩來林彪向何參謀總長提出四項新的要求後，表示願意依據二十九年皓電提示的原則，重新商談，不但仍無結果，並且顯出中俄共要求的和平共存，只是內豺外狼，同惡相濟，暴露出「日本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兩個戰爭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蘇一一六）

第三次和談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是年的西安商談，雖有美國駐華大使參加，但因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其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已在談判過程中充分暴露。它們先提出的十七條，尙與過去兩次的要求，相差不遠。其後提出的十二條，則已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全部推翻，誠如「蘇俄在中國」的記述，「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次苛刻，當然得不到結果。」（蘇一一八）

第四次和談，仍在民國三十三年。是年冬季，因中共對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更積極展開，而其分化中美的合作，又無所不至，故政府雖然動心忍性，仍以毛澤東與赫爾利大使共同簽署的五項協定爲商談基礎，依然失敗。誠如「蘇俄在中國」的記述，「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同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蘇一二五）

第五次和談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此次商談的內容與結果，悉如「蘇俄在中國」的記述，「完全是共匪一種政治的宣傳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

寧。而他在這次宣傳攻勢之中，不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詆蔑赫爾利大使，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頓了。（蘇一二六）

第六次和談仍是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以後，中俄共對於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齊計劃，便全面展開。而以其發出的七道「命令」，提出的六項要求，作為全部行動的前哨戰。政府深感局勢險危，便在與蘇俄談判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重新開始與它商談和平共存的途徑，在四十一天之內，與其代表舉行五次會議，發表會談紀錄。但是「毛澤東回到延安以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澈底破壞無遺了。」「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蔽了匪軍的實際行動。」（蘇一四一、一四二）

第七次和談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在美國馬歇爾特使參加商談期間，無論是三人小組舉行的六次會議，各黨派與社會賢達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與其成立的五項協議，亦無論政府是實行張家口停戰，並平行商談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及由三人會議商談軍事，五人小組商談政治，都只是夾縫，全無結果。誠如「蘇俄在中國」的記述，「中共所需要的緩兵時間已經爭獲了，也就是他歡迎美國調停的笑臉時期已經過去了，從此以馬歇爾特使為中心的和平商談與軍事調處，都為共匪澈底破壞而無形宣告結束。這一年餘的和平商談，竟與從前六次商談是同樣的結果。」（蘇一八〇）

## 第二節 中共要求和平共存的作用

無論從何方面看，「俄共及其國際共產組織從來沒有承認任何和平方法可以代替其暴力和決戰的原則。」（蘇三三一）「他們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

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蘇七）

它們在無力武裝征服之時，便以退爲進，以和爲戰。他們最具體的策略與行動，則爲二十六年之秋，毛澤東向其部隊的講話，「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這一決策，可分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均，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並決議：「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爲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然是跟着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領史達林。」（蘇八六—八七）。故其「和平共存戰術的主要作用，全是爲了他改變雙方的均勢，即改變敵人物質的優勢爲劣勢，同時亦即改變他自己物質的精神的劣勢爲優勢，而進行其流血的決戰……並隱蔽其決戰的方法和目的。」（蘇三三一）。「並且他的退却和防禦，同時使用，而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就是分散敵人的力量而集中自己的力量，鬆懈敵人的鬥志而加強自己的鬥志。尤其是他退却或採取防禦的態勢之時，乃積極施展其政治心理滲透戰術，從敵人的內部瓦解其反共壁壘，並分化其反共盟友，而後施其最後之一擊。」（蘇三七七）。要是「戰爭失敗了，他就要求和平共存。待他實力長成了，他就破壞和平談判，發動武裝叛亂。而且他正對我們和平談判的時候，也就是他對我們準備武裝叛亂的時候。這就是他辯證法所謂矛盾的統一和對立物的轉變。」（蘇三七五）

它深知「和談的作用有下列的幾種：一、和談可以延緩我們對他的攻擊。如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共匪提出停戰議和，就是緩兵之計。二、和談可以掩蔽共匪的武裝變亂，如抗戰期間，第一次至第三次商談，即是武裝變亂的烟幕。三、和談可以增加中立主義的聲勢，而擴張其外衛的後備力量，如抗戰結束後，毛澤東在重慶的和談，就是這個作用。四、和談可以打擊我們的士氣，如抗戰結束以後之和平商談及軍事調處，即是這個作用。五、和談可以使自由世界發生兩個中國的印象。所以俄共與中共都善於疲勞談判。」（蘇四二九—四三〇）。故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共匪和平共存的要求，是戰略的防禦與戰術的攻擊。抗戰結束以後，共匪對我國國民政府的和談，却改變為戰略的攻擊與戰術的防禦。」（蘇三五四）

「共匪另一個重要的詐術，乃是將戰爭威脅與和平商談交互使用，造成一張一弛的局勢，或將兩者同時使用，造成邊打邊談的局勢。這種詐術可以打擊我們前方的士氣，阻礙我們後方的動員，動搖我們政府的內部，混亂國際社會的視聽，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共匪對我們政府所施用邊打邊談的詐術，就是最好的實例。」（蘇四一九）

因此，「從俄共和中共對華侵略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知道他和平共存的要求，有時他用作退却的掩護，有時他用作防禦的手段，也有時他用作攻擊的方法。」（蘇三七六）。「俄共及其傀儡中共與我們的和平共存，在實質上就是他侵略我們中國的一種基本戰略。」（蘇三七五）。這套「和平共存的欺世幻術，是列寧傳統的間接作戰迂迴戰略所產生的。」（蘇二八二）。「在列寧的戰爭思想上，最健全的戰略是遲延戰鬥，最健全的戰術是遲延攻擊，直至對方的士氣衰落，人心動亂，使其決定性的最後一戰可以施展之時為止。」（蘇三二九）

「在共匪執行莫斯科所賦予任務的過程中，他對和平商談有怎樣作用呢？他運用美國調處來助長中立主義的發展，並且利用停戰協定來掩蔽其軍事行動。……現在可以明白的說，共匪當初之所以接受美國調處，就是要破壞這個調處，他之所以簽訂這個停戰協定，就是要破壞這個協定，由此造成一種不戰不和，邊打邊談的局勢。因之，三十五年這整整一年的歲月，完全是替他爭取時間，他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來對政府作最後決戰的準備。」（蘇一九三、一九四）。「因之，在俄共的戰爭思想上，使用武力與使用和平方法，都是戰爭。」（蘇三二〇）。「蘇俄及其共產集團的無限戰爭，乃是攻擊與防禦，軍事與政治，戰爭與和平之辯證法的統一。」（蘇三二八）。「而且這種新殖民主義和反革命勢力所使用的鬥爭方式——和平共存，實比舊殖民地主義者武裝侵略的炮艦政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險與禍害。」（蘇二〇四）

### 第三節 中共的和談連環套

和平共存既是它祖傳的欺世幻術，世人是不会盡被其欺的，於是它又施展其迫使世人非鑽進其圈套不可的各種手法，也就是使人非嘗試「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便無他途可走的法門。其手法的總樞機便是和談，其進行的方式則有各種。「爲了從羣衆中瓦解敵人的陣營而增強自己的盟友，他就運用其統一戰線。爲了從羣衆中削弱敵人的組織而準備自己的進攻，他就運用其中立主義……至於孤立戰術和反孤立戰術，則在其整個戰略計劃之中，發揮其攻擊和防禦二者並行不悖的作用。」（蘇三八七）。固然，「統一戰線是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的攻擊戰之主要方式，中共曾經多次反覆使用這個戰略，來進攻我們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蘇三八〇）。「而其所謂鬥爭又聯合的

統一戰線，也不過是他反孤立戰術的最高方式。」（蘇三八二）。但最兇險，最易使全世界人人入其彀中的，則名爲中立主義。因爲「中立對於一個個人，好像是自由，其實他是要使之是非不明，不負其應有的責任。中立對於一個國家，好像是獨立，其實他是要使之敵我不分，失去其應有的立場。……以其敵我不分，他就可混淆視聽，擾亂陣線。以其是非不明，他更能顛倒黑白，以假亂真。然後他纔能對反共國家實施其各個擊破的手段，對非共國家展開其和平轉變的技術。」（蘇三八六）。故「中立戰術乃是國際共產黨和平共存的主要戰術，和平共存不過是一個口號與一種姿態。」（蘇三七八）。它怕政府不中其緩兵之計，而仍動員戡亂，則又放出失敗主義，使各方反對戰爭。「其政治作戰中所使用的最後一着，就是他一面以反戰的口號，阻止敵人的攻擊，而一面準備其武裝，以展開他自己的攻勢，實行準備決戰。」（蘇二四一）。這亦是它祖宗列寧傳下的法寶，「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軍事失敗主義，乃擊敗了其臨時政府，而建立他的蘇維埃政權。……抗戰結束以後，中共及其外國之民主同盟，一面與我國政府進行和平商談，同時對我國革命軍到處肆行襲擊，而一面在我國革命軍的後方，散佈失敗主義和製造厭惡心理，使一般社會中間乃至政府裏面，流行一種論調，以爲戡亂軍事沒有勝利的可能，只有和談纔是一條出路。……於是我國政府正在必須動員的時候，無法實施動員，而我國軍正在最後決戰的關頭，亦不能集中力量與共匪作最後的決戰，而遭受了悲慘的失敗。」（蘇二四一、二四四）

並且「在其和戰並用的時候，對於和平商談，又有其全副的詐術。他屢次與我們政府進行和談，都有其一定的方式。在商談軍事問題時，他必然提出政治問題，在商談政治問題時，他必然主張召開一種會議。在舉行會議時，他首先對議程作疲勞的爭執，或者達到他拖延的目的，或者先在這初步的

談判上，爭取其突擊的勝利。至於他在戰力不足或軍事失敗時，就要求和談，來掩護其軍事的整理與戰力的補充。……他在勝利時，或戰力相等時，也要利用和談，來分化我們反共的陣營，使其勝利更加容易與徹底。……尤其是他在停戰協定或和平條約上簽字，就是要破壞這個條約來準備着隨時翻案。他在和談破裂時，更轉嫁其破壞的責任於政府。」（蘇四一九—四二〇）。又慣用奇襲，使我常陷於被動的招架。他「常從一個方式轉換為另一方式，而使其新鬥爭方式發生奇襲的效用。即如其軍事作戰中，突然提出和議，又如其在和談進行中，突然施行武裝攻擊，使我政府陷於被動的地位。……這一原則，在他的宣傳戰上更應用得最為得意。當敵人對他的甲點施行攻勢宣傳，而使其無法辯護時，他便轉換一個角度，就是在其敵人猝不及防的一點上，施行奇襲。使其敵人不能不放棄其對甲點的攻勢宣傳，而轉換為對乙點的守勢宣傳，而其敵人的宣傳戰亦從主動轉為被動。」（蘇四二〇）。至於「每次和平商談，政府的讓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後，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縱隊中共發動全面叛亂。」（蘇一九三）。則更不待言。

它這套和談的作用及其方式，亦是它鬼祖宗列寧的衣鉢真傳。列寧曾對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加以引伸，認定「和平是戰爭的繼續」「和平是繼續戰爭的其他手段」。列寧這個引伸，便構成了中俄共思想戰爭的基點與法門。「所以蘇俄及其國際共產黨的對敵鬥爭，不僅隨時變換其鬥爭方式，並且要從一個方式變換為正相反對的方式，這就是他辯證法所謂對立物的轉變。」（蘇四二一）

總之，「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他鬥爭的目標，不是控制就是毀滅；對於他接觸的民衆不是壓迫就是利用。所有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

定，都是他一時的鬥爭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爲了準備暴力，爲了最後決戰。」（蘇二二一）

#### 第四節 政府是否必需與中共和談

於今必須問個明白的是，當年中國政府與中共商談和平共存，有無必要？

第一、是否由於不瞭解中共，纔與它和談？不是的。它最陰險惡毒的要求，我國政府尙且洞若觀火，斷然拒絕，豈有比較淺簡的要求，反被它的和談魔術迷亂之理。

一、如中共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乞降以後，「他每次商談，必要求合法政黨的地位，我國政府始終堅持，一面收編匪軍，一面以政治方法解決共黨的問題。其解決的方針，就是容許共黨參加對日抗戰，至於其政黨的合法地位，要到憲政時期，依憲法辦理。爲什麼我們不許他有政黨的合法地位呢？因爲共匪慣用的伎倆，就是他利用其合法地位，在羣衆中發展組織，並準備武裝暴動的各種條件，一有機會，就乘機而起。所以爭取合法地位，乃是他防禦戰的一種方式，而隨時準備轉守爲攻。我們要防範他利用合法地位而實施其非法活動，亦就是要制止他轉變合法的狡計，惟一的方法，就是不給他以合法地位。」（蘇四三四）

二、如「共黨和平共存所採取的鬥爭方式，其最後一步，就是他所謂聯合政府……此乃是一種政治口號和一種滲透與顛覆的政治戰術，而決不是現代民主國家所採取的聯合政府之精神。……民國二十四年以後，中共奉行其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統一戰體的指示，在抗戰期間，始終以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爲其政治主張。但是他直到三十三年十一月，纔正式向我政府提出聯合政府的要求。我政府拒絕了他這一要求。」（蘇四三八）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政治協商會議所協議的國民政府改組案，就是要改組國民政府爲聯合政府。後來因爲中共和民主同盟要求其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保持否決權，而爲其他各黨派所反對。並且他屢次拒絕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企圖阻止國民大會的召開。直到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大會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三十六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乃與制憲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但沒有共黨在內。於是共黨以聯合政府的方式而實行滲透顛覆的企圖，亦終於失敗。」（蘇四三八）

「二次大戰結束期間，史達林定下一個聯合政府的公式，指使中共及東歐各國共黨，來製造政變。第一步由共黨要求參加政府，第二步由他利用其政府機關的掩護，製造和發展其反政府的組織武器，第三步再來實行政變。可是我們對於史達林這一公式，是看的特別清楚的。因爲他這一公式是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間，中共在我們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鬥爭經驗發展出來的。所以我們政府也就依據這同一時期的痛苦經驗，拒絕他的要求。」（蘇四三六—四三九）

三、如「我們對俄共曾經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終不屑採取中立主義。最明顯的事實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共黨外國團體，以中立的姿態，發起抗日聯俄運動，企圖迫使我政府跟隨着莫斯科的路線來前進。當時我政府決心排斥他這個壓力，堅持獨立民主的方針，促成國際的合作，爲國家生存與世界和平來抗日作戰。到了三十五年抗戰結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絕史達林的建議，排斥其中立戰術，保持國際正義，維護國家的獨立與自由的立場。」（蘇二五〇）

「當時要我採取他的所謂獨立政策，對外以美蘇兩國和東西兩方的橋樑自居，採取中立路線，而對內經由莫斯科的調停而與中共及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其結果是整個中國和平轉變爲蘇俄的附庸，蘇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個中國，從此他不僅是可以和平的征服亞洲，而且更可以轉化太平洋爲俄

羅斯的內湖，因此我乃決心拒絕史達林這一切建議。」（蘇一五三）

四、如「我鑒於停戰令以後三個月之中，中共對於所有協議與重要條款幾乎破壞殆盡，乃特別對馬歇爾特使說，這次美國參加國共和談，調處軍事衝突，務須中美兩國政策互相協調，更要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互相了解，免為共黨離間中傷的奸計所乘纔好。我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並時加警覺，所以我對於共匪反覆無常，荒謬狂妄的要求，總是委曲求合，忍耐到底，無論如何，不使中美雙方發生裂痕，使蘇俄共匪乘機得逞。」（蘇一六五）

「在俄共看來，如果馬特使在華調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失敗，所以他不只是破壞這一調處，而且他希望中美兩國在此調停期間，發生衝突，而致破裂。於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約搗亂，另一面且對美國恣意指責，時加污蔑，到了最後階段，其反美的謬妄狂妄態度，更令人不堪想像，這是莫斯科預定陰謀的實現。他要在美國無法調停，而馬使離華回國之後，乘機來調處國共衝突，干涉和操縱中國的政局。但是俄共這一個企圖，早已為我們所看破，而卒成幻想。」（蘇一六六）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國宣告放棄調處，馬歇爾特使回美以後，蘇俄與共匪即繼續不斷的向我政府作試探和談的要求。特別在三十六年間國軍向烟台、威海衛、蓬萊等地渤海沿岸進展的時候，他們重開和談與停止國共衝突的要求，更為迫切。但是我個人三十年與俄相持的經驗，看透了莫斯科企圖調停的作用與後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對我們的調停，我們中國早在三十六年已成為波蘭以聯合政府而招致滅亡之續，所以對於他的歷次的要求或試探，毅然決然，皆一律拒絕。」（蘇一九二）

第二、是否由於反共組織與技術上犯了無可補救的錯誤，纔與它和談？不是的。

反共組織不嚴密，而警覺不够提高；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够充實；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

段不够澈底；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以上四點，乃是我們反共組織與行政技術上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還都是可以設法補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補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決心能够堅定，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那我們雖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蘇二三二）

第三、是否由於反共政策與戰略上犯了無可補救的錯誤，纔與它和談？不是的。

一段以爲我們第一個錯誤，是我們接受雅爾達的條件，而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其實是一日本侵略主義者已告投降，我們爲了結束東方的險惡局勢，而要保持國家生存，不能不謀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時間，而望與蘇俄和平相處的途徑，這是我們當時訂定這個條約的決心。即令蘇俄此後對我們中國繼續其侵略政策，則這個條約亦可以作爲國際上衡量蘇俄侵華行爲的尺度，和我們中國對俄交涉的根據。所以這一着並不能遽然斷定我們的政策爲有重大的錯誤。」（蘇二三三）

一段以爲我們第二個錯誤，是我們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其實是一「我們中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如不簽訂中俄條約，並接受美國調停，將使我們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時雖有力量解決中共問題，却沒有力量單獨對抗蘇俄共產帝國主義而阻止其侵入東北，策應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爲了和平要仁至義盡，對朋友要開誠布公，只要我們盡其在我，而在道義上無所愧怍，即不能認爲我們在政策上有重大錯誤。」（蘇二三四）

一段以爲我們第三個錯誤，是我們在剿共未成期間，即實行憲政。其實是一「我們確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主義，纔是我們擊敗共產極權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這部民主憲法，與蘇俄帝國鐵幕統制相對照，纔能暴露共匪對人民施行恐怖和殘殺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後必歸失敗的命運。故在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對於剿共軍事雖有若干不利的影響，但亦並非是我們什麼重大錯誤。」（蘇二三四）

第四是否由於政治上具有不易克服的重大缺點，不能配合戡亂動員，纔與它和談？不是的。

事實是：「當時內政上的財政軍事經濟工商教育司法社會等各方面很多缺點，自然也是反共鬥爭失敗的因素，但是這些都不是失敗的主因。如果我們在反共組織和技術上沒有重大缺點，在政策和戰略上沒有什麼錯誤，尤其反共鬥爭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動搖，那麼我們這些行政上的缺點還是隨時可以改正補充，根本上並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蘇二五一）

第五、是否由於國軍實力不能戡平叛亂纔與它和談？不是的。

事實是：「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戰軍事初告結束，當時匪軍非法盤踞的地區不過七十縣。即在受降時期，他一時發展，也不過二百縣。如果共匪以暴力對我國革命軍作戰，他的結果，必定是與民國二十三年時在贛南一樣的命運，被我國軍消滅，毫無疑問的。……他在全面叛亂期間，其軍事上所發生的效用，最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其國際宣傳與情報活動的力量之大，實在要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們國內所運用的統一戰線與中立戰術，以及散佈失敗主義的宣傳。而他全面叛亂之所以能够這樣迅速發展，使國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運用其接觸、滲透、宣傳、情報、組織等詐術，復以其假和平的反內戰口號為掩護，而來準備其最後的武裝暴力。故其真正的軍事武力戰爭，不過為其決戰階段最後使用武器之一種而已。」（蘇二四五——二四六）

「我們政府對共黨及其匪軍的方針，如能始終採取封鎖隔絕，積極對他全力作戰，則無論其武力增加至如何程度，匪軍擴展至如何範圍，他最後仍必敗在我們手裏。」（蘇四〇五）。「由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圍剿的勝利，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如抱定決心，以軍事來解決，乃自有成功的把握。」（蘇二一七）。「如果國民

政府放手動員戡亂，亦必能重獲十年前在贛南五度圍剿最後的勝利。」（蘇一五四）

退一步言，「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過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爲全面戰爭亦所不顧，乃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蘇二四〇）。再退幾步言，「我們中國與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經驗，指出了一個事實，共匪真是用暴力來決戰的時候，他勝敗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們的手上，而並不是完全取決於他的。」（蘇二四四）

這已有當時的具體事實可證：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動員戡亂之後，國軍對個別戰役，如延安的收復，沂蒙山區的決戰，山東半島的戰爭，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東戰役都獲得勝利。」（蘇一九一）

○「匪軍在東北擴大變亂，並集中四平街，阻止國軍從瀋陽北上接收主權，遂引起戰爭，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三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聿明部徹底擊敗，喪失過半，其殘部潰不成軍，分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潰。杜總指揮部即於四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佔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爲目標，沿長春鐵路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勦共戰役，可說是繼二十三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的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時的慘狀，只有過之而不及。」（蘇一九六）

○「當時已進攻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的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

能。」（蘇一七一）

## 第五節 政府接受和談的原因

政府既有理由又有實力勦平共亂，究竟爲什麼要幾番與它和談呢？尤其如對俄復交，使「蘇俄派駐中國的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其貿易機構，成爲他部署其間諜組織、和指揮中共匪徒、顛覆我國家的機構。」而其「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爲苛刻，對我國輸入的武器，都沒有預備零件，且不能適時應用，至於民國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蘇二三六）。又如收編共軍，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戰的時機，反以襲擊我抗日部隊，擴張其武裝暴力，到了我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更傳播失敗主義，企圖與日軍夾擊我後方，而顛覆我政府。」（蘇二三七）。又如處置東北問題，既知「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渝關，而以錦州爲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訴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府有關內有充分的實力，敲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劃。」爲什麼「前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呢？（蘇二三八）。且三十五年一月，簽訂停戰協定既然「中美雙方堅持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東北問題不列入政治協商範圍，而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的調動，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蘇二三九）。爲什麼不能貫徹到底呢？像這些在政策和戰略上的重大錯誤，何以明知故犯呢？

當年接受和談的原因，顯然是被迫的，是欲罷而不能的。

#### 第一、和談是被環境所迫：

被國際環境逼迫的事實是：如對俄復交，是由於「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蘇七二）。並且期能達成安內攘外的政策，因為「當時一般人以為只有聯俄纔能抗日。」（蘇二三六）。此事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莫斯科爲了阻止日本北進，就希望中國對他復交，我政府對此極爲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纔宣佈中俄復交。」（蘇二三五）。其後又於「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顧惠慶爲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蘇七一）。如收編共軍，「是我們受了日本軍閥侵華戰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蘇二三七）。如處置東北問題，「我們決策之後，却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蘇二三九）

被國內環境逼迫的事實是：一爲國民反共意志的瓦解：「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成長之初，乃一方面內受共黨及其外圍份子散佈其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蘇俄共產帝國其國際同路人對我及毀府以及我國的信譽，加以誣毀。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遂爲其所抵銷，而歸於失敗。卒使一般國民的反共意志，趨於瓦解，而我政府勦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面動員來支持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蘇二二五——二二六）。到了抗戰結束之後，中共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賣國殘民，全面武裝叛亂的行動，摧毀我國一切建設事業，阻絕我政府一切復員工作，破壞經濟，擾亂社會，特別針對人民久戰厭倦的心理，散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最後卒致一般社會，是非顛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計後果。於是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

其斷喪，民族固有的德性幾乎毀滅，所有倫理道德立國的基礎，乃完全動搖，而反共意識亦就隨之瓦解。」（蘇二二三）。

二爲一般人對共認識的錯誤：「國內外一般人士都誤信勸共卽是造共的口號，來反對我政府勸共戡亂的政策；而我們的宣傳，又不能突破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這個政治心理攻勢，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共黨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了。」（蘇二二〇）。「後來抗戰結束了，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傳的攻勢，環攻我國民政府爲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牽制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蘇二一五）。尤其是「我們對於他那種辯證法的質變戰術，不僅目覩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黨黨員，還有參加反共鬥爭爲時甚久的份子，仍然認識不清，警覺不夠。」（蘇二一六）

三爲中外人士反共鬥爭經驗的缺乏。「我們本身缺乏反共鬥爭的經驗，世界亦沒有這樣反共鬥爭的先例。三十年來，我們每一次與蘇俄及中共接觸乃至商談，每次與俄共及中共決裂乃至作戰，都是一步一步的探索和研討。有時我們不知其爲俄共的陷阱，而冒然失脚，也有時我們明知其爲共黨的陰謀，而依然中計。……國際社會亦沒有經驗過這樣一個大陰謀的外交先例，所以當時並沒有人能了解蘇俄真是懷抱着這樣統制整個世界的侵略野心，更料不到我們中國反共鬥爭的失敗，對於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竟發生了這樣重大的影響。」（蘇二九九）

最顯著的事例是：三十三年十一月初，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爲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莫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作用之所在。但



是民國三十三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蘇一二五）

又因為「我們對共匪始終是重倫理，講信義，相信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因而一向誠心誠意企圖與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軌，完成建國的事業。那裏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這也就是我們以民族意識和民主觀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戰爭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蘇二一五）

更因為經驗不足，「防制共黨不能如防制共軍那樣嚴峻，而對待其外國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黨一樣的重視，所以我們能够屢次擊敗共軍，而未能消滅共黨的組織，我們能破壞有形的共黨，而未能制止無形的共黨外圍的活動。」（蘇二二五）

並由於美國更加缺乏經驗，致助我而反害我。「從美國看來，他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處國共衝突，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使其戰後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够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十分誠意的，並亦自認其為十分公正的。但在這調處進行中間，美國為使各方接受調處，並遵守協議，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響。他這一政治影響，對於中共的匪區，以及蘇俄的鐵幕，都不能發生什麼效用。而其對於我們中國的國民心理以及我們中國政府的政策與措施，却造成重大的惡果，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預料所不及的。」（蘇一六五）

總之，「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驗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衆的了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

挫折，而終於失敗。」（蘇六）。正因為如此，致「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迴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蘇六）

但是，「檢討了政府和我個人在反共鬥爭中的錯誤和缺失，及其對國際國內所發生的形勢與影響，……只有怪我個人自己，在這長期反共鬥爭中，應該見到的未能預見，已經見到的又未能取信於人。」（蘇三七三）

## 第二、和談是被觀念所誤：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九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後，蔣委員長即發表激勵共黨的談話，他表示「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勦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勸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神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致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蘇八二——八三）。「即如蘆溝橋事變之後，政府收編共軍這件事，也是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蘇二二七）

「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豐功，始終抱着堅強的信心，我個人亦復為此。……民國十二年 國父

於容共之後，雖親見當時中共領袖陳獨秀及其跨黨份子小醜跳梁的惡劣行爲，仍然自信他們中共不能對中國有什麼危害，更不信俄共的赤化中國。我個人遊俄回國之後，雖抱定反共決心，亦由於同樣的自信太過，竟未能對共黨問題作澈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匪軍盤踞延安，其實力不過五千人，當時我們在日本侵華戰事迫於眉睫之際，乃放鬆一着，與他進行政治的談判。此後抗戰期間，我們一方面堅持對特區的警戒與隔離，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國際路線，然而另一方面又與他進行了五次商談，總以爲抗戰進行之中，無論共黨如何背信食言，陰謀煽亂，而在此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與社會公論之下，始終有就範之可能。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性與暴行。」（蘇二二三、二二四）

由於前述客觀主觀兩大類因素，致明知中共任何言論思想的表示，各種行爲的表現，全是偽裝，如「他所謂人民，就是榨壓人民的共黨本身，他所謂解放，就是奴役，他所謂和平，乃是戰爭的另一方式，他所謂共存，就是由他統製的變相。所以他所扮演的笑容，就是他最猙獰的另一面目。」（蘇四二六）。「我們可以說，共黨在其政治作戰中，無論其一言一行，一靜一動，以至於一顰一笑，一啼一哭，隨時隨地所施展的，無不是他的偽裝也無不是他的詐術。」（蘇四一五）。「我們如依辯證法的否定律來判斷蘇俄及共匪的和談與停戰，即可把握其本質。」（蘇四三一）。但仍不得不屢受其欺騙，而且幾次停戰，與它和談。

誠然：「我們在共匪的戰爭威脅之下，自動陷於動搖與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談，而以為從此可以獲致和平，乃是百分之百的失敗。」（蘇二四四）。尤其「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的惟一關鍵。」（蘇一七〇）。「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蘇二三九）

但是，「我們在反共鬥爭中，以誠制偽，以拙制巧，雖曾遭受其重大犧牲，但我們並不因之氣餒，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惡，公義自能戰勝強權。」（蘇二四九）。「至今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及其在台灣所實施的地方自治，恰與大陸上共匪所謂民主專政的極權暴政，成為鮮明的對照，而我們反共抗暴必勝，和復國建國必成的基礎，也就在這裏奠定了。」同時也「使俄共所預定的如期滅絕我中華民國，達成其統治大陸，獨霸歐亞的野心，為之澈底粉碎。」（蘇二四九）

## 第四章 政協前夜十幕對話劇

### 第一節 險惡的背景

在上編各章節中，雖已隨文說及這次國共商談的背景，但東鱗西爪，總嫌散碎，不容易使人一目瞭然於中共這條孽龍的整體，或者是這個鬼魅的全身，及其禍害人類的陰謀暴行。在這次商談的前一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與我國蔣主席三次會談的記錄，正好彌補這個缺憾。並且因為它的記錄是對話體，和記錄這次國共商談的體裁一樣，更可據以推知其後蔣主席和毛澤東五次會談時說的是那些

話，及如何說法的  
這個文件，並被一  
點有異，但相差並

此外，美國的  
他在回憶錄中記載  
文本「蔣總統傳」

應該注意的目

(一) 華萊士

後，繞經新疆省  
係的人物，並且  
部長，一九四〇  
時，堅持蔣主席  
告稱，「蔣主席  
命中產生的成份  
由美國共產黨同  
和拉鐵華爾所代  
界的一個重要機  
館乃至中國國民

其後在一九四八年間，華萊士又曾反對杜魯門援助希臘及土耳其抵抗共黨侵略的政策，而以犧牲其本黨與政府爲代價，則其人如何，更可想見。他既是這樣的一個人，對華白皮書所引述的事實，又必然是根據他的報告，那麼白皮書中對於蔣、華兩氏的談話，爲何作出那種不分黑白，只是惋惜的結論，也就無需另覓答案了。其後太平洋關係學會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T.A. Bisson）「中國在聯合國作戰中的地位」，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其幽靈至今仍在作祟，則尤爲世人所熟知。

（二）參與蔣、華會談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思，早受左翼份子所包圍。證據是，繼高思職位的赫爾利，曾把大使館內親共館員十一人解職，包括謝偉士、戴維斯、基格瓦等與太平洋關係學會有密切關係的高級館員在內。高思自必早被這些館員所影響，并以影響華萊士。故其所發報告，業經美國國務院披露的，無一對國民政府有利。

（三）魏德邁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奉命來華調查中國局勢後所發表的聲明書中，亦有許多不滿意蔣主席的措詞，直到四年以後，他在參議院外交財政兩委員會爲麥克阿瑟升職案被邀作證時，纔自認此一聲明的錯誤。但仍不甚澈底，所以他的回憶錄中，對於毛、周的兇狠陰險，仍少記載。

（四）國共十次商談中，除中共王若飛有一次拍桌謾罵外，色辭總比較溫和，扮相不壞，顯然出於毛的耳提面命。周曾演過話劇，毛也很會做作。他從延安窑洞飛抵重慶，被迎入上清寺愉園張治中宅時，主人照例獻茶，他却失杯落地，僞裝膽小，教人不必怕他。及國民參政會二百五十餘參政員借軍事委員會大禮堂開歡送會，他致答詞時，面色蒼白，聲音急促，說話無幾，時發咳嗽，台下各人正在靜聽，他却突然提高嗓子，向全場說，「讓我喊，——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長萬歲！」喊時高舉右手，全身上聳，然後在衆人鼓掌聲中，低頭緩步離去。他這種表演，和張治中在他返延安的前一日，歡送他於軍委會大禮堂的做作相同。也和他在同去的前一日，陪同蔣委員長在大樑子一家戲院看演平劇，起立道別時，振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異曲同工。他經此三幕的表演，令人感覺他確是誠意合作，赫爾利尤爲深信不疑。除蔣委員長外，誰也沒有料到他回去不到十天，就公然把他在重慶時與政府代表共同協議的「雙十會談紀要」，完全破壞。

今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篇」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對其黨徒所說的一段話看，尤可見他處心的狡毒，行爲的狠惡，偽裝和平的陰險。他曾這樣說，「赫爾利大使要我們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我對他說，我們要自由在地，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國民黨黨奪抗戰勝利的果實，我們要發動全國性規模的內戰。」所以他在將赴重慶的前二天，特別通知他的黨徒，要擴大內戰，通知中有這樣的一段，「國民黨壟斷了整個受降權利，但在華北方面，我們要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鎮等處。我軍配合蘇軍蒙軍造成了我黨有利之地位。」

「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儘可能奪取平綏綫、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道清路。切斷北寧、隴海、膠濟、平漢、滬寧、津浦各鐵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暫時也好。同時使用必要力量，廣佔鄉村和府城縣城及小市鎮。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間的許多縣城，和江淮間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箇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好形勢。再

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份，察熱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所以他在十月十一日剛返延安，十七日就囑咐他的幹部，必須繼續鬥爭，曾說，「在重慶會談已經達成協議的，還只是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和平這一條，雖寫在協定上面，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實現，現在有些地方的打仗，打得相當大。……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這樣的仗，還要打下去。」「紀要上說要和平團結，而實際上在打仗，就把他們（指國府）澈底消滅。」

由此可以了解，當時來到中國的美國大小官員，不論他們是出於故意或無意，他們的言論行動，却無一不是幫助中共，損害國府。並可以了解，自毛曾以次的共徒，不論他們怎樣表現，却都是狐媚狼吞，面和手辣。既如此，則作成「雙十會談紀要」這一時期的內外環境，是何等的危微險惡！

## 一、背景在華萊士三見蔣主席

羅斯福總統鑒於國際輿論與外交報告，漸多同情中共，不滿國府，他自己對國共的觀感，亦逐漸轉變，便派遣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考察中國全般情形，商討改善局勢意見，敦促國府當局忍讓為國，與中共謀致協議解決爭端，以利抗日軍事。並囑華氏乘便應蘇俄邀請參觀中亞細亞農業之約，順道赴俄，一晤史達林總理，觀其對中國的態度。

### （一）蔣主席與華萊士第一次會談

華萊士副總統受命後，先赴蘇俄，後來中國，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廿日抵達我戰時首都重慶。翌日華萊士副總統（以下簡稱華氏）與中國政府蔣中正主席（以下簡稱蔣氏）舉行會談，美方參



與者有駐華大使高思、公使艾哲遜、華氏隨員文森、范宣德、及駐華軍事代表團人員等。我方參與者有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外交部長宋子文、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副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軍令部長徐永昌、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周至柔、政治部長張治中、交通部長張嘉璈、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後勤部長俞飛鵬等。首由華氏要求各部說明當時之軍事、財政、經濟、交通、補給各情形，隨後商討改善上述各項意見。

華氏在談話中着重中國之軍事與經濟，表示美國對中國之軍事逆轉，通貨膨脹，異常關懷。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在獲得美援後，於軍事方面，必能增強戰力，放棄過去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消極戰略，而採積極行動，改變戰局。於財經方面，必能擴展生產，增加收入，消除赤字，穩定貨幣。詎意事實表現，與吾人之理想未符，良深遺憾。設當前之軍事、經濟情勢，不予及時改善，則對盟國之軍事計劃影響至大。要求中國政府迅採有效措施，扭轉軍事頹勢，阻止通貨惡性膨脹，以利共同對日之軍事行動。

蔣氏解釋：（一）關於通貨膨脹，由於抗戰不能結束，軍費必須支出，而國課收入緊縮，盟邦援助有限，為適應事實需要，惟有增加發行。（二）關於軍事失利，由於精銳部隊多在緬甸戰場，國內軍隊，以連年轉戰，甚少整訓時間，尤多陳舊武器，在戰鬥技能與火力動力方面，不及敵軍，以此作戰，勝算自少。加以防線遼闊，戒備須嚴，缺乏有力部隊可資抽調為戰略預備兵團，適時增援，挽回戰局，惟有針對敵軍消滅我野戰軍之企圖，依其狀況，轉進至有利地帶，待機反攻。然此皆係不得已者，今盟邦却要求我政府採取措施，阻止軍事、經濟繼續惡化，吾人自當縝密考慮，若盟友能提供有效意見，則更當樂於接納。

華：經濟惡化，既係受軍事之影響，則防止通貨膨脹當先求軍事好轉；設軍事獲勝，規復若干萬庶地區，增加經濟生產，充裕國課收入，自能減少財政赤字，無須乞靈於增加發行矣。然軍事好轉，首須具有充沛戰力，故增強戰力，實為扭轉軍事頹勢之先決行動。目前中國境內之國軍，槍械不良，訓練不足者固多；但裝備犀利，訓練有素，控置未用者，亦復不少。如西北方面現有武器精銳，戰力充沛之師甚衆，中國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監視共軍。延安受封鎖威脅，亦以其武力不用於抗戰，而以對付國軍，同室操戈，相互牽制之兵力達數十萬人，曷勝惋惜！設中國政府以此強大軍隊，轉用於抗日途徑，增強前線戰力，則軍事好轉，可操左券！

蔣：中共居心叵測，時思乘國家抗戰艱苦之機，發動叛亂，赤化中國。我爲完成抗戰使命，必須安定後方，鞏固國本，乃以必要兵力置於西北，監視共軍行動。倘爲改善戰局，抽調此項兵力，增強戰線，則西北各處防務空虛，門戶洞開，恐國軍朝撤，夕即成爲蘇維埃區域矣，此危及國本至大！國本危殆，中國政府何能抗戰到底，實現盟國之遠東戰略？

華：國共之爭，各執一詞，究竟真相如何？非外人所宜置評。惟吾人以爲延安對中央之反動，可能因其改革政治之要求，未爲中央所採納，乃趨橫決，企圖循軍事途徑實現主張。設中央採納其若干建議，並准其參加政府，共同致力於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則延安當會改變其反中央之態度，而與政府團結合作。既已團結合作，當毋庸再以兵力監視對方，則此項軍隊可依情況之要求，轉用於前線，增強戰力矣，寧非有裨於軍事之好轉？故國共息爭，恢復團結，即可增強戰力，扭轉軍事之頹勢。

中國丁此抗戰艱苦階段，分散對日力量，牽制軍事行動，而予強寇以可乘之隙，殊非明智所取，中國政府何不因時制宜，忍讓爲國，採和內攘外之決策，求抗戰建國之完成？以此，吾人建議中國政

府，修正對延安之策略，稍作讓步，俾由談判途徑解決爭端，恢復團結，消弭中國之軍事、經濟危機。

蔣：國府對中共之談判，非不讓步，且迭作重大讓步，奈中共以國難時期，爲其發展勢力之良機；視談判場合，爲其奪取政權之捷徑，不就所爭執之問題，覓致協議，而按其竊國之陰謀，肆行勒索，迫使政府無從接納其條件，放棄解決爭端之希望，破壞團結，咎實在彼！

雖然，今談判之門，政府迄猶洞開，如彼有和解誠意，可以隨時舉行，否則，雖政府讓步，亦無裨於事。

華：國共談判，未獲結果之原因，依吾人觀之，除雙方不願讓步外，缺乏公正第三者充作調人，居間斡旋，亦有關係。茲吾人建議，以後談判，應邀一第三者參與，以證明曲直，折衷偏差。若以中國人士不宜扮此角色，則邀一外國友人出任調人，或有助於消除僵局，達成協議也。

蔣：尊意良佳，吾人至表贊同，所慮者，不易覓此友耳。

華：倘不以此爲干預內政，吾人願任勞怨，且實告閣下，當余離華府前，羅斯福總統諄諄語余曰：「國共兩黨，不宜延續內爭，務須促其團結，一致抗日，倘兩黨不能直接商談合作，則可邀一友人從旁促成，吾人願任此一友人。」

蔣氏當表歡迎，并約次日（廿二）詳盡商討中共問題。

## ②蔣主席與華萊士第二次會談

廿二日，蔣主席與華副總統舉行第二次會談，美方參與者與昨日同，我方參與者有何應欽、宋子文、張羣、白崇禧、張治中、陳果夫、吳鐵城、王世杰、陳布雷等（餘略）。

蔣：昨承華副總統相告，貴國不憚煩難，願參與國共雙方之談判，調解爭端，此種熱忱，殊可感

佩！吾人與中共談判，經已三次，均以中共勒索過份，態度頑強，致無結果，此後得盟友參與調解，或可使其改變觀感，達成協議，吾人拭目以待，並願聞盟友對此問題之解決高見。

華：承閣下接納吾人參與國共談判之建議，並表歡迎，實感榮幸。吾人深知調解國共糾紛之任務，相當艱鉅，惟以貴我兩國為同仇敵愾之盟邦，在遠東有休戚相連之關係，當此貴國進入抗戰艱苦時期，而有併發內戰影響共同對日軍事之危機，豈能漠視，無動於衷？因此，不避艱難，擬効排解之勞。至於解決辦法，無人居調人地位，似不宜預有主觀意見，將根據國共雙方所提之條件，衡情酌理，折衷斡旋，謀致協議。以此，目前余無調解腹案，當請閣下與政府其他領袖發揮高見，俾增進吾人之了解，而資調處之借鏡。

蔣：共黨問題，本一政治問題，中國政府素主以政治方法尋求解決，但以中共年來之行爲及迭與談判均無結果之事實視之，吾人對中共有新認識，即：（一）中共無意與政府再談判解決糾紛；（二）中共已放棄對日作戰之任務，展開奪取政權之陰謀，並企圖乘國難時機，完成其必備條件；（三）中共展開之陰謀，非一孤立問題，而為國際共黨世界革命陰謀之一部，且獲國際共黨之支持，有既定之步驟與預定之目標，非到達終點，不半途廢止；（四）政治談判與軍事行動同為共黨爭取利益，達到目的之手段，絕不以政治談判予對方為解決糾紛之途徑；（五）除非國民政府統治中國之政權交其掌握，則糾紛永無止境，而內戰難免爆發。以此，吾人對解決中共問題之方法，認為須重新考慮，由談判妥協之決策，已失時效，而非對症之藥。

華：閣下所謂談判妥協，已失時效，是否對中共之問題，將以武力解決？

蔣：余意，在將徹底了解中共情形之看法，提供閣下，使閣下明瞭政治談判不能解決國共糾紛，

而非即謂中國政府改循軍事途徑，解決中共問題。倘中共繼續行動越軌，以武力實現其陰謀，中國政府爲伸張紀綱，而無法避免用武時，則將被迫予以軍事制裁。

華：若此，則內戰爆發矣！勢將削弱對日作戰之力量，設日寇乘隙進犯，恐國軍不及救平內亂，而先爲強寇擊破矣！挑動內戰，不亦危乎？

蔣：然聽任中共圖攻國軍，打擊抗戰力量；倡亂後方，動搖國本安全，則中華民國亦不待日寇征服，而先爲共黨傾覆矣！一味姑息，不亦殆乎？

華：主席閣下認爲國共糾紛難由談判解決者，無非以中共有奪取政權，赤化中國之企圖也；設中共無此企圖，國共糾紛可否由談判解決？

蔣：苟中共無此企圖，吾人相信根本無國共糾紛，即有糾紛，亦早已解決，決不僵持迄今！

華：據中共聲稱，彼等無奪取政權之企圖，僅要求政府接納其建議，開放政權，改革政治，使國家趨向進步而已。此種要求，在民主國家爲人民應有之權利，而未可厚非，中國政府何不考慮其建議，而與協商合作，同謀國家之進步？

蔣：君所述中共之言，係其欺人宣傳之詞，中共對外之宣傳，與其實際之行爲，絕不一致，不可依票面而計值。倘其行爲與宣傳相稱，則與政府之間，根本無爭執發生。政府對其建議，自當盡量接納。無如彼之開放政權腹案，企圖以其本身及親共份子爲領導中心，控制政府，操縱政令，進而奪取政權；彼之改革政治腹案，企圖在操縱政令之後，依共黨方式，建立蘇維埃政府，施行暴力政治。此實一經由政治途徑，達到奪取政權，赤化中國目的之陰謀。中國政府同意開放政權，但反對中共奪取政權；同意改革政治，但反對中共施行蘇維埃式政治。因此，中國政府在考慮其建議後，拒絕接納。

華：中國政府拒絕中共之政治建議，並以武力封鎖其邊區，監視其行動，施用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之壓力，是否可使中共就範，遵從政府意旨，解決彼此糾紛？

蔣：擺在面前之事實，已證明中共之不就範；況彼之行動爲實現國際共黨陰謀之一部，即使中共迫於情勢，意欲就範，國際共黨亦將不許；倘國際共黨領導者令其改變態度，則將作例外接受。

文森：主席閣下迭謂中共行動，爲實現國際共黨之陰謀，此國際共黨，是否即爲蘇俄？

蔣：若國際共黨之領導者，非蘇俄而爲其他國家，則余所指當非蘇俄？否則，當非其他國家。

文森：當吾人訪問蘇俄時，聞我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先生云，史達林總理曾向其表示，願在對日抗戰期間，支持蔣主席領導之國府，并對國共糾紛之未解決，極表關切；然此關切乃由於史達林希望中國對日作戰實際有效之想，而非由於其思想與某方相同之原因；同時彼以爲在遠東方面美國應佔有領導地位。

蔣：史達林作此表示，在不明中蘇關係之人士聞之，或爲吾人欣感；在深明中蘇關係之人士聞之，或爲吾人失笑，蓋蘇俄年來對中國邦交之表現，僅有出賣中國主權，掠奪中國領土，製造中國內亂，而鮮有有利於中國之事實，可爲支持我國政府之明證，其詞實違心之言也；彼或深知美國政府爲增強中國對日軍事之效力，意將調解國共之糾紛，爲免美國疑其與中共有關，特對哈里曼先生作此表示，藉以逃避負中共行動之責任耳！其實中共事無大小皆由其幕後指導，彼應負中共一切行動之責任，倘調解國共糾紛，而不責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將不僅徒勞，且屬大錯！

華：史達林此項表示有無任何用意，吾人未便揣忖，惟閣下之高見，當列紀錄，以便參考。至於調解國共糾紛，責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之建議，未悉閣下能否提出證據，以證明其與中共之行動有

關？若有證據，自當向其交涉，否則，殊難迫其負中共之行動責任也。余意國共爭端之解決，仍應求諸國共本身之決定，而不必涉及蘇俄也。

蔣：蘇俄繼承馬克斯、列寧之野心，領導國際共黨致力於世界革命，此爲舉世皆知之事實，既舉世皆知，卽足爲明證，貴國有何不可向其交涉，課以負中共行動之責？且蘇俄除使中共赤化中國外，其本身亦作侵華行動，中國今日不僅外有日寇壓境之患，內有中共竊國之禍，而復側有蘇俄親邊之憂。中國政府於防日、防共以外，更須防俄。倘盟國爲求對日軍事勝利，須以吾人監視中共之軍隊，轉用於抗戰前線，以增強戰力，而調解國共之爭端，則應同時調和中蘇之關係。否則，吾人內顧之憂雖除，而側顧之慮猶在，爲防蘇俄侵略，仍須以重兵防衛邊陲也，所可抽調轉用於前線之兵力，恐無裨於軍事之好轉。同時中共以我撤軍有限，兵防仍嚴，企圖莫明，亦必按兵不動，保持對峙狀態，則盟友調解之努力，豈非徒勞？以此，調解國共糾紛，須與調和中蘇關係同時進行，同時解決，方期於事有濟。吾人歡迎盟邦調解國共糾紛，更歡迎盟邦調和中蘇關係。

華：閣下之意，歎難遵命：因（一）國共糾紛與中蘇關係，實爲兩事，而情形不同，前者現有爭端存在，且僵持不下，影響盟國共同對日之軍事，美國基於切身利害，不容忽視，有敦促解決，參與折衝之必要。後者，過去雖有不愉快之事影響中蘇邦交，但現未發生爭端，與美國利害無關，吾人殊未便過問。（二）關於責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一事，因閣下所舉蘇俄與中共有關之證據，係屬過去之事，須知蘇俄曾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二日，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已與各國共黨脫離組織關係，卽或藕斷絲連，暗中尚有連繫，但事屬祕密，而非公開證據，不能遽謂其有指使中共行動嫌疑，除非中國政府能提出蘇俄在解散共產國際後，公開與中共恢復關係之證據，則吾人實難向其交涉也。余意中蘇關

係之調和，應由中國政府逕向蘇俄洽商改善，國共糾紛之解決，擬請中國政府作必要讓步，與中共繼續談判，謀致協議。

蔣：閣下之意，似在避免對蘇交涉，吾人不以為然！因此二問題，蘇俄皆係主角，必須向其交涉，方為正確目標，亦惟有美國向其交涉，方獲有效解決；否則，解決困難。倘謂中蘇之間，現未發生糾紛，於美國無利害影響，美國未便過問，則中國為防止蘇俄侵略，保留邊防重兵，不以增強前線，改善戰局，致防害盟國之軍事計劃，豈非對美國有利害影響？美國將否過問？倘謂無公開證據，證明蘇俄與中共有關，不能問其負指使行動責任，則蘇可恃此無恐，放膽指使各國共黨奪取政權，實現其世界革命陰謀矣！各國共黨亦恃有蘇俄支持，肆行叛亂，不達目的不止矣！安能尚望中共於談判席上解決國共之糾紛？後果嚴重，擬請閣下重新考慮為幸！

華：尊意顧慮周到，見解卓越，當予保留，容後考慮。

華：解決國共糾紛之關鍵，據吾人觀察，不在蘇俄保證中共之就範，而在國府捐棄對中共之主觀；因中國政府對於中共持有基本之主觀，堅決認定中共為蘇俄在華之支部；中共之行動，係實現蘇俄赤化中國之陰謀，中共之言論，係絕無信用之謊詞，並基此以處理中共問題，採步步為營之態度，不問中共提出之主張，是否公平合理，皆以為其中有陰謀存在，不願接納，以致彼此關係加深惡化，累積糾紛，無由解決！

設中國政府對中共問題，改變此種基本主觀，而以中共一切與蘇俄無關，視中共之行動在求政治刷新，國家進步，中共之言論，出於衷誠表現，平心靜氣，考慮其建議，或亦覺其主張不無有裨於國是。然後擇其公平合理者，採納，至當可行者，實施。則中共將無所藉口，反對政府所有糾紛可迎刃



而解矣。中國政府，何不改變對中共之基本主觀？

蔣：余意最好請君先勸中共放棄其現有野心，終止其越軌行動，而切實履行提出之諾言。因政府對中共之態度，係根據中共之行爲而反應，設彼無竊國野心之行動，而履行其提出之諾言，則政府對彼根本無戒備之必要。先生何不勸中共先作洗心革面之悔改？

高思：要調解國共糾紛，吾人自當與中共接觸，勸其終止促起政府反感之行動；然中共亦嘗否認政府指摘之事實，並指摘政府一貫對其歧視，企圖將其消滅，而謂其行動係不堪政府之威脅，被迫採取者。以此，吾人亦敦請中國政府改變對中共之主觀意識，以便解決彼此之糾紛。

蔣：國共糾紛，誰啓釁端，孰爲戎首，有昭昭之事實在人耳目，固不容中共信口雌黃，顛倒是非也。余意請按事實以定曲直，依曲直而主公道，持公道進行調解，則得其平矣！否則，惑於片面宣傳之詞，或存先入爲主之見，不顧事實，主觀折衝，則將失之偏頗矣！

范：閣下所言良然，調人自當如是以進行調解，然關於中共所作所爲之事實，據吾人所聞，與閣下所述者，殊有出入，是非難屬，頗難評定，且感困惑！

蔣：是則盟友對國共糾紛之真相，尙欠明瞭也。調人不明糾紛真相，則折衝難期得其平，若此，吾人尙須將糾紛原委作必要之說明，午後會談，當爲君等述之。

上午會談終。

午後，蔣華會談繼續舉行。

蔣：由於上午之交談，發覺盟友對國共糾紛之真相，尙欠充分了解，茲爲使盟友徹底明瞭此項真相，以利折衝，特將中共違反諾言之事實，居心叵測之行爲，敘述如次：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年），中共實行與國府連合抗日之時，曾於九月廿二日發表一共赴國難之宣言，向中央政府及全國人民提出四項諾言：（一）孫中山先生所倡之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中共願爲其實現而奮鬥。（二）中共取消以武力及一切蘇維埃式之運動，推翻政府之國策，並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之土地。（三）中共取消現在之蘇維埃政府，根據民權，推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中共軍隊取消紅軍名稱，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番號，隸屬國府軍委會，待命出動，對日作戰。

當時全國上下以中共能改過自新、團結禦侮，亦國家不幸之大幸！莫不望其實踐諾言，以贖前愆。不意當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後改爲第十八集團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軍隊講話，即謂「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黨中央的決策，是七分發展力量，兩分應付國府，一分對付日軍。決策的實施，分三階段，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本身生存與力量發展；第二階段，求與國民黨力量平衡，而與抗衡；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建立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奪取政權。」

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抗戰前途與黨的路線問題」，亦決定如下方針：（一）擴大戰線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祕密而公開，由局部而全面，爲黨爭取合法平等地位。（二）武裝力量決定政治前途，在抗日期間，盡量擴充武力，以爲未來奪取政權之資本。

爾後，中共之行動，遂按右述各項策略實施，積極在各省展開活動，發展組織，吸收黨員，膨脹力量。同時朱德抵山西後，即建立晉冀豫與晉冀察兩軍區，並於年冬及廿七年春季後，以所屬各股分向冀、魯、豫三省流竄，到處摧毀地方團隊，以擴充其武裝力量。其竄至冀中之徐向前股，並圍攻河北省政府；呂正操股則圍攻博野、安國一帶之抗日民軍張蔭梧部。竄至冀魯邊區之邢仁甫股則圍攻

埔山之中央第五三游擊支隊孫仲文部。竄至魯西之劉伯誠股則圍攻山東省政府。而在武漢之共黨，則領導三個外圍組織之民衆團體，在支援抗日名義掩護下，計劃暴動。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七年）中共之野心更熾，除於延安方面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外，並於三月以後令朱德在五臺成立魯冀察綏邊區政府，又煽動晉南國軍韓鈞所部叛變。其山東縱隊則竄至蘇北暴動。六月十八日，余召見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飭其轉告延安須遵守諾言，及時糾正共軍之行動。廿九年一月間，何總長亦囑葉劍英轉告延安撤銷擅自擴充之軍隊與邊區組織。但中共不遵，反要求擴大邊區範圍與共軍編制。並於春夏期間，其在河北之共軍，進攻河北省府鹿鍾麟部與朱懷冰部；在山東之共軍，進攻國軍孫良誠、高樹勳部；在山西之共軍，進攻國軍趙承綬、王靖國各部。

政府與最高統帥部，爲平息內爭，遏止變亂，提出一解決方案，對中共之擴大邊區要求，准以延安附近及以北共十八縣屬之。對中共之擴充軍隊要求，准第十八集團軍擴至三個軍、六個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擴至兩個師。同時劃定黃河以北地區爲其新作戰地境，命將竄過黃河及長江以南各省之共軍，全數開入黃河以北，對日軍作戰，以免與國軍鄰接，發生糾紛。

七月十六日，何總長與周恩來、葉劍英等商討右述方案，經獲同意，當由周恩來攜返延安，轉交朱德、葉挺飭屬遵照；同時最高統帥部亦通令國軍避免與共軍衝突，國軍固奉命唯謹，然共軍則猖獗如故！

八月間，魯西共軍劉伯誠股，再攻山東省府所在地之魯村，蘇北新四軍葉挺股，則乘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寇激戰之際，進攻省府基地之如皋、泰興，省政府轉進東臺，新四軍復攻陷東臺。

最高統帥部以共軍之不法行動，雖應嚴厲制裁，然爲顧全大局，猶予最後容忍，除由何總長於十

月十九日電令共軍遵限開入防地外，最高統帥部亦於十二月九日親令朱德、葉挺將黃河以南之十八集團軍所部，在十二月卅一日前，開入黃河以北防區；長江以南之新四軍所部，在十二月卅一日前開至江北，并於翌年（民國卅年）一月卅日前，開入黃河以北防區。

詎意該兩部抗令到底，而新四軍向南竄，企圖控制京、滬、杭三角地區，深入皖南與浙西山地，建立據點，竟於卅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圍攻駐於皖南郎溪之國軍第四十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解散該軍。最高統帥部，爲整飭紀律，將拿獲之首犯葉挺，由軍法審判，并明令取消新四軍之番號。

共軍經此懲戒後，其越軌行動，較前斂跡，在德蘇戰爭爆發迄俄軍屢戰屢敗期間，未有滋事，而延安對中樞態度，亦稍溫和。但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俄軍反攻獲勝，克復高加索區後，中共之態度又趨猖狂。其殘留在江北，擅自恢復新四軍番號之陳毅股，又乘江蘇省韓主席率部與日寇激戰之際，進攻蘇省抗戰基地之漣水，並攻國軍戰略預備隊第一一二師。而在山東之共軍，即襲擊國軍于學忠部。迨最高統帥部嚴電詰責，延安反提出四項要求：（一）予中國共產黨以合法地位。（二）朱德所部，擴編爲三個軍，九個師；陳毅所部，恢復新四軍番號，並擴編爲三個師。（三）黃河以南之共軍，俟抗戰結束後，開入黃河以北之防區。（四）陝甘寧邊區，改爲行政區；其他邊區，另改名義。其索價之昂，較前倍增，得寸進尺，實難接納，以致雙方之糾紛，迄今猶未解決。

以上所述，爲中共違反諾言，居心叵測之行爲，亦即國共糾紛之真相，願我盟友以第三者地位與客觀態度，公允批評，究竟實自誰啓，咎應誰尸？如曲在我，當接納盟友建議，先改變對中共之主觀，苟曲在彼，又將如之何？

華：依閣下所述，中共之行爲，誠足令人扼腕！但在吾人詢問其以前，暫時保留批評。

蔣：不過余須促請盟友注意者，即中共對內之態度，係依蘇俄之情勢爲轉移。當歐戰初期，英法處境危殆，德義未遑東顧，蘇俄獲德蘇互不侵犯之協定，保障西陲，利於實施西守東進，赤化中國之陰謀時，中共即行動猖獗，態度狂妄，積極循陰謀而擴張。在德蘇戰爭爆發後，蘇俄屢戰屢敗，自救不遑，無力赤化世界時，中共即斂束非法行爲，僞裝和遜態度，極力求政府之諒解。迨蘇俄得盟國援助，反攻獲勝，局勢好轉，對反法西斯戰爭與赤化世界任務可以同時進行時，中共又拋棄和遜態度，恢復叛亂行爲，由此以觀，足證中共之動靜，皆基於蘇俄之指導。縱然第三國際在名義上業已解散，而國際共黨實仍歸蘇俄統率，遂行其世界革命之陰謀。中國人民亦深知中共之傾向國際主義之成份，較多於傾向祖國政府之成份。

華：中共此種行動，對抗戰官兵之影響如何？

蔣：予前方將士之影響甚爲不利！因彼等以中共如此行爲，政府不予嚴厲制裁，伸張綱紀，而與談判，謀致妥協，甚表不滿，且感困惑！深恐中共在蘇俄支持下，竊取政權成功，彼等身家財產，將無安全可言，赤色恐怖，威脅其抗日鬥志，以此，士氣沮喪，軍事失利。

范：目前蘇俄本身之情勢，尙難樂觀，似不致指使中共放棄抗戰任務，執行其他陰謀，而破壞國府抗戰建國之成功。蓋日寇征服中國後，納粹勢必要求其北進以攻俄，蘇俄陷於兩面作戰之情勢，危險孰甚？中共欲於此時期望蘇俄支持其奪取政權，實難想像。

蔣：中共自美參戰後，已堅信日寇無力北進，遠東戰局，無須中國抵抗，日本亦將失敗。因此，彼等目前積極進行赤化中國之陰謀，而希望政府抗戰失敗，俾增強其自身之地位，以利奪取政權也。

范宣德：中共以外若干進步人士曾告吾人，中國共產黨乃一實行土地改革之民主集團，彼等無意奪取政權，且亦無此力量，惟以政府忽視廣大農民之困苦，未行土地改革，致懷不滿，其目前之行爲，不過爲促起政府實施改革制度之積極表示耳。倘國府能接納其建議，而許其參加政府組織，則彼將樂於與政府合作。

蔣：此一說法，當爲依附共黨之份子歪曲宣傳，殊非事實。因中國共產黨（一）擁有足以叛亂之龐大武力。（二）依以往與現在共區之事實，終年對人民鬥爭、清算、沒收、殘殺，而人民則長期恐怖、饑餓、囚禁、奴役、死亡。即貧僱農階級者，亦勞作所獲不足征獻，流盡血汗不得果腹，較之非共區農民之生活，相差天壤。（三）就其軍事準備及行動觀之，係積極向世界革命之途徑邁進。凡此種種，絕不類一愛國家人民、求政治進步之民主組織，而適足反證其爲一實現馬列主義之共產黨徒，其共產化之程度，較蘇俄人爲尤甚。且彼等之土地改革，主張以革命手段達成，此乃一無人道之殘酷行爲，不合本國情勢之需要，惟一適合中國之所需者，乃我國父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所示之平均地權政策。中國政府原期循序實施，奈自底定全國之後，即遭共匪叛亂，倭寇侵略，國無寧日，妨害實施！然抗戰結束後，即予實行，至許中共參加政府一事，在其改變行爲及達成協議前，暫不考慮。

華：抗日戰爭，關係國家民族之存亡禍福，竊以爲國府應多予人民以陳述意見之機會，國民黨應多予效忠政府之其他黨派以參加政府、共濟時艱之機會，俾全國團結，上下一心，以利抗戰之前途。

蔣：尊意良然，凡有利於國家之建議，效忠政府之人士，國府自當虛懷接納，延攬贊助，以收羣心羣力、一德一心之效，倘中共如此，亦一視同仁。

華：主席閣下以爲中共應當如何，方可解決國共間之問題？

蔣：中共如履行其所發「共赴國難宣言」之諾言，衷誠擁護政府，而充分表現於所接受之軍政任務，則彼此之爭持，解決實極簡單。

華：吾人極願如此，但根據閣下之所述，恐不易爲！

蔣：彼等對貴國殊感興趣，余意由貴國曉以大義，勸其接受政府意見，或樂於從命也。

華：吾人固願竭盡棉力，居中斡旋，倘彼堅持成見，則將如何？

蔣：此余所以前向閣下建議，須責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方於事有濟也。

華：無論缺乏迫使蘇俄負此責任之充分理由，且蘇俄當局亦曾表示中共與其無關，即相強亦殊無益也。

蔣：若然，則請盟友對國共之爭執，暫轉超然態度，彼等或將於無人理會之下，願與政府謀致解決，然此非吾人謝絕盟友調解之謂也。

至是外長宋子文發言：吾人有一申明，即中國政府雖然要求中共服從政令，但無意干涉其地方行政，或罷免其願與政府合作之軍政人員。

華：此固良佳，然吾人尤望國府作更大之讓步，俾早日獲致協議。因國共之不合作，非僅削弱中國抗戰之力量，抑且影響盟國整個之局勢，羅斯福總統所關懷者，在於此耳，而非有意干涉他國之內政也。今閣下等以爲吾人超然旁觀可促使中共願與政府謀致解決，吾人當予考慮，惟須鄭重爲閣下等告者，目前中國抗戰情勢之發展，至堪焦慮，中國政府切勿過於求取有利條件，延宕解決時間，致增大軍事危機，妨害美國在遠東之行動，幸甚！

蔣：羅斯福總統及閣下之意，吾人已深切了解，在當前之世界情勢下，吾人唯一迫切而神聖之任

務，爲增強作戰力量，協同盟國擊敗侵略之日寇。余當悉力以赴，求其達成。對中共之爭端，如其具有誠意謀致解決，政府決不苛刻要求，俾易迅速達成協議，且決循政治途徑進行，此可請閣下轉達貴國總統及朝野人士釋其疑慮也。

華：善甚！

范宜德：中共之真相，人言而實殊，吾人擬派一軍事觀察團及其他人員赴共區一行，實地考察其軍事、政治之情形，以明究竟，主席以爲如何？

蔣：余以爲此舉，將對君等之目的毫無裨益！因貴國之人員抵達共區後，一切行將由彼等支配與監視，絕難自由深入民間及軍中明察暗訪，所得見聞者，僅爲毒藥外表之糖衣，將被其眩惑、利用作義務之宣傳，以增吾人解決問題之困難，共區之行，似以勿去爲佳。

是日會談終。

### ③ 蔣主席與華萊士第三次會談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蔣主席與華萊士繼續會談。

蔣：副總統閣下，昨日貴方提出派一軍事考察團前赴共區考察，余未表贊同，閣下等或以爲憾，因是而益信彼等之宣傳。余經一再考慮，以爲證實中共之真相，無過實地觀察，倘貴方認爲有此必要，而感興趣，儘可派人前往。

華：良佳！俟必要時，派遣之。不過吾人對調解國共糾紛之事，經審慎考慮，決定尊重閣下意見，保持超然態度，暫不介入，願閣下好自爲之。

蔣：倘此決定非誤會吾人有拒絕盟友調解之意，而係出於審慎考慮之結果，則吾人當尊重閣下之



意志。其實中國政府歡迎盟友調解國共爭端，尤其歡迎盟友斡旋中蘇關係。因中蘇間問題，如得美國居中斡旋，改善關係，較易實現；否則，吾人對俄殊少信心。閣下此次來華，道經蘇俄曾與史達林晤談，彼對中蘇關係，當對閣下有所表示，意見如何？願聞梗概。

華：蘇俄當局曾告吾人，彼之人民在華旅行、居留或營正當商業，皆爲中國政府及其人民以間諜或匪人視之，而嚴密監視其行動，未能享有他國在華僑民之待遇，殊表憤懣！尤特別指稱在新疆省內曾與地方政府簽訂合法條約，合作發展經濟資源之利益，未獲中國政府之承認；有數十萬居留新省之俄僑，具有悠久之歷史，未獲中國政府之保障，蘇俄政府殊難漠視。爲維護其僑民安全與條約之權益，必要時，將採取有效措施，以爲外交後盾。

蔣：蘇俄當局如此說法，顯係爲其未來之挑釁行動而辯護，中國政府對入境外僑，除有共黨或間諜行爲者必須監視外，其他外僑，皆依外交條約予以保護。蘇俄人民在各國行爲如何，世所共知，彼對我西北邊省覬覦已久，外蒙、唐努烏梁海由其導演獨立後，皆置於掌握。年來復在新疆發展共黨勢力，勾結不肖官吏，簽訂非法密約；並組織軍隊，供給軍火，挑撥民族感情，煽動叛亂，種種非法行爲，中國政府確有確證；幸指示地方當局處置適當，未生事變，今欲藉口保僑，重演外蒙獨立之歷史，則其行爲與日寇侵華之罪行並無二致。中國政府爲維護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對來自日本之侵略既予抵抗，不能對來自蘇俄之侵略則予忍受也。

華：閣下之意，竊期以爲不可！蓋盟國反攻伊始，正宜增強戰力，擴張戰果，以期擊敗軸心，若中蘇兩國發生衝突，以其用於擊敗日寇之兵力，轉而用於攻擊同盟之友邦，是摧毀盟國勝利之果，而資敵以可乘之隙也，不智孰甚！

蔣！此非不知，無如蘇俄將欲侵略何！

華：上述之不利，非僅中國已也，蘇俄亦復如之。余曾以此勸蘇俄，蘇俄頗有同感，尤爲重新考慮，然此並非已改變態度之謂也。茲余建議，中蘇不愉快氣氛，亟宜終止，不可加深惡化。中國政府應循外交途徑與蘇俄舉行商談，在會議席上廓清彼此之疑慮，獲致改善關係之協議，同時對新疆各民族之政治要求，多予考慮，而力求遂其願望，俾免爲蘇俄利用，則善甚矣！

蔣：閣下之意，吾人至願考慮，中國政府對改善中蘇邦交及實現新疆各民族之願望，在無損中國主權及政府威信之原則下，任何可以避免衝突之措施，不惜委曲求全。惟蘇俄對中蘇關係之態度，似存極大陰謀，懷有領土野心，可能乘中國無力西顧之時會，提出苛刻要求，除非美國政府參與會議，協助解決，則中蘇會談殊難望獲致協議也。

宋子文：吾人茲重申前議，歡迎美國政府與中蘇會談，協助調整兩國邦交。

華：中蘇商談改進邦交，純係兩國間之事，與其他國家無關，美國參與，殊感尷尬。設蘇俄對華政策，果如蔣主席所言，存有其他企圖，而力求實現，則美國居間折衝，亦難促成協議，況美國不能非份干預盟邦之外交乎？中國政府欲望美國對中蘇問題參與任何會議，殊不可期。

不過就余之觀察，蘇俄在作戰期間，尙不致對華有何不遜行動，若在擊敗軸心國之後，而中國之形勢懸殊，則難逆料，余意中國政府及時與其尋求解決，事較易爲，遲則難矣。

蔣：中國政府殊願從速與蘇俄商談，如美國未便正面參與折衝，亦請從旁斡旋，促進中蘇兩國早日會談，和諧改善彼此之關係。

華：余對此未便擅作承諾，願以尊意轉達羅斯福總統，請其考慮，再行答覆。

蔣：善甚。

……  
上午會談終。

午後會談，商討事項多為雙方同意改進之各項實施技術。最後，華副總統致詞，表示此次會談，彼此皆以坦白誠懇態度交換意見，使其對國共問題及其他實際情形，增進了解，收穫良多，深為滿意，並表感謝。蔣主席答詞對華氏不辭勞苦，萬里來華排解內爭之熱忱，亦表感佩；並請其轉告羅斯福總統，如美國願居間斡旋中蘇關係，並促成兩國從速舉行代表會議，將極表歡迎。

六月二十四日，華萊士副總統離渝返美，蔣主席夫婦親赴機場送行，三人會娓娓續談，後據美國國務院透露消息，當時談話之要旨如次：（一）蔣主席對於華副總統訪蘇時，曾以羅斯福總統代表資格，致力改善中蘇關係，再表示謝意。（二）中共問題雖屬內政問題，中國政府實歡迎美國協助解決；不過中共乃一全無信義之黨徒，羅斯福總統出任調解將有啼笑皆非之苦，但如總統甘願冒險任之，中國政府決不以此為干涉內政也。

右錄華萊士三見蔣主席，為對話體，是中國外交檔案中之資料，已成為中華民國歷史的文獻矣。

#### ④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簡略記錄

美國國務院檔案，亦有同類的記載，文字雖較簡略，但在實質方面的出入並不甚大。且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一書中，曾以蔣、華兩氏談話記錄為重要的資料之一，並作如下的評述，「十七年來之慘痛內爭，以及嗣後在外患之下勉強之合作，造成根深蒂固之仇恨、猜忌、觀點與目標之不同，以及不願忘懷往事，凡此皆便可作為有效供獻之局外協助，大受限制，其嚴重之程度，

有爲當時所未能完全見及者。」此一文件既爲美國如此重視與引述，則自有並存的必要。爰將美國白皮書關係於華萊士之使命記載錄之如左：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春，羅斯福總統遣派副總統華萊士前來中國研究如何加強中國抗日戰爭之努力，華萊士先生趁機往訪蘇聯之中亞細亞，短期考察農業發展情形，並於六月下旬抵達重慶。在訪華期間，華萊士曾就彼此有關事件與委員長數度長談。於此數次談話紀錄中，可見討論問題之範圍甚廣，惟大半與本書所述之事件及問題無關。

「在六月二十一日與委員長談話中，華萊士先生謂總統曾向其表示如國共不能合作，彼等可『邀一友人』，總統並表示彼可能即係此友。文森於次晨談話中述及史達林曾對駐莫斯科哈里曼大使表示，願在作戰期間支持委員長，並對國共問題之解決極表關切。此乃由於其對實際有效對日作戰之關切，而非由於任何思想上之考慮，彼以爲美國在遠東應佔有領導地位。

「在六月二十二日午後談話中，委員長對中共作長篇之指摘。彼謂共黨行動對中國士氣曾予不利影響。彼並謂縱然第三國際在名義上業已解散，中國人民仍認共黨傾向於國際主義之成份多於中國人之成份。彼更聲言共黨希望中國對日抗戰失敗，庶可增強其自身地位。彼等對此種發展並不顧慮，因彼等堅信無需中國抵抗，日本亦將失敗。委員長力斥共產黨宣傳所謂彼等僅爲土地改革之民主份子之一說，並謂彼等共產化程度較俄國人尤甚。彼謂如共產黨能同意擁護政府，在政府行政方面接受和平及政治之任務，則共產黨問題之解決實極簡單。彼敦促美國對共產黨維持『超然』態度，則可促使彼等更願與國民黨獲致解決。

此次談話時外交部長亦在座，談話至此，插言政府雖然要求共產黨服從其職權而並無意干涉地

方行政或免除願與政府合作之官員與軍官。最後委員長謂彼了解羅斯福總統之政策，並請轉達總統彼對共產問題，極願以政治方法解決之。

「委員長于次晨六月二十三日談話中，突推翻拒絕美國人赴共區之前議，並同意美國軍事觀察團可以前往。其後談話中復提出俄國問題。華萊士先生強調中國境內，不應許可興起與俄國發生衝突之情勢一點，委員長表示同意。並謂凡無損中國主權，任何可避免此項衝突之事項皆可做到。華萊士先生復謂殊難期望美國參加任何談判，委員長亦表示同意。並謂中國願儘早尋求機會與俄國商討。」

「在當日另一次談話中，委員長請其將下列意旨轉告總統，『如美國能改進中蘇關係並能促使中蘇兩國代表會議，蔣主席對此項友誼協助，將極表歡迎。』」

「六月二十四日委員長於赴機場時，對於華萊士先生以羅斯福總統代表資格致力於中蘇關係之改善，曾兩度表示謝意。委員長且謂共產黨問題雖屬內政問題，惟彼仍歡迎總統協助解決。彼雖堅決表示共產黨乃無信用之人，但如總統甘願冒險協助，他自樂於接受此項協助，而並不認為干涉內政。」

## 二、背景在魏德邁的報告國務院文與回憶錄

中共的話如果可信，那麼上帝也將學習說謊。中共的行為如果合理，那麼魔鬼也就有做上帝的資格。可是當毛酋在重慶期間，竟有不少人認他並不是魔鬼，雖還沒有公然恭維他是上帝。因此，魏德邁的兩段記載，就頗有參攷價值。閱此記載，就更會驚駭當時國民政府處境的如何險惡。

### ①魏德邁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

魏德邁將軍在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四項諾言的一個月後，曾根據毛澤東對其黨徒與部隊所發祕

密指令向國務院提出報告書，從其報告書中，更可證中共百分之百是世界最大的說謊者。其報告如左：

報告書中曾引述毛澤東的如下秘密指令：

「中日戰爭給予我黨一個上佳的擴展機會。我們的固定策略應該是：百分之七十作本黨的擴展，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執行此項固定政策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折衷時期；在這時期我們的犧牲應該表現我們表面上對中央政府的服從，及信奉三民主義（孫逸仙博士所提倡的民族、民權及民生主義），但，實際上，這是爲了本黨的存在及擴展的烟幕作用。」

「第二時期是鬥爭時期，在這時期內，我們應該花二年或三年的時間來建樹我黨的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基礎，擴展我們的軍政力量到我們足以匹敵及摧毀國民黨的階段，而掃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應當等待到一個非常的轉變時期，我們應該給予日本侵略者若干讓步。」

「第三時期是反攻時期；在這時期，我們的軍隊應該侵入華中，割斷中央政府軍隊的交通線，使之孤立而予以消滅。等到我們的準備就緒，來全面反攻，從國民黨手中奪得領導權。」（載在魏德邁將軍報告英文本第二、八三頁）

又據此指令加以評斷：

「這一種共產黨的策略的後果：凡共產黨的游擊活動之處，受損害者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的人民。日軍爲報復中共的破壞，焚毀無抵抗的鄉村。中共又殺死與他們不合作的鄉民，說這批鄉民是『叛國者』或『賣國賊』。實際上，中共紅軍既不能也不願嘗試爲保護人民來抵禦日軍；而日軍更無意於保護中國人民來攻打共軍。介乎水火之間，龐大數額的中國人民簡直是無路可走，除了在兩個屠夫之間盲目地選擇一個。」

「在日本投降之前後，中共所佔最大的便宜就建築於毫不顧及中國人民的命運之上。國民政府却爲自由中國的戰後餘燼而努力保護，雖然效果甚微，中共只劫掠日本及中國政府軍的佔領區，他們所扮的角色是童話中的胡狼與班狼（替獅子覓食），來對付受傷的中國大象，事實上，這匹傷象却倔強地不肯對敵人屈服。」

「在中日戰事中的任何一次大戰役，中共軍隊從未參與過——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上海之役，固未有份。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台兒莊之役，亦未有份，李宗仁將軍在徐州予日軍以大敗。同年保衛武漢戰事，中共未嘗加手。長沙幾次大戰，甚至後來的緬甸及緬南薩爾溫江的戰役，中共都無隻兵參加。連親共的美國人也都口供證實。中共軍隊，在整個中日戰爭中，從未攻擊過任何一個日軍的重要據點或日本統治下的火車路線。忽侯脫在他的與傑柯勃合著的暢銷書「中國怒吼」中也承認：「中共軍隊只當他們有機會可予極少的敵軍以突襲時才出戰……在各次出色的戰役中，總是中央政府的疲竭的兵士去迎戰，咬住敵人而死。」

魏德邁將軍報告，發表於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在抗戰結束十三年之後，距今雖已二十年，但它對於中共軍隊在中日戰爭中的任何一次大戰役未曾參與所作肯定而公平的敘述，仍值得重視。

毛澤東發佈秘密指令後之第二十二年——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十月毛澤東選集第四集開始發售。中有一勝利後我們對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內稱：「抗日戰爭過去了，新的情況任務，是國內鬥爭。我黨目前的情況和一九二七年不同了，在八年中，我們靠自己的力量，現在得到了大小城市一七五個，組織了一百萬的正規軍，二百二十萬的民兵，在十九個省區內，建立了十九個大塊解放區。我有這擴展的成果，爲了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所以要「寸權必奪，寸利必得」。「針

鋒相對，寸土必爭。」這是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八月十三日說的。迨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立即以十八集團軍名義，篡奪受降權。而在八月十日起，兩星期內即又多佔領了五十九個城市。並聲言：「須爭得者全力爭取，即使暫時控制也好。」則其利用抵抗外患，以求坐大，及憑藉外患，以造成其內亂，更假調停與和談，以達其目的，更可明瞭。

## ②魏德邁回憶錄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曾與中央方面會議五次，並曾偕周恩來同訪魏德邁於魏氏寓邸，在魏德邁的回憶錄中，曾記述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如下：

「在重慶我的家中，與毛澤東周恩來談共產主義，我問毛周二位說，『為什麼你們和你們的黨徒，不能由你們自己主動及不採取外國的主義，來完成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極佳目標？』周恩來答道：『中國的解放者不能與社會主義國家相分離，也不能無國際無產階級的助力。』我又問道：『然則你們必須獲得蘇俄的助力？』周便毫不猶豫的說：

『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蘇聯的助力，和英美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助力。否則，我們不能推翻小資產階級的獨裁政權而獲得勝利。』

此時毛澤東惟靜聽而未發言，忽有一女性譯員插口道：

『中國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中不可或缺之一部。我們必須為中國的政治經濟革命而奮鬥。』

至此魏德邁提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蔣介石及他的政府也會努力，達到同樣目的，但毛、周二氏均不表同意。魏氏續言：『共產黨在未得政權前，似乎是人道主義的建設性。及其既得政



權，變爲騙人的陷阱，剝奪了人的自由。」語至斯，周恩來似欲啓口，魏氏故作作不見而續謂之曰：「共產黨爲了獲得政權，所用的方法：說謊、威脅、謀殺、劫奪、奴役，這成了共產黨奪取政權及維持政權的招牌。」

周恩來感覺激動，乃慢慢地說出一句：「這個世界反動勢力太大了！」繼復引申列寧的話：「無產階級必須繼續鬥爭，一直到資本主義全部消滅爲止。」

待毛、周及譯員辭出，魏氏立即紀錄，以證實史迪威、赫爾利、甚至馬歇爾認中共係爲爭取中國人民的利益而非國際共產黨之同路的錯誤觀念。」

另據魏德邁回憶錄，其中於不同時間，而與中共相接觸之事件，又記其對日反攻計劃中，擬進攻東海岸，要求中共同時在華北對日軍施壓力，使日軍無法南調。中共方面贊同魏氏之議，但中共却提出條件，需索器械槍砲及軍需先行運到延安，始肯照辦。

「某次，中共延安疫癘流行，魏氏立於人道立場懇請蔣委員長撥給醫藥十一噸給中共以急救華北的民衆。又另一次，毛澤東忽提出邀請魏德邁爲中共軍隊的總司令，語似誠懇。魏氏自謂不解其用意所在，但立即予以禮貌而和諧拒絕之。謂：『我就任中國戰場總司令，在同一戰場同一中國，我但知執行我所奉到之命令，是竭力支持中國國民政府。』」（以上見魏德邁回憶錄）

由是可見毛澤東在重慶的時間雖僅六周，但在魏德邁身上所用的手段，就很險毒狡狠。

### 三、背景在董顯光著 蔣總統傳

董顯光著英文本 蔣總統傳，語無虛發，事皆足徵。其中關於赫爾利致力國共和談經過敘之特

詳，茲譯是書第二十八章中的一段如左，一以證赫爾利對於中國之統一強大繁榮，確具無上熱情，惟其智慧不足以助成其殷望，一以再證當時背景的複雜險惡。這一段文是：

「在日本投降之前，赫爾利竭盡全力試探重慶、延安戰時協定之可能性。自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王劉會商破裂之後，赫爾利前往莫斯科，冀在莫斯科得到蘇俄居間協助以打破國共僵局。他發覺史達林在那時雖保證勝利，惟對於有關中國共產黨問題，顯然表示冷淡態度，見莫洛托夫時亦然。莫洛托夫重申共產現行路線，矯稱：中國共產黨乃是土地改革者，利用之以欺騙美國。赫爾利在莫斯科因無所得。

當赫爾利大使離華之前，曾一再致力於聯合計劃。日本投降之後，美國國務院一再勸請蔣委員長試與毛澤東作一度面談。因而疊發三電邀請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討協定的可能條款。最後毛澤東同意前來。赫爾利及張治中相偕往延安，陪同毛澤東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飛來重慶。

此次蔣委員長與毛澤東面對面會談乃一十有八年以還之第一次。毛澤東留重慶凡六個星期，與蔣委員長商談。當次一級會議舉行時，張羣、王世杰、邵力子為政府代表。周恩來、王若飛為中國共產黨代表。

赫爾利寧願毛澤東與政府直接談商。嗣後赫氏告政府與共產黨代表曰：伊定於九月二十四日返美國述職，並表示希望雙方能於是日以前達到協議。

此會談直至赫爾利預定離開重慶回國是日之早晨猶在僵持中，赫爾利座機於九月二十四日起飛之前，偕同張羣守候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諾。祇須毛澤東同意，所準備之聯合公報便可宣佈。但是一諾

終未實現，赫爾利起飛返美，他的使命尚無結束的後果。

毛澤東致赫爾利函，祇要求赫爾利展期至伊目觀毛氏安返延安時返美。蔣委員長對赫爾利保證毛澤東安返延安。但是毛澤東堅持赫爾利須給彼以書面保證。赫爾利甫離重慶，共產黨對彼即大肆攻擊。赫爾利良心上致力於予共產黨以公平交易，但共產黨無動於中，只有接受他們的全部條件，才能使他們滿意。

總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四十四日的間歇性談商，赫爾利所促成者，僅有左之一點：

『雙方同意，必須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並共同認蔣主席所倡導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等，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但協議範圍並未伸展至於中共武裝部隊之合法化與中共控制地區之行政權力。關於右舉的目標，中共堅決要求如左：

（一）中國共產黨及地方獨立武裝集團，務須參加軍事委員會及所有分枝機構。

（二）現在所有各級官吏於改編後予以加委，照舊領導其原有部隊，退除役軍官須由政府給予訓練。

（三）在「解放區」所有軍事單位一律編入地方防守部隊。

右之要求，與部隊國家化的原則，大相逕庭。不過使中國共產黨之私有武裝部隊合法化而已。蔣委員長現實的以此為談商之要點，堅決拒絕接受紅軍在國民政府中佔有特殊權力。

蔣委員長就其立場發表談話如左：

『在國家國境之內，絕對無私有的部隊，更不許任何政黨保留有武裝部隊。只有武裝部隊不再受私有利益及個人利益指揮之際，不再受政治黨派私有志願之保護，國家統一才有保障。』

中國共產黨部隊在國軍中應保留若干爲一最顯著的問題。共產黨始要求保留四十八師，稍後同意減少至四十三師。赫爾利大使居間折衷曾建議於蔣委員長核准編爲二十或二十四師。蔣委員長重提舊事告赫爾利曰：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月，獨山未失陷之前，共產黨祇希望得到十二至十六師的軍隊番號。

蔣委員長又曰：假使共產黨接受一切條件，伊可勉予同意共產黨擁有二十師的尺度。此非一新穎而又不現實的事件。蔣委員長飽經政治變故，鑒於中國因受私有軍隊不斷所加之禍害而延阻其進步。彼雖削平軍閥之割據，但實現三民主義之工作，終因之梗阻多年。迄今彼又重觀來自共產黨所加於中國將來之威脅，更有甚於昔日軍閥之挑戰，彼不能與其相調協者以此。

經過與毛澤東、周恩來之全般會談，國民政府深覺共產黨武裝部隊之隸屬問題，爲無法克服之障礙。共產黨用歪曲及游移不可捉摸的態度，如環之無端，以建議代終結，該建議意味着中國紅軍繼續維持其獨立性。

關於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行政問題，中共代表堅持保留共黨行政的獨立統治，如在陝甘寧邊區已經建立者，及其他十八「解放區」。這等要求經歸納後形成左列建議之形式：

（一）政府派遣共產黨所指定之人爲陝甘寧邊區、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等省之主席及委員廳長。

（二）政府派遣共產黨所指定之人爲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省政府之副主席及

委員廳長。

(三) 政府派共黨所指定之人爲北平、天津、青島等特別市之副市長。

(四) 共產黨得提名參加西北各省政府之行政人選。

右列四種建議，顯然不是政治民主化的計劃，實係共黨控制地區進一步合法化之詭計。

凡茲要求，不難一望而知共產黨的真正企圖在妨礙統一，製造混亂，加速中國政治與軍事全面之分裂，造成其全面叛亂，奪取政權的有利基礎，致一切商談，悉爲其此等狡猾的伎倆和要求所弄僵，致四十天之馬拉松談商遂無結果而散。

此次談商唯一成果，雙方祇得到一個協議，即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作爲常設機構，爲未來之國民大會制訂國家新憲法而作安排。談商既閉幕，毛澤東遂於十月十一日遄返延安。

## 第二節 公演出全本鬧劇

張子房能佐劉邦消滅暴秦政權，其九世孫張道陵及其後裔，又都能捉鬼拿妖被除不祥。只是道高一尺，魔高千丈，直到中華民國初年，赤色鬼魅更從莫斯科來到我國作祟，整個大陸淪爲鬼域，迄今猶在猖獗。岳軍先生雖亦姓張，却不曾學過張天師的法術，也缺乏鍾馗捉鬼的本領，更沒有「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爲飯」的特別嗜好，惟受了外國來的馬面鬼影響，只得忍氣吞聲，在重慶會家岩德安里一幢屋子裏，向鬼談理論道，希望能奏「三年伐鬼」之效；而反被鬼揶揄，授鬼機會，弄到「天有鬼屋，地有鬼國，南海小虞山有鬼母，盧充有鬼妻，生鬼子」，到處都成鬼世界，真不幸極了。當時「鬼鬧張天師」是怎樣的鬧法？「扮鬼臉」是怎樣扮法？強詞奪理到如何程度？裂嘴

癡笑到如何模樣？世人至今不曉，岳軍先生白日，仍不公佈那時情景，恐怕「懷鬼胎」的網使鬼的氣餒更鴟張，終不免「搭鬼棚」，使鬼十三年前「鬼鬧張天師」的十幕劇本，盡照原只在逼宮，而其逼宮的奸兇，且使曹操司馬懿

## 一、惡魔伸手

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午後五時半周恩來、王  
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民主、團結  
表大會之宣言爲標準）。

二、擁護 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三、承認各黨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五、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六、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令各部隊原地待命。

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採取各項必要措施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

(一) 政治會議即黨派協商會議，以各黨派代表及若干無黨派人士組成之，由國民政府召集，討論事項如下：

論事項如下：

1. 和平建國大計。

2. 民主實施綱領。

3. 各黨派參加政府問題。

4. 重選國民大會。

5. 復員善後問題。

(二) 確定省縣自治，實行普選，其程序應由下而上。

(三) 解放區解決辦法：

1. 「陝甘寧邊區及」(王若飛親筆加)、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及委員由中共推荐。

2. 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 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直轄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長。

4. 參加東北行政組織。

(四) 實施善後緊急救濟。

一〇、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

(一) 公平合理整編全國軍隊，分期實施，中共部隊改編為十六軍四十八個師。

(二) 重劃軍區，實施征補制度，中共軍隊集中淮河流域(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即

中共現駐地區)。

(三) 保障整編後各級官佐。

(四) 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所屬各部工作。

(五) 設北平行營及北平政治委員會，由中共推荐人員分任。

(六) 安置編餘官佐。

(七) 解放區民兵由地方編作自衛隊。

(八) 實行公平合理之補給制度。

(九) 確定政治教育計劃。

一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

(一) 釋放政治犯。

(二) 保障各項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 取消特務機關(中統調統等)。

## 二、旭日當頭

蔣委員長指示對中共談判要點

三十四年九月四日上午九時於德安里官邸

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第一、二兩條具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應提出。我方可根據日前余與毛澤東談話之要點作成方



案，對中共提出，必要時可將雙方所提方案，一併發表，隨時將兩方談話情形，作成紀錄，通知美國與蘇聯大使。余日前與毛澤東談話要點如下：

一、軍隊問題：關於中共軍隊之編組，去年張（文白）王（雪艇）兩氏與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談時，已允予整編爲八個師至十個師，嗣後余因顧念事實，復於去年冬國民參政會議席上允予編組爲十個師至十二個師。現在抗戰結束，全國軍隊均須縮編，情形已不相同，但余之諾言仍爲有效，不過此十二師之數，乃中央所能允許之最高限度。

至於軍隊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體方案，經雙方商討決定。

二、解放區問題：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區，爲事實所絕對行不通者，吾人應本革命者精誠坦白之精神與態度來解決此一問題。只要中共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則不僅各縣行政人員中央經過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員如主席，中央亦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參加。

三、政治問題：日前談話中，毛澤東詢余對此一問題，如何解決？余答以現在戰爭完結，擬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由各黨各派人士參加，共同參與政治。至於中央政府之組織與人事，刻因國民大會即時召開，擬暫不變動，一俟國民大會集議，新政府產生之時，各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均可依法參加中央政府。中共方面如現在即欲參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慮。

四、國民大會問題：毛澤東氏詢及國民大會將如何召開？余答以已經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應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則除已當選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額。

### 三、邪正昭彰

九月三日周王兩先生談話要點之答復（八日於會談時面交周恩來一份）

第一項

和平建國自爲共同不易之方針，實行三民主義亦爲共同必遵之目的；至民主與統一必須並重，民主固爲統一的基礎，統一亦必爲民主的基礎。

第二項

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

第三項

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爲憲政常軌，今可卽行承認。曾承說明「平等非均等」與「長期合作和平建國」之旨，甚佩。

第四項

「解放區」名詞應成過去，雪艇先生曾謂政府至多祇能作下列之然諾：「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爲國家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歧視。」余等甚贊同。

第五項

此在原則上絕無問題，惟懲治漢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僞軍亦須用妥慎辦法，以免影響當地安寧。

第六項

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第七項

一切武裝衝突，自須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隊不能專賴空運，在必要時，中共軍隊不應阻止其通過。

## 第八項

此條僅舉原則，自無問題。

## 第九項

(一) 政治會議之組織，或如 蔣主席與毛澤東先生所談：「現在戰爭已完結，擬將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各派選任人員參加，共同參與政治」；或如毛先生與寧艇先生所談：「由蔣主席約集其他黨派人士及無黨派者若干人，（名額及人選可由蔣主席酌定）與政府及中共代表開一會議，以極短時間通過政府與中共所商談之結果，此一會議，即可名之為政治會議，不必常開會，有必要時始召集」；可再商談決定。至其討論事項，似可不必預為規定。關於國民大會問題，蔣主席曾謂「已選出之代表仍應有效，但其名額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決」；毛先生曾表示「如政府堅持舊代表必須有效，則中共不能與政府成立協議，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國民大會」；吾人可再繼續商談，並據以提出於政治會議。

(二) 此在原則上甚同意，惟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

(三) 「解放區」問題，已如第四項所答復。中共對於其抗戰卓著勤勞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蔣主席與毛先生談：「祇要中共方面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則不僅各縣行政人員，中央經過考核可以酌予任用，即省行政人員主席，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參加」——其指示極為明白。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

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市副主席，則即非「真誠作到軍令政令統一」，希望以革命者精誠坦白之精神與態度，解決此一問題。

(四) 此爲政令統一後必然應辦之事。

#### 第十項

(一) 關於軍隊整編問題，蔣主席已與毛先生面談：「現在抗戰結束，全國軍隊均須縮編，情勢已與去歲國民參政會開會時不同，但余當時所作可將中共軍隊編爲十個軍十二個師之諾言仍然有效，必當負責做到」；全國軍隊縮編情形，亦迭經文白辭修諸先生面告；故十二個師在中央實已爲可允許之最高限度，務望鄭重考慮。

(二) 中共軍隊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討論決定，於依令編組後實施。

(三) (四) (六) (八) (九) 均無問題，其詳細辦法，倘中共有意見，均可提出商談。

(五) 北平行營主任，不宜規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員會之設置，更不相宜。

(七) 祇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不宜作一般之規定。

#### 第十一項

(一) 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二) 雪艇先生曾提出文字：「抗戰終結後，關於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事，當給與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已得毛先生贊同。

(三) 此項可贊同周恩來先面談之意，祇辦情報，嚴禁有逮捕拘禁等行爲。

#### 四、鍾進士揮筆直書

今日談商之結果

談話時未作任何筆錄，以下係杰於晤談後自行紀錄。

談話時毛、周、王均在座，但談話完全由毛氏主持。（當時王世杰先生任外交部長，不久即赴國外。著者註）

#### 一、政治會議問題

毛氏之主張如下：

（甲）此次雙方商談有結果時，由政府與其他黨派人士，亦非正式與之交換意見。

（乙）交換意見後，由蔣主席約集其他黨派人士及其他無黨派者若干人（名額及人選可由蔣主席酌定）與政府及中共代表開一會議，以極短之時間通過政府與中共所商談之結果。此一會議，即可名之為政治會議，該會議亦不必常開，以後有必要時，始再召開。

#### 二、國民大會問題

毛之意見如下：

國民大會問題，如政府堅持舊代表必須有效，則中共不能與我方成立協議，但中共可不必因是而不出席國民會議。

#### 三、自由問題

毛氏完全贊同下列文字（其大意係予所擬）

「抗戰結束後，關於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合、結社等事當給與人民以一般民主國人民在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 四、關於政黨問題

毛氏表示謂應予各黨各派以合法地位，但亦不反對制定政治結社法，惟謂結社不宜受限制。予謂小黨林立，法國之覆轍可爲鑒戒，彼謂中國情形不致蹈法國覆轍。

#### 五、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毛氏謂應列入共同聲明之文字中。

予謂此事政府準備自動辦理，恐不願列入共同聲明。至何人宜釋放，彼可酌提人名於政府。

#### 六、關於所謂「解放區行政」問題

余謂此事政府至多恐只能作下列之然諾，收復區（予不贊同「解放區」名詞）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爲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歧視。毛氏對以上意見未提異議，惟續詢對此等區域內之地方民選團體將如何處置？予謂制度恐不可分歧。

#### 七、關於中共軍隊問題

（甲）毛氏謂中共軍隊須改編爲四十八師。

予拒絕討論。只請注意者兩點：十二師之數係中央尙未裁軍時所定之數。中央最近數月已裁去八十餘師。

### (乙) 軍隊指揮問題

毛氏表示謂宜以北平行營給予中共將領，俾秉承 蔣委員長之命，指揮中共在山東、江蘇、河化、熱、察、綏、等地方之軍隊。

予謂此不可行。中央軍事委員會中或有中共將領參加。

### 八、受降問題

毛氏最後表示謂南京總受降縱因盟國規定，不能加派中共人員，分區受降必須指定若干中共將領在其區域內執行。

## 五、如此鬧劇如此逼宮

### 國共第一次商談紀錄

時間：九月四日下午九時至十二時

地點：重慶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 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邵力子：（以下簡稱邵）今天是談具體問題？抑任意提出問題？

周恩來：（以下簡稱周）我們上次主張頭四天任意交換意見，以奠立談話基礎，現在四天已過，本來昨天即應商談具體問題，故昨日早晨，有王雪艇先生與毛先生之談話，王先生有談話紀錄，我方亦提出十一項具體建議，此十一項意見，我方在延安時，即已討論決定者。但其文字上

尚可修改，不必作爲定案。我們今天可否以此十一項作爲根據，將其已接近者不談，而先對具體事項不拘形跡的加以商討？

邵

：我們前數日之談話，態度均甚坦白，精神亦甚融洽，然談及具體事項，即覺過重成見，故我以爲我等商談之精神與態度，尙有應求進步之處，兄等昨日所提之方案其中第九、十兩項，實令政府爲難。兄等既主張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而所提出之條款，則又僅就片面之立場，沒有顧及彼此均應遵守之原則。文字上之修改與否，並無重要。所要在談話之雙方不僅要顧及本身之困難，而尤當顧及對方之困難，然後談話始能順利進行。兄等所提方案中一、二兩項立意甚善，然以後之條款，亦必求其一致才好。比如吾人既說擁護蔣先生，便須設身處地、不可增加他的困難。我以爲我等皆當一本蔣先生所說，以共患難的精神參加談話，才能求得具體問題的解決。故兄等昨天的提案，實有重加考慮之必要。

王若飛：（以下簡稱王）昨天恩來所提之十一條，你們當可就此考慮何者可以同意，何者尙須商量？儘可提出討論。

張羣：我等要求得此次商談之成功。有一先決問題，即必須以互諒互信之精神作爲談話之基礎，有此精神，則商談即有爭論亦易解決，無此精神，則縱談具體問題，亦不易獲得結果。蔣主席此次三電毛先生，毛先生亦惠然肯來，無非願求得具體問題之解決。現在時機難得，我們必須拿出誠意，以達成此次商談之目的。然兄等此次所提條件，距離實在太遠，由此可知我等商談之基礎尙須加強，彼此了解之精神尙須增進。蔣主席前昨兩天與毛先生一再談話，其意義亦即在於促成我等的了解，使此次商談，早得結果。恩來兄方才說：彼此意見接近者



邵

不必討論，其亟待解決者提出討論。我以為亟須確定者尙是談判之態度與精神。

周

：我昨天在文白先生家中，與毛先生談到多年來國共兩黨的關係，總存在於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此問題應該解決而且可以解決；但同時一談及具體問題，即覺不易求得解決的方案。現在抗戰勝利，憲政即將實施，問題之解決，迫不及待。數日來與兄等談話，彼此情緒甚好，故個人甚抱樂觀。但昨日看了各位的方案，覺得根本矛盾尙未消除。此方案中一二兩條，態度甚好，不勝讚佩，然亦有數點根本無從討論，故我以為彼此間之了解與互諒，尙待增進。具體問題之解決，自不免遭遇困難，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我今天上午與文白兄言：數日來我們完全在聽取對方之意見，但還有許多問題，尙未談到。毛先生此次來渝，完全是一種友好的行動，自然希望問題解決，比如邊區問題，我們過去主張先解決邊區的軍隊問題，其他問題留待戰後再行討論。但林祖涵同志來渝與中央作第二期談判時，並未獲得解決。其後赫爾利大使私人奉 蔣先生命與我方商談，中共方面提出五點，赫爾利大使贊成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然商談仍無結果，故我方亦未將五點內容宣布。總之國共第二期談判我方成立聯合政府結束黨治之主張，並未蒙中央採納。故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問題亦未能解決。現在戰爭結束，國家需要和平建設，國共第三階段之談判極為重要。故我等在延安時，即預先考慮此次談判，我等究竟可能讓步至何種程度？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即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亦不反對參

邵

加，現亦不打算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凡此讓步，皆爲此次談話之政治基礎，亦即國共兩黨從此政治休戰，足可保證此次談判之成功。國民黨是中國的領導黨，本黨乃一小黨，我等以上述之讓步，政治既可安定，各黨派間亦可和平合作。毛先生有此決心，黨內異議，均所不顧，毅然來渝。如果不希望解決問題，毛先生何能遠來？

：我並非以爲兄等之方案，完全不能考慮，我亦承認兄等此次商談已有若干讓步。但兄等須知中央之讓步，亦已達最大之限度。蔣主席上次答毛先生四點詢問，主張改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容許各黨派參加，此不僅採納中共之意見，亦係容納多方面之意見。又對於實際參加中央政府一點，主席原望於國民大會召開以後新政府成立之時，歡迎各黨派參加。然此時中共如即欲參加亦無不可。此種方式，雖非聯合政府，然與邱吉爾首相當年所領導的英國戰時聯立內閣精神上並無差別。可知中央之讓步，已達最大限度。昨天蔣主席在勝利日慶祝典禮致詞，主張國民大會之召開愈早愈好，以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故關於政治問題，雙方原則上已趨一致。所認爲困難而不能解決者，乃兄等提出之九、十兩項。至關於北平行營一事，雪艇兄已申明不能考慮。北平政治委員會一事，政府現時根本無此制度。政府於東北行營內設置政治、經濟兩個委員會，係應東北收復後特殊情況之需要，以收復淪陷已久之東北政治、經濟爲目的。而兄等所提之政治委員會之性質，實與「九一八」以前華北、西南政治委員會相同，其於國家之統一，實相違背，故我對兄等此項主張之提出，實不勝詫異！國家之環境與需要已進步至現階段，吾人一切主張，不應使國家退步，恢復十年二十年前之舊態。中央所要求者，僅爲政令與軍令之統一，至於用人行政，必本用人惟才之旨，決不岐

視中共人士。此種大公無私之精神，兼顧事實與體制，應爲兄等所接受。而兄等尙有懷疑，可見我等互信互諒之精神尙不够也。故我以爲此次談話，仍以培養互信互諒之精神爲首安，而軍隊之數目，尙在其次也。

張 羣：恩來兄所談政治基礎，我甚了解，我們希望此次會談可以成功，亦卽在此。至於解決問題之辦法，我們也可以盡量商討，求得結果。不過感覺困難的，卽兄等昨日所提出之九、十兩條，實爲問題之癥結所在。此兩項所涉及之軍隊改編與解放區處置辦法，前天 蔣主席與毛先生談話時已有誠懇坦白的表示！如軍隊之數目問題，其前後談判的經過，與中央目前整軍計劃及其實施情形，文白兄將有所說明。而就以往所談判的，與兄等昨日所提之建議比較，則距離甚遠。至於軍隊駐地與軍隊數目有連帶關係，軍隊數目多，自然駐地廣，反之，駐地小，蔣主席指示將來軍隊駐地，可由毛先生提出方案來討論。他的意思，無非爲顧及實際情況。但兄等須知所謂軍隊數目與軍隊駐地，實爲一個問題之兩面，因此，我們雙方都應該有一個互諒互讓的辦法才好。

其次爲解放區問題，我們站在國家行政立場說，我們國家要求政令統一，只有從法令規章上來想辦法，根據法令規章，再在人事上作相當考慮，看如何考核，如何任用，究竟中共人士須要就幾省幾區中來設法安插。惟有採取此種方式，才可以解決兄等所謂解放區問題。但如認解放區爲國家內部另外一種政權，致將國家領土分割人民分裂這種辦法，在抗戰時期，或基於省區淪陷敵手，一時不妨爲權宜之計則可，但現在戰爭已經結束，國家要求和平統一，此種狀態，豈可任其繼續存在，自非遵循國家法令規章，及時加以改善不可。倘使現行

法令規章有不妥善處，則依法修改之，廢止之，乃至於再創制新法，俱無不可，而切不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某些地區可通行某種法令，某些地區又另外通行一種法令。倘然如此，則根本與國家政令之統一，背道而馳了。縱如兄等所議重劃省區而治，亦是各行其政，互不相謀，非導致國家於分崩離析之局不止了。蔣主席今日曾與毛先生談話謂中共的困難，即是彼之困難，彼之困難，亦即是中共之困難，彼此必須本乎互諒互信的精神互相照顧，以求困難之克服，始能求得問題之解決。因此本人建議，對於困難的問題，可多交換意見，務增進彼此間之了解，如同作戰，首先攻堅，對於困難問題，首先聚精會神商討，集中力量來求解決。

我們提出解放區解決辦法的四點、有兩個原因：（一）我黨對國民大會之選舉現已讓步，我黨僅為少數黨。（二）國民大會以後無論在政府在議會，我黨亦必仍限於為少數黨之地位，如此，我黨幹部之安插與黨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發生問題。所以我黨主張凡一省一市我黨佔多數者，其省政府主席直轄市市長由我黨推荐，佔少數者由我黨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長，此係為讓步合作設想，期使兩黨不致對立。若不然，則無論在國民大會席上，或國民大會閉幕以後國民黨都是居於第一黨，而我黨政治地位，尙復有何保障。所以我們坦白的提議要求政府承認我黨在現有地區的政治地位。即我黨所推荐的行政主管人員，仍由國民政府任命，各省市行政，僅由我黨推荐人員辦理，而非由我一黨壟斷。現在東北三省已劃分為九省，依此辦法，則陝西四川及其餘各省莫不可以重新劃分。如能按照重劃省區辦法，來解決解放區問題，亦不失為一良策，但兄等均不贊成。因此，我黨始提出昨日之建議案。

至於北平政治委員會之設置，乃為改組過程中增強兩黨團結之辦法，其隸屬或在北平行營之下，或置於行營之上，均可商量，蓋我黨所着重者並非在此，而惟在謀北方幾省政治問題之解決也。

總之，我黨此次所建議之辦法，其目的在促成國民大會之召開，並促成國民大會後全國政治之安定，使兩黨均可安心。此種辦法，與兩黨所共持之原則，並無不合之處。我黨所爭者惟在人事與組織。即於政令統一的原則之下，我黨只求人事與組織之調和配合，而決非於中央體制與法令規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種相反的體制與法令系統。我們所設想者誠為一理想的完全統一之局面，但此理想，決非一蹴即可實現，一如軍隊之改編，亦非旦夕之功即可辦到與中央之編制與裝備訓練等完全相同也。由此可知我黨昨所提建議之九、十兩項，皆與原則相符，今後急待解決者，為省市區域與軍隊之數目而已。

邵：我所關心者在有了辦法是否能夠實行？如不能實行，則此項辦法，在中外人士看起來，不過是相安一時之計，決非國家長治久安之道。尤其你們主張何省應歸中央，何省應歸國民黨，何省應由中共參加，以此種方式提出要求，無怪乎社會評論將形成爲南北朝。

王：我們今天談話，甚爲直率，檢討我們兩黨之關係，非自今日始，自抗戰以來，彼此之間即已存在許多問題。此蓋由於兩黨作法之不同，與所處之環境各異，故我黨今日始有敵後軍隊與解放區政權；但現在抗戰已勝利結束，我們要求和平民主團結，以求中國政令軍令之統一，此一原則，彼此都是同意，但解決問題，必須根據事實，即如國民黨政府，現在要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其間必須依據實際政情，規定步驟，逐步進行，始達目的。又如收復東北，

亦必須根據東北現實情況，按照計劃與一定手續，始能接收。所以我們有了原則與方針，還須根據事實，一步一步去進行。此次會談，我們要解決一切問題，首須承認事實，我黨所提建議案，其第一、二兩項，即係承認國民黨之政權並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而我黨今日所要求於政府者，亦無非在於事實之承認，此種既成事實，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認，則客觀上仍然存在。今日我黨客觀之事實為何，即擁有一百二十萬軍隊，十九個解放區政權，此種事實如不承認，而要用武力解決，則不僅為今日之國情所不容許，而且為我黨所堅決反對。此次蔣主席三電約毛先生來重慶，其意即在避免武力內爭，而企求以和平民主與團結的方法來求得統一。我黨昨日所提建議辦法，亦係循此途徑以解決兩黨之問題。

周

：我黨不僅事實上擁有敵後軍隊與解放區政權，而且擁有百餘萬黨員，此百餘萬黨員如何安置，必須有一過渡辦法，我黨之所以要求幾個省與幾個市即係為此。

王

：我黨既有百餘萬黨員與百數十萬軍隊，又有許多由人民產生之解放區政權，這一般黨員官兵等，皆須顧到，期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過渡到團結統一。故我黨建議中之北平行營與北方政治委員會即係應此目前實際之需要而設置，如無此安置之辦法，則我黨即無以對全體之官兵與黨員民衆。

張治中：恩來兄，我們兩人今天上午所談者，兄已報告毛先生否？

周

：尚未詳報？我當時所說軍隊改為四十八個師，自非旦夕之功即可作到中央之標準。即中央現在整編軍隊，亦不能在短時期中即可使所有部隊照新編制一律辦好，更何來如許美械以裝備中共軍隊。故我們雖規定為四十八個師，但尚須有實行之具體辦法，以為過渡。其他政治問

邵 周 張

題之解決，亦係如此。不是有了理想，即關於解放區問題，我認爲此爲戰時之狀態；此乃是名詞問題，事實仍然存在，只要我們兄所談中共政治地位問題以及解放區與中共政治地位，不必與解放區相提並論，即我們中共承認中國國民黨爲第一大黨，自居於共商國是，一切問題在中央妥商解決，在易解決。中共之政治地位，係由八年來在二期或抗戰以前，國民黨與政府不會承認中共不在堅持所謂解放區之承認，而須就整個允諾增加名額，俾中共亦有代表參加，則國民黨今既願與中共攜手合作，共商國是合作之精誠與商談之圓滿成功而益增鞏固泥形式，以爲有了解放區作政治基礎，始中央自可於法令規章範圍以內盡量設法調劑，未有不被採納者，故余之意見，兄等是否命令之統一，至於地方問題，在政令統一的承認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須承認中共解放區。

王

難期問題之解決。

邵

：即法國今日所行之辦法，亦非如兄等之所要求者。

周

：法國因有一貫之民主傳統，人民選舉可不受解放軍——地下軍之影響，此種情形與中國不同。而其選舉結果，共產黨居第一位，其他黨派皆居少數。

張治中：我前天與恩來兄談及中國在此次戰役，已成爲世界五強之一，我們必須朝現代化的方向前進。固然，我們現在尙不能一步登天，走到英美一樣，但吾人一切措施，決不可再蹈軍閥時代的覆轍。軍隊復員可以依照功勛以定升敘，但決不可恃其武裝，向中央要求地盤。其他文武官員，亦莫不然。且就中共立場而言，中共是否必須爭地盤，爭軍隊，始保證其地位。余以爲不然，中共此時如能放棄其地盤，交出其軍隊，則其在國家的地位與國民中之聲譽，必更高於今日。軍隊之編組與安置，如不依照現代國家之合法合理的辦法來辦理，決不能成爲現代國家之軍隊，此一基本觀念，吾人必須確定。故余以爲兄等此次所提辦法，實爲支離破碎之辦法，決不能促成國家之統一。我爲兄等計，最好能將此次抗戰期中所有中共之將領列名呈報中央，何者應委以實職，何者應授予勳章，編餘人員應如何安插。中央顧念全體將士抗戰之勳勞，必一秉至公，酌量辦理，我們幾年來主張有功之將領，不必升官，只敘勳績，此乃現代國家之辦法。若飛兄說要承認事實，我當然承認你們有文武人員的事實。但兄等亦須承認一事實，即國家已走上現代統一道路的事實。國家爲酬庸將領，決不能學古代的裂土封侯！此點兄等當然明瞭。故我以爲兄等之文武人員應安置者，可照現代國家之辦法，向中央陳報，何人可任行政工作，何人可任軍長師長，何人可以敘勳，何人應予調整，編一名冊



送來，中央必盡量採納。我想此次抗戰之後，政府對於文武人員，皆當設法安置。然軍隊必須標準化，政治必須注重於現代之建設，以期造成爲現代之國家。故吾人今日所討論之問題，實不離一觀念的問題。我等對於現代之國家，究竟應有何種正確之觀念。

且余以爲中共要保持如許軍隊，實一累贅，軍隊之經費，必須取給於人民，當然要增加人民的負擔，國民之印象亦不能轉好。且此次抗戰之後，敵人已被打倒，各盟邦與我國之合作日益增強，正我們致力和平建設之時期。吾人尙要保持此龐大之軍隊，豈非失其意義乎？現在我等之基本精神似已協調，然基本觀念尙未一致，具體問題難於解決者在此。

邵：我想中共即令無一兵一卒，國民黨也不能消滅他，中共軍隊少一點，國民黨也不致進攻他，反之，即使中共軍隊再多些，亦決不能打倒國民黨。

周：兄等以封建軍閥割據來比擬中共，我不能承認。我們兩黨之擁有武裝，且有十八年之鬥爭歷史，此革命事實發展之結果。今日我等商談，即在設法避免雙方武裝鬥爭，而以民主之和平的方式爲政治上之競爭。

邵：兄等之意見，認爲各種軍事政治問題之解決，須有一過渡辦法。余則認爲值此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必有過渡時期，即可使國內統一團結問題爲整個之解決。

周：我們現在皆認定「打」是內外情勢所不容許的，所以只能以政治解決。本此宗旨，我黨已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只看中央對於此事之解決，所準備之具體方案如何？

張羣：今天的商談可以歸納出一個結果，即是我們今晚所提的意見，請恩來與若飛兩位詳告毛澤東先生，兄等詳加考慮後，可隨時通知我方再準備下次繼續商談，總望談一次能有一次的進步。

## 國共第二次商談紀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八日

地點：重慶中四路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張治中 邵力子 周恩來 王若飛

周恩來：（以下簡稱周）上次商談情形，我等已告訴毛澤東同志，我方所提十一項建議，每項之下，本已附有說明，但因我黨現在之地位，無論敵後政權與解放區軍隊皆未蒙承認，故我方所提建議，不能獲得兄等之信任，而報紙言論，甚至說我們爲割據，似此理論鬥爭，我方亦將強調結束黨治，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以相對抗，如此，談判成爲僵局，問題即不能解決。

本來我方提案主張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如能通過，即可結束黨治，實行普選，而一切軍隊之整編，省區問題之處置，皆可由聯合政府辦理，如此，一切皆了，即不必再如今日要就個別問題來商談，只以此項提案未曾獲得政府之同意，所以這次毛同志來渝，即不再提，而改提日前之十一項建議。此次建議之精神，在承認國民政府的法統與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故政治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參加政府，順從政府的邀請，我方已爲很大讓步，其他軍隊駐地與省區問題，我方皆提出切實之方案，而兄等認爲不能考慮，尙無明確答復，究竟政府對於這些問題如何想法，我方亟願知道。

現在其他黨派人士正盼我等商談獲得結果，以便他們共同參加，公開談判，而免妨礙民主作

風。但我等所商各事，雖然原則略已同意，具體問題，尚無結論，可對兩黨以外之人宣佈，因此，他們已不免發生誤會。我等應予注意。

我等上次所談，皆爲具體問題，如軍隊數目，我方所提出者既不予考慮，蔣主席所指示者——十二個師是否固定不變？其實依據我方之建議，我黨軍隊已裁去一半，地區已退出一半，而政府尙以爲我們要求太多，超過了實在數量，其他政治會議，國民大會與自由問題……等，我方皆已提出解決辦法，皆未蒙答復，希望政府能够對此有所說明，俾我方得詳加考慮。

張治中：上次兄等所提方案之十一項建議，其中第九項關於省區，中共要求完全佔有五個省及一個邊區，參加六個省與四個直轄市，猶如分割地盤，我們不敢贊同，第十項關於軍隊，中共要求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數字太大，我們不能接受。所以兄等要求政府答復，政府實在困難，還望兄等重新加以考慮。

周：如政府不能承認我黨現存之地區，即可實行普選，如不贊成普選，又不能同意我方建議，則政府尙有何辦法可以解決問題，兄等總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讓步，一概退出。

張治中：要建設現代化國家，一切事必須依現代化辦法處理。前年林彪來渝，中共要求十至十二個師，去年林祖涵來渝，則要求六個軍十五個師，時間只相差一年多，已增了四個師，此次兄等來渝，則要求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較之一年前，更增加了三十三個師，兄等軍隊之擴充，何如此之快！又豈是現代化國家所應爾！

王若飛：（以下簡稱王）我方以往所提出者因爲戰時，只是解決軍隊問題之一部份，但現在抗戰結束，已到和平建國時期，故須將整個軍事來解決。

周

：過去在抗

東，故須

主

：我等談話

（中共有

前，人所

一，已不

取解決辦

雙方之對

但亦要求

決。否則

兄等要求

何能謂爲

五省，過

參加，何

必須一方

解決。

張治中：兄所謂兩

皆設有國

爲國家所有，而非國民黨一黨所私。本年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且已正式決議將軍隊黨部取消，即其證明。故現在中央軍隊並非國民黨之軍隊，而乃是國家的軍隊，將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實施憲政，本黨還政於民，則軍隊即是人民的軍隊。既然國民黨已無軍隊，則中共復何理由要保持其一黨所私有之軍隊。

王：國民黨現在尙在黨治時期，故所稱中央軍隊，尙是國民黨之軍隊。

張治中：兄謂要承認事實，中央現已准許將中共軍隊改編爲十二個師，其人事亦可由中共保薦。此即中央承認事實之苦心。至所謂解放區作風不同，全國各省都奉行保甲制度，而解放區獨異，因而要求劃出五省歸中共，此種辦法，實在違反現代國家之要求。

周：我方只是在法統不容紊亂，黨治必須結束的原則之下，提此建議。亦可說是一過渡辦法。

邵：中共要求分割省區，殊與國家之統一原則不符。

周：我方建議，乃於盤根錯節、痛定思痛中想出辦法。本來我方一貫主張普選，如今既不普選，又不遷就事實，何能走上和平建國坦途。

邵：余意雙方精神如能獲一致，問題自易解決。即如王外長雪艇兄前次在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旅大問題，雪艇兄語史達林如依蘇聯所擬方案（按即要求租借旅大）則中國九龍租借地，即無法收回。蘇聯素來贊助我國取消不平等條約，曷若再助一臂，俾竟全功。史達林聞之，慨然應允，旅大遂獲收回。今中共要促成國家和平統一，而又要政府承認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實，實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棄武力與地盤，誠意率之國家，則以蔣主席精誠謀國，天下爲公之作法，不僅不致虧待中共，而且將敬重不置。

周

：如此，我們即可依照建國大綱之規定，實施省縣自治，實行普選。

王

：依照我方之建議，並非向中央作分外新的要求，如軍隊，如省區，皆屬事實已經存在，不過根據事實，擬定辦法，以求實現和平統一，民主團結的目的。我等既已申明擁護 蔣主席，亦希望 蔣主席對於我方所請求者有公平的辦法。

周

：我方已首先承認政府法統，擁護 蔣主席的領導地位，而要實現國家統一，使軍隊改編，政治普選，皆須有一過程，始可達到目的。今總觀我方十一項建議，無一項不是本此精神，作相當讓步，以期解決問題，並非有意與中央為難。

邵

：雙方在原則上皆已同意，所不同者為數字。

王

：此即由於未承認我黨之地位所致。

周

：政府對於我方建議，究竟有何意見？

張

：為增進諒解，不如依照文字記載來商談。我等已會談五次，原則雖無多差異，然商談尚未臻具體。兄等前次所提建議，僅憑口述，我已紀有要點，此外 蔣主席與毛先生幾次談話，以及我等過去幾次會商，所有要點，亦已一併整理。此項文件，請兄等一閱，如有錯誤，可以改正（當即交與周恩來九月三日周王提出談話要點一份）。因此，我提議，雙方對於理論商討，可以告一結束，今後應討論具體問題，以期一次會談有一次之進步。至於對兄等建議十一項，我方已遵照 蔣主席指示之要旨，擬定答復一件，即請兄等收閱加以考慮。此兩項文件，即為近數日來，雙方會談所得之具體紀載。

周

：我方當根據兄等之答覆，加以研究，其已獲得雙方同意者，即可認為解決。其未一致者，再

國共第三次商談記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十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半

地點：重慶中山四路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周恩來：（以下簡稱周）前日會談兄等提交我方對於九月三日十一項建議之答覆，我等已詳加研究。今日會談原擬就軍事、政治與黨派各項問題，逐一討論但因此等問題都是彼此互相關連，可否提出其中較為重大者，先行商討，以期獲得結果？如此，其他事項自可逐一迎刃而解。

在軍事、政治、黨派三大項目中，最重要者為政治與軍事，而政治方面所包括者有三大問題：（一）政治會議，（二）國民大會，（三）省區。軍事方面所包括者有兩大問題：（一）重劃受降區，（二）縮編軍隊。至於黨派問題，彼此意見，略相接近，易於解決。

今天談政治問題，首先討論政治會議，所謂政治會議，即是黨派協商之會議。此事去年冬我與王雪艇先生曾有商討，當時我方主張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雪艇先生則主張改為政治會議，邀請各黨派人士參加政府，雙方意見大體上還相接近，故我方認為可以接受考慮。後來六參政員赴延安，亦主張召開政治會議，此次毛先生來渝，日前與雪艇先生談話，遂同意此項主張，提出於九月三日之十一項建議中，此項政治會議，在顧全國民政府法統原則之下，就各黨派推出之代表以及政府所遴選之無黨派人士，事先經過兩黨協商決定，即由

國民政府召集之。政治會議所協商之事項有五：（一）和平建國大計，（二）施政綱領，（三）各黨派參加政府問題，（四）國民大會問題，（五）復員善後問題，凡此五項，皆由兩黨事先協商，獲得一致結果，即由蔣主席名義提出政治會議討論，（不由中共提出）通過後，再送請政府接受辦理。此項會議，實係兼顧法紀與事實，而為結束黨治過程中所必要者，其與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後所成立之政治會議性質完全不同，前者為政府以外之協商組織，以求得協商一致為目的，後者為政府以內之權力機關，以多數表決為通過。

張羣：此項政治會議是經常的，抑是臨時的？

周：此項會議完全為協議上述五項問題而召集。此五項問題獲得協議得到解決，則會議的任務即算終了。因此，倘對此五項問題在一次會議中即可全部解決，則一次會議後，即可結束，不必再開。故此項會議，完全為各黨派臨時協商之性質。

張羣：關於政治會議之組織，中共方面有何意見？

周：政治會議由四方面人員組成之：（一）中國國民黨之代表，（二）中國共產黨之代表，（三）其他黨派（包括青年黨、民主同盟等）之代表，（四）無黨派人士。

邵力子：（以下簡稱邵）各方面之代表人數擬定若干？

周：我方建議四方面各推選代表九人，另請蔣主席參加，共計三十七人組織之。

張羣：兄所稱無黨派人士，究竟所指示為何？嘗有以前自稱為無黨無派之人士，而現在或已加入民主同盟，或已加入其他黨派，自不能再稱為無黨無派之人士矣。

周：所謂無黨無派人士，必須真正屬於無黨無派者而後可，其現已加入黨派者，自不在內。



張羣：再、「其他黨派」亦有問題。所謂其他黨派究竟包括那些黨派，現在各黨派，如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國社黨，我們已經承認，但第三黨，救國會……等雖於二十七年武漢時曾一度要求承認，但均未獲允。又如民主同盟，原由民主政團同盟演變而來，其中參加份子爲共產黨，青年黨，國社黨份子，亦有以個人名義參加者，迄未獲承認，此等黨派如何處置？

周：聽說杜月笙、章行嚴等最近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黨。

張羣：在這些黨派之中，青年黨已有二十一年之歷史，黨員人數較多，居於第三個較大的政黨之地位，如要他加入所謂「第三方面」共同推選代表，恐他們不願意，在政治會議中，青年黨恐將爭取一個單位。

周：此等問題可以協商，不過我方主張其他黨派還是聯合共同推選代表爲好。

張治中：此次會議可稱爲政治協商會議，不必稱爲黨派會議，其參加人員可由兩黨協商名單送請國民政府召集之。

張羣：如邀青年黨、國社黨與民主同盟參加而由我兩黨指定其參加人員，似不甚妥。

邵：可商同他們自己提出人選，惟無黨無派人士究竟推出幾人參加，其人選似頗不易。

周：曾赴延安六參政員中之傅斯年、王雲五、胡政之諸位均可，又國民參政會中代表產業界與文化界之無黨派人士亦可遴選。

邵：此類人選極少。

張治中：出席政治會議之人數似不宜太多。

張羣：各黨派既皆有其組織，則其代表人數雖或多或少，效力初無二致。

周：此乃國民大會召開以前對一切問題採取協商性質之會議，各方所提出代表人數之多少，無關重要。但求對所議事項能尋得協商一致爲目的。

張：倘會議中不能一致時如何辦法？

周：我們可以盡量於事先協商一致，即令會中有一、二人持異議亦不難說服。因既爲協商，自必有數個大原則可資約束。

邵：兄等考慮「第三方面」可出幾人？

周：他們可共出九人。

邵：青年黨分配幾人？

王：可由他們自行酌定。

周：如嫌人數太多，可否就國共兩方面之代表名額中減少數人。

張：關於政治會議之組織兄等尙有更多意見否？

周：無他意見。

張：關於政治會議協議之內容如何？

周：除前述五項問題外，對於國共談判經過情形，亦可提出報告。

張：所謂和平建國大計，究何所指？

周：即我方所提十一項建議。

張：此十一項建議以何種方式提出？是徵求會議之同意，抑經兩黨協商決定後提出會議報告？且此等建議事項而以和平建國大計爲題提出，是否尙須考慮？

周：本來我方十一項建議中已有政治會議一項，其他軍事政治有關各項協商結果，皆可提出，以示公開。

張：所謂施政綱領，據恩來兄剛纔所說，經過兩方協商決定後，不由中共提出而由政府或蔣主席名義提出，意見甚好，但其內容，兄等有無決定？

周：我方已擬有施政綱領草案，係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形式。

張：對於國民大會問題有何意見？

周：對於國民大會我方主張重選代表並延期舉行。但在雙方協商未臻一致以前，暫不公開。因為如實行普選，則將來究竟何黨佔多數，尙不可逆料。如此次英國大選，工黨竟佔壓倒之多數，即其一例。不過中國民主之基礎尙未普遍，如實行普選，結果國民黨必然仍佔多數。至於開會時期，我方主張延展，其理由：如受降工作四個月完成，而國共談判，獲得解決，全國政治，悉就秩序，彼時人心大安，再公告內外，定期召開，實最妥善。且至遲亦不出一年以外。

張：對此問題，過去討論已多，兄等主張代表重選，而我方顧及法令與事實，必須於維持舊有代表的原則之下，來想補救之辦法，如兩方互不相讓，則此問題即無法再談。我以為循協商之途徑，如能以維持舊代表為前提，則補救辦法甚多。

：吾兄有何補救辦法？

張：或於應選而未選出之代表名額中，由各黨派分配選出，或於原定代表人數之外，再增加若干名額皆可考慮。

王：國民大會之召開必須延期，代表最好重選。如果國民黨認為重選有困難，亦可提出方案協商決定。兄所謂增加名額是否可增加三分之一？

邵：如增加三分之一，固可對十年來已獲選民資格及抗戰有功者予以被選之機會，但政府將無以說明為何全部代表不能重選之理由。

周：國民大會延期舉行，似可作一決定。

張：國民大會如須延期，不外兩個理由：（一）籌備不及，（二）協商決定。如就我個人的意見說，則目前「還都第一」，俟抵南京後，再從容召開。不過就國民大會主持籌備人員之意見，恐仍以愈早舉行愈好。

周：此次國民大會乃確立建國大計之會議，其職權如兼有制憲行憲並選舉大總統，又為一奠立民主規範之大會，以如此關係重大之會議，而竟倉卒舉行，以致許多手續未臻完備，許多事務籌備不周，於法理上說，實不能避免各方之責難，故為慎重計，不如延期舉行，俾得完成手續，實行普選。

張：就本黨與政府之立場而言，不能承認兄所說之理由，政府在法律上是無可指責的，且惟其要貫徹法令，故不能不促使國民大會依法及早召集，蓋本黨負責訓政，更願早日卸下仔肩，還政於民，以俯順社會輿論，實施憲政之要求。

周：如果國民大會之職權兼有制憲行憲及選舉大總統，為慎重將事，不如延期召開，重選代表，以便國大職責，一次全盤解決。

邵：倘中共能讓步一點，則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之國民大會，僅賦予制憲之權，以後再根

據憲法實行普選，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始賦予行憲及選舉大總統之權，如此亦可解決國民大會問題。

張羣：兄等如同意，此亦爲解決問題之辦法。倘今日商談尙不能作一決定，則擬留待明日繼續商討，並可請國民大會負責主持之葉楚傖、張厲生兩先生參加說明。還有各黨派參加政府一項，請兄等提出具體意見。

周：其方式如 蔣主席所示，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請各黨各派參加，或如以往之提案，於行政院內設置政務委員會，請各黨各派參加皆可。既然由政治會議通過共同施政綱領各黨派自可參加政府，不過其方式可由政府聘請，而由各黨派推選人員應聘參加。

張羣：既由政府聘請參加，則其人選是否必須經由政治會議之協商？

邵：余意政治會議只能以協商爲目的，而不可硬性的規定其職權，如參加政府一項，即不必出於政治會議之決議或通過。

周：政治會議協議之事項，必有範圍，我方所提各項，即其協議之範圍也。我想參加政府並無多大困難。兄等是否尙有其他顧慮。

邵：無他顧慮，不過不宜硬性的規定爲政治會議之職權，否則政府每更調院部會主官均須提請政治會議通過，殊爲困難。

張羣：還有復員善後問題，中共要求具體內容如何？

周：此項包括復員與善後救濟，我解放區年來受惠最深，百姓痛苦，而遠東善後救濟總署並未計及，蔣署長前在美國雖曾聲言中國救濟事宜將不分黨派與地區，一視同仁，然我方始終未

能與之取得聯絡。

張羣：本日會談至此爲止，明日下午四時繼續商談。

#### 國共第四次商談紀錄

時間：九月十一日午後四時

地點：重慶中山四路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葉楚傖 張厲生 周恩來 王若飛

張羣：昨天因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有許多事實經過及國民大會有關事項，必須請楚傖、厲生兩兄參加，現在即請二兄就此問題，加以說明。

張厲生：關於此一問題，如兩方面僅就相反之理由發揮，決不易求得解決。故雙方均須開誠布公，爲國家打算，以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庶幾可以縮短彼此間之距離。中央方面對於國民大會所持之理由，余等早有所聞；而參政會對於此問題所反映之各方面的意見，周王二兄亦必深知。故我等若純談各方面之理由，實無補於問題之解決。

葉楚傖：國民大會區域與職業代表應選出者共一千二百名。（中委與政府遴選者在外）現已選出者區域與職業合計九百五十六人。未選出者有二百四十四人，此九百五十六人中，死亡及犯刑事者五十七人，依法應由候補者遞補。國民大會開會之法定人數平時爲二分之一，制憲時爲三分之二。故現已選出之代表，已足開會之法定人數。（三分之二爲九百人）

已當選之代表皆係依法產生，各省市皆設有選舉事務所。其他區域、職業或特種選舉，皆有

負責辦理之機構。當選人由各選舉機構呈報政府，政府即予備案，並發給當選證。故現已選出之九百五十六人皆已完成其被選舉人之手續而為合法之國民代表。

現區域代表尚未選出者，有冀、察、平、津、東北三省，熱河、新疆、台灣、西藏及內蒙之伊盟。重慶改為特別市後增加之代表亦尚未選出。山東代表雖已辦完選舉，但選票尚未呈報。職業團體僅工程師學會代表六名尚未選出。以上為區域及職業代表選舉之情形。

二十六年抗戰發生以後，不便辦理選舉，國民政府乃決定遴選的辦法，由提名委員會就各區域、各職業團體中的知名之士，提出名單，送遴選委員會決定之。此外尚有應由國民政府遴選之代表二百四十名，皆未選定。

總之，區域與職業未選出及國府遴選未定之代表名額，共計尚有四百八十名。

張 羣：除應由國府遴選之二百四十名外，其他二百四十名，原因抗戰之關係而不及選出者，現在抗戰已結束，地方收復，有人主張冀、察、平、津等地即行選舉。在東北、台灣之收復，尚須稍待時日，國民大會若如期舉行，則二處之代表亦惟有遴選之一法。

葉 ：如期開會，恐冀、察、平、津等省市亦來不及選舉。

張 羣：此即事實上之困難，不能不延期，然我等究贊成延期，亦須商討解決。

張厲生：國民大會之職權，乃依照 總理建國大綱之規定：「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佈之。」故理論上第一次國民大會實不過結束訓政，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之日期而已。至於根據憲法產生政府，乃第二次國民大會之任務。但為提早實施憲政起見，第一次國民大會自身決定除制憲之外，並行使憲法賦予之職權，亦有可能。

至於已選出之代表，皆經過合法之手續，如現時政府忽又不承認，另行選舉，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當選之代表將自行組織，如印度國民大會一樣，另行集會，如此，則更增國家之困難矣，此吾人不可不慎重處理者。

周恩來：如吾人此次確定國民大會為制憲會議，則其職權即如法國現在之國會，只能制憲而不能行憲矣。

張厲生：我國國民大會之性質，與法國國會之性質，完全不同。國民大會乃根據訓政時期之成績，制頒憲法。將來行憲之國民大會且可選舉及罷免政府長官。

依據目前情形推測，將來憲政實施以後，唯一可慮之點，即恐蹈法國覆轍，黨派林立，徒增加政治之紛擾。

張羣：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北京方面有所謂八百羅漢，組織團體，紛立黨派，達百餘個之多，可為殷鑒。

王若飛：在民主普選制度確立以後，小黨派必失其存在。

周：國民參政會中有人主張就各區域內代表名額再增加三分之一，以為補救，葉先生意見如何。

葉：此事甚為困難，因各區域皆有候補代表，如不將候補代表改為正式代表，而另行加選三分之一之代表，則各候補人必不滿意，候補代表乃依票數之多寡而選出，並無定額，因當初未規定候補人之名額，及其當選之票數故也。

周：如此，則法律根據殊為薄弱。

張厲生：總之，國民大會問題如何解決，視我全國團結之程度而定，此時要辦全國普選，事實上實不



易行通。因國家在此八年抗戰之後，社會亟須安定與休息。如目前即行普選，勢必使社會紛擾不寧，決非建國當務之急。

張羣：如恩來兄所說，加選三分之一之代表，則必有人質問，三分之一之代表既可選舉，則何以不能全部普選。故此說如行，必予人以口實。

張厲生：我等可否即就此四百八十名中尋求解決辦法？如此中不能求得解決，再研究其他解決辦法亦可。

周：國民黨中央委員名額，據文白兄言，尙未決定，當亦可以讓出。

張厲生：此乃我黨內之問題，將來我黨自有決定。我等此時應先就此四百八十名中設法。

葉：本黨中委之名額，照舊章規定爲二百四十名，但現在中委人數幾已倍增，將來尙須重作決定。又本屆參政會任期末滿，且其中六十餘名已當選爲代表，其他亦擬請改任爲國民大會代表。張厲生：我主張我等今日之討論，可先就此四百八十名額中研究辦法，即如何使各黨各派之人士參加。將來以選舉或遴選之方式產生之，均無不可。

王若飛：蔣先生主張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還政於民，此乃重大之措施，吾人不可不慎重其事，而求真正合乎民意，以免各方面之指責與批評。現在一般人說：過去所選出之代表，乃國民黨一黨執政時所產生者，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滿，自不能再代表國民，關於此點，左舜生先生曾發表文章，舉出許多理由，故我以爲蔣先生此一重大措施，吾人不可不慎重行之，最好能重行選舉。但選舉需時，故大會必延期召開。我們或顧慮有人反對，謂國民黨有意遷延，不願還政於民，然此事有許多解決辦法，如召開政治會

議，使各黨派參加政府，然後再行普選，如此，則各方面自不致有所藉口矣。

葉

：國民代表自當選以來，由於時局之限制，實際尙未能履行其職務，故不得認為任期屆滿。

張厲生

：關於此一問題，各方面之理由皆持之有故，然實際不過一形式問題。民主政治，乃是一種形式，實際運用，在於吾人之方法如何耳，如有適當之方法，必可名實兼顧，而求得合理之解決。我兩黨對於現實政治之主張，雖各有不同，然終極目標——建設三民主義、和平統一、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一點，則余確信彼此均一致也。

周

：國民大會之任務，不外下列三點：（一）制憲——制定妥善之憲法，為全國所贊同。（二）行憲——乃國共兩黨合作而非代替，故大家亦可同意，（三）選舉總統——即一致選舉蔣先生為大總統，此點，毛先生亦同意，凡此乃國民大會之實際意義。至於代表之選舉不過形式而已，但雖為形式，必求合乎民主，我黨對於過去所選之國民代表，以其並非普選，向未曾表示同意，現在如不重選，則於本黨之一貫理論，殊難通過。吾人批評國民黨為一事，承認國民黨之領導地位又為一事。我黨對於國民黨政權之擁護，固十年如一日，而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不經普選，則我黨一貫的不敢苟同。故要我等承認已選之代表，殊為困難。既然如此，則不如由兩黨提出一聯合名單，承認國民黨為第一大黨，而其他黨派亦各派代表若干名。

張

：兄等主張國民大會應慎重其事，延期召開，俾制憲行憲選舉諸事，一舉而畢其功，以期安定

政治，策進建設，使民主史上不致留一點遺憾，而主張重選代表，此點在原則上不無理由。惟兄等已承認國民大會代表如重行改選，國民黨仍佔多數，即依恩來兄剛才所說，提出聯合

名單，國民黨亦爲第一大黨，如此則無論形式如何，而兄等所承認之事實始終未變，又何必重選。且我以爲即不重選，亦非無法補救，而全國普選，尤非易事，故余以爲吾人不如在承認原有代表的原則之下另想補救之法。

此補救辦法，即在二百四十名中央名額與其他四百八十名代表名額之中以求得適當之解決，均無不可。

邵：如採此法，本黨已作最大之讓步，而同時顧到中共之主張，若必堅持重選，則原有之代表必堅持異議。

周：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是否可以修改？

羣：爲免牽一髮而動全局計，最好能於不改變法令的原則之下，以協商的方式，謀補救的辦法。

周：請葉先生給我一份國民大會的組織法、選舉法、選舉施行細則、及已當選之代表名單。

葉：除代表名單尚未完成，未便公布外，其他可照送。

張：已當選之代表，經嚴格審查後，名單再行公佈，此事政府自當迅速辦理。

邵：我等可否就此一問題作一結論。

周：我方須搜集材料，再行研究。我方已提出政治會議之辦法，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可否由政府提出一解決方案，俾便商討。

張：我等意見，歸納之，即在承認舊有代表原則之下，可以協商具體補救辦法，兄等如尙須考慮，下次繼續商談。

周：除國民大會問題之外，今天趁內政部張部長在此，可否一談取消特務機關問題。

（當由邵祕書長說明中共對此之建議，並由張部長說明內政部對此問題之態度，無他討論而散。）

### 國與第五次商談紀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午後三時半

地點：重慶中四路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張厲生 周恩來 王若飛

#### （一）國民大會問題

張羣：倘吾人承認被選之代表應予保留，則可於區域職業尚未選出之二百四十名，及由國府遴選之二百四十名代表中求得補救之辦法。前者包括東北各省及冀察平津各省市以及工程界應選出之代表，後者為救選舉之窮，擬由政府遴選者。大概對婦女界與新聞界請求增加之代表，均將於此項名額中分配之。

張厲生：由政府遴選之名額中將來如除去婦女界與新聞界及其他團體請求增加之名額外，所餘者恐為數已不多。

周恩來：政府可否就此問題，提交我等一文件，以便考慮協商，求得結束。

張羣：此事可推楚儉先生草擬。

周恩來：現在我等對於國民大會問題，就事實上之籌備與協議之進行，勢須延期召開，此點想兄等或亦承認，至於重選代表一點，我等亦諒解政府之困難，但不知國民大會之組織法與選舉法是

否可以修改。

張羣：在承認已當選的代表的原則之下，國民大會之組織法與選舉法，亦可酌予變通辦理，以期雙方願望皆可達到。

## （二）政治會議問題：

周：政治會議之人數，爲容納各方面之人士，及便於召開起見，我主張國共雙方之人數不妨減少一點，而保留較多之名額，延攬各黨派與無黨派之人士參加，其協議之事項，須事先由兩黨商得一致之結論，再由政府提出政治會議，經會議決定一致而執行之，此意見我曾向毛先生談及，渠亦贊同。

張羣：政治會議既等於黨派協商，則國共兩黨代表人數不妨減少，以延攬各方人士。

周：政治會議之意義，在訓政結束之過程中使各黨派由協商而趨於合作，一改過去一黨在野一黨在朝之方式，亦非以此黨代替彼黨之方式，乃求黨派合作，共同參加政府，以求全國政治之安定。

張羣：各黨派參加政府之方式如何？

周：除共產黨外，其他黨派最好以民主同盟之方式包括之，會議之人數，暫時不必作硬性規定。邵力子：各方面參加政治會議之代表，可由各方面推舉而由政府聘請召集之。

張羣：政治會議之產生，自須由國民政府召集，至參加會議代表，可否假定爲二十至二十五人，由國民政府就各黨派領袖與社會賢達中聘請之。

周：候與民主同盟接洽時當徵詢其意見如何？

王若飛：前次六參政員去延安時，吾人主張政治會議即黨派協商會議，由 蔣先生召集，在國民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之過程中，政府之組織與措施，皆由此一會議以協議之方式求得一致之決定，然後通過 蔣先生由政府執行之，所謂協議之方式，在求得各黨派間意見之一致，而非以多數表決也，我們今天所討論之政治會議，與六參政員所提者已有不同，當時所提，蓋由黨派會議與聯合政府轉變而來也。

我等對於國民大會問題，不僅主張重選而且要求修改選舉法與組織法，以實行民主自由的普選，此事固不易辦，然最好能辦到。

蔣先生主張在軍事結束以後，國民大會召開之前，改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同時並擬請其他黨派參加政府——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此為一種方式，但雪艇先生所主張之政治會議，為另一種方式，即是於國民大會前容納各黨派人士參加的臨時協商組織，吾人對於此一方式表示贊同。

張 羣：對於政治會議之意見，歸納言之，不外（一）政治會議之組織，（二）政治會議之地位，（三）政治會議協議之範圍，今天所討論者，可為下次進一步商談之根據。

### （三）共同施政綱領問題

周 ；毛先生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我們共同的要求」，即是我黨所希望通過之共同施政綱領，希望政府方面亦提出方案共同協商，及早決定，以便提付政治會議協議。

### （四）參加政府問題

邵 ；參加政府之方式有二即（一）參加國防最高委員會，（二）參政行政院。

周：還可以參加軍事委員會。

張厲生：我當時主張各黨派可參加國防最高委員會，而不主張參加行政院，因前者為決策機關，而後者為執行機關也。

張：蔣主席之原意，擬開放國防最高委員會與行政院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並擬在行政院內設立政務委員會。但政務委員會如參加院會，猶有意義，否則在系統上頗難安置。現在改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自較參加行政院為妥當。

上次雪艇先生主張：在國民大會開會以前，將政治會議，改為經常的，各黨各派均得參加，各項問題經該會議一致，即由主席提交政府執行，如此則國防會不必改組，法令亦不必修改，政府經常組織亦不必變更。

邵：我贊成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然希望各黨派不必拘於形式。應如總理在時，第一次政治會議，以解決問題為前提。

#### （五）解放區問題：

張厲生：關於地方問題，吾人亦可本兩黨在中央協商合作解決問題之精神，貫徹下去，在中共所謂解放區內，使各黨派亦得酌量參加地方政府，此種方式，純為兩黨之合作，而非兩黨之交替，且不必形諸文字，作為商討之條款。

周：關於解放區之問題，我等本來有一民主的方案，我黨主張聯合政府的精神是一貫的，但因聯合政府之議，不為中央所採納，而且蔣主席一再指示我等應以革命者精誠坦白之精神，切實解決問題，故直率的提出有關解放區之幾點：須知現在本黨控制之下有十九個解放區，政

治上已實行減息減租民選政府，我們對於此一事實上之問題，如何解決。前次爲顧及事實並本互相讓步之精神，提出建議，而文白兄謂我等要求數省之主席乃爲封建作法，我等實不能同意，我們如不採取此一辦法，即可實行普選，自省縣以迄區鄉之行政官吏，均可在中央與各黨派監督之下，實行民選，以選舉之結果，提請中央任命。此種自下而上之選舉，最爲公開而澈底，也不許一黨包辦。然吾人爲顧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國其他地區未實行普選以前，不願單獨實行普選，故有此次切合實際之提案，主張某些地區已由中共負責者，即由中共推荐主席，然其他黨派，仍可以參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如此，即可以促成彼此之團結國家與之統一，而本黨重劃省區之議，亦以此提案，不再提出討論矣。我以爲我等此一辦法，極切實際，中央如能採納，自不必形諸文字形式，要在有一致之協商與決定而已。總之，關於解放區問題，我黨在儘量讓步，以期依據中央統一之政令，求得問題之解決，以促成我兩黨之合作。

王

：關於解放區問題，並非我方要求政府重劃地區或分割省區，因我方已有此種區域存在，且其所實行之減租減息與民選之制度，亦已爲當地人民所擁護，故雪艇先生主張有功之文武人員，政府可予以任用一點，猶不足以滿足人民之期望。我等以爲欲解決解放區問題，惟有兩種辦法，一爲普選，從而請中央承認人民所選舉之地方政府，如中央以爲不能有少數省區實行此特殊之制度，則惟有採取我等現提之辦法。

張

：請問兄等所謂十九個解放區，究以何者爲界限？共有若干縣？有若干縣之縣長已經民選。周：我此次未帶材料，但我等所提五省中，除山西外，其他河北山東等省幾全部皆解放區，且有



多數縣長已經選出。

張厲生：我以爲此問題，軍事與政治是關連的，一省一區之內有政治問題亦有軍事問題，倘軍事問題能獲解決，則其餘亦必可解決。惟有一重要之前提，即須我們兩黨有互信，對於建國前途有共同的認識，果能如此，則吾人根據三民主義，堅定作去，則決無不能解決之問題。

張羣：民主同盟所提出之十條辦法中，主張在各收復區成立人事整理機構，亦不失爲解決地區問題之一法。

### 國共第六次商談紀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半

地點：重慶中四路德安里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周恩來 王若飛

張羣：（以下簡稱張）今日我等商談何事？

周恩來：（以下簡稱周）關於省區問題 兄等有無方案提出？

張：今天中午便中曾請示 蔣主席，承指示，日前 蔣主席與毛先生所談者爲解決問題之唯一辦法，（按即指在軍令政令統一之後，關於省縣行政人員中共可以推荐，中央當本「用人惟才」予以任用。）兄等本月三日建議案內關於省區之擬議與國家政令之統一不符，礙難考慮。故此一問題，商談至今，已經挺住，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不知兄等意見如何？

周：蔣主席所指示者僅爲一原則，其具體辦法如何，範圍如何？仍可商量。例如遵照 蔣主席之指

示，或由下而上，根據民選之結果，呈請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薦人員請政府核委。二者似可擇一而行。如嫌我方提案太具體，則只須兩黨協商定妥，亦可見諸文字。

張：依照兄意，可否舉例說明？

周：例如山東全省一九縣，何思源能治理者不過三數縣，而中共解放區截至最近太安收復為止，已有八十餘縣，皆有民選之縣長，其縣長且已進駐各該縣城，中央即可承認加委。

張：山東已有中央任命之省政府，中共所佔各縣，自亦有省府委任之縣長。

王若飛（以下簡稱王）：中央雖委有縣長，然皆未進入縣境，一如過去東四省主席遠離省境，駐在重慶者然。

周：依照 蔣主席所說，採用我方建議之辦法，則山東省府委員廳長可由中央委派亦可由地方推荐，使各方面皆可參加。而主席由中共人士擔任，負責主持省政，此乃由上而下之辦法。如此法不行，則可採用由下而上之辦法，實行民選政府，呈請中央任命。又如山西閻先生所管治者外，中共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縣份。

張：凡中共建有政府之縣份，是否亦皆駐有中共之軍隊？

周：軍隊不一定駐在固定之縣份，但凡收復之縣份，皆有中共軍隊，其軍隊他調者，則有自衛之民兵。

張：兄謂依照 蔣主席對毛先生表示之意見，尚須研究具體辦法，請問兄有何具體辦法？

周：即是規定省區，並協商省政府之合作辦法。如某幾省由中共任主席，某幾省由中共任副主席。張：中央政府本着國家政令統一之原則以任命省市地方行政主官，如須劃定何省由中共任主席何

省由中共任副主席，以仍有悖政令之統一，政府不能接受。

周

：我等非要求 蔣主席劃定省區，而是就既成之事實協商解決辦法。

張

：根據 蔣主席之意見，各省地方用人，應由中央政府依照法令規章辦理，即令人事上特殊情形，須予照顧，亦不能以此作為談判條件，以此條件限制政府。

周

：我方之建議案，為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之過渡辦法，國民大會以後，憲政實施，即可實行普選。

王

：中央依照政令統一之原則，處理各項問題，儘可不必否認地方之現存事實。今我方提案，規定解放區各省市由中共推薦人員請中央任命，並不有違政令統一之旨。如此次東北與台灣之收復，其用行政，亦採取因地制宜之辦法，而無傷於政令之統一。

張

：要貫徹政令統一，即不能完全承認兄等所謂既成事實。蓋就中央政府之立場言，凡國境以內，不容有兩套相反之法令制度，同時并行。

周

：我解放區一切行政設施，並未脫離三民主義之範圍。就制度言，我們並未要求改變中央之制度，而仍依照中央之規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都是中央過去所已頒佈者，其實施情形，可以分別派員考核呈報，故解放區之法規制度與中央並無不同之處。在此原則之下，由中共方面推荐負責人員，請中央加委，並不違背 蔣先生之主張。

張

：兄等主張凡中共所建立之區域與政權，皆須保留，不得變更，省府組織亦須由中共推荐，換言之，即中共一切制度人事與組織皆須中央承認，而謂為與中央法令並無不合之處，此我之所不解者。試就制度而言，在實行新縣制之縣，固可實行選舉，然省級人員皆須由中央選擇委放。我個人久任省府主席，省府之委員廳長，莫不由中央決定。但兄等現在之主張，顯然

王

欲於中央法制之外，另作規定，以拘束中央之用人，此中央所不能同意者也。至於雙方現行之地方制度，大體上無甚差異，不過名稱有所不同而已。例如新縣制之下，戶長會議可以選舉甲長，保民大會可以選舉保長，鄉鎮民代表會可以選舉鄉鎮長，並可選舉縣參議員，以組織縣參議會，將來縣參議會，亦可以選舉縣長，一級一級由下而上。所不同者，按照中央法令規定，戶長會議，每戶只戶長一人參加，而你們現在所實行者，一戶之內凡及齡之公民皆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此點可以供我方參考研究。縣以上在中央之制度為專員，而中共方面為區主任，區主任可當專員之選者，兄等亦可推荐。總之，在符合中央政令統一的原則下，一切事情，皆可以雙方之默契求得解決。

：凡解決問題，必須承認事實。我黨現在所提之辦法，乃由訓政進入憲政，由一黨專政進入自由普選之必要辦法，亦為解決當前現實問題以避免內戰所應採取之必要步驟。政府如能採納，則邊區可以歸原省區，政令亦可統一。我以為政府法令制府並非一成不變，為容納事實，有時且有變更之必要。若政府不採納我黨之辦法，必令我等變更主張，則我等必須向黨內解釋，此事甚為困難。

張

：講到向黨內解釋困難，我方亦何莫不然。九年以前，我們黨內一般同志，都主張「剿匪」，而現在則對於中共，則極力求其團結合作，以謀國家之和平統一。此種新的努力與過去之政策完全相反，亦何嘗不須對黨內煞費解釋。然吾人此次談判，為國家民族前途着想，是否以求得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團結，與真正的統一，抑或還留下將來的紛爭，此點我等不可不切實注意。

周

張 周

張 周 張 周 王 周

：我黨對於國民黨，已作重大之讓步。如承認 蔣先生之領導，承認國民黨之統治權，國民大會如不重選，國民黨固為第一大黨，即令重選，國民黨亦能得多數，故國民黨之前途，已獲保障，決無動搖。以軍隊而論，現在國民黨有二百六十三個師，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個師，尚不及六分之一，故軍權政權，中共皆承認國民黨為中國第一大黨。吾人深知目前共產黨固不能打倒國民黨，然國民黨亦不能抹煞共產黨。故國民黨亦必須為我黨打算，方能使我兩黨各得其所。我們所提之辦法，乃目前過渡期間之必要辦法，吾人以爲民主統一之思想，未可一蹴而就，須經此必要之步驟與過程，方能達到。

：你們所要求之四十八個師，是否尚可伸縮？

：將來中央軍隊如果縮編，我方之軍隊自須縮編。至於省區問題，我方所要求之各省，並非一黨包辦，乃係與各方合作，中央固可派人參加，地方賢達亦可參與，不過中共負主要之責任而已，凡此皆不必寫成條文，只須雙方默契即可。

：你們的軍隊和駐地，與你們所提解放區的關係如何？

：無一定之關係，軍隊要國家化，必可隨時調動。故我方之軍隊與解放區並無絕對的關係。

：是否你們軍隊所駐之地，即所謂「解放區」？

：改編以後之四十八個師，當然駐於現在之「解放區」，不能駐在他處。

：我方之軍隊，將集中於淮北及黃河以北，湖北與廣東等地之軍隊皆須退出。

：我們談話已有兩週，我方爲求問題之解決，一再讓步，不知政府對於此事，除已提出之原則外，尚有其他意見否？

邵

你們的軍隊問題可否與善後復員問題合併研討辦法，現在即依中央之規定，編爲十二個師，其他編餘之兵員，可從事農墾與建設之工作。如此，則中央之整軍工作，必可加速進行。

周

：我方一百二十萬軍隊，若要一旦即裁減爲十二個師，實不可能，故必須分期實施。我等盼望本月份內，雙方談判能將問題解決，問題解決之後，執行時間，至少必須三個月，此三個月之過渡時間，我等如能將軍隊裁去一半，亦可使國內人心大安矣。果真此點如能作到，則明年即可還都，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編整國軍，豈不甚好。

張

：敵人投降之後，蔣主席邀毛先生來渝，其原意在共商大計，解決國是。但商談的內容，在你們所提的辦法，是事先經過你們黨內的決議，並且在你們未來重慶以前，已經公布，而我方事前黨內並未有何討論，亦未準備任何方案與中共談判。故上月二十八日毛先生抵渝後，蔣主席即告毛先生任何問題，皆可坦白提出，盡量發揮意見。兩週以來，我們會談亦是儘量聽取兄等之意見，俾了解兄等之困難。或者以爲兄等此來，我們應準備具體方案，即不然，兄等既有方案，我方亦應提出對案，此種作法，原無不可，然近於外交方式。我等認爲我們今日所談之問題，乃國內之政治問題，必須以誠懇坦白之精神，始能求得解決，故始終抱無事不可商量之態度，聽取兄等對各方面之主張，研究何者雙方可以同意，何者不能同意，不能同意之原因何在，彼此之困難何在，雙方如能設身處地着想，則任何問題皆能解決。但兄等所提軍隊問題與中央規定相去如此之遠，實無法再談。又如解放區問題，余等非不瞭解兄等之意見，然中央之主張，已不能再有變更，故此二者均未能獲得協議。且尚有一事須爲兄等告者，我等此次與兄等會商，乃奉蔣主席之指派，而蔣主席此次之所主張，尚未提經

黨與政府討論。蔣主席須對黨與政府負責，吾人不能不體諒其困難。兄等自謂已經讓步，並聲明此乃過渡之辦法，此種精神，吾人自為感佩。然蔣主席對於各種核心重要問題，均已明白表示，對於軍隊之縮編，收復區內行政人員之任用，均已從寬，我等實不能再作任何主張。或者蔣主席與毛先生直接商量，較易獲得結果。

周 我方此次所提十一項建議之過渡辦法，較之八月二十五日我黨所發表之六大原則，已相差甚遠，因為有毛先生在此，我等隨時可以請示讓步辦法，所以會談容易進行。

王 談判須承認對方之地位，尊重對方之意見，始能接近。蔣主席所提之辦法，何以尙不能解決問題，乃因有事實上之困難在。如不顧此種困難，則即令我等接受，亦是行不通。我中共之軍隊，乃歷史之產物，即要裁減，亦必須採取必要之辦法與步驟，且整編之後，亦非永遠為中共之軍隊，將來全國整軍，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則，編整為國防軍。其次關於地區問題，我黨之軍隊集中於淮北及黃河以北之地區，乃為一大讓步，現在海南島、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皆有我黨之軍隊，刻下京滬杭三城，雖由政府收復，然城外即為新四軍，將來如何實行上述地區之規定，此等軍隊，皆須撤退。最近上海方面之同志，幾次要求暴動，皆經我黨壓制，始未實現。故吾人如明瞭此種事實，方知我方所提之十一條，實充滿讓步之精神，此種事實，望兄等轉呈蔣主席。

張 若飛兄之意見，我甚瞭解，惟須知兄等方案提出之前，政府對於中共軍隊之考慮，只有九個師，兄等方案提出後，蔣主席即允增為十二個師，實為顧及兄等之困難，故兄等可否再考慮政府之困難，而提出新的修正？現在兄等要求四十八個師而政府只能允許十二個師，相去實

在太遠。

：目前困難，我方所提方案，乃第一步在國民大會以前將一百二十萬軍隊裁為四十八師，將來隨國軍之縮編，自可再為減少。

：我們可否將軍隊駐地與解放區問題合併討論，擬具具體辦法，作一次解決。由軍隊數目之協定而議定其駐地，由駐地而議定解放區，如此即可將問題簡單化。現在兄等所謂淮北尚有範圍，至於黃河以北，則包括之地區，未免太廣。故最好能按軍隊數目之多寡以定其駐地之大小，如此則軍隊問題解決而政治問題亦可連帶解決矣。

：此亦為解決問題之一種辦法，我方可以考慮。

：我黨在淮河流域與蘇北皆有解放區，其他浙江湖北以及廣東海南島等地亦有若干縣。

：你們所謂解放區，總共究有若干縣？

：今天因為手邊沒有攜帶統計表冊，暫時無法奉告。但此類材料我方可以供給。

：你們所供給之材料，或者較為可靠。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今天可否再繼續商談？

：我方的主張是延期召開，重選代表，但政府的困難我方亦承認。現在且聽各方面對此問題的反映如何，同時盼望政府能提出具體方案來討論。

：關於國民大會與政治會議問題，我等都已經詳加商討，現在可以聽取各方面之反應與意見。至於軍隊駐地與解放區問題，請兄等重加考慮，並盼轉告毛先生可否提出修正案。

國共第七次商談紀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午後三時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周恩來：昨晚與今日上午我和毛澤東同志討論之結果，有二事奉告：

第一、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數為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六分之一，即中央現有二百六十三個師，我方應編有四十三個師（較九月三日所提方案多讓五個師），以後中央軍隊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如中央軍隊縮編為六十師，中共應為十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為一百二十師，中共應有二十個師。

第二、關於「軍隊」「駐地」「解放區」三者，岳軍先生提議併案討論我等亦表贊同。我方擬將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內黃河以南等八個地區之軍隊撤退，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此為第一步。

張羣：所謂隴海路以北地區，究竟指何處，請具體說明。

周恩來：包括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四省全部，山西之一大部，綏遠之一小部，以及豫北與陝甘寧邊區，皆為隴海路以北中共軍隊駐地，中共軍隊依令縮編後之四十三師，即駐於上開各地，但交通工具須請中央協助。

張羣：中共現在散駐各地之軍隊，將如何調動？

周恩來：一部份調集指定地區，一部份歸農。完全就地解散，萬難辦到。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三地區之軍隊撤退，而將中共所有之四十三個師，集中駐防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份，綏遠之小部份，與陝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

至於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規定而合一，換言之，即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四省與陝甘寧邊區（中共亦要求劃爲一省）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二特別市之副市長，亦由中共推荐人員充任，但對於蘇北、皖北、豫北三地區中共軍隊尚未撤退以前，其專員縣長，仍由中共委任。

北平行營及政務委員會，由中共人員主持。

張羣：兄所稱中共軍隊編併爲四十三師之前，軍餉糧秣等之供應，一切皆不須由中央發給，究由何處取給？

周恩來：一部份由生產自給，其餘只好取之於地方。

我方之新方案如此，兄等有何意見？

張羣：兄等所提此新方案，甚難考慮，余等亦無何意見，候轉呈 蔣主席請示。今天尙有他事商談否？可否將公告事加以商討，凡雙方商談已獲得同意之事，皆可公告之。但軍隊問題，無法解決，不能公告，實屬憾事，祇好着重於政治方面。

邵力子：中共承認「擁護 蔣主席之領導地位」一語，請不必載諸公告之內。

周恩來：文字可以斟酌，或改爲「在 蔣先生領導之下」亦可。

張羣：（提及公告內容各點）贊同力子兄主張，將第一點文字簡化。其下二、三、四……各點，概括爲軍事政治兩項，而將軍隊國家化之原則，軍隊數目、駐地、受降等包括於軍事之內。其他政治會議等，則置於政治一項之內。公告全文，經雙方同意，請力子先生起草，明日提出討論。

周恩來：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如何處置？

張 羣：兄等意見如何？

周恩來：我等考慮有兩個方法：（一）關於此一問題，可留待政治會議討論，我等雙方之意見現在皆不必提出。（二）王雲艇先生月內返渝，我等再作共同研討亦可，但此事必須邀各黨派共同

商討。

邵力子：將來政治會議商議此問題時，兄等取何態度？是否堅持重選主張？

周恩來：毛澤東同志此次應邀來渝，目的在解決國共兩黨問題。對於國民大會事，我今天不重提主張，並非我等對此事不加考慮，只暫行保留而已。

張治中：關於軍隊問題，兄等要求太過，不必再討價還價。余認為此一問題，非距離之大小問題，而為根本觀點之不同的問題。中共之觀點，總以為必有軍隊，有地盤，控制軍政機關，始有保障，而中央則認為軍令必須統一，於此原則之下，始可解決問題。如依中共之辦法，則非為謀軍令政令之統一，而完全為分裂國家，所謂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謂統一，亦係分裂之統一。兄等試思中共軍隊悉數撤退至黃河以北，而據有黃河以北之地區，是無異分疆而治，欲二分天下有其一。即就軍隊之數字而言，二十六年中共要求編為三個師以後，到三十二年要求增為十二師，去年要求增至十六個師，事隔一年，現在復要求增至四十八個師，較之抗戰初起之三個師已增加十六倍，而中央國軍在抗戰之初為二百餘師，迄今仍不過三百餘師，所增者未及一倍。兄等所要求者距離中央所能允許者如此之大，復何能討論。

兄等去年尚只說所有官兵不過四十餘萬人，今則忽增至一百二十餘萬人，未及一年時間，而

中共之軍隊何來如許之官兵？

王若飛：現在我方官兵都極憤慨，漢奸軍隊都已獲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隊反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認，須知中共軍隊即令不獲中央之承認，不獲中央之接濟，亦必能生存發展。

### 國共第八次商談紀錄

時間：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地點：重慶中四路德安里第一〇一號

出席者：張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張羣：今天商談關於軍事問題，請文白兄先加以說明。

張治中：關於軍事一項，我與政府各負責同志說及，兄等所提新方案，已有所讓步，對毛先生與兄等企求解決問題之苦心以及所感受之困難，我等甚為諒解，然中央方面之困難，以及蔣委員長亟盼此項問題能够順利獲得適當解決，以便乘此時機，推進建設，以副國內外殷切的期望之意，亦盼兄等能設身處地着想，力求彼此互相接近，如此，雙方雖有若干困難，亦可迎刃而解。委座曾謂中共之困難，即是彼之困難，彼必設法為之解決。其意亦謂彼之困難，亦即是中共之困難，切盼中共方面能够體諒時艱，協助政府，及早促使國內真正統一團結之完成。若飛兄前日談及中共幹部對此事頗表憤慨，余昨晚曾邀請政府軍事上各部門負責同志商討，大家對中共之過分要求，尤深為憤慨，覺得國家於抗戰結束之後，軍隊正須整頓縮編，而中共尚要求擴充數額，政府殊難予以考慮，須知軍隊擴充如此之多，決非良好現象，將來

憲政實施時期，亦必不須藉武力作一黨參與政治之保障。兄等現在要求多編軍隊，或係爲安插多數官兵着想，然困難始終未能解決，國家在承平時期的多設常備軍，敵國日本戰前常備軍亦只十七個師，我國戰後國防常備軍額，最多恐亦不能超過九十或一百餘師，余前次赴延安，葉劍英兄即謂現在一般軍事幹部，都有厭倦之意，不願再作軍官，可見彼輩將士之心理。如依兄等所提，中共要求如此多的軍隊，所需軍費必多，軍費多，即人民之負擔重，尤其中共以一在野黨之地位，將參加政府，亦係以一政黨之地位，而須擁有軍隊，且要求多量軍隊，其予國民與國際人士之觀感，實至爲不智，故我爲中共設想，委座已允許於軍令統一原則之下，編中共軍隊爲十二個師，並爲顧及中共之困難，此數以外，尚可增加數個補充師，兄等應可滿足矣。余之意見，兄等提出軍隊數字，至多亦不能超過兄等去年之所提出者——按即五個軍十六個師，此數當時中央並未應允。而且當時尙在抗戰時期，今則抗戰結束，全國軍隊，即須縮編，此項數字，兄等亦不能超過矣。至於前日兄等提及按照比例數字來決定軍隊數額，無論其爲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皆不適當，且反與中共不利。故不如直截了當確定數額之爲愈。

其次，關於軍事指揮機構，北平行營之人事任命甫經中央明令發表，不宜更改。我們且不說中共軍隊遵令整編確定以後，駐在一地，即可受當地軍事最高司令部之指揮調度，不必另設指揮機構，即令爲顧及事實亦不必設置行營一類之機關，而只可由中央按照軍事指揮系統，予以適當之名義，以便統率指揮。

再次，關於軍隊駐地，兄等所希望者爲那幾處地方，應具體而明確的指出來，中央可予考

慮。而不可籠統的說「黃河以北地區」或「隴海路以北地區」，因為軍隊駐在一地，必須設置營房，一師有一師之營房，一團有一團之營房，皆須統籌計劃，預爲設備。

至於兄等所謂「解放區」或所謂「何省應由中共推荐主席」一節，與軍隊駐地，不可混淆，我等研究之結果，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廳長委員，何人堪充專員縣長，儘可開列名單，送請中央量才任用。中央必本「用人惟才，用人惟賢」之旨辦理，決不致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但切不可指定何省應劃歸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何人任廳長委員，何人任專員縣長。將來憲政時期，必須實行軍民分治，省主席不可兼攝軍事，省區之駐軍長官更不可兼政治，蓋軍區與省區將來必明確劃分，並非一事。

我前天談話時業經說明我們的根本觀念不相同。我今天深覺當前國家局勢，急須迅速結束軍事。而最首要者在解決兩黨間之問題，而要解決問題，又須首先培養信心。故兄等所提出之方案，不可使人懷疑，反致有礙信心之培養。即如兄等所提華北四省主席應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異乎割據地盤，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聯外蒙，東北聯東三省，果如此，則兄等究係作何打算，作何準備。

王若飛：那末，中央將我黨軍隊都消滅好了！

張治中：既係商談，我等即應本溫和之態度從容協商。

周恩來：文白先生所說可分三部份：（一）說明雙方對於努力求問題之解決，其態度是一致的，我方之提出建議方案，即是如此。（二）彼此應相互體諒彼此之困難，應設身處地，推己及人，以互讓互諒之精神求問題之解決，我方亦有同感。（三）彼此根本觀念之不同，此確屬事實。

雖然今日我等之商談係出於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國民黨及其政府皆視我黨為被統治者，為投降者，自西安事變以來即一貫如此。但吾人今日既言民主團結，彼此即應立於平等地位，如謂「我的是我的，你的亦應交給我」，此即非民主。今日我黨已承認 蔣先生之領導地位，已承認國民黨為中國之第一大黨。就 蔣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說領導各黨各派，領導全中國，因為 蔣先生不只是國民黨的總裁，而且是全國的領袖，但國民黨却不能以領導者自居，而以被統治者視我黨，否則，此種觀念一經表露，必惹起我黨之憤怒！即如昨天毛先生與陳立夫先生談話，陳即以放棄外國的思想觀念，放棄一黨的武力政權，共圖新中國建設等話相告，即係完全抹殺我黨之地位，而為代表國民黨之觀念與精神，果如陳說，則我黨一切皆應交與政府，方始滿足。殊不知我黨所有軍隊政權，並非不願交出，倘依去年我黨之提案，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成立聯合統帥部，則我黨一切軍隊與政權皆可交與政府處理，如此時我黨仍保有一點特殊性，即為我黨之不對，但現在政府尚在國民黨黨治時期，我們何能將軍隊的政權交與一黨之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達到統一全國軍政之理想，必須採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驟，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

再講到具體方案，關於軍隊數目一項，如依我方所說六分之一之比例數為標準，則可將最初之數字與最後之數字一次解決，且雙方即以此比例相約束，足資憑據。況且武器裝備都操在中央政府之手，對於所編中共軍隊，可無顧慮。方子先生說不如先決定一最後之數字，此辦法亦可考慮，但須具體商定達到此最後數字之實施步驟，倘兄等能同意此點，而須由我方提

出一最後之數字時，我方可以考慮。

張羣：兄等可否即提出所要求之最後數字？

周恩來：如兄等能承認我方所提達到最後數字之實施步驟，則我方考慮後，亦可提出此最後數目。至於行營，北平已經設置，另設北方行營亦可。

邵力子：政府無此體制。

周恩來：關於指揮機構名稱，尙易接近，至於由我方推荐省主席等人選由中央任用，而不必指定何省區，此事與民主普選之精神不符，中共在某一省，如無集中之黨員與擁護我之人民政權，僅推荐一主席，殊無意義，此不過爲安插幹部而已，非我方提案之初意。

王若飛：軍隊國家化，所謂「國家」乃人民的國家，而非一黨的國家，如能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則一切軍事政治皆可解決。國民黨所謂「統一」乃是「服從」，而我黨則主團結合作、平等協商，互相尊重彼此的地位，此爲我等談判應有之態度，我前天所說漢奸偽軍已獲得委任，而抗日軍隊反不獲承認，大家都很憤慨一點，現在解放區一般幹部與人民，確有此心理，他們抗戰八年，守住大門，以掩護後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應有的地位，其地位反不如漢奸偽軍。過去，人民從敵人手中取得政權，而現在中央要從人民手中取回政權。

要解決「解放區」問題，其合理辦法，首在承認事實，如河北、山東、察哈爾、熱河四省以及山西之大部份，綏遠之小部份，完全爲我們中共所領導之軍隊與人民，此等地區早已實行民選，自鄉區而縣，皆有民選之議會與政府，省之一級亦可自下而上，選舉政府，此種事



張 羣：

實，如不蒙承認，可重行普選，依照三三制，各黨各派皆可參加，選舉結果，再請政府委任，但我方因為遵照 蔣主席之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員請中央任命，所以不提普選，而提出前次之建議。如此我方若干邊區皆可回復原來之省區，而在各省區之內，中央仍可駐紮軍隊，如今已收復之青島、北平、天津、各大都市，中央已派遣軍隊進入城內，由此可知我方所舉各省區，並非由我黨一黨包辦，我方提案，已為很大之讓步，目的無非在避免內戰。

若飛兄所說漢奸偽軍已獲委任，這是因為他們在抗戰時期反正投降過來，將功抵罪，只要有利於國，何可不予自新之路，中共軍隊乃整個的，現在中央請兄等來渝協商，即是要確定具體辦法，加以整編，而並非不予承認。至謂 蔣主席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員請政府委任，蔣主席之意，是說在軍令政令統一之後，政府對於中共所推荐之人員亦可任用，但並未如兄等所說規定何幾省省區必須由中共推荐主席，此點請不可誤會。

我以為問題之癥結所在，還是軍隊，就黨派合法承認、平等合作而論，如中共不以軍隊為一黨所私有，則各黨派團結合作，原是平等的，也是容易實現的，政治亦然，倘不與軍隊牽連一起，亦極容易解決。目前要求軍隊國家化，一時間不能全如理想，但遇有困難，我們儘可設法解決，而至低限度，一切軍隊必須脫離黨派關係，打破地盤觀念。中央政府年來對於全國軍隊之整理建設，即係依此方針進行，凡國民革命軍之黨部，現已取消，許多地方軍隊，皆已聽令調遣，即其證明，對於中共之軍隊，所要求者亦是如此，因此，我們談到軍隊問題，不可將軍隊駐地與省區和省之行政混連一起。過去我們為要改革各省各軍隊防區制度，不知費了多少努力，到了現在，我們只能有國軍，不能有省軍，只能有國防，不能有省防，

雖然目前全國各地軍隊之整理還沒有完全達到理想，但今後決不能再有所謂川軍粵軍等名目。中共軍隊經此次協商，由政府整編之後，可以決定幾個駐防地點，不可專劃省區，否則如將軍隊與省區及省地方行政混而爲一，則對外間割據之譏，將何以自解？蔣主席前日對我說，此次毛先生來渝商談，爲了顧到他的困難，他很坦白誠懇的向毛先生提出中共軍隊可編爲十二個師，並增加幾個補充師，軍隊駐地，可由毛先生提出具體方案，商討決定，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負責的，不料蔣主席提出這個數字，你們還有如許困難，這樣，以後蔣主席即無法再與毛先生談了。

王若飛：你所持的觀點，仍然是偏於你一方面的立場，而沒有承認我方的事實。

張羣：我並非不承認中共之事實，我的意見，正是顧全現實，只求將軍隊數字商定，使軍隊與省區及省地方政治不要混聯一起。

王若飛：你們國民黨作了些什麼？今日的問題，要看全國的民主實行到何程度，如能實行民主，問題即易解決。

張治中：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造中華民國，彼時中國共產黨尙不知在何處，一個國家必有政府，有了政府，必須承認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你們既承認國民政府，即須將一切問題，在政府法令規章的能允可的範圍之內來求得解決。

張羣：你（指王若飛）的意思，你們中共解放區一切都不能改動，中央一切法令規章都不能進去！王若飛：（此時血脈憤張，強詞奪理，並握拳擊椅有聲，且有一「你們國民黨政府是什麼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是希特勒政府」等語，旋又自知未免失態，支吾其詞，重述其須承認事實一套老

邵力子：兄等所說要求承認事實，我以為現在中國最重大的事實就是不要打仗。兄等說「過去人民從敵人手中取得政權，現在政府要從人民手中取回政權」此語殊為不當。政府是中華民國的政府，中華民國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華民國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職責所在，當然有權管理。

兄等又說，根本觀念不同，我覺得你們一個觀念却不可有，兄等以為只有你們纔是民主，而我們政府與國民黨乃非民主，這個觀念我勸兄等必須改變。

周恩來：軍隊與省區分開，我方亦如此主張，軍隊不能干涉選舉，亦屬毫無問題，選舉須自下而上，鄉區縣政府可以民選，省主席亦可以民選。

邵力子：中央並未說要完全推翻你們現有地方行政的成就，而只是要求中共依照中央的政令來調整。王若飛：有了中央政令，還要因地制宜，譬如中央對於東北、台灣之收復，即不能不為因地制宜的措施。張羣：因地制宜，固甚重要，但不能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行使兩套法令。

周恩來：用民選方法來解決解放區問題，最為理想。我方已實行縣以下之民選，省之一級既不能別於全國其他各省，實施普選，而蔣先生復有中共可推荐人員由政府委任之指示，因此我方纔率直的提出解決省區之辦法，使上下能銜接起來。

現在我等商談，癡結不在軍事，而在對省區問題，彼此有距離。過去在抗戰期間，兩方商談可以拖延，問題可以僵持，現在和平建國時期，問題之解決必須從速，雙方商談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

張羣：今天談話可以歸納起來。關於軍隊，蔣主席第一次與毛先生談話，規定爲十二個師，第二次與毛先生談話，因爲顧及他的困難，除十二個師外，另可增加幾個補充師，這是政府所能允諾的最高限度。除此之外，別無所謂最初數字與最後數字，亦無所謂過渡辦法，以比例爲標準之說，更不必要。

周恩來：我方所說者，係根據文白先生剛纔所提之標準。

邵力子：恩來兄所提先規定一最後數字，再規定具體實施辦法，逐期縮編，以達到最後數字之目標，似亦可行。至於在編縮過程中關於交通運輸遣散經費等困難事項，有須中央協助者，可以呈請蔣主席核准。

張治中：我剛纔所說兄等所提軍隊數字，至多不能超過去年兄等所已提出者，但此數字並未經政府承認。兄等現在可否即予確定中共要求爲幾個師？

周恩來：文白先生所提去年五軍十六個師一說，我等可與毛先生商量。

邵力子：關於發表公告一事，兄等意見如何？

周恩來：我們應該承認解決問題尚有困難，所以商談二十餘日尙未了結，但我們決不可失去解決問題之信心，藉予全國人民以安慰。

王若飛：應說明兩方堅決避免內戰，一切問題均可在和諧協商中求得解決。

張羣：此僅爲一消息，而非公告，雙方商談發表公告，原係赫爾利大使之提議，蔣主席表示允可，我等已擬有公告全文草稿，兄等亦已閱及，可否俟今日午後赫爾利大使自滬抵渝後再與一商，方作決定（雙方表示同意）。

## 國共第九次商談紀錄

時 間：卅四年九月廿七日上午十時

地 點：重慶中四路第一〇三號

參加者：張 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張治中：中共現有之軍隊要縮編至規定之數字，尙須經過相當之程序與步驟。此中技術上之問題可否由軍令軍政兩部及兄等派員另組小組會議，以便提供材料，共同商討。

周恩來：此意甚好，我等亦欲聽取中央軍隊整個整編之計劃，俟軍令軍政二部人選派定，通知我方，我方即當派員參加。一俟該小組會議商得初步結果，即可提供我方討論。

張 羣：關於解放區之解決辦法：兄等有新的意見否？

周 ；我等對於此一問題，先後曾提出四種主張。最先主張重劃省區，即將現有之解放區，使之變爲行省，俾現實情形得接近中央之法令。但我等來渝以後，蔣主席首先提出中共得推荐地方行政人員，由中央加委，我等爲尊重蔣主席之意見，遂改變初衷，按各省實際情形，主張在解放區佔地最廣之各省，由中共擔任該省主席，佔地次廣者，由中共推荐副主席。至委員之人選，中央與地方人士，均得參加。後來此一辦法亦行不通，故主張重行選舉，由各縣民選縣長與縣參議會，縣參議會產生省參議會，省參議會選舉省長與委員。前天與毛先生談及，以爲憲法尙未頒佈，省級選舉暫時不能實行，故又改變主張，暫維現狀。即現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區治理之。此一辦法如兄等尙不

能同意，則最後之途徑，只有交出政治會議解決之矣。

張羣：不能解決之問題，交由政治會議解決，在我等固可減輕責任，然政治會議亦須尋求辦法，故我等不如作最大之努力，以期獲得最後之成功。關於此一問題，不知其他黨派有何意見。

周：其他方面不知，惟黃炎培在原則上贊成重選。

張羣：關於解放區問題，兄等前後所提之辦法，均有難行之處，即如重劃省區，此議中央不能同意，因以面積而論解放區在全國究爲局部之問題，如重劃省區，則必須涉及全國，變動過大，此時固不易實行。其次兄等主張若干省由中共推荐主席，若干省市由中共推荐副主席與副市長，亦與中央之意見不相符合，中央對於中共推荐之地方行政人員，雖願考核加委，然不能由中共指定任用之地區。至於重選加委之辦法，則以現在憲法尚未頒佈，省的法律地位，尚未確定，亦未便施行。如必須行之，則法律上之根據殊爲薄弱。現在兄等主張暫維現狀，此亦非問題之真正的解決。余等今日之商談，正因爲現狀不可暫維之故也。

周：暫維現狀，亦須雙方商得暫行之辦法。

邵力子：爲真正之團結起見，我以爲兄等應注意下述的幾點事實。第一、山東河北一帶之重要城市如濟南、青島、北平、天津等，中央軍隊正由空運前往受降，中共軍隊當未能佔領。第二、中共在理論上不能阻止中央在河北、山東一帶駐軍。第三、中共在山東、河北雖佔有廣大之地區，然交通線向在日軍控制之下，將來自亦歸中央接收，中央必須運用。中共現對平漢、津浦、隴海三路，雖實行破壞，然此種舉動，不僅使國內之民心不順，且將使國際之觀感不良，基於此三點事實，兄等實不能要求何省應完全歸中共治理。否則中央即勉強劃歸中共治

周

理，事實上亦必發生種種糾紛。

：關於此三點事實，我等與邵先生之觀念，頗有出入，我等對於中央此次受降區域與受降任務之規定，自始即表示反對。但現在日軍不向我繳械，而中央又空運部隊前往受降，我雖無法阻止，然決不贊同。至於交通道路，現在雖大部份在敵人控制之下，然我方亦佔領有若干之車站，將來商談如有結果，我方自應維持，中央有權利利用，我方亦有權利利用。但在商談未獲結果以前，中央除由海空運輸部隊之外，若尙要利用鐵道，則我方決不能同意。現在我方在新黃河以南之部隊，已準備撤退，其目的即在便利復員。若胡宗南、閻百川、李延年之部隊要利用新黃河以北之鐵路向前推進，我方不能不懷疑其有以武力解決解放區之企圖，自不能坐視。

設若我等之商談已獲結果，軍區重行劃定，我方亦得參加軍委會工作，則中央軍隊要利用鐵道運輸，以達到規定之地位，自無問題。

邵

：中共在過去八年之中，與本黨共同奮鬥，其於軍事上給與敵人之打擊，不能謂爲無功；其於解放區政治上若干之理想與成就，亦值得政府採納。今抗戰結束，爲國家政令之統一，解放區問題必須解決。但中共方面所顧慮者，一恐過去抗戰之功績，爲政府所抹煞，一恐過去在解放區若干有益於民之政治措施，爲政府所廢棄，其實政府決不致如此短視，且真正之功績，亦非他人所能抹煞者。然中共若要求交通發達，國脈所關之山東、河北各省，完全由中共治理，此亦不可能之事。否則，國家之政令即無法統一。故余等只能就常理常識，於現存事實之中，求一妥善解決之方法，一方面不致埋沒中共過去的軍功與政績，一方面不致破壞

中央政令之統一，方能兩全其美。兄等若能同意，在冀、魯等省將若干大都市及交通路線交中央治理，而中央則保證中共過去解放區有利於民之若干政治理想與措施仍得繼續維持之，則其中必可求得一解決之辦法。

張羣：我以爲在現存局勢之下，不妨實行一暫時之辦法，即解放區各縣，其縣政府成立已有規模且有成績表現者，省政府應承認之，同時縣政府亦應承認省政府，彼此互相承認，以求得行政上之協調，俟憲法頒佈，省政府組織與地位確定之後，再行選舉，兄等以爲如何？

周：縣級行政人員重選加委之辦法，岳軍先生已經同意，現在只剩中間——省級之行政人員應否選舉問題尚未決定。將來蔣先生與毛先生直接商談，也許可求得解決。余以爲重選加委，總不失爲一民主的辦法。

張治中：真正之民主，必爲全國一致之民主，且必以法律之程序爲根據。若以軍隊爲政權之保障，此乃舊式之方法，即非真正的民主。

周：民主統一爲現代國家之趨勢，然吾人亦不能不顧及現實，余以爲我等所提出之辦法，乃適合中國國情之辦法。

張羣：兄等所提暫維現狀之主張，亦必附有若干具體之辦法，方能暫維現狀，不知兄等考慮及之否？不外從（一）避免內戰（二）解決敵僞（三）維持交通（四）中央與邊區政策之協調各點着想，兄等有何意見。

張羣：講民主當然不反對選舉，然在省的制度與組織未確定以前，實行民選省長，則法律上之根據不足。故在憲法頒佈之前暫維現狀之辦法，惟有如前述省與縣互相承認，不使發生糾紛而已。



國共第十次商談紀錄

時 間：卅四年九月廿八日上午十時

地 點：重慶中四路第一〇三號

出席者：張 羣 邵力子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

張治中：昨天兄等同意另組小組會議，商討軍隊縮編之技術問題，究擬派何人參加？

周恩來：毛先生主張派葉參謀長劍英參加，因葉參謀長對我方全盤軍事情形當甚明瞭，與軍政部林次長及軍令部劉次長私人交誼亦深，便於解決問題故也。

張治中：如劍英能來，我方亦請林、劉兩次長參加。

張 羣：現在我們討論政治會議問題，關於政治會議問題，我等經過商討獲得初步之結論後，即可起草條例，徵求各方面之意見，但最後仍由 蔣主席決定。政治會議由國民政府會召集，此已不成問題。其組織在條文上應寫明由各黨派領袖與社會賢達組織之，人數究以若干為宜？請兄等表示意見。但我同意邵先生之主張，國民黨較共產黨應多參加一人。

周恩來：政治會議由 蔣先生主席，蔣先生即為國民黨黨員。

邵力子：蔣先生公務太忙，不見得每次均能主席。

周 ；蔣先生不能主席時，指定一人主席亦可。

張 羣：政治會議之人數，我主張為二十五人，國民黨為七人，共產黨為六人，其餘十二人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各佔六人，名額上如須留伸縮餘地，則可規定為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

周：關於此點，岳軍先生與民主同盟及青年黨談過否？

張：未談過。

邵：第三方面之名額，不妨增加一點。

張：如爲廿五人至廿九人，國共方面共佔十三人，則尚有十二——十六名可以伸縮。二十五人爲基本數，如有適當之人選，則可增爲廿九人。

周：關於人數問題，我以爲尙須徵求各方面之意見，昨見曾慕韓，渠以爲政治會議之人數不妨增多一點，以便容納各方面之人物，使能在會議中儘量發表意見，以求得彼此間之協議，使退無閒言，若不令參加，彼等勢必在會外擅發議論矣。

張治中：政治會議之四方面，係指那四方面而言。

張：國民黨、共產黨、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

周：社會賢達，乃代表社會各方面，如能多加延攬，亦可聽取社會各方面之意見，故我以爲人數仍以三十六人加主席爲三十七人爲宜。

邵：將來名單發表時，是否須註明某人係代表某方面。

周：以註明爲宜。

邵：比如青年黨之負責人，同時又爲民主同盟之負責人，如被推爲政治會議之代表，則究應註明係何代表何方？

周：然此事亦有困難。

張：現在社會上已有人進行組黨，希望能參加政治會議，我等對於此種新成立之組織如何處置？

周：參加協議之黨派，當然僅就抗戰以來即已存在之黨派而言，至於最近新成立之黨派，自不必令其參加。至將來法律之地位，可由國民大會決定之。

張羣：民主同盟是否可視為黨派？

周：民主同盟有集體之政見，自可視為黨派。各黨各派在事實上有其存在者計有青年黨、國社黨、民主同盟、救國黨、第三黨。但後二者尙未能爭取政府之承認。

張羣：無黨無派與各黨各派之界限，事實上無法分得太嚴格。將來在組織條文上應否明文規定？尙待研究。無黨無派之代表，兄等考慮何人爲宜？

邵：莫德惠、王雲五、胡政之、吳貽芳、傅斯年、郭沫若、范旭初、吳蘊初對於團結建國之問題，均甚關切，似可爲無黨無派之代表。但仍當與各方面接洽後，始能決定。

張羣：政治會議討論事項之範圍如何？

周：邵先生所草擬之兩項：即（一）討論和平建國方案（二）討論召開國民大會問題，甚爲概括。其他支節問題，皆可包括在內，我們即可以此爲政治會議討論之範圍。

邵：現在之工作在如何草擬此方案之綱領，以便將來提付討論。

張羣：候各方面提出意見後，即可推人起草。

周：如討論國民大會問題，必將牽涉五五憲草，將來各黨派恐難免意見上之岐異，例如第一條、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一點，即有若干黨派不同意。

邵：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一點，國民黨當然贊成，共產黨宣稱爲三民主義而奮鬥，自不反對，青年黨亦未見不能同意，至於其他條文，兄等如有意見，盼與孫院長談談。

周：甚好。我在今年 中山先生誕辰，曾發表一文，根據 中山先生之遺教，列舉與憲法有關之問題七項，此文即可檢寄一份，供兄等之參考。

張：政治會議協議之方式如何。

周：關於政治會議之協議方式，我方曾提出下列原則：即（一）平等的（二）自由的（三）一致的（四）公開的（五）協議之結果有最後拘束力。

張：任何會議出席者皆有發言權與表決權，其爲平等不成問題。在會內可以發言，會外可以接待賓客，自由上亦無任何拘束。協議之結果，各方面均須遵守，當然有最後之拘束力。此三者皆不必討論。現在所應討論者，爲「一致的」與「公開的」二點。在問題之討論未達相當階段時，往往須暫緩發表，似不能一律公開，即參政會亦有此例。至於「一致的」一點，如規定過於呆板，事實上恐不能成立協議。因政治會議之人數既達三十餘人，則對於同一問題，決不能避免矛盾之見解。如必須一致，則一二人之反對，即可使三十餘人之同意，歸於無效，不知兄等有何補救之法。

周：所謂「公開的」當然係指原則而言。政府會議之協議，如因事實之需要，何時公開，會議本身自可斟酌決定。至「一致的」乃協議所應遵守之原則，吾人既請各代表參加會議，自當尊重其意見，且余信參加會議之代表，必能明識大體，意見上縱有參差，希望其能互相說服。張：政治會議之代表若僅爲少數之黨派領袖，自易求得意見之一致，無如現在政治會議，名義上雖僅包括四方面，而實際上乃包括更多之方面，人數衆多，意見紛歧，萬一對於某一問題，因極少數之反對而不能求得一致之協議時，將何以補救？

周：此確爲難免發生之困難，可否於政治會議中，另組一常務委員會，由各方面推舉一人爲常委，如此，即易於成立協議。

張羣：此意見未嘗不好。然第三方面——各黨各派——必起而爭執，名額又必擴大，復不易成立協議矣。故關於「一致的」一點，應請兄等再行考慮。余以爲國共任何一方不能同意之問題，當然不能成協議，故國共在會議中必無不能同意之問題。現在所當考慮者乃少數代表持反對意見，不能成爲協議時，應如何補救之問題。如對於某項問題，會議中已有卅餘人同意，只有一、二人反對，可否即視爲協議成立。

周：此似可行。

王若飛：對於同一問題，如有四分之三以上代表之同意，似即可成立協議矣。

張羣：關於政治會議問題，原係雪艇兄與兄等商談，可否俟渠歸國後，與兄等再行討論，然後徵求各方面之意見？

周：不必俟雪艇兄歸國，即可由我雙方約請三四方面之領袖，作初步商談，如有結果，即請蔣先生作最後決定，定期召集。

張羣：關於政治會議，我等今日所談，可得結論如下：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以前，設政治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之，以各黨派領袖及社會賢達爲會員，協議和平建國方案與召開國民大會問題，名額暫定爲卅七人。

## 六、鬧出一個怪物——政協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惡鬼統戰詭計得逞的產物，是魅魍魎羣起亂嚷的大舞台，是「鬼鬧張天師」時期鬧成的鬼把戲，是擴大和談對象的奇形怪象，它比盧充鬼家庭的惡作劇還厲害萬倍。盧充的鬼妻尙沒有與羣鬼雜交，但生出的小雜種已經全沒人樣。中共惡鬼則到處倚門賣笑，搔首弄姿，既拼上惡少年，又勾引了良家子弟，更強姦了正人君子，她在這樣的交媾縱慾，滿坑滿谷堆滿「人渣」之下，怎得不大腹便便，產下這個名叫「政治協商會議」的怪東西來？又怎得不被我國的先知說中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又正因為它是妖孽，所以中共至今還在利用她的「賸餘價值」。

### 政治會議問題談話要點 九月三十日午後四時半在國民參政會

所涉及者：爲名稱、人數、表決方式（全體一致，極大多數，大多數、會外協商）、會議類別（大會、常會、特別委員會、小組會、圓桌會議）及其他如（公開、旁聽、執行、複議、人選）等問題。

左舜生：贊成會員人數爲三十七人，不贊成分設大會、常會，主張隨時設小組會。因爲設常委則非常委皆處於次要地位，各黨派人士意見非常委所能代表。

王雲五：應分大會與常會，大會表決用大多數式，常會用一致式，先由常會通過，再提大會，仿照國際聯合會辦法。

傅斯年：不贊成大會之外有常會，惟大會可用五分之四等極大多數決定，程序問題須過半數通過，其他重要問題用大多數方式通過、如三分之二，五分之四等，但遇有×人數提出某問題須一致表決時，應用一致表決，如兩次大會均不能一致通過，則反對者不超過×人數時，亦應作爲

通過。

絕對不能以多數壓倒少數，絕對不能讓少數搗亂，絕對不能讓國共獨裁，亦不能讓其他黨派聯合獨裁。

黃炎培：贊成會員人數爲三十七人，及王雲五所提議大會與常會之分。大會用極大多數，常會用一致式，此外可用小組會，討論個別問題，亦用一致表決。實現平等，可用圓桌會議。大會應公開，並許旁聽。

沈鈞儒：贊成會議須一致表決，因一致可增加執行力量，如不一致可在會外協商。贊成常會，但不可妨礙全體會之一致。贊成公開，但公開應有限度，不贊成旁聽。

章伯鈞：政治會議，性質特殊，討論須取協商精神，而表決則必須一致。常會不須設，可設常設特別委員會，專爲研究不一致之問題，遇特殊問題不能一致時，可交特委會；如得一致，則交全體會由極大多數表決。

羅隆基：不贊成常會及特別會，減少人數不能解決一致之問題，每一問題均要一致，甚爲困難，可因問題之輕重而決定一致與不一致。普通問題則不必要一致，如某方要求此問題之一致，則此問題須用一致表決。特殊問題要一致，如不一致，則須另行協商，保全協商精神，而不以大多數壓迫少數。

曾琦：性質問題，此種會議應有決定性與拘束性。名稱問題，現在抗戰告終，建國開始，可名爲「建國會」。名額問題，如用常會則名額須多，不用常會名額宜少。全體一致不可能，民主政治應取決於大多數。小組會有必要，但不必常設。此種建國會，非國會性質，公開應

有限度。

張瀾：國共之間，如能開誠互讓公開合理，必能得到一致，則其他黨派等大抵可能一致，然國共雖一致而不公平合理，則其他黨派亦不能贊成。又如政治會議已得到一致決定，政府與中共兩方執行如何，請將來參加政治會議之人士注意。

傅斯年：凡已通過事項，遇執行發生困難時，如有×人數提出，可以「複議」一次。但如仍贊成原議，則必須執行。

周恩來：凡一切決議，執行時如有變質等情事，政治會議可派員檢查或監視，複議一次，自可規定作為補救辦法。

章伯鈞：人選問題，政府應與各黨派協商，各黨派亦可自行協商。

附小紙條一張，其上錄有：

- 一、國民政府為加強全國團結，協商建國大計，在憲政實施以前，特設政治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 二、本會議會員由國民政府就各黨領袖社會賢達中延聘三十七人組織之。
- 三、本會議協商事項(1)和平建國方案(2)召開國民大會問題。
- 四、本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以國民政府為主席，主席因事不能出席時，指定會員一人代理之。
- 五、政治會議之性質是公開的、一致的、有決定權的。

（編者按：此小紙條中之文字，可能為當時多數不反對之結論，但由誰寫成？又何以未提詢在場人員有無異議？則已無從探問。其後政協會議之組織，即以此為藍本。）



## 第二編 源流濁亂的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雖發動於國民參政會，實決定於國共商談，其爲陰陽怪氣中成胎的怪物，已在前編指出。值茲天下滔滔，衆生昏昏，只有寫明這怪物出世後誤國惑民的情節，纔能引起今日民主陣營迅速採取懲前毖後的措施，亦纔能證實三十四年九月間十次商談的無益而有害，並證實王雲五會員所說政治協商會議「影響於我國最近一二十年之政治者最大」這句話，非常正確。又只有集錄當時的新聞報導，纔不致無徵不信。

### 第一章 匪氛冲天

#### 第一節 中共的陰謀暴行

一個好的開始，事已成功一半，一個壞的開始，事已失敗一半。要是開始和經過及結局都壞，那就豈止完全失敗，更將貽禍世界。

日本纔投降，中共便到處叛亂，好像要替日本軍閥立即報讎是的。當時朱德致國民政府 蔣主席的電文，竟用「你及你的政府」這類詞句，連漢奸殷汝耕、王揖唐、汪精衛、溥儀等所不敢這樣說，日本軍閥內閣廣田林銑、近衛文磨、平沼騏、阿部信行、米內光政、東條英磯、小磯等尙沒有這樣粗暴野蠻的嘴臉，他們竟公然出之。當時毛澤東曾指示其嘍囉：「我們共產黨人現在還要再加努力，將

晉冀察綏魯遼各省全部佔領，阻止國民黨軍隊北上，讓國民黨政府繼續關在四川，然後再談和平問題。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堅決相信，只有打下去纔是真正的和平，祇有不斷的鬥爭，纔是爭取團結。」這種陰謀，實在比日本近衛內閣企圖與剛失首都的國民政府謀和，尤為變本加厲。當時朱德給賀龍的作戰命令，要他把握時機，盡力擴張地盤，並要賀龍李運昌葉承呂正操等部隊分別向太原、遼甯、河北、山東、熱察綏進攻。接着便是圍攻歸綏、山西、山東等地，攻佔秦陽等處，便是破壞山西境內鐵路，決毀山東境內河堤，便是襲擊沿平漢鐵路北上受降的國軍，到處實行其所謂「圍困大據點，爭取小據點」的謀略。甚至與日軍日俘合流，使冀東方面的日軍二千餘和他合作，使其蘇北幹部利用「日本解放聯盟」的名義，護送日軍至延安受訓，使日本砲兵射手圍攻歸綏，殘殺軍民，使許多日軍將領充任他們的參謀幕僚，使日本工兵破壞水陸交通，使日本各黨派人員組成不法會社，擾亂各地治安，並假借國民政府名義，偽造日軍戰犯名單，企圖影響日軍的心理，使其畏懼不安，不得不投奔於他，聽其驅使。像這些均經各地新聞記者逐日報導的事實，誠如當時休假於新墨西哥州聖太飛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對美聯社記者所說：「中國共產黨武裝部隊企圖獲得日軍一部份武裝，好在中國建立獨立政府或毀滅中華民國政府。」這和日本軍閥所為，有什麼差別？至於他們在當時訂立的「新征兵辦法」，規定十六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壯丁，一律編為正式軍隊參加作戰，三十五歲以上者，征編為預備軍隊，均服勞役；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均須參加軍中工作，凡有違背規定者皆處死刑；這種大量征兵征役的嚴酷辦法，更比日本侵華末期在偽滿國所施行的還要暴烈。中共在三十四年起的暴行陰謀如此，已經很難阻止，而蘇俄又「助紂為虐」，「為虎附翼」，豈是口舌有效？此在當時或僅料蘇俄必然如此，而無從確知其真情如何，及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莫斯科電台公開承認蘇俄會

將得自日本關東軍的全部武器交與中共，使它能夠發動叛動，它說，「這些武器包括有七十萬枝步槍，將近一萬一千挺輕機關槍與三千挺重機關槍，一千八百多門大砲，兩千五百門迫擊砲，七百多輛坦克，將近九百架飛機，與將近八百所大型軍火庫。」又承認，由於蘇俄的干預，使中國國民黨接收東北的計劃無法進行，「中國東北因此成了中共領導人民武裝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與工業基地。」蘇俄既如此的假手其傀儡來滅亡中國，那麼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即令全是正人君子，甚至有全知全能的上帝監臨其事，亦決無撥亂反正的可能。

## 第二節 馬到不成功

我國人形容一件事成功的順利快速爲「馬到成功」，既然上帝也不能叫中共不作亂，則任何能征善跑、識途越嶺的好馬，又怎能馬到便成功？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儘管兼程來華、撮合國共，或竟如王婆誇口的「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馬，」但中共的打算，必將如狠毒的秦王對燕太子丹所說的，「烏頭白，馬生角，始許爾返國」，馬歇爾又如何能「生角」？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下旬，美國政府選派前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爲駐華特使，用意本好，觀感則誤，使其發生錯覺的事實，則有幾件，這幾件事實的造成，則均出於中共的佈局。

一是，美國覺得赫爾利大使既能做到使毛澤東飛往重慶，那麼再使勳業彪炳、地位崇高的馬歇爾將軍繼赫爾利之後，完成國共的合作，自更可能。

二是，美國覺得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國共雙方會談至十月十一日，已對各種問題得到部份協議，

並已發表「會談紀要」，其未能決定部份，亦必能繼續商決。

「會談紀要」是：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第一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國，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作，為達成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先採必要之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延緩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及修改國民大會組織選舉法，和五五憲法草案等三項主張。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其名額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決，五五憲法草案，原曾發動各界研討，貢獻修改意見。因此雙方同意成立協議。但中共方面聲明，中共不願見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壞團結，同時雙方均同意將此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一致認為政府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皆有平等合法地

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為憲政常軌，今可即行承認。

(六)關於特務機關問題：雙方同意政府應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人民之權。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雙方同意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九)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應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維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師，並表示迅速將其所領導下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各地之部隊，由上述地區，逐次撤退，應整編的軍隊調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商談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的數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人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部隊人員為各級官佐，縮編軍官佐、應實行分區訓練，設立公平合理的補編制度，並確定政治教育計劃。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項，均無問題，亦願商談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應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自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討論計劃上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十)關於解放區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

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應成爲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開始提出三方案，爲依照現在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並即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維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劃省區變動太大，必須通盤籌劃，非短時間所能決定。同時政府方面表示：依據 蔣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國軍令統一之後，中央可考慮中共推薦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有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爲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於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解決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山西、山東、河北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爲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省府副主席及委員（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廣大解放區或有部份解放區）；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市，得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副市長。於東北委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此事討論多次後，中共方面對上述提議所列推選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爲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請推選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爲晉、綏兩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對於其抗戰軍事著有勞績，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薦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副主席等，則即非真誠做到軍令之統一。於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解決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重行舉行人民普選。在政治協商會議派員監督之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選賢參加舉辦。凡一縣有過半數區鄉已舉行人民普選，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縣級民選，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省級行政區級民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省區加委方式，乃非謀政令之統一，惟縣級民選加委，可以考慮，而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目前祇能由中央

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掌行政，俾即恢復常態。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種解決方案，各解放區，暫維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之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同時中共方面認為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之懸而不決，慮為和平建設之障礙，仍盼能商得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繼續商談。

(十一)關於奸偽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惟懲治漢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偽軍，亦須妥慎辦理，以免影響當地安寧。

(十二)關於受降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紀念日於重慶

王世杰 (此處留有空隙，以備張羣補簽)

張治中 邵力子 王若飛

三是美國覺得國共雙方歷時一月餘的會談結果，既如此的露出光明，毛澤東離開重慶前的公開談話，又是那樣的坦率，這一切，電訊既有報導，前途當可樂觀，而殊不知其大謬不然。當時電訊的報導是：

(重慶八日中央社電)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於八日晚假軍委會禮堂舉行盛大晚會，招待黨政軍首長、留渝參政員、文化界、新聞界暨各界領袖聯歡，并邀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委員周恩來王若飛及新近來渝之美國出版家魯斯氏，與會者五百餘人，濟濟一堂。七時正，晚會開始，張

部長主席致詞，略謂今日舉行晚會，集各界士女於一堂，甚感光榮欣慰，藉機並歡迎與歡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以毛先生前應國民政府 蔣主席邀約來渝商談民主和平統一團結建國諸問題，迄今已獲有大部份之協議，毛先生定日內飛返延安，留有其他未經協議事項，繼續商討，故今日歡迎而又歡送。至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商談及結果，當爲諸君所關注，不久即可有雙方共同之公報發表。今日因時間關係，未能詳述。簡言之，吾人認定今後建國工作，必須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使中華民國永遠民主和平統一，且此項意見爲共產黨方面所提出，尤可欣佩。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已越五十載，其目的即在實現民主政治。當前世界上任何國家均求統一團結，中國自亦不能例外，故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矢志在 蔣主席領導下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也，此所以雙方於建國原則及方針上意見一致，而無異議也。此外雙方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地位平等與平等合作諸事項，均經詳盡商談，其程度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至其餘未得協議之少數部份，將繼續商談。張部長報告畢，請毛澤東致詞，略謂：本人此次承 蔣主席邀約來渝，商談期內，備受招待，衷心銘感。今日又承張部長舉行晚會，歡迎與歡送，亦表感激。此次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商談，爲全國人士所關心，以所談問題不是一二黨派問題，而是與全國人民利害相關故也。適張部長報告謂談判情況之樂觀，前途必可圓滿解決，本人完全有同感焉。此次雙方會談解決若干問題，其他部份將繼續商談。可以告慰者，吾人必以商談解決一切。今日情勢「以和爲貴」，雙方除和平商談外無他途。今後中國需要統一，始可建設成爲獨立自由富強之國家，吾人今後亦唯有在 蔣主席領導下，爲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努力奮鬥，求長期永遠的合作，以建設新中國。過去和今日雙方談商，容有若干困難，將來恐亦難免不無困難發生，唯吾人既已立定和平、民主、統一團結原則，擁護 蔣主席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義，則一切困難必可完全克服。毛氏致詞畢，全場亦報以掌聲，嗣與會者全體聚餐，未有遊藝助興。

美國政府本此三種錯覺，就意氣揚揚，放馬過來了。雖然馬不停蹄，東奔西走，想瞭解情勢，找出坦途，略如當時若干日報的報導，其後且七上廬山，商得蔣主席同意，不斷遷就中共的無理要求，結果還不是和六出祁山的孔明，九伐中原的姜維一樣，沒有改變曹操蓄意篡漢的陰謀麼？他個人像韓愈感喟的「祇辱於奴隸人之手」，自不消說。

馬歇爾至中國之初，朝野各方對他的任務的希望之深，可從下列各項電訊中看出：

（中山日報廿六日重慶電）美特使馬歇爾，昨日再度晉謁蔣主席。蔣主席接見之於官邸，同進午餐。同日馬特使接見共黨代表周恩來，會談甚久。

（美國新聞處重慶廿四日電）美國駐華大使馬歇爾元帥，昨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稱：美政府對努力調停中國內戰，及即將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深為關切。美政府與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之幸福，以及中國人民之對世界和平之關係，深切注意。馬帥拒絕發表任何聲明，惟稱：欲獲知中國真實情況將須相當時間，渠來中國之任務，係求能獲知各項情況，而非發表聲明。

（中山日報特派員重慶廿六日電）政府與共產黨會談，定今日在此間重開，一般認為會談屢續舉行，顯示團結已獲顯著進步。據悉：政治協商會議將延至卅五年元旦以後舉行，馬歇爾特使已晤見共產黨代表，會談達一小時。馬歇爾特使將繼續晤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等黨派代表。共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今日稱：共產黨方面願首先無條件停止軍事進攻。此間工業界昨日表示：政治協商會議之拘束力應先予確定。

（文化社特接舊金山廿六日廣播）重慶息：馬歇爾于今日下午接見中國民主同盟代表，聽取彼等

對中國政治之意見。

（中央社重慶廿六日電）外部定廿九日下午五時至七時于兩浮支路新廈舉行鷄尾酒會，歡迎馬歇爾特使，並介紹馬帥與各界人士會晤，屆時駐華使節，各部會首長，參政會駐會委員，及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等，均將被邀參加。又軍政次長俞大維，今晨往訪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元帥。

### 第三節 杜魯門弄巧成拙

杜魯門特使馬歇爾啓程來華之後，杜魯門總統緊接着申明美國對華政策，給這匹好馬打氣，用意雖佳，但因措施失當，結果便完全相反，固不止如美國各地報社的觀察，認為希望遙遠而已。

（中山日報接舊金山廣播）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宣佈：美國對華政策無改變。馬歇爾將軍此次來華之任務，是使中國得到和平民主自由之實施。

美國國務院因赫爾辭職引起的風波，中國國內軍事衝突的加劇，使得杜魯門總統也呼籲中國應立刻停止內爭，並且發表對華政策之聲明。

（紐約廣播）美聯社每日評論稱，杜魯門呼籲中國停止內爭，此事在過去一週中，已成新聞中心，及各主要國家紛紛討論之重要事件，同時亦為在莫斯科舉行之三強外長會議目的之一。該會議將討論世界之主要難題，包括中國在內。杜魯門當馬歇爾乘機赴華之際，申明美對美政策綱要，以待其完成。彼稱：中國不斷之內爭，將威脅世界安全及和平。彼呼籲：1.設法停止中國內戰，2.從速遣送一百五十萬日軍回國，3.民主政府，應包括所有政黨份子。4.中共軍隊歸入國家軍隊，以上四項為蔣主席及共黨雙方共認之目標。杜魯門希望以中國所欲商借美元之答允與否，而謀其言之實現；彼

稱：當中國情形不再威脅世界和平時，始能談到貸款。

（中央社紐約十七日專電）美國人民于杜魯門總統所發表闡明對華政策長達一千五百字之聲明後，可以測知總統授與其特使馬歇爾元帥指令之內容。總統之聲明，顯示馬歇爾卿命于抵達我國後，將從事下列各項措置：「甲」建議政府軍隊與共產黨軍隊須立即停止軍事衝突，「乙」設法將在華日軍迅速撤退，「丙」建議召開各主要政治份子代表之全國性會議，俾組廣泛代議制之政府，「丁」建議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修改，「戊」建議於廣泛代議政府一旦成立之際，所有自主的軍隊，應加裁除，并當編歸國軍，「己」中國採取上列步驟後，美將與國民政府即磋商合理方式之援華辦法，其中包括信用及現金貸款在內。總統之聲明，明定美國確認并將繼續承認國民政府，且於國際事項方面，尤以消除日本在華勢力，一方面仍將與國民政府合作。該聲明并言明美海軍陸戰隊，除非待日本在華勢力完全消除後，不擬撤回，美國對華不致作軍事干涉之行爲。在美國外交史上，總統爲美國人民及世界之利益計，公開闡明美國對其主要盟國一貫之政策，猶屬創舉。此一行動係於赫爾利將軍提出控訴後以決定者。杜總統前日曾應允將授予馬帥之訓令條款披露，然此項聲明要非訓令全文，此點必須指出。總統本日僅發表其訓令之背景而已，渠未曾言明其所以不能遵守前次諾言之理由，揆諸當時實情，援用總統政策之自由處置。杜總統發表是項聲明，顯欲美國人民保有明智之瞭解，將能獲得普遍之讚許，或許不能使美國國內要求採取「不干涉中國」政策之左翼人士滿意，此等左翼人士尤表反對者則爲總統對于美海軍陸戰隊留于華北之理由。左翼人士對總統聲明之反對，反將從而廓清美對華政策之一般誤解。杜總統之意向，對於將來中美之關係，有利益之影響。總統政策之澄清，一半當歸功于赫爾利。此外馬帥懷有美國人民之希望，咸認刻所擔任之工作，至巨且艱，已于前日啓程赴華。對

予馬帥首途之一般評論，乃認渠曾獲得杜總統無條件之支持，將來馬帥之建議，無疑可獲白宮及國務院允許。此外，併當注意馬帥此行，非特獲有目前之訓令，並因其前任參謀總長之職，故熟悉中國政治軍事各般事宜，有某評論家謂無人能懷疑其代表美國發言之資格。

（美國新聞處舊金山二十日電）美國各報社論繼續檢討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及馬歇爾將軍擔任特使之任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美總統闡明對華政策甚佳，但單獨文字亦屬無用，更大之效果將是馬歇爾如何能使中國兩黨携手，以及如何利用在華美軍及美國資金。如欲得更重要之成效，則有待中國本身之努力，蓋絕無人能在旦夕之間能以團結及民主贈與中國也。

華盛頓郵報稱：杜魯門總統之宣言，證明我人援助中國更感興趣。吾人現面對現實，認為自休戰以迄團結，其中係一遙遠之路程。總統謂中央政府乃獲致團結中國之真正工具。總之，目前若能休戰，直至日軍被遣返國，則已足矣。

諸非於十八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中國共產黨深恐一旦解散其軍隊而編入國民軍，則彼等將失去其政治之力量，故彼等勢必拒絕美總統之建議。但諸氏又稱：杜魯門之聲明足以幫助造成一強大統一民主之中國，此正為美國始終所希望者。但必須認清事實，此一目的非輕易達到。中國人民當然求之不得，但阻礙甚大。故馬歇爾執行總統之指令殊非易事，馬氏盡力以赴，非無希望，馬氏使命之成敗，不但有關中國之前途，而且世界之和平亦繫於此。

#### 第四節 政協會議亦竟難產

政治協商會議本是中共代表在國共商談中同意召開的，又來了一位美籍助產士，應該可以順利誕

生，事實却並非如此。中共代表的姍姍來遲，尤爲不祥之兆。請看當時中外報社的記載：

（成都廿四日中央電）張羣飛返蓉後，記者趨訪，以政府與共黨商談內容奉告。據謂：日來在渝繼續與共黨代表商談，主要問題爲避免衝突，恢復交通，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三事。抗戰以來，政府一貫政策爲加強團結，鞏固統一，實現民主，努力建設，對共黨問題，政府始終依據既定方針，以政治方式尋求解決途徑。此次參加談判代表，秉承政府意旨，努力不懈，對避免衝突，恢復交通辦法，已累作具體之商談，意見尙未一致。但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辦法，業經商定，并已預定下月一日召開。周先生已飛延安報告，并預定週後偕共黨代表到渝，參加會議。屆時本人亦將再赴陪都。政治協商會議均係各黨各派人士及社會賢達參加，悉心研議，以能獲得合法合理之解決。

（重慶十七日美新聞處電）外交部長王世杰，今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報告，政治協商會議，或將於十一月初開會，由蔣委員長任主席。國民大會開會日期，及與「國大」有關之問題，將爲該會議主要議題。王氏續稱：政府現正與各方交換意見，決定各黨派出席該會議之代表名額及代表候補者之人選。該會議將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其他政黨與無黨無派者四方面之代表。

（重慶十二日美國新聞處電）美聯社電稱：中央政府與中共雙方，今日同意於定期本月二十日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席上，解決雙方政治與軍事之歧異。中宣部長吳國楨及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均公開表示同意中國民主同盟主張之協調會議。

（中山日報廿九日重慶專電）重慶訊：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廿七日一度重開談判召集統一會議。會議結果，據政府方面發言人稱：會商經過尙稱順利，共黨代表提出幾項建議：1. 政治協商會議應提前一月一日舉行，立刻進行籌備開會工作。2. 協商會議祕書長一席，不得由政府官吏充任。3. 接納無

黨無派知名之士參加。4. 每次開會准新聞記者參加。5. 釋放政治犯。6. 准允共黨在渝設無線電台。以上各點，經政府方面允許予以考慮。又據共黨代表談稱：在政治協商會未正式開會前，先舉行統一會議，共黨方面提出三項主張，大致如下：1. 中國境內國共兩方應即無條件停止軍事行動，2. 政治問題均由政治協商會議解決，3. 將來由各黨及中立份子組織調查團赴戰區調查實情。該項主張，政府方面尚未答復云。

（中山日報特接重慶廣播）重慶方面以飛機二架飛赴延安，迎接延安五代表及十八集團軍長官來重慶。

（廣州日報特接紐約廣播）重慶息：本日下午周恩來及其他四名共黨代表抵渝，另有兩名已在此間。政治協商會議之日期，尚未宣佈，惟預料將在聖誕節前後舉行。

（中央社重慶五日電）五日下午政府代表張主席羣王部長世杰邵秘書長力子及共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氏繼續商談，雙方就以前原提有關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問題之方案，已商得同意，并依照雙方同意之案，推定張邵周恩來迅即商議實施。

## 第二章 場外鑼鼓齊鳴

### 第一節 中外人士一致殷望

身受共禍已久的中國人民，關心中國前途的外國朋友，都祝望政協會議快快開，好好議，只能成功，不可失敗。從當時各報社的報導，真像大旱的望雲雨，天地晦冥時的望日出，就是蓄意叛亂的中

共，也只得假意附和。

（舊金山廣播）在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後，中央政府與中共方面，均表滿意，可以爲此次談判之道義支持。又中共發言人稱：此次政治協商會議前途，殊爲樂觀。

（美國新聞處重慶十八日電）據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爾今晨談稱，代表雲集重慶，準備各黨間再度聯合，致力中國和平團結之舉，業已引起全國各方強調此次會議，必須獲得成功結果之反應。而此次新成立之政治協商會議已將於一週之內召開，該會之空氣頗富希望，而過度樂觀則在避免。杜魯門總統所作美國政策之堅定聲明，已使未來之商談，獲得助益。渠已明白說明中國在戰後建設工作中，可獲得美國完全支持之機會。今觀中國是否能促進國內之團結，然杜魯門亦未提供一種萬能良藥，中國必須自覓治療胃病之方法。過去數次政府與共產黨間協商之中，阻礙發展之基本爭論，迄今仍然存在。於紛亂狀態之中，各派均有痛苦之經驗，即解決中國內部問題之和平道路，實屬艱苦而遙遠，欲達此路，亦唯有逐步前進。至對於目前空氣，有所裨益者，尙有數項因素：第一個因素即爲美國外交上之壓力，該項壓力可由杜魯門之聲明，與總統特使馬歇爾元帥即將來華一事證實。另一因素，爲中國輿論一致反對內戰。更有一個因素，爲國共雙方均覺有更大妥協之需要。最後一個因素，則爲過去數日中之國內混亂局勢之教訓，雙方均以軍事手段達成各種目的，則一場持久之血戰必不可免。中國報紙尙在繼續評論杜魯門之聲明，一般的明白表示贊同，官方報紙以之爲一粒難於消化之藥品，惟亦並非絕無其作調解之性質，蓋聲明中，杜魯門再度提出美國承認中國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之政府也。共產黨則認爲彼等乃係可自此種聲明獲益之主要對象，蓋彼等由於美國願助中國統一國內而增強其商談地位。

（中山日報特接倫敦廣播）行將在中國重慶舉行之政治協商會議，並無法律根據。黨融洽媒介，並商就國家大事之若干原則而已。該會將於聖誕節前後舉行，其中三十八有一人或兩人為婦女。

## 第二節 各報代達輿論

站在民衆前線的文化界新聞界，更爲此一大事發爲文章和宣言，一致歡欣鼓舞。

（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電）南京文化界人士，前於京市文化運動委員會舉行之首次會就時局交換意見，並通過對時局宣言。此項宣言，頃經整理就緒，茲將全文誌次：和行建國大業的必備條件，因此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衷心希望最近行將召開的政治協商利進行，並獲得圓滿結果。在這裏我們願對當前時局提供四點意見，敬告我赴會代表及弟姊妹們：

第一、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有待於各代表的一番謀取真誠；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代真心誠意，能以國家民族爲重，而不以國家民族爲敵，謀求問題的解決，而不製造問題宣傳，提出若干不能接受的條件，徒然延誤時間，無補實際。

第二、中國共產黨問題的癥結，在於他們之有自主的軍隊，游離於國家法令之外。共產黨毅然還軍於國，聽候政府編遣。政黨要爭以政見，不爭以武力，爭於議場，不爭民主政治的常軌。中國共產黨素以民主爲號召，當能言行相顧，不再憑藉武力，以爲政第三、我們不願列舉中國共產黨種種欺騙的宣傳，不願列舉中國共產黨種種非法的



有鐵證，公道自在人心，決非任何狡辯所可掩飾抹煞。中國歷史上唯有黃巢李闖之流，始以暴亂爲務，殺戮爲快，但其結果終歸失敗。我們電請中國共產黨聽聽國民的呼號，國民要求安居樂業，要求返歸故鄉，反對任何名目任何藉口的叛亂。爲中國共產黨計，應該立刻放下屠刀，懸崖勒馬，以事實與天下人共見，這是中國之幸，也是中國共產黨之幸。

第四、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目標，即在實施民主憲政，數十年來無數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八年來全國軍民的艱苦抗戰，無非深求此一目標的實現。現在國民大會召開有期，距此目標益近，祇有循此正途向前邁進，決不能別尋蹊徑，以自亂步驟，毀棄前功。我們希望政治協商會議，是走向國民大會的橋梁，而不是國民大會的代表。

我們希望政府的陣容由於這一會議而加強，但不應有所謂「聯合政府」的計議，以致造成事實與理論兩不相容的局面。我們要珍重數十年來的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及幾經磨難而爲國民所一致擁護的國家中心。以上是我們最率直的意見，也是我們最殷切的期望。

（大公報意見）共軍應即停止軍事行動，促成協商會議之順序成就。中央政府既以寬大爲懷，而共黨亦應停止軍事行動，彼此開誠佈公，在會議席上公開討論，解決一切，實不應因小爭執，而在戰場上解決。

（中央日報社論摘要）……這個會議所以爲舉世矚目全國重視，並不因爲他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創舉。我們知道國民政府自抗戰發動以來有其一貫的政治建設方針，就是要使抗戰的勝利與憲政的成同時實現。所以蘆溝橋事件發生的時候，蔣委員長召集全國各黨派和社會賢達集會於牯嶺，宣佈全面抗戰的政策。中國共產黨代表雖沒有正式出席這有名的談話會，但是他們當時同在牯嶺，備蔣

委員長的諮詢與商量。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這時候商量的結果。到了全面抗戰展開以後，國防參議會成立於南京，續會於武漢，參加的人士有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的代表和社會賢達。當時的國防參議員在今天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亦不在少數。這一個各黨各派社會賢達的會議乃是國民參政會的前身，而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更曾經這個會議討論，纔由國民政府作最後的決定。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武漢，續會於重慶，至今四屆相承，都有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在內。……由牯嶺談話會到國民參政會一脈相承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向着民主政治而前進的記錄。在這個悠長的記錄上，政治協商會議不是開創之局。……

政治協商會議所以爲舉世矚目全國重視，也不因爲他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完成。我們知道國民政府所信守的建國大綱，以國民大會爲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樞紐。……自一方面說，在國民大會開會以前，訓政時期約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在國民大會開會以後，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自他方面說，政權之歸還於國民，乃以國民大會爲惟一的樞紐，而以五權憲法爲正當的軌道。因此召開國民大會纔是憲政的成功。至於政治協商會議乃是國民政府在國民大會召開之前的一種權宜的重大措施，並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經的步驟。……

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性，……是在中國民主政治發育滋長過程中必須解決的若干問題要待他來解決。尤其是在這從抗戰結束到和平開始的決定關頭。這些問題如不解決，不但民主政治沒有成就，亦且國家社會將淪於破碎沒落的深淵，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國民政府爲了解決這些問題而召開的一個會議。……

……民主政治是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各黨派各階級依於法定的軌道而提出他們的意

見，經過討論構成政策，交行政機關見諸實施。……在這種制度之下，各黨派各階級的爭執，訴之於輿論，而不訴之武力，決之於會場上的表決，而不決之於人民的生命財產與國家的公共建設的破壞。政治協商會議雖不是國民選舉的代表機關，但是他是中國今日化非法爲合法，化分裂爲統一的重樞紐，他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政治協商會議雖不能變更國家根本大法，但是他對於制頒國家根本大法的國民大會召開，有最現實而最具道義力量的助力，他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政治協商會議雖不是常設的決定政策的國會式的機關，但是他對於今日以後的和平建國大計有最現實而最具道義力量的貢獻，他的重要性就在這裏。……

國家的存亡和社會的治亂，是關係每一個國民的身家職業的。想回家的人們關心交通，受黃災的人們關懷河工，沒有職業的人們關懷工商農礦，而一切的一切都以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爲前提條件。政治協商會議的議題，乃是全國每一個國民身家職業的前提條件。我們相信全國每一個國民誰都希望這個會議的成功。這個會議所以具有道義力量，就在這裏。我們希望並確信參加會議的諸君，在心目中，只有國家存亡社會治亂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案。他們參加會議，決不是爲了一黨一派一己之私，這就是會議的道義力量的根源。這一道義力量如能充分表現充分發揮，足以造成今日國內最感缺乏的互信，互信在今日是解決一切重大問題的基點。……

……當此抗戰結束和平肇始的今日，大家都要竭盡所有的力量，使勝利的光榮歸於國家，勝利的果實歸於人民。誰都不會聽任國家應享的勝利光榮減色，人民應享的勝利果實流產。誰都要確保國家統一，安定社會秩序，導入民主法治的前途。……

（中山日報社論）抗戰勝利結束以後，中央對共產黨問題，迄今未改變政治解決的一貫方針，亦

決不杜絕政治解決的門徑。這種事例很多：如 蔣主席三次懇電邀毛澤東先生赴渝會商國事，此其一。雙方會商結果，公佈會談記錄，中央並切盼繼續解決政治及軍事各問題，此其二。迫中共稱亂華北，妄圖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後，中央爲顧惜民生疾苦，力圖團結統一大業不致中斷，一面令華北國軍一再退讓，一面同意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此其三。……共產黨如能實踐其諾言，不先動手，不爭受降，不爭地盤，則問題就極單純。……

……目前政治協商會議舉行在即，如果北方還在打仗，共產軍隊還沒有停手，那祇有加多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層暗影，與前途的困難。……

政治協商會議，不是政權瓜分會議，而是團結統一會議，應該由此會議而加強建國的「重心」。國家必須民主，必須法治，爲我們共同的要求，爲世界潮流所歸趨。而達到民主與法治則要經過一段艱辛的過程，明年「五五」舉行的國民大會是達成這一過程的必要手段。至如何健全國民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不妨作廣泛的交換意見。此外前次公佈的會談記錄內所未解決的問題，如軍隊國家化，政府機構的主要問題等，想爲討論的主題，我們更願其作誠意的協商。共產黨過去屢次爽約，深令國人疑懼，這一次是立信機會，最好以事實來表現。……

### 第三章 幕內裝扮辛勤

#### 第一節 千呼萬喚始出來

一再延展的協商會議，終於決定於一月十日召開了，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辦法及全體會員名單

核定後，由該會議秘書處通告週知。

(一) 國民政府爲在憲政實施以前，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起見，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二) 本會議名額定爲三十八人。

(三) 本會議協商範圍如左：一、和平建國方案，二、國民大會召集有關事項。

(四) 本會議開會時以國民政府主席爲主席，主席因事不能出席時，由主席指定會員一人爲臨時主席。本會議之集會，由主席召集之。本會爲審議案件草擬計劃及工作報告事項，于必要時得設分組委員會。前項分組委員會，及召集人，由主席臨時指定之。

(五) 本會議商定事項，由本會議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

(六) 本會議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由本會議主席指派。酌置秘書幹事及書記，由秘書長派充之。

政治協商會議會員名單：孫科、吳鐵城、張羣、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杰、邵力子、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曾琦、陳啓天、楊永浚、余家菊、常乃惠、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 第二節 各黨各派各式樣

如果說民主政治是議會政治，議會政治是政黨政治，那麼各黨各派和所謂「無黨無派」的代表，

能否靠他們構成民主政治？似乎不需要等到他們發表政見，已經可在他們的形相上得到解答了。當時新聞記者王遂今的分析，在二十年後的今日看去，仍像一張新攝的像片。他的分析是：

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分爲五方面，第一方面是國民黨（孫科、吳鐵城、張羣、王世杰、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邵力子），第二方面是共產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第三方面是民主同盟（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第四方面是青年黨（曾琦、陳啓天、楊永浚、余家菊、常乃惠），第五方面是無黨無派（莫德惠、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邵從恩、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郭沫若）。

說到各黨各派，現在政府正式承認其合法的還少；實際上除國民黨、共產黨外，各黨也不過僅具鵲形而已。但是被邀參加協商會議的各黨派，事實上實已獲得了政府的承認了。

共產黨呢？從過去陳獨秀路線，而變爲口路線，而李立三路線，而王明路線，而至今日的毛澤東路線，一直是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反動勢力，毛澤東的路線，有他的「新民主主義」的一套。所謂「新民主主義」者，企圖要中國建立一個所謂「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他要組織的是所謂「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這無非學着蘇維埃制度的一套。所謂「戰略」所謂「聯盟」「聯邦」，無非是要令地域性的與階級性的分裂合法化而已。但有一層，也許正是毛澤東的得意處，也許正是毛澤東的悲哀處，即在他的「新民主主義」中，一面大捧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面又大捧其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一面是說明三民主義的深植民心，連他也不能否定，而且還圖利用；一面是說明資產階級的力量甚大，連他也不能輕侮，而且還圖借重。

中國民主同盟現在是第三大黨了，過去幾年間，在政府委曲求全的時候，他們也巧妙地敲動反

政府氣氛，以求其自身地位有一左右逢源的優勢。所以他們的主張，也是所謂「聯合政府」。但這所謂「聯合政府」是否即為共黨的應聲蟲，抑為另有其形式，那就不得而知了。

中國民主同盟，包括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救國會、第三黨、鄉建派、職教社等政團。現在的主席是張瀾，祕書是左舜生，組織是張伯鈞，宣傳是羅隆基，文化是張申府，國內關係是梁漱溟，國際關係是張君勱。

中國青年黨這個黨，除國共二黨外，是一個最有歷史最像樣的黨了。它創立於民國十八年，它是標榜國家主義的，前身就叫國家主義青年團。它的宗旨據說是：「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的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所以它也主張全民政治的。抗戰以後，他又主張從團結統一產生憲政。但主張國民政府召開黨派會議，解決一切重大問題，包括政府改組與國大召開。……這在今日看來，它的主張也算如願以償了。

要是說民主同盟是有左傾色彩的話，那末青年黨可以說是漸趨右傾了。但這種右傾，無非令它的中間性更穩一些。在今日，政治協商會議它佔了五席之多，所以它事實上已脫離了民主同盟而採獨立的作風。雖然它們雙方都沒有承認有脫盟這件事。

它的領導者曾琦，他為要在協商會議造成獨特立場的印象起見，它的兩個主要份子都沒有被派為代表，這兩位是李璜和左舜生。原因即在他倆是民主同盟的主要份子。

國家社會黨，在民主同盟中，它正在爭取領導。事實上除了青年黨之外，它在同盟中確佔了重要的地位。它一再聲明，這黨並非與德國的國社黨有關，涵義上也不相同，它是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但不否定了國家的本位。它的總書記是張君勱，他是很熱心於民主同盟的一人。其他主要份子如張東

蔣是民主政團同盟時代的熱心份子。至如羅隆基、潘光旦等，過去也都是國社黨人。

第三黨，有人嘲笑它是章伯鈞的「一人黨」，此或過份，至少第三黨也有相當的歷史。它自認最輝煌的是福建「人民政府」時代，他們曾「忝與其盛」。它最初的領導人物是鄧演達與陳友仁。正式的名稱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抗戰以後，彭澤民與章伯鈞在主持，他們自稱它也是社會主義的政黨。但實際上他們是太缺乏羣衆的，而理論也並不健全。

救國會，應該不是陌生的了，「七君子案」就是它的歷史的片段。它是產生於廿五年全國正受日本壓迫到快要爆發的時候，他們是當時主戰最烈的份子。他們自傲的說：「救國會不是徒托空言的政治組織，它由成立起就有了行動。」但抗戰以來，沈鈞儒、史良在後方做紅律師，章乃器則成爲數一數二的實業家了。

鄉村建設派，似乎是學究氣更重於政客氣，不能不說他們是一批肯踏實的工作者。他們曾辦過刊物，辦過學校，在山東做過鄉建工作。他們的領袖是梁漱溟，其他如梁仲華、章元善、晏陽初、楊開道，皆其主要份子。

中華職業教育社，是黃炎培主持的一個教育機關，它怎樣合成爲一個政團，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黃炎培此老的熱中政治，却也不可否認。

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也許更較能代表民意的，還是九個無黨無派的代表。東北耆宿的莫德惠、四川父老的邵從恩、出版家兼企業家的王雲五、學者而教授的傅斯年，報人胡霖，左翼作家盟主的郭沫若、金融家的錢新之、西南實業家的繆雲台、華北工業家的李燭塵，都是本身有聲望有權威的人物，他們是可以代表人民一部份的利益的。



當一查協商會議的三十八個代表中間，除去了八個是政府人員之外，三十人竟有廿三人是現任參政員或曾任參政員，這是說明若謂協商會議有民意成份的話，也是因參政會而產生的。

三十八位脚色中，除第一方面的國民黨九個人外，列爲第二方面的七個，本來是共產黨的，把他們燒成灰，還是共產黨，自然無須解剖。列爲第三方面的，所謂「民主同盟」九人，至今只有張君勱一人未入鬼幕。列爲第四方面的青年黨五人，表裏如一，生死不變，無用分析。列爲第五方面的所謂「社會賢達」九人，就更有「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別了。其屬於前者的，是莫德惠、王雲五、傅斯年、錢永銘、胡霖、繆嘉銘六人，其屬於後者的，則有郭沫若、李燭塵二人，邵從恩此老則未便逆斷。糟了，二十一個或二十二個道高一尺的人，要向魔高一丈的十七個或十八個鬼協商，如何能濟？

## 第四章 兩支前奏曲

### 第一節 達成停戰

政協會議是爲團結統一和平建設而召開，所以在正式開會之前，必須先行停戰，一新國內外耳目，造成會議時的和諧情緒，然後會議才能有所成就。

停戰談判初由政府與中共直接商談，至一月五日止獲得如下的協議：

(一) 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一切交通。關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條之規定商定之。

(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等義務有關，故應由政府與中共各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

(三)由參政會駐會委員及政治協商會議各推定國共兩黨當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組織軍事考察團，會同國共雙方代表，分赴全國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同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並公布之。

在馬歇爾特使到來之後，再由張羣、周恩來、馬歇爾組織「三人會議」繼續商談。

以下是各報社報導的會議情形：

(中山日報昨晚特接重慶廣播)，共產黨代表已發出通告，接納中央政府提議之三項和平方案，對停止戰爭一節，應允按步實行。中央政府與共黨代表已於昨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繼續談判。至於雙方停止糾紛之一切細則，則由中央代表王世杰等與共黨代表周恩來等於今日繼續談判。

(文化社特接四日舊金山廣播)重慶息：中國共產黨及中央政府談判人員，正討論共黨對蔣主席除夕所提和平建議之正式答覆內所提出之四個條件，條件如下：一、共黨一般的贊成國民政府之建議，以馬歇爾為三人委員會中之一員，以決定停戰及恢復鐵路交通之程序。二、全國戰鬥立刻停止。三、交通之恢復應包括陸、海、空、郵，及電訊。四、調查團體應由各方面之重要份子組成，包括政治協商會議之會員。政府提議停戰及恢復交通，雙方選出代表，討論停戰之方法，及中立之視察者，視察前線之情勢。當兩方代表於昨日會談之際，共黨之答覆：乃於是時轉交政府代表。出席會議者，共黨方面為周恩來、葉劍英、王若飛、董必武，政府方面為張羣、王世杰、邵力子。

(文化社特接舊金山八日廣播)重慶息：中國報紙預測政府與共黨雙方「停火命令」，將於明日

發出。中國戰時首都刻正等候馬歇爾與國民政府及共黨會談人發出正式公佈。馬帥自於昨日會談後宣稱：「吾人已獲進展」，但迄今未有發出消息。今晨舉行歷時三小時之會談，似尚未達到最後三結果。馬帥於會談後表現高興之狀，但不願做評語。周恩來稱，彼希望會談能在本日下午完成工作。張羣僅稱：「吾人將于本日下午再次會議」。

（文化社特接舊金山八日廣播）重慶息：馬帥、張羣、周恩來之三人會談今日上午十時繼續舉行。至下午一時會談暫停，各會談人同進午餐，復於下午四時卅分繼續會談。今晨會談後，馬帥表示今日將難望有結論。「停火」問題，仍為今日討論之主要項目。

（又訊）今日下午四時半繼續舉行之三人會談中，主要項目有四點：一、停火，二、恢復交通，三、接受日軍投降，四、遣送日軍回國。

（中山日報六日特接舊金山廣播）馬歇爾將軍應允 蔣主席之邀請，出任調停國共事件，馬歇爾將軍昨日曾在陪都分別會見 蔣主席及周恩來。

（中山日報九日專電）重慶訊：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將軍昨日下午會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作兩次會談，每次會談時間約三小時之久，關於兩軍停止衝突事，大致已決定，但其細節現仍在討論中。

（中山日報九日專電）合衆社重慶訊：今天政府與共黨代表會議未能獲得最後協議，決延至明日舉行。在政治協商會議前發出停戰令，似已不可能。此係連續三人會議之第四次。張羣告記者謂，前途不壞，但問題甚多困難，在三人會議事務未結束前，消息不能公佈，討論仍將繼續。

三人會議最後得到協議，由政府與共黨簽定了四個文件：（一）停止衝突命令草稿，（二）停戰事項，（以上兩件係三人共同簽字的）（三）軍事調處執行部，（四）共同聲明，（這兩件是政府與

中共雙方代表簽字的）共同聲明的內容包括：（一）（二）（三）三個文件的要點。

## 第二節 停戰令與執行組

（舊金山廣播稱）重慶政府方面確息：政府停火命令，已於今日十一時三十分自渝發出。據稱：在張羣、周恩來之聲明中曾提及滿洲不包括熱河在內，殆表示在熱河之中央政府軍正立刻停止推進。據稱：命令能够在一月十二日之前抵達野戰軍司令部之主要部隊。又謂：在北平之執行總部將迅可組成。與馬歇爾同赴渝之美使館拜洛德上校，將在二十四小時內赴平協助總部之建立。

（文化社特接十日新德里廣播）重慶息：周恩來及張羣在星期四日八時舉行緊急會議後，正式宣佈：蔣主席、毛澤東已同時發出停火命令。執行總部已在北平設立，以監督執行該命令。該宣佈係於十時二十分發出，打破於昨晚七時卅分結束之三人會議所引起之沈悶局面，因在該會議後政府宣稱，各項解決又遭困難也。由於國共雙方均渴望在政治協商會舉行前能達到解決，故遂促成召開今晨之緊急會議，而達到最後協定。

（重慶十日中央社電）政府代表張羣及中共代表周恩來，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商定辦法，會同聲明，已由雙方分別向所屬部隊頒發下開命令：

中華民國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不論正規部隊、民團非正規部隊，或游擊隊，應即實行下列命令：（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規定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行動，一律停止；惟對於復員、換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軍事行動，乃屬例外。（三）破壞阻礙一切交通

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該項交通線之障礙物應即拆除。(四)爲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二人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雙方並聲明下開規定，亦經同意，并載入會議記錄內：(一)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在揚子江以南整軍計劃之繼續實施，並不影響。(二)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行動，並不影響。(三)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三節內所云之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四)茲同意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項規定下之行動，應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

雙方並聲明軍事調處執行部之一切協定建議及指示，祇涉及停止衝突所引起之直接問題。

美國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僅爲協助中國委員實施停止衝突命令。

軍事調處執行部內設置執行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實地監察詳細辦法之實行。

軍事調處執行委員，得各別設置通訊網，足保迅速而無阻礙之通信。

軍事調處執行部先設在北平。

關於設置軍事調處執行部，公告中已載其要點，現在補充說明幾點如下：

(一)軍事調處執行部是爲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實施和解散敵軍武裝及遣送敵俘的任務順利完成而設置的，任務規定得很明白。

(二)軍事調處執行部設委員三人，美國方面已指定羅賓遜代辦，政府方面指定軍令部鄭廳長介

民，中共方面指定葉參謀長劍英，後天就可以前往北平開始工作。

(三)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辦事程序，三個委員各有一表決權，一切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對下發布必要的命令。對上級報告由所屬的執行組每日繕具，由各委員分送其首長。

(四)軍事調處執行部之工作，由執行組推動之。執行組主任由美國軍官擔任，督察有關部隊，有發布及宣達一切命令指令之權。必要地點，並得設置分站，或派遣監察或報告小組。

(五)軍事調處執行部繼續存在，執行其工作，至政府或中共方面通知廢止之日為止。

(中央社北平十八日電)軍處調處執行部之組織，大致決定三委員之下設執行處，由政府、中共、美國各派參謀長一人合組之，並由政府代表蔡文治任正參謀長，執行處下設四組，亦由政府、中共，及美國各派一人合組之。

(中山日報社重慶十二日加急專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政府代表為軍令部第三廳廳長鄭介民，中共代表為葉劍英，美方代表為駐華大使館代辦羅賓遜，三方各派官兵工作人員百餘人，十一日已分批空運飛平，政府原有進兵熱河、察哈爾之議，即進兵至赤峯多倫之問題，現則暫時不談。

(美國新聞處北平十八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央委員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與美方代表羅賓遜本日發表聯合文告如下：日前，在重慶成立停戰協定結果，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定內規定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織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又一人代表美國，該執行部負責執行停戰協定及有關交通線執行部之命令，以中國政府主席之名義發出之。事前經三委員共同籌劃及籌備，在尚未收到命令偏僻地區執行停戰命令之各種必要行動，已組織流動隊八隊，在負責區內

各要點執行停戰命令，每隊包括國府代表，中共代表及美方代表各一人，由兵士與譯員以及與執行部保持接觸之信號隊相陪，彼等在衝突區與雙方部隊接洽時，即示停戰命令，如果各部隊閱悉停戰命令後，仍繼續作戰，執行流動隊即將事實報告執行部，再由執行部據實報告在重慶談判之當局。執行部之權力僅以報告調查爲限，在進行工作時，便克復不少阻礙，其中最嚴重者，爲缺乏適當之交通，經數年之戰爭後，華北交通情形甚爲惡劣，若干部隊一時恐不易接到命令，當事件發生後，經調查確因交通阻礙而不易接到命令之時，此等事件並不視爲破壞停戰協定之徵象。我人在人員方面極爲缺乏，尤其是在我人組織之最初階段，因此我人無從派遣代表團至每一戰爭地點，對於每一新發生之事件，我人在獲得報告後，即予優先之注意。代表團被派往彼等所能出力之地點截至目前爲止，我人已派代表團三隊前赴山東省之濟南，綏遠省之集寧，及熱河省之赤峯，其他代表團亦在候命出發中。美國飛機在察哈爾、冀、魯各省十五個村鎮散發傳單，此次傳單原載有 蔣主席及中共主席毛澤東頒佈之停戰命令。在必要時，美機將再在其他區域投擲傳單。有一次所發之傳單除刊載停戰命令外，並籲請駐軍准許貨物與食物之自由出入口。我人來此六日，委員三人及其部屬在工作上極爲協調一致。我人在意見上有若干不同點，當無疑問，但我人有理由相信，此種不同觀點，必可在合作精神下迎刃而解，而此種精神早已成爲執行部工作之特徵矣。

（中央社北平十五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頃發表第一號公報云：最近成立之軍事調處執行部，今日迅速行動，以停止熱河省赤峯地區衝突。今晨派遣三人和平小組，攜帶停火命令前往該地。三委員抵平不過一天半，停止衝突命令在重慶發出亦僅六日，執行部已開始行動，實現其停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間衝突之任務。赤峯地區雙方之部隊，恐因通訊破壞，尚未接到停火命令，今晨美國陸戰隊戰

門機會在該地投擲傳單，勸阻雙方停止衝突。並于傳單內，要求赤峯共產黨領導之軍隊，準備好當地機場，以備和平小組之（C—四七）式機降落。小組人員為谷漢穎少校代表國民政府，□□代表共產黨，杜第洛上校代表美軍，該組攜帶三週前在重慶發表之命令，彼等將先飛錦州，取得杜聿明將軍司令部之直接命令，因在熱河之國軍屬杜將軍指揮。彼等並攜有三委員簽署之信函，要求予以保護及幫助。該組于提出彼等之訓令後，將調查該衝突區情況報告執行部本部。

（中央社北平十八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為迅速停止仍在繼續中之衝突，除分在熱、察、綏、魯各省各縣城市村鎮散發傳單外，日昨並特派二執行小組分赴赤峯、集寧兩地，今十八日派赴濟南之執行小組，如期出發。目前執行政府方面工作人員抵平者計八十名，中共方面卅名，美國方面一百二十五名。該部原定工作人員政府方面及中共方面各一百七十名，美方為一百二十名，現美方工作人員均已到齊，政府及中共兩方工作人員亦將陸續來平。據悉：執行部明十九日將派執行小組赴徐州、大同、及張家口。

### 第三節 會員茶話

（中央社訊）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員茶會，七日下午三時假軍委會舉行，此為正式會議前夕各黨派人士之首次集會，出席會員沈鈞儒、王雲五、繆嘉銘、張申府、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張東蓀、傅斯年、李燭塵、孫科、錢永銘、陳立夫、邵力子、陳布雷、張厲生、郭沫若、鄧穎超、董必武、王世杰、吳鐵城、吳玉章、胡霖、陳啓天、曾琦、余家菊、楊永浚、常乃惠、邵從恩、周恩來、葉劍英、王若飛、陸定一、張羣三十四人（莫德惠、張君勱、尙未回渝。黃炎培、張瀾、因病未



到），祕書長雷震，公推孫會員科爲臨時主席，茶會採取自由交換意見方式。

首由雷祕書長報告，略謂：政治協商會議，定十日上午十時在國民政府開幕，會期兩週，祕書處工作，正積極進行中，開會期間，將允許新聞記者列席旁聽，名額以不超過三十八人爲限。

雷氏報告後，沈會員鈞儒提出會場中會員座次問題，當決定依照名單次序排列。陸會員定一稱：會議新聞，應由中央社廣播，蓋因中央社爲全國性的統一通訊社。梁會員漱溟強調會議時應有容忍互諒之精神，會前造成和諧之空氣，更屬必要。梁氏嗣提出民主同盟方面之主張，及關於政府與中共會談紀要中之意見數點。曾會員琦就青年黨之立場發言謂：該黨希望此次會議總要有結果，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曾氏嗣提出祕書處須備有參考文件及法規章程，並建議會議期間應以半日開會，半日在會外協商，每日發表公報。邵會員力子首對梁會員所提會議應有和諧精神一點表示同意，並對其他各點意見加以解釋。梁氏立即表示接受。章會員伯鈞提議，協商會議各黨派代表發表廣播演說。周會員恩來謂：政治協商會議此爲第一次，希望以後有必要時，再繼續舉行。此次會議如兩星期不能完畢，亦應延長，俾從長討論。周氏繼對於議程之意見稱：①停止軍事衝突問題，已由政府及中共代表與馬歇爾將軍組成之三人會議進行商討，並希望在最短期內，發出停戰命令。三人會議結果，並擬提出會議報告，俾永遠消弭內戰辦法。②政府與中共會談，亦擬向會議提出報告。③和平建國方案。④國民大會問題。關於祕書處問題，吾人希望各方面選舉祕書，參加祕書處，協助有政治性之事務，如發表公報等事，吾人推定齊燕銘參加。關於宣傳方面會議，既已允許新聞記者旁聽，各報均可自由報導，並希望中央社爲政治協商會議服務，俾各方意見，均可集中央社發出，才能迅速準確。渠以爲每次開會，時間不宜過長，對協商辦法，亦屬需要。並稱：渠相信政治協商會議，應該有結果。王會員世杰

提出黃會員炎培所提宣傳休戰一點謂：陸會員一定已表贊成，渠亦甚同意，希望各報對團結方面，應多說話少漫罵。繆會員嘉銘對會議表決方式及法定人數問題，謂應有明確規定。傅會員斯年亦就此等問題發表意見。陳會員布雷希望新聞記者慎重發布新聞，造成良好的開始。最後邵會員力子特別希望會議成功，渠對要求參加會議，或要求旁聽之各方人士，未能如願以償表示歉意。邵氏並稱：實因該會議場種種問題之限制，並非不尊重渠等之意見，深盼各方人士諒解。時已至五點，主席提出結論後，宣告散會。

各報記者也有善頌善禱的特寫，抄錄三文為例：

黃宇乾會這樣寫着：

「作爲政治協商會議序幕之會議代表談話會于一日七日在融洽和諧及肅穆之空氣中揭開，有如重慶侵晨的濃霧，旭日當空中豁然開朗了。談話會係於是日下午三時在軍事委員會中舉行，到孫科等三十五人。爲了和平建國，爲了鞏固國家的統一，全國人民均滿懷熱望，注視着這個會議的成就。今天，在這一片謙沖和諧空氣笑聲交流中，各出席代表作第一次交換意見之序幕揭開。

林森路最近修築完成的平坦大路，通過軍事委員會會報室的大廳裏，四角爐火熊熊，透過綠色窗幔射進來的陽光，使人感到分外的和煦，對着前面一排長窗的牆壁上，懸 蔣主席的玉照和手書，在這莊嚴的環境中，舉行這具有歷史意義的集會，人們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溫暖。

一點不錯，這裏有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黨派，大家濟濟一堂，協商國是，這就是民主團結的路。三十五人圍坐一個長桌，臨時推定孫科任主席。周恩來、吳鐵城等都依次坐下。鬚眉皆白的邵從恩先生也扶杖而至，陳布雷執筆爲書，張羣則喜閉目凝思，陳立夫穿着長絲袍，葉劍英穿黃呢新軍

服，佩二星中將領章，十足表示一位將軍的神氣，鄧穎超總沒有脫下延安的藍制服，民主同盟的幾位代表老成持重，青年黨由曾琦率領而來。

談話偏重於會議議程方面，各方代表紛紛起立發言，公認就易於解決者先談，難於解決者後談爲原則。治標之後，再談治本。一致強調彼此容忍，互讓、自責、自勉，祇許成功，不容失敗。均以樂觀的情緒，開懷懇談，表現着霧季的重慶已露出曙光。

會談開始，各方面代表發言紀錄如下：

沈鈞儒：贊成黃炎培的書面意見，即每一代表在會場之發言，應由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場廣播。

沈鈞儒：會場坐次似不應採抽籤辦法，而以同一黨派實行連坐爲佳。

陸定一：贊成黃炎培的書面意見，即每一代表在會場之發言，應由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場廣播。

梁漱溟：希望各代表容忍、互諒之精神從事協商，而在會前及在會議進行中造成和諧空氣尤爲重要。議程希望排列如下：①有關停止內戰事項，②有關人民基本自由事項，③有關復員救濟事項，④共同施政綱領，⑤政權開放，⑥軍隊統一於國家，⑦國民大會，⑧憲章。

曾琦：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希望每天只有半天開會及有公報發表。表決辦法，暫不發表，留待續商。

邵力子：梁漱溟所談的精神，本人深表欽佩，但亦有遺憾者，要造成和諧空氣，各方對政府之責備應該減少，最好少談過去，努力現在。

梁氏隨答稱：願意接受。

章伯鈞：政治協商會議爲國家三十年之盛舉，必須在和諧空氣中進行，但全國地域遼闊，難保沒

有不愉快事實存在，故各代表之廣播及每日公報，亦甚需要。

周恩來：（一）關於會期者，同意梁漱溟先生所談。（二）關於議程者，應根據已商定之排列爲：1. 停止內戰（周氏隨即解釋謂張羣、馬歇爾及其本人之三人會議正在進行中，可能於會前雙方下令停戰，希望會議有更進一步澈底消滅內戰之方針）。2. 向會議報告國共商談之經過。3. 和平建國方案（包括政府改組等）。4. 國民大會及其有關問題，解放區問題，應歸入和平建國方案。（三）關於秘書處者，各方面應推定秘書一人協商政治性事務。（四）關於召開辦法者，同意梁漱溟辦法。（五）中央社應爲會議服務、廣播及通電。（六）每天開會最多四小時。（七）希望力求在和諧空氣中進行商討。

王世杰：宣傳休戰，各方自動檢查。

傅斯年：因會議受道德上之約束甚大，故召開辦法第四條似可不動。

梁漱溟隨答：接受。

三十幾位代表互相傳遞着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話語，互相傳遞着端上來一盤盤熱氣騰騰的點心，整個室內充滿溫暖與和諧。

當孫院長起立致詞時，外面忽來「立正」的號聲，遠遠的傳來軍委會降旗禮奏國歌的樂聲，全場一致自動肅立。在這代表着無限崇高和光輝的聲音，使每一個人的靈魂，如同受到一次隆重的洗禮，今日共商國是的人，將會感到一種偉大的啓示。

最後由主席孫氏作結論：所得意見經整理後，秘書處能負責者將逕付執行，不能負責者提第一次大會討論。並宣佈會議召開日期爲本月十日上午十時在國民政府。

這協商會議的前奏，就在和諧一團熱熱的溫暖空氣中結束。

關於會議之費用將在一千五百萬元之間。代表來往所需汽油一項，估計達八百加侖。年屆七十高齡的代表，有三人之多。外籍記者規定爲十五人，中國記者規定爲二十人，指定總編輯、總主筆、採訪主任一人擔任。聽吧！這就是奠定中國民主的前奏曲！

王遂今也曾描述花絮，用「和諧的插曲」標題。其文是：

「政治協商會議七日下午茶話會，在軍委會會報室舉行。會員圍長桌而坐，新聞記者則散落地坐在靠牆的窗下沙發上，周恩來的坐位與吳鐵城相對，兩人常常相視而笑。

邵力子說明記者列席旁聽名額決定不超過會員數目（三八人），此因在事實上技術上均有苦衷，不得不予以限制。

關於協商會議的座次問題，黃炎培主張採圓桌方式，雷震恐報告有困難，決定凹形排列。

沈鈞儒主張各黨的席次應該連在一起，以便集中會商。傅斯年附議說：無黨無派本應敬陪末座。中共宣傳部長引用舊金山會議非代表羅姆洛的話說：「讓我們用這會場作爲最後的戰場」。

梁漱溟講話最多，提出了解放政治犯的問題。但邵力子說：「過去不愉快的事不要去說它，會談記要因內亂之擴大而沒有實行。現在重新作和諧的開始之際，希望沒有令這空氣破壞的遺憾。梁漱溟立即表示接受。

邵力子又說，邀請各黨派參加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即是事實上承認了各黨派的合法地位。

周恩來說：關於解放區問題，中共決定撤回，而列入和平建國方案中討論。按：這個問題，就是在雙十會談紀要上中共提了四次要求承認並加委解放區政權，而未獲解決的問題。

王世杰主張「宣傳休戰」，陸定一贊成。

陳布雷、邵力子以老新聞記者資格，再希望記者慎重發表。

梁漱溟主張在「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的規定中，要在主席之下加負責二字。傅斯年却說不必，因會議並非依法產生的機構，但雖無法的拘束，卻有絕大的道義力量，決議不患政府不實施，如其不實施，對政府也是有大不利的。

沈鈞儒赴會議，被衛兵攔駕，因他步行沒坐汽車，疑他不是代表。沈老離會，祇好搭了記者的汽車回去。

曾琦發言：願代表們抱定會議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

茶會近尾聲時，遠處傳來降旗歌聲，衆皆默然超立。「……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的歌聲，聲聲打動代表們的心。

## 第五章 會議隆重開幕

### 第一節 開幕盛況

在三人會議獲得協議之後，這個國人期望的化戾氣爲祥和的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隆重揭幕了，會期定兩週，當時各報的報導如下：

（中山日報特派員十日專電）政治協商會議今晨十時在國府大禮堂隆重開幕，出席會員三十八人（有二人缺席），記者亦三十八人。該會議規定過半數會員出席，即符法定人數。議案有過半數出席

會員贊成者無反對意見者，即可通過。但如有五人以上提出反對，得經協商後作第二次表決。如仍有五人不同意，則再予協商。第三次如經到會會員五分之四同意，即爲通過。此即爲一致決斷方式。

（中央社重慶十日電）國民政府于領導全國軍民抗戰獲致勝利後，爲求和平建國、實施憲政而召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之政治協商會議，于全國人民期望中，十日上午十時在國民政府禮堂開幕，蔣主席親臨主持。

出席會員：陳啓天、常乃惠、余家菊、王雲五、邵力子、郭沫若、繆嘉銘、傅斯年、曾琦、楊永浚、吳鐵城、王世杰、孫科、張厲生、錢永銘、陳立夫、李燭塵、王若飛、鄧穎超、吳玉章、葉劍英、董必武、陳布雷、胡霖、陳定一、張瀾、沈鈞儒、邵從恩、張東蓀、張申府、章伯鈞、羅隆基、梁漱溟、黃炎培、周恩來、張羣等三十六人，莫德惠、張君勱二會員，因尚未返渝缺席。

會場佈置簡單整潔，主席台前會員席共五排，座次係按政府公布名單排列。新聞記者席四排居後。主席蒞場時，全體會員肅立，主席微笑點首示答。雷祕書長震報告到會人數後，主席宣告開會，恭讀國父遺囑，首宣布停止軍事衝突辦法，已經商妥，停止衝突命令即可發佈，會場一致鼓掌歡迎。繼宣讀開會詞，指陳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目的，及對會議之意見，在集思廣意，共商和平建國三基本方案，與促進憲政之實施，盼各會員真誠坦白，大公無私，高瞻遠矚，一切以國家爲前提，並祝該會議成功。最後宣布政府決定實施事項。繼由中共代表周恩來、青年黨代表曾會員琦、民主同盟代表沈會員鈞儒、無黨派代表邵會員從恩致詞。雷祕書長震報告明日下午三時繼續開會。十一時半主席宣告散會。

## 第二節 蔣主席貢獻三點意見 準備實行四事

開會後，首由會議主席 蔣先生宣佈停止軍事衝突辦法已經商妥，停止衝突命令即可發佈。在座各會員及來賓與記者，無不熱烈鼓掌。

繼宣讀開會詞全文如次：

各位先生：

今天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本席代表國民政府向各位致誠摯之歡迎，同時也願乘此時機陳述我個人對會議的期望。至於政治的方針，我在元旦廣播詞中，已經詳盡說明，不再重述。

今天到會的各會員，有半數以上都會參加過歷屆的國民參政會，因此我在今天很自然的聯想到國民參政會的成就。參政會到今天已是第四屆，而民選的成分逐漸增加，現在由選舉產生的參政會，已佔總額三分之一。歷屆參政會對國家的貢獻不一而足，而最重要的就是共同一致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儘管參政員中間在政治上的立場和見解各有不同，而對於國家民族安危存亡所繫的根本大計，其主張則是全體一致，始終一貫的。我們所以能持久抗戰，獲得勝利，這是一種主要的力量。現在我們抗戰已告勝利，我們中國對這次世界大戰中的任務，正如其他聯合國一樣：「要贏得勝利，並且要贏得和平」。所謂贏得和平，就一般的說，是要確實保持勝利的成果，建立世界和平的秩序，永絕侵略戰亂的根源。而在我們中國來說，尤其要緊接着抗戰的勝利，以舉國一致的努力，排除萬難，以謀國內秩序的安定，和建國工作的進行。

本會議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來共商國是。我們所要商討的是國家由戰時渡



到平時，由抗戰進到建國基本方案。也就是怎樣集中一切力量，增強一切力量，以開始建國工作的問題。我們八年苦戰，死者爲國犧牲，生者備嘗痛苦，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保障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國的障礙，以求得這一個復興建設的良機。現在抗戰既已勝利結束，建國工作就應立即開始，我們中國必須實行三民主義，已爲全國所公認，中國必須成爲統一民主而強盛的國家，更是世界所切望。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努力促成國民大會的如期召集，民主憲政的及早實施。同時我們要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集思廣益，羣策羣力，來消除一切足以妨礙意志統一，影響安寧秩序，和延續復興建國的因素，以充實我們建國的力量，加速我們建國的進行。政府召集本會議的旨趣就在於此，本會議的使命與任務，也就在於此。

我們過去因爲進行着生死存亡的抗戰，一切的措置與法令都着重於適應軍事的要求。抗戰結束以後，我們的工作應該是「善後爲先，建設第一」。許多戰時法令，已經在繼續廢止或修改，今後政治上和社會上一的設施，都要盡量納之於正常的軌轍，加強法治的精神，以立憲政的基礎。參加本會議的各位先生，對於此一點是具有同感的。如有意見，深望盡量陳述，政府無不可以考慮採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國家社會現實的狀況，總要使過渡期間不發生困難或紛亂，使國家根本不至於動搖，以期順利推行憲政，而使建國工作得以圓滿進行。

本會議雖然不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但各位先生熱心國事，關切民生，一定能體察人民真正的願望，認識人民迫切的要求。國父有言，「國家之基本在於人民」，所以人民的要求與國家的需要，必然是符合的。依本席的觀察，今天我們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求安定，求復興，求國家的統一進步與繁榮，以增進他們的生活。最低限度，也要求他們的生活有保障，使他們得以安居樂業，使他們的

自由不受侵害。對於這一點，政府當然要負責盡職，以滿足人民的願望，解除人民的痛苦，保障人民的自由。同時本會議所要充分商討的，也就要以這些最迫切的要求為基礎，來確定我們當前的國是。我們中國必須實現民主，這是我們國民革命一貫的宗旨，也是這次艱苦抗戰的目的。但在國民大會沒有召集，憲政沒有實施以前，人民真正的意志，還沒有充份表達的途徑，我們大家的責任却是十分的沉重。政府這次召集本會議，祇有責任和義務的觀念，決沒有自私和得失之見。政府對於本會議的決定，只要有利於國家的建設，有裨於人民的幸福，有助於民主的推進，無不傾誠接納。同時我個人在會議開始的今天，要對各位貢獻下面幾點的意見：

第一、要真誠坦白，樹立民主的楷模。我們這一次會議，當然不是為各黨派解決自身問題的會議，而是為共同奠定建國基礎的會議。我們各人對於國事的見解和政治上主張，必不能絕對相同，或許是距離甚大，但是我希望各位在鞏固國本的共同認識之下，都能充分坦白的提出主張，不必有所隱諱或保留。我們正可以藉此熱烈討論的機會，從各種不同的見解中，發表共同的途徑，從相互的諒解中，增進我們合作的精神。惟有坦白，纔見得真誠，也惟有犧牲成見，擇善而從，纔能成立合理而有益的決議。應主張的就積極主張，該讓步的就不惜讓步。我們要以這一次為民主精神的試驗，也要以這一次為養成民主風度的嚆矢。我們希望本會議能始終保持諒解與和諧，不希望發生任何停頓和波折。

第二、要大公無私，顧全國家的利益。我們的諒解與讓步有一個共同的指歸，這就是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先，而黨派或個人的得失為後。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之前，所有黨派或個人部份的成見，應無不可以犧牲，無不可以讓步。為了成立有效的決議，有時候撤銷我們的提案，比之堅持我們的主張，更有偉大的價值。這樣纔見得我們謀國的公忠，纔能使這次會議有確實的成就。

第三、要高瞻遠矚，正視國家的前途。我們在舉行會議的中間有三件事，大家牢記在心：一是抗戰期中軍民犧牲的壯烈；二是我們同胞流離痛苦，渴望解救的迫切；三是我們國家過去蒙受憂患的深重，和民族前途安危禍福的不可預知。所以我們這一次會議是要集中力量，而決不可以分散力量，是要造成團結，而決不可以破壞團結，是要扶助政府增強政府，而決不是要削弱政府，是要開闢建國的前途，促使我們國家的進步，而決不可以使國家停滯在百事落後的地位，甚至於造成國家的退步。只要我們能認識這幾個要點，而後我們國家乃可以邁進於民主建設的大道，為世界友邦所尊重。

各位先生：本席對於這一次會議，是具有充分的信心。我深感我們過去國民參政會的精誠合作，已經贏得抗戰的勝利，我因此同樣深信這一次會議的成就，必能推進建國的工作，保持勝利的成果，以贏得和平。世界輿論所屬望，人民殷切的祈求，都集中於我們這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敬以十分的誠意，瞻祝本會議的成功。

接着，蔣主席又宣佈政府準備實施各事項如次：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及修正。

政黨之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政治犯：政治犯除犯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爲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 第三節 各方面代表致詞

蔣主席致詞後，各方面推舉代表一人致詞，茲摘述其大要如次：

中國共產黨會員代表周恩來稱：

「這個會議是中國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來所期待的，經過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戰勝利後的會談中加以確定了……照預先商定的會議內容，雖僅有兩大項，但在此過渡期中，『和平建國方案』及『國大憲法問題』却關係中國民族和國家今後的命運很大。……抗戰勝利後，緊接着不幸的國內戰爭，使中國人民和世界盟邦的政府人民都關心此事，並要求迅速結束內爭。中共當事人的一方面，此次由代表團前來陪都，首先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經二十多天的呼籲奔走，經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經我們盟邦馬歇爾將軍的贊助，最後賴蔣主席的遠見和決心，使全世界對中國所關心的內戰，在今天雙方下令停止了。……國共雙方的雙十會談紀錄中，已經承認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基礎上，並在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雙方同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作，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我們提議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之上，實現各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

民主同盟代表沈鈞儒稱：

「……先有和平，而後能實現民主。……我們認為當前復員和救濟這些問題，比較制憲行憲問題還迫切。……至於實行開放政權，訂定共同綱領，召開國民大會以及制定憲法，實行憲政等等問題，當然是國家走上民主正軌的許多立待解決的問題。……民主同盟對這些問題有一貫的主張，却没有任

何的成見。……」

青年黨會員代表曾琦稱：

「……回憶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政府始則有廬山會議的召集，繼則有國防會議的召開，隨後更有國民參政會的召集。……我們抗日統一陣線堅固如泰山，不可動搖。……希望由此會議渡到憲政階段，構成建國的統一陣線，期以三年，完成名實相符的現代國家。……」

無黨派會員代表邵從恩稱：

「……但是成功兩個字……是指國家成功，民族成功，不是一黨一派，或是個人的成功。……我們看到雙十會談紀要，第一條明明寫着「竭力避免內戰」，可是墨藩未乾，就打起來了。……明年七月因為政府召開國民大會，中共又另有辦法；我們以為召開國民大會是政府還政於民，却不能因還政於民，反使人民受苦難。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請政府緩開國民大會，由國共兩方面互相商討，才有先召開此次政治協商會議的辦法。……我不敢說國民黨是保守，但國民黨執政多少年，從艱難辛苦到了今日，這點經驗就會有保守心理。國民黨方面的保守，就是要鞏固國基，沒有保守，國家基礎便要動搖，不可收拾。我不敢說中國共產黨是進步，但是一切作風總是向着進步方面走。假如說，國民黨可代表中國的保守黨，共產黨可代表中國的進步黨；但人民有保守，有進步，等於一推一拉，國家便有進步。我們則不能相成，反而相消。……此外還有兩黨，一是中國青年黨，以國家主義為精神，實行民主，這可謂保守性兼有進步性者。一是中國民主同盟，我看了他們的黨綱，是以民主為主，而不忘各階級利益，是進步性而有保守性者。……」

#### 第四節 重慶的霧散了

梁元蓀一月十三日的一篇報導，堪代表人民乃至外國朋友一種轉變為喜的心聲。其文如下：

「百萬以上的重慶市民，在緊張和恐怖的情緒下，好不容易渡過了八年。去年八月十日敵人宣佈投降的消息傳來，正狂歡慶祝這種艱苦日子的解放。可是九月以後，便是重慶霧季的開始，狂歡過後，沈重的氣息仍壓到每個人的心頭，霧雨交襲的日子，與過去並沒兩樣。更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冬天竟打起雷來，這是別的地方與往年所沒有的，似象徵着一個不吉祥的預告。」

抗戰勝利了，和平建國的前途又將怎樣？人們的腦筋又浮現一個陰影，政府與中共代表談了四十多天，消息竟一天一天消沈下去。陰雨頻作的天氣，霧顯得更濃重，陰霾四伏。一紙會談記要發表過後，不久隨之各地共軍襲擊政府接收部隊的消息來了，又在報紙上佔據着過去戰爭新聞的篇幅，五花撩亂的標題，使讀者看了不知所以，內亂真稱得够亂了！

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重申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希望中國應謀取政治統一，停止內亂，軍隊國家化，實行憲政；同時對馬歇爾駐華特使啓程來華，協助中國謀取和平統一。十六日延安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及隨員等一行三十餘人，翩然蒞陪都，準備出席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這無異重霧中的重慶露出了一線曙光，使陪都以至全國全世界的人民都感到興奮和欣慰。

自此又蹉跎了半個多月，還是一晴一陰的持續下去！好的消息傳過後，壞的消息又跟着來。誰敢擔保前次毛澤東來渝商談的情景不會重演一次。聖誕節至元旦後的期間，雖逢佳節，但是毛雨綿綿，

雲霧滿佈，大家都在沉悶中期待着新年應有的好消息。至一月九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雲霧顯得更濃厚，富有歷史意味的山城已在朦朧中，陰沈威脅着每個人的神經，說不出一句開朗的話，敏感的人正懷疑這是暴風雨的前夕，於是謠言與無稽之揣測正在黑暗中爬行着，金融市場也在候機醞釀風浪，以遂其投機的機會。

這個黑暗，乃是黎明的黑暗，等到一個將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十日的黎明到來的時候，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致開幕詞中首先宣佈稱「本人很愉快的向諸位宣佈，停止衝突的辦法已經商妥，停止衝突的命令即可發佈。」於是掌聲雷動，一片歡呼，立刻傳遍全市全國各界，這真是一個不平凡的黎明，照亮了每個人的心窩，全市市民的情緒即爲之浮動不已，大街小巷均在爭看各報的號外，慶祝和平建國的光明前途！

政治協商會議隆重揭幕後，在蔣主席偉大的感召下負有劃時代使命的會議，便在一種空前和諧的空氣中，開始討論各個議程，這不獨得人和之利，而亦是天時所賜。十一日起，重慶是例外的晴朗，濃霧全散了，太陽顯得更溫暖可愛。報紙再沒有火拚的消息出現了，各家的報紙都在讚揚這一個偉大的宣佈與慶祝國家和平的開始。中央日報的社論題目是：「和平勝利的曙光」。開頭即指出：「去年九月三日是我們贏得戰爭勝利的一日。昨日是我們達到和平勝利的一日。」「……和平勝利的曙光，乃更加凝集保持發揚充實，使大地草木隨陽春的回轉而茁壯。全國同胞將感八年抗戰的痛苦犧牲並非徒勞，而我們中國國民黨同志尤欣慰五十年革命的辛勤奮鬥，終有成功的把握。」「……政治協商會議將成爲中國歷史上重大的一會，停止衝突令亦將成爲中國歷史上光榮的一筆。」

大公報頭條新聞則用四個七行頭號合起來一樣大的字的標題：「停戰令下」與「舉國同慶和平實

現」。其社論稱：「政治協商會議開宗明義的第一章，便是停戰令的宣佈，這是一個極大的開始，是政治協商會議將獲得完全成功的一個預告。」又在末段提出：「中共代表周恩來氏昨在政治協商會議席上說：『我們今天在先烈的昭示下，在中山先生的遺像之前，應痛下決心：不僅在今天下令停戰，而且要永遠使中國不再發生內戰。』這話對極了，這正是國家民族的需要。」

新華日報社論也用和中央日報差不多一樣的題目：「新中國的曙光」，也說「這是德國投降與日本投降之後的最好消息。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和平民主的先聲，給我們展示了新中國的曙光。我們必須一德一心與羣策羣力，把停戰的命令，使之變成和平的實現；必須使政府當局已宣佈的保障人權與釋放政治犯等，完全無保留地迅速付諸實施。」

除 蔣主席英明的昭示外，尚有兩個文獻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個是孫科院長於十日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闡述政府對於國府改組、修改憲草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問題的意見：甲、國府改組：「政府就現行法統之下，擴大政府的基礎，使大家得以共同參加憲政開始前過渡期間政府機構，共負政治責任。政府擬從修改政府組織法着手，擴充國民政府委員會以爲政治最高決策指導機關，其具體辦法如下：一、擴充國民政府委員名額；二、國府委員得國府主席提請選任黨外人士充任之，擴大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其職權與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相同。政府擴大改組後，政府主張行政院設置政務委員若干人，得兼各部會長官。」乙、修改憲草問題：「關於五五憲章，政府主張推定專家組織委員會，參酌各方所提意見，提交國民大會採納，關於五五憲章，原則方面當可由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丙、國民大會問題：「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爲制憲的國民大會，政府主張制憲國民大會不宜再行展期，但其職權祇限於制憲工作，不兼負行憲的責任。至於



國民大會代表除已選出者外，其餘名額將予合理增加，使各黨派及社會人士有充分參加機會。此第一屆國民大會任務完成後，第二屆大會將於六個月內依照憲法辦理全國總選舉，組織成立。」這表示政府政策的開明與對解決國是的誠意。

第二個文獻是十二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關於政府與共產黨會談經過的報告詞中，其重申中共的信念：（一）認為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今日中國之必須承認擁護並努力求其實現；（二）始終承認 蔣主席在全國的領導地位；（三）承認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並尊重其歷史與地位；（四）無意推翻國民政府。再在周氏於十日會議的致詞中，把過去所提議的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已改為：「要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之上，實現各黨派與無黨派代表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這是很明顯的修正，前者是主張各黨派以平等地位，來組織聯合政府；後者乃是在各黨派人士合作之下，實現舉國一致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有中心的，即是以第一大黨的國民黨為中心，而與其他黨派合作所擴大組織的政府。綜合來看，會前 蔣主席宣佈了停止衝突，並實施保證人民自由，承認政黨合法地位，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等明快決定。會中各黨派代表的致詞和提議要求均頗能以國家民族前途為重，開明坦白互相讓步，而在極良好的空氣下，使此劃時代的和平建國的政治協商會議，獲得了一個良好的開始，俗語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們預卜着會議的成功，建立和平統一的新中國。（一月十三日於重慶）

## 第五節 眾會員形相畢露

另有一家日報記者的「會中人素描」已很逼真，一看舊日新聞，恍如各現眼前。雖然當時玷污了

莊嚴廟堂，其後更使它淪爲銅駝荆棘，可是此文仍有其現時代的價值。其文如下：

『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府大禮堂舉行。這個禮堂，也正是國家大典舉行的所在，它巍然地在一個高崗上。華麗的走廊，寬闊的甬道，和開朗的廣場，加上這新宮殿式的建築，令鵠立在頭門之外的羣衆望而起肅然之感，但能看得到的祇是國府衛隊的漂亮制服和排在廣場中的許多汽車，誰看到裏面是怎麼回事？』

會場是富麗堂皇的，地毯如茵，窗幔長垂，銀色的火爐，分置四角，三五盆鮮花，點綴四處，乳白的燈，永遠亮著，這一切，令人有溫暖之感。

開幕日的座次，一行行都向主席台排列，但有人不贊成這樣，所以第二日起改排U形了，主席和祕書居中一排，代表們則分在兩邊，相對而坐，像舉行着一個大宴會。

新聞記者三十八人，在下面排成四行，仍朝向主席而坐。

右邊上首的代表，是國民黨的八位，中間的是中共的七位，下首是青年黨的五位，左邊上首的代表是民主同盟的九位，下首是無黨無派的九位。

國民黨代表態度最沉着，中共代表除周恩來外，發言的也不多，青年黨代表樣子很老實，個個都是方頭大耳，皆振筆疾書在紀錄每個發言者的話。民主同盟代表肥瘦老少不一，面目也不驚人，話却最多，但坐在那兒似甚閒散。無黨無派代表白頭的最多，耳朵重聽的也有兩人（郭沫若與傅斯年）。但他們的態度均雍容儒雅，發言也常風趣橫生。

國民黨代表中，陳立夫不說一句話，但兩次五人會外協商，他却都參加了，這是說明他的重要性總是在機要一方面的。陳布雷也沒講話，不斷地吸着烟，又常離座找痰盂。吳鐵城坐在最上首，常回

過頭來望望大家。張屬生剃的平頭，穿的舊學生裝，一口河北重音。王雪艇到底是一個忙人，第三次會因事後到，但他這次不去倫敦參加聯合國大會而參加這會，說明他多麼重視着它。張羣予人的印象是開朗明快，有政治家之風度，無怪有傳他最近將任行政院長之謠了。張羣的對面是邵力子，他一頭白髮，滿面笑容，改不掉的紹興官話，舌戰羣儒，從來沒有受窘的時候。邵力子的下首即周恩來，這三人常常細語談笑，狀甚親暱。周說話的聲音最響，浙江口音已不甚多，說話時總抬着頭，眼睛朝着天花板，想一句說一句的樣子，慢得可以叫記者一字一句記下來。第三次會時，邵力子請他先報告（報告會談經過），這出于他意外，因為他照例預備要說的話是在政府報告之後的，又苦不知政府將作怎樣的報告，他笑了一聲，非常不自然。董必武王若飛講了幾句話，聲音頗緩滯。陸定一雖是中共的宣傳部長，講話時可不知所云。葉劍英是一個典型的廣東軍人，倒是蠻有禮貌的，當邵從恩贈別時，他起立深深一個鞠躬，起碼有七八十度。鄧穎超是一位胖太太，穿着黑呢制服常和女記者們招呼，他說過一次話，也和其他婦女一樣的作風，要在考察團中有一名婦女代表。青年黨的領袖曾琦，白胖而矮、禿頂、長袍馬褂，講話也多出言醇厚鎮靜，他會不慌不忙的戰倒了梁漱溟。青年黨另有余家菊講話。民主同盟以梁漱溟說得最多，也許是全場說得最多的一人，有些爭論上他比中共代表還要有興趣，但爭的面紅耳赤的時候，也會忽然自動放棄自己的爭點，如他和曾琦舌戰之後，突願撤回議程中列入「討論會談紀要有關爭論」之議，贏得些稀疏的掌聲與笑聲，他因而拂袖出場小便去了！他是又瘦又黑，袍袖又大的人。羅隆基老是張着嘴吧，瞞着眼皮，他有次發言反對對停止衝突報告作一決議，說「聽了就算了！」却給邵力子斥為要不得的「算了精神。」矮小的沈鈞儒，講了一大篇，却叫人抓不住要點之苦。

無黨無派的代表中，有七五老人的邵從恩，他鬚髮皓然而神姿飄爽，講話像做古文，但音調充滿了感情，句句悲天憫人，字字發自心坎，他的年輕女兒隨着他照顧扶持着，她是特別來賓席上唯一女賓，但他有時離座蹣跚，吸着土製雪茄，悠然神往于窗前的盆花。

兩個兒子坐在一塊兒，郭沫若沒講一句話，傅斯年却常常妙語驚四座，討論議程時，他要各拿出各的方案來，「那有先有媳婦後有兒子之事！」他有次說，「你們發揮你們的高論，我也可發揮我的低論了。」

王雲五雖然也已白鬚白髮，但精力似甚充沛，他對調和異見，似乎用着力量，他總是代表無黨無派者出席五人小組的。」

## 第六節 漁陽鼙鼓動地來

自停戰令發出後，各地國軍均遵令後撤，極力避免衝突，不幸共產黨部隊在停戰令到達之後，依然攻擊國軍，不肯停止，各報記者報導協商會議隆重閉幕的墨跡未乾，不到三天，就寫出共軍在某些地區叛亂的事實，安祿山叛亂時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而這類消息，顯然是驚破議場協商事了。且忍住痛淚，抄錄幾樁實例。至於這樁實例，是否會出現於今後的越南的和會之上？自有中外記者據實報導。

『（歸綏十三日中央社電） 蔣主席停止一切軍事衝突恢復一切交通命令業已到第十二戰區司令部，傳作義奉命後，立即分電各部隊確實遵行，並將原令印發十萬張，散發綏境所有一切部隊。惟在

寧境及綏境東各游擊部隊及民衆自衛組織，多散駐各地，且與國軍駐地參混處最易發生誤會，除命寧境部隊一律於十三日撤至綏東地區外，並命在綏東之各部隊一律於十三日下午十二時後均在原地停止戰鬥行動，不得發一槍一彈，在兩地直接與共軍聯絡。惟爲預防共軍之藉口而引起誤會起見，傳司令長官特電懇請轉達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早日派員飛綏實地考察，以免糾紛。

（中央社北平十七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停止衝突命令經已發出，而綏熱魯各地，尙不時有衝突發生，經該部鄭、葉、羅三委員協商決定於今晨特遣執行小組，搭機赴赤峯、集寧、濟南，調查各該地區衝突情形，惟派濟南之執行小組，今日因故未能出發。據悉，調處執行部政府方面工作人員，日昨曾有廿餘人飛抵平，今日下午復有三十人抵達。

（中央社濟南十八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濟南執行小組雷克上校，軍令部上校參謀鹿叔五，中共代表馬金橋，偕同隨員十二人，於十八日下午一時半由平飛抵濟，下機後即赴辦公地點，即日開始工作。」

可是不幸的很，據政協會議代表王雲五在其所著「袖廬論國是」中指出：中共方面在達成停火協議並簽定整編及統編方案之後，旋即表現他們之參加停戰，無異是一時的耍把戲，在戰場上的共軍，不顧一切，移向若干點，而攫取更適於戰略的陣地。在河北省，他們占據了玉田與豐潤，在河南省占據了孟縣與考城。在山西省占據了候馬、浮山、苛嵐等地，在綏遠省占據了集寧，在蘇北則破壞了隴海路若干段，在山東奪取了棲霞等地。民國三十五年之初，中共控制之地區已由三十四年秋間日本投降時所占據的八十一縣，擴張至三百縣。

共軍在停戰期內的策略，集中於迅速奪取東北，首先占據外蒙邊界之赤峯陶林兩縣，政府爲着和

諧起見，不得已遷就。此兩地之重要性，因其橫亘於共產黨在察哈爾熱河兩省之據點與東北共軍之交通線間，如爲國軍所掌握，將可堵塞共黨之人力物資對於關外林彪所部之供應。因此，共產黨在停戰的時期內，不斷輸送其武力於東北，自山西省移入者四萬六千人，自山東移入者四萬人，自河北省移入者一萬人，另有八萬人從山東海運，利用俄人占據之港口而入東北。馬歇爾將軍誤信共黨能遵守協定，遂於是年三月返國，及其甫抵華盛頓，共黨蔑視協定，並有俄人勾結之消息，已傳至美國，蓋其時共黨估計俄國占領軍事業經準備撤退，於是林彪所部先後開入長春哈爾濱與齊齊哈爾，同時紅軍又奪取四平街控制上開各地遼南的咽喉，以阻塞政府軍之由陸地輸入東北。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因一切準備已周，便不惜撕開假面具，宣布東北『全面敵對行動』了。

## 第六章 各次會議實況

### 第一節 先有媳婦 後有兒子

在分敘各次會議實況前，略敘全貌，以清眉目。協商會議原定於一月二十二日閉幕，經一再延展，直至一月三十一日始告結束。其間共開大會九次，政府組織組八次，施政綱領組七次，軍事組四次，憲草組四次，國大組六次。至歷次大會日期及會議事項則如下述：

第一次 一月十日 揭幕。主席宣布重要事項。各方面致詞。

第二次 一月十日 報告國共會談經過。授權祕書長排定會議議程，議決推選八人組織軍事考察團。

第三次 一月十二日 周恩來、邵力子分別報告會談經過。通過何基鴻、林可璣、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林斌丞、伍觀淇八人爲軍事考察團代表；冷遹、林虎、張奚若、任鴻雋爲候補。

第四次 一月十四日 商定議程，分政治、軍事、國大、憲草四類，開始討論。擴大國府組織問題，政府提出具體意見，各會員廣泛交換意見。

第五次 一月十五日 討論施政綱領問題。

第六次 一月十六日 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成立軍事三人小組。

第七次 一月十七日 討論國民大會問題。

第八次 一月十八日 繼續討論國民大會問題。

第九次 一月十九日 討論憲草問題。

政治協商會議二次大會，下午三時舉行，六時纔散會。……會議一開始，就是張羣與周恩來的報告，他倆的結論一致的論到了整編中共部隊將是今後的問題核心。張羣說明了中共部隊的整編實施以後，纔是真正的停止軍事衝突。周恩來則提出了諾言，這次協商會議對於整編軍隊的計劃如有決定，中共部隊一定接受聽命整編，一定實踐宿諾編爲二十個師。報告以後，大會展開了議程問題的舌戰，梁漱溟前在茶會提出的八個項目，自停止衝突令下與 蔣主席宣示四點以後，問題事實上已解決了一半，所以梁漱溟雖經過了一場激昂的辯論，終於自願放棄了已不必要的會談紀要有關事項等項目，他贏得了一些稀疏的掌聲！

中共代表董必武，仍認對會談紀要作一報告是必要的，但爲了不破壞這和諧的開始，爲了避免不愉快的回憶、曾琦主張祇作報告不加討論，最好提出書面報告。關於這一點，周恩來說明報告是在會

談中會有的約束。

討論議程還沒有個結果，大家似乎已感到時間的浪費了，傅斯年妙語解頤說：「恐怕旁邊的記者們已不耐煩了！」他叫大家各拿出的各方案來，藏起來憑空討論議程是枉然的，那有先有媳婦，後有兒子的事？他還強調會外協商應重於會內討論。曾琦也大叫時間經濟。王雲五、黃炎培雖提出了折衷的議事項目，但終於決定了「當日商定次日議題」的辦法。

最後，決定了明天的議事項目是：一、會談紀要報告；二、軍事考察團由各方面提出名單，交無黨無派審核決定，三、提案審查的分組問題。

（將近）尾聲時，邵力子建議對今日的周張停止軍事衝突經過報告，應有一個決議案，羅隆基卻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這是多餘的，聽了就算了！邵力子立即駁斥了這種要不得的「算了精神」。

會中講話最多的，是梁漱溟與曾琦，其次是周恩來、邵力子、王雲五、張厲生等。就黨派來看，則以民主同盟發言最多，無黨無派似乎成為會中的調和力量，他們的白髮與長袍馬褂令人起敬愛之感，這許是會中決定以他們來審核軍事考察團名單的原因吧！『前列電訊，都是中央社記者初次的報導。

## 第二節 各報舊賬

王遜今接着描寫當時的情形是：

「政協會議第三次會，聽取政府中共會議經過報告，會場空氣始終保持和諧，大家都在作一個冷靜的回憶。固然這回憶是不愉快的，甚至是惡劣的；但在「化戾氣為祥和」的今日，回憶帶來了反省與警惕。



周恩來被請首先報告，他客氣地一笑開始簡略說明九年來的商談經過，他特別提出他懷念二十六年間的商談對手張沖（淮南），他接着把商談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互相承認必互相尊重，他說中共承認且尊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承認且尊重蔣主席的領導，承認且尊重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承認且尊重國民政府的統治。他否認中共有推翻政府的任何企圖，他說「解放區」的政權是地方性的而且是分散的，並沒樹立另一領導中心。他報告了中共去年曾欲籌備一個所謂「解放區國民代表大會」，——這倒證實了盛傳已久的延安也在籌備類似國民大會的會議之說了。——但他僅是一個「人民團體的聯合會」而已。

關於「解放區」的問題，大家認為是地方割據。他說，不是的，是「地方自治」。但他承認那「地方」的「民選」，程度不够，不過還希望「重新選舉」。既不是「割據」，軍隊駐在那兒何用呢？他說那是應與「地方自治」分開的。

周恩來最後說，中共並沒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但他沒有說明聯合政府的形式。他強調「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並進，應沒有先後。

邵力子接着報告，他說會談的進行，張治中的努力最多，他並以一件件事實來證明，雙方都是有誠意的，並沒有故作拖延，也沒有祕密的事項，且都作了讓步。特別地他指出一點：政府在商談中並沒先作定見或先提方案，僅就中共所提的十二項作最大的讓步。

但最堪遺憾的一件事今日公開了，邵力子宣佈在「會議紀要」中原有第十二項關於避免軍事衝突事項的規定，中共提的辦法是停止軍事衝突，雙方部隊留駐地待命。而政府則對停止軍事衝突同意，但國軍為受降進行時，中共軍應不加阻止。這個意見為中共拒絕了，結果這十二項也索性沒有了！何

期果然，軍事衝突在這次會談紀要公布後，不久就擴大了。

至於中共區域的民選問題，邵力子說，政府也會讓步接受，願考慮縣級民選加委，但省級民選加委，是破壞政令的統一，應該不談，但這也給中共拒絕了。

最後，邵力子特別對赫爾利將軍從中折衝的努力，表示了無限的感謝。

周恩來報告以後，邵從恩撫着白鬚，以沉邁的聲調，對那沒有名目的軍事衝突，表示重大的遺憾！這是歷史的污點，他熱情的說：「我願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青年黨的余家菊也認為商談來解決軍事是最好的，而且現在運用這種方法已有進步了，比如由雙方談，已進而為多方談，由且打且談，已進而為停戰協商，由為了彼此相安，已進而為了全會安定。今日的報告，自始至終是多麼地平心靜氣！我們並沒有預料那樣的發生什麼有破壞和諧的事。

這時五人的會外協商正在進行，以決定軍事考察團的名單，會議等候着他們的結論，在這時間，葉劍英禮貌地站起來說，他將於明日飛平了，並講了幾句告辭的話。

有了告辭，似乎又不能不有贈言！這又輪到高齡皓首的邵從恩了，他解釋受降說：受降是國家的受降，非一黨一派所得而私，何謂國家的受降呢？一是所至之地應該加惠人民，二是所繳之械應該歸諸國家，三是必令敵人尊我敬我，不看輕我！否則即不是受降。

葉劍英又禮貌地再站起來，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謝。

這位古稀之年的長者，引起了大家的景仰，他神采飄逸，而聲音又充滿了感情，字字打入聽眾的心坎，令人懷念在遙遠北方無數的父老。

他的女兒一旁照料着他的行動，而他卻有時離座蹣跚，獨個兒悠然神往於窗前的盆花。

會外協商不一會兒提出了考察團名單，明天又將是五人會外協商來決定議程。——會外協商，這是一個多麼新而好的方式，它將減了不知多少的唇舌！」

### 第三節 在議程外打岔

王遂今又報導：

「還沒到九時，國府大禮堂裏記者席與特別來賓席上已坐滿人，後來祇得另搬椅子在走道上，吳國楨部長也很容易佔到一角之地。褚輔成老先生也來了。邵從恩最先到會場，獨個兒用心地在瀏覽政府組織方案原文。傅斯年因為耳朵重聽，和胡霖對換了一個位置。會員席的後面，又添桌椅，也坐滿了人。電燈換了燈泡，益發亮了。鎂光常在會議最高潮時閃動！——「政治熱」已充斥這所八年來領導抗戰終獲勝利具有光榮傳統的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禮堂裏。

討論的是「政府組織」，大家注意的是「政府組織」，希望求得合理合法解決的也是「政府組織」。現在政府方面有此誠意，有此決心，提此方案，所以政協會議也以此列為首題，但昨天，因為發生了議程外的爭論，幾乎阻礙會議的進行！

事情是這樣的：在政府代表王世杰與青年黨代表曾琦說明了兩方關於「政府組織」的提案後，主席方面宣布開始討論，民主同盟代表張東蓀忽然把問題扯過，說了一番「條件」的理論：「必要條件非足夠條件」！他說：「光討論政府組織是不够的！必先實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為條件。」是呀，政府不是已宣布要這樣做了嗎？但他的「條件」來得厲害，「不行，政府一定要在三五日內做到，並報告實施情況」。緊接着梁漱溟站起來說得更衝動：「如果此事不先做到，我們不願再討論其他問

題」。但這種近於要挾的話，也仍得到政府代表的答覆，邵力子以個人的立場報告一個消息，國防委員會已通知有關機關在十天內檢討各項有關人民自由法令，以決其修改或廢止；七天內查明各政治犯案，以便分別辦理。最後說：「要人民自由，須有良好政治環境；要有良好政治環境，須協商會議圓滿成功」！

寧靜的陳布雷也說話了，他認為張梁兩人以「條件」來向政府提出是不對的。以中國之大，原因之多，「限期」實施是不應該的。政府未始不可以敷衍大家，但政府有誠意，所以求其迅速，尤須求其確實，希望不要作此「嚴格的束縛」。

青年黨曾琦也覺得像這樣的打岔實在不好，他表示：現在提出人民自由問題，是破壞了既定的議程，議程規定最先討論政府組織，此時不應岔出討論人民自由？這個議程是五人小組決定的，梁漱溟代表民主同盟，也曾參加討論，而且同意的。

在這超出本日議程外的爭論中，周恩來也起立發言了。他提起了西安事變，提起了張學良與楊虎城，但他承認他們也「抓錯了的人」？所以他說除「人民」不願釋放者外，無不釋放。最後，提高了聲音，要政府代表也允許釋放張楊。對於中國政治具有常識的人，誰不曉得西安事變的內幕及其醞釀的經過呢？但張厲生的答覆却敦厚地不願說穿，他祇說：「我不想以宣傳家的資格說話，然而我可以說，是以一個國民黨員來說話，我是有勇氣有決心來答覆的；我要是一個政府代表的身份來說話，爲了使協商會保持和諧，就要不溯既往，則願使我要答覆的話保留」。（此時筆者也在場旁聽，立即寫一條子請會場幹事送給吳鐵城先生，要他趕快提出「秩序」問題，請主席維持。）此時，全場凝神傾聽，肅然無聲，但問題的癥結和事理的曲直在沉默中更表現出來！

邵力子走到上首去報告了一件新聞，剛剛還是前天的事，他將一個江蘇來的電報交給周恩來，請他查查，這電報就是國民黨的工作同志被中共抓去了。他又委婉愷切地說：張學良向來父事 蔣主席，蔣主席也視之如子弟，今日不過父兄對子弟之管束較嚴而已，將來張楊不但自由，相信且將繼續爲國效勞。反之，中共抓人，我們並沒有公開宣傳而且剛才聽說「中共釋放政治犯，人民不願釋放者除外」，照此說來，將來問題還多。——說到這兒，周恩來在座位上發出聲音來：「我沒有說」。——於是邵力子也就說：「那麼，是我聽錯了。」

#### 第四節 竟說出下流話外行話

王遂今的報導如次：

「晨霧四塞，一片空濛，迎面而來的汽車，只能看兩個黯然的燈，蹣跚地破霧而行。生活在這山城的低氣壓下，叫人緊張，又叫人沉着。」

會場仍溫暖明亮，噴吸的煙氣繚繞不散，蔚成一片，氣壓和外面是一樣的低。

昨天討論的是「施政綱領」，在這議程下，自然先要聽取各方提出的方案，但幾乎和前日情形「如出一轍」，先來了個岔子！梁漱溟第一個站起來，提出了地方政府問題，他要併到「政府組織」中討論，他特別說到所謂「解放區」。但會場沒有反應，主席於是仍宣布開始「施政綱領」的討論。

接着是張申府說話，他先問：「不知大家讀過我的幾篇文章沒有？」全場沒有反應。於是，張先生拿起他寫好的一篇綱領的「前言」，一字一句的唸起來。他又說施政綱領應該是「原則的，但不太原則；具體的，但不太具體；不是高調，但也不太低。」又說「黨者尙黑」呀，「君子黨而不黨」

呀；他所說的要點似乎是一「民主同盟不是黨」，「我們還沒有方案提出，意見還不一致。」他又說明爲什麼要先討論人民自由問題，因爲「否則，這會議就要被人罵爲分贓會議了！」——他的話叫人聽了有點茫然。

吳鐵城因此也說他也聽到人說「分贓會議」的不幸渾號，而且還聽說不如來一個政治協定的話。黃炎培以尖酸刻薄的口吻說話了：分贓會議這名詞，以後不可再提，分贓的贓，是偷來搶來的，那能說現在政府的政權是偷來的搶來的呢？分贓也等於上海人所說的剝豬獠，當然政府不是一「豬獠」。——這種失態的話，出之於堂堂政治協商會議一個會員之口，怎能令人置信！兩個鐘頭以後，這尖酸刻薄小丑般的道白，從會場傳到外面一個座談會，參加座談的人都深爲惋惜，他們對協商會議裏面某些份子的道德水準和民主風度表示懷疑。參政員兼名法律家江一平在許多人的惋惜懷疑中，站了起來，侃侃的講了一番大道理。他說：「我們不必學別人說下流的話，我是研究法律的人，我從法律的觀點上說話，國民黨的政權堂堂正正地受之於國民會議的付託，當然不是偷來的，更不是搶來的，惟其是受國民會議付託之重，政權的遞嬗，便應有一定的法軌，便絕對不容私相授受。至於說到「分贓」的話，凡依法取得之物，如不依法使用，則自不依法使用之時起，即變成了一「贓」。故依法取得之物不是一「贓」，不依法使用才是一「贓」。今天問題的癥結是，非有一「贓」之可分，皆因分而成「贓」！江一平老吏斷獄般發表了這樣一段法律上的「分贓」論，使這個座談會的空氣又是嚴肅，又是輕鬆，比之於協商會議裏面的空氣，似乎和諧得多了！

說話回到會場裏來。董必武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十條綱領，章伯鈞立刻起立說，中共的主張與他的主張，有許多地方不謀而合。

常燕生代表青年黨提出綱領方案，他認為綱領的原則，應該簡要勝於繁雜，現實勝於理論，除弊勝於興利。他特別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民主同盟的羅隆基，是一位政治學教授，他背誦了一些（英國）的政治史。但是他說：「我贊成中共的二五押稅，二五加稅，是多麼切實的方法！」董必武連忙回過頭來更正「二五減租，是二五減租，不是二五加稅，」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陳布雷的發言，使會場重新靜下來。他就正名方面說了幾句，他愷切的說：「不要再用『聯合政府』這個字眼，不要濫用『特務』這個名詞，——這些話令人想起過去許多分化詭陷的宣傳。他又認為綱領的名稱，可以稱之為建國綱領。」

工業家李燭塵最後一個發言，他提出「國農、民工」的意見，他談及西北造林的重要，說：「蔣主席自到過河西後，甘肅省銳意造林，第一年成績不好，樹苗活的不多，第二年就好了，活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又談及青海造林甚有成績，西北製革也很重要。至於沿海平原的鹽浸土，可用日本人的方法灌水三次，洗去鹽質，就能耕種，華北平原已有五十萬畝地恢復耕植力了。治河呢，日本人的計劃也可用，就是要在河曲築堤提高上游水位，並開鑿運河，濬深舊黃河，自青島或連雲港出口。又說到西北需要大規模的農貸，尤其棉農的貸款，現在中國棉紡織工業有四百萬紗錠，要是全部生產，年需棉花一千二百萬擔，但中國祇產四百萬擔，不足之數，與其拿錢去買外國棉，不如拿錢借給老百姓自己增產。——他以經驗和博識，提供了許多實際寶貴的意見，博得了全場的掌聲。」

最後祕書長宣讀五個小組委員會的名單。王雲五說：「無黨無派代表均有個人立場，所以希望增加，結果傅斯年被推參加了一二兩組。」

## 第五節 纔論及軍隊國家化大問題

王遂今報導會場的情形如下：

「軍事問題實際上是當前國是的癥結所在，但在昨天的政協會議中，平靜無波，反偶見席間三兩笑語，一片和諧景象，幾令人不再相信這個問題是多麼嚴重困難的了。素不多話的青年黨代表陳啓天，昨天以嘹亮的聲音，說明他們對於軍隊國家化的提案，他高叫軍隊不應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任何地方！他特別強調「軍」「黨」應該分離，纔可避免由政爭釀成兵爭。辦法是現役軍人不得參加黨派，禁止黨派在軍隊裏活動，軍隊教育應該不是黨性教育，他們並且主張國防部可以由人民來主持。梁漱溟起立說明民主同盟的提案，據說和青年黨的差不多，有沒有不同呢？有的，詳略之別而已！

不過他對於組織一個「委員會」，據說要包括國共兩黨的軍人，「和國共兩黨以外黨派的軍人」，他特別着重這點：「這個國共兩黨以外黨派的軍人不知有沒有？但希望他有，另外再加上非軍人。」——這又與青年黨文人治軍的主張大不相同了。

當張羣報告了三人軍事小組已經舉行之後，梁漱溟忙着起立又說：「我忘了一件事，就是遣軍事小組是要屬於那委員會的，」但沒有任何反應。

邵力子說話的時候，提到聯合國大會對過於艱鉅的問題不加討論，兩國間的問題也不討論，他主張政治協商會議也可仿行，將過於艱鉅的問題留待國民大會去討論，兩黨間的問題也不討論，由兩黨自己去解決。



這話獲得了青年黨的歡迎。但民主同盟可不然，張東蓀起來說：國共兩方的問題，不能祇顧兩方談，不能祇顧到兩方的利益，而不顧他方乃至全國的利益。於是，梁漱溟和張申府兩人拍起手來。其餘的人則多報以輕微的一笑。張羣報告的消息是很值得欣慰的，他說：因為葉劍英飛平，三人軍事小組已由 蔣主席另指定張治中，他自己和周恩來三人組成，而且前天開過一次會了，三人決在一月內要商定中共部隊整編的辦法，其後二月內就要將中共部隊整編完成。他又說：蔣主席怕各位對目前政府整軍的情形不明瞭，所以特命軍政部長林蔚來報告。

林蔚報告是很具體的數目字，兩個副官還抬來一個木架子，上面掛着一張張圖表，林次長手執教鞭，像教授般不厭詳盡地講了一個小時。

休息後，周恩來發言，他雖同意軍事國家化，軍隊不應屬於個人黨派和地方，但他說軍隊是應屬於「人民」的。說到中共部隊的整編，他說中共一定做到縮編至二十個師團，但是，須劃定駐地，而且要等到憲政實施以後，中共部隊始受政府的調動。旁聽席上很有人聽了不耐煩，說：這是甚麼國家化？這還不是他們原來的那一套？這還不是割據的身體上披了一件國家化的外衣？但也有人忠恕地說：還要協商下去，且等着瞧罷！

周恩來又轉過身來，向着記者席發揮了一番反對「軍人第一」的宣傳。最後，他表示了對青年黨「軍黨分離」主張的同意。

邵力子於是委婉地說道：軍人第一是爲了抗戰中尊崇軍人的一句口號，抗戰中軍人最勞苦功高，軍人拿性命捍衛祖國，但社會上對軍人不重視，甚至有一部份人表示厭惡，所以要用這句口號來喚起社會對軍人的尊敬和協助。說到「軍黨分離」，這是我們早已在做的，黨部已經退出軍隊。但對於中

共部隊整編以後，倒不馬上要求他們的軍人脫離黨籍，祇先要求他們在軍中不作黨的活動。

邵力子又對前日張申府「黨總是害苦人民」的妙論，作了嚴正的答覆：害苦人民的黨容或有之，但就國民黨而言，沒有同盟會，那能推翻滿清？沒有國民黨領導的北伐，那能剷除北洋軍閥？沒有國民黨領導的抗戰，那能擊退日本的侵略？而八年抗戰下來，中國被敵蹂躪最烈，封鎖最久，人民痛苦因也最深，要是說國民黨害苦人民，這是不公平的！

這一席話義正辭嚴，聽的人都爲之首肯。張申府也起來解釋誤會。我們從此可知，天下之大，雄辯雖有時可以勝於事實，但事實畢竟還是事實。」

## 第六節 國民大會問題上場

王遂今也有忠實的報導：

「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到『國大問題』。雖然大家都說這個協議會僅是一個黨派會議，不是一個人民代表會議，但對於那個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的問題也不妨在這兒謀取政治的解決途徑。」

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從遙遠的西方飛回國來，昨天翩然到會，一陣的掌聲，歡迎這位新來的會員。

張厲生說明政府對於國大問題的四點意見，他特別就法律與情理強調舊代表之必須承認，國大代表「於會期完畢時任務終了」。所以祇有任務而沒有任期，試問這個任務憑什麼法律的根據可以解除它？再者，我們今日所求者，是團結統一以祈求國家的安定，假如不承認以前依法選出的代表，試問他們及選舉他們的人民將作何感想？作何反應？今天各黨因爲對國是的主張不一致，所以有此政協會

議，那末要是他們也來個「國民大會黨」，亦向政府表示其要求，試問政府將何以章伯鈞先生講了些「感謝」「興奮」的話，他有時稱「我個人」有時稱「我們」一篇十個月前的意見書，聲明堅持舊代表應該無效！什麼由理呢？他找出一份舊報間已久的大公報，裏面有一篇有關國大的社論，捧起來讀了一陣，認為報紙言論也者看見無黨無派代表席上有的向胡霖微笑，有的向胡霖點頭，像是道賀。鄧穎超代舊代表主張重新考慮，並非拒絕考慮。她主張國民大會組織法選法也要修改，比如被選舉權就沒有好好的規定；又比如戶長會議上只有一戶一個選舉權，應該一人一對「公民宣誓」也大大不滿，她特別強調了宣誓文，這裏面有一句是要公民擁護三樣是限制思想自由，不合民主原則。

張東蓀起立，發揮一番議論，他主張國大代表重選，重選以後國民黨仍佔多數打了一個比喻，比如打麻將，贏的因為手段好牌法好而贏了，輸的甘心情願；若是輸的也不甘心。——這個譬喻倒與黃炎培「剝豬羅」之喻，有異曲同工之妙，引起旁聽者。他忽然提到了前天羣衆大會的事，大概有什麼觸犯了他，竟提高了他的聲音，怒起來：「真理是真理，我要警告新聞記者，聽着！請你們不要來破壞了我們會議，得記者們個個莫名其妙。」

休息了，二三十個記者立刻簽名提出了四條質問：

一、那一個新聞記者破壞了和諧空氣？

二、新聞記者有無新聞自由？

三、張先生這種態度是否和諧？

四、請張先生必須逐條答覆？

這質問不久由主席遞到了張東蓀手裏，他又起立說了幾句，承認了自己的「出言不慎！」

話說回本題上來，張君勳第一次發言了，他認為國民大會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民主的起點，希望以政治家的風度想出個一面能使政府的威信維繫不墜，一面能解決此一現實問題的途徑。

曾琦很同意張君勳的主張，他特別強調組織一個國民大會預備會的需要。他又說：「政治糾紛，要取決於議場，不要取決於戰場；要取決於選票，不要取決於槍棍」。

白髮而紅顏的王雲五說：「我也沒有當選，但他苦心地折衷了雙方的意見，要法理與事實兼顧；我做生意的打算盤是內行。」他提出一個方案，把四百六十名當然代表名額與二百四十名指定代表名額讓出來，加以協商解決。

誰能說國民大會代表是國民黨清一色，在這兒，張瀾與錢新之就是代表，張瀾可惜因病未到，錢新之却作了不平的聲明，他是上海八代表之一，這八代表中，就有四個不是國民黨員，「我也不是國民黨員，我也沒有競選，但我得到票數很多。」

會場空氣寧靜下來，大家聽邵從恩撫鬚而道：他道去年的事，國民大會原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但當他聽說延安中共也將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不禁憂心如搗，深恐就此分家，所以他在參政會提出一案，主張互讓。他再追溯到九年前事，蔣主席蒙難西安，他感謝周恩來「保全」了國家領導者，方有抗戰勝利的今日，希望中共以同樣的心情，保全蔣主席的威信於人民，以期有建國成功的明天。

胡政之對他的「忠實的讀者」章伯鈞說了幾句話；第一、大公報的立場是「對事不對人」，第二、大公報的主張，不能以一文而窺全豹。他對於大會問題，主張想出一條出路來。

最後是邵力子作了昨天辯論的總結，他欽佩民主同盟與中共有「堅定的立場」，但也相信他們必無「固執的成見」。世界上焉有條條法律十全十美沒有缺點，但中共所指責的幾點，也有誤會的，如戶長會議就根本不同於國大選舉，及其他民意機關選舉。至於公民宣誓，他說，現在恐怕不會成問題吧！因為三民主義今日已為各黨各派所尊重，總不致把「擁護三民主義」解釋成思想限制的了！至於婦女權呢，將來特別加以注意好了！」

## 第七節 疲勞轟炸國大問題

請仍看王遂今的忠實報導：

『政治協商會議，于十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第八次會議，原定議程：（一）繼續討論國民大會問題，（二）憲草問題；惟因討論國大問題時間甚久，憲草改明日研討。今日之會，到會員李燭塵等三十四人，雷祕書長報告出席人數後，主席孫科宣告開會。』

羅隆基氏首先發言，反對國大舊代表有效，據稱：政府的威信與當前實際政治困難要顧到，但新憲法之威信與憲法之理論亦要顧到，羅氏繼批評昨日王雲五、胡霖、傅斯年、張厲生諸氏之主張，惟贊同郭沫若、鄧穎超二氏之意見。渠復代表民主同盟提出以下各點：（一）如維持舊代表，則須舉行民意測驗，由工商文化學生等智識份子舉行。（二）以舊代表為候選人，舉辦復選，（三）不開國民大會，由專家制憲，公民表決。

周恩來氏繼續解釋何謂協商？何謂和諧？何謂政治解決三點謂：因有不同意見，須有協商，雖有爭論，但應彼此重視對方意見，俾得到尋求共同原則，周氏並謂：承認不承認舊代表爲一回事，中共參加不參加國大又爲一回事，渠反對承認舊代表。

陳立夫氏今日首次發言謂：討論國大問題，首須認清幾個基本觀念：第一、由一黨政治制度到多黨政治制度之過渡期間，不能抹煞現有一黨的政治制度，否則一切問題不能解決。以多黨立場視一切建國工作爲權利，然從一黨專政立場觀之，則認爲義務。第二、選舉第二條第四項，由政府指派代表二百四十人係一補救辦法，雖非絕對良好，但適合中國國情，因我國與歐美不同，每有當選資格且應當選者，常自視清高不願競選，故不能不有此辦法以資補救。第三、代表任期原未明白規定，故有爭議。有謂十年以前所選代表依憲草任期八年之規定，早已屆滿。殊不知任期應從就任日起算，今國大尚未召開，渠等亦未就任，則任期不但未滿，且實未開始，何況抗戰八年舊代表之未就任，乃特殊情形，至於憲草尚未依法通過，更不能據以限止代表任期。陳氏最後謂：講民主須顧到法，否則爲無法無天，何能謂民主，過去國大已選代表，皆係由全國各區域產生，如以民主必須取決于多數，則無人有权取銷其資格。

吳鐵城氏對維持舊代表一點，作補充意見，渠稱：反對舊代表理由，不外兩點，一爲廿五年所選代表，不足以代表今日民意。一爲當年無選舉權或被選舉權者，今日已取得，不應剝奪其權利。對第一點當年所選代表八年來多參加抗戰服務，渠等所得經驗與認識，均已提高，更足以代表民意。對第二點今日取得選舉或被選資格者，究不能超過當年有選舉或被選權之人數，不應祇顧及少數人之權利而不承認已得選舉權者之選舉結果。吳氏最後謂國大問題，不純係理論問題，而是事實問題。

王雲五氏對羅隆基氏意見，提出答復：渠認為民主的基礎，係在法治，倘抹煞法律，則此種民主，實不可靠。法治之精神，人民應守法，政府亦應守法，政府不能隨便否定法律，否則與民主立場衝突。渠認為國大組織法，有一缺點，即代表無一定任期又無取消代資格辦法，渠贊成予以修改。但過去所選代表，不能不維持。渠便強調，應兼顧法律與事實，希望國民黨中委之當然代表四百六十名額讓出容納各黨派人士參加。王氏又謂，羅氏認為此等代表，由協商產生，不能取得人民尊重，則將來制定憲法亦不能取得人民尊重等語，渠表示懷疑。至於民意測驗辦法，僅由智識份子參加，則是否可代表全體民意，亦屬疑問。

邵從恩氏稱：渠對此問題，曾費一夜苦思，已另想得一辦法，即由現在起，以三個會議解決此問題：（一）第一個會議，即此次政治協商會議，其任務為各黨派互相擬定民主開始步驟，起草改正國大組織法及選舉法乃至憲草大綱，提出一提案。（二）第二個會議仍照政府之主張五月五日召開，將吾人所改正之組織法及選舉法和憲草，提交該會討論，作為正式之組織法選舉法及憲草。此一會議，等於孫中山先生主張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中山先生所提出農工商等九類，亦包括在內，則舊代表之推翻不推翻，亦不成為主要問題。（三）第三個會議，即根據第二個會議決定之組織法選舉法成立之會議，其任務為制憲與行憲。邵氏認為此項辦法，並不違反國父遺教，各方面事實與將來之憲法前途，均可顧到。

陸定一氏發言，對於「三三制」加以解釋稱：在中共地區選舉代表時中共黨已獲選人數，不得超過總代表三分之一，過此則設法減少之。但在國大名單中，聽說國民黨員佔過半數。陸氏復提到十三年國民黨「聯俄」「聯共」「工農」三政策，及抗戰各黨派之功勞，渠反對舊代表有效，謂「並非普

選」者。

胡霖氏重提昨日章伯鈞氏引證大公報之社評，謂昨日因時間關係，未能詳加說明，渠並嚴正拒絕羅隆基氏批評渠對國大問題爲「馬馬虎虎」之看法，謂對此國家大事、任何人亦不應「馬虎」，彼此協商，能讓則讓，不能讓則不讓，雙方不讓，亦須尋求出路，但絕不能「馬虎」。並強調應以政治解決政治，協商會議爲「有所予取，」務期速使商定各項辦法；然後對某特定問題，始可求得解決。胡氏並謂：吾人不應以黨派利益置於國家之上，並須注意會外一般情形，如社會人士對吾人有分贓之感覺，認爲某人欲做國府委員，某人欲作部長，則將使勇於負責者，亦不免有所躊躇，吾人應如何使會外人士，認爲本會有價值，對人民有益。渠繼稱，現在劈劈剝剝之槍聲雖未停止，但相信總有希望，深盼諸位不要錯過此機會，尋求政治解決。胡氏最後建議，由政治協商會議發起，成立一憲草研究委員會，敦請專家，起草審定，俾提供政府。渠認爲國大本身即係政治問題，希望在小組會中，慎重討論。

羅隆基氏對胡氏所言，表示大體同意，并聲明願收回「馬虎」字樣。並稱「協商要有所取，與有所予；但應予之以道，問題乃在如何取予。渠繼對王雲五、陳立夫二氏意見有所批評，並強調舉行民意測驗，及公民複決之主張。

張厲生氏謂關於國大問題，已經兩日之討論，會議亦已開會八次之多，所討論者，不外政治、軍事、國大、憲草四大問題，雖分日研討，然互相均有關聯，因此循環討論，循環協商，商來商去，和氣一團，迄未獲結果，惟收穫亦甚多，各方面在發表意見時，無不稱「人民需要民主」，人民固需民主，但不需黨派之爭，甚至憎惡黨派之爭，渠等所注意者，爲吾人協商有何結果。大家皆謂自己代表



民意，爲人民謀利益，然人民所欲者，非爲空話，乃係實利。是以渠建議各黨派及無黨派方面，各推一人，對四大問題作一通盤考慮，使之趨于一致。對於尙待協商之問題作更具體更積極之商量。張氏在發言之際，張君勛氏起而干涉，謂渠越出議題範圍，經主席解釋，張乃畢其辭。

曾琦氏發言時，張君勛氏復起立請主席對發言超出議題者應予制止。主席答覆，此非國會，乃協商會議，有話均可自由說，你剛回來，尙不清楚。張氏復坐，主席仍請會會員琦繼續發言，曾氏以議程尙未討論憲草問題，不欲發言。

邵力子謂國大問題，應交小組協商方對，對羅隆基提出代表是否有效，應舉行民意測驗一事，提出意見，謂知識份子既可測驗，則不如立即請會議中無黨派代表作一臨時測驗。

討論至此，已下午一時，主席將張厲生氏建議各方推人對四大問題作通盤考慮一點，徵求意見，張東蓀氏主張，似可俟憲草討論後再說，主席乃宣告散會。

記者王遂今的報導，有補充中央社電文缺漏之處，其文如下：

政協會議繼續討論國大問題進入了第二天。

羅隆基拿着許多紙片站起來，表示他對此問題「遲疑很久」，接着說了兩遍「我是研究政治的」。他對於第一天討論時幾位會員的意見，表示不滿意，他以爲王雲五的「算盤」也打得不算高明。當然代表如讓出來，國民黨中委豈非要落空？所以他仍主張不如索性重選，「不是我們民主同盟要爭，是因爲即使協商會議承認了舊代表，人民也要不滿的。」

他對胡霖的意見也不贊成，「國大這問題是不能馬馬虎虎的，現在先攪出來，將來再攪是不行的。」於是他代表民主同盟提出了好辦法——這是研究政治的他「遲疑很久」得來的結果。

什麼辦法呢？其中之一是用民意測驗來決定國大舊代表的承認與否，「全國民意測驗也許可能，但可以就工商界與知識份子方面舉行民意測驗的。」

這一番高見，引起胡霖，王雲五的抗議。

胡霖說：「剛才聽見羅先生說我馬馬虎虎，我不能承認！誰也不能說馬馬虎虎。我們這個會，決不能馬馬虎虎，也不應更不許馬馬虎虎。」

胡氏說到他主張組織一個憲草研究會時，又慨乎言之「現在真正對憲法有研究的實在太少了！比如褚輔成先生，才是真正對憲法有研究的，真正的憲法老鬥士！」

他老實地說：「我們不能就這會場裏三十多人來看，要看看會外的空氣，不要讓社會說我們是分贓，我們要把國家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所以他請大家放嚴肅一點罷。

羅隆基忙着起立說：「要是我說了馬馬虎虎的話，我願意收回！」又說：「胡霖是我的朋友」，一向很尊重的。

但王雲五接着說：「聽了羅先生的高論，不敢苟同，民主一定要法治，否則靠不住。國大組織法選舉法，若是民意公決修改，我同意。但現在是協商，我們只從法理下顧全事實。我建議指定代表當然代表等名額讓出來協商，這是不違反法律精神的，同時又顧到了事實。羅先生說即使協商會議承認了舊代表，人民也會不滿，倒要請問：「如果協商會議不承認了舊代表，人民又將作何感想？」

邵力子笑迷迷地說：羅先生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民意測驗的主張，我覺得很好，不過恐怕所謂工商界，不足代表整個民意，知識份子的界限也不易弄清，依我之見，不如請九位無黨無派代表來一個「民意測驗罷」！引得九位大笑起來，連說不敢。

恕我把發言的次序顛倒了，周恩來第二個講話了，他承認毛澤東確和王世杰說過「中共不同意舊代表有效，但並不因而不參加國民大會」的話，他說：「是說過的，說了的話算數！」——旁聽席的耳語却道：「但願如此！」

陳立夫自開會以來一直緘默着，昨天說話了：他糾正了幾個模糊觀念，同時也深切闡明了國大組織法和選舉法的立法精神。這些觀念和法意攪不清楚，爭辯少結果，他說的大意是這樣的：

第一、一部份人對國民黨一黨治國的批評是錯誤。國民黨與政府的關係，是民國十三年改組後取法於蘇聯的制度，若用一黨制的看法來批評它，根本是不對的。國民黨現在爲了還政於民，一黨政治正過渡到多黨政治，若忽略了一黨政治歷史的特質，問題是不容易求得結論的。

國民黨受了國民會議的付託，在國民大會開會之前，負責行使政權，這在約法上是明白規定的，所以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便是國民大會的前身。現在國民黨要還政於民，國民黨代表和人民代表自然要在一起辦交代。國民黨中委之參加國大，是義務不是權利。至於與人民代表沒有交代可辦的人，參加與否，關係倒不是頂重要的。

第二、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爲不民主，其實中國要進至真民主，還要相當時間，一般選舉，要當選必須競選，但中國許多年高德劭的人，往往不會去競選，而且要三顧茅廬，方肯出山，爲要補救此點，參政員的產生也有丁種遴選的辦法，丁種的遴選，使參政會更加充實，這是中國實情，有此必要，這是立法的苦心，並非不民主，而且是走向民主道路更積極的步驟。國大出席人中有國民黨中委二百四十名，這在國大代表總額上僅佔五分之一，較之「三三制」似乎進步多了！

第三論到任期，任期應是從就任到卸任之期，國大代表根本還未就任，怎樣能說任期太長？又怎

樣能抹煞抗戰八年的非常時期於不顧？更滑稽的是，有人竟拿憲章中任期六年作理由，來否定國大代表，憲章還涉通過，又怎能對國大代表發生拘束的力量？

已產生之國大代表係擁有三億五千萬人民之區域所選出，試問甚麼人有資格否定他們的存在？黨派又有甚麼資格來加以否定？如國大每一代表皆須黨派承認，莫非要叫每一代表都奔走於黨派之間？民主不能離開法治，離開法治就是無法無天的民主；民主也不能離開多數，誰有資格來說三億五千萬人民的區域中產生出來的代表無效？

吳鐵城接着補充說：國大代表雖然已選出八九年，但在抗戰八年中，他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正足以增加了他們的代表資格。

共黨的陸定一，對陳立夫所說的幾點加以答辯。他說中共的三三制是規定「中共黨員在民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如其超過了三分之一，就要加以削減，」又說，學習蘇聯，中共更比較來得熟識。又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中山先生揭櫫三大政策，就是「聯共」「聯俄」「農工」。

羅隆基也來發表他的政治學見解：「我是江西人，我是三億五千萬中的一個，我就沒有同意。」陳立夫向主席祇要兩分鐘時間，輕輕地將反駁的理論駁倒了：「三三制下民選出來的中共黨員，超過名額的三分之一，要被削減，就不是民主，就是黨的統制，此其一。過去慘痛的歷史不要說了，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時并非「聯共」而是「容共」，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此其二。國民黨的一黨政治是取法於蘇聯的制度，並不是「學習」！此其三。三億五千萬指的是「區域」，羅先生雖是三億五千萬人中的一個，但畢竟還是最少數。

邵從恩要大家「憑良心說話！」他爲了此事澈底憂心，今晨雖然疲憊，但仍然來了。他建議由協

商會議初步研究憲草，再「按 國父遺教召開國民大會預備會，討論制憲。」這預備會裏就包括舊代表與各黨派，最後普選，召開行憲的國民大會。

一個插曲結束了昨天的會：張厲生建議組織五人小組整理各種意見，不要再作「循環協商」了！大家叫人民，叫民主，不錯，人民要民主，可不要我們，厭惡我們不息的黨派爭論。——說到這裏，新從法國回來的張君勸忽叫「不要說到題外去！」

主席孫科却說：「我們是協商，有話大家說。」

昨日開會時，張東蓀忽向記者咆哮謂：「你們不要破壞和諧空氣，」列席各記者聞言，羣情大憤，向之提出質問，咸認係干涉新聞自由、且爲無的發矢，後經張東蓀表示出言不慎，事始寢。」

## 第八節 討論憲法怪論百出

王遂今又不憚煩地報導如下：

「政治協商會議第九次會議于十九日上午九時舉行討論憲草問題，首由政府代表孫科說明五五憲草之內容及其精神，黃炎培、沈鈞儒、傅斯年、胡霖、曾琦、楊永浚、張申府、吳玉章、李燭塵諸氏，相繼發言。」

會議由孫科主席，雷祕書長報告出席會員余家菊等三十二人後，孫會員科以政府代表資格，對五五憲草加以說明，原詞如下：

五五憲草是根據五權憲法精神而擬訂，本人以國民代表資格，說明其所包含之重要原則：

第一、人民行使政權，政府行使治權，政權歸人民行使的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選舉

罷免兩權是對人，創制複決兩權是對事。其在地方行使的是直接民權，選舉或罷免地方官吏，創制或複決地方單行法規。其在中央行使的因中國幅員遼闊，故由人民選舉代表，成立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或罷免中央政府官吏，創制或複決重要的法律。至治權則歸政府行使，照英美之三權制度，有行政、立法、司法三部份。五權制度將考試權由行政權中獨立，將立法、監察兩權分立，共為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五種。此五種權，由政府分別行使，謂之治權。

第二、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為什麼要政府有能？政府是為人民所產生，官吏是人民之公僕，亦為人民所信任而選出，由此所組織之政府，應該給他相當的權，俾有充份能力，執行職務，使政治效能，充分表現，這是比議會政治國家因國會黨派不能團結，發生政治糾紛，改組內閣，政治不得安定，確為進步。例如法國自普法戰爭後，至上次大戰開始止，其間不過幾十年而內閣改組多至百餘次，平均每年要改組內閣三次。因此政府重要官員，大部份時間忙於交卸事，至有許多政策無暇推行，法國政治之失敗，由於政制之不良，實為重大原因，政府常在動搖之中，自然會變為無能，不能應付時代需要。故今後我們建立政府，必須使之有能，實在非常重要。因此國民大會會期不能太長，以免常因開會選舉，改組政府，有害各種政策之進行。

第三、五五憲草公布以後，有些人士不明瞭國民大會性質，以為國民大會既是人民行使政權的組織，那麼它的權力還應該補充，例如預算決算、外交方針、施政方針等職權，都應一一列入。但是據我們的看法，就是在憲法內不一列舉，國民大會也是有此權力。依憲草第三十二條規定，國民大會會有創制法律、複決法律之權，既能創制法律，當然也能創制政策，既然能複決法律，當然也能複決政府的政策。議會國家要推行一種政策實施一種辦法，必先在議會通過一個法案，政府根據議會通

過的法案，纔能推行實施，政府提出的預算案，實際就是一個法律案，議會對於某一部的預算不予通過，無異通過裁撤某部。譬如徵兵是根據兵役法而辦理的，假如國民大會主張平時不需要徵兵，它只要否決現行兵役法，政府便必須停止。總之國民大會有了創制複決兩權，實際上已經包羅萬象。另一方面，國民大會既是行使政權的機構，按照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原則，便不宜於經常開會，使政府各部門不能行使其職權。同時在五權政治的理論上說，國民大會閉幕期內，其職權由立法院代替施行，假如國民大會經常集會，立法院自無工作可言，所以說，國民大會行使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實在是包括國家最高權力，不過爲顧到政府在各部份的分工合作，國民大會不宜經常開會，牽制政府工作，使政府有充分時間能力，負擔起它應該負擔的職務。

第四、外界對於憲草中所規定五權行使的辦法，常有一種誤會，許多人誤會十幾年來的國民政府的五院組織，就是將來的五院。現在的五院制是訓政時期的五院制，立法院的立法原則，則由國民黨中央決定，交立法院制定法律，現在立法院沒有制定法律之權，所有建議，亦要由中央核定後方能完成立法程序。行政院亦復如是，其重要政策，都要由中央核定。現在的五院，除了司法院獨立，中央不干涉裁判以外，各院的重要事務，都經中央核定。所以現在的政府是一權制度，國民大會以後的五院，與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各院的權力都比現在要充實，將來的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關，除了國民大會可制定法律外，無論什麼法案，立法院都可創制。這樣的立法院，實無異於英美議會。

第五、關於國家元首問題，現在憲草所規定的總統有兩個資格：一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一是行政首長，將來行政院的院長，及各部會長，都對總統負責，總統有直接指揮行政之權。美國部長都是對總統負責，不是對議會或選民負責，現在憲草規定總統對於國民大會負責，等於總統

制。有人批評憲草的總統權太大了，不過我們看憲草總統一節，規定總統職權，都依法行使法律所授予總統的權，總統才有權行使。一般人反對最烈的是憲草四十四條所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權，其實總統發佈緊急命令，須得行政會議之決議，並須提交立法院追認。所謂總統權力過大這一點，或可加以研究。其他各點上總統的權力，則都是有限制的。

第六、憲草中對於省制當時並沒有很好規定，這幾年來我們也感到省級規定需要補充。憲草起草時，中央正注意中央集權，把地方的權逐漸集中，在憲草中沒有規定省有甚麼權，中央給他做什麼事就做甚麼事，這制度推行至今，連財政權也集中在中央，省預算成爲中央預算的一部份，此在抗戰中是有他的理由，的確也收到相當效果，使中央在戰時財政負擔得了，今後和平建國，我們覺得應該改正。國父在五權憲法中的規定省長制度，但憲草中無此規定。去年憲政實施協進會研究結果，大家都覺得這個制度應該變更，省的地位要從新規定，一方面代表國家執行國家法令，同時省也是一個地方自治體，有其本身的任務，恢復過去理想中國家與地方的均權制度。

此外，尚有兩點：第一、憲草中沒有提到軍事，也沒有提到財政，周恩來先生說：選舉制度在憲法內也應有原則規定。立法院起草時，軍事財政本有專章，審查時認爲這是一種政策，要因時因地來變更，如果憲法硬性規定，兵役國防制度變更時，便須修改憲法，故未列入。

第七、一般研究憲法的多說人民之權利與義務的一章中規定的人民自由，都有一句「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主張應取消這幾個字。規定的自由，在平時原是无條件保障的，但如對外發生戰事時人民自由是受有限制，英國最講自由，但一九四〇年法國快崩潰時，邱吉爾組織聯合政府，向國會提出一個要求，國會通過授予特別權力，征調物資，資本主義國家對資產的保障是很重視的，在戰時就不能



不暫時放棄。許多國家的憲法，對自由無條件保障，但下戒嚴令時，可以將某幾條暫時停止效力。世界各國既有此例，中國行憲政時，是否採用由總統命令停止某幾條憲法效力的方式？我們認為憲法是根本大法，停止憲法某幾條效力，會動搖國民對憲法尊嚴的心理，怎樣才能避免停止條文效力，而使政府有權應付事實需要，政府必須有法律根據。所謂法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國民大會制定；另一種是立法院制定，立法院是對國民大會負責的。總之，五五憲草也許有疑問和缺點，這在國民黨方面不認為這草案是天經地義，不可修改，他希望的，就是中華民國憲政要根據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推行五權制度，一方面保障人民行使政權，一方面使政府有能執行國家政務。至於國民大會的產生組織，大總統職權，五院組織的方式及其運用，那是專門技術問題，可以從長研討，補充修正。

黃炎培氏以其參與憲政期成會及憲政實施協進會工作之經驗，認為五五憲草有重新研討之必要。並稱：研討憲草應持冷靜絕對客觀與遠見之態度。渠繼綜述各方對憲草內容之意見，並列舉應予考慮之問題，如：（一）人民權利之法律限制，（二）男女平等之具體規定，（三）五院制度，（四）總統權限及副總統與行政院長問題，（五）省長之民選問題，並贊同胡霖氏主張成立憲草委員會，聘請專家詳加研討。

沈鈞儒氏繼之發言，着重地方政權問題，渠詳述其當年參與天壇憲草工作時之情形，及當時渠對於地方制度問題之主張。最後提及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第十項「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渠表示應提出政治協商會議討論。

傅斯年氏謂：五五憲草係根據五權憲法之精義而擬定，此項憲法既為三民主義之憲法，則應表示三民主義之貫徹性，但其內容對民權之行使，與國內各小民族問題，均無特別規定。對於國民大會問

題，氏認爲此種制度因時代變遷，已有修正必要。渠建議如仍採五院制，可以立法院作爲下院，監察院作爲上院，運用各國兩院制之國會職權。兩院名稱可仍舊，惟職權擴大，不必有國會之名，但有國會之實，立法委員一部由國大選出，大部由人民直接選舉，監察委員由省議會選出，如此，則一面接受五權憲法之原則，一面實行兩院制之議會制度，兩者可兼顧。傅氏並認爲省區應加調整，惟反對聯省自治。

胡霖氏稱：三民主義，不但中國人不反對，世界學者亦不能認爲不對。然運用之法則應加考慮。吾人尊重孫中山先生之精神，但不必拘於形式。胡氏並稱，五五憲草可討論之處甚多，例如國民大會問題應否設立，大有考慮必要，蓋其職權本可由立法院行使，則何需此龐大之機構形式行使創制與複決權。渠重提昨日之建議，由政協會議或由政府設立憲草審議委員會加以研討，人數不宜過多，並限三四個月內完成。

曾琦氏謂：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故有其尊嚴性，渠主張組織「憲草審議會」，認爲憲法之性質，應爲柔性，並應採取內閣制，兩院制，五院制祇可保其精神，不可拘於形式。省制應採均權主義，確定省之自治地位。

楊永浚氏今日首次發言謂：地方應重于中央，自治重于行政，並強調省應爲最高自治單位，省長由民選，並確定中央與省之均權制度。

張申府氏提出三原則：（一）憲草須修改，須合乎國情、本國歷史、及世界潮流，（二）不祇顧及現在，且應開闢將來，（三）人民權利不應予以限制，並予以自由機會。

吳玉章氏謂：憲法之根本方針，應根據三民主義建國原則，適應世界潮流與中國情況，此爲大家

之希望。孫中山先生之偉大精神，亦應善爲納入憲法之內。渠繼提出以下原則：（一）保障人民權利，不應用普通法律限制。（二）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用孫中山先生均權主義，五院制度分割權力，殆等於無權，致總統權力太大。吳氏並稱：世界上最民主之國家爲英美，吾人將來可採用英美之國會制度，惟須參酌我國實際情況。（三）地方自治問題，省爲自治單位，省長由民選，依照孫先生遺教，制定省憲，使地方可自由發展。（四）在憲法上規定，軍事上採民主精神，非軍國主義精神，使軍人爲人民服務。文化與經濟方面，均應任其自由發展，不加限制。

李燭塵氏謂：「憲草中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問題，每以前者爲先，後者爲後。」李氏並特別提出應重視「民族資本」與「民族工業」之口號。以昨日張厲生氏建議由各方推定一人，對連日議題作一總檢討，決定待各小組協商後再提。

王逸今也有報導，亦可補中央社的不足，其文如下：

認真討論到百年大計根本大法時，情緒反見鬆弛了！也許因爲連日開會忽晨忽昏，疲勞已極，看看休會期到，大家不禁解放起來，所以當沈鈞儒說話時，聽不慣他那一口嘉興鄉音的，個個都昏昏欲睡。王雲五的眼睛時閉時張，傅斯年拿着烟斗在發呆，旁聽席上停住了鉛筆，耳語之聲一片。旁聽者傳遞紙片作樂，皆稱爲「疲勞轟炸」。

昨天討論憲章，這是一般討論中最後一個日程。

孫科在主席位上起立，說明五五憲章的立法精神，他特別強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一點；以法國爲例，法第一共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年間內閣更迭一百多次，議員與閣員忙着對付政潮，反把國事廢弛。一九三八年我從莫斯科到巴黎，我想向法國要求供給我們武器，作抗戰之用，但與法

政府商量了數星期，毫無結果。法國的條件是要我們拿飛機去換。我說我們的飛機現在也是蘇聯在供給，你們爲什麼不生產呢？他們却說：「你們可向蘇聯多要幾架，我們現在的飛機工業因爲受政潮的影響，一日只能生產一架，現在安南緊急，只怕不及增援……」這就證明法政府因爲政潮的影響而無能，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的迅速崩潰。

孫科又說：目前的五院，因爲上面還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以實在是無權的；但在憲實施後的五院則不然，權都很大，立法院也就等於議會了。

總統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行政首長，等於美國總統制，他的權力仍須受約束的，不過他有緊急處置權。

地方制度，省的地位還沒有定，五五憲草也以縣爲自治單位。這種中央集權制在抗戰中倒是一大支援，但到了建國時期，就可以不必如此。國父遺教也是要民選省長的，那時的省，一方面代表國家，實施中央法令，一方面有高度自治權，如省財政——這就是均權制。

五五憲草對國防與財政，沒有規定，因爲覺得它們是政策，需要因時地而改變的。對選舉制度也涉有規定，可以研究。

人民自由權利，「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一點，平時固可以無此條件，但在戰時，就需要了，比如英國在戰時下令徵用人民物資，就限制私有財產之權。又比如在敵機轟炸下，令人民疏散，就是限制居住自由。若無此種限制之權，總統固可停用憲法條文，但這會引起動搖國本的危險。

孫科最後說，五五憲草並非天經地義；希望在三民主義的原則下盡量貢獻意見。

黃炎培自作了「剝豬糞」的妙喻後，沉默了三天，昨天規規矩矩地講了一堆，他真可謂以善於譬

喻見稱：他說憲法好比一件衣服，要顧到子子孫孫都能穿。他另一卓見是要男女平等，「雖然不規定也是一樣，但規定了則可以安慰女同胞」！

沈鈞儒絮絮如老嫗，居然主張起「聯省自治」來，他說「在省說應是聯省，在國說就是聯邦，而且要有雙重立法，使省有省的單行法」。他更進一步來發揮「聯合」論：「過去省的委員制，拿來今日說，就是省的聯合制。」——這一套話，倒令人記起中共的一套、中共與地方聯合政府的主意來。而「聯省自治」也與中共新民主主義中的「民主共和國聯邦」有異曲同工之妙。

誰不知道「聯省自治」會造成了軍閥的割據，阻礙了中國的進步？爲國父深切痛恨？現在居然以「民主」的舊衣出現在今日的政治協商會議，我們像見到一個死去的幽靈在這裏發出呻喚！沈說話時，偏要說這是他老早的主張，大概要免人家疑他什麼。又偏要說「我個人的意見」，不知是否他要暗示這不是「民主同盟」的意見？

沈鈞儒的說話越說越令人迷糊，「十五省的共產政府要承認它們，並且要鼓勵它們」！——我不曉得，全世界也不曉得，從那兒來的十五省的共產政府。

旁聽席上有一位道：「天呀！我疑心我的耳朵出毛病了」！一位新來的來賓則問：「這個老翁是代表那一黨的」？

傅斯年怕人家聽不清他的話，故意站到會場中央去說，他以爲在三民主義精神下國會制非不能容，立院可以作爲下院，其委員可以由國民大會選出一部份，由直接普選一部份，監察院可以作爲上院，其委員由各省參議會裏產生。立法院通過法律，監察院加以審核，名稱雖異，實同國會。

說到省，他反對「聯省」，中國的文化是整個的不能分割，蘇聯因爲是一黨制，所以他可以「聯

邦」；中國憲政下若要「聯省」將來可能形成「地方黨的勢力」，這種地方黨如果擴張「聯省」也將成了中國建設的大障礙！主張省有自治地位，但必須縮小省區，方免藩鎮割據之禍，現在的省，至少應一分爲三。

胡政之和傅斯年的主張一致，他說：中國往昔的「聯省自治」，實不堪回憶。「聯省自治是國父最反對的，他說他親聽國父說過反對的話，所以聯省自治絕不能行」。他重提組織憲法審議會之議，人不必多，但必須專才。

接着青年黨提出意見，由曾琦發言。

共產黨吳玉章也發表了中共對憲草意見，他說得那麼原則而空洞，他叫大家去看他們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

## 第九節 三次延長會期繼續分組討論

（中央社二十二日電）政治協商會議原定二十三日閉幕，現因協商會尚未完畢，國民政府主席決定延期三日。

（中央社二十三日電）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委員會今日成立，下午四時舉行第一次會議，對各項問題作一通盤之檢討，並獲得若干協議，明日將繼續開會討論。茲誌該會委員名單如下：吳鐵城、曾琦、陳啓天、王雲五、傅斯年、章伯鈞、張東蓀、周恩來、董必武，召集人孫科。

（中山日報二十三日重慶專電）政府鑒於人民自由權利要求之迫切，二十二日舉行國防最高委員會，以研究廢止或修改有關人民自由法令，當決定分別將若干名政治犯予以釋放，除於昨日會後即

行將中共中央委員廖承志恢復自由外，並將於日內釋放葉挺等數人。（葉挺係中共新四軍軍長，於民國二十九年「天水事件」時因襲擊國軍被俘）。

（中央社二十四日電）政治協商會議分組委會憲草組及政府組織組施政綱領組，於二十四日上午下午開會，各項問題續有一部分獲得協議。明日仍由各小組繼續協商，並召集綜合委會第二次會議，不舉行大會。

（重慶專電）政治協商會議軍事組連日開會，爭論之點，為中共部隊整編後之調動問題。

（中央社二十五日電）政治協商會議，各分組委會連日開會截至二十五日止，計政府組織組開會六次，施政綱領組七次，軍事組四次，憲草組四次，國大組二次，綜合委會一次。頃悉：軍事憲草兩組今日協商完畢，對各項問題大致已獲協議。施政綱領組亦可望明日結束。其他各組則尚待繼續協商。又綜合委員會原定今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惟因多數會員參加軍事組及施政綱領組，時間衝突，故未舉行。

政治協商會議會期原定延至二十六日截止，惟政府組織及國大兩小組委會尚未獲得協議，須待繼續協商。頃悉：蔣主席已通知再延長會期三日，至二十九日閉幕。

（中央社電）政治協商會議分組委會政府組織及施政綱領組，今日上午開會，施政綱領組獲得協議已告結束。下午綜合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又悉：政府組織及國大組，定明日開會繼續商討。

（舊金山二十六日廣播）重慶悉：政協會綜合委員會今日下午舉行會議，以期在政協最後會議前解決餘下之問題。周恩來預料將在政協舉行最後會議之前，返延安聽候訓示。會議定星期一恢復。軍事、憲法草案及共同綱領之三小組委員會已達到圓滿會議，其他之兩小組委員會，今日整日會議，

討論改組政府及國民大會兩問題，軍事小組委會祇擬定廣泛之工作綱領，至於詳細項目，將交由三人軍事小組決定。關於起草憲法問題，各黨均贊成將用內閣制以替代美國之總統制，即行政院由國民大會選出，並對立法院負責。又贊成以美國為根據之兩院立法制，下議院由立法院組成，一半之議員由國民大會選出，其他之一半由總投票選出。監察院為上議院，其議員由各省立法機關選出。各省亦將仿照美國成為地方自治政府單位。

（中山日報二十九日重慶專電）政治協商會議之政府組織組，似以豁然開朗，中共已「有條件」同意國府委員二分之一為國民黨。

（中山日報重慶專電）政治協商會議政府組織組，協議國府委員四十人，五院長在內，國民黨佔半數，中共則要求佔十八人，國府委員由主席選任（提請國民黨中執會通過不作明文規定）。國府委員會對各部長有任免權，主席有提請複決權，但主席之緊急處置權取消。

二十七日討論國民大會問題，中共表示可能承認舊代表，但須經過各省參議會通過之手續，并希望保證在五五召開之國民大會，能通過政治協商會議所擬定之憲草。惟所餘之新代表產生方式，尙待續商。

（中央社電）政治協商會議原定延至二十九日閉幕，惟因中共代表周恩來陸定一二氏赴延安，尙未返渝，故今日未舉行大會，該會會期已決定再延長二日，至三十一日閉幕。

（中央社電）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大會分組委員，今日上下午連續開會，未獲協議，定明日下午繼續協商。

（舊金山廣播）重慶息：政協會之國大會議今日未獲協議，共黨要求四分一席位，國民黨佔半



數，其餘各黨佔四分之一。共黨及民主同盟要求三十五名。各黨代表所擬定之憲法草案，將不交由國民大會修正。國民黨要求保留十年前選出之九百名代表，并加上中央執行委員會當然代表。

（重慶三十日專電）政治協商會議決定請馬歇爾特使偕張羣周恩來飛各停戰區視察，即可成行。又：政府已令查出歷年被中共捕去人員，將要求中共同時釋放，葉挺將與馬法五交換。

## 第十節 愛國學生大遊行

各報記者目觀會議情形，已發生不少痛感，但怕部份會員又借題發揮，以遂其拖延時日的詭計，所以隱忍不言。中山日報記者挨到二十二日纔發表有限度的觀察數行，原只是例證之一。

（中山日報記者重慶電）政協會議一般討論結束後，據記者連日旁聽所得印象觀之：

（一）政府組織似最易成立協議：即國民政府委員會延請黨外人士參加，惟無用人權，此點為中共所爭，至名額分配，國民黨須過半數。

（二）政治綱領，中共所提出之和平建國綱領，高唱中央的與省的聯合政府，并建立聯邦與聯省自治，以圖保全其地方勢力，此為無黨派代表所反對最力，認係軍閥割據之還魂，此點政府亦決不讓步，但亦無方案提出，因認為此舉并非急需。

（三）軍隊國家化問題，尚須留待三人軍事小組解決。

（四）國民代表大會問題，舊選代表為主要爭持之點，可能商得折衷方案，即舊選代表有效，但五五所開之國民代表大會，為國民代表大會預備。

（五）憲草將隨以上現實問題解決而解決，政府亦不堅持五五憲草為絕對不可以修改者。

真誠愛國的學生青年，便忍不住了，就在二十五日舉行愛國遊行，妥求團結統一和平民主，促進政治會議成功，并抗議香港修築屏山機場。

（中央社重慶二十五日電）本市沙磁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工校、中大附中、重慶中學、蜀都中學六校學生，爲促進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及屏山機場與白爾丁號事件，表示抗議起見，今晨整隊徒步來城，謁見當局。首由政治協商會議祕書長雷震接見，六校代表陳述意見，雷氏當即轉陳。旋即會議臨時主席孫科，會員周恩來、陳啓天、張君勱、邵力子、莫德惠先後報告政治協商會議情形，及會議成功之必然性，并對於各校同學愛國熱情，莫不表示感佩。各同學旋即整隊遊行，至晚始回校。此次參加遊行學生萬餘人，沿途秩序極佳，態度尤爲嚴謹，行列到處，市民鼓掌歡迎。

（中山日報重慶專電）本市沙磁區大學學生萬餘人，二十五日舉行愛國遊行，對內要求永久停戰，政治會議必須成功；對外要求英國交還九龍香港，停築屏山機場，英國須撤換駐滬總領事，並遣使向我道歉。遊行行列長達三四里，先至國府草坡廣場間，人頭攢動，旗幟如簇，秩序井然。孫科等均對學生作報告；至周恩來報告停戰令已下時，衆高呼：「還沒有停！」。當時邵力子報告國大舊代表希望承認時，衆又呼：「要合理產生。」繼莫德惠作總答覆，莫氏謂：「垂老之年，未睹國家安定，至爲痛念！此次自東北歸來，父老亦寄語望治，如再不能和平統一，將無顏北返矣。」聲淚俱下，全場皆哭。繼即出發遊行鬧市，沿途高呼口號，觀者如堵，至英使館領事巷口時，羣情幾如暴風雨矣。

民情如此，總應有些顧慮，共黨代表周恩來於二十七日飛返延安報告，自然另有陰謀，但不能說與此全無關係。

（中央社電）政治協商會議，政府組織及國大組綜合委員會今日未舉行會議，定明日下午起繼續

協商。

（中央社二十七日電）中共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周恩來，今晨九時飛延安報告會議情形，聞周氏明日下午可返渝。

## 第十一節 決議案產生了

王遂今對全盤決議案的如何形成，也有綜合報導。

政治協商會議着重於會外協商，這是在開幕之日就已電告過的。十九日以前的九次大會，雖然爭論得非常熱烈，實際並沒有解決問題，而十九日以後，以迄三十一日的各分組會外協商，才把問題一一從最遠距離上漸漸拉攏接近，終至協議。

在這十二天的分組協商的過程中，我曾零星地報告協商的進度，這是公報上所沒有發表的，但仍不會系統地綜合地把這協商的內幕加以評述。現在會議已經閉幕，決議案已經發表，但大家對於各案怎樣從遙遠的距離上接近攏來，恐怕還是有興趣想知道的：

現在就我們所悉的，將此五案分述如下：

一、政府組織：關於政府組織，國民黨與青年黨均有提案。青年黨的提案中建議恢復中央政治會議的組織，他們認為國府委員會一向沒有實權，而中央政治會議在戰前是超乎國府之上界乎黨（國民黨中執會）與政府之間的最高權力機關，頗似戰時的國防最高委員會，青年黨怕擴大後的國府仍無權力，所以希望恢復中央政治會議容納各黨派，以代替國防最高委員。

協商時並沒有把青年黨的提案作根據，而以國民黨的擴大國府意見作藍本。國民黨方面，原案沒

有定出委員分配的比例，但說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又說要有三分之一人的連署始可提出建議。一時羅隆基輩必武都誤會增加三分之一爲國民黨外人士，覺得未免太少，而且無法提出建議。後經王世杰解釋，所謂增加三分之一，意思是要有府委四十八人，至其分配，還待協商的。這個府委名額的分配，就成爲爭執的焦點。國民黨方面堅持保有二分之一，中共則提出三三制的辦法，即國民黨，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各佔三分之一，國民黨當然不肯。在綜合小組席上，中共知道國民黨尤欲堅持的是國大舊代表之承認，所以又承認舊代表作爲國府三三制的交換。這問題膠着不得解決，直至某晚深夜，王世杰親訪周恩來，周亦剛剛接着延安方面的電報，同意國府委員四十人，內一半即二十人是國民黨，不過中共仍希望保有第二大黨的地位，要求佔有十人，國民黨允許其他二十人在會後協商分配。而五院院長爲當然委員，包括在國民黨的二十人中。

但在這裏，國民黨也讓了步。原案國府委會沒有對各部會長的任免權，現在有了；原案主席有否決國府委會決議之權，現在改爲提請複議權了；原案國府委會要對國民黨中執會負責，現在祇對主席負責，主席則對中執會負責（不作明文規定；原案是最高決策機關，現在是最高國務機關了；原案是三分之一的人連署始得提案，現在祇須三人連署了。）

關於行政院的政務委員會，設政務委員十九人，現有十一部三委員會，政委中除去兼部會長的十四人外，還有五人不兼部會；政委的五分之二，即七至八人，是各黨各派社會賢達來分配，而此七八人中，有四人不管部會，意思就是說，國民黨外人士將有三至四人是兼部會長的。此七至八人中，青年黨主張由四方面均分，中共則要求佔有三至四人，這一點，恐怕也須在會後繼續協商的。

二、施政綱領：施政綱領，大家都重視，大家都說，空有舞台和演員是不行的，必須還要有「脚

本」，中共提出一點「和平建國綱領」本案，但沒有完全作為協商的根據，只沿用了它的名稱，至于通過的「和平建國的綱領」九項，卻是集各方的意見而擬成，當然也採納了許多中共的主張。這個「綱領」，蔣主席在閉幕詞中祇單獨地提到它，其重視可知。

但在「國府委員會」中，有一條規定「國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行議決。某一議案，如其內容是否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發生疑義時，由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解釋之。」這一點，大家都以為國民黨既掌握了半數委員，始終可以對涉及綱領的案件，操着決定權。

以上的政府組織與施政綱領，是目前到憲政實施的「過渡時期」的辦法，這個時期，想來不至超過一年的。因為五月五日制定憲法後，六個月內就根據憲法選出新政府來了！

三、軍事：青年黨建議的「軍黨分立」「軍民分治」和「以政治軍」等辦法，迅速地成立協議。但問題膠着於整編辦法，中央軍隊已定六個月內整編為九十師，共黨軍也先行整編為二十師，且由軍事小組一月內商訂辦法，其後二月內整編完成。政府方面，在進行此項協商時，提出迅速整編方案，希望上兩項的整編完竣後，進一步就進行第二期的整編，即再將全國所有軍隊混合整編為五十或六十師，這一點，民主同盟也支持，中共雖原則上同意，但希望仍保持比例，而非「混合」。比如可以將中央軍再編為四十五師，共黨軍再減為十師，這一點正爭持頗久，但終將「混和整編」改為「統一整編」字樣，問題又要在會後再去協商的。在國防部一點上，也是個爭執所在。中共和民主同盟都主張設置國防委員會，容納各黨派人士，這也就是中共前所主張的「聯合統帥部」，國民黨方面沒有答應。折衷的方案，是國防部下設一建軍委員會，容納各方人士參與。這是第一期整軍完成以後才

設置的。至于目前，軍委會下也將設一整編考核委會，也容納各方人士參加。

四、國民大會：也許政治協商會議的主題還是在國大問題，當沒開始分組協商之前，會議兩次來討論此案，王雲五、邵從恩都提出折衷案來。無黨無派代表們，頗欲盡力在難題下，找一出路。

分組協商以後，王邵的折衷案並沒被採納。這問題困難重重，一直到除夕的前一日，方才取得協議，大家都鬆了口氣。其間折衝的經過，也無限的曲折起伏。

國民大會舊代表（九百五十名），中共和民主同盟願意承認其有效。但起初，他們祇肯承認這僅是國民黨一黨所選出的代表，用這個理由，他們也要求增加各黨派的代表名額，但青年黨認為這樣做不好，結果大家才承認了是民選的代表。

至于新代表的產生，起初，國民黨提出方案，新代表六百名，其中二百三十名，為國民黨代表，三百七十名由各黨派與社會賢達分配，這提案原已大體獲得各方的同意。但至二十八日，中共提出方案，要求新代表增至八百名，並主張各黨派與社會賢達要佔三分之一強，這個提案，國民黨也願考慮。但至二十九日，中共又要求國大代表總額內中共須佔四分之一，即五百名，同時民主同盟也要求五分之一，青年黨要求十分之一，因而問題陷入僵局，那一天上午的分組會議，也就不歡而散。到了下午，國民黨方面提出新方案：（一）不談代表總名額。（二）國大須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始可通過憲法。（三）各黨派的代表可佔四分之一強，但是仍無協議。至三十日，中共要求名額減至四百十五名，民主同盟仍要求四百名，青年黨要求二百名，莫德惠、錢永銘主張無黨無派也要二百名，仍然沒有結果。那天晚上淒風苦雨，記者奔走各方，欲探出一好消息來而終不可得。直至深夜，周恩來自延它趕回，與國民黨代表先作單獨協商，三十一日上午，才在分組會上，取得了最後協議，政協會議方

才急轉直下，豁然開朗，大會也遂得於這天的黃昏舉行。論者都以為這關鍵乃在周恩來之飛回，帶來了延安的指示。這最後協議是怎樣的呢？除已見于決議文中者外，新代表增為七百名，這七百名中國民黨代表佔二百三十名，共產黨佔二百名，民主同盟一百名，青年黨一百名，社會賢達七十名，但須再由國民黨共產黨商定，各讓十名予民主同盟，即國民黨為一百九十名，民主同盟為一百一十名。——這是在決議文中不錄的。

五、憲草：憲草因為國民黨方面對五五憲草並不堅持，而共產黨方面也似興趣不多，且仍須經過國民大會的制定，所以彼此較易成立協議。

但就「憲草修改原則」而論，各方批評很多，如傅斯年，他在表決時聲明願放棄表決權，因他有幾點意見要保留。

首先「憲草修改原則」中所採的是兩院制，立法院當作下院，監察院當作上院，並不違背五權憲法的精神。這一點，原為傅斯年最早所主張，但協議後的「原則」中，規定立法院「由人民直接選舉之」。傅斯年以為這樣的普選，太單純，太具地方性，因為中國的情形，人才集中於「一點」，而非散佈于「面」，立法院的職責重大，從「面」去收羅人才，恐怕還有不足，而有遺才之恨，所以必須輔以他種選舉方法，如職業選舉等，方能盡致天下英才於一堂。至于監察院之不同意見，他也認為須加明確的界限，以免牽掣政府。此一點，有些人以為監察權不能太大，因為國父對監察權的本意，僅在從旁監察而已，並不希望使政府的一能「多一重阻礙」。

其次，這個「憲草修改原則」所採的是內閣制，則似乎又與國父所創導且效法於美國的總統制不同。傅斯年即認為立法院對行政院的權力太大，可能造成政局的不安定。總統制的好處，即在使政

權有「能」，而內閣制因爲向議會（立法院）負責，往往易受牽制。法國第三次共和之閣潮連綿，是一殷鑑。

復次，關於省的制度，傅斯年主張不必有省憲。又主張省確定爲自治最高單位之前提，必須先將省區劃小。他說，中國歷代的地方制度，都是小的，「省」原是由中央制定，如「中書省門下省」是元清等異族統治中國所用的中央集權制，所以很大。但如今若就以這些大省自治起來，則由中央集權下的省，變爲地方自治下的省，是有危險的。這樣的大省自治，祇有蘇聯可以，因爲蘇聯是一黨制的國家，在中國則不可以，因爲中國多黨制下，可能造成「地方黨」的龐大勢力，成爲國家建設的障礙。最後，關於少數民族的自治，傅斯年主張在西藏等地可以行之，如果少數民族根本與漢族不可分，意識上也沒有分的必要時，可以一視同仁，不必硬性的予以分開。

蔣主席在閉幕式前說明一點：國民黨與各黨派間有一種諒解，大家要盡力促成這個憲草（即將根據此原則擬定者），將來能在五五召開的國民大會通過，但這諒解並不是脅制國民大會之意，我們只能提請國大「採納」，不能硬要它「接受」。

## 第七章 會議隆重閉幕

### 第一節 毋忘這一月份的末日

（中央社重慶電）政治協商會議，三十一日於結束最後一分組國民大會組工作後，下午六時半在國府禮堂舉行第十次會議，蔣主席親臨主持，討論各分組委員會報告，全部獲得一致通過。今日之



會，到會員孫科等三十七人，雷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後，蔣主席即宣佈開會，討論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各分組委員會報告。各項報告討論前，分由秘書二人宣讀主席訓詞，請各會員發表意見。各案均獲迅速一致通過，僅黃炎培、張厲生、董必武、李燭塵四人對和平建國綱領略有說明，莫德惠、傅斯年、黃炎培三人對憲草問題發表意見，傅、黃、莫之建議交付紀錄，俟提交憲草審議會研討。

每分組委員會報告通告後，蔣主席起立說明下列兩點：

(一)憲法草案組報告中所說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一語。此「採納」二字之意義，外間或有誤會，實際並不影響國民大會之權限，國民大會在行使其應有之職權時，自不受任何之限制，惟審議委員會自應充分研討，以備國民大會之採擇。

(二)本會議所通過之各案及施政綱領，是具有全國性的，全國各地不分區域，不分黨派，均必共同遵行；不論在各省區或在中共軍隊所駐在的地方，都應一律有效，以實現國家軍令政令的統一，確奠和平建國的基礎。以上兩點，特提出說明，望會議同人轉告全國同胞注意。主席詞畢，即宣告會議圓滿結束，旋舉行大會閉幕式。

(中央社重慶卅一日電)政治協商會議自本月十日起，舉行歷廿二日，共舉行大會十次，並分組協商，卅一日晚八時半圓滿閉幕。閉幕式由蔣主席主持，即席致詞，對該會議之成就，表示欣慰。詞畢，全體鼓掌，繼由中共代表周恩來，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青年黨代表曾琦，無黨無派代表莫德惠致詞，大會遂宣告圓滿結束。會後，蔣主席並與全體會員聚餐。

政治協商會議舉行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十日，結束於三十一日，應與奉命來華調解

國共衝突問題美國特使馬歇爾於飛抵重慶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並觀，因是日爲毛澤東自延安飛渝，並爲其「延安總部」下令各地共軍全面蠢動，且開赴東北，阻撓接收，破壞統一之日，適與翌年之一月三十一日共軍已進攻平津之事實相呼應，同有不容渾忘之因果關係在也。

## 第二節 蔣主席贊佩和平建國綱領

諸位會員：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經過二十餘次熱烈的討論，已經完成其應有的任務；今天宣告閉會儀式，本人以職務關係，不能每次都來和諸位交換意見，甚覺抱歉！回溯二十餘天中間，諸位會員無論在分組會商或全體大會，都能開誠布公，大家本着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實事求是的尋覓各種問題合理的解決，使本會議始終在祥和協調空氣之中，獲得圓滿的成就，尤爲本會議最可寶貴的收穫，本人虔誠希望這種公忠坦白的精神，能够永遠繼續下去；大家不爭意氣，不重私見，只是一心爲着國家，爲着人民而共同協力，則本會議的一切決定，必可順利執行，今後無謂的政爭，必可澈底化除，和平建國的目的，必可迅速達成；對於未來憲政實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顯光明。這是今天閉會之際，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應該特別提出來向諸位表示感謝！

原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造成獨立自由統一的民主國家。尤其要團結奮鬥來達成和平建國的目的。至於國民革命的對象，對外是在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是在打倒封建割據的勢力。以往推翻帝制，掃蕩軍閥，和此次八年抗戰，兢兢業業，堅苦奮鬥，唯一的目的，無非是求獨立求統一。先除去民主的障礙，以促成民主制度的實現。到現在掃除革命障礙，奠立民主

基礎的工作，已經初步成功。我們當前唯一重要的問題，只是如何確保統一，如何建立民主？換句話說：也就是如何實現三民主義的問題。我們要知道，這必須有確實的統一，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再會有私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來妨礙政令與軍令的統一。否則，無論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動。這樣的假民主，永遠不能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而且永遠成爲民主政治的障礙。因此，我們爲了要實現真民主、真統一，和平團結兩個條件，實在是我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國父臨終遺囑：「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國人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始終是服膺這個最高的遺訓；除了對於割據的軍閥和侵略的日本不得不用武力對抗之外，其他對於國內一切問題，不論遭遇任何嚴重形勢，總是抱定忍讓爲國的決心，不惜委曲求全，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縱使不得已而有軍事衝突，也只是被動的防衛，決不採取主動的行動。這因爲我們認定我們的國力民力，只可從安定中求保養，再禁不起任何戰禍的摧殘。所以每在危機一髮之間，都能化乖戾爲祥和，並且任何齟齬的意見，也都能融和一致，恢復到和平團結。已往這種經過事例，尤其是抗戰以來八年間的事實，國人皆所共知，毋待贅述。這就是我們今日所主張的統一民主和平團結的精神所在。而這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一本統一民主和平團結的大原則而進行，所以各種議案，都有可循可行的決定。我要坦白說一句，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五十年來國民革命精神所孕育陶鑄而成的結果，足使飽經憂患痛苦而急須休養生息的全國同胞，感覺到無限安慰，希望我們大家要把這四大原則，永遠作爲我們的信條，永遠照着這個信條共同遵行，共同努力，才可安慰爲革命抗戰而犧牲的軍民先烈，才不致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本會議開會三日，政府即頒佈全國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並公佈了

一月五日所協議的辦法，同時公佈停戰命令內容的全部與其附屬規定的四項條款，以示一致運行的決心。本會議開會的第二天，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並向會議詳細報告，因此本會議就能够專心致志來研究關於和平建國與促進憲政的各種方案。本會議所決定的各項方案，本人雖然不能每次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注意和研究，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果。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本人認為各案之中要算建國綱領為各種方案的基本之中心，因為此案從甲、總則，乙、人民權利，丙、政治，丁、軍事，戊、外交，己、經濟及財政，庚、教育及文化，辛、善後救濟，壬、僑務等各章的各條規定，均屬異常完備，確合時代要求，充滿了統一性，充滿了民主性，實在是渡到憲政時期最適宜的綱領。我們有了這個綱領，由中央以至全國各地的政府，由各黨各派與社會領導人士以至全國各地的同胞，都有了共同遵守的準則。尤其參加本會議的各黨各派，對於這個綱領既是大家共同商討，共同決議，而且就要參加政府，來共同推行。我們對全國同胞必須守信義、負責任，自身先從事實行動方面有切實遵行的表現；並且必須貫徹其全國性，使能普遍的實現。我以為有兩件事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鄭重聲明：

第一、本綱領既經規定「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所有現行若干由戰時法令與此原則有抵觸的，中央當然要修正廢止；同時我相信中共軍隊駐在地之內，自必同樣遵守這個綱領，解除現有的一切限制。至於在教育文化方面，又規定了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這一條對於我國教育文化的發展與求學青年良好環境的養成，更是十分重要。今後自由保障，全國無論任何地方，當然只有合於本綱領的一種法令，不應再有任何歧異和特殊的辦法。那麼今後各個政黨的活動，以至對政治的競

爭，儘可依照國家統一法令之應有的合法權利和手續，公開組織、公開進行，決不應該再有使用武裝暴動或者在各地秘密組織的行動。否則即是喪失政治的本質，破壞了民主的精神，不但違反了本綱領，而且阻障了憲政進程。我們如果要不愧爲民主國家的政黨，必革除自民元以來所有政黨過去一切不良的現象，才有建立現代國家的希望。

第二、本綱領丁項軍事一章，對於軍隊國家化的宗旨與規定，極爲切實。另外還有一個經過軍事組協商，而更詳細的軍事方案。我想我們既然迫切需要和平與統一，則綱領的軍事部份，實爲鞏固和平，完成統一的最大要素；政府對於軍隊整編問題，早經有所決定，已在着手實施，日前軍政部林次長並已向本會詳細報告，將來還要按照綱領與方案的規定繼續推進。至於中共方面的軍隊整編，自然也要依照綱領與方案切實整編；本來軍政令的統一，爲立國必需的基本條件，這不僅全國飽經痛苦的同胞所一致要求，也是各黨派所一再聲明認爲不可否認的原則。現在協商會議已有結果，綱領方面均經商定，我們當前最急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全國所有軍隊不分黨派，不分地區，都能聽命於政府的指導，以達到綱領所定軍令軍政和軍制統一的標準。這一點，我敢確信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決沒有例外的，惟有這樣確實做到，才能符合建國的要求，才能安慰人民的渴望。否則不僅大家參加政府涉有意義，而且和平團結也將沒有基礎，反而增加了國家的危機與政府內部的糾紛，這當然不是國家民族所需要，也決非各位會員和各政黨忠誠謀國的本意。

上面所說的兩點，確是本綱領能否全面貫徹的試金石，果能澈底做到，則全國各地秩序立刻可以安定，復員工作亦可順利完成。而本綱領其他的各章各條亦無一不可迎刃而解，圓滿實施，這是本會同人無可推諉的職責。今天我以最懇摯的悵忱，特別提起大家的注意。同時我個人誓必忠實信守這個

綱領，更必督責我們各級軍政人員恪切遵守。即使有時難免無心錯誤，或者督責不周，只要大家說明指出，無論我本人或是我的部屬，都無不誠懇接受，切實改正。我常常說：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質，不可只顧個人的自由，而侵略別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養法治的習慣，不可專責別人守法，而自己則處處置身於法外。我這幾句話，實在是鑒於我國社會對自由與民主觀念的模糊和法治與守法意識的薄弱。我認為社會沒有安甯便是國家沒有基礎，人民不重法治，必使種種罪惡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因之我上面幾句話實在是沉痛的呼籲。尤其近年以來，社會上和教育界所表現的這種弊端病態，更是深刻而顯著，長此不加改進，我們中國將無法自立於現代國家之林，諸位會員想必也有同感。現在我們政治協商會議訂了和平建國綱領，這一綱領是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責，以建立和平統一的法治國家為目的。我們大家為求發揮本會議的實效，開創建國的規模，心須先從我們自身負起轉移風氣的責任，樹立守法的精神，以作全國人民的楷模，那才可以完成我們對歷史對時代的使命。

最後我要趁今天會議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時候，將我多年蘊在心而沒有說的話簡單的向各位申述。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祇知獻身於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於現在抗戰勝利，這卅五年之中，所有革命戰役，無役不從，艱難困苦，無所不經，自省革命志願與應盡的革命義務，幸無隕越；對於國家和人民亦已盡了我一份子的天職，聊可自慰。今天不能說國民革命已經完全成功，但是剷除革命障礙的工作，確已告一段落。自今天起，國家完全進入建國大業開始的時期了，可是我們國家當此元氣創傷之後，國運前途的危難和建國事業的艱鉅，只有比戰前乃至戰時更加嚴重，實在不勝臨淵履冰之懼！幸而此次政治協商會議訂定了和平建國綱領，及各種有關問題的方案，建國初基已具，憲政實施有期，今後各黨各派的中堅份子以及社會賢

達都將參加政府，共同負起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大責。今後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责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這一個重大的責任，要交給各位同人和全國同胞來共同擔負。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確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誠，督促我們國家走上統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報答為革命抗戰犧牲的先烈，完成 國父締造民國未竟的事功。同時要求各位同人為國家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們在抗戰時期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誠團結，來擔負今後建國的责任，開闢我們國家民族光明燦爛的前途！

### 第三節 一個公正會員的正確觀感

政協的組織計有多種文件（一）擴大政府辦法（二）和平建國綱領（三）軍事問題報告（四）國大組織報告（五）憲草修正原則。這五項問題的決議經大會九次，政府組織組八次施政綱領組七次，軍事組四次，憲草組四次，國大組七次的大小會議，應該是圓滿的，尤其關鍵所在的軍事問題已經認真解決。可是，並非如此。

列入社會賢達方面的王雲五會員的「岫廬論國是」這本書中，已經寫出他對政協決議的觀感，他的觀感是公正的正確的，且摘述幾行如下：

一、在協商會議中，五組的協商結果，最失敗者無疑是軍事問題，因中共一貫保持其叛變目的，不論軍事問題有如何合理的解決，總不肯信守諾言，於是每次停火協議，轉成為中共敗退之護符。

在軍事問題報告中，所舉建軍原則、整軍原則，實行以政統軍辦法，及實行整編辦法，在原則上雖不免偶有遷就事實之處，大體尚無大謬。根據此一報告，軍事三人小組隨即商定並簽訂所謂軍隊整

編及統編基本方案，其內容遷就事實者更多，然使能切實遵行，尚可收和平建國之效，不幸爲中共所破壞，在簽訂此一文件之時，即已實施其憑藉武力亂之陰謀，所以在此一方面之成效，實等於零，算得是協商會議五種決議案中之最失敗者。

二、擴大政府組織，因中共與民盟之無理要挾，卒未依協商原議實現。及三十六年夏，局部擴大政府組織，除中共不參加，民盟中之民社黨則與青年黨及社會賢達共同參加，事前並依據政協議定之和平建國綱領，訂爲國民政府施政綱領十二條，由參加擴大政府組織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共同簽署，足見國民黨之尊重政協決議，雖於中共民盟拒絕參加時，仍努力予以履行也。

後來經過了正面和側面不少的協商，總算決定了兩個原則，其一：規定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爲四十人，國民黨以第一大黨占其半數，即二十名，其餘四方面合占二十名。其二：規定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對通常事項仍以過半數表決，但涉及變更協商會議所通過之施政綱領，則須有三分之二委員之贊同，始得通過。換句話說，對於此類重要事項之決議，少數黨派得聯合三分之一之委員行使其否決權。討論至此，已經迫近閉會時期，各會員亦皆精疲力竭，對於四方面合佔國府委員二十名之如何分配威主張於閉會後再由四方面自行協商，我獨認爲正如俗語所謂「打鐵趁熱」，不宜稍緩，蓋恐一經擱置問題轉多。

但蹉跎復蹉跎，國共分裂之形迹，由於協商會議閉會後一連串發生之事故，而日益惡化，其不能達成協議，亦固其所。

由於中共與民盟藉口共同控制否決權，堅持占有府委十四席，以致久未獲得協議。稍後中共又因局勢之進展，認爲不參加政府於彼更有利，民盟亦始終追隨中共，因之按照政協決議之擴大政府辦法



已無實現之可能。然由於國民黨之決心請求各方面合作，同時民社黨又脫離民盟，於是三十六年四月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連同無黨派人士卒組成擴大的國民政府。

三、再談和平建國綱領：在國民政府擴大組織以前，國民黨不斷與協商會議除中共以外的其他三方面商談，結果青年黨及無黨派人士與新由民主同盟脫離之民社黨均允於商定之國民政府施政綱領下參加。經於三十六年四月下旬由四方面代表五人共同簽署，其中綱領十二條中之第一條，明定「改組後之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之準繩」，是其尊重政協之決議已昭然若揭。……假使不是由於中共之搗亂，一切依照擴大政府組織之決議進行，深信我國的政治定然走上軌道，而實現和平建國之目標。因為我敢證言國民黨方面，尤其是總裁蔣先生，確有開放政權，與各黨派及無黨派合作之誠意，倒是行憲以後，由於中共之構亂益烈，政府為應付緊急危難，在措施上反不能充分遵行和平建國綱領所規定的。

四、政協決議影響最大者，莫如國民大會與五五憲草。國民大會由五五憲草所規定之龐大職權，一變而為無形國大，經會後繼續協商，雖然復為有形，其職權實已大減。五五憲草，經協商決議修正原則十二項，性質已大有改變。雖經會後之憲草審議與繼續協商，略有修正，惟經整理提出於制憲國民大會之憲草修正案，並據此而制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其接近於政協修正原則者，遠勝於其維持五五憲草之程度。

五、關於國民大會舊代表的有效問題，在第七次大會中，中共與民盟都力主國民大會代表應重新選舉。我獨持異議，謂「原有代表固然選出了多年，中共、民盟各會員多認為不能代表新的民意，但是國民大會之不能如期召集，其責任不在各代表，因處此抗戰之非常時期，甚至如英國之重視選舉，

其現有國會議員亦因戰事而特別延長任期。查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所定各代表之職責應於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集後解除，國大一日不召集，則其職責一日不能解除，國大之主要職權在制定憲法，制憲爲法治之基，倘以政治方式變更制憲代表的法律地位，不僅此例不可開，且原有代表倘以護法之名自行集會，豈不是徒滋紛擾？至謂多年前所選舉的代表不能代表新的民意，縱係事實，但也有一折衷辦法可以解決此困難，而仍能維持原有代表。查國民大會代表組織法規定有由政府遴選之代表二百四十六名，又規定國民黨中委均爲國大代表，而中委共有四百六十名，兩者合計爲七百零六名，皆無需選舉，可由政府與國民黨支配。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之目的，係因國民黨願還政於民，並容納各黨與社會賢達參加政府，推此美意，儘可將政府與國民黨所能支配之代表名額七百名，公平分配於各方面。加以各地方尚未選出之代表與原有代表之故或附逆者亦有若干名，與上述之七百餘名合計當有九百餘名，與現有之舊代表爲數大致相等。依此辦法分別遴選選舉，則代表新的民意者在國民大會中至少亦可佔半數。此項主張，自問對於法理與事實尙能兼顧，但當我提出之初，中共與民盟的代表固然立即發言反對，即國民黨人士在維持舊代表的大原則下，對於我的主張固然相同，然對於我所提的解決辦法，特別是把國民黨中委所占的國大名額另行分配，聞也有些人不很贊同。可是經過了國民大會組多日的討論，竟然脫不了我的建議，除各方面已接受我的建議爲協同的基礎外，原來主張全部國大代表改選最烈的中共代表祇好退讓一步，表示一切問題倘均獲滿意的解決，則對於承認原有代表一問題將不堅持。最後協商的結果，遂將上述的七百名遴選代表名額分配爲國民黨占一百三十名，中共二百名，民盟及青年黨各占一百名，社會賢達占七十名。

至於會議所以五次延長的原因，王雲五在該書中亦曾說及，話雖不多，已見中共方面故意刁難拖

延的一班。

因出席小組之代表，可以隨時更動，間有易人出席之事實，但如非必要，亦多專由一人出席，以資熟手。某日討論某一問題，四方面同一主張，獨中共方面持異議，最後中共迫於衆意，其出席代表周恩來不能不表示讓步，但託詞爲時已晚，原則雖無問題，文字可能需要斟酌，要求改於明日作最後決定。當時任何人均認爲可以達成協議，想不到次日續會，周恩來託故不出席，改以秦邦憲爲代表，而秦邦憲則託詞周恩來並無交代之言，僅以電話囑其出席，於是一切謾爲不知，重新開始討論，耗費三四小時的脣舌，毫無結果。於是各方面始恍然於中共所提隨時可以易人出席之議，竟懷有此種深意。其後又開會一次，擬對本問題繼續討論，周恩來仍避不出席，由秦邦憲參加，仍無協議，其陰謀益昭然若揭。

由於中共方面之時而倔強，時而狡展，民盟方面分子複雜，間有持正者，然多數均與中共一鼻孔出氣，於是除余與王亮老大都主張相同外，青年黨代表多能持正，往往發生舉足輕重之作用，尤以陳啓天爲然，因之，中共深有恨焉。某日討論某問題，秦憲邦竟對陳啓天破口痛罵，啓天憤而退席，並聲言今後青年黨不另派代表出席。後來經其他三方面極力調處，中共迫於衆議，微露歉意，啓天始復出席。局勢如此，憲草之協商改善，迄於是年五月間各人復紛紛復員東下，所能獲致協議者殊鮮。

### 第三編 坦途與陷阱

#### 第一章 中共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 第一節 戰略性的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共黨的魔術雖變幻百出，但只要臨之以周深適捷的戰略戰略戰術，彼即無從施其技。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所以能靠策略成功，並不是真由於其策略神妙，而實由於民主國家政略戰略戰術過於拙劣。例如它慣用的聲東擊西，避實擊虛，以少勝多，以密勝疏，以速勝緩，以恫嚇代實戰，以分化代圍攻，以佯退代苦鬥，以議場代戰場，無一不是由於民主國家給它以儘可這樣幹的罅隙。即就越戰舉例，亦俯拾即是。越南二十年戰爭，民生慘苦，美兵徵召艱辛，民意紛歧，雙方均缺乏長期戰爭的決心與準備，顯不同於中俄越共長期鬥爭的布置，惟有速戰速決，纔能不被這種情勢所困敗。可是美國的戰略則以戰求和，戰略則以戰迫和，戰術則反擊有限度，都與情勢所需要的對策根本相反，共黨也就樂得擴大這一相反的程度，毅然決定其「繼續戰爭」的政略，實行其「以戰迫退」的戰略，大搞其以游擊戰疲撓敵兵的戰術，並以此游擊戰破壞敵方的農工生產，打擊敵方的財稅收入，加重敵方的難民負擔，使敵方愈益損失長期戰爭的條件。像這種對敵方弱點的利用與擴大，實已超越詭譎的魔術之上，而為其勢所必行的適當策略，在根本上已使美越方面先輸一着。即就魔術論，美亦愈學愈敗。例如共黨搞分化，美就在西貢分化其被認為不聽命的將領，甚至容許倒斃其總統，而反使共黨獲得再分化的

便利。又如中俄共援助阿聯，美即分援以色列與阿聯雙方，冀其互相對立，造成均勢，又使蘇俄取得再分化它們的機會，挑起以阿第三次戰爭。在中俄越共是用機動的戰術，以配合其既定的政略戰略，圖獲事半功倍之效，而在美國則是在政略曖昧搖擺的基礎上，追隨效法敵人變動不定的戰術，期望獲致萬一之效，如何不着着失敗！

但既疏忽根本，亂舞枝葉，如果舞的對勁，亦未嘗不能補救萬一。亦即是說，敵人的魔術雖多，總是百變不離其宗，只要能看出其宗旨所在，亦即政略或戰略所在，自能把它的魔術各個擊破。就中共論，它用以迷亂對方耳目的重要工具之一，即是和談，而其決定不變的政略，則在其軍隊與地盤的保持和發展。例如它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三日提出的談話要點，雖分列為十一條，但除「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的第四條是主題，第九條第三項計共四款，與第十條從（一）到（八）計共八項是主文外，其餘都是陪襯文字。所以商談雖歷十次，而十分之七八的時間，都用在軍隊與地盤的爭持上面，總得你目眩頭脹，希望你急求了事。你如不上其當，它便在陪襯問題上信口亂扯，扭做一團，希望你在疲勞之中，放鬆了主題的拒絕。當時它的目的雖沒有達到，但已有了兩種收穫，一是備戰必需的時間，二是嫁罪政府的依據。

今日越共困擾美國的手法，直與中共相等，以前它會堅持美國必須先行接受其四條件始允和談，其後雖似讓步，只須美國「首先無條件停止轟炸，結束其危害北越的所有戰爭行動，和談便可開始進行」，然其用心則更險毒，一在騙得喘息的機會，二在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三在加強美國境內反戰的壓力，四在麻痺美軍的鬥志，顯然是「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至一九六六與六七年之間，它的策略已收效大半，北越總理范文同就提出較此苛刻百倍的和談條件了，事見本書第三編第三章第二節

## 第二十九項第十二目中。

越共可能有一天走進會場，但它在會場中捉弄美國的伎倆，會和中共以前擺佈中國政府的作法不同麼？這問題，已可從華盛頓郵報評論中得到解答。該報早曾說過，「你怎麼和像中共這樣國家談判呢？當你有許多話正待啓齒，而又碰到種種迫使你投降的條件時，教你從何開始說起呢？你說容許它進入聯合國吧，它說要驅出中華民國的代表，要撤消一九五一年所通過的譴責它是韓戰侵略者的決議案，要排除所有帝國主義者的傀儡國家，要乖乖地修改聯合國憲章，要美國向它道歉。你說要和它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吧，它提出的條件是美國要在越南撤兵，要退出台灣，美國又怎樣和它談判呢？」該報所說的，又早有事實作證，它在華沙會議席上不是如此亂扯過十多年麼？它今後在越南和談席上又怎能不如此亂攪？你如不先在戰場上贏得戰爭，便休想在議場上贏得和平。然而詹森總統除表示願意談判北越提出的四點原則外，並表示即使提出十四點乃至四十點亦願商談了。這除非別有勝算，或另有苦衷，否則除認清中共政略的和談魔術外，還須對照一下它在中國得逞的和談戰術。

### 第二節 戰術性的和談魔術今昔對照

中共最了解「道無術不行」這句話關係的重要，故對於和談的本義，既確定其爲戰爭的另一面，研幾其一定可以取勝的種種技術，並已收其巨效於中國。其術雖可歸納爲十六種方式，但其藉此以達到的政略，則不外軍隊與地盤的保持和發展，只要隨時記住它政略的所在，決不使它達成，則它儘管用什麼障眼法，總是「作偽心勞日拙。」

(一) 欲取姑與：其所謂與，不僅是先與後取，並且是虛與實取。例如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

中共代表提出談話要點的第一條，便寫明「實行三民主義」，第二條又寫明「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何等恭順、動聽。其餘九條與其各項各款，不是全與第一、二兩條的原則及意義完全相反，把這兩條的規定從根拔除了麼？這和以往舊式帝國主義者與中國簽訂許多條約的程式，開頭總是寫上「尊重大清帝國主權領土的完整」，其餘便都是侵略性質的條款，不是完全相同麼？中共這種騙人的言語文字，周恩來在其後政治協商會議席上更不知用了多少次，他在第三次會議中所說的「一般方針的解決，我們始終認為是『雙十會談紀要』的主要成功」，自己早已從談話要點的第三至第十一項中陰消了第一第二條最主要的方針，而偏說為「主要成功」，這成功的不是中共是誰？這不是「先與後取」並且是「虛與實取」是什麼？

比這更狡展的，是反過來玩，就是先取後與的一種最厲害的巧取。例如中共在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二十日提出二十條的要求，六月三日又提出十二條的要求，其後又口頭提出八條，最後雖減為十二條，但內容仍與最先提出的二十條無甚差異，直和奸商惡賈一樣，極盡討價還價的能事。今日美國急想跳出越戰旋渦，不惜從無條件和談改為有條件和談，從遷就北越的四點原則後，並曾表示可以增加至十四點四十點，何其不怕夾纏拖延一至此極！北越提出的「一、承認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三、由南北雙方自謀越南的和平統一」，已與過去中共對中國政府提出動聽的好話一樣，它如真個加提許多點，則其糾纏的程度，將更狡惡於周恩來王若飛的嘴臉，至少亦必借題發揮，將其第三點與美國第九點「贊成在南越舉行自由選舉」相配合，誅求不已，非達到由「民族解放陣線」代替西貢政府統治越南的目標，便決不簽訂協議，簽了亦不算數，這都是意中事。

（二）力爭重點：「槍桿裏出政權」這句話，是中共最得意的經驗之談，所以它第一件決不放鬆

的，就是其軍隊的保持及發展。在它尚不便公然發展其武力時，並且還需要與政府和談時，便逐次增加其軍隊數量的要求。例如在抗戰之初，它自稱在陝北有兵八萬人，政府會准它編爲三個師共四萬五千人，這已從寬發落，寬到超過了它的實有數量。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林彪到重慶時，還只要求十至十二個師。三十三年五月西安商談時，他先求編爲四十七個師，旋求編爲六個軍十八個師，後求編爲四個軍十二個師。同年六月，林祖涵到重慶時，又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三十四年抗戰結束後，更要求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在三年之內，要求逐次增加到四倍，其間雖有時減少，亦僅是姿態。

當時政府雖相忍爲國，逐次容讓，如在國民參政會開會期間，已允許它編爲十個軍十二個師。抗戰勝利後，因需普遍裁軍，曾想縮編共軍爲九個師，旋因它已提出四十八個師的要求，即仍守四個軍十二個師的謊言。又因它在其他各種問題上勒索不已，又再允許它在軍令統一的原則之下，除十二個師外，尚可增加數個補充師，但亦未獲同意。它的主要目的，林祖涵在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向國民參政會第十三次會議的報告中，已自動說明「現在的重點是軍事」。而對於服從軍令軍政理應統一的根本原則，則絕無表示。周恩來自覺理屈辭窮之時，雖在三十四年九月的第七次商談中，表示可以減爲四十三個師，又在第八次商談中表示可以考慮上年所提五個軍十六個師之議，但其迄無誠意使之達成協議，僅於最後一次的第十次商談中，同意另設小組商談此事，姑且收兵，另圖發展。

尤可憂痛的是，周恩來在第七次商談中，竟說「中共軍隊軍餉糧秣等供應，一部份由生產自給，其餘只好取之地方」，已不啻自白其匪行的一斑。其所謂「生產自給」，要不外「蘇俄在中國」第一二一與一二二頁內紀述的「走私貿易」，「產銷鴉片與私發偽鈔」；其所謂「取之地方」，要不外在同頁中指出的「非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衆，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製販嗎啡等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民衆血脂。它這種殺民養兵的暴行，王若飛且毫不諱言，曾在第七次商談中悍然說出「中共軍隊即令不獲中央承認，不獲中央接濟，亦必能生存發展」。正因其忍心禍民盜國，民國三十五年間，國共雙方雖會商定，「第一期國軍從三百五十四個師縮編爲九十個師，共軍縮編爲十八個師，第二次國軍再縮編爲五十個師，共軍再縮編爲十個師，政府就照這樣實行了。但是他不僅沒有縮編爲他自己承諾的十八個師乃至十個師，反而加緊動員，儘量擴編。」（蘇二七五）

越共願意縮編其在南越的游擊隊，與在北越的大量部隊麼？即使願意，它的指揮者中共能允許它麼？中國政府已被顛覆在滿載軍火匪餓的車輛「和談車」下，越南有何幸運而不蹈其覆轍？要是癡夢重重，更想拉攏中共參加世界裁軍會議，怕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敢擔保，最懂得魔鬼把戲的魔王也會大搖其頭吧。

中共同樣不放棄的是地盤，已被佔據的固然力爭，未被佔據的也說已經由它解放。在它提出的談話要點第九條第三項內，即要求佔有五個省及一個邊區的全部政權，及六個省與四個直轄市的部份政權，已經是野心勃勃，亂開花帳。在第二次商談中，王若飛又張大其辭，說它們「有十九個解放區」了。及張羣在第五次商談時，問到「所謂十九個解放區，究以何者爲界限？共有若干縣？」周恩來只得說，「我此次未帶材料，但我等所提五省中除山西外，其他河北山東等省，幾全部皆爲解放區。」在第六次商談時，王若飛更說「我黨的軍隊集中於淮北及黃河以北的地區，乃爲一大讓步。現在海南島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皆有我黨的軍隊。」及張羣指說「兄等所謂淮北，尙有範圍，至於黃河以北，則包括的地區未免太廣。」王雖稍斂辭鋒，但依然信口開河地說，「我黨在淮河流域與蘇北皆有解放區，其他浙江湖北以及廣東與海南島等地，亦有若干縣。」此時邵力子也說，「你們所謂解放

區，總共究有若干縣？」王自然也 and 周一樣，說了一句遁詞，「今天因爲手邊沒有攜帶統計表冊，暫時無法奉告。」

他們並且始終表示，中央如不能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就只有實行第九條第三項開列的「解放區解決辦法」，用這兩面鋒刃，箝制政府。中共要把佔據地作爲進佔全國的基地，要把佔據地的軍權政權財產作爲顛覆政府的資本，都已昭然若揭。

中共這樣的爭軍地盤，本是採取列寧世界革命的策略，而與一般軍閥養兵拓地的目標絕對不同。列寧認爲「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京經過加爾各答的」，黃河以北各地正是進入北平最近的路，越南又正是經由中南半島進入加爾各答最近的路，中越俄共怎肯放棄？它們正在東南亞的關鍵地越南與美國鬥爭，又怎肯停手？何況越南比韓國更爲重要，東南亞各國的複雜脆弱，亦遠不像當年中國及南韓的堅強單純，中共尙能攫取大陸，攪亂韓國，豈肯反棄更易攫取更爲重要的越南而與美國和解？當年中國和談代表加上馬歇爾將軍尙未能限制其擴張，現在又有什麼長策或辯舌能使它收斂其侵略的野心？要是它忽然指使越共進行和談，也仍祇是其迂迴戰略的運用，以前列寧在席捲俄國以後，不出匈牙利平原直攻歐洲，却指示要採取大迂迴的戰略，繞道亞非兩洲回到歐洲去，而他竟成功了，今後中越共若竟活用其教訓，以和談爲不戰而取得回到印度洋大西洋的輕便機會，豈不比戰爭更爲有利？

(三) 巧護主軸：中共所提十一條中第四條的「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是它決不放鬆的主軸。爲了保護這力能轉動並且捲入一切的主軸，曾在第九條第二、三兩項中明擺出兩大武器，一是在全國「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省縣市長，二是由其推荐「解放區」內的省主席或副主席與直轄市市

長或副市長，並在十次商談中不斷提出聯合政府、民選地方政府、中央加委「解放區」縣市民選人員、保留解放區維持治安的「解放軍」、及重劃省區等主張。它明知在政制法規與事實各方面都窒礙難行，一如張岳軍氏在第九次商談中的逐一指出，但依然力爭，並且表示逐步退讓，一如周恩來在第九次商談中的表示，極盡其舒捲自如的伎倆，以同護其視同生命的主軸。總使國家一無所得，它們毫無所失，並且更有所獲。其謀略的作用是，要是爭得聯合政府，則外可見好各方，內可攬覆政府。要是爭得普選全國地方政府議員，則不但可以使其非法的「解放區」政權變成合法，並可在全國選舉競爭中混水摸魚。要是爭不到全國普選，亦可退而保持其自認為經由選舉產生的「解放區」縣市長。要是此事亦爭不到，便先進後退，索性要求推荐省主席或副主席、直轄市市長或副市長，候靜政府還價到「承認解放區政權」這一步。又要是「解放區」的承認仍爭不到，即爭名異實同的重劃省區，使其變為合法的割據。最後要是都爭不到，收穫也已經豐富，如已經爭取到整補其軍隊的時間，爭取到國內外浮慕民主自由者的同情，爭取到懈弛國軍戰鬥的意志，延誤國家動員戡亂的進行之類。要是政府不上其拖延戰略的當，不被其贖日持久所貽誤，又可以提出人多口雜的黨派會議，使政府仍為其所誤。要是此計又不售，還可以提出政府較易接受的政治會議，除同樣可以獲得其需要爭取的時間以外，並可藉此擾亂國家既定的大計。又要是此計仍失敗，還可以改頭換面，迫政府接受權力較小的政治協商會議。他們這套萬變不離其宗的設計，在名稱上儘管步步退讓，而在其操縱之下，仍可使其作用膨脹，直膨脹到與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一樣。如果政府不上其當，主張分別解決各個問題，仍可祭出其法寶，使軍事政治兩大問題無可單獨解決。即令他已走到無可躲閃的地步，還可以無中生有，再造新事實，另提新問題，使舊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的商談，中共把解放區問題與軍隊改編問題，扯在一起，分進合擊的情形，固然可在這紀錄中看出。其繼此而起的商談，更是節外生枝，枝外生葉，使前後談判，由此一概否定，而其要求談判的作用，則已完全發生。例如「在談判裁軍問題時，共黨最後必另提政治問題爲裁軍的先決條件。民國三十五年，中共與我們談判整軍時，他同時提出政治問題，就是要成立政治協商會議與改組國民政府。但是他最後又要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持有否決權。在談判軍隊數字時，共黨必使其對方減低其所保留的軍隊數字。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亦可以減低其自己的數字。等到其對方實行縮編其軍隊的時候，他的軍隊並不縮編，更加緊其軍事動員。」（蘇二七五）又「在談判撤兵時，共黨只求其對方從其所保持的撤退。到了對方已實行撤退時，他却提出一個政治條件，作爲他拒絕撤退的口實。這個政治條件，就是他撤兵之後，必須維持他佔據時期的政治權力。民國三十五年，中共與我們政府談判蘇北問題時，他答應從蘇北撤兵，但要求政府承認他在蘇北的行政組織。」（蘇二七六）

共黨都是不達目的不止，萬變不離其宗，並且愈變愈狠的惡魔。在過去，中共雖知和談是通往聯合政府的捷徑，是發展軍隊地盤的過程，但亦知國府決不會中其計。在其後，中共雖曾竊喜哈里曼於一九六二年三月間跑往寮國，以停止每月三百餘萬美元援助的壓力，迫使傅彌將軍等接受日內瓦會議的決定，容納寮共成立「三頭馬車」式的聯合政府，但它已知美國借鑑於波蘭、捷克亡於聯合政府的覆轍，並經常防止寮共的顛覆，或不致又在越南做聯合政府的舊夢。在今日，中越共雖決不放棄其在南越已有的地盤與武力，但深知此非西貢及華府所能同意，而又不能再將聯合政府作爲工具，只得索性把戰場搬到華府，以昇高美國左傾份子的反戰空氣爲燃料，以「種族問題」「窮人問題」爲直接製造華府煩擾、間接達成它們交易的爐灶。它們灼知黑白事件是白宮最頭痛棘手的問題，便誘使愚

蠢的黑人和騙取選票的政客在各地大放其野火，既把美國人民注意越戰的心力拉回國內，並把擴展實力的佈局在南越北美同時並進。又抓住詹森政府消除貧窮的主張，予以利用，一面誣囑白宮救濟他國而不幫助本國窮人，使詹森不易解釋；又一面煽動黑人整日不作事，拚命生孩子，使美國政府社會不勝負荷生育救濟金的重擔；總使其陷在各方齊起反感的窘境之下，遷就越共在地盤武力方面的爭持。它更早知美國的越戰政策是「保護南越，不攻北越」，便一面設法使劇烈的戰爭都在南越進行，務使南越人民在家破人亡之下加緊反美，又一面拖長越戰的時間，務使美國政府在軍民厭戰之下更想撤退，而皆以迫使美國遷就共所提的條件為鵠的。這些作法，不但巧護主軸，力爭重點，並且極盡其化整為零，將計就計的能事，顯較以前施之於國府的，奸厲幾倍。

更有一項美國親受其教已有一百三十三次之多的事，那便是中共與美國從日內瓦至華沙的會談。在這會談中，主題雖有「外長會議」與「不使用武力」兩項，但談了十多年，卻始終不放棄其以「武力奪取台灣」的基本目標，而其中忽退忽進、忽此忽彼的幾幕表演，尤見其魔術玄妙的一斑，這豈是直心腸、呆手脚的美國佬所能望其項背？

（四）虛構事實：周王二人在十次商談中，都似言之成理，無非因其持之有故。其故的一小部份原成於他們的非法行為，而其大部份則為虛構，或為小部份事故的任意擴大。這在民國三十三年間的國民參政會中，已迫使張治中也不能不提出他與王世杰答復林祖涵信中相似的措詞，「來函所說中共在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徹底實行了三民主義，又說在中共的一切區域內，一切人民和抗日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但有許多事實，迫着我們否認。即如民主與自由，國父遺教欲以五權分列為民主的正軌與人民自由的保障，中共區域內可有司法權監察權獨立的事實？中共區域內的人民

乃至共產黨員，可有言論自由身體自由的保障？」故他們所謂已有一百二十多軍隊的事實，所謂解放區內已有民選議會與政府的事實，所謂已有十九個解放區的事實，全都是步步狡展，多多益善的說法，你既不能一概否認，他亦阻撓你實地調查。他們所以如此說，並不真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問題，迫使政府承認他們的各種要求。他們亦並非不知會遭政府的拒絕，而只在爭取其所需的時間。正因為他們的作用在此，所以詭計多端，不但經常虛構己方的事實，有時還掩護己方的事實，更抹煞對方的事實。借和談以掩護他們的叛亂，借三民主義以掩護他們的共產主義，已不待言。他們把政府迭次忍讓的事實，概不發表，只宣傳政府排除異黨，說政府中全是「死硬派」，亦早為中外耳熟能詳。而張治中在不得已中，向參政會公佈他與王世杰答復林祖涵函內的「何以說是一字不提」一語，尤足看出他們抹煞事實的程度實已到了他們的同路人亦無法為諱的地步。

爲目的不擇手段，只要便利於其達到目的，亦會削改歷史事蹟，杜撰自然界定律，作爲衛護其政策實現其野心的證據。蘇俄在一九三八年特別編行的學校教科書「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短篇教程」中，尙祇是對於史達林的政敵絲毫不露推崇的跡象，只想使人感覺列寧的主要幕僚人員大都是「賣國賊」或「破壞者」，其中惡魁便是托洛斯基。及將史達林的「作品集」不斷加以補充後，又寫成史達林對於布爾什維克運動大獲全勝的貢獻，不但不低於列寧，並且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實際策劃人籌備人，列寧則在韜光養晦。爲了黨的路線而削改歷史，並不限於「短篇教程」，整個蘇俄的過去，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也都經過重新安排，以求人民更能支持史達林的政策。最驚人的歷史改編，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例如齊斯多夫上校在紅星報上發表的專文，竟說英美轟炸德國的效果是零，他的結論是，「能够單獨作戰，而且不假任何外援，便能完全消

滅德國作戰機能，從德國侵略者之下，完全解放歐洲的蘇聯武裝部隊，迫使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得不急忙派軍登陸法國。」他更說：「英美部隊登陸法國的目標不在擊敗德國，而在趕先一步，怕蘇聯完全解放歐洲在前。」在其他一些雜誌中，也都如此云云地宣傳擊敗了德日義資本主義大集團的，是單獨作戰的蘇聯，英美只在故意延緩第二戰場的開闢，而暗中仍在援助納粹。「真理報」更荒謬竟說原子彈的轟炸，是在恫嚇蘇聯，是因為蘇聯對德國風捲落葉的勝利，使他們氣憤而蠻幹。

文學雜誌尤其偷天換日，除特用「戰爭販子布萊德雷將軍」的題目，亂說他的部隊由於蘇聯已在東部發動攻勢，所以在西部根本未遇德軍抵抗以外，甚至說，「義大利的馬可尼居然將蘇聯公民波波夫所發明的無線電無恥的據為己有。德國的西門斯不折不扣的偷取了蘇聯公民雅哥必的電碼系統。來特兄弟居然篡奪了莫夏斯基的光榮。發明電燈泡的不是愛迪生，而是雅布洛其可夫，電燈泡原來就叫作蘇聯燈。波朱諾夫發明蒸汽引擎，遠在史蒂芬生以前。建造第一艘輪船的，也是蘇聯人，不是福爾敦，早在十九世紀初葉，第一艘潛水艇便在蘇聯海中浮浮沉沉。一八五〇年，外國人所稱之為『奇怪機器』的東西，便已在沙拉托夫出現，這就是第一個牽引機，是一個名叫布利諾夫的蘇聯人製造的，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早。製造鋼板的捲筒法也說是蘇聯工人派亞托夫早在一八六幾年便發明了，但是一遇外國人便叩頭的腐敗沙皇官吏們，竟冷心的把這個發明賣給一個外國公司，以後反作為英國的發明，轉賣給沙皇政府。」此外，說成屬於蘇聯的其他各種「第一個」，計包括質量不減定律、氣球、自行車、內燃機、坦克、雷達、電視、人造橡皮、螺旋推行飛機、配尼西靈，和一大堆其他東西。又甚至為求自然科學的理論必須配合黨的路線，亦竟改變了自然科學的定律，例如農業學家賴森科，不經過科學的實驗，就反對染色體學說，反對孟德爾與摩根的調查結果，蘇俄政府也就指責那些

尊重孟德爾與摩根學說的人爲「對西方布爾喬亞顛倒崇拜者」而予以整肅，並推崇賴森科的定律爲社會主義的結晶。

有其父，必有其子，毛酋也就依樣畫葫蘆，其黨徒更亦步亦趨，把「毛澤東語錄」視同「短篇教程」，把捏造的「雷峯」「王杰」「焦裕祿」「麥賢得」等勞動英雄，視同波波夫、雅哥必、莫夏斯基、雅布洛、波朱諾夫、布利諾夫、亞托夫；把抗日戰爭的領導與勝利謊稱係毛酋之功，由其日報雜誌於每年的紀念日撰論發表，把「毛澤東思想」說成爲創造萬物、主宰人類的上帝，同於漢朝末年黃巾賊煽惑愚民時所宣傳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還不是師法大騙子史達林厚顏無恥的行爲，並效尤大流寇黃巾賊荒謬無恥的嘴臉麼？

像這些篡改歷史、製造新聞、虛構自然界原理定律的故事，已够怪誕了，而更怪誕的是近年來不斷在美國日報雜誌上載過的所謂「胡志明走廊」或「胡志明小徑」，誰不知其爲要命的鬼路，可是誰又會想到北越竟會不承認有此一條路的怪事呢？誰又會想到以往曾使法國棘手、現在尤使美國頭痛的這條路，河內電台却多次描述「這條路是虛構的東西」呢？其故意「實者虛之」的伎倆，實與其故意「虛者實之」的騙術更爲詭譎，這都是天真務實的美國人民連做夢也沒想到過的吧！共黨這類騙術，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早在其著作的「欺世大師」中寫的甚多，美國人即使不讀蔣總統著的「蘇俄在中國」，不讀我發表的這份「國共商談紀錄」，總得讀一下胡佛先生的大著。有此準備，纔能了解今日越共所謂「民族解放陣線」的名實，亦纔能在將來的和談席上料定越共將如何虛報其「解放區」「解放軍」的數目，本此預定對策。

（五）慣佈烟幕：鐵幕在使外面人永遠無從看到它的真相，烟幕在使對方一時誤認它的謊語



假事爲真話實情，這本是共黨慣弄玄虛，常以色相迷人的祖傳法寶。馬克斯以物慾迷人心知，列寧以偽裝潛入俄國，史達林以改造黨史哄騙人民，中共亦以種種假相掩蔽其種種奸惡，真個是講張爲幻，粉墨登場！

只在十次商談中，中共所放迷亂各方心目的烟幕已甚多。例如毛澤東表示，「如政府堅持舊代表必須有效，則中共與政府不能成立協議，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國民大會」，其後周恩來并在政治協商會議第八次大會中重申毛語「這話是說過的，說了的話算數」，話雖如此，事却完全相反。周說，「倘依去年我黨的提案，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成立聯合統帥部，則我黨一切軍隊與政權，皆可交與政府處理，如此時我黨仍保有一點特殊性，即爲我黨的不對」，話雖動聽，明是欺人。又說，「中共在某一省，如無集中的黨員，與擁護我黨的人民政權，僅推荐一主席，殊無意義」，這就不但暴露其「仍保有特殊性」，自己取消了前言，並顯出他們決不放棄其「共黨政治」，而與王若飛說的「有了中央政令，還須因地制宜」，同一用意。在十次商談中反覆說的「河北、山東、察哈爾、熱河四省，以及山西的大部份，綏遠的小部份，早已實行民選，自鄉區而縣，皆有民選的議會與政府，」共黨居然在戰時就有民選的的議會與政府，真是天大的謊話，用「民選」作烟幕，則爲他們慣用的伎倆。自由、民主、平等、獨立、團結、統一、和平、自決，所有現代政治社會中神聖而又時髦的詞彙，原都是他們製造烟幕的材料，本不足怪。今日美國的「和平之鴿」，假使能飛上北越「赤色之門」，所能聽到的將盡是這些聲音。而且北越提出的四點和談原則，已經塗滿了「獨立」「主權」「和平統一」「自行解決」種種美妙光色，完全與周、王所提談話要點第一條中塗滿「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等名詞一樣，則他們將來在會場上所說的，決無不與毛、周、王所爭的獨異之理。

且專放迷人烟幕的中共，於今更工於此道了。其所用「遮蓋布」式的烟幕，則已有沖銷南斯拉夫記者報導的新例。這位記者寫的「中共七月政變內幕」，經貝爾格萊德的「政治報」揭載後，即一面驅逐該記者出境，一面編造許多篇由賀龍策畫發動的「二月兵變」來遮蓋掩飾，沖淡這件事的真實性，並意圖把所有反毛反共「兵變」「政變」的事件，歸納成一件事，而擬將羅瑞卿、王恩茂、蕭勁光等數十高級將領，連同彭真、陸定一等一網打成「黑幫」。又有五一勞動節一幕，毛幫企圖掩飾其文革一年後黨政軍分崩離析的事象，便在中外記者目觀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中，故意使被整肅的黨政軍人員亮相，使人認為這些人已經悔改前行，仍團結在毛的左右。尤其狡詭的是，不斷在大字報中，故意擴大毛俄交惡情形，企圖轉移國內外視線，激起大陸人民愛國情緒。又在大字報中，擴大宣傳美國內部的不合作，同於法國在奧邊府失敗時的巴黎情形，務使河內膽壯，西貢氣餒。如此烟幕百出，真是由來已久，於今尤甚。只有眼睛已被赤燄薰瞎了的西方鴿子，纔看不出它的真相，識不透它的真意。

（六）倒栽栽證：在多次會議中，阻撓和談成功的明明是中共，它却向外宣傳政府沒有誠意，袒庇中共的明明是美國，它却多方指責美國對它歧視，務使國內外人更壓迫政府接受它的各種要求。被它傾陷者如予以反駁，則其強詞奪理的聲音更高，並密造事件，嫁禍政府，必使政府懾於輿論，不得不更予遷就。如政府不屑與之辯，則各方的迷亂更甚，它更得操縱易惑難明的羣衆，羣起與政府爲難。十九年前中國政府的顛覆主要由於外界是非的顛倒，並非戡亂政策的錯誤。如謂錯誤，則亦屬於未能糾正社會是非觀念這一個重大問題方面。昔人謂「社稷不保，僅爲亡國，是非不明，則爲亡天下」，向和俄共一樣以世界革命爲職志的中共，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先變亂是非，纔能顛倒衆生，於是就在這方面加緊下手，所有趙高指鹿爲馬式的、項莊舞劍式的、秦檜莫須有式的、潑婦罵街式的、

酷吏栽贓式的各種誣陷政府的魔術，一齊搬出，搬之不已，國民政府的江山也就被它搬到手了。它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抗日戰爭前夜，為什麼仍然否認民族性，強調階級性，根本抹煞了人類共有的民族意識？就在準備把中國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以便其出賣民族，製造其俄共傀儡的政權。它這指鹿為馬式的詭辯，居然能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尤其使蘇俄認為孺子可教，更顯出其經驗，助其完全成功了。它在政府對日本正進行不共戴天的浴血抗戰期間，為什麼時常散佈謠言，誣蔑政府與日本祕密進行和談？就在使國內外相信政府準備對中共發動內戰，所以要對日妥協，並相信真正抗日的是中共而不是政府，企圖由此獲得盟國的同情與援助。他這種莫須有式的栽陷，特別使史迪威將軍信以為真，羅斯福總統也幾乎被它顛倒，倘非蔣委員長真金不怕火燒，硬與白宮力爭，則中國早亡於一九四四年間，中共的竊據大陸，已提前了五年了。它在政府已痛感和平無望，只得用武力戡亂的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為什麼造佈謠言，硬說政府求它和談？及一般人也誤信國家非和談即無出路之時，尤其在它已將俄交日軍武器到處射擊之際，又宣傳政府加緊內戰，直說「蔣總統下野，纔有和談」，目的就在歸罪政府，推倒領導中心。它這種項莊舞劍式的、潑婦罵街式的、酷吏栽贓式的宣傳戰，戰之不已，居然戰到衆生顛倒，美國迷惘，蘇俄鼓掌，大陸變狀。

今日中共倒栽贓證的技巧，比以前更毒，它怕越共接受和談，影響它的贖武擴張主義，就宣傳美國是戰爭販子，是劫掠海盜，是弄和騙子，要越共作戰到底，把美國拖死。它怕蘇俄與己為敵，與越共為友，就宣傳蘇俄是帝國主義的幫兇，是馬列主義的叛徒，是與美國合謀屠殺越共的兇手，務使共產集團都背叛蘇俄，而奉它為盟主。他自己要延長越戰，便說蘇俄誘使北越投降，由此劫持俄越。又怕蘇俄假借援助北越名義，插手東南亞，分享其獨吞亞洲的一杯羹，即又設計栽陷，就在蘇俄假道

中國大陸運輸援共裝備物資這件事上，射出一箭數鵰的毒矢，一面截留各物自用，或換成劣品運出，作爲蘇俄並不認真援越的贖證，又一面迫使蘇俄物品改走海道，促成美俄海上衝突，要是蘇俄不願上當，願與中共在這件事上謀求妥協，它亦可在其中取得外交上政治上縱橫捭闔的利益，而使美國危疑震撼，更不敢升高越戰。

總之，他自己企圖或正在這樣幹，便硬說對方陰謀或已經這樣幹，如對方沒有一些跡象足以證明其如此云云之時，便再捉弄對方釀成事端，以實其說。它這樣蓄意害人的行爲，奸狠如蘇俄，已對它有「扶亂坑死登」的痛感。（「扶亂坑死登」(Frankenstein)是莎雷夫人所著 Frankenstein 小說裏的人名，係一研究生理學者，曾手製一怪物而賦以生命，其怪物終至以怨報德而加害於其創造的主人。）而臭味絕不相投，却又異常天真的美國人，怎能和它鬥爭？

（七）得寸進尺：共黨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除非世界全部赤化，并且赤化在中共的手中，所以中共對政府的要求，總是得隲望蜀，得寸進尺。他們在這種野心勃發之下，儘管行與言違，甚至言與言違，亦恬不爲怪，且自感得意。例如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林祖涵致王世杰張治中的信中曾說：「提示案與中共六月四日正式提出的意見，相距甚遠」，但纔過七日（六月十一日）的信中則說「與西安商談的意見略有出入」，而八月三十日的信中却又說，「政府提示案與中共書面所提之十二條與口頭八條，原則上相距太遠」，三封信說兩樣話，自相出入，連到張治中也不敢不在參政會中公開他和王世杰的覆信中語，「中央提示案對於去歲林彪師長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見，已經大部容納，確係絕對真實，但先生依然強調距離太遠。可是距離遠的原因，不外是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較去年林師長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十二條又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來函又於十二

條以外，加上所謂口頭八條，要求既與時俱增，距離乃不能不遠。例如陝北邊區和所謂「其他抗日根據地問題」，林師長所提爲「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爲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簽字的文件，並未列入「其他抗日根據地」；中共所提十二條中，則要求承認「陝甘甯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先生來函則更以「陝甘甯邊區政府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的承認爲言。此種逐漸變化，逐漸擴大要求的情形下，倘商談不能接近，其責任究在誰方？」再如在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日，周恩來既在致詞中說，「軍事衝突停止了，纔能很好的談到政治解決」，又說：「有了和平團結的局面，三民主義的統一基礎，中國纔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普選」，而事實則在政協開幕之日，中共並未停止其武裝叛亂，並且在他們破壞和平團結的現狀之下，就高喊普選。他們所以如此云云，無非想粉飾其得寸進尺的狂行而已。

美國不明中共行徑的少數人士，今正在迫使其政府遷就中共的若干要求，如果遷就有效，那麼以前中國政府早已無數次的遷就了，效在何處？要是認爲談總比不談好，那麼已經談了十多年來的華沙會談，還不是徒然便利中共的進退自如，更加造成美國的進退兩難，坐令他們更得備戰的機會麼？事實很清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周恩來說及中共可與美國坐下來舉行談判「以緩和遠東的，特別是台灣的緊張局勢」，這是一退。但又接着表示「他的政府支持蘇聯關於召開十國會議討論台灣問題的提議，亦願考慮召開會議的別種基礎」，意在提高自己的地位與美俄英法等國相等，這是緊跟着的一進。八月一日美共代表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會談，雖然繼續談了七十三次，却一無成就。及九月十五日，移在華沙繼續談判，舉行第七十四次的會談中，中共代表宣稱「所有被中共拘留的美國人民都可釋回」，這是二退。但又立即要求進一步討論一些實質問題，並且提出先行討論解除禁運，與舉行高

階層會議，亦即外長會議，除仍圖提高其政權的國際地位外，又希望獲得美國的重大物資，這是二進，更非美國所能接受。十一月三日的第七十五次會談時，中共代表王炳南便逼迫美國接受其要求，十二月一日又提出一件聲明書的草案中，表明美國亦須作放棄使用武力的保證，企圖美國永不用武力解決兩國間的一切爭端，這是三進。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美國針對其總統抽象的文字，提出具體實質的對案，中共的真面目既被揭破，便惱羞成怒，忿然發表一個聲明，索性說出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沒有過問或保衛台灣的權利，這是四進。一月二十二日美國也發表了一個聲明，駁正中共的觀點，並指明不對台灣使用武力，是中共已經接受的原則。四月十九日，美再提出一個雙方共同聲明的草案，殷望中共與美國共同聲明不在台灣海峽或他處威脅或使用武力，中共則更反對，決不願在聲明中觸及台灣問題。五月十一日的會談中，中共便又提出了它的草案，用「決心以和平談判解決兩國在台灣地區的爭執，而不對對方威脅或使用武力，雙方當繼續會談，以期在兩個月內，探求獲致實際可能的方法，以實現這個共同願望包括舉行中美雙方的外長會議」等措詞，一在爭得美國永不對它威脅或使用武力，二在爭得其國際地位的提高，三在爭得美國承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與不干涉其內政，四在爭得美國在限期內接受其要求不再拖延，不但含義甚明，並且在其草案中增加了要求和文字，這是它的五進。美國雖在當日就提出答辯，並重申其四月十九日的草案中「並不妨礙任何一方實現其政策的和平試驗」的意義，但本此意義看，已無異暗許中共可以要求歸併台灣，惟只能用和平方式，極盡其遷就的能事，可是中共的答覆，一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用三十萬發砲彈猛轟金門，威脅台灣。二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國「展望」雜誌刊出周恩來對美國親共記者史諾的表示，不僅要美國退出台灣，並須退出亞洲。

這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的一年內，中共就在會談中作出三次假退，五次猛進的事實，真正是傳襲了蘇俄的衣鉢。蘇俄總是自己先決定了一個最低的決不讓步的目標，再與西方國家談判。與之談判者如要求它作部份性的解決時，它即認為對方已經氣餒，立即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使對方震驚失措，它更可以從容收穫。不想今日美國若干知識份子與國會議員以及各國和平搨客，連這種極清楚的事例也竟不管，仍在迫使美國政府與越共和談，並連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胡志明在其給詹森總統的覆信中，提出比原提「四項條件」更進幾步的「五點立場」也似不知，豈不可悲！認真說，共黨既企圖把美國佈置在全球的反共實力，趕回到白宮的牆邊，則美國亦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少把越共的侵略勢力消滅，把中共的火頭吹回到北平的中南海邊，把蘇俄的兇鋒推回到克姆林宮的牆邊，纔是使世界進入和平的要途，亦是無可再退的腳步，無可再低的目標。

（八）無限鬥爭：只要可以鬥智爭勢，就不論何時都漫無限止的幹去，這也是共黨慣用的會議戰術。在國共十次商談的開始時，周恩來便不主張就談具體問題，只主張「頭四天任意交換意見」，即已在程序上運用其拖延的戰術。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始討論實質問題時，自應依照各方代表共同決定的議程，專門討論「政府組織」，可是中共的啦啦隊民盟代表張東蓀一開口便撇開主題，扯到「實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的另一問題上去，雖經青年黨代表會琦指責其非，周恩來不但置之不理，並且索性扯到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楊虎城被拘的舊事上去，白開了一天的會議。中共這種操縱程序的戰術，自然也是師法蘇俄。在與蘇俄談判時，一開始就必然會因程序問題而大起爭執，諸如坐次的排列，主席輪值的次序等等，照西方人看去，都無關宏旨，但蘇俄代表却時常為此展開序幕戰，甚至爭到面紅耳赤，不歡而散。要是與之談判者認為與其在程序問題上多費時間精力，不如留在實質問題上

用，便姑予遷就，則將使蘇俄誤認爲對方軟弱，待到討論實質問題時就更強悍。且議程的準備，一到蘇俄代表手中，又常會變成重要的實質問題，其危險更甚。如果不惜與蘇俄爭到底，則不但它的態度更將惡化，並會使局外人發生兩種錯覺，一即誤認爲引起如此激辯的議程問題現已獲得協議，則談判已有成功的希望，由此鬆懈了西方人民的戒備。二即誤認爲蘇俄既這樣認真討論，它確有解決問題的誠意，由此愈信可以與它和平共處。當西方外交家愈感覺這種軟硬俱錯，進退兩難的痛苦，它就愈可在這個矛盾中進行其無限度無範圍無止境的鬥爭。中共在此道上，更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觀。它早把談判本身視同另一方式的戰爭，所以它在談判一開始時，就採漫無限制的鬥爭原則，務使談判的形勢比終有結束一天的武力戰爭更險惡，談判的結果比戰爭更於它有利，因此也就抱定主張，使談判的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亦永遠不關閉重開談判之門，永遠要保留一個爭執。華沙會談的既無結果，亦不關門，更是最具體的例證。

越共及北越即使表示願意談判，其談判的開始與結局，亦決不會改變故轍。何況它們早已在程序上佈就爭端，「民族解放陣線」必須列爲和談代表之一，就是程序上的一顆定時炸彈。應付這種局面，絕不是美國之長，美國外交家向不習慣縱橫捭闔，美國人民一向缺乏堅定忍耐，對於任何爭執，總希望儘量使其迅速獲得和平解決，即令是一個不完全的解決，亦認爲和平已經獲得，較有利於美國。蘇俄看透美國這種弱點已經五十年，中共亦已二十餘年，越共亦已從中俄共方面輸入這種經驗。除非美國亦已有此認識，決定在完全消滅中俄越共擴張勢力之前，決不與之和談，至少不在越共未滅、北越未敗之時，依然進行戰爭。否則美國落入和談陷阱後的無限災痛，更將比今日的有限戰爭嚴重的多。

（九）吸擴外國：共產黨本是垃圾堆，並且是最能發酵生菌的垃圾堆，正因爲它是這樣的體



質，而塵世上政海中又偏多垃圾份子，它又工於吸收，長於製造，也就左右逢源，無入而不自得。它擴張聲勢，增加實力的祕訣，主要是「騙」「打」「黏」「挖」四種。例如它的暴行明明比法西斯主義還要可怖，却滿口都是自由民主，它的禍國明明比漢奸還要險惡，却滿口都是抗日救國，它的游擊隊經常是游而不擊，甚至是串同日軍襲擊國軍，却反誣國軍與共軍作對，政府與日本妥協。如此的反覆宣傳，務使厭戰的人民，尤其是好奇的人士信以為真，或明或暗的聽其驅策，這就是它的「騙術」。例如它要掌握青年，就先爭取力能影響青年的煽動性作家，他若不受利用，就打得他投降。中共曾譏笑魯迅的自由主義，痛罵他的「阿Q正傳」，用百犬吠聲的戰術，把他圍攻到體無完膚；他經過了一年的圍擊，終於接受了他們早已準備着的王冠，而他所寫的阿Q，也就不再是「對羣衆形象的歪曲」，而成了「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階級英雄」；一九三〇年代中國青年的轉向左傾，他是個重大的影響，這就是它的「打術」。例如共黨向視各種幫會爲封建組織，幫會亦與共黨勢同水火，但有時爲求掩護共幹的行動，也就設法黏附上去，然後再把幫內份子黏帶過來，抗戰時期，各淪陷區青紅幫徒作他們的耳目供他們奔走的事不少，就是它「黏」的本領。例如他們發現政府各機構內合其條件的各級人員，就運用聲色貨利的刀子，把他們挖走，抗戰時期被其挖去的人不少，他們亦視此爲最有效的挖空對方心臟的「空心戰術」。他們用這些方法爭取到的若干人中，雖自知其作用不很大，可供利用的時間亦極短，但只要這些人有一些用處就決不輕易放過；例如周恩來王若飛在談到政治會議的代表人數時，立即主張應多至三十七人，又主張「其他黨派的參加政府，最好以民主同盟的方式包括之」，並攫取機會，自願效勞，表示「候與民主同盟接洽」，就是他們細大不捐的例證，是無孔不入的統戰訣巧，同時也證明他們早和民主同盟的關係絕不尋常。

共黨是成型的垃圾堆，其外圍分子則爲塵埃，它到處飛揚，既不易看清，也無從捉摸。國民政府掃蕩垃圾的努力，雖然歷時三十年，可是更需要肅清這種塵埃的認識，尙感不足，所以終於元首蒙塵，人民塗炭。於今越共所說的「民族解放陣線」，顯然是滾入南越的垃圾堆，它們遇着張嘴機會，一定誇言尙有同志許多，應予承認，若予否定，又一定亂罵南越政府是什麼東西，美國是帝國主義，吹起這陣旋風，把游離在越南境內的塵埃，捲到它們的身旁。不惜身染骯髒，而願與越共垃圾堆和談的美國人，如不先斷定越共本身的灰堆究有多大，并阻止其堆外的塵埃飛人，待塵頭落定以後，再作計較，便必然墮入它們佈就的塵網，教你永陷塵劫，但不知美國已經造成一套必需的垃圾箱和吸塵機沒有？

(一〇) 威脅辱罵：自己疑懼，不敢硬幹，只是虛作恐喝的話，使對方懾服，或破口謾罵，使對方難堪，是共黨外強中乾時常用的慣技。周恩來王若飛在十次商談中，既主張政治會議討論的事項，爲(1)和平建國大計，(2)施政綱領，(3)各黨派參加政府問題，(4)國民大會問題，(5)復員善後問題，使它成爲權力廣泛的組織，又企圖硬性規定它的職權，使政府難於更調院部會主官，想脅迫政府轉而考慮他的聯合政府方案。周又接連說出「我等對於中央此次受降區域與受降任務的規定，自始即表示反對」，「中央空運部隊前往受降，我等決不贊同」，「中央除由海空運輸部隊之外，若要利用鐵道，則我方決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視」。王更說：「最近上海方面的同志，幾次要求暴動，皆經我黨壓制，故未實現」。如此的極盡威脅，和他在第八次商談中的血脈憤張，強詞奪理，握拳擊椅的表現，同樣是「恫疑虛喝」一如蘇秦揭穿秦國對韓魏的姿態。這本是蘇俄的故智，其作用自亦不離蘇俄的範疇。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的外長會議中，對於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即開始實行其「辱罵外交」

(The Diplomacy of Vituperation)。維辛斯基在聯合國中，亦儘量用嘻笑怒罵的姿態，向全世界宣佈美國的「罪狀」。在他們已知威脅無效時，就改用辱罵，用外交家向未聽到的野蠻話，把對方罵的狗血噴頭。並預計其這種語氣，至少可收到四種作用：一是使對方在被激怒之下，亦以惡言相報之時，會失去冷靜判斷的理智，而其自己則面目雖甚猙獰，頭腦仍保寧靜，自信可以收得操縱議場之益，在事實上亦確是如此。二是冷嘲熱罵的語言，經常可以達成有價值的宣傳目標，使會場外的廣泛聽衆都認它是理直氣壯的一方。三是它本不想在會議席上解決問題，常想借此獲致備戰的時間，如果對方也竟跟着對罵，它的遲滯戰術便完全成功。四是它在開始時即已抱定其一切不讓步的原則，必吵罵到對方讓步或會議決裂時纔止，對方讓步則它已勝利，不讓步而至會議決裂，則它又可歸咎於對方。而且它在實行其辱罵之前，早已決定一個限度，以進到戰爭的邊緣爲止。故其辱罵的技術，已成爲一種藝術，一種科學，一種必勝的戰略。

文明的美國人，向沒有蠻罵他人的習慣，外交家突遇共黨此種陌生的外交作法，便頓感驚詫，只此已輸一着。鄙棄罵戰採用兵戰或用嚇阻戰，美國自有資格，但像今日所行的嚇阻措施，不但從共黨看去，直是「班門弄斧」，即艾森豪將軍亦已看出。他前在蓋茨堡時，就對幾位新聞記者說過：「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他就任總統時，韓戰正陷於困境，他很感煩憂，就請印度總理尼赫魯告訴中共，如果中共對停戰協定再不同意，他將以美國一切武力包括原子彈攻擊中國大陸，中共衡量結果，韓戰於是結束。」一位記者即詢問他：「如果今天再來使用這樣的壓力於河內，你以爲能對中共發生嚇阻作用麼？」他搖頭說：「不，我以爲無用，韓戰畢竟是過去很久以前的事了，情勢已經變遷了。」而且當前的事實，亦已經證明其爲無效。前年八月，詹森總統爲了越南問題，不是曾向國會提出一個授

權案，請求國會支持他在東南亞可以使用一切武力，國會也會決議熱烈支持麼？又不是下令轟炸東京灣，作為嚇阻政策的具體表現麼？結果怎樣，不但中越共不受嚇，反更兇悍。一九六六年詹森在新年國情咨文中的大聲嚇阻，更何嘗有一些新效力。如說有，那便是美國反被中越共嚇壞了，否則為什麼到處叩頭，請人去向中越共說好話？事理顯然，你既暗示他們不用怕，他們就反而叫你怕，更加發揮其恐怖主義。一九六六年紐西蘭白皮書公佈的就是例證，白皮書指出，在一九六三年中，被越共謀殺的平民一千五百人以上，政府官員五百人以上，被恐怖份子襲擊受傷的計共八千人以上，被活捉的計共七千人以上。一九六四年中，最少有一千八百名官員、教師、村長被刺殺，另有一萬人被俘虜。其後更肆行無忌，直向華府進行，正當魯斯克國務卿與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萊特舌戰時，轉播聽證會情況的電視台，也傳出恐嚇性的電話，說要狙擊魯斯克，害得保安人員不能不採行緊急措施。情勢既如此發展，除非美國決心實力對付恐嚇，否則誰也不敢保險暗佈在華府的刺客暴徒惡棍不會造成林肯總統那樣的遭遇。

（一一）鑽隙奇策：共黨本靠鑽隙得天下，列甯乘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即將失敗之際，偷入俄境，襲取政權。史達林乘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部隊復員「心理復員」(Psychic demobilization)均已完成，無力抵抗蘇俄之際，曾在德奧義等處，劫得許多權力。中共效法蘇俄，亦乘人民厭戰，美國迫和之際，襲取大陸。它們有隙即襲，無隙亦用滲透分化手段，造成並擴大可乘之隙，任何和談更是它們攻瑕抵隙的最好場所。在國共十次商談中，中共往往在政府代表已允考慮其某種意見後，即認定政府的立場已經動搖，有隙可乘，便突然提出另一要求，使政府招架不暇。例如政府既允延期召開國民大會，他們即又突然要求增加三分之一的代表名額，甚至主張三三制，不准超過三三分配名額者

當選。政府既反對設置北平行營，他們又突然提出範圍更廣大的「北方行營。」又如其後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政府已允改組國民政府，他們又突然要求保有否決權。即使奇襲失敗，他們亦已外博勤求和平之名，陰收拖延戰術之利。它在軍事上曾恃游擊戰術獵取勝利，在政治上沿用游擊手法破壞和談，今在中東又正利用阿以軍事對立，美俄英法政策各異之際，煽動阿聯長期抵抗以國，美國如仍不悟和談是「養癰遺患」的毒菌，豈不是「自貽伊戚」？

情勢極明白，越局和談如果意外實現，中越共必施展其神出鬼沒的魔掌，向各方偷營劫寨，教你忙於招架，反把主題拋棄。在議場中，必擴大其四點原則的解釋，如不得逞，必突然製造新事件，構成新問題，迫你遷就其新解釋。在越境內，必乘彼此談到相持不下之時，破壞停火，忽向盟軍奇襲，效尤日本特使尙在華府談判，而日軍已偷襲珍珠港的作法。在越境外，亦可能近則奇襲泰國邊區，遠則密聯韓共突擊南韓，更遠則在中東或非洲縱火，使國際救火隊的美國，弄的焦頭爛額。若復希望蘇俄參加談判，那又恰與引誘中共參加國際組織的結果相同，除非各國消防史上已有縱火隊參加救火隊而能撲滅火災的記錄，否則祇有使火更燎原。爲美國計，惟有任何時期總不予敵人以可乘的縫隙，纔能杜絕敵人任何方式的奇襲。亦惟有從頭瞭解蘇俄的政策是向各地經常不斷的探襲，首先沿邊週界上試探，直至找到弱點之後，它的權力即從那裏襲入，中共亦是如此，纔會灼知絕不示弱，是必然得勝的戰略。

(一二) 玩弄諾言：在共黨的詞典裏，諾言就是謊言，一諾可使對方感覺輕鬆，降低鬥志，一謊可使對方墮入圈套，由我操縱，它真了澈「騙死了人不償命」的意義。最工於此道的是蘇俄，最善學蘇俄的是中共。俄國歷史家克琉柴夫斯基在其評述俄國十七世紀民主的文中，早就指出「莫斯科沙皇

御下諸貴族人物的民主方法，常常教外國駐蘇大使們一籌莫展。尤其是那些希望開誠布公直截了當的處理事務的大使們，他們深深的抱怨莫斯科外交人員們的心口不一，作事操切而無恆，以及提出諾言，破壞諾言的輕率。假如要不落其彀中，單祇認為他們是在撒謊是不够的，你還得要衡量一下他們撒謊的目的，及如何去衡量這個目的。

「當他們的撒謊被你道破時，他們也無絲毫愧色，嗤笑一聲，算是答覆。不管談判之點大家已經如何地確定，如何同意，如何說明，一到必要時，他們總可以橫生枝節，找出方法來減輕原來協議的力量，甚至於青天霹靂的重新提出一個方案來。」在帝俄時代已是如此，蘇俄繼起更甚，最慣於使用這個技術的是維辛斯基。最能給它一針見血的便是美國前駐德國總司令克萊將軍，克萊對柏林封鎖事件曾說，「蘇俄政府似乎能够俯拾即得的找出理由來，證明他們破壞諒解或諾言是合理的」。美國在與蘇俄打交道至今，雖曾成立了五十二個協定和條約，現在只有二個尚未被蘇俄破壞。它所恃的理由是什麼？美國外交家當然知道，為什麼不能對它據理力爭，亦都了解，總不外「非我族類，無理可喻，只好歎氣」而已。以前中共的迭次破壞商談結果，破壞停火協定，其後中共在華沙會談中的多所要求，迭毀承諾，都與蘇俄如出一轍，美國外交家尤為清楚。

越共效法中俄共，中共更在背後牽引，一旦走入會場，其變卦之多，自在意中。無論和戰，美國只有記取克萊將軍應付柏林封鎖時的決心和忍耐，與之周旋。戰則決心求勝，忍受犧牲，和亦決求絕對光榮，耐心避免犧牲。克萊曾恃此樹立一個不訴諸戰爭而能對蘇俄應付裕如的歷史性先例，詹森政府尤應憑藉這種決心和忍耐，而在對越事件上，一雪已故萊吉爾斯（Wm Rogers）所說「美國是從未輸掉一個戰爭，但也從未贏得一個和平」的恥辱歷史。

(一三) 偽裝讓步：退讓與讓奪，在赤色字典中，向來是異詞同義，和它們的一切術語相同。例如在第一次商談時，張岳軍氏因中共堅持各條，即說：「蔣主席已經指示，將來軍隊駐地，可由毛澤東先生提出方案來討論，他的意思，無非爲我們雙方都應該有一個互諒互讓的辦法纔好，」其後各次會談，他都發表這種希望。於是周恩來說及「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不過形式，」以形式的選舉，表示他們的讓步。但又接着說：「國民大會代表不經普選，則我黨一貫的不敢苟同，」仍回到其堅持普選的主張方面了。又說：「但選舉需時，故大會必延期召開。我們或顧慮有人反對，謂國民黨有意遷延，不願還政於民，然此事有許多解決辦法，如召開政治會議，使各黨派參加政府，然後再行普選，如此則各方面自不致有所藉口了，」是則雖似替政府打算，實則反進幾步，要一舉而兼得召開政治會議與組織聯合政府，及重選國大代表三大收穫了。王若飛說：「我黨的軍隊集中於淮北及黃河以北地區，乃爲一大讓步，一更是虛張聲勢，先進幾步以後的讓步。至於周恩來先後所說的「今綜觀我方十一項建議，無一不是本此精神，作相當讓步，以期解決問題，並非有意與中央爲難，」吾人如明瞭此種事實，方知我方所提的十一條，實充滿讓步的精神，則不但是欺人之談，並帶有威脅之意了。他們自毀其讓步的手段，尤爲可惡。在十次商談後的政協會議中，他們一到迫於衆議，無可再爭時，雖曾表示在原則上可以讓步，却又立即說及文字尚須修正。並託辭今日已來不及，須到明日再作決定。到了明日，原來出席的人又託故不到，改由他人前來，而來者則又表示對昨日之事一概不知，要求重新討論。如此無賴，每使會議徒費時間，毫無結果。因此，在這十次商談期間，政府代表張岳軍雖真正希望中共能够真正讓步，而希望始終落空。

共黨只圖前進，向不後退，即使退，亦是退一步，進兩步。在他們以退爲進時，又總是以偽亂

真，用絕對相反的說詞，去隱蔽其真正的企圖，使對方發生錯覺迷惑，終至受騙。現在縱能辦到與越共北越和談，他們一定說出不止已經讓步的話，要你也讓步，假使輕易然諾，而不深入研究其背後隱藏的陰謀，將必造成更大的災禍。何況毛澤東早就說過：「和談是另一次戰爭的政治準備。」再揭穿說，越共北越乃是並非真正拒絕和談者，而是真正打算以和談來謀取不戰而勝的果實者。特別是中共壁越戰問題，有它自己的一套看法作法。它的看法是：假使和談不成功，那麼戰爭發展到最後，美越盟將將把戰火推到中國大陸，吾命休矣。假使和談成功，那麼自己不再能向東南亞伸展，亞洲共黨體系將叛離而去，吾命亦不絕如縷了。它由此形成的作法是：和戰既兩窮，就運用矛盾統一律的原則，造成亦戰亦和的局勢，坐待有利無害的收穫。美國政府如亦認為中共的看法作法確是如此，那麼收拾越南問題的決策準則亦即在此。準則的主旨，便是不讓中共可以不戰而勝，定要迫使中共出戰而敗，不讓中共把美國拖得心灰計窮，定要做到中共自己引火燒身。中共縱想偽裝讓步，也已經日暮途窮，無步可行。

(一四) 化整為零：中共在幾次被擊敗時，每使其殘餘部隊化整為零，分向各路逃走。它這種起死回生的經驗，移用到會談席上，也同樣有效。例如它當時爭持的主要問題，原只在迫使政府「承認解放區及抗日部隊」，但它為什麼把會談要點分寫成十一條？既如此分列了，又為什麼在談判各個問題時，總是環繞著牽涉及扯拉到這兩個問題上去？更為什麼談來談去，終歸得不到什麼結論？拆穿說，無非使政府坐失截亂時機，它們獲得備戰時機而已，也無非表示它們爲了勤求和平，所以討論不厭其詳，各人不憚煩勞，準備歸咎政府而已。化整為零，不但需要技巧，並需要耐心，更需要懂得心戰。他們了解人們都怕麻煩，美國人尤甚，共產黨徒亦不能免，就從此下手，先把它們自身的這個弱



點變成強點，然後再以此強點去攻擾對方的弱點，所以常能屈敵而不屈於敵。在這個戰術上，列寧曾努力訓練其同志，他在一九一六年，曾寫信給他的同志說：「你來信說，你疲於通信和商談，我完全了解你，但是你必須耐煩，你一旦擔任了談判工作，便不許你慌張或失望，否則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中共用此祖傳法寶，先碎割談判的要點，再隨時把話頭扯遠，用此技術和政府代表糾纏了一個多月，纏出一個續命湯的政治協商會議後，再在還政協會議中，拉進許多幫手，繼續糾纏多時，最後給你一個「無結果」，而它自己却豐收了許多個「無結果的結果」。

中共還有一種化整為零的方式，就是特意製造不甚聳動聽聞的地方事件，把責任推歸政府，再把地方事件逐步擴大，產生混亂與動盪，然後全面叛亂，此在其技術上講，實是活用「化整為零」而為「化零為整」，就其作用上看，則為列寧所說的「混亂是革命的資本」。它們變化之多，直多到連暗中與它們同走一路的張治中，也覺得不便再給它們掩飾，只得在國民參政會上說：「這樣談下去，有點像故意拖延了，」「不願意來解決問題，」「從西安商談到現在五個月中，已經把問題愈談愈遠了。」多到連已經左傾的大公報，亦對它們遲遲不派出代表，派出以後又遲遲不履行停火協議，感覺不耐煩，只得籲請它們真正停戰。多到連本來同情它們的若干美國人，和殷望政協儘速商決各事的人，亦對它們往往不同意四方面委員都持同一主張的問題那種態度，以及周恩來所說「此次政協會議如兩星期不能完畢，亦應延長，俾從長討論」的用意都覺奇怪，各懷憂慮。中共以前對國民政府會這樣的幹過多次，今後自必指導越共與北越亦如此幹。尤其是北越共黨的一分為二，使化為另一體系的南越共黨在南越行動，並隨時宣揚它們對若干問題的主張並不一致，更無疑是「化整為零」的一種作法，又顯然是早已實行此種作法。

(一五)分合運用：化整爲零是在分耗政府精力，淆亂社會觀聽，爭取喘息時間。分合運用的手段則更奸惡，在貫徹其殊途同歸，進退皆利的目的。中共前在與政府商談期間，尙只能運用統戰方式，使具有政治性組織的「民主同盟」「職教社」等團體幫它活動，使無政治性組織的報館記者與學校師生在旁吶喊，但已使政府疲於應付，社會不辨是非，國命由此隕越。

越共更厲害，北越共黨政權與在南越的游擊隊明明是一體，却故意分爲兩方，以造成其互相呼應的聲勢。這個盡人皆知的事，更可從美軍齒獲的祕密文件與其訓話記錄中得到證明。北越爲了取得進退皆利的地位，便提高其在南越的共黨之資格權力，使它堪與西貢分庭抗禮的鐵證有二，一爲北越勞動黨（共產黨）第一書記勞勵致南越境內越共部隊總司令阮志清一封長信裏的說法，二爲越共高級幹部的兩本日記中，記載阮文永視察南越越共司令部時發表的談話。勞勵是北越最有勢力的人物，阮文永是北越陸軍副參謀總長、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民族統一委員會主席，他們的意見，自足以代表北越共黨最高階層的觀點與決策。

這兩種文件，已很清楚地說明了直接指揮越共在南越作戰的人員是勞勵與阮文永。而其指示作戰的目標是什麼，應該怎樣打，何種任務應該優先執行，如何應付和談，以及其他有關問題，則兩人都是依據北越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案發出的。僅這一點，已可完全明白南越的共黨部隊係由北越共黨全面控制的事實。若再就「北越祖國陣線」與「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聯合聲明，及北越副總理批評一九六〇年黨第一書記黎筭在勞動黨第三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所說的話看，就更清楚。聲明中說：「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歡迎北越祖國陣線的國家重新統一的政策。」批評中說：「總而言之，我們的民族統一陣線，目前是越南祖國陣線，但因我們的國家仍分裂爲兩區域，北區與南區，每區有

其自己的革命任務。在南越的陣線，是以民族民主陣線為要素，同時在北越的以社會主義陣線為要素。在南方的陣線工作，有賴於工農革命羣衆同盟，而且必須具有彈性。此陣線是很廣泛的，鬥爭方式是靈活的，以求達成南方人民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由於南北兩區的情勢不同，南方必須基於祖國陣線總計劃之精神，而去擬定適合於他們特別情勢的工作計劃。祇有在祖國陣線計劃中提出之重新統一國家的問題，是目前南北雙方的共同任務。我們贊同和平統一，因此我們同意這個原則。」

但是北越總理范文同則對美國教授們堅稱「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是唯一真正代表南越人民的南越共產黨在南越人民和世界人民當中享有極大的聲望，」胡志明亦對巴黎世界晚報記者堅稱，「必須南越人民根據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計劃，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而此解放陣線亦即是唯一有權代表南越人民者。」而美國一些知識份子亦竟中其宣傳之毒，不認為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是北越的前線組織，連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亦被其宣傳所矇蔽。至於為何多次改變這個陣線的名稱？由北越的共產黨改名為勞動黨，再改名為「人民革命黨」又再把「人民革命黨」控制的南方支部稱為「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則一如一九六一年勞動黨祕密文件論及南越的人民革命黨時所說的「首先要明白，這僅是名稱的改變，雖然表面的名稱與在南越的不同，但祕密中，它是勞動黨的南方支部，同在由胡志明主持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則為百不變不離其分合運用的又一技巧。

分合運用確有幾種妙用，其在爭取資格權力方面的妙用至少有五：(1)在表示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是由南越人民自謀解放的獨立組織，並不受北越共產政府及共產國際的指揮。(2)在表示該陣線的所有主張行動，悉係代表南越人民的公意，北越政府亦無權使它改變。(3)在表示該陣線是南越境內人民的組織，不是北越境內共產黨員破壞十七度線侵入南越以後纔成立的。(4)在表示該陣線有資格要求南越人

民服兵役出錢穀，人民亦願爲解脫外族的壓迫而出力出錢，並不需要裹脅掠奪。(5)在表示無論對外對內的任何會議，該陣線都有資格派代表出席，北越代表無權反對。其在和談開始後的妙用至少有四：(1)構成該陣線代表、北越代表、南越代表、三分天下的形勢，使南越居於一對二的不利地位。(2)北越代表不便堅持之事，即由該陣線代表出面力爭，若力爭不得，它就宣佈退出，讓北越代表提出使它回到議場的苛刻條件。(3)該陣線在沒有爭到代表時或在宣布退出後，仍可在戰場上繼續作戰，讓北越代表在議場上與對方糾纏。(4)該陣線代表即使簽署休戰協定並同意各問題的解決方案後，仍可假借南越民意，隨時予以推翻，北越亦可謬爲無權過問。

它們的形體與名稱的表面雖不同，最後的目標則一，並且愈分離愈可以達到目標。其共同目標是：一如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的「學習」雜誌中所聲明的「要建立印度支那民主陣線的政策」，「在南方的馬列主義游擊兵，已明白的指出需要一徹底的革命的黨，來作南方革命的先鋒部隊，」既明言「印度支那」與「南方革命」，則其總目標不但要蠶食越南全境，並且要鯨吞中南半島了。

(一六)將計就計：這是共黨慣用的魔術。最著的是，中共因爲政府不承認已經選出的國大代表爲無效，又曾表示國府委員會可以改組，即爭取最現實的權力與最鋒利的武器，主張委員名額應由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各佔三分之一，俾能否決一切議案，推翻整個國府。並主張委員會有任免各部長之權，俾能任用其徒衆，竊據行政院。中共這種將計就計的行爲，北越已在實行，最清楚的事例是：詹森總統既獅子大開口，說過北越就是提出十四點四十點也可商量的話，北越也就在它自己提出的四項條件之外，再指使越共另提五項條件，並都堅持不放了。

二十多年前，中共曾利用國內外一些人渴望和平的呼籲，扮演和談多幕劇，以顛覆政府，今又迎

合美國意旨，從日內瓦到華沙，演出長期話劇，以困陷美國。演員的情形是：美國四人，中共二人，各坐在長方形竹棹旁，對讀其政府或政權的觀點、警告、挑戰，與反擊，彼此用冷峻、拘謹、刻板、毫無笑容的嘴臉，對罵一場，再由翻譯傳聲，約兩小時後，就各轉身而去，和重慶會家岩與國府路的會談、韓國板門店的會談，情形大致相同。劇目的重點是：中共依據其在萬隆會議中編成的劇本，以美國人最歡迎的遣回美俘爲「海報」，與美國商談東亞「緊張情勢的消除」，企圖控制台灣。每到談不下去時，便先後加入「舉行雙邊外長會議」「結束美國禁運」「開始與中共貿易」「交換新聞人員」「同意在亞洲和其他地區建立核子禁區」「召集一世界性的或核子國家的裁軍會議」「成立雙邊保證、不對對方使用核子武器」「談判美國從越南撤退問題」等新劇目，多方糾纏。美方也提出「共同聲明不對台灣使用武力」「立即遣回所有被扣押的美國人」「成立安排並促成大陸海岸島嶼的中立化及穩定台灣海峽的情形」「簽訂核子禁試條約」「參加一般裁軍」「相互保證任何一方將不對對方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相的或單方的派遣新聞人員」「結束對於科學家學者醫生企業人員和其他人員旅行的限制」「成立協定以運剩餘的糧食」「有關談判越南衝突問題」等新節目，與之對抗。劇情的發展是：由於中共決不放棄侵襲台灣，美國也決不遷就中共的主要企圖，致雙方先後提出的十九項具體建議，均被拒絕。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之間，中共要求就數項較易解決的兩國外長會議、貿易與新聞人員交換的建議，成立協議，不再堅持美國必先同意從台灣撤退始得討論此等建議的主張，美國則仍表示除非中共同意共同放棄武力的使用，尤其是放棄台灣的擷取，並釋放所有被押的美國人員，即拒絕討論此等事項。及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已發現其主要目標的台灣，如僅靠談判而不成立某種妥協，即決不可能獲得，便改用僵持外交的策略以困擾美國。自一九六〇年起，又發現這種外交策略

並無實效，即又回入原路，堅持其美國必須無條件接受完全從台灣撤退的原則，纔願與美國商談任何次要事項，這種堅持，至今未變。會談的結果是：費去了最初十四次會議的精力，僅成立一項交換人俘的協定，美國將中共俘虜全部遣返，中共則仍扣押美俘數人，除此以外，美國不但一無收穫，中共且已在越南甚至在美國，開闢了更加困擾美國的戰場，困擾的結果是，截至一九六七年九月底止，已經傷亡了十萬以上的美國子弟，加上七百億左右美元的耗費，假使美國不中其一將計就計一之計，它又如何能使美國備受愈談愈糟之災。

### 第三節 攀出陷阱的一條繩索

陷阱就是和談，繩索就是猛擊。除和談外，中越共別無其他的陷阱，除猛擊外，美國再無其他的繩索。可是美國至今似乎仍未明決表示不再在陷阱旁找出路，還想把演唱了十二年尚未閉幕的華沙會談悲劇搬到越南或日內瓦或聯合國或任何地區去演唱，這正是中越共最歡迎的事。儘管詹森總統有些不耐煩，可是並未死了這條心事，他在一九六六年的國情咨文固然充份抱此意念，他在一九六五年的咨文中雖然說「在一九六五年中，我曾與世界各地的盟邦和對方舉行了三百項非公開會談，討論越南的和平，」「自耶誕以來，能幹而有經驗的代表們，已分訪了四十個國家，已與一百餘個政府舉行過會談，」但是「迄今，我們並未收到一項可證明為失敗或成功的答覆」，而其結論却是「我們也許必須面對一個長期而艱苦的戰鬥，或一個長期而艱苦的會議，或甚至兩者俱來的局面。」即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尚表示即在任何海洋中的艦上都歡迎與越共談判。

詹森如此的哀鳴悲觀，顯然是他已經跌在深阱裏，至少也是陷入迷津裏的反應。且照現在的作法

和趨勢看，一定是「兩者俱來」的局面，亦一定是兩種惡果俱來的結局。其一是，因和談而墮士氣、長敵氣，重蹈中國大陸淪亡的前轍，此已無須重複解釋。其二是，必將幫助中共兼收列寧史達林幾次獲得的成就。列寧乘世界第一次大戰中簽訂對德和約以後，既可穩定並發展其共產政權，復得向東方推進，更得鬆懈西方警備。史達林自與希特勒聯盟，誘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即進軍波蘭，瓜分東歐。自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後，又誘使日軍南進，佔領英美轄地。中共傳其衣鉢，利用日軍侵華機會，呼籲停戰抗日，獲得軍隊整補時間，復燃死灰。又利用戰後人民渴望和平情緒及美國調停機會，邊談邊打，盜竊大陸。其後復得史達林提出和談的助力，得以避免聯軍從韓國進攻大陸的危機。美國如果不以和談的覆轍為苦，中共自必更以和談的成果為甘，又必分散戰場到泰國寮國甚至韓國和菲律賓去，同時到安理會或日內瓦去，以兵戰誘使和戰，以軍隊的游擊戰伴隨議場上的起伏戰，以疲勞談判幫助長期肉搏，以困擾美國人民的思想戰加強消耗美國的軍事戰。要是美國竟入其圈套，那麼詹森總統在一九六五年所說的「時間已不再在敵人一方」，中共終將有一天會高喊「時間又回轉到我方來了」的。

現在尚有跳出陷阱或走出迷津的時間，美國也有從陷溺深處攀登平地的強大繩索，繩索就是武力，方法就是猛打。要是仍用分期升級，肢解自身的戰術，空軍則先炸無關重要地區，然後再看情勢發展，機炸較重要的軍事目標，迄今尚未考慮炸毀敵人的根據地及其庇護區；陸軍則至今仍進退於十七度線的南面，尚無向北越海岸登陸的決心；海軍則僅砲擊北越南部海岸的砲壘，尚未進行兩棲登陸的作戰；惟用化整為零的軍事行動，而與共黨慣作化整為零的游擊戰術爭一日的短長，夢化零至於僅死守幾個小點，而讓敵人穩佔大片的地面，始終用己之短，攻敵之長，使敵人得以儘量發展運用其所

長，而終不敢修改以前無效的零碎攻擊爲必勝的整體進攻，一舉而摧毀越共的庇護所及其政權，則此種畏首畏尾的打法，已經是一身其餘幾一，而由此下去，豈不是業已墮入陷阱的美國，更給共軍以凌遲美國全身的方便與機會？自紅衛兵造反至今的這段時間，正是美國躍向坦途的最好時間，但也是稍縱即逝的時間，豈可一錯再失！

## 第二章 中共一貫的看法與整套的作法

### 第一節 毛製馬列史眼鏡裏的越南

毛澤東比史達林更差，絕對不懂馬克斯主義，所懂的只是馬克斯的若干怪論和列寧史達林的全套鬼計。他在抗日戰爭期間與美國人接觸以後，已略懂美國政府中人及社會大眾的心理，便運用這些怪論鬼計及其自己的心得，操縱美國。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這些怪論鬼計心得的雜製品。他既把這種製品向各方強迫推銷，更把這種製品再製成自戴的眼鏡，去看一切事一切人，解決一切問題，凡在眼鏡框外的一切現象，他都看不見，亦不屑去看，偶然看到，亦仍視爲離經叛道，應該一律打倒。這比海明威敘述某位中國軍官譏笑英國人偏陋的話，更爲偏陋。中國軍官會說，「你想英人爲什麼戴獨隻眼鏡呢？因爲他留一隻眼要看見他所願意看見的事物，另一隻眼可以閉着不看他所不願意看見的事物。」毛製馬列史眼鏡，就具有這種孽障。不幸美國人又愛用其本國那套「民主自由社會工廠」裏製就的眼鏡，英國人又另有自造的單眼鏡，其他各國也各戴其慣用的眼鏡，他們都不戴任何眼鏡而早用兩隻明眼看透了中共原形的中國人不同，這就使毛製眼鏡更自覺其光明無比，而許多國家的當政者



論政者也就在毛製眼鏡的反射光之下，弄得眼花撩亂，舉動乖方，愈使毛酋目空一切，禍及全球了。

從毛澤東自製的這種眼鏡之下看去，中共世界革命的發足點及其進行曲，是應以北越爲延安，以南越爲中國大陸，以東南亞爲南越，以亞洲爲東南亞，以非洲爲亞洲，以南美洲爲歐洲，以北美洲爲南美洲，根據舊跡，依次吞併。世界革命的政略，過去在中國，是以農村的面，包圍城市的點，今後在國際，是應以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其世界革命的戰略，是應以喊打換和談，以和談換時間，以時間換空間。其世界革命的戰術，是應以宣傳戰滲透戰顛覆戰代替軍事戰。形成這整套策略的背景，則爲民主國家的不合作，新興國家的鬧政變。前者如戴高樂法國的脫離英美集團，是最尖銳的例證，今後這類事例一定還會到處出現。後者如在一九六五年前後，全世界已有五十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換上生手，其中三十一個國家的換人是出於政變，這比一九六四年底以前的十年之中，全世界僅發生過五十二次成功的政變，顯然增加。今後非洲中東近東拉丁美洲等初開發地區政變的發生，恐比一九六五年更多。像這些不斷政變的事實，恰巧是給予中共繪製世界革命藍圖最合用的色料，而美國人的思想言論行動，又有烘雲托月的妙用。更有一種汲之不竭的革命泉源，那就是窮人總比富人多，富人總怕窮人兇，中國又獨有七億多的窮人，用此革命，何命不革，一世不成，可革到二世三世，終有成功的一天。紅衛兵造反，除一時的作用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製造窮人，組訓窮人，製造下一代窮人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大運動。鼓勵越共作戰到底的作用，就更大了，因爲越南這個戰場的關係甚鉅，一是控制太平洋，進入印度洋，攫取亞澳非三洲，問鼎歐美二洲的戰略基地；二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產世界與非共產世界一場關鍵戰爭的決戰處；三是民族解放戰與人民游擊戰的重要訓練區；四是共產集團與非共產集團長期鬥爭中意志強弱組織鬆密行動齊亂的考驗戰。中共早如此

看，並已在如此幹。緩進的反毛派，亦是如此。

而今美國朝野急切祝望越戰和解，豈非正是中共施展其和談魔術的絕妙機會，是便利其進行世界革命戰略的最好現象。中共心裏有數，過去的席捲大陸，是靠美國的插手和談，越戰的和談只要有美國參加，同樣可以席捲東南亞。現在不許越共和談，只因魔術尚未玩够，操縱還需時間，需要儘量表現介入越戰的姿態，纔能在和談的作法與結局方面，收到「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奇效。它爲什麼這樣的拿得穩？因爲它自以爲對美國看得準，對東南亞乃至對全世界的前途看得準。它看準的是什麼？可從各種事象中揭發出來。至於它看法的狂謬，自不消說。但可以肯定三點：一點是，它對美國內情的了解，勝於美國對它真相的認識。又一點是，它在毛製馬列史眼鏡下看去，總感覺它的看法是正確的。更可以由此斷定另一點，任何自以爲是的觀念，最後一定成爲政治鬥爭的出發點，此則無論古今中外，都事同一律。

美國人在未被事實證明以前，也許會不同意這個論斷，尤其反對下文所述「在中共眼裏看去」的各端，而認爲全是揣想推測之詞。若誠如此，則願用兩句話先向美國禱祝，「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後再指明兩點：就瞭解中共這一點說，十多年來，美國研究中共的人數之多，資料之富，用力之勤，我不否認，並很敬佩。但美國人畢竟不是中國人，中國人都曾直接間接或多或少的領教過中共的思想言論行爲達四十年之久，美國人顯然缺乏這種遭遇，歷年研究所得，雖不盡同於瞎子摸象，總不免隔靴搔癢。這也並不是說美國人的智慧不及中國人，而是說美國人在這方面缺少了實際的經驗。最能代表我說明此點的，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美國安全委員會」(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出版之「華府報告」(Washington Report)所引述姜笙(Frank J. Johnson)在台北所撰

「台灣的觀點」一文中開首一段話，並曾以「自由中國最瞭解中共」標其端的這段文。其文是：「在全世界的人民當中，自由中國人民可以說是瞭解中共最合格的專家。他們在大陸上，雖然敗在毛澤東打打談談的戰略之下，可是在此以前，他們已經和毛澤東鬥爭了二十多年之久。他們曾在美國的壓力之下，體驗過長期心勞日絀的和平協商，試圖結束內戰，而其對手卻決心要大獲全勝。他們曾從艱苦中，領教過共黨所謂聯合政府的含義。尤其他們都是中國人，分析本國人的想法和做法，自較可靠。」

再就瞭解美國人這一點說：求學與僑居在美國的以中國人爲最多，大陸淪陷後更甚。以一向注重研究政治教育心理及歷史文化的中國人，實地考察分析美國人的心理與歷史，當然獨多心得。共僑雖然十九是土包子，沒到過美國，但是他們仍可從尙在大陸的留美學生和派赴共產國家的各項人員，尤其與美國部長級官員在華沙會談了一百數十次的上層共幹各方面，獲得認識美國的一些知識。

總之，中華民國的人固然最瞭解美國，共幹亦相差無幾，中國人瞭解美國的深刻，實遠過於美國人的瞭解中國。中國人有句名言，「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中共自然是最大的狂夫，美國總須勉爲「不以人廢言」的聖人，如以爲然，就請耐心細閱下文。

## 第二節 毛製馬列史眼鏡裏的美國

一、民好和平官喜戰爭的矛盾：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人民傳習其開國元勳維護世界和平的遺教，一直以此爲第二生命。現在更富強康樂，根本不需要戰爭，並且普遍厭惡這種犧牲生命財產的戰爭，尤其不了解爲什麼要在離開家鄉八千英里遙遠的越南，去從事勝利渺茫的戰爭。美國一些學者議員政客對於共黨的厲害，雖不是完全無知，但爲了爭取選票與虛榮，又正在迎合人民愛好和平厭惡

戰爭的心理，故意採取與政府不同的立場，不斷譁衆取寵，藉以增加他們的聲望。特別是迷信和平，絕對反戰的宗教信徒，他們的人數既多，教會的勢力又特別廣大，更是可以利用的對象。只要利用他們的筆舌，利用他們的禮拜，在報紙上、在議會內、在電視上、在教會中，使他們搖筆鼓舌，使他們默念禱告，隨時提出和平論調，宣傳失敗主義，就可普遍引起社會大眾激烈反戰。再運用擾亂戰術，就可使他們的政府首腦分散精力，造成錯誤。儘管美國人厭惡共產黨，但是採用間接的漸進的掩蔽的戰術，其初只使他們重視教義中有關愛世人愛和平的信條，其繼再使他們反戰，但不反對政府，其後纔使他們直接反對政府，不怕他們不跟着進展。

前在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之間，中共曾操縱這類人，特別是親共的或者不滿意政象的職業學生，經常向中國政府請願遊行罷課示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並利用潛伏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內及美國國務院內的共產黨員與親共人士，處處怂恿相應，致杜魯門與馬歇爾等一個個墮入術中，致中國政府不再能發動民衆對付中共，都是統戰得法的結果。現正用同一手法，能收同樣效果的，便是接受中共指導的越共。越共已煽動得南越人民反戰反美，其逐鹿總統議員的人亦都以「和平」爲爭取選民的口號，美國亦寄望於由此產生的政府能與北越進行和解，都是例證。誰都明瞭法國在奠邊府的失敗，不是敗於軍事，而是敗於巴黎當時的政治紛爭，及人民對於越戰的失去信心，但在當時又有誰明白其中的因果關係呢？今日美國人民的不了解，已經同於當年的法國人，只要聯合越共並利用那些美國人統戰下去，又只要把統戰技術運用得更精巧，更神祕，遲早可使今日的美國，變成以前的法國，今日的西貢，變成以前的奠邊府，這都是可以預期的。且共黨能統一各種矛盾，不信「美帝」能統一其官民的對立，不愁共黨不能在美國存立。

中共的看法想法作法要是真個如此，確是可慮。詹森總統雖已記取歷史教訓，正在避免歷史覆轍，美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議員雖也表示擁護政府的對越政策，但如不能使其人徹悟中共多方宣傳，到處煽動的影響力量，則在越戰曠日持久之下，社會積非成是之後，兩院議員將會改變初衷，這又是中共必有的推斷，並且是必有的行動。倘竟演變至此，則中共逼使越南步入中國大陸覆轍之計，不是完全實行了嗎？

二、不瞭解共黨的厲害：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雖亦有共產黨，但美國人並沒有身受共產革命的教訓，根本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認為共產黨和民主黨共和黨差不多。尤其不了解中共越共都有武力在手，與美共絕對不同，亦不注意美共在其國內的活動。了解其活動的只有極少數人，如警察與聯邦調查局人員以及政府首長，但是僅這些人了解有什麼用？這些人也會向人民解釋，但是人民總認為這僅是政府回護自己措施的說詞，解說也沒有用？何況人民又往往覺得學者專家的意見，總比官場的見解為高，既有傅爾布來特、李普曼、費正清、休斯這批人接連用「強教」「公聽」等方式駁斥政府的對越政策，更會使人民揚棄政府的措施，政府也會逐漸改變其措施，過去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共黨組織為合法，其後法院又對公然焚毀征兵證的壯丁僅判處徒刑三年並予以緩刑，和若干行政官員的高唱圍堵而不使孤立等論調，都是例證。

中共因此又可能認為：只要加緊耕耘，定可刈取滲透顛覆的果實。而這種果實的到手，且比十八年前更為輕易。其中理由有四：一是當時了解中共手段、嘗過痛苦滋味的中國人民，尚且由於急求苟安，便不睬政府的告誡。二是始終不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經常推行隔離政策的國民政府，尚且不能防止中共的滲透顛覆。三是美共雖不像中共擁有軍隊，可是它們已與中共裏應外合，正在美國本土

作戰，從事於比軍事行動更厲害的政治作戰，致力於配合越南軍事行動的政治作戰。四是美國政府對南越的軍事經濟援助雖甚積極，大異於二十年前對中國政府的袖手旁觀，但美國既已敞開門戶，中共就可以無孔不入，無法不用，務使美國援助南越於外而終受挫於內。

中共的看法想法要是真個如此，那麼不明白其奸惡的美國人，特別是爲之張目的人，如再不大澈大悟，則被中共垂涎已久的豐碩米倉與南進跳板的越南，固不免如中國大陸一樣的被他們穩拿到手，而美國前途的吉凶如何，也就可以類推了。

三、橫衝直撞向原地轉：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人仍保持拓荒時代的粗線條作風，只要一經決定行動，就不再想及可能發生違反原定目標的後果。例如美國左傾政客只求搞垮不合自己胃口的吳廷琰政府，却不想及這是教唆越人自壞長城，是對越南野心家教獠升木，是替美國引火燒身的勾當。這勾當一經共黨利用，南越政府不是屢被顛覆，反美運動也就乘機迭起麼？又如只認爲第七艦隊可以堵住中共勢力的擴張，却想不到也是堵住台灣向大陸進軍的後果，這後果一經共黨利用，不是反得安心製造核彈，並有機會援助越共麼？又如只知用軍事力量從外包圍中共，却無視中共會用滲透戰術從內攪亂美國。只竊喜蘇俄包圍中共的西北部，可以接合美國在東南方的包圍圈，却沒想到蘇俄將有從中國西北部搶進大陸，並從大陸伸其熊掌於太平洋的一天。又如只幻想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可以像蘇俄那樣的逐漸修改其行動，却沒想到今日讓中共進入並不困難，將來要中共出去就不容易。更沒有了解中共永遠是世界革命主義的實行者，中共的下一代二代三代爲要保持政權厲行信條都需要兇過其前一代。何況蘇俄也只是暫變其方式，決非永變其目的，以蘇俄例中共，只是形式邏輯。又如只把大陸與台灣海島分爲兩個中國，就可相安一時，却蔑視東西德南北韓當前的各種危機與日後無可避免的

劇戰，更無視美國子弟爲什麼在越南苦戰的眼前這件事實。要是認爲「兩個中國」的說法，只是別有作用的政治詞令，那也忽視了一般美國人皆將信以爲真的後果，會造成美國政府今後行動窒礙，作繭自縛的困苦。其他類似這些橫衝直撞不顧後果的構想與言行，不勝列舉。

中共並可能認爲：美國人不但短視，並且易變，一到發覺後果不佳時，可以改頭換面，退回原地，如嫌惡吳廷琰的專制於前，却又贊助阮高祺的軍人政府於後，廢棄戰略村於前，却又推行名異實同的新生邑於後，便是例證。在他們這樣不停的行動時，自以爲一切都由自己支配，而不自知其已被客觀環境與主觀情緒所奴役，正如拉羅適佛戈爾（Maxime de Rochefoucauld）的格言所說，「人常常相信他在自己支配一切，其實一切在支配他，並且當其在精神上去趨赴一個目的時，而他的情緒又無形的牽引他到另一目的。」既如此，就更有逼他們退回門羅主義舊堡壘的可能了。今日美國不少議員提出議案，主張增加關稅，不正是準備龜縮的開端麼？

中共對美國倘真如此看、想、作，而美國人的性格却又不出其所料，就非常可憂了。中國政府認識中共最深刻，防備亦最周密，尙不免百密一疏，吃了大虧。今日一切站在明處、天真無邪的美國人，只知一往直前，明槍交戰，却不防完全躲在暗處、一團邪氣中共份子，常在左思右想，暗箭傷人，要是竟不能學些乖巧，那麼今後越南政府的痛史，就是當年中國國府的翻版。

四、僅對直接刺激起反應：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人經常只注意與其自身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對國家社會的事件，亦僅直覺其特別嚴重時，纔會引起震動，急起對付，最顯著的例，是珍珠港事變。正因爲如此，就可以制就一套制勝美國的計劃，曲折進行。軍事行動的原則是：只採取迂迴間接的步驟，僅在越南從事於間歇性的小接觸的零星的戰爭；而不給美國重大突兀的刺激；只空喊出兵，

暫時不做出像在韓戰中渡過鴨綠江的那種驚人行動；只借刀殺人，由北越共軍去打擊美國，自己暫不公開動手，務使美國人不即跳起來，爭着要和中越共拚命，並使美國人逐漸吵開來，嚷着要和中越共拉手。而且這種時停時打忽緊忽鬆的戰爭是長期性的，美國人也不會有這種無休止作戰的耐心，很容易使他們感到厭倦。倘使美國人因此永遠不感覺刺激，那麼中共也就永遠得到勝利了。政治作戰的原則是：加緊分化美越兩國的內層，使他們各自內訌。在此原則之下，務使美國的參議院變成議員官員的播臺，互相譴責，長期衝突，弄到官方迷惘困惑煩躁徬徨動搖，連詹森也不能免，並弄到民間叫囂恐懼怨憤偏激浮動，把他們應有的同仇敵愾，變成反常的同室操戈。同時要使南越政府經常被學生和尙政客攻擊垮台，要使南越人民日益痛恨厭惡長期戰爭的摧毀其家庭與生計，並十分懷疑美國有限度戰爭的用意與後果，把他們應有的簞食壺漿，變成反常的恩將仇報。倘使美國人越南人永遠感覺無關宏旨，那麼中共也就永遠大有收穫了。

中共的看、想、作，要是真個如此，而美國人又真是麻木如此，那麼林彪所說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開，可以被割裂，被擊敗，有些可以打擊他們的頭，有些可以斬斷他們的腳，」他們也就認為真理了。要是他們本此熟路輕車再向前進，那麼民主陣營的破裂，也就可以在他們所選定的軍事戰場上，與其所操縱的政治戰術上，並且在美國人已經被他們牽着鼻子走的馬路上，逐漸實現，毛澤東也將自喜其所說的世界正處於「大變動大分裂」這句話的正確了。如果美國與中共的看法想法做法都一成不變，各行其是，則其結局豈止越南如中國大陸的全塗紅色，就是整個亞洲也會有進入「紅色警戒」狀態的一天。（紅色警戒是軍事設施最高準備狀態的表示，通常意味着攻擊行動即將發動。）

五、人人都喜新奇驚人：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懷有政治慾的人物，往往利用其人民厭故



喜新的心理，高唱標新立異的曲調，作爲騙取選票的前奏，這不僅可供轉輾利用，亦早有成功的紀錄。前在中國，不是利用太平洋關係學會的力量，使共產黨員希斯擔任美國遠東事務局局長的助理，格雷弗斯擔任華盛頓援華委員會的主席麼？不是使居里與拉鐵摩爾出任中國政府顧問，使十多位共產黨員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館館員麼？又不是組織「美國和平運動委員會」，作爲煽動機構麼？經這些人裏應外合的活動，中國的紅朝廷，就由美國的白皮書助產成功了，現在爲什麼不這樣幹？美國人民愛找刺激，容易感受任何聳動的新聞，各自名爲「中國通」的蛋頭學究又愛出風頭，西貢的政客僧尼與部份學生又常想推翻其政府，爲什麼不蹈瑕抵隙，乘機操縱？在二次大戰以前，尙只有三十多個國家有三國國際的地下組織，已能幫助中共成功，而今已有各式各樣的同路人與組織體，棋佈在八十多個國家裏，憑藉比以前更爲雄厚，爲什麼不大幹一番？

中共既認定可以大幹，並且已在積極的幹，於是從一九六五年四月起，美國左傾份子便在東部以哈佛大學爲中心，在西部以加州大學爲中心，在中部以芝加哥大學爲中心，用「連鎖通訊」辦法，號召教授學生從事於反對政府亞洲政策的活動，就積極展開了。於是以傅爾布萊特爲首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班嘉明等，密西根大學教授艾克斯坦、亞歷山大等，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納、沙果利亞等，喬治華盛頓大學哈洛、興登等，便在參議院內開庭，向政府首長疲勞審訊了。於是若干左傾大報如紐約時報、金山紀事報等，也給他們大登廣告，鼓動社會，名政論家如李普曼、雷斯等，也大放厥詞，爲共張目，各廣播台電視台也以此爲頭號新聞，儘量播映了。於是特別組織的左傾社團，如「大學國際檢討外交政策委員會」「選舉督正會」「美國人民檢討遠東政策協會」等等，已如響斯應，而「教會聯合會」「民主運動委員會」等民間團體，亦都變爲外圍組織，若網若綢，其聲勢之盛，遠過於以

前的「美國和平運動委員會」了。於是反戰行動愈演愈奇，由共黨操縱的紐約示威運動中，領導游行的黑人金路德牧師，爲了維持其前在黑人民權運動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聲望，積蓄其政治的賭本，就煽動羣衆盡情亂幹，致當衆焚毀國旗，公然高舉越共萬歲牌子，青年男女各燒徵召令的一半，互傳對方愛情，種種恬不知恥的怪狀百出，且在事後抱怨警察局低估其游行人數十二萬五千人爲過少，至少也有三十萬人參加，尤其不滿美聯社報導的六萬人，快快然認爲與他們的聲譽有關了。於是美國當前第一號大事件的越南戰爭，已變爲議論最紛紜，人民最感覺熱鬧的對華政策大論戰，成爲戰爭中的戰爭，竟代中共越共在華盛頓開關成第二戰場了。於是中共的看法想法做法，一一實現，更使它樂此不疲，更要照此大幹下去了。

如果這個描述不太離譜，而其今日所爲又恰與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前後對付國民政府的方式完全相同，而目前越南的局勢，又恰是國府戡亂末期情景的再版，則詹森總統雖已引爲殷鑑，並會對左傾親共份子採取一些行動，但如僅此爲止，而無法使這些人都引爲前車之鑑，則今後的越南，究竟是誰家的天下？仍不能無疑。

六、共黨正歡迎美國那樣的民主自由：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建築在工業經濟上的自由社會與民主制度，日在變動發展伸張之中，因其易於變化，便可供多方面利用。一可根據其只求前進的傾向，曠使左傾政客不斷攻擊政府，煽惑人民，破壞現狀，以便不戰而勝。今日若干議員的公審高級官員，若干報紙電台的鼓吹親共政策，不能謂與共黨的操縱無關。二可根據其只求發展的心理，慫恿人民逼使政府加緊爲社會謀福利，倘使政府全力以赴，即不能以全力充實國防；倘使政府兼籌並顧，即必增加人民納稅負擔；倘使政府推行社會政策過慢，即將引起人民不滿。今日詹森處在大社會主義建

設與對越作戰的夾攻之中，已經受到限制進展的痛苦，便是中共展開有計劃的壓力之結果。三可根據其變動的現象，加深各階層言論思想的紛歧，使他們的政府舉棋不定，他們的軍民惶惑不安。今日美國朝野對中共的能力與意圖，形成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派人認為中共年來既飽受挫折，已無力量威脅世界；另一派人則認為中共的處境愈壞，愈要防它鋌而走險。由此兩派意見導致的混亂，已很可觀。再加上美國決策階層對中共是否將參加越戰各持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官員也隨時變更其所見，就更加複雜了。由意見的紛歧，進於行動的錯亂，最後歸於自殺，祇是時間問題。何況自殺已經開始，如軍人認為應進攻北越，或徹底炸毀中國大陸通往北越的一切交通線，或封鎖海防港口與十七度線，而若干議員與文人則一一反對，其舌戰的熾烈，反過於越南的砲火，文武如此異趣，將相如此不和，縱得天時地利，又有何用？四可根據其伸張的趨勢，擴大影響的範圍，誘使南越先倒在民主自由的追求之下，然後再收拾美國。而南越僧侶學生及峴港順化軍人反美反政府的強烈，要求制定憲法，還政於民的潮浪，又正和以前中共顛覆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作法及其成功相同。共黨最怕敵國政治社會穩定不變，美之變，正是共之利。

中共的眼裏心裏要真是個如此，則其捉弄美越兩國的企圖，已可用三句話揭穿，就是使美越兩國變戰時為平時，變對外為對內，變勝利為失敗。美越兩國如果儘讓他們把形勢改變，自己終不知把政治作風改變，那麼越南全境固不免於赤化之災，而美國的自由社會與民主制度亦將遭遇不白之冤，並有岌岌動搖之象了。

七、把經營公司方式塑造他國政府：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資本主義是美國政治民主、社會自由、經濟發達的原動力，但也是美國政治外交走上商業化，而其後必將失敗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的經

濟特徵，是經營自由，發展便利，本輕利重。企業家在創辦公司之時，如認為合股經營，可以節省各自創辦的一切支出，即不問志趣是否盡同，便冒險投資。及發覺分營更可以爭市場，少繳稅，便立即改組。及又發覺設立分公司於國外，更可逃稅，更有厚利，即遠走天外。這都是美國人的經商經驗及其行爲。

美國政府也就運用商人的經驗於處理國際事務之上，對於共產黨正在劇烈活動的國家，輒根據公司合營或分營的原則，強力調解，聯合政府即無異於合股經營的公司，以前曾壓迫中國寮國如此經營，於今亦頗有人主張越南同樣辦理。聯合不成，就把它分開，已把德國韓國越南都分爲二，現又希望分立「兩個中國」；他們認為只有如此，纔能以較小的代價，坐收操縱四個「半國」的利益，其非親俄的「半國」，自然聽我指揮，至少亦有緩衝美俄戰爭的作用，其已親俄的「半國」，勢力亦被削弱，我真可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最合乎經濟原則。而其無暇顧及聯合政府所以成立與成功的原始因素，是在各黨派聯合對外，並非各敵人聯合安內，移對外的體制於對內，只有更加促成衝突分裂，二十年前督促中國政府走這條路，結果走成了中共的天下，五年前又強迫寮國政府走這條路，結果也走成了寮共的局面。要是仍希望越南成立聯合政府，中共自然樂於湊興。只是美國人何以利令智昏至於如此？亦無非傳染商人盲目投資，冒險求利的習性而已。詹森政府目前雖不主張越南再走這條路，但能否始終不理其國人商業化的輿論？是否不爲長期越戰大量犧牲所困擾？能否不因越共偽裝與北越立異，故意拋出與西貢組織聯合政府的釣鉤，而竟爲其所動？則決定於共黨活動的深度廣度強度如何，此則大權操在中共手中，而非詹森所能圍堵。以馬歇爾的威望，與其和中共交涉的經驗，尙且在已經恍然大悟之後，出任國務卿之初，仍堅持其一九四六年的主張，並以停止經軍援助的壓力，迫使國府

與中共合組政府，則詹森能否不明知故犯？自很難說，但西貢必將懷疑，當可料定。

何況就美國商業化的對越政策看，還用不着等待聯合政府成立後再做手脚，根本只有成立全越共產政府的可能，沒有組織聯合政府的餘地。美國只想以戰迫和，並不努力於以戰求勝，只想把越共趕回北越，並不主張消滅北越政府，這已經不合生意經，而且他又顯然是並不想賺錢，只求不虧本，是膽小商人的行爲。再加上他們自覺人力的本錢較少，深怕中共七億人力武裝而出，同時也怕中共陣地史無前例的縱深，不但有越共在其陣前，並有俄共國際共密排於其陣後，即在白宮輦轂之下亦還有美共在其陣中，他們怎得不斤斤計較彼此作戰本錢的大小，刻刻擔心國際政治市場的變化。即使小本經營的越戰，未必成爲虧本的買賣，或者尚有贏餘，那也只是戰術的勝利，何嘗是戰略的勝利，而其最後的總決算，仍將是經營世界革命企業者的大收益。即使「世界革命公司」需要支出大本錢，並需要長期經營，但一定是大器晚成，必有大利在後。又即使大股東因緩進急進的主張不同，自相拆夥，前之如蘇俄與南斯拉夫的各行其是，近之如中俄共的分裂，那也只是大企業公司一時的現象。又即使暫時緊縮革命範圍，那也只是一時的不景氣，列甯也會行過以退爲進的策略，列甯何嘗失敗。

中共這種觀點，這套設計，在其歷年的言論行動中，已可證實。美國是否真如其所料竟爲商人政府，似亦不能無疑。如長此不變，則其結束除便利蘇俄插手越南，留待中共再向越南拆台，最後把整個越南送進中國大陸的覆轍之中，同於公司的宣告破產以外，還得另出巨資，準備在其他地區對付另外幾個韓戰越戰。中共認爲不待籌設越南聯合政府而已造成全越共產政權，自係夢想，經常吹出各種買空賣空的法螺，亦易戳破，但它已經培植不少共產的左傾的姑息的反戰的份子在美國，並在其他國家之內，則其謀略的陰毒，佈局的周密，似猶過於陽翟大賈「以呂易秦」的呂不韋了。

八、民間猶存血濃於水的意識：在中共的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用救火的習慣去應付國際變亂，又正是共黨大可利用之點。當火災突起於眼前之際，先顧自家，再顧近鄰，然後及於遠鄰，如此利害關係的打算，原是人之情。可是美國人把這種尺度用在國際問題的處理方面，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重歐輕亞政策，則由來已久，可謂笨極。今日詹森政府雖對這種政策表示異議，但其不給中共以決定性的打擊，只在越南與越共周旋，顯然帶有「輕亞」的意味，假使戰爭爆發於歐洲，美國決不會僅轟炸蘇俄的附庸國家的。在此以前，因為首求歐戰勝利，次求減輕亞戰犧牲，便與蘇俄秘密造成親俄疏華的雅爾達協定，其後又迫使中國政府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滿以為中蘇條約一訂，蘇俄便會出兵攻日，美國即可努力於歐洲的善後工作；却不知蘇俄不出兵，美國已能直搗東京。更沒想到蘇俄一出兵，中共便與蘇俄連接一氣，中國政府立即受到中俄共軍裏應外合的打擊，從東北一直挨打到東南海邊，終至於由此造成消耗美國的韓戰越戰，以及美國分別援助亞洲各國的沉重負擔。要不是重歐輕亞，何致如此的自討苦吃？要不是那種救火習慣的濫用，又何致一貫的重歐輕亞？這個國際列車一步步傾覆的軌跡，詹森雖已看明，並認定太平洋的時代已經開始，但大西洋國家終將拖住美國的腿，中共亦有辦法迎擊美國的頭，蘇俄亦隨時可在各處放火，使美國疲於奔命，則均為勢所必然。

惟恐天下不亂的中共，及表面和善的蘇俄，都將如中共對美國這樣的看法作法，陷美國於多面作戰，自極可能。那時白宮主人如果外被英德等國所包圍，內受姑息份子的壓迫，再回入重歐輕亞的舊路，則越戰即使已經結束，而亞洲戰端的再起，不論其起於何處，總將使美國焦頭爛額，使民主陣營旗靡轍亂，猶過於中國大陸淪陷時期的現象，豈不甚危。因此，身負國際救火隊重任的美國，除將歐亞孰輕孰重的計較，變為救火或消滅放火者孰輕孰重的考慮以外，實已無從定出更有效的第二個方針

與政策。

且從毛澤東的言行看，似乎他早已認定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是改不過來的，因為它有先天的因素存在。歐洲人是和美國人爲同樣的白種人，英國人更與美國人的血統相接近，幾千年來影響世界活動的中心向在歐洲，又向與英國的活動有關。亞洲人則均爲黃種人，除蒙古人的行動一度震驚歐洲外，任何變亂都波及不到歐洲，更波及不到美洲，這自然會造成美國人重歐輕亞的意識，然亦正是便利於亞洲人「關起門來做皇帝」的絕妙條件。可惜日本人太落後，只知用帝國主義的手段去幹，自必無成。惟有共產主義纔是統一亞洲、進攻歐美非各洲的現代利器，真個是「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美國人如果真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行爲，又真被中共瞧透，那麼詹森政府儘管能作先後輕重的考慮，似亦不易制定行得通的政策。

九、腦子裏擱不下歷史教訓：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是極度忙亂的社會，人民忙於做生意，政府議會忙於爭選民，誰也無暇深究歷史教訓。一般人又富於自尊心創造性，蔑視歷史教訓。且立國還不到二百年，根本極少歷史教訓。這一切，正是共黨搬演歷史故事的天然舞台，而事實也確是如此。二十年餘前的中國，因對日長期苦戰，幣值日落，物價日升，民心士氣交受其害。在日本投降之初，美國雖曾供應冬季服裝與運輸工具，俾三十萬國軍得往東北接收，中國雖亦曾根據中蘇友好條約，迫使俄軍從東北撤退，避免對中俄共軍兩面作戰，然終由於餉精短絀，軍紀受損，及中共的操縱，致美式的彈械裝備，有些流入中共手中，美亦因此不再援助。及東北既失，中原苦戰，美國雖允予貸款，但又受到中共的嚇阻，並慮中共誣譏其爲助長內亂，乃初則以限其用途於整理財經爲辭，終

且取消前議，此實爲中共得逞的重大因素之一。證以當時法意土希等國依靠馬歇爾經援計劃，免爲共黨所乘的明效；及其後台灣省政府與後勤司令部於危急之際，動用黃金，盡發欠餉，頓使由華南馳援的饑疲戰士，勃發所向披靡的無比勇氣，立殲二萬餘共軍於金門，又續殲共軍七千人於登徒島，而使中共至今不能順利進入東南亞的事實，則尤足洞明成敗關鍵的所在。再如調大將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問題，用政治力量補救軍事，使習慣於服從命令的軍人，忽從事於政治的運用，除墮入中共的圈套外，豈能別有所得。其後雖思補救失敗，擬調麥克阿瑟由東京來華，並擬調美軍助平大亂，但又因其初既未聲明麥帥迥異於史迪威，其後則又爲時已晚，卒成空想。最後復因蔣既被迫去位，白宮更用白皮書勾銷中國事，益使三軍無主，全局瓦解。美國的失敗，便是中共的成功，今在越南自然也會同樣成功。

中共的看法倘真如此，倒很真實，即是當年中國大陸的淪陷，不在政府軍隊的不能打，而在美國於政治上加以阻止，於經濟上斷絕援助。這幾頁痛史，美國雖未全忘，並已援助越南經濟社會的建設，自不致被它完全料定。但總因對越軍事政策的動盪，姑息氣氛的瀰漫，南越政府的不穩定，以及南越美軍統帥的威望膽識，似又不及韓戰中的麥克阿瑟將軍，且動輒造掣其肘，而徒亂人意的幾個參議員又嘵嘵不休，更爲韓戰期間所未有，則「沙灘築室」似的經社建設，在越人已有一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的痛感，在中共眼裏，就更有「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的便利。美國人如真重視現實，就必須回憶幾件近年的事：其一在古巴，當時古巴在拔第斯泰總統時代，絕對反共，且素親美，乃美嫌他不民主，遽援攆卡斯特羅上台，而不知其爲共黨人物，致古巴既全部赤化，美亦在肘腋之間，自樹一敵。其二在南韓，當時美國不珍重李承晚總統肇造共和之功，而惟嫌其不民主，且對之停止援助，致其客死異鄉，韓國政局亦因之擾攘不安至四、五年之久，纔得平復。其三卽在南越，其四卽在中國，



不再複述。前車屢覆，來軫益逾，其念之哉！

十、小生意經的對越戰略：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由於過度重視人的生命，只敢被動應戰，不願主動出戰。又由於「宋襄公式」的人道主義過深，深怕核子武器會大量殺傷人民，已把真老虎變成紙老虎。更由於只懂正規戰，不懂共黨新型戰爭的戰略戰術，反致積小犧牲為大犧牲。這些情勢，正是最可利用的弱點，並且早有事實為證。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必待敵人的暴力打及自身，纔敢命將出師。今在越南參戰，只是被東南亞公約與日內瓦公約所逼，纔枝節應付，逐步增資，却不曾規畫出一氣呵成的大戰略。例如在第一階段，僅站在顧問地位指揮越軍作戰，直等到百里居營房機場被越共襲擊，受到重大損失，纔進入直接作戰的第二階段，然仍限於空軍的轟炸，并限於北越若干軍事設備與交通要道的轟炸；今後會不會進入第三階段，進攻北越的政治經濟中心，則全操在共黨手中，美國決不敢自作決定。即使敢主動進軍，直搗北越，亦不會進攻中國大陸，羅斯福尚不敢採納邱吉爾的政略戰略，從巴爾幹反攻德軍，何況身處在內訌外患中的詹森。又即使悍然不顧，也會使戰場上的勝利，被和會中的失敗所抵銷，第一次大戰後的威爾遜，第二次大戰後的羅斯福，不是反而造成了德國日本的再興，共產國家的紛起麼？今日美國又由於看不清蘇俄的底牌，震驚中共的人海戰術，就連海防港口也不敢封鎖，更不敢實行大規模的全面戰略，始終認為共產黨不怕死，尤其不顧犧牲多少人命，不像美國的兵民是美國最珍貴的財寶，就算死一個美國人換十個以上的共軍屍體，也總覺得不合算，依然虧本。

美國官民本此觀點就膽怯了，就不主張用地面部隊去打越共了，就以爲美國用十萬人，中越共會用二七八萬人來對抗了，就戰不敢求勝，和也不望有利了。總之，就始終只敢對越戰零星投資，分期

升級了。中越共對此弱點，大可不戰而勝，只要動員美國怕死畏共而反自名進步份子者，去向其人民不斷叫喊，刺激大眾重視人命的下意識，就可鬧到詹森政府膽小如鼠，手足無措。即使詹森要採行重點戰略，至少亦可予以削弱。即使美國具有極優勢的現代軍事設備，亦可使它被重視人命的觀念，與不切實際的軍事思想，爲之大半凍結。這樣的把美國擺佈到最後，它如仍不畏難而退，就只有在越南戰場上慢性自殺，而中共在亞洲取得全面性的主動，即於此實現了。

最打錯了算盤的，認爲與中共進行貿易，可以改善雙方關係，一舉兩得，一本萬利，「美帝」既如此糊塗，中共正可把各種輸入品移作軍事用，或把其中一部份用以加速工農品的成長，由此奪取美國市場，無論用在何方，近之總可以增加援助越共的實力，遠之總可以增加世界革命的本錢。

中共若竟得意忘形，像上文那樣的自拉自唱，原很可笑。但如果它將美國處理黑人叛亂這件事相提並論，那就更堪警惕，因爲它本是慣於擾亂他國內政的國際盜匪。何況一九六七年夏天黑人的激烈叛亂，無疑是共黨的滲入指導，是居留在北平的黑人領袖之一羅勃·威廉斯所策動，否則在三十年代的不景氣中，黑人的生活情形遠壞於今日，當時並無黑人暴動的事實，即無從解釋。而今日暴亂的作用，則在破壞美國對越戰的努力，已無待解說。但是美國政府仍本平等博愛的精神，與經營小生意的手法，只是命令警察多方嚇阻，絕對不准開槍，致助長了他們「城市游擊戰」的兇焰。及發現嚇阻無效，警察的增援亦失敗，纔調動八千人之多的國民軍去鎮壓底特律的叛亂。但因其方法也和警察所採取的一樣，又遭擊退，纔又下令第一〇一及八十二空運師的四千七百名聯邦軍趕往現場。這雖增加了足夠的武力，但仍命令非遇射擊不得開火，終致一營裝備充實的傘兵，即在一時內被投石的黑人羣衆所打回。假使在暴動剛起之時，斷定事不簡單，立即用充足的力量，對於違法犯紀的份子迎頭予以遏

止，使之瞭解政府的決心，並使利用黑人問題以爭取選票的若干政客更存戒心，則何致形成美國歷史上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這次動亂？何致引起一般人民的反感，認為聯邦政府不採取有效的行動，州及市的法律執行機構亦未取適當的處理，過早的釋放許多搶劫犯而不予起訴，遂有不願納稅去作救濟那些拒絕工作而反作亂的黑人們之用的傾向？更何致自一九六五年洛杉磯瓦茲區黑人暴動以來一再採用錯誤的戰術，造成一再的失敗，彷彿對付越戰的情形而尙無改正的跡象？

中共倘真作如是觀，又存如此想，並已經如此幹，而美國人的言論行動，又恰合其所需，正在給越南全境導演悲劇，給北平魔宮製造喜劇，這豈不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際間一幕最大的滑稽劇？可斷言，美國如真這樣的兒戲，越南人民必不願追隨美國同戲。中共既不會改編其「制服美國」的劇本，美國如終不能改編其「和戰不定」的越南劇本，則越南的閉幕劇，將是「中國大陸赤化劇」的重演，而「東南亞的淪陷戲」，亦將鑼鼓喧天，接續開幕了。

一一、反感來自優越感：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由於優越感特別強烈，往往根據自己的優點，制定自以為是的方案，以處理他國的問題，成則永遠予智自雄，目空一切，視對方如無物，敗則任意歸咎他國，拔脚而去，把它一筆勾銷。他國人民，特別是亞洲人民，既不熟習美國民主政治那套議論紛紜的作風，尤不滿意美國人這種喧賓奪主的行為，早與美國貌合神離，而美國人則茫然不知，依然我行我素，總覺得自己是對的，也就因此看不到他人還有更對之處，其實也不屑去看。這種不知己、尤其不知彼的後果，前在中國，近在亞非的新獨立各國，已陸續反映出來。有志於世界共產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的共黨，如果不乘機發作，豈不是「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例如南越人民飽受長期亡國之痛，排外心理特強，儘可使他們的反美如反法。越南獨立後，又受二十餘年戰亂不停的痛

苦，處處糜爛，人人恐怖，儘可使他們追求和平，反對戰爭。美國軍人花天酒地的生活，刺入物價飛漲生活艱苦的越南眼中，刺入南越陣亡將士遺族眼中，已是饑火上升，儘可使他們變為反美的憤火中燒。南越政府貪污無能，又缺乏老練的舵手，可儘量製造風潮，使他們在波濤洶湧中，個個覆沒。南越軍人分別割據於中南北三部，各部人民的地方觀念，封建色彩，又適足幫助軍人割據。佔全人口百分八十的佛教徒，已經變佛性為革命性，打破清規，大開殺戒，以寺院為政戰的大本營，推倒了好幾個政府。佔全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天主教徒，亦自立壁壘，與政府抗衡。血氣方剛的學生青年，處在政潮起伏中，更容易盲從盲動。農工商公教人員既各自為謀，又無組織健全旗幟鮮明的一個大政黨能夠團結他們，領導他們。七十幾個各黨各派，互相傾軋，更只有使各階級感覺社會混亂萬分，身家危如累卵。這些現象，正是挑撥離間，顛覆越南的良好因素。反正人民集會暴動，合衆叫囂，攻擊政府，擾亂社會，是美國人一向認為天賦的權利，並希望他國人民也跟他們學習。

中共的看法想法做法倘真如此，可謂刻毒之至。要是美國的表演，偏又投其所好，諸如獨自決定對抗越共的政略戰略，直接經理越軍的餉糧彈械，如何不讓中共去激動越人的反感？美國有限度戰爭的無限期延長，又無限制的使用南越民地為軍事基地，如何不使中共引起越人憂憤生活將更枯竭的情緒？既把戰爭限制在南越境內，使南越軍人無從向外發展，如何不給中共挑起他們磨擦的機會？既把美製的貨色，如美式的政制，美式的建設，美式的戰爭，向越南推銷，如何不讓中共誘使動亂的南越各界更不愉快，更加亂鬧？美國造成的情勢如此，給予中共利用的事實如彼，如果仍不澈悟越南最大問題的所在，在政治而不在軍事，在後方而不在戰區，在政客佛徒及部份學生軍人而不在農工商各界，一言以蔽之，在美國而不在越南，亦不在越共中共，而仍不肯快刀斬亂麻，全力擊潰越共，壓服

中共，使國內外一切問題迎刃而解，那麼美國人優越感的下場，第一步就只有再版一九四九年的對華白皮書，第二步就很可能回到不願再問天下事的門羅主義。第三步呢？不忍說，也不說自明。

一二、不懂政治戰：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政治藝術不够高明，更不懂政治作戰，最跛脚的是圍堵政策。號稱最懂蘇俄的肯南，發明這個政策去對付史達林的擴張政策，自以為成功，卻不把當時蘇俄尚無核子武器，希臘共黨猶在苦鬥，捷克共黨剛纔得勢，這些不能不使蘇俄暫時蟄伏的客觀因素計算在內，只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及發覺歐洲政治經濟的形勢已變，兵器戰略亦不同於前，便匆忙變為「堵而不圍」，欣欣然以為蘇俄已願與民主國家和平共存，更自覺其政策的靈效。及吃過韓戰的痛苦以後，也就祭出這套法寶，把中共加緊圍堵。不久又以為中共亦可與美國和平共處，並以為將可由此建立歐亞與美俄之間的均勢，便又同樣的改走「堵而不圍」路線，僅努力於堵絕中的軍事行動，只圖保持美國的軍事防線。但又怕中共被堵得鋌而走險，便又給中共以政治方面的出路，改行「圍而不堵」的路線。像這種竊取日本「政經分離」的原則，希望中共能在狙公「朝三暮四」的擺佈之下就範，真是蠢極！希望戰火不燎原的只堵不圍，何損於中共，中共不是依然動員兵力物資援助越共麼？何利於美國，美國不是反因此不敢進入中國大陸麼？給中共保持政治出路的只圍不堵，亦何損益於中共，中共是根本不想變更世界革命路線的。更何益於美國，美國豈非將會因此助成中共內部修正主義更與蘇俄接近，更與美國疏遠的形勢麼？即就近事論，美國把越南戰事局部化，以為可由此分化中俄共，造成亞洲的均勢麼？其實只是造成美國在越南的泥足而已。如此無一而可的策略，自己肢解了圍堵設備的行為，然仍美其名曰「堵而不圍」「圍而不堵」，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民，只希望進步分子點頭，卻反引起他們大搖其頭，不是政治能力差勁是什麼？

即使回頭厲行既圍且堵的全面扼殺手段，也辦不通。因為這須貫串及於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纔能有效。美國即使不再顧慮中共的鋌而走險，但又有什麼力量真能佈成天羅地網？這不必說對中共不可能，即對越共亦辦不成。以前法國曾用四十萬兵力圍堵尚無叢林鳥道的阿爾及利亞，猶且敗退，美國與西貢又怎能把南越幾千百個鄉村一一守住，而不讓已經佔據百分四十左右鄉村的越共，從小道從夜間襲入其他地區？更如何送入經援軍援各物到西貢政府控制的各鄉邨裏去，而不虞越共的攔劫？這和美國計劃在南北越之間建築什麼電化的防線，都是同樣愚蠢的作法。

如堅持以前圍堵蘇俄有效之說，認為圍堵中共不應如此失望，則亦應想及圍堵蘇俄是西方盟邦的全體行動，現在能使東南亞公約簽字國同力合作呢？即使能，又怎能使其他西方國家與中共斷絕經濟往來？不但如此，連美國自身亦有資敵之嫌吧，禁運戰略物質固已變成具文，而准許「戰略人資」由美轉回中國大陸，如著名的物理化學地質學及原子科學家若干人，不是在美國造就，由美國放走的麼？至於美國若干人吵着要中共進入聯合國，國防部長主張向中共搭檔，那就更便利中共進行「無疆界的戰爭」了。

如尚以爲美俄兩國對中共的大包圍圈已經構成，中共一倒，越共即斃，或越共一敗，中共即縮，那也只是聊以自慰的說法。即使照美國的如意算盤打去，聯合蘇俄迫使中共也走修正主義路線，但轉瞬便成中俄共聯合圍堵美國的局面，這時俄共越過北令海峽、紅海海峽，中共越過馬六甲海峽，把五大洲陸地連接起來，不是反把美國包圍起來是什麼？又即使中俄共仍是各走各路，中共的陸權與海權結合，亦可由西太平洋轉窺印度洋，構成新的「東亞共榮圈」，粉碎美國及民主國家以海權為主對大陸陸權的新月形包圍圈；雖然印尼共黨暫時失勢，給中共在巽地海峽部份造成一個缺口，但遲早總

會把它縫合的。即不談這種遠景，而僅談往事與現況，中共亦決無害怕圍堵之理，為什麼？因為早有「人彈」在美國轟，現更有核彈可向各處射，人彈已發揮其阻力，核彈又大可供勒索，在阻力與勒索裹應外合之下，將使圍堵的每一回合都不能贏得勝利，並使已失去的事物永遠不能收回，最後使圍堵政策根本無法成功。中共的不怕圍堵在此，美國人政治戰的特別低能亦即在此。

美國在中共的心頭眼底倘真如此，已很可憂。而其本此觀點所定對策的原則，更顯然刻毒。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向親共記者史諾所比喻的一段話，已足代表。在他與史諾談話時，曾講過捉跳蚤的方法。他把手指按在桌上，表示已經壓住一些跳蚤，形容美國自以為壓住了中共的得意情形。於是他說：「你不能移開手指。你不看見麼，手指一移開，跳蚤就跑了。這樣的人，對於沒有被捉牢的跳蚤是沒有防禦力的，跳蚤可以隨時隨地隨意動員起來，在他身上大嚼特嚼。」周又隨即把雙手用力一拍，並說：「那才是捉跳蚤的方法。」又另打一個譬喻說：「美國好像一個人用手圈起一堆雞蛋。他不能動，否則他就完蛋了。」其含義是很明顯的，中共將繼續不斷盡其所能去挑撥一切跳蚤，特別是全世界各落後地區的跳蚤。所以最後周恩來宣稱，「重大事件必將爆發，假使不先在台灣地區，便在其他地區，這將造成一連串的反应，埋葬美國在整個亞洲的地位。」他並認為「美國在全世界有二百多個空軍基地，乃是四肢被釘住的一個動物，是坐着挨打的目標。」周恩來這番尖酸誇大的話，會觸犯了史諾的民族自尊心，便在其訪問中國大陸報告的文中批評說：「但是，這個譬喻顯然有它適用的限度。我們的雙手不僅壓住着跳蚤，也控制着不可數計的致人死命的核子威力。雖然我們不容易消滅所有的跳蚤，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祇須拾起一個手指，就能發生強大的核子殺傷力，以毀滅一切寶貝似的跳蚤，包括被捉住或沒有被捉住的。這個手指向下的人，能够老是被挑撥而不發作

麼！」周恩來所說的把雙手用力一拍，「纔是消滅跳蚤的方法」，倒是老實話，但不知美國現用「手圈雞蛋」和「指壓跳蚤」式的「圍堵」和「遏制」辦法，能否改正？這就看美國人的政治鬥爭智慧能否提高？若竟不能，則美國就祇有作繭自縛，最後倒栽在擅長搞政治作戰的老虔婆紅裙之下了。

一三、對天下事都求標準化制度化：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由於過度工業化，對一切事物便都要求標準化制度化，在其國內，到處是一樣的火車旅館餐室加油站，一樣的日報雜誌校舍廠房，不認為呆板，反認為進步，致對於軍事統治的國家，便認為出於他們的標準化制度化之外，最看不順眼。詹森在檀島會議中，要南越提早結束軍事統治，成立文治政府，其理由雖是促進政治民主，配合經社建設，其動機則顯在看不得順眼。既如此，共黨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第一個好題材，是南越的黨派。黨派多至七十幾個，均無固定的黨員，工商團體的組織更散漫，在政治上起不了什麼作用，這都不是有組織有紀律的越共之對手。佛教徒人數雖衆，組織雖嚴，然早已成為共黨的友軍。天主教徒雖不完全同意佛教徒的作風，但也不滿意政府的所為，儘可把它「統戰」過來。它們經中越共的聯合操縱，各黨派的百家爭鳴，不是已像法國第三共和的現象麼？自吳廷琰政府倒斃後不到三年之內，已幾度換人，正如「長安易棋」，便都是這批人搞成的。它們有時雖蛰伏，但「驚蟄」的氣節一到，便又動作了。

第二個好題材，是各種會議。會議是實現民主政治的要件，越共是最能把持會議的團體，儘可逼使美國人壓迫南越負責人向這條路上走。過去已有的收穫是，經過中越共聯合操縱，佛教徒曾拒不出席政治會議，天主教也只到代表二人。而在開幕那天，多數代表都蔑視阮文紹的開幕詞，佛院學生且在成化高喊「政治會議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具。」以前既有如此收穫，今後自可加緊耕耘。特別是



美國既急求和談，越共即可借此要挾，仿照以前中共對國府的辦法，要求改選全部制憲代表。如計得售，則今後中央與地方聯合政府的組織，如中共前在和平建國綱領中的主張，就有力爭的根據了。

第三個好題材，是制憲會議。在這會議中，西貢方面的代表一定希望政府有大權，以便對付共黨，人民代表則必然怕政府專制，定予反對，其相爭的情勢，將如以往中共與國府的相持不下，而其複雜則猶過之。因為在南越的各黨派之間，文人與軍人之間，佛教徒與政府之間，對國會與政府的制衡，見解固有距離，就是美國的文官與軍人，美國政府與南越政府的觀點上，亦頗有出入。制憲時期的爭執，也許不會鬧到像以前中共對國府的嚴重情形，甚至制憲代表與政府互相遷就，但總有隙縫可鑽。何況越南人民根本缺乏地方自治的知識經驗，而若干地區的軍隊指揮官，且不免割據自雄，自一九四五年以來，雖已有過四部憲法，都未發生功效，即由於此，今後豈能有異？

第四個好題材，是選舉問題。南越政府爲了防共，一定希望嚴格限制選舉。人民爲了民主，一定要求絕對自由選舉，越共北越爲了特殊目的，一定指使外國團體力爭自下而上的自由普選。即使不能在選舉制度上獲勝，亦可在投票工作上設法，西貢政府如不能完全控制五千多個鄉村，越共便可在地方選舉中佈局。即使選舉時越共的各種威脅，恐嚇、暗殺、破壞都不發生作用，西貢政府尙能保護人民安全投票，但究竟要選出何種人物，誰也沒有仔細想過。即使如美國人的希望，都由文人當選，亦未必能刷新政治，使共黨失去繁殖的溫床。恰正相反，一羣落選的人，必然造作選舉舞弊的理由，聯合組織反對新政府的陣線，使政局更不安定。倘由此更進一步與「越南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行動，使軍事更趨逆轉，亦甚可能。至於文人勢必掣軍人的肘，則亦爲常有的事，美國白宮及五角大廈內許多文官遙遙牽阻其在越將領的行動，便是顯例。要是選出的總統議員以軍人爲多，則更是多此一舉，並

且是增加紛擾傾軋的一舉。如果美國促使越南政府符合美國民主形式的用意，僅在向美國人民交代，那又適足證明其爲政治侵略，更可予以攻擊。

美國人雖然反共，但有一點却是共產黨的「同志」，尤其是中共最歡迎的「同志」。這一點是，中共一部份同志都信仰毛澤東主義是無往不利的靈丹，光明無比的太陽，希望各國共產黨都奉爲行動的最高指針。美國人則都信仰他們的民主自由制度是世界第一的政治體制，總希望甚至壓迫他國亦步亦趨。美國既不理他國的始終懷疑，中共即有操縱利用的永遠機會。

中共預定的策略若真如此，美國就必須認清四點：第一、民主政治雖是戰勝共黨極權政治的基本利器，但如不先平定越共的武裝叛亂，它就沒有真正產生及存在的餘地。第二、文治政府如非成於人民真正的認識與需要，而僅恃於政府甚至外力的促成，終難免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結局，至少也容易流爲有名無實的文人政府。第三、零星紛亂的各黨派，既都不是確具政見的政黨，而各種教徒及越共則比較有組織及信仰，不但因此無從構成較爲穩健的兩黨政治，並可能導致各宗教間各黨派間及其對政府之間無窮期的糾紛。倘不能在這三點上作根本的推進，則美國的一番好意，勢將成爲滿樓風雨，弄到棟折榱崩。第四、民主與不民主並無一定界線，英美二國雖都號稱民主，但又何嘗全合理想？若把自己半生不熟、滋味苦澀的菓子，硬塞進正害腸胃病人口裏，只有使他病反增加。

一四、全體美國人門不過一個越南和尚：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民族年輕衝動，易受哄騙，天真得如孩童，你只要反覆的多方的告訴他們某個國家太不民主，容易被共產黨得勢，他就會根據什麼公約，忽促採取行動。即使決定行動的人，有些「欺君」之嫌，也仍會得到原諒。這種行動如果成功，就更以爲確實符合人民的需要，嗣後如遇到同類情形，仍樂於同樣處理。中共這種想法如竟是這

樣，則無疑是它根據美國以前壓迫中國政府民主改革，特別是近年弄成吳廷琰倒斃事件，而作成的結論。

倒吳這件事，確是政治和尚釋智廣有計劃的引起美國人天真衝動的代表作。吳廷琰政府本是反共親美的是最明瞭共產黨與佛教徒串演叛劇的一個領導人。當時西貢及華府的「專家們」說他如何迫害佛教徒，及青年和尚如何願意自焚，根本就是哄騙美國人的「莫須有」之事，是最好詐殘酷的政治陰謀。可是美國人却信以為真，義憤填膺，迫不及待。美國一兩個二等官員，就在政府首長都渡假在外的星期日，擅作主張，欺弄首長，把「吳廷琰的頭顱，用美國國旗包着送到釋智廣的手中」了。據若干新聞記者報導，及美國駐越記者希金斯在「我們在越南的惡夢」一本書中所說：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那天，國務院舉行緊急會議，由副國務卿哈里曼及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何斯曼擬就一份電報，指示西貢大使洛奇去壓迫吳廷琰釋放被拘禁的佛教徒，並恢復被暫停的一些自由，倘被拒絕，大使館可不反對南越將領的武裝反抗。洛奇即用電話告訴正在棕櫚泉渡假的甘迺迪總統，說明越南政變已如箭在弦上，並請示意見。好強的甘迺迪，早就誤信了中傷吳廷琰者的宣傳，祇說了「聽其自然」一句話後，就把電話掛斷了。國防部代部長吉伯垂聽了白宮助理員佛勒斯托口唸的電文，及「總統要那樣做」的口訊以後，也就不負責任的態度之下，讓南越軍人幹起來了。

如此大事如此幹，怎不開成惡例，闖下大禍！惡例是，後人都可放膽推倒前人，倒至阮高祺已是第八個。阮高祺雖曾倒過楊文明，却容忍了九次「自焚事件」，可是釋智廣却指責他的迫害佛教徒比吳廷琰更甚，硬迫他還政於民，美國也照例贊成了。今後被繼續推倒的政府，將不知多少個，恐非到中越共佔據南越後將不會中止。大禍是，自吳廷琰倒斃開始，越共便轉敗為勝，南越便被深入，美軍便在南越傷亡慘重，美國政府便陷入泥淖，欲退不得，求和不成。今後美國人如果仍是那麼天真，特

別是姑息份子仍是這據愚蠢，那就可以這樣說，近兩億的美國人，仍是鬥不過一個南越的和尙。即使和尙們暫時放下屠刀，今後仍會跳出，無論是其同路人從政治選舉中露頭或僧家自己當選，仍會把美國佬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若真如此，豈不丟臉！豈不被中共看透！

一五、富翁最怕窮光棍：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因為安富尊榮，已像中國人說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總不敢和窮光蛋廝打。如果碰上既窮且惡的人向這種闊少爺撒潑放刁，他也先要看清風色，再作道理。要是他的鄰居或友人對它暗示，最好賠個笑臉，出幾個錢，買個眼前安靜，那正符合他的希望。如果他還沒有摸清楚友人鄰居的態度，而窮兇極惡的人又會愈鬧愈兇，實已無可再忍，那就捲袖瞪眼，表演一陣對付「潑皮」的低姿勢，聊以出氣解嘲之外，不敢再進一步行動了。

美國現在的處境及其對策，不正如此麼？它在處理越共問題上，提刀四顧，顧慮百端。它眼見英國為百足之蟲，死而不殞，其自私自利的外交作風，仍如二次大戰前殖民地徧佈全球時那種神氣，仍持重歐亞的過時政策，仍在或明或暗的想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雖也同意美國的介入越戰，却至今未出一兵一物，並準備放棄蘇彝士以東的一切。戴高樂的獨樹異幟，處處與美國為難，與蘇俄中共勾結，企圖獨霸歐洲，重返越南，亦够美國擔憂。一大羣的非洲新興國家，多少都不免害着自卑感與自大狂，進退於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之間，美國更迎拒兩難。尤其感覺困惑的是，摸不清中共的底牌，是否會公然介入越戰？也看不透中俄共的前途，會不會破鏡重圓？雖想加深中俄共的裂痕，但又想到如向北越大舉進攻，反會逼使中俄共復合。雖想利用中共內部的鬥爭有所作為，但又想到要是這樣幹，反會逼使中共各派復歸團結。最拿不定主意的是，聯俄或聯中共究竟是那條路比較有利？美國這個政治低能兒，經濟闊少爺，是在國際兇惡潮流中打滾慣了的，蘇俄既能影響了它和歐洲的關係於

前，中共爲什麼不能影響它在亞洲的政策於今？在二十年前，中國政府因爲過於顧慮對外關係，不敢自決自行，中共纔得強調中立主義，進行統戰政策，離間中美感情，加強中俄合作，使之再三停戰，百般遷就，最後動彈不得，一敗塗地，今日爲什麼不能如法泡製，施之於美國？雖然美國人在決心行動以後，常會堅持到底，並且常得勝利，如它在第一、二次大戰中的表現，但是它的下定決心是很遲緩的，不像共產國家的想到就幹，決不理會外面的情勢如何，而這也正是最便利中共「兼弱攻昧」之處。共產黨原都是窮光蛋出身，決無身家生命的顧慮，成固可喜，敗亦可以捲土重來。何況中共雖窮於財，却不窮於智，雖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如美國，但核子武器的製造正在趕上；更何況越共意志的異常堅強，就由於它們的一向貧窮，窮而後工，工於攻防，工於愚敵誘敵殺敵。這都更使美國覺得異常可怕。

中共似又覺得：蘇俄就是對付美國的能手，自美國承認蘇俄以後，兩國雖會就重要問題舉行過三千四百多次會議，交涉的紀錄長達一萬萬零七百萬個字，可以分訂七百冊，並成立五十二個協定與條約，但蘇俄已經破壞了其中的五十個，這種窮光棍對付闊少爺的事實，美國參議員柯頓也會在參議院說過。蘇俄尚且能使美國噤不敢言，豈有中共反不能之理？以前侮辱罵美國的次數已不知多少，現在叫千萬窮小子反美帝反蘇修，從國內反到國外，連蘇俄都對中共無可奈何，何況美帝？今日正是「窮人翻身」的世界，亞非拉丁美洲國家都是與中共同病相憐，一鼻孔出氣的窮苦國家，吾道不孤，人莫敢擋，怕什麼不鬧窮禍？

中共對美國的看法想法做法若真如此，而其窮光蛋作風，又已經在美國在越南在華沙撒潑放刁，世所共知。如果美國休於國內外中立主義、姑息主義、綏靖主義、不結盟主義、一切怕事主義的大包

圍中，戰不敢求勝，和不求有功，而謀和大員以至總統却飛徧各地，比軍事的進展還快速千萬倍，比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十五個年期間顧慮對外關係也過幾倍，甚至認為中共的所以闖禍由於太窮，惟有和它經濟往來，它纔能不「闖窮禍」，而不知它是認為人民越窮它就越有辦法的惡煞星，豈不更是自作多情，對它「表錯了情」？

一六、核子軍變成紙老虎：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因為害怕傷失安富尊榮的地位與生活，尤其怕戰爭中的死傷，遂致對於若干重大問題，判斷錯誤，舉止失當，造成本想避免的嚴重後果。如果共黨再用恐嚇宣傳，可使他們更不敢做應做的並且是有效的事。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本不成問題的核子戰爭問題。中共自己本覺得試爆的最大作用，在日後固然有力量達成世界革命，但在目前則僅在影響人類心理，特別是美國人最害怕核戰的心理。他們害怕的結果，並已在各方面產生。

一在其深怕越戰擴大，會激起中共更努力完成核子武器計劃，尤慮中共會動用其現有的核子力量，向東南亞地區乾坤一擲，先發制人，所以只敢作有限度戰爭。如果再在西貢華府擴大反戰反美運動，更可嚇退美軍。

二在其深怕中共積極發展並擴散核子力量，已無暇顧及聯合國遣責中共侵略的決議，與其自己一向堅持的原則，盡力拉攏中共參加國際裁軍及禁爆禁散會議。中共如果繼續宣傳蘇俄將會加入越戰，更可增加核子戰爭的恐怖作用，更會使反戰份子壓迫其政府犧牲一切而與中共和談，尤其會使亞非國家都感覺美國不足恃，各為其自身安全之故，轉而投靠中共。

三在其深怕台灣進行反攻，便堅持其「將會導使蘇俄最後使用核子武器幫助中共抗美」的說法，以嚇阻台灣。美國即使覺得不會出現這種局勢，可是為求目前苟安之故，已經自棄其所信，迫使台灣

不能動作。如果中共再利用其膽小怕死的智識份子，像「寧赤毋死」「寧投降毋毀滅」的羅素這類人的嘴巴，更向其政府與人民嚇阻，美國就更會用此說辭嚇阻台灣，更便利中共向東南亞放膽行動。

總之，美國夸夸其談的嚇阻，與圍堵政策，特別是核子力量，都被心理上的歇斯的里症纏繞了。並且自從他們有了核子武器以來，沒有嚇住中共，反把自己嚇壞了。他們在世界全面戰略上的等於空白，在越南重點戰略上的進退維谷，便是自己嚇破了膽的病象，這豈止是有核子武器等於沒有，有核子牙的老虎而不敢咬人，等於紙老虎而已哉。循此下去，美國即使在越戰中得勝，亦只是遲延了中共的最後勝利。中共埋葬美國，征服世界的藍圖，固然是靠人民戰爭的威力，但也是靠美國人恐懼心理的貢獻。你說我們中共是核子敲詐也好，笑我們的核武器粗陋也罷，反正你們美國人是已經在發抖了。

中共若真對美國抱着如此得意的看法，對自己作出如此決定的行動，便不是全無根據的。如果美國人真被他看穿，如果詹森總統又不知怎樣對其人民施行心理教育，糾正其人民只怕眼前犧牲而不計日後大禍的錯誤心理，那真要被中共笑掉大牙，也真是自己拔掉核子牙了！害怕的心理與所怕的對象是互相消長的，你如怕敵人，敵人不怕你，反之，你如不怕敵人，敵人就怕你，美國人總須了解此理。

一七、美國人的思想源流與共產主義一脈相通：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人思想的哲學基礎，根本和共產主義的唯物史觀同一源流。他們個人自由主義的思想，已發展為極端個人主義的行為，更可能發展為否定政治倫理宗教等一切權威的虛無主義。其所以如此，主要出於「存在先於本質」的觀點，也就是與馬克斯的唯物論同一出發點。美國人的注重物質享受，經濟發展，輕視物質以外的一切價值，甚至無視其存在，這與馬克斯認為人類意識不能決定自己的生存，祇有生存情形決定人類意

識，亦祇有物質生活及其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進程，有何差別？美國又盛行實用主義的教是真理的育，認為真理是相對的，常隨時代環境變動，惟有適合於時代環境而有效果者，纔本質與標準；這與馬列主義者「否定的否定」的不斷革命論，豈不是一鼻孔出氣？

美國人這種的哲學思想，經沙德大力提倡，把存在主義與馬克斯哲學結為一體以後，愈使自由主義的絕對性，情意的無限奔放，死亡的極度恐怖，價值判斷的否定與機變，風靡全國，波及西歐。在這種思潮浸灌之下，大家認為除了「個人存在第一」以外，其他任何原則與立場都可隨着實際的環境改變，乃至全盤放棄。只要合乎實用，有利於個人的存在，任何違反原則與立場的主張或方法，都可採用，至少可以試驗。其例甚多，近年如雅爾達協定的商訂，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的實現，「兩個中國」的構想，越戰和解的活動，實際都是與正義公理獨立自由民主的真諦不相符合的想法做法。

尤其是美國崛起的新左派，在它的思想與行為上，更便利於共黨的利用。其所組織的「民主社會學生聯合會」「全國新政促進協會」「杜布華俱樂部」(W. E. B. Dubois Club)，用強教、強坐、強參加及遊行示威等方式，代表黑人，佃農，領取福利金的白人，被摒於學校外的退學生，與受困於集體化社會中的個人，並歡迎共產份子社會主義份子參加，反對越南戰爭，譴責美國的外交政策，咒詛資本主義，反對徵兵制度，拒絕作反共者，迷信西方的衰落，鄙視傳統污點的家庭，憎恨他們的父親，敵視統治階層，討厭聯邦政府，揚棄自由主義，原諒共黨的集權統治，讚揚毛澤東、卡斯楚，歌誦男女自由交歡，嚮往早期詩人索雷、愛默生、懷特曼，稱許窮人的純潔和智慧，反對社會的繁榮和富庶，並改變了政治辯論的性質格調和辭語，由三數萬信徒在十多個雜誌報紙上，吹起毀滅舊社會舊制度，徹底改造人性的號角，向「共裁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邁進，永遠的保持激進，好



似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派」，也似英國模爾筆下的「烏托邦」，其實是共產主義的學生兄弟。美國人固有思想既乘時發展，而其想法作法尤其和中共相同，則中共只要從這方面下手，特別把新左派的活動份子統戰過來，如柏克萊自由言論運動會的沙維亞（Mario Savio），耶魯大學美國歷史教授林德（Staughton Lynd）民主學聯會創始人之一海登（Tom Hayden），以及在新左派份子陷入迷惑與懷疑時，總是以唱歌去振奮人心的歌手狄蘭（Bob Dylan）這些人，都是容易弄過來的。社會學家貝爾（Paul Bell）說，「最好的新左派是完全一副熱情，最壞的新左派則是根本沒有腦筋」，有熱情而無腦筋，不正是中共的最好工具麼？美國人的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原祇是抱著一股十字軍的熱誠，所以一得勝利，一遇現實，立即止步，這更是最便利中共操縱的證據。而美國的「嬉痞」份子，又正是中共「紅衛兵」的縮影。

美國姑息主義的思想背景，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即使沒有中共因利乘便的進襲，美國已經免不了自腐。阻止中共勢力擴張這件事，根本就是思想戰爭，倘自己先毀對敵的主要武器，而又開門揖盜，還有什麼戰爭可言？事理既如此，如果詹森總統不能積極進行國民的思想教育，及時鞏固自己的思想防線，則縱能在軍事上戰勝越共，終將在思想上最後自亡。強大國家的滅亡，與弱小國家的復興，歷史上均有前例，而其或興或亡的基本因素，則為其國民思想的或健康或不健康。

一八、共黨的歡喜冤家是和談：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國政府首腦總想在國際間尋出一條通往越南和平之路的原因，固不止一個，但主要是怕七億人民的人海戰。因為美國沒有復國戰爭的經驗，不會了解大陸人民變成台灣反攻部隊伙伴的可能性，又不了解中共根本不需要向北越開入大量陸空部隊與美軍正面作戰，也不願自毀其消耗美國的定策，致長期戰爭就此結束。

美國人對這兩點既懵然無知，中共就更可以在越南堅持兩種企圖，進行兩種打法。爲保持越南戰場成爲國際鬥爭的資本，仍繼續施用襲擊美軍拖延時期的戰術，使北越騎虎難下。爲運用優勢的政治戰補救劣勢的軍事戰，仍擴大介入越戰的氣氛，使美國總想懸崖勒馬。這兩種打法，反正都不需要中共自己動手，襲擊美軍固然是越共的事，嚇退美國則是他們反戰份子的事。雖然中共站在越共背後苦撐，也大費氣力，但總比公然介入爲有利。雖然美國反戰份子會忽然覺悟，但總不免利令智昏，他們只要找到了什麼基金，就會使自名爲中國問題的專家，寫些驚世駭俗的文章去報帳，好在有紐約時報帶頭，寫文章的更自覺聲勢浩大，吾道不孤。既有這些寶貝在，只須中共再壓迫人民肯出爲數可觀的血汗錢，通過國際統戰的大活動，不怕他們不上鉤，不繼續擔任阻撓戰爭與要求和談的工作，更不怕美國不在西貢華府兩個戰場、越南三種武裝敵人（北越軍、越共主力部隊、恐怖性游擊隊）的環攻之下撤退。即使他們真個迷途知返，中共尚可改用迂迴漸進的戰略，忽然表示退讓，以軟化美國首腦實行原定計劃的決心。

且美國既以戰迫和，中越共正可以和代戰。共黨的所謂和談，本是戰爭的另一方式，根本與美國書獃子心目中的和談是兩回事，如果實行這個方式時更有利於中共，自更歡迎。即使和談無結果，但在和談的試探及和談的舉行這兩種情形之下，仍有顛覆美越民心士氣及鬆弛美國壓力的效用。又即使美國首腦所表示的和談誠意乃至條件，僅是一種外交詞令，但其效用還是相差無幾，一九四五到四七年中共在大陸時即曾收過這種效果。萬一和談真個成功，成功的亦僅是中共，決非美國，一九六一到六二年寮國的停戰言和，保障其長期中立的結果，尤其一九五四年越南的停戰言和，分爲「兩個越南」的結果，都是鐵一般的證據。並且有利於共產國家者尙不止此，美國要達成越南的和局，只有向

中共讓步，又只有演變到最後從亞洲撤退，中共就可控制亞洲；蘇俄目覩美國尚且向中共讓步，也就會聯合戴高樂迫使美國從歐洲撤退，蘇俄就可控制歐洲，這不是全世界將成為共黨的天下麼？好在美國人只求眼前無事，儘可製造許多麻煩事件去困擾他們，重新挑起他們放棄不久的門羅主義思想，使他們到處知難而退。更好在亞洲人怕中共甚於怕蘇俄，魯斯克又曾表示無需與亞洲國家簽訂「核子保障」協定，也不愁亞洲不被中共控制。

中共最怕的，第一是美國人的不怕戰爭，尤其是美國人的忽然參加戰爭，中共就在韓戰中吃過其苦。第二是美國提出雙方准許記者醫生科學家等互相往來的辦法，以表示其不願孤立中共，如果貿然接受，則中共派出去的人將會變心，美國派進來的人定是偵探。第三是中越共被打敗了以後的和談，只能接收其無可還價的嚴酷條件。中共最歡迎的，是美國人既想和又不能不戰的「灰色戰爭」，既作戰又不敢求勝的「有限戰爭」。如果再在和談時，先提高條件，高到美國萬不能接受時，再減低一些，使美國感覺滿意，使中共逼使美國分期投降的賤賂由此貫澈。

中共倘使真個如此估量美國，審度自己，而其赤色字典中「和談」的意義，又別有解釋，則詹森總統雖會對他的民主黨員說過：「我們不能再次自欺的相信屈服可以達到和平，或認為權宜辦法可以達到和平」，但如不能再進一步，使其人民記取古羅馬的軍事信條，「希望和平的，應當準備戰爭，沒有人敢侮辱或觸犯一個公認有優越戰力的強國」，那麼敢於侮辱或觸犯美國的雖是中共，其實是美國自己。

一九、美軍必敗於越南的地形與共黨的戰術：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軍在越南必敗的原因，除美國人自己反戰，他國人迫使乞和，南越人不滿白宮的作戰限度及其駐越人員驕奢的生活各端

以外，而就越南的地形與美軍的戰術二者看，亦決無可勝之理。

其將敗於地形的理由是：美軍最不善於山林沼澤戰，越南恰正多這種地形，所以美國地面部隊儘管大舉進攻，亦搜索不到隱藏在叢山濃林中的共軍。即或發現據點，並被攻克，亦總是克無所得。美軍剛走，共軍即回，一得機會，即又襲擊。美軍只能死守交通要點，終不能掃蕩共軍佔領已久的廣漠地面。無論如何轟炸，亦終不能夷平山林沼澤。至於消耗美軍實力的人造地形，如假營房、假工事，使其空軍枉投許多炸彈。如暗繫繩索於浮橋之下，由河畔坑道中人拉其一端，使其追兵隨橋溺下；以及到處掘地道，用毒弩，活用「絆馬索」，善佈「梅花樁」，總使其大耗人力物力。越南戰場上流行一個譏笑軍的笑話，「打垮了房子，沒有打死一個蚊子，」恰是如此。這越南，這再加上共黨本領的越南，直是天造地設埋葬美軍的墳場，那裏是美軍馳騁的戰場？

越境以內如此，越境以外亦如幾條細死美軍的繩索。由北越經寮國轉柬埔寨而進入南越的幾條曲折小徑，所謂「胡志明走廊」，更是林深山錯，在高速度的飛機上想要找到運輸人物的越共蹤影，何異大海撿針，如何封閉得住？美在泰國的空軍基地雖然有用，但如不能封閉由寮入泰的路，又何能阻止中越寮泰共黨的破壞？寮為中立國家，美國何敢破壞？美軍陷入如此縱深幽險的戰地，再打十年廿年，亦將和現況一樣。除非拔腳回家，就將困死他鄉，必不會在這等地區打一場永遠不能結束的仗。

其將敗於戰術的理由：是中共認為美國採取有限度的不求勝利的戰術，如笑其愚蠢，不如說它聰明，因為它本不能勝，不如自己先表示不求勝，反可藏拙，並可示德。為什麼不能勝？因為美國陸軍只長於正軌戰，不習於游擊戰；只長於陣地戰，不習於山澤戰；只敢作遠距離的砲火戰，不敢作肉搏戰；只敢白天戰，不敢夜戰；只敢作防禦戰，不敢作進攻戰。美軍的所短，正是共軍的所長，以長制

短，短者必敗。美國海軍威力雖雄冠全球，但無用武之地，中越共都不須從海上進兵，海軍就失去其阻止陸軍越洋進攻的能力。裝有射程及於二十餘哩至四十哩大砲的主力艦，如用以砲擊越共設備與兵員，自可減少美機出擊的艱險與犧牲，在韓戰中即曾如此幹過，但都不曾服役，解封檢修必須兩年的時間。較長的不用，而惟用其最短的，自然必最失敗。

必最失敗的原因很多，一因其不長於游擊戰，越共即可用此戰術使之疲於奔命。他們爲了搜索越共，只得由幾個人蹣手蹣足前進，稍露聲影，非被游擊兵炸死，便是自己落入陷阱。他們爲了警戒營地，只得經常派出了巡邏兵，一得巡邏兵的聯絡電話以後，又只得每隔一刻鐘回答一砲，表示予以支援，同時也向越共表示他們並未睡覺。他們爲了過於害怕，早把營地周圍的樹木砍盡，使越共無從躲進，却正好是自裸全形，便利越共夜襲。他們最感頭痛的，却不是越共過多，而是不知那些人是越共，纔遇上一個笑臉迎人的店主或販夫農民，轉瞬即被炸死或刺傷。並且在百密一疏之下，十幾個武裝的越共，亦能滲入西貢機場，除非被警犬察覺，則暗携現代武器的一個人，就很可以同於一百人的破壞力。更有防不勝防的，使訓練成的一羣兔子，拖着幾磅炸藥，炸毀飛機。又如置一窩黃蜂於地雷之下，使美軍或觸雷而亡，或被刺而傷。再如同機散放毒蛇蝎子蜈蚣馬蜂於美軍居遊各處，使之寢食不安。如此神出鬼沒，萬物效靈的游擊戰，顯然比華盛頓抗英游擊戰還要厲害，那裏是只懂正軌戰的美軍所能制勝？即使美越軍有足够的兵力大舉進攻，也只如用「大鐵錘打蚊子」，毫無用處。何況美軍已備多力分，西貢所轄各鄉村與小城市的人民，大半是越共游擊隊的幫手，白天是他們的老百姓，黑夜就是他們的敵人，若這些人不願與越共合作時，就必受到殺身之禍，例如一九六四至六五兩年之間，被越共殺死的村長就已有二千七百多人，一九六五年這一年內，失蹤的被綁架的被暗殺的村長更

多，高達一萬多人，連不附共黨的教員護士牧師等人計算，已達六萬人。美越軍遇上這樣無處不擊，無人不殺，獸蟲皆兵的越共游擊隊，那簡直是「小棒打蚊羣」，怎能取勝？

二因其不長於山澤戰，越共除出沒於山澤中以誘擊美軍以外，並可根據這種不易攻防的地形，設下各種陷阱，使處處變為無可活動的山林澤沼，動即陷入。如埋藏地雷於僻地，接通其觸發線於路間；如裝置手榴彈於酒瓶，用金屬線連繫於放在鄉村小屋門口的長凳子上；如挖裝炸彈於書冊；如暗藏小型塑膠彈於車、籃、籬、櫥、桶等等可以傷及人的地方；如在屋外懸掛越共旗幟，旗桿下暗藏爆炸物；如在小穴洞底遍插尖釘、竹刺、或埋藏炸藥；如在密林深箐之間，裝上炸彈或尖釘；如是種種方式，處處皆是暗機關，只須美軍一踏上，一移瓶，一搬凳，一揭書，一拔旗，一陷足，一觸及，不死也傷。截至一九六六年底止，美國二萬五千名陸戰隊第一師百分之五十的死傷，南越七萬四千陸戰隊百分廿五的傷亡，不是主要由於吃上這些暗器的虧麼？且明知是越共佔據的坦地，例如稠密的鄉村，但也早被視同陷阱，若大膽轟炸，傷害平民，即遭各方痛罵。如是種種，美軍雖已在講求對策，但又怎能完全根除呢？到處陷阱，即到處是越共的陣地，而決不是美軍的陣地，美軍既無地可陣，如何能攻必克，戰必勝？

三因其不敢作肉搏戰，越共即可採用中共發明的人海戰爭或人民戰爭的戰略，使美軍無論增加到五十萬七十萬，仍只如小巫之見大巫。這種戰略的特點，是正軌軍採前進配備，民兵加強縱深，誘敵深入就殲。以之行於越南，尤為有效，因為越共三面無敵，只須一面迎敵，可以集中兵力於一面，實行其殲滅戰。因為越共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內部意力集中，民衆悉受驅策，絕無後顧之憂，儘可實行其挺進戰。因為美軍進攻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是不求勝利的，越共即每次都能以衆擊寡，儘可

實行其包圍戰。加以美國駐越司令部方面的觀點，又正是共軍更可發揮人海戰的據點：一是他們認定兵員是美國的財寶，不值得與共軍作人海戰。二是他們認為不想使大量部隊充斥越南基地，損及越南經濟。共軍可乘之機既如此之多，美軍砲火雖烈，也會被共軍「聯袂成風，揮汗成雨」的大風雨沖沒颳死了的。

四因其不敢夜戰，越共即可不分晝夜，到處襲擊，使他們白天煩疲，夜更怯餒。並且中共使美軍喪膽的夜襲，由來已久。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清晨的中共行動，被他們叫做「安平屠殺」事件的第一次教訓，美軍是不會全忘的。那時共軍用迫擊砲與機槍，突襲由天津到北平的一百名美國海軍陸戰隊，使他們死了四人，傷了十六人，他們雖會下車還擊，但只像射擊鬼影一般，沒有射中一個，亦未找到一個共軍的彈殼。其後三十個月的時間內，他們在這北部地區又遇到這種神出鬼沒的襲擊十八次，傷亡人數增至四百五十餘名。那時所用各種狙擊方式，如置石塊於汽車途中，使美之運兵車輛不能通過，如下車搬石，即遭伏擊，柯爾文少尉即由此送命。如一九四七年聖誕節，一隊共軍一看到正在青島附近狩獵野鴨的五名美軍，忙脫帽招呼，美兵正想還禮時，共兵已開槍射死其中一人，生擒四人，這五名陸戰隊的失蹤，迄今猶成爲美國對中共交涉的懸案。由中共伏擊安平美軍起，至一九四九年初美國陸戰隊全從中國撤退止，不到四年之間，中共便在中國成功了，接着不到十八個月之後，美國大量的海軍陸戰隊及其他軍人又在韓國犧牲了。何況今日在越南的美國子弟，更害着嚴重的「恐夜病」，都怕黑夜一到，生命難保。

五因其不敢採取進攻戰，既怕進攻北越，將招致中共軍的大規模介入，又怕轟炸或封鎖海防港口，必將受蘇俄軍艦的反擊，引起大戰，就只得驅逐越共返回十七度線以北爲其作戰目的，這怎能

阻止游擊隊毫無顧忌的行動？即使南越真能在長達四十哩的非軍事區之南部，用地雷、鐵絲網、碉堡築成一道屏障，完成其所謂柵欄計劃，防止越共南進，但由於南北越的非軍事區，從中國海迄廣治省東部犬牙交錯，絕不同於南北韓非軍事區的形勢，又怎能有效？堅強如馬其諾防線，尚且變成廢物，何況這種極脆弱的柵欄？更何況美國正苦兵力不足，今在越南戰場上平均每哩只能配駐二人，早已無力主動出擊，復須協辦鄉村綏靖；及越共使用俄製一四〇火箭以後，更加重了美軍軍力的負擔，又有什麼餘力能助越軍防守柵欄？又即使美軍能再增加，越民亦不怕死，必能攻破柵欄，美國在建築這條柵欄時消耗鉅大財力物力的結果，除幫助共黨達成其消耗戰的目的以外，勢將一無所得，且已有事實可證，僅六分之一為北越人的越共，尚能就地取材，裹脅南越民衆到處進攻，凡其所到之處，美越軍已不能守禦，則此種柵欄縱能堅如鐵壁，反足激使越共作背水之陣，為困獸之鬥，愈將拚死與美越軍周旋，豈不是比共黨司令部所作的激勵更為有力？美軍既如此作繭自縛，共軍自更游刃有餘。

此外，共黨所以能輕易推翻原有的政府，除用「空心戰術」，「滲透各階層各社團各鄉邨各機關，使各離心離德以外，就是用「恐怖戰術」，襲擊各軍隊各都市各交通運輸線各政府人員，使各怕神怕鬼。這樣的空其內，擊其外，化明打為暗擊，從四面攻一點，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使對方處處陷於被動，人人朝不保夕，所以易如探囊取物。在這種戰術下，美國在越南即使用盡各種新武器，亦只能延後其敗北的時間。

中共的想法做法若真完全如此，亦非完全無理。在這個地形特殊，敵技詭譎，既無戰線而又隨時隨地都是戰線，既不易遇到敵人而又隨時隨地會遇到敵人的越南戰場，就是以閃電戰擊潰了阿聯軍隊的以色列名將戴陽，經其實地考察後，也曾認為美軍不能僅靠武器制勝。既如此，則與之對壘的美



軍，除一舉而擊破其頭部，即攻佔其政權所在地，再繼之以清鄉工作以外，要是仍用拳擊賽式的就地對打，或使大於越共四倍的美越等聯軍一百二十萬人，日耗戰費七八千萬美金，並不惜再擴大在越南子弟九分之一的傷亡率，永與敵人捉迷藏外，總是難於致勝的。中國政府的攻破其瑞金偽都，是初次奏效。再攻其延安新巢穴的部署，倘非東北部隊被其滲透，造成西安事變，則今日的中國大陸，必仍在中國政府憲治之下，既無過去的韓戰，更何來今日的越戰？不過改變戰略戰術，應先根據事實改正政略，倘仍認為中共將公然出兵，而竟無視美國多次增兵，多次轟炸北越軍事目標而中共迄未採取進一步行動的事實，及蘇俄亦未敢在美國壓力之下而不撤退其古巴飛彈的事實，與其假道中國大陸頗多阻難的事實，及其尚未敢公然參加阿聯與以色列軍事戰的事實，而祇是自己嚇自己，依舊根據圍堵敵人並已失效的政略，採取有限度的戰略，以對付並無固定戰場的敵人，則其結果除被中共一一料中外，恐沒有什麼奇蹟出現。

二〇、美軍根本違反戰爭原則：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為美軍不但不懂共軍的戰術，並根本違反戰爭的基本原則。其所以違反，由於自恃其火力強，人氣壯，諾曼第登陸固靠此成功，今後登陸府敗戰式的再現，亦將由此導致。例如戰爭的第一原則，開始就決定其目標在消滅敵人的威脅。可是美國在越南作戰的目標並非如此，只望把越共趕回十七度線以北去，這就已經由自己造成了全盤失敗的基礎。第二個原則，既是戰爭，就得進攻，只有進攻纔能致勝。可是美國陸海空軍都只是採取攻勢防禦的戰略，即或前進，亦自定限度，這又如何能勝？第三個原則是，集中足夠的兵力，攻克敵人最重要的據點，使其首尾不相應，全局都崩潰。可是美軍經常分駐於南越四個兵團區內，僅在戰術性的作戰中，纔集結部份兵力，以求一逞，這不但不能取勝，反予共軍以各個擊破的便利。第四個原則

是，巧妙地集中兵力於敵人不預期的地點、時期，予以不預期的突襲。可是美軍是對採用游擊戰術的越共作戰，根本找不住突襲的對象。越共又已滲入越南各階層各機關，一切軍事行動的計劃早被窺破，根本無法進行突襲。美軍本身也因裝備累贅，行動遲緩，即使突襲，亦不能獲致宏效。空中騎兵師雖能補此缺憾，但能攻而不能守，又有何用？第五個原則是，自處於極安全的地位，任何行動都不爲敵人所偵悉所破壞。此則美軍絕難辦到，不但行動都受華府牽制，即華府的決策亦時受左傾份子的干擾，這又如何能保密防諜？第六個原則是，無論戰略性的進攻或戰術性的突襲，總須絕對機動，始能進退自如，攻守咸宜。可是美軍的處境則完全不適合於實行此一原則，它即使不遇上越共寮共泰共東共中共俄共國際共這樣深廣的配備，而僅就其自身的深廣牽掣看，如在美軍之旁有越南軍有韓紐澳菲泰軍，其後有遠在數千里外的五角大廈，有顧慮多端的白宮，又有七嘴八舌的國會學府報館，處處給它留難，它又何能運動自由？第七個原則是命令簡單明瞭，可以貫徹到底，不會發生一些偏差。可是美軍不然，前線將士應該如何行動，進攻何處，要做些什麼民事工作，不要如此這般，統由華府的文官傳達，這已經複雜萬分。並且正在遵辦時，又往往接到幾道補充命令。僅應付紛至沓來的命令已够忙亂，更何暇自定迅赴機宜的計劃與行動。第八個原則是，以統一的指揮，處理瞬息萬變的軍情，進行勝敗攸關的戰鬥。可是在越美軍的命令，向由總統傳給國防部長，再由國防部長傳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然後付給戰區司令官，轉發與陸海空部隊司令官，重重指揮，層層轉達。不但如此，即僅就美軍在南越境內的情形看，亦四分五裂，本應統一的政治軍事外交，亦由美軍統帥部、大使館、中央情報局分別負責，產生了脫節牽掣抵觸等毛病。在越南指揮美軍作戰的魏摩蘭，名爲總司令，實際只是一個傳令兵，連一個直接指揮和調協陸海空軍作戰的聯合參謀也沒有，又如何能收指臂相使之效。

這八個基本原則都不遵守，只是靠着火力亂燒，就是燒焦了赤壁，也不會像周瑜孔明那樣戰勝曹兵，胡志明也終將在奠邊府再一次的殲滅敵兵，這是可以料定的。

中共要是確持這些看法，當然有些過甚，但亦大體不錯，證以在四天內以色列就擊敗阿聯的戰例，就可知其大部份看法的正確。如就目標的原則看，以軍是完全遵守的，它早知阿聯蓄意毀滅以色列國家，除集中全力從事於消滅阿聯侵略力量的準備以外，始終沒有考慮過與阿聯商談什麼共存的問題，不浪費一寸光陰去與虎謀皮，全國二百五十餘萬人民亦都澈底了解其政府的決策完全正確，爭向着消滅阿聯侵略的這一目標朝夜努力，故能全體一致的一擊全勝。美軍沒有能如以軍恪守這個目標的原則，所以至今未能勝敵。就攻勢的原則看，以軍是完全遵守的，它在軍事行動一開始，就採取攻勢，先動用空軍炸毀阿刺伯的全部機場，再用陸軍三個師攻入西奈半島，殲滅埃及陸軍七個師，同時攻入約旦，斬斷埃及的左臂，並用輕兵對付敘利亞，使它不敢前進，待壓垮埃及以後，再調裝甲部隊進攻敘利亞的陸軍，以收各個擊破之效。從天空到地下，都厲行主動攻勢，故能使敵人束手。美軍沒有能如以軍這樣恪守這個攻勢的原則，所以至今未能勝敵。就集中的原則看，以軍是完全遵守的，它一經決定作戰，就集中百分八十以上的空軍力量，齊向敵方機場猛炸，集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陸軍力量，齊向西奈半島猛攻。而將一小部份軍力分防約旦、敘利亞，故能殲厥巨魁，迅奏膚功。埃及的統帥則不然，既不知密集兵力去猛攻以色列的軍事基地，亦缺少指揮全軍的才能，其他盟軍更各自為政，自始即無協同作戰的計劃。在越的美軍亦然，其數量雖已近五十萬人，但大半分擔各處基地的防守任務，其中真能上前線作戰的，恐不到三分之一，並且不能集中運用於每一戰役。以阿美軍勝敗之分，自亦與此集中軍力的原則是否遵守有關。就突襲的原則看，以軍是確實做到的，它在三條戰線的進攻

地點，分配兵力，進行時間，都出於敵人意料之外，所以能出如兔脫，烈如霆擊，使阿軍不及還手。美軍對越共固無從突襲，對河內又不敢突襲，就反將突襲的勝利等閒送給敵人了。就安全的原則看，以軍亦絕對辦到，朝野上下困心衡慮，動心忍性，一以防諜爲急務，以保國爲天職，絕無叛國份子立足的餘地，亦無和平運動的出現，故能在平時則謀於九地之下，使敵人不覺其可畏，在戰時則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不知如何抗，故能攻守咸宜，十九年來三戰三勝。它在這次戰爭中的戰略，主要在於攻擊沿海綠洲地區，並加強防衛本國邊境加薩走廊南端的阿布阿西拉，此外並攻擊西奈中部的坎第拉，使得埃及不知其主攻目標究在何處。尤妙的是它早知約旦是頑強的敵人，就在它力攻埃軍時，對約旦的砲擊並不立即還手，直待其軍隊進至非還手不可之時，纔予以圍殲，使胡笙王大出意外。在越美軍既無精確的諜報系統，又無周密的防諜系統，從華府到南越的舉動，都裸露在敵人面前，全無安全可言。就運動的原則看，以軍更做得極妙，一切行動都能操縱敵情，使之慌張失措，如埃及預料以色列空軍必從西奈半島北方或東方來襲，以色列亦擺出從此方面進攻的姿態，事實則是從西面偏南攻入。埃及預料以色列空軍的出動時間必在旭日已升之後，亦必爲雷達所能瞞及之點。而以色列則偏擇埃軍朝食之時出動，偏在雷達搜索不到的低層前進；而其裝甲部隊與空軍的配合行動，亦非埃軍意料所及，完全運用孫子兵法「聲東擊西」的原理，極盡其機動突擊的能事，如何能不勝。美軍對越共作戰，則完全出於被動，完全與運動的原則相反，如何能不敗。就簡明的原則看，以軍亦完全符合，從元首到小兵，都只知作戰，只求戰勝，觀念簡單明確，行動單純齊一，真能了解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真能做到意志集中，行動集中。在越美軍的遭遇，則完全與原則相反，不切實際的繁複命令，已把前線將士攪的頭昏，又怎能集中精力於作戰。就指揮統一的原則看，以軍亦徹底符合，

不但令出於一，並且動合機宜，連校場上的紀律亦被視為戰地效率的障礙，而毅然予以摒棄，一惟指揮官的戰地命令是遵是行。美軍的行動準則則全不統一，更與人自爲戰的越共游擊隊大相逕庭，這就無怪指揮者的繁多，直與美軍殺死一個共軍要費三十餘萬美元的代價相同；而越共殺死一個美兵，亦如其指揮者的少，僅需五十萬元了。詹森政府如仍不能鑒取以軍致勝的明白教訓，遵行戰爭的基本原則，則美軍最後的命運，豈不真被中共所料中。

二一、美國最不得人和：在中共眼裏，可能認爲美國由於驕傲過甚，難得他人合作。一如在美越軍方面，由於美國一面作戰，一面謀和，戰既不求勝，和亦難有效，越軍正疑此戰等於白費，甚至會被出賣。又由於美軍使越軍擔任綏靖工作，被越軍認爲這是降級的恥辱。越軍目覩美軍的盛氣凌人，亦常感不滿。二如在美軍與越南人民之間，則因其生活水準甚高，所到之處，各物即隨之漲價，頓使越民朝夜感受切膚之痛。加以言語不通，更增隔閡。美機轟炸的禍及平民，美軍巡邏的誤捉平民，則愈使越民憎恨。而在美軍的主觀上，亦視越民爲半開化民族，常有子女玉帛予取予求的行爲，流露於不自覺之間。至於因越共越民中共的膚色相同，無從辨認其誰是暗殺狙擊美軍的兇手，乃顯露其疏遠並痛惡越民的聲色，亦常不免。三如在美軍與越南政府之間，則因越南政府財稅收入減少，百官俸給菲薄，工作效率降低，常遭美軍白眼，甚且越俎代庖，遇事擅專，幾使越南政府有一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感。及傅爾布萊特竟說阮高祺由美國支持，亦可由美國逐走，引起越南外交部長的怒責，即益深畛域之見。以如此的優越感，如此傷害他國政府的自尊心及其對人民的威信，只有「美帝」敢爲。四如在美軍與其盟軍之間，亦各存和戰的歧見，美國在以戰迫和，韓越兩方則慮和將禍及自身，意在作戰到底，紐澳兩方則又慮戰火將燒及其本土，意在能和即和。五如在前線與後方、或軍人與文

官方面，無異兩個壁壘，在越司令官成爲華府的傀儡，進退動止，要聽後方指揮，否則就會遭遇到麥克阿瑟在韓戰中那樣的命運，並且他們受到的限制，比麥克阿瑟還多。則魏摩蘭今後的命運，可能亦與麥克阿瑟相類。

尤其可被利用的幼稚事，是國會議員和報館主筆的一些議論，可以直接指揮白宮主人，間接威脅戰地將士，將士已苦於動輒跌倒在戰地的捉迷藏中，他們又在後方大放其「流淚彈」，同時把「長程流淚彈」射到前線，使民氣戰志跟着低落，使白宮國務院老是眼淚汪汪的只想和解，魏摩蘭看到了紐約反戰遊行後所說的「我在國內這塊無法用真刀真槍作戰的戰場上，竟看到了敵人成功的跡象」，真一些兒不假。同樣可被利用的幼稚話是，莫過於「戰爭昇級」這個名詞，任何戰爭的目的，總在擊敗敵人，只要可以達此目的，則雖向中立國假道前進，亦儘可大膽幹去，何況本是敵國的土地，更何況在共黨的戰術之下，早無前後方之分，軍民之別，本無什麼昇降進退可言，而今美國政府竟說「昇級」「昇級」，不但不合戰爭邏輯，反授反戰份子痛責詹森「贖武好戰」的話柄，反給剛纔前進的將士迎頭痛擊的橫禍，反增加他們與政府之間的尷尬情形，與國民之間的不愉快氣氛。如果說「地利不如人和」，那麼他們既不得地利，又大失人和，不敗何待？

中共的如此看美軍，恰是看對了的。如果美國各方不痛自懲，則雖不致蹈法國在奠邊府的同樣覆轍，但無論在戰場或議場上的勝利，都很渺茫，却可斷言。尤其「反共戰爭演成反美的民族戰爭」，則因美國軍民與越南軍民及雙方政府間的齟齬磨擦於內，中越俄共黨的挑撥煽動於外，更將不易消弭。

### 第三章 美國應有的對策

#### 第一節 改進人民思想陣地

一、六種心理缺陷已累及外交鬥爭：任何行動的決定、策劃、及其結果，都靠認識。美國人民固然不甚認識共產黨，政府中人亦不够深刻，有時且不免錯誤。美國與俄共交手五十年，與中共交手二十多年的紀錄，甚少成就，就由於認識不足。

自蘇俄政府成立至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期間，美國吃够了不瞭解共黨的虧。初則因鄙視蘇俄新政權的叛離協約國陣營而不予承認，繼則僅視承認蘇俄有利於商務經濟的發展而不知戒懼，又繼則因厭惡蘇俄的極權政治而不願多與往來，其後則全反所爲，因痛恨納粹德國的侵略而遽與蘇俄合作，因急於結束對日戰爭與恢復中國的和平秩序而更予蘇俄中共以朋比爲好的便利。

二次大戰終了，美國人民被勝利所陶醉，不再注意世界情勢，致在冷戰期間，因不瞭解敵情而致失敗的事例更多於前。一是由於不瞭解共黨向視和平爲戰爭另一方式的觀點，不知針對它的想法作法，特別妥籌戰後世界和平方案，堅決進行，而仍認爲處理戰爭的善後問題及戰後的世界問題，祇是戰爭本身最後一階段的工作，儘可像戰爭那樣單純的迅速的解決，而不認爲它是戰後時代中一個完整而複雜的部份，是需要特別安排與努力的另一問題；又認爲蘇俄既與各國聯合作戰，亦將能與各國共謀和平，且以爲聯合國一經成立，和平即可維持，便在對俄外交軍事的準備方面，吃盡了思想簡

單，行動遲鈍之苦。二是由於不瞭解共黨世界革命的策略，是在攪亂世界的秩序中捕捉利益，共產國家以外的不少國家，又各國不滿現狀，正在求變，這正是戰後共黨發展的好機會。可是美國則以維持世界和平、秩序、安定爲有利的觀點，定爲外交政策的原則，反顯得蘇俄的做法符合各國的期望，美國的想法違反世界的潮流，便在一切對外交涉方面，吃盡了認識偏差，行動背時之苦。三是由於不瞭解過去歐洲帝國主義給予弱小民族的種種痛苦，遂亦不瞭解它們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意義，更缺乏應付的準備。當此種情勢展開之時，雖仍表示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但對於它們的革命行動，甚少積極支持，有時反加以阻止，致殖民國家與反殖民國家都不滿意，甚至倒向蘇俄方面，吃够了認識不清，經驗缺乏之苦。四是由於不瞭解俄共集團以外各國的差別需要，及其對某種問題利害關係的不盡相同，只是把這些國家看作同一範疇，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世界的趨勢，把自己歷史的現在的生活方式與需要，去誘脅他國攜手，終致隔靴搔癢，自增苦惱，受够了觀感錯誤，行動呆板之累。五是由於不瞭解蘇俄的外交技術雖然機變百出，有時且顯出野蠻下流，但其第一目標總在鞏固其獨裁權位，其次始在進行其擴張政策，乃見不及此，只對其向外發展的行爲，作簡單直接的攻擊，而不知先就其內心的需要與恐懼之點，說服其只有與民主國家和平合作，纔能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下保持其權位，否則結果必然相反。即令偶生此種想法，亦很少積極作法，更不懂此種心理作戰的重要與方法，纔使蘇俄當權派感覺只有向外生事，始能鎮壓國內。又正因爲不懂心理戰，致美國人民相率陶醉於蘇俄侵略行爲的遽被遏阻，而不知美國的世界和平目標並未達成，及僵持局面的後患堪慮。從一九四六年延至今日忽張忽弛的冷戰形勢，顯已侵蝕了美國人民的政治警覺，助長了美國人民的外交情心，這無疑是不瞭解國外敵情國內民情的結果。六是由於不瞭解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美國地位的強盛，



在世界歷史中無與倫比，無論對世界有所作為與否，都會產生全球性的影響，必須負起廣泛而持久的責任，只感覺大戰已了，如釋重負，不再深思及此。同時不瞭解向居世界政治中心的歐洲各國，經過兩次大戰以後，無論在經濟、人口、心理各方面都呈衰頹現象，已喪失其過問世界大事的能力與興趣。尚未完全開發的亞洲，則因英日法在此地區的勢力，已隨戰爭結束，其本身又無一個權力中心，便到處呈現動亂不安情況。地接歐亞兩洲的蘇俄，遂得以乘隙奪取柏林為席捲歐洲的跳板，以赤化中國為囊括亞洲的起點，致美國窮於應付，各國大失所望。二次大戰後世界形勢的如此逆轉，無疑是美國對其戰後使命缺乏認識與準備負荷的自然結果。

造成這六種不識敵情世局的共通因素，則為自滿心理，惟自滿方便願意求知的人類正常心理，形成不再求知的顛覆頭腦，變為心理上的一種缺陷，於是對於國際問題應有的看法作法，也就被誤於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景之下了，這正所謂「滿遭損，謙受益。」

二、五種心理因素又攪雜外交技術：這些心理上的缺陷，已構成外交政策上的差錯，不幸實行政策的技術，又因各種心理因素與傳統作法的滲入，致混亂無準，差錯更甚。如一，其先由於拓荒時代可以避難就易，擇地墾殖，無須慘淡經營，便有收穫。其後又由於社會經濟發達，謀生不難，即或失業，亦獲救濟，從古至今，既少鍛鍊忍耐性習的環境，對於國際大問題的內容，遂有不求甚解，不願苦幹，只求迅速解決的傾向。甚至更使理解淺急，以為既懂共產思想，則對於蘇俄行動已得最後答案，而不再求知它們的對外技術最有彈性，交涉結果亦不乏例外。政府雖了解處理問題的程序技巧，亦因經驗薄弱，不易得心應手，有時且破綻百出，這種外交表現，就更增加人民的厭煩，更與蘇俄以可乘之隙。如二，由於地大物富，得天獨厚，並由於立國至今，外戰皆勝，遂養成易視世間事的

心理，以爲凡事都可以在美國的崇高原則巨大力量之前幹成，至於如何纔能達成期望，則不甚研求。即使偶然想及，又覺得美國特別有效的工商管理技術，既可移用於管理國防大事，自亦可移用於處理國際事務，此種簡單死板的觀念，膠柱鼓瑟的手段，反使本非盤根錯節的問題，轉生枝節。如三，由於物質的戰史的及政治經濟制度的各種獲利因素，已養成人民特別強烈的優越感，一遇國際大事，總想自執牛耳，要有關國家聽我指揮，甚至懷疑其他國家的任何動機與行爲，拒絕他國貢獻的意見，又甚至嫌惡聯合國的議論多而成功少，頗想脫離其糾纏，另造國際壇坫的新貌。即使標榜合作，廣訂協定，亦仍以自我爲中心，不願自居於夥伴，不自覺其盛氣凌人的聲色，已使人貌合神離。及自覺失當，急謀補救，但亦不出於「美元外交」的運用範圍，且於援助的技術態度，不但很少注意，並不免有德色，致本可親密合作的與國，往往隨某一問題的解決而終止。如四，由於美國人的多數祖先，本長大於一種孤立氣氛之中，很少受到外來的影響，具有孤立色彩的華盛頓的告別書，與門羅主義的提出，都產生這種背景之中。兩次世界大戰的功効，雖已使美國人瞭解不再能獨善其身，但並未給予美國人以共同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且更向相反方面發展，越發強固其對外戰爭總得勝利的優越感，越發不重視如何聯結與國去達成其改進世界目標的必要技術。雖屢次碰壁，亦只恨壁太多，不認手太拙。如五，由於美國長期免受外來壓力，人民既有安定的環境從事工商業的經營，政府亦由此忙於解決各種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複雜問題，遂致眼光心力的焦點，經常集中於國境以內，只對於處理與他們最有直接關係的事物最感興趣，在競選總統時，雙方都以辯論內政問題爲主，而避免演講超國家性的國際問題，即由於此。本此習慣的觀念與作風，其外交政策中的思想目標，遂有消極多於積極的趨勢，着重於攻擊敵人，而少重視其所應達成的實際願望，自更不重視達成其願望技術。

三、三大特性又織就自縛羅網：無耐心，感優越，習於孤立，這三大主要特性，又都有互相助長的性能。而其深度廣度速度加强的結果，更削弱其應付國際事務所必需的知識、眼光、心胸、魄力、方法等勤求進步的努力。三者相激相盪的情勢，亦很易看出。如既因大戰勝利的關係，就不再探求國家的新使命，致安於現狀，坐忘後患。如既無準備又無耐心應付國際間事，而國際間事却又迭起紛至，自會祇憑優越感用事。既感覺天下仍多事，而又在較小問題上曾經獲得解決，就更感覺吾能獨了天下事，致發生一種過份的優越感，乃至過大的使命感，同時也更以為處理一切事殊無耐心漸進堅苦奮鬥的必要。而其在政治外交社會各方面傳統的時隱時現的孤立氣質，又極易引起兩種絕對相反的動向，一種即是「捨我其誰」的優越感，自以為是的自信心；另一種則為對什麼都不信任的反射作用，走向極端的懷疑主義，致不屑與人合作，合作亦不融洽。這三種特性互相助長的結果，已使美國人民的精神上逐漸走入一種真空狀態，在行動上則表現為幼稚、偏激、叫囂、迷惘、游移等等十分混亂的狀態，而其已經反映在國際上的，則已有目共覩。

如在國際問題的看法方面：更愛用自己那套極簡單的是非善惡標準，並堅信其標準最卓越，再無耐心去細究他國情形的殊異，問題的複雜。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遇共黨作亂的國家，即視美式民主或聯合政府為萬應靈丹，伴隨軍經援助一同輸出。在冷戰期間，把蘇俄的一切行動，總看成一個固定的情況因素，應付之以「一切不同意原則」，簡化為一種絕對是非性的看法與對策。又如在國際問題的解決方面：只求速效，最恨拖延，對任何問題總想找出一種迅速而容易了事的途徑，致對於尋常外交慣例，每感覺不耐煩。幾經挫折，即又自覺短兵相接的外交戰，縱橫捭闔的外交工作，並不擅長，最好閉門不管，至少亦不願為政府後盾，頗有由自卑感形成了漢的心理傾向。但又因騎虎難

下，欲罷不能，便不免走入兩極端，要求攤牌，非和平，即戰爭，非猛進，即撤退，非走世界一切由美國重新安排的新孤立主義路線，即仍走不再管世界一切的舊孤立主義原路。巴黎和會中威爾遜總統處理戰後問題的雄圖，即是試走新路線的見端，及被列強打回後，便來一個大反動，不肯參加任何國際活動，甚至對國際法庭的加入，參議院亦堅決拒絕，即是仍思走原路的表現。尤其最近十年來對共政策的變動不定，最能反映此種心理弱點，初則認為圍堵政策最為省力，旋又覺其並無近功，即意氣揚揚，改唱解放政策，不久又認為不易貫徹，即又採取旁觀態度，匈牙利革命運動的失敗，猶太事件援助的中止，應由此種心理負責。同樣反映在越戰方面的，更為清楚，介入了八年，始終不敢大戰，軍人要前進，文人扯後腿，一般人民則已不耐，不進攻，便撤回，總算迅速了結，部份國會議員則主張不過問歐洲，退出亞洲，掌握核子優勢，依靠兩洋防線，坐待世局演變。由此政治上孤立主義的激盪，又挑起經濟孤立主義的逆流，一九六七月間，即有部份國會議員提出各種有關貿易保護法案達數百件之多，可謂奇特而其實並不奇特。像這些心理的引起，政府雖應分負其促成之責，但美國人民優越感的作祟，畢竟為其主因。這在美國應付同盟國及非共國家問題時一般人民顯出的態度，更是熔化不了的鐵證，人民總覺得美國的政策是最正確的，這些國家定會與美國合作，再無耐心去了解各項合作的各別限度。只要一見他國與己立異，便疑其傾向共產集團，反使蘇俄獲得意外的收穫。

且由於優越感的橫梗胸中，處事每不免粗疏浮虛。國際事務何等複雜，可是處理的方針即因此空洞抽象，除決策者自己心裏有數外，很少作過清楚確實的公開表達，國內外人都無法真切瞭解。依據方針製定的具體計劃，亦受優越感的影響，往往過於廣漠，正與常求速效的國民心理相悖反，甚至有些計劃是爲了應付根本尚未發生的情況，而與已經出現的實際問題無關，致格格不相入。其推行計劃的

技術，則與計劃的缺點正相反，計劃之病在空泛而不確定，技術則在生硬而少彈性，只是根據自己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強使他國無條件照辦。有時雖已感覺技術的重要，力求改進，但仍是美國式的做法多於他國環境的差異，加以驕矜的本色，復沖銷了改進的部份。及發現步步錯誤，不憚虛心求益，却又過猶不及，只把不成熟的抽象觀念，變成概括的原則，提示於人，終致結果變質。威爾遜總統十四點的崇高原則，得不到國內外的擁護，顯與其計劃過於廣泛，技術過於拙劣，直接訴諸民意的宣傳工作亦甚疏忽，有極大關係。羅斯福總統處理國際問題的才能經驗雖然較佳，但仍敵不過史達林伎倆的鬼域，致安排戰後歐亞兩洲的計劃，與其政躬同歸於盡。杜魯門總統依據羅氏安定亞洲的藍圖，欲使中國成為戰後亞洲的中心力量，固未失誤方向，但又由於不認識共產黨，尤其不認識中共，以為先調解國共紛爭，再結合國共力量，即可使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強大國家，反因一着之錯，造成中國大陸淪陷，引起亞洲全局動搖。韓戰突起，顯然是補救以前失誤的絕妙機會，却又誤於政府太短視，人民求苟安，合作的技術又太差，致佳境變成禍淵。當時雖得高揚聯合國大旗前進，雖有十五國並肩作戰，而印度却指責麥克阿瑟統帥進攻鴨綠江的必要戰略為侵略，攻擊聯合國譴責中共侵略的決議為荒謬，英亦抗議美國的反對中共過於硬性，其他出兵各國亦都怪美國太霸道。更錯誤的是，由於不反共的戰略，形成有限度戰爭的戰略，導致攔阻中華民國軍隊渡海痛擊中共之背的一大失策。甘迺迪總統少年氣盛，頗思有所作為，但因經驗不夠，而又為蛋形學者不健全的觀念所左右，遂致正確的目標，合理的原則，均被不老練的技術所推翻。例如目標本在使南越政府更有利於對共作戰，原則本在使其政治社會能够民主自由，可是由於手段虛莽，性子躁急，認識不深刻，竟同意煽共份子推翻了吳廷琰的文人政府，搞得政變由此迭起，經濟由此益枯，戰爭愈加困難，致歸屬於政府的土地人民尚不如一

九六三年時期百分之七十五那麼的多，財物的收益尚不如一九六三年輸出的白米三十萬噸那樣的好。詹森總統承頂艱鉅，竭智盡能於越戰，但亦被困於美國人民的性習，至今尚無從放手幹去。

反視蘇俄，則益見美國之失。它在外交鬥爭的基礎上，開始就從心理方面下手。它懂得一般人類大致相同的好惡，就在世界各地儘量利用人類的不滿、厭惡、害怕、希望等心理，又能運用切實的語言行動，使其攻心戰術確能發生作用。並在世界各地，儘量宣傳美國是人民公敵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戰爭販子的帝國主義國家，一以抵制美國的反對其擴張，二使多數國家更能同情自己，背棄美國。它能在各國的社會組織中都成立一個聽其指揮的共產黨，至少亦能成立許多與它呼應相應的外國團體；而美國則無此能耐，祇是直覺地把「自由」去代表一切與共產黨擴張主義奴役主義相反的觀念，把「自由世界」去概括所有非共國家，並即認此為反共戰線的基石。而對此若有若無的基石，則又自定一種衡量其價值的簡單標準，只要這些國家的行為愈接近於美國的希望，就認為它的道德水準亦愈高，愈願予以援助。據此相較，已可證美之不及。不幸事實的反映又往往與美國的期望不相符合，而又不能忍耐，不知反省，致在此基石上產生了相當大的缺口，更與蘇俄以滲透的嫌隙，終致最重要的思想陣地，不斷讓給蘇俄輕易佔領。

今後史家如論及五十年來美國外交失敗的因果關係，諒必直書為：人民的素質，影響外交政策的實質，及實行政策的技術，致降低外交行動的實績。

四、舊習性更不能適應今後新形勢：由於國民特性的影響，會使美國政府在處理國際重大事務方面，經常受到阻撓，各種阻力如不能化除，或竟加強，則處理今後國際事務自更困難。展望世局趨勢，毛派路線必被斷塞，中共如不是偽裝改變，即為愈趨威脅，蘇俄擴張主義更必伸入中國大陸，美

俄的政策與行動將必在中國大陸及亞洲地區正面衝突。但大勢所趨，共產主義的侵略暴行，終必被時代潮流所沖刷。只是浪花過大，世界仍將動盪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那時許多新興國家，特別是脫離蘇俄控制的東歐各國，均將各求滿足其久被抑制的慾望，發洩其多年鬱積的悶氣，此種潛流，勢必到處噴出。在此新形勢下發生的新糾紛新問題，必將與時俱增，且其要求改變環境的急迫而普遍，亦必更甚於以前。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尚因忽視各國求變的需要而為蘇俄所乘，蘇俄曾以世界革命的口號，騙得許多國家疏美而親俄，今後倘使故態復萌，甚至感覺美國已為世界惟一強國，則各國嫉視美國的程度，最低亦不會低於以前。以前尚可用危言聳聽的宣傳方式，單線進軍的戰略，激使人民對抗人類公敵的蘇俄，今後則因美俄兩巨強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俱已縮小，世界已遠離美俄對抗的狹窄天地，國際關係的流動性成為常態，美如不能多方應付，勢將到處樹敵。以前尚可披上對抗共黨的外衣，慫恿國會迅速通過重大法案，如「國際合作總署法案」的能在化繁為簡之下，不遭疑阻，如幾次越戰巨額經費預算案的能連參眾兩院照數批准，今後蘇俄及各國共黨勢力則已不再被人民重視，而解決許多新問題的新法案，則勢必陸續提出。此時既無公認的大敵可資利用，即易使各案沉入黨派紛爭的海底。倘竟由此引起共黨勢力的重振，並非絕不可能。即或不然，而美國的不能永遠獨強，另一強國或數國的將為形勢所造成，亦已有兩次世界大戰後日德俄崛起的事實可證。且美國人民優越感的提高，又很可能和共黨勢力的衰頹成反比。那時如果輕視崛起的強國，而以為美國儘可獨力對付，則更將貽患無窮。當希特勒咆哮叱咤時，一般美國人不是看他只像一個卡通片上的英雄麼？不是直等到聯軍在歐洲的立足點縮小到只剩下英倫彈丸之地時，纔發覺美國所以能不捲入歐洲漩渦，係受英國海軍的掩護，纔放棄中立觀念，急與聯軍合力抗德麼？當年如此，今後就很難不如此。

美國政府所以常須利用敵國外患鞭策人民，纔能使人民勉強接受其政策，而其所得的一些功效，不久又每被蘇俄硬硬兼施的外交戰術所損毀的基本原因，則在其建築於國民習性上的政策並無明確堅定的思想體系，可以作為最高的指導原則。究竟美國思想是什麼？美國人向無定論，又如何能憑此產生一套具有控制性的外交政策目標，使人民能向此目標準備與政府共同努力。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從來只有一種道德性的抽象原則，一九六三年魯斯克國務卿廣播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五個目標」，解說雖較明白，但仍缺乏完整體系，一經當時副國務卿麥克希譽做「木棍和蘿蔔」的集合體，就更使人發生「重點何在」之疑，直與「圍堵而不孤立」的自造矛盾，自毀功效相同。其對於達成目標所必需的各種細節問題，自更無從提出正確的答案。連前國務卿艾奇遜也看不慣，忍不住，曾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演講於艾姆賀斯特學院時大聲疾呼的說，「作為外交政策的道德標準，祇是一大堆的道德主義、格言與口號，對於許多複雜問題的決定，既不能協助，亦不能指導，反而增加困惑」。今後倘仍像以前那樣的高頭講章，則人民豈但無從按步就班的去努力，並可因目標過於混雜，人民更加天真樂觀，耐心依然缺乏之故，以為大敵既經打倒，整個世界最後都會自動達到民主自由化的境界，而不知繼續努力的必要。又如仍一方堅信道德性的外交原則，同時炫耀物質文明的可貴，而忽視他國現實的問題與條件的限制，致對方的反應既與美國的信念期望相反，美國人民的反應則感到困惑惱恨，將更不利於政策的推行。

五、四種攻心戰術的回顧與前瞻：任何事要人民合作，總得先使人民了解為什麼要他們合作及怎樣合作？倘使其事涉及他國，並且是對抗敵國，則尚須向國外努力，需要特定一套宣傳計劃，同時實施。其第一對象當然是美國的人民，應用全力求得多數人民了解並擁護政府政策的進行。第二對



象是美國的友邦，應盡一切力量求得它們支持美國處理某一國際問題的政策，至少也不表示異議。第三對象是中立國，應盡力爭取其友誼，至少亦應鞏固它們的反共意志。第四對象是共產國家以內的人民，使他們亦能向民主自由的政治社會方面邁進。此皆為今後美國最急要的宣傳重點，非此則很可能讓新世界又滑入舊窠臼。

已在今世具有戰略意義的宣傳工作，在美國人看去，它只是政客의 演說，騙子的謊話，始終予以鄙視。而懂得它是爭取人心重要工具的人，亦因不懂攻心戰術，弄得收效甚微，甚至發生反作用。

例如猛刺人心的宣傳戰術，本是對平日向不注意國際事件的美國人民最適切的方式，美國也會用過。最突出的一例，便是在冷戰已使美俄兩方形成僵持局面，美國人民已產生一種安全感的期間，忽然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出現蘇俄一百八十四磅的「斯波尼克」一號衛星射入地球軌道的新事件，美即乘機宣傳其太空探險與長程飛彈落在蘇俄之後，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與技術天才已不屬於美國，居然激得人民直跳起來，願意接受政府的騙策，對抗蘇俄的威脅，但總因為技術很少變換，不久已使人民視為老生常談，無足重視，又使蘇俄在登陸月球的表現方面領先一步，一九六六年內蘇俄把兩艘無人駕駛的太空船，先後降落月球，便是例證。此就心理方面言，原本是一種救急的辦法，要是不斷使用，則其危言聳聽的程度無論如何尖高，也會變成平淡無奇，並會使人神經麻木，否則亦會使人神經過敏，誤會為欺騙。有限度的越戰政策與參加越戰的意義，至今已宣傳了七年多，總提不起人民的精神，甚至認為政府驕武好戰，即由於神經疲勞或過敏之故。更顯明的事例，則為過度誇張反戰的氣勢，此種原只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然因新聞報導偏差，只求刺激，不顧後果，只宣傳一羣人在紐約華盛頓的反戰遊行中，燒毀國旗與徵兵卡、及進犯國防部等新奇情景，故意把它渲染的彷彿一九

五一年一月間韓戰初期會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張撤兵那種情況；而於在此同一時間內，正有萬餘青年自動走進國防部應募中心，願以其生命奉獻國家的表現，以及詹森總統曾在巴提摩爾青年商會講述這種忠勇的舉動時，感動得聽衆拍掌不已的鏡頭，却都未被傳播機構重視，類如此的偏激宣傳甚多，如何不生極大的惡果？何況今後世變將呈現波動狀態，波度由小而大，猛刺既被認爲無病呻吟，亦無法證明日後的危險，並不能普遍應付四面八方的問題，緘默又於心不安，已經尷尬萬分，倘再信口雌黃，如何得了！

再如感動人心的宣傳戰術，本有其一定的作用。當危機確已嚴重，却非一般人民所能看出，政府採行的防患措施，又非人民所願接受，此際最需要的警覺、冷靜、慎重、堅忍等能力，人民更是一向缺乏，在此期間，就全靠政府誠切曉諭，傳播機構隨時提撕，纔能使人民動心忍性，共赴艱鉅。但如政府領袖平日缺乏被人民愛戴的條件，即使坦心置腹，舌敝唇焦，亦甚少反應。即使尚未全失民愛，但如一向對於某一件大事的說明，不够堅定明朗，未曾引起人民注意，則其後縱使和盤托出，垂涕而道，亦已難得人民重視，其最近的顯例，則爲詹森政府對越戰的解釋。今後面臨世變紛紜的新形勢，既不可以忽視，亦不可以躁進，惟有事前共同警戒，事際沉着應付，始不致張皇失措，或治絲益棼，然此非僅靠法治的美國政府所易爲力，亦非習慣於民主自由而又缺乏耐心的美國人民所能感悟。

又如說服人心的宣傳戰術，亦即是經過公開的辯論，調協各方的主要歧見，作爲政府決策根據的方式，此本爲議會政治的美國人民所熟習的方式，今後自更應循此方式行去。但如遇表面不甚嚴重而實際已極危急，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的事件，若仍經由冗長的辯論途徑，即足使國家及世界陷入一種更不利的地位，弄到更難收拾。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六日尼克森副總統曾隱其名，用「高級行政來源」

的新聞方式，試放「測風氣球」(Tide Gauge)，暗示美國政府準備派地面兵力參加越戰，經過公開辯論後，得知人民反對，便打消了這個計劃。假使當時大多數人較有遠見，或為此計劃辯護的人較有能力，則越共早被消滅。又假使物望所歸的艾森豪總統挺身而出，親向人民說明實行此計劃的必要，則民意的反映必然較佳，而越戰勝利的光榮事蹟，可在諾曼第登陸史後加上數頁。

又再如培育人心的宣傳戰術，尤為基本任務，其效雖較學校教育為小，然隨時養成人民注意國家事世界的興趣與習慣，實足以補學校教育的不及。此一工作，美國各種傳播機構雖已在進行，但總因不甚重視，流於聊備一格。尤其各報紙各電視各廣播台對於此項任務的努力，都不像它們宣傳各種球賽各種科學發明各種工商業發展的起勁。有時雖然心血來潮，撰成特寫，發為議論，但贊助政府政策者少，攻擊政府措施者多，此與培育公民知識道德的基本原則，直是背道而馳。今後美國人民將進為世界公民，需要共同負起爭取各國協力建設新世界的新任務，亦即幫助各國人民都能辨識其本國的要求是否合理？達到要求的方法有那幾種？前途有無可能發生的主要障礙？均具有大致相同的看法，纔能保障新世界的建設成功，達成美國義不容辭的使命。

由於鄙視宣傳，便不講究宣傳，既不刻意講究，自必着着失敗，縱然「美國之音」徧世界，而亦為效甚微，即使敵方不加干擾，然亦不免自相干擾，除前述的各種事象以外，尚有同樣嚴重的一點，那便是經過失敗的教訓以後，雖已認識宣傳的作用，但對其價值的估計，却仍不甚正確，非失之過高，即失之過低，對宣傳工具的性能、限度、效率，甚少正確的了解，連政府中部份官員，有時亦不免犯此錯誤。遂致（一）對於宣傳作用的期待極不穩定；其最著的事例，即在一九五三年時期，美國政府似乎相信一種魔術式廉價式的說服方式，即能迅速擊敗蘇俄的威脅；不少國會議員則持相反的觀

點，對整個宣傳抱着不信任的心理，甚至麥加錫議員會去調查「美國之音」，更有人主張取消宣傳機構，移其經費改購炸彈飛機，此種主張直到一九五七年的「節約」呼聲之中，還在國會中提出。遂致（二）對於宣傳的後果甚少顧及；其最著的事例，即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期間，曾儘量宣傳「解放政策」的正確重要，但對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人民的革命運動却不予支持，致世人非常懷疑美國的誠意；假使當年共和黨在競選總統時，稍顧大言壯語的後果，何致其後失借於國外。遂致（三）對於與宣傳效率有關事項極不注意；其最著的事例，則為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政黨傾軋情形，黑社會作惡事實，日報雜誌總是過度渲染，每被共黨曲解利用。而工商業者惟利是圖的表現，與政府斤斤計較本利的對外援助，亦使他國譏笑為「威尼斯商人」的作風。過於炫耀其物質生活的宣傳，又被外人認為好萊塢的電影片即足代表全貌。類如此的許多事例，即已顯示美國人民並不知其一舉一動都會在宣傳上發生或好或壞的影響力。遂致（四）對於宣傳題材不合對方的需要；其最顯著的事例，則為看他國人同美國人一樣，認為他們亦能了解美國人早已熟悉的外交原則，及發覺他國人的解釋與自己的認識不同時，則更認為他國人太蠢，只有美國人頂聰明，既由此惹起他國人的反感，亦即由此削弱他國人對於蘇俄說服工作的抵抗力。遂致（五）由於上述三種失敗，便對於宣傳的時間與份量不免矜持，又造成說得太遲或太早，太多成太少的損失。其說得太遲的，如不在大戰剛了時，即喚起人民注意防止共黨的滲透顛覆，直到蘇俄謀奪希臘土耳其時纔開始動員輿論和經軍實力予以抗禦。當時輿論的鬆懈，則與政府聲明的不够充足成正比。說得太早的是：搶着高喊解放被宰割的民族而其後不能履行，爭相宣傳核子武力與太空科學的領先而被蘇俄的成就所推翻。說得太少的，如美國介入越戰的目標，除詹森總統也許認為未到時期，不便多所聲明外，魯斯克國務卿在一九六七年期以前的多次

聲明，特別是身為國防部長的麥納瑪拉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月上旬在參院的答辯詞，尙僅表示美國的對越作戰，並非在毀滅北越政權，祇在制止其援助南越共軍，如此輕描淡寫，顯與美國出兵的宗旨頗有出入，這怎能鼓得起人民擁護政府的對越政策？至於蘇俄已援助北越，已不斷宣傳美國侵略，而美國政府則另說一套，始終不會針對其所說，予以直捷的還擊，更不會翻開其歷史，提出其許多侵略的事實，則不僅是說得太少，並且是等於沒有說。說得太多的，明知蘇俄的終極目標在赤化世界，却偏對它的援助北越解釋為抵制中共對它的輕視。更甚的是，對於蘇俄和平共存的行爲，過度誇耀，用意固在誇耀圍堵政策的成功，却不防加深人民的自我陶醉。同時說得太多而又太少的是，麥納瑪拉既極言蘇俄即將完成「局部軌道轟炸系統」，却不宜傳美國征服太空願較蘇俄進步的許多紀錄。若此之類，該使人民先機疾赴的却隱忍不提，該使人民埋頭苦幹的却誇張績效，該使人民群悉因果的却吞吐其辭，該使人民沉機觀變的却助敵張目，宣傳技術的所以如此乖方，要爲忽然懂得宣傳作用以後情緒不穩定的結果。宣傳戰本是極關重要的攻心戰、思想戰，做得好，可使民心悅服，敵氣衰弱，做不好，反致多言多敗，變成迷亂民意的自戕工具，變成幫助蘇俄成功的「特種美援」，不幸美國竟誤入自戕之途，至少亦是用力多而成功少的狹路，豈可畏此終古！

六、迅速充實鞏固思想戰的後勤司令部：今後世界兩極權的終將漸趨於一，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來，都無理由反被蘇俄統一，除非人性都願接受奴役。可是在美俄兩強對峙時代，美國所用的一些宣傳方式，所得的一些經驗，雖也曾收到一些消極性的效果，戳破了蘇俄的欺騙，却未必能適用於今後的世界各地。尤其在新舊兩世界的過渡期間，一有失當，即可使世紀一度倒退，並種下其後若干亂源。且已有下列的各種事實爲證：在僅僅對抗共產集團時期，尙因不懂宣傳戰而付過摸索門路的巨大代價，

何況處理今後新形勢中的新問題，已全變其舊日行動路線的指標，而武力戰爭的危機，亦未必能在短期內完全消滅，豈可不早作準備？在對付中俄共兩個共產國家而雙方又已分裂，中共且在內閣時期，尙因自己造成「聯俄制毛」或「聯毛制俄」兩種對策的困擾，而入於袖手旁觀，索性不動的狀態，致機會逐漸消逝，何況在今後世界中，將見許多國家發生許多不盡相同的新問題，更勢美國彈精竭慮，助之解決，豈可不未雨綢繆？在蘇俄和平共存的烟幕之下，尙使美國人民精神懈弛，尊榮自娛，何況今後世界進入較少爆炸性的環境，豈可缺乏「安不忘危」的警覺？在各種社會教育設備不及美國完善的蘇俄，尙且使用極權的力量，把其政策路線灌入其人民的腦中，何況思想言論一向自由的美國人民，今後勢將更爲自由，更不適宜於應付今後紛紜雜起的事象，豈可不加緊養成全國人民協力應變的才能？在僅有一個最大敵人蘇俄的今日，美國人民尙且厭惡政府對共政策的宣傳，幾乎變得充耳不聞，熟視無睹，何況處在新形勢的今後，全球一百幾十個國家，特別是剛纔脫離共產統治的國家，都將利用其新得的行動自由，各開闢其新的外交路線，形成新的衝突與和諧，新的敵人與朋友，會對美國發生許多新的麻煩，甚至是爆炸性的爭執，豈可不使人民早有心理準備？今日詹森政府雖不會擔任三十年或五十年以後的國家職務，但總須具此遠見，早爲三、五十年以後的世局與人民，奠立可大可久的丕基，而以進行人民的思想教育爲入手的亦爲根本的工作。

雖然茲事體大，而就現在的需要看，亦緩不濟急，但對此「百年樹人」的百年大計，總不可仍復疏忽。由於前人疏忽，纔使得今日的詹森總統受苦，現在豈忍坐視此種苦因更趨深重，再令後人受罪？必須不以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把以前缺陷標本兼治。治本在向各級學校教育、各種社會教育努力，看準必然到來的新世界，研求「世界公民」必需的知能，制成教育綱要，勸求普遍貫徹。治標在

制定一套較短期間的公民教育與國事宣傳的計劃，以補救今日的缺陷，除掉青年國民已在書本上學知的外交基本原則，和美利堅本國及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風習與現狀以外，並準對各國意圖及時代潮流，預定一套八至十年的對策，與其終點的目標，再分配所需的努力總量、及如何努力的計劃與技術於各階段之間，然後在各級學校教育上，在公私宣傳工具上，求得美國人民的了解與實行，進一步求得他國朝野的同感。要是今後問題最多的地區仍在亞洲，而美國人民對亞洲的無知程度，仍比一九六四年的調查結果好的有限，亦即在一千五百人中，尚不知中國大陸有共黨政權的竟佔百分之二十八的人，不知中華民國政府已遷到台灣的竟佔百分之三十九的人，不知越南有戰爭的竟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則第一階段宣傳教育的重點，就應置在亞洲方面，而在太平洋時展開的今後，亦尚有其必要性。

## 第二節 肅清中共在美國開闢的戰場

美國只想擊退越共於南越，中共却總想戰勝美國於華府，孰智孰愚，瞭然可觀。美國犧牲國民的生命財產去射擊自劃限度的越南戰場，中共則借用美國人的筆舌，開闢並無止境的北美戰場，勝敗之數，又將於此決定。中共儘量擴大美國的弱點，雖甚狂妄，但美國如無弱點，它就無從擴大，則美國應該坦然承認。

美國一些人的反對越戰，原有其各自的作用，無須太重視，但由於他們都略具聲望，多少總會影響人民的心理，妨害政府的行動，故不能不把它看成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美國已對越共正式宣戰，自可運用一九一八年「間諜法」的原則，課處亞利伯罕二十年有期徒刑的成例，（亞在紐約散發傳單，詆毀威爾遜政府遣運部隊軍火赴西伯利亞，準備與聯軍部隊圍攻蘇俄共產政權），或運用一九

四〇年「斯密士法案」的原則，制止煽惑人民危害政府的宣傳與行動，給這些人以法律的制裁。可惜這些原則與成例都不適用，而可用的法條，又被法院從寬解釋，流於失出，這些人又都是死硬派，不可以理喻情遣。事既實逼處此，就只有釜底抽薪，給國民普遍注射防疫針，使大家瞭解政府對越政策的正確，不致仍被這些人蠱惑。

時代雜誌在一九六六年一篇文章中曾說：「決策者必須有所決定，作坦白的答覆與解釋。」在事實上確有必要。例如北越越共的騷擾，本為俄共所引起，中共所助長。並為中俄共實行其侵略亞洲、消耗美國，又皆為借刀殺人，不敢與美國正面軍事衝突的事實表現，但美國至今不願正視這個事實，反代中俄共諱莫如深，致美國人民亦僅能著眼於越戰的表面情況。又如國際間對於中共內閣的實情與動向，都缺少透澈的認識，總以為這是中共內部權力或政策路線之爭，其偏激冒險的路線終必為另一溫和穩健的路線所代替，而皆忽視它本是中國人民的反共行為所激起的鬥爭這個因果關係，致美國人民亦缺乏深刻的觀察。再如自甘迺迪總統本人至詹森總統本人與兩人的高級官員之間，對美國的東南亞政策，一直有極深的歧見，以前對寮國問題是如此，今對越南問題尤甚，或主張嚴格的有限戰爭，或堅持全面戰爭，否則退出戰爭，更使大多數人民不能形成大致相同的見解。對這三個問題的看法如此混亂膚淺，則詹森總統針對中共向美國下手之處，給它還手，也就是針對那些被中共利用的人與事，去向美國人民說明，實已不容再緩。當然在一九六七年冬季前解說過的也不算少，可是總不够明朗堅定，不明朗就會使人民誤解亂講，不堅定就會使人民困惑動搖，不明朗堅定也會使敵人誤會真意，不明利害，更趨於囂張，比不說還壞。倘再真如密執安州州長隆尼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對新聞記者所說的「有系統地提供越戰不正確的消息，」隱瞞失敗，誇大勝利，那就壞到無以復加了。



退一步言，即使並非如此，美國面對的敵人亦並非奸險狂暴的共黨，而僅爲普通的強敵，如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所遇，則從戰略上講，亦仍須改變現行的作風。二次大戰以後，設於美國華盛頓D.C.的國防大學，每年都請往講演戰略問題的魏德邁將軍；一向講究總體戰，是美國人都欽佩的。最近來台灣，在指揮參謀大學講演「和平的戰略」時，曾強調「戰略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科學，運用全國的資源，去達成國家既定的目標。」他把國家的資源分爲政治能力、經濟能力、心理能力、軍事能力四類，在決定國家的政策時，此即爲四種可用的武器。並說「一位堅強的國家元首，對士氣會產生無比的力量，這種力量即可達成不戰而使敵人屈服的目標，」真是名將名論。美國在世界上最優越的資源是經濟與軍事兩種能力，而最顯得不足的是政治與心理兩種能力，由於元首的態度够堅強，政治戰心理戰的藝術不够高明，已使得兩種優越能力的運用不合效率，並導致民心士氣渙散低落，這最是可惜、急須改進的一件大事。

羅斯福總統所以能使人民羣起要求參戰，主要得力於他的一爐邊閒話，定期在無線電廣播中全國人民談話，把他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訴人民，人民也感覺有如總統和他們在爐邊聊天，感覺熱誠親切，他的政策就由於直接訴諸人民之故，國會不敢杯葛，他的聲望亦由此日隆。今日詹森總統的聲望低落，要在國會通過的政府法案，已有許多障礙，不但妨害越戰並將影響到明年的總統選舉，並直接訴諸人民的良知，便很難挽救這種的劣勢。倘誠慮於危機，仿效羅斯福爐邊閒話的作法，在電上露面，則其收效之大，將過於以前。因爲以前僅能用無線電傳聲，不像今日已有並傳聲音笑貌的視設置。又因爲以前無線電的裝設尚未普遍，不像今日美國家庭之中，擁有一架或一架以上電視機已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而在密歇根、俄亥俄、新澤西則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善用此武器去解

南問題與重要法案，自會發生意外的效力。即就對付大敵的蘇俄問題上看，亦應向其人民發出友善之聲，使之明瞭美國並不與他們為敵，以抵制克姆林宮的歪曲宣傳，「美國之聲」廣播電台的俄文節目，已經有了很好的開端，如再積極進行，則透過干擾之牆的這種廣播，實在是比核彈還有力的武器，是一個謀求世界自由和平的攻心武器。

急待向美國人民說明的重要事項，已有三十四件：

一、記取華盛頓與耶穌的戰爭觀：詹森政府應使人民都了解：和平是戰爭的產物，一定要用反侵略的戰爭去消滅侵略的戰爭，纔有和平可言。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間，歐洲能夠出現廿年和平的局面，就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能夠消滅德意日的侵略戰爭，恢復和平狀態，是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為和平而戰的兩次參戰，本是實行開國之父華盛頓的遺教。華盛頓在抗英戰爭期間，只是全力作戰，並未侈言和平，其後極力維持國際和平的必要，是在戰爭勝利以後纔開始。又本是實行耶穌的教義，因為耶穌並不會主張人與魔鬼和平共存，只希望世人不要幫魔鬼為非作歹。這開國之父及救世之主的正大行為根本精神，應該在那說百出的今日，提醒大眾。

倘有要使大眾深惡痛絕的是，姑息份子膽敢污蔑開國人物及開國歷史這件事。例如一九五四年傅爾布萊特就會在參議院中說：「蘇俄的社會主義，在現代條件之下，並不比喬治三世時代美國獨立宣言更為激進。」一九六四年他又說：「美國在越南增兵，和一九六二年蘇俄在古巴秘密設置核子飛彈，如出一轍。」埃達和州的參議員邱遲說：「河內鼓動的越南革命，正和美國一七七幾年的獨立戰爭一樣。」芝加哥大學教授摩根索說：「詹森堅決不准越共參加和談，等於喬治三世堅決不讓華盛頓

與漢密爾頓參加和談，而與法國路易十六和談一樣。」這些人如此顛倒污辱美國歷史，豈不是咄咄怪事！在宗教方面不能容忍的是：被共黨奪取的「普世教會」，由共黨組織的「和睦協會」，以及被共黨利用的「全美宗教和平大會」，均已如越南和尚釋智廣的曲解佛教，而以教宗的「和平通諭」為幌子，要求承認中共，要求停戰，要求准許中共入聯合國。它們對於共黨堅持的階級鬥爭主義，許多迫害宗教的事實，則極意掩蔽。這些社團如此的污辱宗教，豈能容得！

戰爭只有前進或後退而無中止的可能，美在越的戰爭，如無意採取必勝的前進戰略，就只有採取必要的後退戰術，假使既不敢進，又不願退，只想打到十七度線為止，那就是必亡的中止路線，不但越南亡，亞洲隨亡，最後美亦難免，華盛頓與耶穌亦必作如是觀。但由於美國的思想戰沒有動員，不僅大部份人民尚不了解中共在越南和在美國暗中活動的事實，就是美國參戰的主要意義與最後目的，政府也沒有向人民清楚說明。所說的都很抽象游移，強調的反是不求勝利，唱反調的又隨處皆是，直弄得美越之間亦多誤會，美國政府說的是為維護越南人民的自由獨立而參戰，越南人民則認為他們是在幫助美國維護世界和平而作戰，甚至認為他們是在幫助美國爭取亞洲的霸權而作戰，又甚至把詹森、魯斯克專對美國人民說的「為美國安全而戰」這類話，作為證明他們觀點正確的例證，並甚至認為美將會中途撤退。競選越南總統和議員者都以「人民福利」「越南和平」為號召，顯然是與美國目標針鋒相對的措辭。因此，今日美國的最先任務，莫過於把越南問題中共問題弭民伐罪的戰爭問題，作為發覺振聵的主要教材，而以華盛頓與耶穌的和平觀戰爭觀為重大根據，以激發美越人民同仇敵愾的精神，纔能使今日未經正式宣戰的戰爭，發生變相宣戰的宣傳宏效。

二、猛悟共黨的成敗、關係美國的盛衰：詹森政府應使人民都了解：不論那一國的共產黨，

都是以奴役人民、侵略世界爲惟一目的。它們若不是這樣做，就不是共產黨，根本不需要組織共產黨。它們的本質，本是一個鬥爭體，是一個決不與他人和平共存的大獨裁者，不但沒有家庭國家民族觀念，亦無人性。其鬥爭的手段是，力量未足時，則用政治的滲透，也就是和平的轉變，力量已足時，即用武裝顛覆，也就是奪取政權的突變。美國共產黨目前的做法，雖還沒有怎樣刺激美國人民，是由於它們的力量還沒有強大，人民也還沒有完全相信它們。但是這種形勢是會改變的，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勢力互相消張的事實，便是明證。今日世界已分爲民主與共產兩大集團，正在從事於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美國人如不運用自己的優勢，及時給共產集團以致命的打擊，終有降爲劣勢的一天，蘇俄的太空競賽，有時搶過美國，便是一例。中共在現代的軍事設備方面雖比蘇俄爲差，更不及美國，但是它們驅迫人民「不要褲子只要核子」那種不顧一切的蠻幹，却仍可怕。形勢比人強，惡劣的形勢比善良的形勢更強，強就強在共產集團不斷擴大惡劣的形勢，民主集團不斷在惡劣形勢中退却，尤其是由於美國人民根本不認識共黨的邪惡無比，更由於美國百分之二十八的人民至今尚未知中國大陸早被中共佔據，百分之二十六的人民至今尙不知有越南戰爭的事實。

依照美國人民對共黨蒙昧無知的情形發展下去，第一步由美國共產黨與民主黨共和黨各爭雄長，再進於共產黨獨霸美國，並非絕不可能之事。何況在美國境內的幾個「親北平」黨派，異常活躍，如「進步勞工黨」的私藏軍火，策劃暴動，反對越戰，成爲中共在美國的軍隊；如「美國馬列共產黨」的訓練游擊，挑撥內爭，擴大種族糾紛，煽動青年拒絕在東南亞服兵役；如「新英格蘭勞工黨」的與「親北平黨派」中「臨時組織委員會」密切合作，企圖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如「革命行動黨」的表示支持越南人民爲反抗美國的侵略而戰；如「和平工會」的收買議員，反對美國的對越政策；它們給

美國的威脅，以及它們公然揚言要組織「第三黨」，以左傾份子美國衆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特別提出警告，並被聯邦調查局密切定，知織水準甚高，共黨決無可乘之隙，須知這些「親北平者」不是知識水準不高的人，他們今日已被共黨利用，今後全美國的盛衰興亡無常，希臘非不文明，然終以懦弱而亡，羅馬帝國非世紀西班牙是海上王國，無敵艦隊揚威遼闊的海上，但自一五八取代，現在只能靠觀光事業的外匯收入，聊以自存。十七、八世不落日國家自誇，但自民族主義思想發展後，其殖民地便紛紛獨高樂的惡氣。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及其後的西班牙人英國人都會人的自信，而今如何？何況共黨務以埋葬美國爲事，其陰險狠意，已初步成功，而中俄共的終將分而復合，又爲它們本質與目的危機，詹森政府急應運用各種有效辦法，使美國人家喻戶曉危，並願意見危授命。

三、注意軍國尚待民國配合：詹森政府應使人民都了解，同時了解美國現在對越南及對中共的政策，是遷就現勢而計，這種無效而有害的現行政策，美國決策階層亦早已看出。

例如現在僅用部份武力圍堵中共，使它不能四出侵略，僅用不是美國的力量不足，而是基於美國人的認識不夠。由於大多數

共前進，而以引起其心理上的恐懼爲基礎。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一）因中共僅恐懼大陸人民不支持它反美，而不恐懼美軍對它的圍堵。（二）因圍堵本是被動的對策，不免隨時跟着形勢轉變，先天上已喪失有效的主動力，轉變到最後，又很可能至於不動。（三）因蘇俄雖圍堵中共於西北，却與美國圍堵它於東南的目標不同，蘇俄只在防止它對自己的倒戈，並不反對它向美國的侵略，美國打擊越共，蘇俄則援助越共，便是最好的說明。如希望蘇俄今後能和美國的行動一致，一如合力解決印、巴紛爭的範例，殊不可能。如更希望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合圍中共，亦是奢望。這是圍堵功效又被大環境削弱的基本情勢。（四）因會對蘇俄奏效的歐洲防衛公約及其組織，不但已被戴高樂攪亂，德英兩國並已削減軍備；中南美國家的泛美組織，已被蘇俄刺入；英國的大不列顛國協，已名存實亡，並已決定從一九七一年起撤退其在亞洲的駐軍；法國的共同市場關係，正在自壞長城；阿剌伯十三個國家共同對外的精神，已受中共影響；非洲國家雛形的團結，及東南亞國家象徵性的公約組織，也都是有氣無力；東北亞國家更是一盤散沙，各自奮鬥；這些事實，又顯示圍堵政策缺乏衆志成城，顛撲不破的國際合作條件。（五）特別是美國人的言論行動不斷增加中共突圍的便利與機會，使它可以利用一些人開放門戶的主張，向美國滲透，可以利用美軍在越南不求勝利的行動，幫助越共南進，可以利用圍堵而不孤立，應戰而不求勝，及希望他進人聯合國與倡議「兩個中國」的各種現象各種言論，向世界各國宣傳美國已喪失反共的信心，使它們不再信賴美國，一如不結盟國家及阿剌伯國家的逐漸倒入中俄共的懷抱，進行其結合世界鄉鄰包圍世界城市的反包圍策略。（六）即使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根本政策，並不同於美國部份人士的主張，但中共仍可運用其「陷阱戰略」以對付美國的圍堵政略，把美國拖垮在越南。同時運用其滲透活動使美國人自相攻殺，紐澤西州美共組織的訓練營，紐約與洛杉磯的

黑人武裝暴動，參議院內的反政府氣氛，大可繼續進行。並可運用其經濟的外交的活動深入各國，一如其與日本加拿大西德等國的進行貿易，與四十多個國家的維持關係，而使圍堵根本失效。

十六年來，美國能在歐洲略收圍嚇蘇俄之效，而終不能同樣收效於亞洲的主要癥結，即在美國部份人士煽動人民自己先解除精神武裝，致其潛伏在美國的第五縱隊之力量，沖銷美國佈置在亞洲的第七縱隊之成就，如此慘痛的事實，詹森政府必須使人民澈底認識。尤其要使人民提高警覺，一旦中共表示願意進入聯合國之時，便是它開始埋葬聯合國之日，也是它開始埋葬美國之日，即使它不可能遂其企圖，可是美國人仍將永遠不能用武力補償其背棄正義公理、獎勵暴政侵略、種種道義上的重大損失。只有使人民感覺這種恥辱的無可倖免，纔能動員人民的力量，圍攻姑息份子於國內，圍剿中共侵略於國外。這就中國格言所說的「明恥教戰」，「知恥近乎勇」。美國人最憎恨被辱，這是一服最對症的藥石。

四，認識反共性的世界戰爭是已經存在的事實：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重視驚天動地的事，忽視細微零星之舉，本是人類通病，志高氣傲的美國人則尤甚。正因如此，纔以為何必勞師動衆，介入數千哩外一個小國的邊境戰，甚至根本不知有越戰這件事的，尚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一。政府僅採用有限度戰略，雖存有對外的顧慮，但顧慮國人的認識不足，意見紛歧，則為主因。其實美國自一九四八年援助希臘土耳其的反共行動起，即已介入反共陣線；根據聯合國決議，聯合民主國家兵力，在韓國的作戰，更顯然是民主國家對共產國家的熱戰；越戰又顯然是韓戰的延長；這都是由人類的共同需要，是依據二次世界大戰目標的繼續行動，亦即是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一九六一年起的介入越戰，是艾森豪、甘迺迪兩總統貫徹二次大戰目標的行動，亦是美國人民與自由人類共同目

標的繼續追求。就越戰開始時的情形看，直與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叛軍的進攻瑪德里相似。就其對世界各地的關係看，更較嚴重。當時義德兩國的支援西班牙叛軍，致其內戰變質為國際性的侵略戰，繼與今日共產國家的支援北越相同，所不同的是西班牙內戰的變質在後，北越則根本就是共產政權，自始即為共黨的侵略。西班牙尚賴國聯的對義制裁，始能扭轉危局，成為雄峙在大西洋東岸直布羅陀海峽旁的歐亞反共堡壘，何況其關係更嚴重於西班牙反侵略戰爭的越戰。若與同一年期的義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德國的進軍來因相較，則今日蘇俄中共的支援北越，對世界全局亦具同等的危險。當時因國聯制裁不力，致提高希特勒侵略歐洲的氣焰，又因慕尼黑會議的姑息，致促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爆發，今若袖手旁觀，甚至再來一次慕尼黑會議，豈非同樣促成全面性的世界第三次大戰？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共產國家的行動看，則三次世界大戰實已發生在距今二十年前，只是其所使用的滲透顛覆各種手段，與其策動支援的一連串零星戰爭，未被美國人民重視而已，美國援助南韓反共戰爭的中止，與當前援助南越反共戰爭的困頓，則顯然是未被美國人民與西方民主國家認識其均為三次世界大戰的一部份所致。再從今日越戰的形勢看，殆與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布爾珙之戰和中途島之戰一樣必將成為三次大戰的決定性戰役，遠之纔能為二十年前的盟國完成二次大戰的全部使命，纔能為現代人類消除第三次全球大戰的重大劫難，纔能補救美國在二次大戰後若干的錯誤行為，近之纔能履行確保東南亞的承諾，纔能使東南亞不蹈中國大陸全部淪陷的覆轍。如果這樣的徹底解說，則富於正義感榮譽心而又一向不甘示弱的美國人民，必然一致奮起，為保護美國的安全，為洗雪美國的恥辱，為消除全球性三次大戰的大禍，各以其生命供國家的驅策。在這樣的舉國努力之下，越戰可能已在一九六二年前後結束，何致拖延出現在這樣對內對外異常艱困的局面。



不幸一着錯，滿盤輸，錯於前，困於後。在多次的聲明中，雖亦曾說及南越如被淪陷，將更助長侵略，但並不能完全說明美國的介入越戰亦與美國本身的安全、信義、榮譽、責任都有密切關係的理由，故不能引起人民的痛感。有時雖曾暗指到中俄共的企圖，但亦把它說的僅如「燭影斧聲」，若有若無。及越戰已拖到現在，還不敢直捷指出其所以拖得如次之久的各種原因。尤其愈說愈糟的是，以前是說「遏阻共黨侵略」，其後則說「求得光榮和平」，光榮和平是否與遏阻侵略同一意義？遏阻是否即為共黨已經放下武器？說者沒有交代，聽者就更困惑，就更不明白美國參加越戰的目標究竟是什麼？也就自然被譏為「沒有戰爭目標的戰爭」，而於三次世界大戰早已發生的這種事實，自然更無一些感覺，反使盲目左傾的人，竟在三次大戰的戰火中，只對美國反戰，不對共產國家反戰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詹森總統向各州立法代表一千三百五十人發表的越戰政策性演說，雖前進一步，強調美國必須維持對北越的軍事壓力，否則將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現實」，把三次大戰與越戰聯結一起，不但過遲，不易轉變人民先入為主的成見，亦沒有直接指明三次大戰早已發生的事實，解說的仍有限度，直與作戰的仍有限度相同，而越戰的仍不敢打破限度，與其所以不敢之故，則亦可於此看出，一句話戳穿，仍有不必要的顧慮而已。

世間大小事，愈多顧慮，必愈加自縛，越戰即是最明白的例證。如爲了顧慮軍人的不耐，就只得用天空轟炸的戰術，夷平北越幾處城市，略示前進；而於越共久已盤踞的山地，北越人民都已遷入的農村，却無法損害其分毫，致百分之九十幾的投彈等於白費，致更增加軍人不滿的事實，則反無暇計及。爲了顧慮文人的厭戰，就只敢用低姿勢的升級戰術，藉以安撫；而於北越與越共的交攻直進，於南越軍民的竊議交談，於亞洲人民的懷疑美國阻止共產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則反少深思。像這些並

未能見好於主戰派和兩派，而反施惠於共黨的惡果，無一非直接種因於政府的顧慮過多，間接起因於人民不瞭解越戰的性質與美國介入的目標。而人民之所以不瞭解，則無非由於詹森政府「口將言而囁」的越戰聲明，以及由此導致「足將進而趑趄」的作戰狀態。

自誤了七年多，今已有全盤悔改的跡象，只是實際的行動尚未能配合。跡象是外電會傳詹森總統已不考慮個人的前途，而只決心打到共黨明白武力決不能達其侵略野心。韓福瑞副總統跟着表示，於同年（一九六七）十月二十一日在馬利蘭州及華盛頓特區美國勞工聯盟與產業組織大會主辦的宴會上告訴聽衆說，「如果一位總統只求好名望，他就不能謀求作好事，從沒有一位戰時的總統能够討好全國人民，將來永遠也不會有。」翌日他又在國防後備人員的會議上發表演說稱：美國的總統如果真的要爲自己的國家服務，他必須在強大的反對壓力下，循着自信爲正確的路線，勇往邁進。他堅決說出：「詹森總統正是遵循着他相信在越南與東南亞完全正確的路線邁進。」魯斯克國務卿亦同時在記者招待會中，詳釋越南對於美國安全的重要關係，其主要論點是：（一）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太平洋的安全與大西洋同等重要；（二）中共是世界的一切禍源，它服膺一種黷武的世界革命教條，以摧毀美國爲其目標；（三）越南的安全與美國的安全息息相關，其威脅的真正來源不是北越而是中共，如讓東南亞淪入中共手中，則美國無異自撤藩籬，將被迫在夏威夷乃至加利福尼亞作戰。如此明快遠見的言論，亦前所未聞。尤爲明朗堅定而扼要的是，則爲魯卿於一九六七年底對「讀者文摘」訪員解釋美國出兵越南四大理由，他說：「美國出兵越南是履行條約義務。美越兩國在一九五五年簽定了莊嚴的共同安全條約，規定締約國的一方受到「武裝侵略」時，應「採取行動應付共同威脅」。其次，是因爲東南亞的和平與安全和美國息息相關。關於這一點，國會兩院曾於一九六四年八月通過了一項決議

案（只有兩票反對），有極爲明確的聲明。第三，是因爲美國對於太平洋的和平，應該和對於大西洋的和平一樣重視。美國政府沒有忘記三十年前的慘痛教訓：侵略得逞，必定繼續侵略。第四，是因爲要使美國的潛在敵人明白，美國對於四十多個盟國的條約承諾，言出必行。否則，敵人可能蠢動，攻擊美國的一個或者幾個盟國，最後使得我們全體都捲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美國無意君臨世界，也不想世界各國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是我們堅信，世界各國，無論大小，皆有權利過自己的生計，不受外來的脅迫。美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反映美國人民的單純願望，而世界各地的人，亦復人同此心，有相同的類望。」如果詹森、韓福瑞、魯斯克能在幾年前就如此說，那麼許多反戰的言論行動就會早受人民的指責。並早會幫助政府就在三次大戰的開端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又如果能把今天這些解說變成明天的行動，則美國人民亦必能發揮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忠勇精神，獲得很快捷的勝利。

五、戳破共黨政治鬥爭七種方式：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共黨雖未在美國領土內和美軍作戰，但已在韓境越境內與美軍作戰，並已在美國境內與美國政府人民作政治戰。政治戰本是共黨認爲戰爭的方式之一，且認爲它的效率更大於軍事戰，所以蘇俄中共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在戰爭結束以後，在世界各地對美國展開劇烈的政治戰，交戰的總帳，是它們的勝利過於美國，這是美國人不必自諱的事。

政治本是一種最高藝術，與共黨鬥爭的政治，更是最新穎最曲折的最高藝術，決不是粗心大意的人所能深識，尤其不是天真無邪的美國人所能體會。加以政治向不像自然科學的有定律而無國界，無國界的自然科學，自可使歷史地理種族文化不同的人，都能承認其客觀的結論。政治則常受歷史地理

種族文化的影響，固有國界存在，即使已有客觀的事實擺在眼前，亦不能獲致共同的結論。政治藝術的永遠規定不出一種國際水準，其故在此。美國人所以總認為美國式政制是反共的利器而不自知其錯誤，並易被共黨利用，亦在於此。又加以共黨政治鬥爭的新藝術，變化無端，更易使人迷亂，一時很難決定對策。就是他們的語意學，亦另有一套，同一句話，有時可作正面解釋，有時應從反面去看，有時須從側面推蔽，有時又含有許多意義，總教你捉摸不定，就更缺乏共同的語言，作為了解他們的基礎。如果美國人好奇喜新，迎合上去，或者爲了達成某種企圖，想加利用，就只有更受他們的侮弄，這都是過去所以上當不淺的原因。但亦不必過於把它看作神鬼莫測，不可方物，只要不被主觀的見解與企圖所干擾，多少亦總可以看出它主要的定式不過那幾種，並且早有佐證。

定式之一是，以少變多。組織統一戰線，使不滿意政府或不滿意生活的人，都供它奔走，是其以少變多的總戰略。開闢政治戰場於黨派傾軋的空隙之中，開闢羣衆戰場於社會矛盾的空隙之中，開闢外交戰場於國際關係的空隙之中，開闢經濟戰場於物資供需失調之中，開闢軍事戰場於世界紛亂之中，是其以少變多的進行曲。過去中共曾用此顛覆國民政府，其後又本此經驗號召建立國際性的「反美統一戰線」，而以鼓勵美國政客羣衆的反戰，加深美國種族的糾紛，離間美國盟邦的感情爲急務，都是它攫取中國大陸藍圖的翻版。

定式之二是，以分求合。分別政府領袖、官員、與社會人士爲三大類，運用各別而又聯貫的技術，逐層對付，使都入其圈套。對政府領袖與上層官員，則多方取容，並傳播其往還的佳訊於社會，使知真在親密合作，騙得社會人士相信，再借此誘惑民衆供其奔走。又再誇大此種形勢，去動搖中層官員的意旨，不再阻撓其所爲，孤立其中的「死硬派」，使他們不再能發生作用。中共用此一套「拉

擺上層，騙取下層，打擊中層」的手法，會造成國民政府分崩離析的現象，達其巧取豪奪的目的，於今又繼續在非共反共國家的內部，尤其它在美國各方，沿用這套法術，並已有許多成就。

定式之三是，以複制單。成立政治外交武力經濟文化思想六條戰線，同時的或交替的向美國發動攻擊，便是以複線制勝單線的藝術。過去中共曾在中華民國及歐洲若干國家用過，現在又正向美國及越南施其故智。被它納入戰線的各界都有，助它吶喊的隨時可聞。若僅靠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三方面與它對壘，自然顯得人少勢孤了。

定式之四是，以暗代明。在它尚無力公開叛亂的時期，總是躲在暗中活動，使人無從察覺。過去中共曾在中國用此方式而獲利，今日又正在華府西貢使用，並已得到部份成功。釋智廣阮正詩的背後站着什麼人，固無須用照妖鏡去照，傅爾布萊特、費正清背後是否有鬼，則美國應予以攝影。

定式之五是，以偽亂真。它的真正目的，是在顛覆反共政府及侵略世界，它的前奏曲，則常是偽裝合作，要求民主，過去中共曾用「土地改革」「民主運動」淆亂觀聽，現在又借「民族自主」「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等口號，以掩飾其真面目。中國先哲痛惡的「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移以指共黨，尤為貼切。

定式之六是，以內助外。滲透到他國政府社會的心臟裏去，唆使左傾自由份子，經常與其政府為難，使其政府不得不改變既定的政策，至少亦苦於內訌，不能順利推行其政策。過去中共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裏的親共份子，助它多方干擾，利用人民厭戰心理，助它乘隙叛亂，現在它又照樣操縱美國的親共反戰份子在國會內電視上報紙中，展開其責難政府對華政策的活動，過去中共會利用費正清、拉鐵摩爾、希斯等人為它助威，今在美國利用的一批人中，仍有過去的人在內。

定式之七是，以形換影，共黨有時固須作戰略的退却，有時亦須採戰略的狂進，退固可使人鬆懈鬥志，進尤可使人震驚失措，言行昏亂。無論進退，總使其投下的影子，大於其原形，使前之被其迷者，更不得不跟着它的影子走，也不得不想出一種亦步亦趨的理由，使局外人亦迷信其觀點的不無道理，它愈得以進退自如，無往不利。例如中共在被圍於延安時期，曾設法使左傾份子認為它是土地改革者。在它加入抗日陣營時期，曾設法使左傾份子認為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者。在它全面叛亂時期，曾設法使左傾份子認為它是新民主主義者。在它竊據大陸向蘇俄一面倒時期，曾設法使左傾份子認為它可以變成狄托。在韓戰停火以後，它曾使左傾份子認為應該分成「兩國中國」。在蘇俄進行「修正主義」時期，又曾使左傾份子認為它的內部亦將「和平演變」。及毛曾高揚「反蘇修」「反美帝」的旗幟，又曾使左傾份子寄望於其「下一代」。無論使人入迷的是中共全體的設計，或部份幹部的宣傳，而其殊途同歸的目標則一，都在使人跟着它的影子起舞；而其擴張為幻的手法則一，都在使其投影更比原形動人。它在移步換形，左傾份子則在逐步捉影，於是世變就在有影無形中逐步擴大了。

中共政治魔術的花樣雖多，主要的亦僅這些。今雖熟能生巧，為鬼為魘，只要不粗心大意，不反想利用，不再幻想、等待、接觸、退避、姑息、求饒，中了毛曾所說「對敵人碉堡最容易的戰法，是從其內部來攻破」的詭計，總可以不至墮其術中。不幸的是，正有人既不清楚亞洲問題，亦不瞭解美越關係，並不認識中共政治鬥爭的法術，更不正視中共正和美國在越南作軍事戰的事實，反自以為很聰明，經常噙噓不休，除被中共暗笑外，實已無異在自己的陣營中倒戈，這種最危險的事，詹森政府更應提醒國人，勿再自侮自伐。

六、列舉真確事實、碾碎虛浮現象：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一時的現象，若視同真

確的事實，則爲淺見。若祇重視一時的現象而竟蔑視真確的事實，則爲謬見。淺見祇自誤，謬見則將誤世。但很不幸，在美國各方面現出的謬見已不少。如南越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中共支援越共作戰的原因之一，也就在經濟方面。它一面在借用戰火燒盡南越殘餘的經濟力量，使其成爲孕育共黨新份子的溫床，又一面仍視越南爲米穀及若干戰略物資的倉庫，必求攫到手中。白宮看透此點，決定援助南越經濟建設，自檀島會議後，更積極進行，俾與軍援相輔相成，雖然今日所付的代價甚大，但將來所得的報酬則更鉅，這是應被國人認知的事實。無奈若干知識份子對此亦似不求甚解，他們所能看到的則爲中共已在大陸存在十多年的現象，並還認此現象爲事實，此外則爲美國陷入越戰的現象，並還認此爲極可怕的事實。殊不知被他們抹煞的事實是太多了，越南問題事實上是一個極複雜的經濟問題，他們固不了解。越南的民生問題愈過愈甚而愈不易解決，是由於越共的禍亂和中共的作梗。中共所以能如此，是由於中共的據有大陸。中共的所以能據大陸，是由於美國的壓制中國政府。壓制的事實甚多，最致命的壓制，則爲當年中國政府已到存亡關頭之頃，美國反加遺一矢，落井下石，完全停止軍援經援，連已經答允的五億美金貸款，亦一文不借，逼使其去和中共組織聯合政府。中共了解其中的關係，也就偏不與國民政府妥協，務使美援斷絕，政府枯斃而後已，如此明顯而又嚴重的事實，他們都像完全忘懷了是的。當時美國在歐洲表現與此相反的事實則是：根據馬歇爾計劃，曾以一百四十億美元的巨款，援助法意土希四國，卒使四國的經濟免於崩潰，四國的公敵逡巡而退。當時亞洲的危機相同，美國秉政的人亦相同，而處理的方式則絕對相反，已是怪事。現在又有若干美國人申指責其政府援越措施的不當，又像完全忘懷了爲時未久的歷史事實是的，豈不更可惜？

倘有奇怪的，這些人只偏信中共已經統治大陸七億人民的誇僞宣傳，並認爲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政府，僅是徒留空名的「流亡政府」，由此迫使其政府承認這個事實，至多亦只能承認「兩個中國」並許它們分別進入聯合國。却故意抹煞許多千萬萬確的其他事實，例如抹煞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人之一的事實；抹煞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一萬四千平方哩土地，比十八個會員國版圖都大的事實；與台灣的一千三百萬人口，又多於八十三個會員國人口的事實；並抹煞海外二千萬華僑仍奉中華民國正朔，及大陸七億人民痛恨中共宰割，不斷反抗的事實；尤其抹煞中共要聯合國承認其侵略並不違反憲章的事實。像這些抹煞一切皎如日星，巍如山嶽的事實之由來，全然出發於錯誤一點，便是錯誤中共目前形成的虛偽現象，當作真正存在的現實。本此錯誤的觀點，撰出錯誤的方案，希望大家同他們一樣的蔽聰塞明，共向錯誤的途徑前進，並以「和談號的破車」作交通工具，要他們的政府駕駛着前進。至於歷時已十多年，談了已一百數十次，華沙與日內瓦兩地紀錄下來的事實究竟如何，也一概抹煞，而對於近經紅衛兵把黨政軍民反毛反共真相提給世人看的事實，則反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且杜撰理由，代它粉飾，為己解嘲。其更甚的，索性將中共愈掘愈深自殺自葬的墳墓，歸咎於美國政府對它的圍堵，硬要美國政府負責，真可說是「怪事處處有，不及美國多。」

亦正因為美國的怪人怪事怪聞特別多，怪到不可以理喻，經不起詰問。如果問以依你之意做去，有無把握使中共變好，他們固然不敢擔保，至多說，日後自會有見證。你如又問以歷史上有無一個名為政府的，會自己革自己的命？名為「人民政府」的，會屠殺無辜人民那樣的多？名為代表人民的，會有逃避虐政流亡國外的人民那樣的多？他們就更「無可奉告」。假如再根據若干事實，問以第一就承認說，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抗日期間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有什麼不同？今在大陸的中共政權，與抗日期間在南京的汪精衛政權及在滿洲的溥儀政權有何兩樣？當時美國為什麼不與汪溥兩政權



和平往來？難道汪溥兩政權不都是存在的事實麼？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的台灣省反抗共黨侵略，規復自己國土，是否比已無寸土而僅流亡在英國的自由法國更有地位力量聲光？當時美國爲什麼不分別承認「維其政府」「戴高樂政府」爲「兩個法國」？第二、就存在說，強盜、綁匪、竊賊、兇手，以及鼠疫、癌症，無一不是存在的事實，爲什麼要全美國人加緊防治，務令根絕，而不要求他們學習與這些人這些病共處呢？中共的惡性毒行，與這些人這些病究有什麼不同？它尙不能與一手提拔它的大恩人蘇俄共處，而反能與美國共處麼？如此追問，他們如能牙清齒白的回答，那亦可算是附共的天生尤物了。

國際間自然最計較現實的利害，但如僅計較眼前較顯較輕的實際利害，而反造成日後更嚴重更不利更難解決的問題，當爲真正有眼光有計較的大政治家必求避免。詹森總統如自信爲大政治家，就心須把以上舉出的許多或正有反的事實及理由，向美國人民儘量提示，惟有歷史巨輪上的真實事實，最能碾碎這些人閉眼捏造的虛偽事實。如再故作癡聾，或仍含糊其詞，迂迴其言，彷彿中國舊時官僚的不敢得罪於巨室，那麼即使決不變更已定的廟算，亦絕不是忠於職守者應有的嚴明態度。而在此一問題上應有的嚴明作法，則除使人民都了解更重大亦更現實的事實以外，便在以有效的行動去急救南越的經濟危機。至於最直捷的有效行動，便是迅速在越南擊敗共軍的侵略，讓越南人民得以提早休養生息。

七、紹述理想主義、裁正現實主義：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民都了解：美國社會雖然富強康樂，但仍非盡善盡美，並因共黨正在擾亂世界，未開發地區人民正患貧愚弱亂，美國亦不能獨善其身，長保現狀。一個偉大的民族，力行一種造福人羣的理想，只有美國人民堪勝此任，這不僅是能力使

然，亦因美國民族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有以致之。所謂理想主義，是茁發於不滿足現實狀況的情緒，依據經驗的鼓勵，經過智慧的啓示，理性的指導，形成純粹客觀的希望，全心全力去求其實現的一種信念，而不是起於直覺，蔽於情慾，成於衝動，不經思考推理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不過於離開事實，亦不爲現實所左右，所以能實事求是，力行其是，使合理事實的造成，一如現存事實的會由人力造成，使當前不合理的現實狀態，由努力而改變，一如舊狀態的已變爲現狀。而確能負此使命的，就只有美國人民，他們在過去會這樣做過，並已有許多成就，他們現在繼續努力的成就，將更大於過去，當然可以斷言。

所以可斷言，是有一種合理而有效的信念力量，爲之保證。這種信念表現在行動方面之時，即成爲道德意識與道德力量的結晶體，既光潔，又堅強，不僅不是其他力量所能摧毀，並且不敢公然違反，任何侵略者獨裁者都假託道德，不敢自認其行爲爲不道德，便是明證。這種道德力量，一直是美國外交行動的指導原則，一切宣言、呼籲、乃至私函，都含有說教的意味，亦都在國際間發生過鉅大的作用。

就美國歷史看，更隨處發現這種有力保證的存在。門羅主義看似消極的打算，其實是具有積極的含意，它盡量讚揚民主原則，推崇民主方式，顯然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當時最重現實主義的梅特涅，看到它的光芒四射，亦不敢正面反抗，只能惋惜新舊兩世界由此分家。正因為它正氣逼人，所以遇事義不返顧。當歐洲各國發生革命之時，會迅速承認法國第二共和，會熱烈贊許匈牙利政變，絕不顧慮法奧兩國舊勢力的反對。當墨西哥革命時期，會援助其自由份子，又會由國會決議譴責左袒其王室的法國拿破崙第三，絕不因本國忙於南北戰爭，就置之不理。及威爾遜總統執政，更把理想主義的

信念，貫徹到許多問題方面，曾拒絕承認墨西哥罕塔的血腥政權，最後使它垮台，絕不因國內現實主義者的尖刻批評而止。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立即認定這是民主對專制的戰爭，終於介入英法陣線，絕不因帝俄專制更烈於德奧而遲疑不前。及一九一九年蘇俄發生內戰，亦仍基於理想主義民主原則的見地，認為經由各黨派協商，終可達致和平。及蘇俄政權日趨獨裁，纔採行不承認政策，直維持到一九三三年後，方纔改變。特別是他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宣言，更全出於民族自決主義的思想，並曾根據這個道德性的原則，盡力反對法國對各協約國的許多要求。他這種理想的提出，確曾使落後民族的問題，創出一個合理的處理方式，成為現代外交的主臬。及羅斯福政府時期，更發揚美國人的崇高信念，不顧英國現實主義的態度，不承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一概獨行其是，並使國聯大會接受斯汀生主義，由於其態度的堅定和這一主義的確立，各國遂決定不再承認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事實及條約，其在國際行動上所發生的影響力，今日猶正在對越參戰這件事實上反映出來。美國人民對於韓戰的痛苦，雖然記憶猶殷，未免有些厭惡戰爭，詹森總統在競選期間，雖曾迎合人民這種心理，並指責高華德是「好戰派」，但一到當選以後，便加派三軍向越共作戰，一切行動，比高華德更進一步，既把主張向敵人妥協的羅拔甘迺迪之司法部長革職，又批評傅爾布萊特、摩斯等參議員與敵人和談的主張為「國家在行使其權力之際，停止使用其權力或撤退其力量，將對世界發生嚴重的影響」，並鄭重指出「美國在中南半島使用武力，祇是要達成該一地區的和平與自由。」而美國人民願意為和平與自由而戰的傳統精神，亦已在服兵役出戰費兩大事實上清楚現出。

集體安全主義，更為美國人民理想主義的高度造詣。這種主義的根本觀念，是認為用武力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尤其是侵略他國的作法，絕對不合於道德的原則，各國應聯合行動，運用道德的武裝

的各種力量予以遏止。國際聯盟及聯合國的組織，許多變邊條約或集體公約的訂立，無一不是美國人道德意識的實體創作。以前統率聯合國軍隊，討伐侵略韓國的中韓共軍，現在聯絡東南亞許多國家義師，征誅中越共軍，則為美國人道德力量的共同發揮。在以往各戰役中，雖亦曾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承認既成事實，這種行動的表面，像是維持美國的利益，其實是貫徹泛美主義的理想。證據是，明知美國在新大陸各國間的貿易利益，比在歐洲的低得多，但仍依據泛美主義的既定原則進行。明知只須承認蘇俄在東歐方面的行動，即可使它尊重美國在西歐的利益，但仍阻止它攫奪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明知美國在日本的貿易與投資數額，遠比在中國的為大，只要不積極干涉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即可保持經濟利益，更可避免兩國作戰的危險，但仍堅持反對侵略的原則，終於造成對日宣戰的事實。僅這幾件事，已足證明美國為了維持國際公共利益，不惜戰爭的決心。

可是有些人不知是何用意，却在曲解自己同胞根據崇高理想的行動，像傅爾布萊特那樣的向大學生連續譴責美國歷史上的許多戰爭，他從攻擊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的戰爭開始，一直攻擊到現在的對越戰爭。他認為對西班牙的戰爭為「帝國主義」，却不提西班牙人在哈瓦那港炸毀美艦與炸死二百八十六名美國的暴行，是給美國人民的理想主義一種嚴重的挑戰。他批評美國保護被解放的古巴人為武力的自大，却不提幫助他們開發資源的德惠。他對美國盡瘁於菲律賓前途的扶植，及協助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秩序的恢復，亦都表示異議。他尤其無視美國參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積極意義，及其打擊侵略者長遠的廣大的影響力量，只是重拾當時極少數人的唾液，認為是炫耀威力。他這樣的嘲笑美國七十年來的外交政策，無非在形容今日介入越戰的荒謬，暗示向共產主義者有條件的投降，纔是寬大與光榮。

不必諱言，美國歷史上也曾有過遷就現實狀態，承認既成事實的行爲，較遠的如「塔虎脫——桂太郎備忘錄」，商定美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日本則保證尊重菲律賓的獨立。較近的如「雅爾達協定」，犧牲中國在東北的主權，換取蘇俄對日本的參戰。但其結果是造成日本經由朝鮮大舉進攻中國的新事實，造成蘇俄協助中共攫取中國大陸的新事實，造成美國無數子弟葬身在太平洋的大禍患，現在又要美國子弟在越南用生命來防止形成更大的禍患。過去犧牲了理想主義的禍患，塔虎脫要是死而有知，是否會在地下後悔？無從揣測，可是羅斯福政府的後悔，則已由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中沒有雅爾達會議紀錄可查這種情形上面，得到反證，這檔案是否真隨中國大陸淪亡？則尙待查證。

一切總以是否符合道德的信條爲取捨的標準，這是美國人最可尊敬之處。一切訴之於道德，雖會使行動失諸剛直，不易在協調中解決問題，並會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不一定切合實際，但已有聯合國的憲章在，它是符合正義公理的原則而爲衆所共認的國際大法，任何國際問題，只須依據它去處理，總不會錯，任何盤根錯節的問題，亦總可以迎刃而解。即使要動用武力，要受到若干人或若干國家的反對，但最後仍必被美國的理想主義所戰勝，則已有不少歷史的紀錄可作保證。反之，如果遷就中共以暴力造成的現實狀態，承認中共竊據大陸爲既成的事實，置聯合國憲章與美國人民一貫追求的理想主義於不顧，尤其置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反共心理及各種行動的事實於不問，彷彿威爾遜政府的不理蘇台德區德國居民問題，而自毀其民族自決的道德原則，則在政府本身固是白圭之玷，而在人類前途更無疑是赤禍的偏及。

以上許多歷史教訓，詹森政府必須引導美國人民從頭溫習。只有這樣做，纔能矯正大部份人民溺於實用主義，致拘泥事實，誤認現象爲現實，造成完全忘却傳統信念的弊患；亦纔能矯正小部份人誤

用理想主義，致根據幻像產生幻想，發生太不顧及合理事實的惡果；一如西提萬斯筆下的「唐·吉訶德」，單憑空想與熱情，缺少經驗與智慧，謬然執着矛，騎着驢，帶着僕人去實行其救世的理想，致一路做出許多可笑的事。「唐·吉訶德」型的美國人，似並不少，傅爾布萊特可爲代表。即在美國的政府內，亦曾幹過這類蠢事，例如誤認爲吳廷琰不民主，同意越南人民把他殺掉，但不久即又支援其後的軍人政府。又認爲吳廷琰搞的戰略村也不合理，把它廢去，但不久即發現戰略村確有用處，便又恢復，只是不願仍用戰略村的原名而改稱「新生邑」，不再由美軍直接把錢物發到村裏去，而改由美軍透過越南政府發到村裏而已。在這一廢一復之間，已不知誤了許多大事。這些事例，必須提醒人民知悉。

八、當心自毀黨德的後果：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瞭解：共產黨的可怕處，在其黨員的組織力量，而其不可怕處，亦正在此。因爲它的組織體緊密尖銳，足以縱橫馳騁，所以可怕。但其組織是成於暴力的壓迫，而不是成於情志的融合，遲早必激起反抗，所以不足懼。而美國人的可憂處，則恰在其與共黨相反處，言論過於率真，行動過於自由，正適合於共黨的乘隙楔入。其中更可憂處，則又在誤認共黨組織力量的愈過愈緊，不易拆散。同時在於自名爲了不起的人，經常喜與政府立異，致自身已被共黨視爲最可利用的楔子而終不自覺。

今日美國執政的是民主黨，而最反對其政府對越對華政策不惜公然叫囂攻擊的，也正是籍隸民主黨的若干議員，其常爲政府辯護的則反在共和黨方面，此實爲美國政黨政治中所少見，亦爲美國在第一、二兩次大戰中所未有。在科學工藝日新月異的社會，原不反對標新立異，但政治主張上新異到國與家人民的需要不符，反與共黨所要做的無異，而被共黨宣傳爲「已在美國政治社會中造成新異

的祕密武器」，那就太不顧利害得失了。在民主自由國家，每個人自然都有言論自由權，但自由至於漫無限度，形成反戰等於反政府的現象，則這些譁衆取寵的人，即使其個人可以俸得部份選民的盲目擁護，但其全黨損失的選票總數必什百倍於其個人的所得；此外黨譽國威的貶損，更不能以數量估計。如果具有光榮歷史的民主黨由此陵夷，同樣具有光榮歷史的共和黨又因缺乏競爭的固有對象，至於不求長進，兩大黨的聲光既由此下落，則美國共產黨的發展機會即由此增加，那時不但傅爾布萊特這類人將成爲美共的俘虜，即美國人民亦將成爲美共俎上之肉，非聽任宰割不可，還有什麼自由選舉與競選可言？那時傅爾布萊特等即使自白過去所爲是愛國的，他人亦未必遽責其不愛國，但此時的自認與共認又有何用？那時美國人曾在過去投過傅爾布萊特等競選票的，即使自悔其票選的錯誤，但自悔又有何用？

政黨政治的所以可貴，端在其具有可貴的黨德黨紀。黨員在黨的會議上可以自由發表政見，但任何政策既經共同決定，則黨員均須盡力遵行，不應公然抨擊，實爲黨員起碼的道德，亦爲必守的紀律，同時又爲法治的重大助力。黨紀在在與國法保持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之用，纔能使國法常張，國運永昌。英國在第二次大戰中危而不亡，殆與其黨員的忠於黨德黨紀有關。他們這種精神，至今猶表現在言論行動之間。以近年之事言，如工黨左翼議員以唐納利（D. Donnelly）和魏亞特（W. Wyatt）爲首，始終反對英國支持美國的越南政策，在言論上和實際行動上都同情北越。他們主張英國急速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其目的亦在拆美國的台。理由則爲「英國不必在遠東多管閒事」「應該節省不必要的軍事支出」，直與美國左派議員的理論相同。而其左右翼聯合戰線的反對聲勢，則更大於美國一小撮的參議員。可是他們的作法却有限度，第一、他們僅在工黨議員大會上表現，並且向不公關

內容，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會議內容的公佈，係尤威爾森的要求，不像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那樣的呼朋嚮侶，鳴鑼擊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英國政府白皮書中透露其撤退遠東駐軍的計劃，則出於其政府的決策，並非成於工黨議員的叫喊。第二、反對派的提案既被二百二十五票對五十四票否決以後，他們即帖然服從黨的決定，不像傅爾布萊特等那樣的隨時自起爐灶，經常借題發揮。第三、威爾森首相肯挺身而出，率直指責他們爲「綏靖主義」，「他們願意我們國家在亞洲退出，這種態度在今日的世界裏是完全不適用的，這是造成核子混戰的靈方，」不像美國總統與國務卿那樣的對一些參議員與其黨員過份客氣。正由於英國的黨員黨魁均能恪守黨德黨紀，所以能掃除澳洲政府的惶疑，鞏固大英國協的結合，挫抑中共擴張的氣燄。

像這些英國的主臬，及美國人錯誤的觀念行爲與悲慘的因果關係，詹森政府必須使美國人民澈底了解。而在進行這種啓迪工作之中，尤須引證事例，使人民了解事後悔悟的無用。例如杜魯門政府一筆勾銷中華民國政府，馬歇爾特使百般壓迫中國政府與中共和談，艾契遜國務卿贊成放棄金馬外島，他們雖均在事後悔悟其錯誤，特別是艾契遜近幾年來已變爲堅決支持其政府強硬政策的中堅人物，且代表鷹派盡力攻擊「強教」的無知，痛惜美國教育的破產，可是大錯已經鑄成，補救已經不及。並須根據過去事實，向人民說明不正確的認識與不澈底的悔悟，更不勝其補救。例如美國自由份子對中共的看法，最初認它是「土地改革者」，未幾認它不會佔據整個大陸，其後又認它是蘇俄的傀儡，不能有效控制大陸，近來又認它們這一代雖甚橫蠻，下一代可能改善。他們對中華民國的看法，最初認爲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只有一個「中共的中國」，其後又主張承認「兩個中國」，最近又企圖不要孤立中共，並要把它拉進聯合國。過去的看法既步步錯誤，已够反證現在的種種主張同樣不正確。尤須



旁證中共在其組黨之初，即曾接受蘇俄所組織的第三國際指揮，開國家政黨投降外國、甘作奴黨的怪例，美國政黨中的黨員倘亦演變至此，則更是美國人的奇恥大辱。必須如此提撕警覺，纔能使美國人民不直傳爾布萊特等所爲，亦纔能促使他們感覺求榮反辱，各自悔改，亦纔能使詹森政府在進行其對越對華政策之時，不再受到牽制。

九、提防過度民主自由的反動力：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不必去問自由社會民主政治會不會被中共利用？應自己先檢查自由社會民主政治有沒有偏差？要是已經發生偏差，並已有黨員公然反對其本黨政府的重大政策，且連續爲之，倘長此下去，即使不被反對黨利用，而其本身先已自毀立場，踰越政黨政治的常軌。美國人民對於若干自由份子高唱姑息中共論調，因聽信的人甚少，本不怎樣重視，不過如任他們狂唱下去，將使人民因厭惡其人而至於懷疑民主政治，更將誤認平靜無譁、行動整飭的極權政治，在戰時反較有力，並念及美國人民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自動放棄其若干自由權利，聽命政府指揮，由此換得勝利的事實，乃逐漸形成一個反動的思想，似非不可能的演變。極權主義的共產黨政權，本已自詡其制度較有功效，且自覺其功效更大於法西斯納粹，又已收凌厲無前而毫無後顧之憂的侵略成果，若再經美國人自覺相形見絀，就更不會放棄其極權制度，而美國人一向對於共產國家的祝望，及對於新興國家或動亂國家仿行美國政制的祝望，均將因此落空，至少距離更大，則亦爲必然的趨勢。

雖然民主自由最能投合人民的心情，由此發生的力量，亦終能擊敗違反人性的專制魔王，遠之如威廉第二，近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軍閥，先後倒斃，然總因代價過大，得失未必相抵。且民主自由國家兩次付出鉅大代價以後的結果，反跳出一批較當年德意日更爲殘暴侵略的共產國家，則尤

爲當前觸目驚心惑民駭俗的事實。這一事實的較易誘使民主自由國家的人民步入反動，不能迫使殘暴侵略的魔王由此反正，則前者雖然尚未分曉，後者已經擺在面前。倘再從美國人最重現實的心理看，和一般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通性看，則前一情勢的終將呈現，亦可預斷。不管其呈現的時間多久，而其不利於人類，自無待言。更從美國人不耐煩的態度看，共產勢力既遏制不住，而在小小的越南尚被越共纏住，反不如效納粹德國的所爲，尚可攻入莫斯科，絕其禍根。要是美國人民既存這種想法，則詹森政府能否順應民意而對蘇俄以毒攻毒？須看膽識而定，須待事實證明，而民主自由政制將一度演成毫無代價的惡化，則殊無可倖免。且美國民主自由政制今日真正可憂之處，則在一部份人崇法守紀的善良習慣日形衰退，物慾則日趨高漲，調節其間的本特宗教與法律，而今則士大夫信仰宗教的程度已不如前，僅餘最後一道防線的守法習慣，又在各方面發生裂痕。其在國內，黑社會組織的到處作奸犯科，工商業者的常在法律漏洞中巧取橫財，尤其有政治地位的黨員議員不恤弁髦黨紀以謀私利，特別是法院亦受共黨滲透，攔阻其裁抑共黨活動的條文。其在國外，若干目中無人的美國旅客或被聘僱人員，亦不免幹出違法亂紀的行爲，使其所在國人民感覺不滿。更有大可憂的是，由於過度自由民主的風氣，已有許多下一代的人將成爲「準瘋子」，那就是青年男女的「嬉痞」(Hippies)運動。他們各聚三、五十人，組織「嬉痞公社」，囚首垢面，鳩衣散髮，呼朋引類，游蕩度日，反抗家庭學校的管教，蔑視禮俗法規的約束，逃避國家社會的責任，追求精神的徹底解放，由搖滾樂開其端，披頭狂張其猷，服食「大麻葉」「迷幻藥」蕩其神。如此放縱無羈的原人生活，起於舊金山，蔓延於紐約、波士頓、西雅圖等大城市，總計已達三十萬人。如竟聽其流蕩忘返，則十年二十年後，企業將無可用之材，營壘將無可用之兵，不待敵人進攻與共黨操縱，而已自趨腐爛，有如古羅馬帝國的崩解。

衰亡：最近五角大廈前的反越戰示威，曾有嬉痞份子爲之前驅，則凶兆已見，歷史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稱爲「美國生活方式的紅色警燈」，並不爲過。這批青年男女如此胡鬧的心理背景，雖與工業文明的緊張單調生活有關，但若干代議士政論家好發新異玄幻之論，好與政府立異，實有誘發作用，而自由民主的過被濫用，則爲其總因。關於天地，必有與立，如要使美國永恆雄立於宇宙間，便當首先矯正自由民主的滑入岔道，並從爲民代表的議員與作民喉舌的報紙入手，以治其標，使國人所矜式。同時向學校社會教育努力，並取締瘋狂享樂、姦淫焚殺的「好萊塢」影片製品，多編演早期移民開發精神的片子，以端其本。如此的變管齊下，使青年勿再感覺精神空虛，亂找刺激，這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一件大事。詹森總統前在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廳落成典禮會上，曾鄭重提及該校走廊上刻着的一句話，「讓自由產生的地方，珍視學習」，用以說明知識份子負有協助推行美國政策的責任，近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白宮告訴一羣退伍軍人領袖們說，「當我離開這裏時，我將直接到教堂去」，真是有感而發的人仁之言，頗與中國歷史上聖君「作之君，作之師」輔世長民的擔當相似，不論能否聯任總統，總望能力行所見。

十、驕誇最易傷害其他民族的自尊心：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美國人值得驕傲的是在科學工藝方面。半世紀來這方面的成就總居世界第一位，自然足以自豪。但爲什麼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往往吃力不討好，特別是受過美國軍經援助的許多國家，大半討厭美國人呢？此無他，是由於美國人缺少政治外交的才識經驗，也就是社會科學的造詣過於落在自然科學的成就之後。因爲自然科學一枝獨秀，千仞壁立，便不免態度驕縱，惹氣凌人。因爲社會科學缺乏千百年歷史文化的雄厚基礎，所以處理國際社會問題無處取法，只是臨時摸索，自然不免碰壁。能够摸索前進，還是較好的態度。最

壞的是自以爲是，心理上早存有優越感，被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所迷，認爲處理人類間事，也像處理自然界物質的具有一定規律；美國的自由社會民主政治就是最合理有效的規律，一見其他國家的動亂現象，更覺得自己社會政治的可貴，便在言語行動上顯出訕訕之聲音顏色而終不自覺。此種意識形態的表現，在較有修養的美國人，尙能強自收斂，而在富甲一方的工商業者，就不免視他人皆如有求於己的乞兒，受聘雇於他國的技術人才，更不免頤指氣使，視受其指導者幾如機器零件。共產國家以輸出階級鬥爭爲事，美國則以輸出民主自由爲務，雖後者的輸出用意不壞，但其不易使人承銷；強迫他人接受後，他人不但不愉快感激，並且痛感其自尊心的橫被損害。自尊心本是被統治民族苦求獨立自由的原始動力，也是千百年來民族運動所由起的共同原因，更是今世最大問題之一，尤其是今日共產國家利用各地區的民族意識，擺起民族革命的旗鼓，以擊退民主國家援助反共國家各種措施的現代鋒利武器。這種民族自尊心力量的不可侮，殆猶過於核子武力，核子武力尙可以凍結，一經使用後亦可以在極短時間中做到停止，惟有出於民族自尊心的民族問題，如得不到解決，或並非完善的解決，便永遠成爲世界最可怕的亂源。此等民族在目前雖無力反抗，但其自尊心從未痊癒過的舊創，既在隱隱作痛，而又加上新的刺激，終必隨時尋求補償。不管他們求償的行動是否有利於其自身，而其有利於共黨的滲透分化，則已到處可見。

事實已很顯明：其在過去，因自由世界的分離散漫，遂致無力對抗統一的共產集團，吃够了各自爲戰之苦。其在今日，共產集團雖已陷於矛盾分裂之境，却仍不能團結盟邦及不結盟國家共除人類公敵，反予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其所以致此，則主要由於各國皆有其極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美國人則被傲氣所驅使，經常予以蔑視所致。如長此不變，儘管美國人得天獨厚，睥睨一世，但在不斷碰壁

以後，氣餒心灰，逐步退回到門羅主義的舊堡壘中去，不願再問他人事，或惱羞成怒，索性跟上新孤立主義者走，一切世間事都想由自己重新做起，都非不可能的演變，而越南問題的和戰兩難，越南民選政府的毀譽雜出，越南人民的厭戰同於美國人民，則已爲導致此種演變的有力因素。如果這些因素激盪不已，流入越南人民自決和戰的一途，那麼在此關頭，便是美國人是否退回舊門羅主義堡壘，或躍入新孤立主義路線的起點，同時也是共黨能否得逞的關鍵。美國人要是一氣而離去，固爲中俄越共極端歡迎；如果一怒而硬幹，中俄越共也可以利用美國人民血脈憤張的弱點，肆其譁張爲幻的伎倆，盡其鼓煽支援的力量，以坐實美國竊武侵略之罪，而使向之尙與美國合作者，亦將離異而去。無論美國人民走向何途，總將造成更嚴重的難題，除非美國政府對於後一途已有妥善充足的準備，對於前一途亦已有防止的布置。如均不然，就該仍在其人民的性習方面對症下藥。

此所謂對症下藥，是努力於端正人民的觀念與作風，必須使其各自承認在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外交這兩課，並不及格，應用到國際社會方面，成績尤差。並須使各人痛切感覺，驕傲最會刺激人，使人嫉妒、反感，以致彼此不能融洽相處，耶穌教人謙卑，就是爲此。美國人把大量金錢援助他國，甚至加上士兵的生命，而受援者並不感恩，還要憎恨，也就在此。改革的起點，則爲先不自滿，滌盡驕氣。改革的方針，則爲因地制宜，不再以他國所不能行的強其採行。必須改革的人物，則爲具有政治慾的人士，勿再亂嚷自由民主，要自己的政府聽他指揮，並要政府去指揮他國，致在國內濫用自由民主，在國外變成強迫接受的自由民主，弄到無以自圓其說，無法交代這本自由民主的濫帳。但如不能先使人民了解最不自由民主的共黨，偏是最鼓動落後國家人民去爭取自由民主的鬼物，那就由於不知彼此的兇險，也就不知己的愚蠢，一切改革便無從談起。故先使人民了解共黨的惡計，在迫使美國更信

民主自由的力量，去強注在向無經驗的民族體內，激起其自尊心橫被損害的反感。由此動心忍性，提高警覺，實為最基本的前提工作。

十一、拯救宗教的迷失：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所以永被世人分別信仰，主要在其和平博愛的教義，在其皆能躬行實踐，專心致志於拯救人類心靈的工作，相率避免干預實際的政治，如有必要，即殺身成仁亦毫無所惜。此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氏，尤為顯著。但事有出乎常軌者，以最毗鄰佛教聖地的越南和尚，却最違背此旨，竟把「僧統院」「化道院」作罔民禍國的司令部，動輒集合萬人，發表政治主張，脅迫政府停止反共。甚至如釋智廣之流，竟赴河內會晤越共頭子胡志明，竟使其徒衆作間諜，時常在其政府的國防機密文件發出後的二十四小時內，便竊得情報，供越共利用，又竟使其組織的「救國委員會」驅逐政府機構內的「勞教」份子，以便利其滲透。

佛教的重要戒律是不撒謊，可是他們又專門撒謊，到處宣傳政府歧視佛教徒，除用此武器謀殺了吳廷琰總統以外，又顛覆了並不反對佛教的阮慶、陳文香、潘輝造等政府。又故意曲解美國援助越南的真意，圖使人民誤信他的惡意宣傳，認為「越南人怕共黨控制，同時也怕美國人控制」，「美國人是反共鬥爭中的剝削者」，妄思藉此趕走美軍。在人民尚未深信其言時，即又驅迫青年僧侶自焚自殺至十次以上，冀以激怒衆生。在政府軍隊進攻叛軍及反政府的僧侶所據守的天和寺之際，即又強迫婦孺與平民作擋箭牌，致冤死受傷者達二百人之多，而以人民為芻狗。凡此所為，直與中共以前謀害政府的手段，如出一轍。

佛教又一重要戒律是不貪嗔，其積極意義在博愛衆生，消極作用在根絕物慾，可是釋智廣的生活

完全相反。除了不食肉飲酒吸煙以外，出入已由腳踏車改乘汽車飛機，交往則有軍人政客共徒，將寺院當作營壘，佛門變成輪轆，設置「行動委員會」，組織「看守政府」，發出一片殺伐之聲，連廟門那種甯靜肅穆的氣象都不如，更不知「戒、定、慧」是什麼，比尋常妖僧的毀法亂紀更甚，只有毛澤東發動的紅衛兵和義和團始祖的白蓮教，堪與相比。

醜惡的越南妖僧並不足怪，因為他的勢力並不強大，不但不足以代表南越人民的意志，亦不足以代表南越全體佛徒的信仰，誠如魏摩蘭將軍接見紐西蘭國會代表團時的指出，南越的政治問題，由於經過外國報紙頭條新聞的渲染，致更離譜。但如窮究源委，亦由於共黨有計劃的毒害現代人的宗教信仰，益使魔高千丈。無神論的共主義，素以摧毀宗教為其主要革命目標之一，不但在其心目中認定「宗教是麻醉人類思想的鴉片」，並在事實上殘殺天主教與基督教徒。一九五四年越共攻破奠邊府後，數以百計的法籍修女和教徒，都被共軍加以集體強姦致死，而在中共紅衛兵出現後，被侮辱毒打的歐美修女，死於大陸者固不少，逃抵香港後因折磨過甚而死的，亦已有英籍老年修女一人，如把此類血淚斑斑的資料搜集成冊，可能比聖經更厚。其不遺殺身之禍的亦早中「攻心」之毒。如美國一小部份教派，就長期在中共滲透誘惑驅使之下，經常干預國際政治以及他國的內政。即譬如羅馬教宗，亦竟不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更不譴責中共屠殺人類的暴行，而惟願求美國停止轟炸越共，真是天地晦冥，萬方同慨。如此既貪且嗔而又工於說騙的僧侶，即使暫憐於正義實力，亦祇是以退為進，若遇機會，自必捲土重來。

詹森政府當前的急務，不但在軍援越南，並在「佛援」東方及「耶援」世界。須知二十世紀初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根源，即植基於基督教會，而世界幾個大宗教的發源地，又都在亞洲，幾個大宗教

的領袖亦都是亞洲人，應即從大處着眼，使印度負起「正法眼藏」的神聖工作，使墮入魔障的越僧由此誕登彼岸。同時永勿再把駐越使館作為妖僧的庇護所，更勿再用美國國旗去包裹這些妖僧的政敵之頭顱。並須與羅馬教廷及耶教會合作，共同闡揚耶教的戰爭觀與其和平博愛的教義，使殘殺者孤立，反戰者猛悟。務從各方面着手，使掃蕩共禍的任務，植基並完成於拯救宗教的迷失之中。

一二、勿再吞食聯合政府的糖衣毒藥：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如果應用經營工商業的方式去經營政治，亦必須投入大資本，從事大規模長期間的經營，纔能物美價廉，福國利民。要是只走小路，目前雖較省力，最後仍將失敗。倘使走錯路線，失敗就必更快更慘。美國人雖不甚關心政治，但是經營工商業的常識或經驗，一般人並不缺乏，就這點上和他們談論政治，無疑是一條現成的通路。就這條通路上使他們了解主張組織聯合政府者在認識上的錯誤，由是羣起糾正，是順理成章之舉。

聯合政府之起，本由於國會中沒有一個絕對多數的政黨之時，纔由一個較多數的政黨聯合各政黨組織聯合內閣，其穩定性雖然較差，但因組成份子同為政黨，同具政黨政治的觀念，尚不致故意搗亂。共產黨則不然，它根本不是普通的政黨，只想消滅政黨政治，實行一黨專政，如希望共產黨能與其他政黨組織聯合政府，本質上的不能相合，已如水與火的不能相容，效用上的適得其反，則更如准許盜賊與警察共同成立治安機關，愈加便利其殺人越貨，至於無從禁止。如再稽諸事實，則聯合政府根本是一種臨時組織，其目的本在借此解決某些現實問題，而其結果則反增加黨派傾軋，政潮洶湧，國運危殆，法國第三共和以後的許多短命內閣，與其在兩次世界大戰時的到處慘敗，都是鐵證。要是其中更有專事鬥爭的共黨參加，則其結果就只有比法國的情形更壞，二次大戰後匈捷兩國的聯合政府都因被共黨控制而崩潰，法意兩國的聯合政府都因共黨退出而垮台，寮國三頭馬車式的聯合政府且因



共黨作祟而至今尙禍及鄰國，更阻害越戰，又都是新證。要是更有中共操縱於其間的聯合政府，則其結果必更壞到極點：因爲毛澤東新民主主義中的聯合政府，是祇許無產階級參加，全由共黨幾個頭目控制的極權政府，以前中國政府力阻這種政府的出現，就是爲此。於今中共又得瀛望蜀，不斷向越南下手。一九六〇年時越共在其「政治宣言」中提出的聯合政府，及在一九六七年底發給聯會會員國的「南越解放陣線政治綱領」中要求組織「南越聯合民主政府」，都與一九四六年中共所提「和平建國綱領」中主張中央與省的聯合政府同一形式實質及其作用，顯然是中共的手筆。

事既如此，則詹森政府除幫助南越政府嚴予拒絕，並採用當年中國政府祇允中共參加國府委員會的方式，要越共放下武器，加入南越的民選政府以外，尤應同時從國內下手，乘機向美國人民說明，經營天下事，同於經營工商業，除非不幹，既已幹了，就得羣策羣力的大幹，大幹纔能成大功。並須準對美國人民日逐漸厭惡聯合國議論多而成功少的心理，一方說明體大思精的聯合國，尙且因共產國家的搗亂，不易成事，何況在一個國內把積怨甚深的黨派，捏成的聯合政府。他方說明聯合國纔真是目標最大人才最多的聯合政府，是威爾遜、羅斯福兩總統名異實同的大佈局。人民如能與政府齊一步驟，各盡其能，向此投資，則此一造福世界的大組織，決非共產集團的力量所能破壞，也就不會再在一些國家裏產生聯合政府的問題。即使有，但在聯合國監臨與美國人民支援的形勢之下，亦無再被共黨吞噬的可能。其勢之固，正如總公司的強大力量，常足以捍禦奸商對其分公司的兼併。好在美國人民都懂得工商大企業的經營原則與管理技術，只要從此着眼，由此着手，就會一拍即合。人民的見解既與政府同樣偉大，自必羣趨於遣大投艱之途，而於容易倒閉破產的聯合政府這個政治小交易，及主張幹這種生意的政治投機家，更必被人民唾棄。而最喜歡買空賣空，操縱政治市場，專搞聯合政府的

共黨，亦將從此銷聲匿跡。這是詹森總統在近代政治史上從根拔清聯合政府糖衣毒藥的一件救世大功德舉，急應率先倡行，力爭首功。

一三、最須鞏固南越戰時政府：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美國部份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一樣，在政治上有同犯錯誤之處。共黨政權想用馬克斯的模式，建立共產國家的經濟制度，根絕資本主義的產銷方式，又用列寧史達林的模式，改造親共非共國家的政治，使它成為附庸，自然註定失敗。美國有些民主人士想用民主政治自由社會的模式，去改造反共非共國家的政治社會，認為這纔是消滅共產勢力的根本辦法，此就理論上說，自無疵瑕，但在事實上，顯然不通。一個不懂民主自由是怎樣意義及狀態久處在專制政府或內亂頻仍之下的人民，要他們驟然去民主去自由，正如久處在黑暗洞穴裏的人，驟然看到日光，只感覺刺眼，絕不感覺舒適，亂跑一陣，跌了幾交以後，便又回到巖穴中去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帝制共和的數起數落，最後仍回到帝制，纔能僞定一時，就是最清楚的史例。

最專制奴役的共產政權，偏愛向反共非共國家大喊民主自由，本在把它作為顛覆這個政府，盜竊這個國家的淫壘，這個國家的新政府無論是經選舉或協商產生，它毒惑對方的目標已達成了一半。即以越南為例，以往的政府會經過兩次民選，結果是越共的坐天，恰如中國皇室裏女妃宦官的不復可制。現在中共指使越共越僭學生軍閥又狂喊還政於民，姑不論其結局能否比以前為佳，祇在制憲與選舉階段，可能發生的紛爭與混亂，亦將大費彌縫的時間。即使能在事前事際消弭這種情勢，但新政府的仍將被它們擾亂顛覆，則仍與過去相同，並不因其為民選的合法政府而即增加抗衡的力量。又即使因美國的勗勉與南越的努力，或可減少被共黨攻擊挑撥的瑕疵，但在新政府成立以後，為了鞏固政權，取悅人民，倘使借託民意，遂對美軍來個逐客令，美將何以自處？留則新政府不合作，去則越南從

此淪陷，僅守幾個據點，亦無補全局。現在雖尚未面臨這種尷尬局面，但不祥之兆已現。其較遠的，如當錫蘭建議舉行結束越戰的全越會議之時，而一向反對和談的阮高祺竟首先表示願意派員參加，無非擔憂美國今後動向的不可測，南越的前途將如以前中國大陸的被美國拋棄，不如先行謀和，為本身謀一個退步，並為爭取選票下一伏筆。其較近的，如在各派爭取選票時，無不標榜謀和罷戰，而在美國進行其建築柵欄防線時，又皆懷疑其為美軍借此逐漸撤退的佈局。雖此類觀感或不正確，而其戰志的動搖，則已見跡象。何況既有選舉，就必有落選的人物，他們如不顧大局而逞意氣，則任何自由公正的選舉，多少總有瑕疵可指，假使共黨從中鼓動，則落選者結合為反政府陣線，致使新政府忙於應付新起的政敵，疏於反共的戰爭，一如以前中國政府的忙於應付「民主同盟」，現在美國政府的忙於應付鴿派人士，最後至於和戰兩敗，尤非絕不可能發生的情勢。倘誠如此，則美國又將何以善其後？

詹森政府必須為南越設身處地着想，必須為美國懲前毖後打算，自動採取確實有效的步驟。原則是明白宣佈越南已進入國際反共戰爭狀態，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並以一年或二年內擊敗北越共軍政權為期，（其實如用小型核彈，一天就可了結。）再以光明堅強的態度，從行動上支持南越戰時政府到底。亦不妨同時宣佈，南越倘能產生民選的政府，固樂觀其成，假使不能，或料定其結果不佳，並認定有擴大現政府基礎的必要，美國均有其期成的道義責任，一切總以有利於反共軍事為第一原則。並以過去中國政府的覆轍，與現在南韓政府的成功，作為說明美國此種態度及政策的依據。中國大陸淪陷的原因，了解者已日多，而南韓近年以來由於政治領導中心的鞏固，造成各方面的進步，不但有力鎮懾北韓共黨，且其雄兵在越南的戰績，對美越兩國都有極大的貢獻，則尚未為美國人民所深識。誠能以此啓迪人民，則不但越共自名為只有它纔代表南越人民意志的胡說，或中俄共認為越南的反

共戰爭祇是美國推行其亞洲政策的邪說，均將爲美國人民所唾棄，而詹森政府以上的宣佈，亦將在鞏固的南越政府之下，迅速達成其最後的目標。

反之，一切倘仍像今日以前的所爲，細了在越將士的左臂，只許他們用右手射擊，又不准射擊的過速，已使中越共大爲得意，而在越南民選政府成立以後，又把美國可以說話的嘴巴，也讓越南的人民與政府封住，並把在越將士比在國內清淨的耳朵也被落選人吵聾，使美軍變成缺臂殘腿啞巴聾子的越南傭兵，豈不是更讓中越共大笑而大得其利！

一四、應隨時與國內外人民計較勝負之數：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及他國人都了解：數字是科學的要素，有時却是政治的毒素。中共在各方面偽造與搬弄數字，固在欺騙世人。而美國軍事參謀人員的機械地斤斤地計算兵員彈械糧餉艦艇飛機雷達醫藥交通電訊及一切裝備的數字，一般人民卻完全不知道這些軍事方面的數字，則美人的自毀於懵懂，和中共的自殺於虛驕，其失相等。今日大部份美國人總覺得越南彈丸之地，又遠在八千哩外，與美國國家利益無關，不值得引起中共的人海戰。要破除這種計較的觀念，即須根據現勢及後果，幫助人民清算。

第一、應使人民了解：美國今日的軍事力量，決非中共所能比。除非它發瘋，即決不敢與美國軍事衝突，發瘋則是上帝使它毀滅的紅燈。如美國的總兵力，一九六七年度已達二百九十八萬七千三百餘，一九六八年度將增至三百四十六萬四千餘人，這樣龐大的兵額，又均具現代最新的裝備，不但不是數多而不精不實的共軍所能敵，亦非其他共產國家所能抗衡，因爲分佈在國外各地區、擔當世界警察任務的美國軍隊，已達一百多萬人，彷彿巨神降世。其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已有七十五萬常備兵員，五百四十艘戰艦，五千二百架各型飛機，其中配備核子彈頭飛彈的在二千六百架以上，六百五

十枚飛彈裝成的潛水艇亦早在各海洋活動。在越南的兵力，陸軍已接近五十萬人，至一九六八年底，如有必要，可增爲七十五萬人。空中機動第一騎兵師，已擁有直昇機四百五十餘架，日後可增至二千架。數百架的運輸機亦正在擴充改進，不久即可用每小時五百五十哩速度，飛行一百架次的「C—5A式」運輸機，能在數天中將七萬軍隊調至任何地區，它真像無重勿載，無遠勿屆，所向無敵的天兵。此外，十億萬發步槍與機槍彈藥，一千萬發迫擊砲彈與大砲彈，九百四十萬枚手榴彈，凡可以從事傳統戰的兵器，亦無不具備而充足。這些數字，不但已較中越共軍力的總和優足的多，並已超過韓戰期間的兵力。如再加上南越軍及盟軍計算，威力自更不止如此。在一九四六年時期，連一師隨時可上戰場的部隊都沒有，然尚能阻止蘇俄在東歐的行動，於今豈有反讓中越共得逞之理？且爲了減少人員的喪亡，在空軍方面，已繼續增加機動化的軍械，減少由人駕駛的遠程轟炸機。在裝備方面，已經使用二十多種最新裝備與技術，將來更可增至八十多種。中共即使敢用人海戰，必將自投火海，並被美軍的裝備海技術海所淹沒。

尚有一種數字，足使美國人自豪自慰的，那就是世界的重心既移在亞洲，而亞洲海上樞紐的太平洋，則又已構成美國的內湖。請向西看，離美國本土二千哩的夏威夷，已構成最堅強的第一道防線；成爲核子潛艇與戰略轟炸機出擊基地的關島，則已構成最堅強的第二道防線；成爲海陸空軍及傘兵基地的琉球羣島，則已構成最堅強的第三道防線。在第一防線中的核子潛艇，已裝有六十枚的北極星飛彈，可射入二千五百哩內敵人的心臟地區，僅一艘潛艇的破壞力，就能癱瘓一個國家的重要設施，太平洋中這種潛艇的數量則很多。至於地面無數的雷達，太空許多的人造衛星，與搜索天上地下的各種電子設備，及不分晝夜、不停片刻、經常在空中陸上海面梭巡的飛機，乃至美國西海岸的第一艦隊，

與在遠東的第七艦隊，如是等等，網已在太平洋上織成一面威力網，使敵人無所遁形，不敢問鼎。美國既擁有壓倒任何國家的現代軍備，只要美國人民不予掣肘，則一動即可使越共成灰，中共齏粉，一怒就可使蘇俄束手而安天下之民。

如認所舉各項數字不盡正確，而真實的數字則須保密，則改用他國權威機構或人物對美國軍力最近的估計並已發表者，即更有力而無害。例如英國的戰略研究所是研究國際防務問題有名的私人機構，它在今年九月十一日發表的一九六七——六八年「軍事均勢」報告中關於美俄中共部份的調查數字，是最好利用的資料。它對美國的估計是，「由於越戰的加強，美國的武裝部隊要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共達三百四十萬人，比蘇俄約多二十萬，洲際彈道飛彈一千零四十五枚，裝備在四十一艘潛艇上的北極星飛彈六百五十六枚，到一九六八年時，美國仍將以二比一之數超過蘇俄，其命中率亦比蘇俄的飛彈為準確。美國現正以海神飛彈代替北極星飛彈，海神飛彈攜帶的彈頭，重量為北極星飛彈的一倍。」並說，「長程轟炸機五百二十架，比蘇俄多三倍以上。」它對蘇俄的估計是：「擁有武裝部隊三百二十萬人，洲際彈道飛彈四百五十至四百七十五枚，中程飛彈（不能到達美國）七百至七百五十枚，類似北極星飛彈而自潛艇發射的飛彈若干枚，長程轟炸機一百五十架，中程轟炸機一千一百架。」它對中共的估計是：「擁有武裝部隊二百七十萬人，原子彈三十枚。」又說：「蘇俄與中共正在努力企圖趕上長程飛彈的距離，但是從現在起一年後，它們仍將僅為美國的一半。」它對北越的估計是：「擁有高射砲六千門，其中半數由雷達控制。」並且說「美國有二十二艘航空母艦正在執行職務，蘇俄與中共則沒有一艘。」

更有利用價值的是，日本國防高級人員最近（一九六七十一月）在其首相加藤訪問東南亞各地

時，以數字證明中共軍力的不足畏。倫敦泰晤士報特派員 Richard Hughes 里察爾士曾報導如次：

中共缺乏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戰爭，他們現在所能動用的軍力，祇有二十至三十師，約四十萬人。他們的分析是：（一）目前大陸情況混亂，需要很大的警衛及保安的軍力，加以遙遠邊區的防務，及運輸上的困難，都減弱中共出擊的力量。（二）除非美軍揮兵北進迫近中共的邊境，中共不會公然參加越戰。即使參加，其所用軍力也不會超過十師人。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軍隊衝突，中共也難於應付。（三）中共的核子力量祇限於中程飛彈。除非美蘇兩國的核子發展就此停止，否則中共的核子能力不會趕上兩大領導國家，遑論超出。（四）中共的海軍力量，更是相形見绌。目前的實力，還遠遠比不上日本有限度的自衛海軍力量。但是對於核子潛艇及飛彈的威脅，日本是不敢輕視的。（五）中共在空軍方面，正在設法自製蘇聯式的戰鬥機與轟炸機。但是由于汽油供量不足，實力大為減弱。中共的飛行人員，每年祇有二十至四十小時的飛行訓練。（日本飛行人員每年的訓練時間是二百至二百五十小時）。（六）中共揚言汽油供應，可自產自足，並稱每年汽油需要量是一千萬噸，但這個數字亦祇及日本汽油每年輸入量的十分之一。（七）除了糧食不足之外，有限度的工業產量以及落後與原始式的方法，絕對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現代戰爭。上項估計，是日本第一次公開估計他國的戰爭力量。西方軍事當局認為：內容確實，措詞小心。關於中共參加越戰的可能性，該項報告書稱：「每天要經由狹小的鐵路運輸一千噸的供應，而同時經由海道載運另一千噸的接濟品，這是非常困難的。假定每天每一師人需要給養一百噸，中共可以遣派二十師人參加越戰。但是由於空中的攻擊以及北越需要幫助，中共所能參戰的軍力，也祇限於十師人了」。

第二、應使人民了解：美國的經濟力量，決非中共所能及。代人民看守錢袋的美國參眾兩院，屢

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援外巨額款項與國防支出，最近通過的各項支出款額更大；越戰所需各費，及其所需經社建設等款，亦隨年增加，足證人民代表灼知人民負擔能力的強大。一九六八年會計年度的預算，總支出達一千七百二十四億美元，總收入估計達一千六百八十一億美元。在支出的經費中，每一美元內有一角三分用之於越南。所以敢列出這樣巨大的收支，完全基於經濟的發展與國民所得的增加。在二次大戰以後，人民爲了適應領導非共世界，充當世界警察的需要，已付出一千二百八十億美元的援外款項，在軍事設施方面，亦較單一性防衛需要增付五千億美元，又足證經濟成長率國民所得率一向很高，現在則更好。更有一項最巨大的力量，由於低度開發國家及不穩定地區面臨人口爆炸的危險，美國的糧食產量，又成爲美國手中的一張王牌，美國的農莊，已漸成爲比槍砲更具有影響世界的力量。

在韓戰期間，每年的軍事費用，會由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十四，現在的增加率，顯然降低。在一九六六和六七兩個會計年度內，軍費支出大約爲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七點七和七點八，比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四年五個年度中的任何一個年度爲少，需要在一九六六與六七兩個年度中分別加上四百四十億和四百六十億美元，纔會接近韓戰時百分之四十的數字。

如就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新聞與世局報導」雜誌根據美國商務部、聯合國及其他官方機構資料、比較分析美國生產力的專文看，則美國的經濟力量可說是「天下無敵」。僅加利福尼亞一州的生產，就超過了土地大於美國本土三分之一與擁有人口七億五千萬的中共生產總值。美國北部十一個州的總生產，亦與土地面積大於美國全部領土及人口超出二億三千萬的蘇俄生產總值相等。美國東半部的生產值，亦超越已經大於蘇俄百分五十的西歐。伊利諾一州的生產值，就和全部非洲相等。俄亥俄



州的生產，相當於人口五億與地面龐大的印度之總生產值。美國面積僅佔全球面積百分之七，人口僅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而其生產額則幾及其他國家總生產額的百分之五十，即使中共全力追趕，亦終瞠乎其後。何況它近年的農產量仍與一九五七年相同，而人口則比一九五七年增到一億以上，更何況它又發動紅衛兵造反，反得各種生產大半停頓或竟破產又如何能支持對外戰爭？

有數字可計的美國經濟力量已如此巨大，非數字可計的美國經濟潛力，如科學、技術、企業、組織、商業方法等，亦已領先了歐洲十五年，更不是中共所能望其項背，此事已由法國最大週刊雜誌發行人兼編輯塞爾文·施瑞博在其所著「美國的挑戰」一本書中證實。這本書已躍居一九六七年巴黎最暢銷書之首，書中第一段即有如下的綜述：

『在十五年中，次於美國國內與蘇俄而居世界第三個工業力量的，很可能是在歐洲的美國工業，已成立九年的歐洲共同市場之本質是美國的。』他認為『美國今天在外表上雖像歐洲，但却領先了十五年。在一九八一年，美國將是另一世界，如果我們不進入那個世界，他們將會獨佔技術和科學等現代的力量』

第三、應使人民了解，中共的人海戰術和游擊戰術已不足畏。如上所述，單憑美國一國的軍事經濟力量已足壓垮中共，何況出兵援助越戰的已有韓、澳、紐、泰、菲等國，出技術人才的已有中華民國、西德、伊朗、西班牙、韓、英、義、菲等國，出物資的已有法、希、義、土、日、菲、泰、巴西、丹麥、瑞士、西班牙、奧地利、委內瑞拉、盧森堡、伊朗、以色列、阿瓜多爾等國，出錢的已有中華民國、日本、西德、愛爾蘭、加拿大、寮國、巴基斯坦等國，各數雖不多，國家則已有三十一，這比全球九十個共產黨內，支持蘇俄的只有六十個，支持中共的只有二國，支持越共的北越人民僅佔

四分之一，則美國聲勢怎樣浩大，中共聲勢怎樣薄弱，已可想見。如果美國再實行大力裝備南韓、越南、中華民國、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盟軍的計劃，而以上述各國總兵力三百八十萬人的半數介入越戰，則不待交鋒，即已先聲奪人了。

雙方實力的懸殊既如此之大，但尚有人憂慮中共會動員全國人民與美國悍然作人海戰，並作游擊戰，則無非以韓戰與越戰為例。殊不知今昔情勢大異，當時中共初據大陸，人民尚未看清它的殘暴，今則飽受迫害，不但不願再次助紂爲虐，並殷望中華民國迅速反攻，即使不立即揮師北伐，中共亦不易倖勝，因爲北越不像北韓那樣的接近中共交通便利地區，遠比當年補給其在韓國的軍隊爲困難。越境又多叢林，亦不像韓國那樣的地形便於人海沖擊。且蘇俄已與中共鬧翻，決不會像韓戰期間那樣的給他撐腰。這許多不同的形勢，中共未嘗不知，只要美國有決心，它一定縮頭，一九五六年的台灣海峽事件，一九六二年的對印進兵事件，就都是他知難而退的例證。要是認爲蘇俄終必援助中共，那也是忘去舊事的錯誤估計，一九四八年蘇俄在國內外的形勢正在最優越時期，擁有武裝部隊三百萬人，核子武器的完成亦比今日中共爲易，合計英美兩國的兵力又祇及它的三分之二，可是它並不敢支持中共侵韓到底，它今日何敢反助中共侵越？即使美國懷疑這些論斷的正確性，而事實亦或如此，但人海如真可畏，則姑不遠談各國以少勝多的許多史例，惟僅須一問以色列的二百五十萬人何以能迅速戰勝五千八百萬人口的阿聯？也就會恍然大悟了。

神出鬼沒的游擊戰，越南地形又便利越共這樣幹，在美國尚未發展各種新式武器以前，自感困擾，今已不然。爲了找出游擊隊潛伏的地點，已有一種投擲於直升機的「嗅人器」，可以透過森林，嗅出人類獸類所排泄的氣味。並有紅外線感應器，可以辨別炊煙與人體熱氣。又有一種空中攜帶叫做

「紅霧」的紅外線探測儀，可以探察人體熱度、營火、及叢林中敵人的跡象。爲了瞭解游擊隊移動的情形，已有一種測視空携雷達，察知在密林中敵人活動的身影。爲了擊中目標，已有一千一百磅的「牆眼」炸彈，經由電視映播，以及時速一千四百英里的「小惡犬」飛彈，經由無線電操縱，都能炸中敵方的橋樑，並有十英里射程的「百舌鳥」飛彈，可以使敵人跟踪美國飛機的雷達光束，受到控制。更有一種超敏感「無線電測向儀」，測出敵人無線電發報機方位，予以炸毀。爲了殲滅進攻的游擊隊，已有一種在彈囊中裝滿許多小炸彈的「散花彈」，經由飛機投下，射出數千彈片，飛散各方，發生強猛的殺傷力。除這許多游擊隊的剋星以外，美軍並已學會反游擊的各種戰術，韓軍則向甚擅長，中華民國派赴越南的軍事人員，更是老手。故對越共的游擊隊，不但無須害怕，且已迭獲勝利，今年（一九六七）十一月十三日美駐南大使彭克已在華盛頓告訴記者說，「南越共軍的新兵人數，已減少百分之五十，他們亦很不容易獲得各項供應品」，「在一年前，祇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歸由南越政府控制，現已增爲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越共控制百分之十七，其餘都在雙方爭逐地區之內」，這種美越方面的成績，即反映越共游擊戰的失敗。

第四、應鼓勵美國人民齊起質問。基於以上的分析，誰都可以斷言，今日美國不能粉碎中越共軍的侵略，絕對不是各種力量的薄弱，實另有原因存在，這應該導使會打算盤的人民起來質問：爲什麼自己國家有無限戰爭的本錢，而偏打有限戰爭？爲什麼中共祇有有限的本錢，而竟想進行無限戰爭？爲什麼只由美國圍堵中共，而不聯合中韓越泰等國的兵力圍攻中共？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既強調「現在與中俄共接界的國家，貢獻出三百五十多萬人供防衛之用，大約超過美國三軍的總人數，如以美國人去代替這三百五十多萬人的退阻力量，則殊不合算，因爲這些國家一名軍人每年所需各費，僅五百四

十美元，而每一美兵則年需四千五百美元，高達百分之七，「這算法原不錯，只是爲什麼不讓所費甚少的中韓越泰等國之兵直搗中共的腹地，而爲美兵分勞呢？依照五角大廈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的宣佈，由於蘇俄的軍援，北越地對空的飛彈基地，現時已有二百多個，比去年增加了四倍之多。又由於中共與蘇俄的援助，北越的高射砲，在一九六七年初，亦比以前增加了一千門，迫使美國空軍冒險進入八千門大砲的共軍防空系統範圍之內。再據各方報導北越進攻美軍的情形，由於蘇俄中共的軍援，尤其是蘇俄一四〇火箭的使用，已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至七月十五日止，致美軍陸戰隊的傷亡數字高達八千人以上，五月至七月間，美軍每月傷亡的總數，均已在二萬人左右。今日以前已如此，今日以後自更嚴重，爲什麼只是零星增加兵力，故意便利於敵人的逐節吞噬，竟由自己增加了嚴重的程度？又爲什麼老作求和份子的應聲蟲，益使政情混亂，軍氣消沉，敵愾高張，一如麥納瑪拉所說的「業已減少美國軍事行動的效率，使越共的死亡率減了百分之五十一？」

這些疑問，美國人民是有權利提出的，如果詹森政府提出的軍事經濟方面之數字，比本文所述的更爲明確，人民的追問就會更力，這毋寧是詹森政府求之不得的好現象，要是人民不問，也應鼓勵他們來問，因爲如此纔能遏阻姑息論調的再起，便利越南戰事的邁進，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往直前，絕無牽掣，一九四〇年後期的反抗蘇俄威脅，全國響應，即皆得力於民衆的奮起。要是認爲人民聽不進這樣囁嚅的數目字，甚至反會把人民嚇倒，那就無異輕視美國人民慣於打算盤的數字頭腦，尤其蔑視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顯然不及英軍強盛，而仍能擊敗英軍的勇敢事實了。

一五、休再放棄雷震萬鈞的主動力：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由理智領域內發射出的大毅力，常能左右環境，並能創造個人或國家的命運，僅憑情感支配的意志與行動則相反，只有流爲

環境的奴隸，毀及國家民族的命運。歷史上一切大事業的成功，及造時勢的英雄，無一不是出於各個人的自覺自主自動，這在過去歷史的記錄是如此，而在可於一分鐘內斷絕個人及國家民族命運的核子戰爭時代，更是如此。過去戰爭的勝負是決定於最後五分鐘，現在確實是決定於最初一分鐘。如果一切只顧目前，則目前的時間實很短促，倘使要它延長亦可辦到，而其權力則操在自己手中。要是這種權力被敵人奪去，則權力被奪之時，就是個人及國家民族命運已甚短促之時，即使還想延長，已為時間所不許。又即使敵人不使用「一剎那間就可以斷絕對方命運」的殺手鐮，如核子武器之類，而只用普通武器，那亦會由於被動應付之故，勝算仍操在敵方。

半世紀來，美國握有壓倒任何強敵的大力，但總因美國政府在使用這種大力之前，須取決於人民，僅此一程序的完成，開始即陷入被動地位，不能先機疾赴。待到人民決定，敵人早已進退自如，所獲已多。待到全力反攻，雖終勝利，但犧牲已重。第一、二兩次的參加世界大戰，都是如此，不幸今日還是如此。今日美國政府對中越共的政策，為什麼只應戰而不求勝，只打仗而不動員，只圍堵而不孤立，弄得處處矛盾，步步荆棘？這並非由於力量不足，而是自詡代表民意的一些人，吵着要政府如此如此的。政府何嘗不知應戰、圍堵，已經是在中共主動造成的形勢之下的被動措施，又何嘗不知不求勝、不動員、不孤立，更是沿續被動的應戰、圍堵以後被動的被動。至於「等待中共下一代變好」的想法，又顯然是長期的被動，一切不外於隨着敵方情勢的變動而變動。如此的被動，泰勒將軍前在舊金山講演時亦不諱言，他曾承認美國在越南的種種計劃，是根據當時的情形擬定的，後來因為共產勢力改變了環境和戰爭條件，原定計劃纔沒有發生效用，美國也就不再根據變動後的情形，重作新的計劃，這誠是慨乎言之。更感慨的是，空軍參謀長麥康奈爾將軍，他在今年（一九六七）

十月初說，「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原來建議使用空軍的強猛攻擊力量，對北越使用壓力，最初列出的目標是九十四個，計劃在六天之內全部予以摧毀。如果在兩年前即採行這個計劃，北越目前將無空防，美機將能更準確的轟炸目標，癱瘓其軍事機能，無慮北越飛彈與米格機攻擊。」爲什麼不這樣幹呢？麥康奈爾將軍與其他軍事首長們又曾告訴參議院預備小組委員會說：「文職人員否決了他們提出的空中閃電突襲計劃。」太平洋軍區美軍總司令夏普上將並在同一年間不但公開反對停炸，且力主加強轟炸。政府不敢採取主動的全盤戰略，並阻止前線總司令與後方參謀長採取部分主動的空炸戰術，致在兩年前即可摧毀北越的機會，一再失去，殊堪痛惜。

近十年來，美國具有優先控制太空的潛力，又總因優越感更大於優先力，認爲蘇俄決不能在太空中猛着先鞭，便又造成幾項的落後紀錄。雖會急起直追，亦係來於對方的刺激。蘇俄「斯潑尼克」一號衛星首先射入地球軌道，形成美國落後的第一次。蘇俄火箭首先射中月球，形成美國落後的第二次。蘇俄無人駕駛的兩艘太空船首先徐徐降落月球，形成美國落後的第三次。今年（一九六七）十月十八日蘇俄「金星四號」太空船首先降落金星上面，形成美國落後的第四次。今年十一月三日經麥納瑪拉宣佈蘇俄已在正式試驗「局部軌道轟炸系統」，又形成美國落後的第五次。其中尚有蘇俄準備試驗有人操縱的太空會合，如亦成功，則「太空漫步」又將搶先美國一步，就使美國落後的次數，至今共達六次。美國具有搶先的潛力，爲什麼反現出多次落後的事實？這不是見不到，早在七年前甘迺迪總統即已決定太空人往返月球的計劃，去年九月十七日開始，美國雷達又已偵知蘇俄曾十一次試驗「局部軌道轟炸系統」，其情報人員復從東歐共黨國家獲得證實，可說十年來蘇俄征服太空的活動，都未逃過美國的電眼。這也不是辦不到，從「斯潑尼克」搶先射出起，美國對於太空軌道的攻擊和防禦系

統，便在研究發展之中。如在今年十月三十日蘇俄雖大肆渲染不載人的兩艘太空船已在地球軌道中會合，其實是尚未完全成功，而美國則已完成數年。尤其今年十一月九日「農神五號」火箭的發射成功，與「測量員六號」太空船搜集月球寶貴資料的豐富，都非蘇俄所能及。這農神五號火箭，真是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傢伙。它是一具高三六三呎，重六百十萬磅的奇大無比的火箭，其推力之大，三節總合起來達八百八十萬磅。這一枚火箭，可以把美國過去十年以來所有發射過的五百多顆人造衛星，一舉送上軌道。它的重量，比美國波音七二七巨無霸噴射客機廿四架還要重。它的推力，如以馬力計算，達一億六千萬匹。他的構造，零件二百萬，電線十五哩，大小引擎八十五具。它比美國除此之外的最大火箭，推力還大六倍，比蘇俄最大火箭至少大兩倍。它發射時產生空氣波的強度，除去核子爆炸以外，僅有兩次自然界的現象超過了它，一次是一八八三年印尼爪哇島火山爆發，另一次是一九〇八年西伯利亞大隕星。這一成功，使美國火箭衝力比蘇俄為差的舊時恥辱，為之洗盡。使一九六九年登陸月球的希望，為之增加。使一九六八年準備完成在太空飛行一月的地球軌道站，及一九七〇年準備建立在太空運行一年，具有偵察監視轟炸摧毀敵人衛星或飛彈多種能力的六人居住的軌道站，都獲得成功的佐證。現在能顯出這樣碩大無比的成就，過去為何讓蘇俄多次領先，必待人民叫喊，纔拔足追趕？很簡單，優越感在胸中作梗，生意經在腦中打算而已。由於此一梗，就梗的火箭與衛星的進行珊珊其遲。由於此一算，就算的蘇俄探測金星火星已有十八次的發射，美國則僅五次；並算的蘇俄探測八大行星的次數今後可能更多，而美國則僅計劃作四次的發射，包括一九六九年在火星近距離的兩次拍照，一九七五年可能在火星上作兩次無人登陸；更算的太空經費一再削減之故，太空總署的人員陸續解聘，專家們的工作情緒大受打擊。由此一梗一算，自然造成六次的落伍紀錄了。如果美國

不再正本清源，主動地運用現有陸海空動的雷霆萬鈞力量，一舉擊滅越共政權，而仍讓敵人繼續利用越戰，消耗美國，使美國在太空競賽及反飛彈武器兩方面不能傾其全力發展，則又將會造成龜兔競走之結果的。

有力主動而不動，一二兩次世界大戰的增加犧牲開其端，將近八年的越戰損耗繼於今，並被核子戰略問題拖成每下愈慘的戰況，無不歷歷在目。美國的核子戰略，雖然不斷跟隨情勢修改，但總因其動機是出於被動的嚇阻性，致使用亦不能自主，只要對方不先使用這個武器，美國就不會使用更比對方優越的這個武器。自己既在這方面取消了中共最怕的自主權，中共就得在他方面取得了於己最有利的自主權，那就是改用普通武器與傳統戰術及原始的游擊戰術，與美軍在越南纏戰，致原來認為核子武器可以嚇阻普通戰爭的美國，也就不能再被動地進行其正想避免的普通戰爭，更不能不從事於比普通戰爭還低級的游擊戰爭。既已被逼回到原始式的戰爭，如果前線統帥有權決定其進攻北越的策略，或採韓戰時仁川登陸的方式，以收扭轉戰局之效，或穿過非軍事區以北地區，使北越共軍再無從向南增援，或從寮境進攻北越的神經中樞河內，並繞過北方、截斷其與中共往來的補給線，同時以奇兵攻佔海防，扼斷其咽喉，整個消滅北越政權，無論其為戰術性的或戰略性的進攻，總讓其自行決定，都可迅速結束此戰。可是全國軍民託命的最高統帥，既把可以自主的一切權力讓給中共，却又似取償於前線統帥是的奪取其手中的權，連到空中轟炸的目標亦予以限制，等於清楚告訴敵人僅炸何處，不炸何地，再讓敵人獲得趨避禍福的自主權，這真是前所未聞的作戰方式。要是主動權被奪於共黨，而竟下意識地取償於南越，一切擅作主張，迫使南越照辦，形成喧賓主現象，則亦厥失惟均。是否直接進攻北越奧援的中共，自為白宮主人獨操的政略決定權，非前線總司令所應過



問，但亦不應讓敵人所左右。且依美國的實力與理由看，實均有自主其行動的可能，並有其必要，以色列戴陽將軍能以寡擊衆，戰勝阿聯於四天之內，魏摩蘭將軍則在七年多內尙未能用強兵利器戰勝越共，即分別在戴陽有權直攻敵人的要害之處而魏摩蘭則不能，尤其在以色列的最高統帥能從大處着眼而詹森總統則不敢如此。如果由此猛悟主動權的重要，不再顧慮中俄共與國內文人的干擾，毅然決然先就越戰下手，一舉摧毀越共的巢穴，則中俄共的來不及赴援，亦將與其不及馳援阿聯相同。如果再進一步，高舉聯合國譴責中共侵略的舊旗幟，伴以東南亞公約的新旗鼓，看準蘇俄日益焦慮中共核彈威脅的大形勢，毅然決然去炸毀中共的核子工廠，並支援中華民國部隊向中國海南島遼東半島等處登陸，分別開闢主攻或佯攻的幾處新戰場，如中共仍不屈服，即明白宣佈以核子武器相餉，則這一主動力量的發揮，顯比僵凍了的核子武力大得多。且就以阿戰役看，向爲亞非歐戰略要地的中東，蘇俄尙未敢立即乘機大幹，何況形勢遼遠的越南，何況力量更弱的中共，則以傳統式戰爭去征服中共，其不致引起世界大戰，亦可預斷。

就美國國內情勢看，美國人民並不反對美國參加越戰，但已顯然不願意被動而間歇的打法。越共襲來就打，一走就又回到原來防守的舊地，打了七年多，還是在原地打，防守的原地，老是那幾個據點，子弟則已傷亡了不少，財物則已斷送了很多，人民那裏忍耐得住！總應該趁人民不耐之時，明白告訴他們，美國亞洲政策的成敗，不完全決定於絕對優勢的各種武器，而是完全決定於絕對必要的主動出擊。果能主動，則亞洲及全世界人類前途的幸運，一定可由美國人造成。反之，則由不求勝，再退到不應戰，不動員再退到不打仗，不孤立再退到不圍堵，不承認中共再退到投降中共，一路隨着中共的赤色指揮棍退到底，直退到斷送盡人類的生命纔止，並非不可想像的事。

美國人是有優越感的，只是未免過度。是工於計較的，只是未免短視。是有豐富的想像力的，只是被幾個親共反戰份子吵得糊塗而麻木了！美國人是有創造精神的，只是傳染了這幾個人的「恐共病」，就使得政府只有到臨遷就中共了。只要一被喚醒，就都會奮迅前進。中越共凍於美國民氣的可畏，民心的齊一，也就只有乖乖地求饒，蘇俄也只有更乖，比拆回古巴飛彈的行動更乖。國外的魔氛既隨國內的民意轉變，於是原來消極的防守戰術，與積極的謀和政略，亦儘可自主自動的澈底改變，至少亦可不再在和戰方面，讓共黨佔盡了主動的便宜，美國吃盡了被動的苦頭，而人類的命運，亦可孕育在這一改變之中。

一六、細說美利堅民族勇於義戰的歷史：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義勇奮發，同仇敵愾，是美國人的傳統精神，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是美國人的歷史事實，過去如此，現在及今後亦如此。當前對越共的戰爭，即為這種傳統精神的繼續表現，只要全國人民都承認戰爭確已存在，勇於出征，則先聲已足奪人，殊無須顧慮中俄共的正面介入。一九五〇年美國毅然出兵遠攻侵略韓國的中韓共軍，終於挽救危局，一九五八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黎巴嫩，史達林未敢干預，便是不遠的例證。蘇俄現尚與美國修好，又正想打擊中共，中共則外強中乾，並正內亂，美在越南的國際環境，自比以前尤為良好，如能把握時機，而不過份顧慮國際形勢，那麼形勢將比現在更好。

並從往事看，由於美國人民勇於義戰精神的發揮，即使情感有些偏激，例如兩次世界大戰的參加，未免偏袒英法，但由於威爾遜羅斯福兩總統的順從民意，亦皆獲致勝利。理由較參加這兩次戰爭為差的，則有一七九八年以「中立權利受到損害」為詞的對法戰爭，與一八一二年的第一次對英戰爭，及其後第二次的對英戰爭，一八四六年的對墨西哥戰爭，一八九八年的對西班牙戰爭。幾乎引起戰爭的事

件，則有一八〇三年傑斐遜總統以國家安全爲理由，準備以戰爭解決法國佔據新奧爾良的問題。他在此八年以前，也曾以同一理由，不恤冒戰爭的危險，強硬表示不能坐視佛羅里達轉讓於任何一國。就是以不過問美洲以外事情爲原則的門羅總統，在他的著名宣言中，仍以不惜一戰的措詞，反對歐洲國家重新佔領西班牙在美洲原有的殖民地。一八九五年委內瑞拉與英屬圭亞那發生劃界糾紛時，美國也認爲此事將影響美國的安全。這八次的表示，基於美國民族傳統精神的發揮，都會制勝對方。

有時爲了維護正義更不恤傷害友邦的情誼，而與向不喜歡其人及向不同情其所爲的國家採取同一行動。如像一九五六年以色列英國法國侵入埃及之時，英法是美的盟國，埃及領袖納塞是向被美國憎惡的人，蘇俄是共產集團的頭目，可是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竟和蘇俄採取一致立場投票，插手阻止以色列英法的行動，這是最不顧慮國際情勢甚至不顧友誼的一個尖銳事例，但是着眼於大處，也就不再顧及小節了。

不過份顧慮輿論或參議院意見的事例亦很多。前者如一八四六年對墨西哥戰事發生之前，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宣戰之後，輿論就不一致，兩次世界大戰的參加，也有不少人表示異議，可是當時的政府都沒有理睬。更甚於此的，是一八一二年戰爭，連代表輿論的國會也不顧各黨派各地方的各種反對，竟站在政府一邊，同意宣戰。後者如一七七六年佛蘭克林總統與法國締結同盟條約，未經任何立法機關批准，一九四二年羅斯福總統簽署的華盛頓宣言，亦未提經參議院同意。更更甚的是，格蘭特政府因爲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森納反對其外交政策，曾使他在輿論責備之下，喪失了主席地位。

這些事例，並非由於當時政府的蔑視輿論或議會，而是由於人民向不注意國際情勢，政府亦未便將複雜微妙而又正在處理中的外交問題，貿然公開。國會自然已在政府方面取得若干國際情報，但總

因代表地區的參議員與代表各職業界各階層的衆議員，立場利害不盡相同之故，甚難融成共同的觀點。如凡事均求同意，不但無以迅速應付稍縱即逝的局勢，並會使局勢更加嚴重。例如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所提禁止武器與軍事物資出口由政府全權決定的法案，本非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體實施的，可是國會的決定並非如此，遂使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反得利用。此外由於國會意見紛歧，致造成敵方判斷錯誤的，亦早有例證，如希特勒沒有料到美國會參戰，終致兇焰高漲，歐戰擴大，史達林沒有看出美國會參戰，終致侵略無忌，韓戰擴大，便都是如在目前的事。

美國政府敢於自作決定，亦非完全自由行動，它除在憲法上早賦予許多權力，在事實上又有其需要以外，而在其民族意識上習慣上及力量的感覺上，更有其深厚的基礎。

其被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所驅使的，如對英對德的幾次戰爭，主要起於美國人感覺在海上受到侮辱，尊嚴榮譽受到損害，情不自禁地發出一種憤不可遏的怒氣，不惜訴諸戰爭。且這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精神，並非臨時造成，而是早奠定於獨立戰爭，發展於十九世紀以後的各次戰役。最顯著的是，德克薩斯與奧利岡問題，亦竟引起人民的注意，而在一八四四年的選舉中，竟叫出一「非北緯五十四度四，就只有戰爭一，如此響出雲霄的口號，終於使波克政府和國會引導人民對墨西哥作戰。而人民嘉許戰績的心情，又遽使一位戰爭的英雄，在一八四八年選舉中成爲總統；並使其後的國務卿韋伯斯特竟歡迎匈牙利的革命英雄訪美，而置奧政府的反對於不顧。一至十九世紀末期，這種精神更清楚地反映在麥金利政府的初期施政之中，掀起一八九八年的對西班牙之戰，當時舉國的興奮，爲前所未見。戰勝以後，民族自信心的雄健洋溢，更瀾漫全國，又使老羅斯總統昂首天外，決定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終於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參加。

其被法治習慣所導引的，例如一九五〇年的介入韓戰，當時美國人認為解決人與人間的糾紛，國內法既甚有效，則解決國與國間的糾紛，國際法自亦為最好工具，以前既曾因此成立國聯規約，凱洛克公約，現在又有聯合國憲章存在，則韓共即不應破壞憲章，美國即須為維護憲章而戰。

其被力量的感覺上所促成的，除軍備力量雄厚的感覺以外，同樣有力的則為經濟景氣的感覺。例如一八一二年對英戰爭的發生，是在取消禁運政策以後，商業好戰之時。一八四六年對墨戰爭的發生，是在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二年不景氣之後，經濟好轉之時。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戰爭的發生，是在一八九三年大不景氣之後，經濟轉佳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加，是在威爾遜總統秉政初期，經濟稍衰，因歐戰而又趨於繁榮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加，更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的不景氣，因厲行新政而進於顯著好轉之時。

現在正是美國民族的尊嚴榮譽最受到中共劇烈侮辱，國際秩序亦最受到中共暴力破壞之時，又正是美國工商經濟空前繁榮之時，並因越戰而呈現錦上添花的好景之時，詹森政府儘可利用民氣時機權力，及歷代總統擴大憲法規定權力的成例，應天順人，命將出師，與中共以決定性的打擊。即使有些人在反對，亦儘可動員輿論，予反對者以打擊，此亦有前事可師，步驟可循，成功可證。例如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大戰之初，固曾順應民意，標榜中立，但一到再度當選以後，即根據發展貿易與對協約國貸款的理由，逐步引導人民走上參戰之路。羅斯福總統在第二次大戰之初，固曾以保證採取和平政策，作為競選的資本，但一到繼續當選以後，便接連實行租借法案及海上護航等措施，把事態引導到戰爭無法避免的邊緣，再與德國攤牌。詹森總統應付國會的經驗，及了解民情的深刻，都不在威爾遜羅斯福之下，殊無顧慮極少數人阻撓的必要。何況怕中共正面衝突的說法，大都是神經過敏的推測，

何必太注意他們的偏見，弄到像麥金利總統一樣，徒被康農譏笑爲「俯伏於地，聽取人民的意見，以致耳朵裏塞滿了蟋蟀？」要是持此種說法的羅拔甘迺迪與傅爾布萊特等別有作用，同於傑斐遜總統之處理美法間損失賠償的付款問題，方針本甚正確，作法亦不冒險，可是自由黨領袖克萊和其黨徒偏說如果這樣幹，戰事可能來臨，故意危言聳聽，企圖在黨爭上有所利得，那就最好置之不理。如果麥金利總統的耳朵裏塞滿蟋蟀，而詹森總統的腦子裏飛滿鴿子，則其結果的兇險，殆將與一八〇三年的情勢相似。當時聯邦主義者原想譴責傑斐遜政府過於軟弱，沒有在路易斯安那採取有力行動，以對付西班牙政府取消採礦權的措施，其譴責本甚合理，其後却因黨見不同，反不接受完全歸併的條約，竟使美國蒙受不利。尤其是他們反對一八一二年戰爭，雖未成功，可是嚴重損害士氣，並使聯邦本身的組織頻於解體，則更爲可議。美國的介入越戰，遠在一九五四年時期即已開始，在過去的十多年裏，羅拔甘迺迪、傅爾布萊特等迄未反對政府的每年增加越戰兵力，本是合理的態度，與聯邦主義者初期的態度同樣合理，於今忽然表示異議，豈不是與聯邦主義者其後的行徑相同？因此，詹森總統如願意理睬他們，就得詰問他們，「是以以前的態度合理？還是現在的態度合理？」並且應鼓勵美國人民羣起責問。

總之，美國人愛好和平是事實，勇於爲國家爲正義作戰也是事實，愈經戰爭，愈能提高美利堅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則尤多歷史例證。據美國專家統計，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都是美國人戰志昂揚，戰績彪炳的年份。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三年，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至一八七〇年，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及一九四五年至今，都是民

族主義緊隨戰爭勝利而磅礴踴躍的年份。奉此民族精神以抗中共，即使不與肉搏，他亦氣沮。因爲今日的中共，不會強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那時移民於有爭端的地區，本皆有發生戰爭的可能，然因美國人表示不怕作戰，衰弱的西班牙固爲之失色，而強大的英國亦竟自動退讓。這許多斑斑可考的歷史事實，如果能使忙於物質享受，忘却歷史教訓的美國人都感到歷歷在目，並且躍躍欲試，則何懼乎沒志氣的姑息主義者？何畏乎有作用的反戰政客？更何憂乎對越對華對亞洲基本的整套的政策不能貫徹？

一七、新亞洲助產士的本領如何：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各人的責任觀念已隨現代的空間觀念全盤改變，最適合於美國人表現其責任感的區域則在亞洲，因爲，（一）空間的距離早被各種交通工具縮小，天涯若毗鄰，亞洲只是美國的西鄰。（二）老羅斯福總統早已指明二十世紀是太平洋的時代，二次大戰以後，世界的重心更已由大西洋東移至太平洋。許多歐洲糾紛，比爆發在亞洲的各種危機，顯然渺小的多。（三）根據一九六五年的統計，世界共有人口三十二億八千五百萬，（在一九六六年中期，已增加爲三十三億五千六百萬。）其中亞洲人口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三，計十八億二千五百萬，（尚不包括蘇俄的亞洲部份在內），歐洲四億四千四百萬，非洲三億一千萬，北美洲二億九千二百萬，南美洲一億六千五百萬，大洋洲一千七百五十萬。政治是處理衆人之事，大政治家及大國家的人民，即應首先處理衆人最多的亞洲事務。（四）亞洲人口固超過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太平洋沿岸亞美澳三洲二十二億以上的人口，又超過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中國七億多人口即已接近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超過亞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並注定世界重心在亞洲，亞洲的重心在中國。這重心如被共黨所操縱，可使太平洋變成「大禍洋」。如讓和平民主的中國人自由發展，而由中華民

國善導於內，美國力助於外，必可使太平洋的太平，造成全世界的太平。（五）亞洲大部份地區是資源豐富而尚未開發或剛在開發的地區，並為均具古文明的地區，不像已經開發的歐洲，亦不像情勢複雜，獨立未久的非洲，美國則顯然是最有開發亞洲實力的鄰國。（六）看亞洲問題比美國人看得更清楚的亞洲人，也是最願意和美國人做朋友的人。所以美國注定了是亞命運的創造者，注定美國光華燦爛的前途在亞洲。

既提明這六大前提，再詳述三方面的情勢：

第一、就美國本身的利害方面看：美國今日面臨的亞洲問題，已同於以前面臨的歐洲問題，美國目前所受太平洋西岸的威脅，更同於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大西洋對岸的威脅，對自身固有轉危為安的必要，在今日又值因利乘便的時機。例如美國與日本的經濟軍事早有聯繫，情誼亦篤。澳洲則久已傳說由「美國管理下的南太平洋羣島，是美國的第五十一州，又是自由世界戰略性的大基地。」紐西蘭、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度、及暫在台灣中的中華民國，又都是亞洲安全帶中的重要環節，美國固有罄送控縱的妙用，各國尤有唇齒輔車的關係。此外如親共的錫蘭政府已經失敗，反共的印尼軍人已經勝利，柬埔寨亦正準備脫離中共支配。這些國家，均將成為贊助美國開發亞洲的主人。儘可這樣說：自韓戰以來，所有亞洲國家的反共戰爭，表面雖是局部國家的戰爭，實際則是美國的戰爭。美國對於亞洲國家的援助，表面雖是美國援助亞洲國家，實際則是亞洲國家援助美國。

第二、就中共給予美國的禍患方面看：由於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佔據中國大陸起，就認定美國是阻止其勢力擴張的主要敵人，積極進行其埋葬美國的計劃，除非中共被徹底擊敗，它就決不願與美國和平共存。它埋葬美國的入手處，是囊括整個亞洲，消滅美國在亞洲的各種勢力。亞洲人的畏懼中共，



過於他們的畏懼蘇俄，就由於他們已經感覺到中共的第一刀就指在他們的身上，都有切膚之痛。而美國人的害怕中共，過於害怕蘇俄，也就由於中共的險狠無比。它在越南，已經謀殺美國萬千子弟，消耗美國大量國力，而以動搖亞洲人對美國的信心爲急務。如果美國竟被它嚇退，亞洲各國也都跟着被它嚇倒，則散佈在亞洲及全球三千萬本來反共的華僑，勢將轉附中共，幫助中共擾亂顛覆其居留地的政府，那時美國除困守本土外，就不再能涉足亞洲一步。又如果中共擴散核子武器於亞洲的若干國家，則受其惠者亦必聽其驅使，那時美國不但失去亞洲，並將失去反共盟主的地位，最後則失去了整個世界。

第三、就蘇俄在中共勢力擴張以後的作法看：美國既能放縱中共在亞洲橫行，蘇俄自亦將在歐洲大幹。反之，中共要是被遏阻於亞洲，蘇俄鑒於美國的強硬，也就只有繼續其與民主國家和平共存的政策，此皆爲必然的連鎖反應。因此，美國在亞洲擊敗中共，實在也是在歐洲嚇阻蘇俄。救歐洲必先救亞洲，救亞洲又必先救中國大陸，更是今日注定的客觀步驟。這種利害關係的決定，與核子武器的強弱多少及是否使用無關，因爲美蘇兩國都不敢用，中共在五年或七年內尚不能用，這一因素已經有等於無，故在今日應予剔除。

上述這許多關係與影響，詹森政府必須向美國人清楚說明，愈詳明愈有效，但必須在自己及亞洲人的心理上行動上先做一番具體工作。在菲京會議中，詹森總統已強調要催生協助與加速一個新亞洲的出現。又說明「在越戰解決後，要運用區域合作及美國大規模的援助，積極促成亞洲工業化現代化，進而實現一個國際和平，經濟富足，人民幸福的社會，」並大聲承認「美國是太平洋的國家！」這比二次大戰結束後，杜魯門總統的宣佈「美國爲大西洋國家」，更具眼力。在菲京會議結束，訪問亞洲

七國以後，看到「新亞洲巨大的活力」，對亞洲地位與反共大業更有正確深刻的瞭解，這是從杜勒斯國務卿以來，估計亞洲國家過低，而於中共則太高估的一大轉變，一大進步。

但是知而不行，同於未知，行而不力，等於未行。在現階段，詹森能否真在越南澈底採用以前中國武力勦共的有效方略，不再拘泥歐美議會式政黨式的粉飾門面方式，尤其不再蹈中國政府被迫和談的失敗軌轍？則已有不少事實與行動使人懷疑。杜魯門能用實力安定希臘，使蘇俄不能由此踏入地中海，使歐洲由此安定富庶，今日越南的地位與情勢，正與以前的希臘相似，詹森是否真在發揮實力平定越亂，使中共不能由此跨入東南亞？却又令人懷疑其行動遠比認識為差。

本為世界古文明，今為世界新邊疆，又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三，並寶藏許多現代工業國防所需要的貴重物資的亞洲，而美國又獨富於開發此地區的資本技術，亞洲人亦不乏優越的合作的開發能力，台灣與日本在經建上卓異的成就，固為世所推崇，即韓菲泰等國急起直追的精神，亦有目共覩。要是詹森政府竟不能據此雄厚的憑藉，實現其銳利的認識，則其給亞洲人民心理上影響的惡劣，比不說「決不使越南一千五百萬人民失望」更甚，這是急須先在自己心理上行動上調整配合的根本工作。而最有效力的調整配合，則為用出一切武力，迅速擊敗越共以及中共，作一個「好的開始」。

一八、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本質：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民都了解：今世一件最無賴最無恥的事，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的這件事。凡够得上稱為思想的，它至少是對事物約略經過分析綜合推理判斷等工夫，結晶成為比較有體系有價值並樂於修正演進的一種意識的名詞。這工夫的是否到家，則與先天的性格，後天的學力，生活的環境，均有因果關係。而毛澤東在這三方面則都甚低劣。

毛的性格，最好用勞勃森的話作證：「他剛愎自用，熱中權力，藉權力以達成他畢生努力爭取的

目標，誰也無法使他放棄其目標及手段。他的手段包括說謊、欺騙、謀殺、和破壞協定。他如認定目標，那麼任何手段他總認為是對的。」勞勃森是美國的外交家，他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及世界二次大戰以後，由於職務關係，曾長期與毛澤東交涉，對毛有親身體認的經驗，他的觀察，自較深刻正確。其次則為曾與毛周旋多次的中國青年黨元老李璜左舜生的觀斷，李說「他疑心重，成見深，方法多，手段辣。」「善於翻雲覆雨，趨吉避凶。以大力攻之，他能遁走，以道理服之，他終不馴。一旦有了機會，得了權力，便翻臉不認人，連同志也把他整到底。」左說他「知識有限，主觀太強，讀書太少，却又太雜，……只從水滸傳、三國演義學得許多鬼主意。」「他並不缺少若干方面的小聰明，運用這種小聰明的方式作政治鬥爭，有時也發生奇效。但以小聰明應付大問題，或提出什麼大主張，當然要毛病百出。」「他最缺乏國際常識，也完全不懂什麼馬列。」「他在過去和最近，作出無數害死人不償命的浪漫主張，都是從中國舊文人的惡習出發。」他如此劣根性，怎會有好想法？

，毛的生長地與學力，更不足道。他是腳尖沒有觸到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半寸土地，腦中沒有民主自由一絲影子，半輩子生活在僻地窮鄉荒山和窖洞裏的人。年青時期好與家鄉痞子往來，痞子是國詐好鬥的無賴之徒，距今四十年前，他就在家鄉搞什麼農民運動，被人民罵為痞子。年壯時，嘯聚地痞流氓，打家劫舍，竄擾湘贛鄂邊區，並在窮惡地方的井崗山上稱王，被民衆痛罵為「痞子軍造反」。其後敗竄到明末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發足處的米脂延安一帶地點，自更「人地相宜」，效尤愈便，雖藏身窖洞，却有如入李張門牆之感，所以他在其後直呼紅衛兵為「關將」。他本只有舊制中學生的知識程度，未受過現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教育，更不懂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是什麼，只覺新奇玄奧可以騙惑他人，彷彿水滸傳中宋江用以騙人的一玄女天書；所以他最口誦心慕的，是水滸傳中梁山盜的

伎倆，與三國演義中奸雄篡位的故事。又只覺得馬克斯既認定社會的演變全是依循物質的規律在機械的衍化，而不重視人類都有改變環境的能力，自可由此發展為視人亦如物，一切由我改造利用，同於工廠的產製貨物。他對陰險狠辣的史達林尤為嚮往，亦不反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暴烈冒險行為，而於法國革命中悍魁暴民造成的混亂恐怖各幕，亦神馳心喜；所以要用紅衛兵去澈底粉碎自己組織的政權機構，另用巴黎公社的方式，建立新的統治體制。那時巴黎公社的做法，是沒收社會財產，把工廠都移交工人，並棄置常備兵，改為國民武裝，他便把紅衛兵視如那時的工人與武備。那時巴黎公社會貼出「殺死強盜」標語，他便編貼大字報，整肅一切「反革命者」。那時巴黎公社最怕市民罵它是強盜組織，曾倒咬他人為強盜，他使用各種方式攻擊與已立異者為反革命份子為帝國主義走狗。又正因為他的境遇學力如此的劣壞駁雜，自然只能產生許多邪惡的心事，對於紅衛兵像痞子般的剪女人褲，像土匪般的劫民間錢，像流氓般的毀孔子廟，像綁匪般的綁架其偽政府主度劉少奇的老婆，如是等等野蠻行為，毛總是稱他們「幹得好。」

他只有狂想、幻想，根本說不上思想。造成他這種腦筋的人物，在中國是流寇張角、黃巢、宋江、韓山童、李自成、張獻忠、張總愚、賴汝光、白狼之類，是奸臣王莽、曹操、司馬懿、劉豫、張邦昌、秦檜、張宏範、吳三桂、洪承疇之類，是暴君秦始皇、隋煬帝之類；在外國則為羅伯士比爾、丹頓、馬拉、特別是史達林等人。造成他這種腦筋的教材，在中國主要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封神榜、隋唐演義，在外國則為法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及史達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大綱」。這些中國舊小說中許多奸刁姦辣的事，大半是文人誣淫誣盜、推波助瀾的筆墨，本無思想可言。就是「革命大綱」亦為雜湊的作品，是布哈林幫助史達林在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時期

寫成的東西。史達林根本不懂馬克斯主義，毛澤東越發不懂，他東抄西襲寫出的「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雖較像樣，實際全是經不起考驗的謬說，並已被十多年來的事實所推翻。其後印發的「老三篇」「毛語錄」，亦被他的老伙伴打爛鬥臭，他雖尚在施展地痞流氓撒野猛打的手段，捏造江湖神棍的符咒奇蹟，去騙脅人民接受，亦已如墮入糞坑的土偶，不但失靈，並且使人掩鼻。即使他的老伙伴不給他難堪，但這種泥塑木雕的土偶，實亦不打自倒。又即使他真懂馬克斯主義，至今亦不能自存，因為馬克斯主義的本身，根本是成立於初期工業社會局部病態現象，與其半生貧窮病態心理，兩種病源交流的基礎之上，本不是卓立不倒的一種健全清醒的思想體系，其後又迭經殘詐成性的俄國人搬弄，先弄成列寧主義，再弄成史達林主義，又再弄成赫魯雪夫和平共存的策略路線，弄到毛澤東手裏，愈加一無是處，百病併發，真個是每下愈沉，現出十足的流氓主義了。

中國本來是不需要共產黨來革命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是可以把民族獨立、民權普及、民生樂利三大革命事業同時進行互相促成的。而在推倒滿清專制、掃盡軍閥禍國、取消不平等條約、戰勝日本侵略這四件大事上，已完成了民族革命任務，在實行民主憲政這件大事上，已奠定了民主自由基礎，在實行平均地權、發展現代企業這兩件大事上，已在台灣建立起全國民生革命的規範，實已不需要中共回頭再依「馬克斯的社會發展規律」，先完成民主主義對封建主義的革命，再進於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也就不需要再組織共產黨。可是中共却偏要凌遲這個革命任務的整體，仍把陳獨秀傳自列寧、列寧傳自馬克斯這套早已失敗了的程序，硬套在中國社會上來亂幹，無非想遂行其繼續革命，永遠專政的野心，並且達成其個人及其後人永遠專政的企圖而已，毛澤東如此想，他的同夥人亦都一樣。毛澤東先後用地痞流氓手段推倒陳獨秀、李立三，再用整頓三風運動推倒陳紹禹，今又

用文化大革命擊倒彭德懷、羅瑞卿，並正在猛攻劉少奇、鄧小平。以前與之對立的各人尚有幾分書生氣，不屑與拚，今日的劉鄧就不同了，便借用毛的這一套與毛火併。拚得雖很劇烈，却都沒有理論根據，依然像過去的胡扯。過去是造出「機會主義」的理由打倒陳獨秀，再用「蘇維埃」的兇器打倒同樣走「蘇維埃」道路的李立三，又再用毫無理論氣味的什麼整風運動打倒陳紹禹，現在是彼此赤裸裸地爲了爭奪權力打成幾團。過去是口喊「無產階級專政」，身却騎在工農羣衆頭上，成爲自己對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彼此利用工農羣衆的不平情緒攻擊對方。最是窘態畢露的，過去曾反對陳獨秀民主主義的階級革命，及逃到陝北以後反大叫民主，仍走陳獨秀的民主道路。即其所謂「新民主主義」，亦仍無什麼「新」的意味，僅是便利他們騎在人民頭上的一頂新帽子。其理論的支離貧乏，思想的混亂淺薄，行爲的險狠醜陋，比篡漢的王莽更甚。過去現在既都如此，將來自亦必然如此。將來被攻擊的第一對象很可能就是周恩來，其罪名一定又是「機會主義」，或是時髦的說法叫做「修正主義」。胡扯「周官」制度以粉飾其篡漢醜行的王莽，其時間尙只有十四年，中共篡國的時間又何能太久，何況他們尙比不上王莽，而只是流寇。

可是毛的造反性格與領袖慾望，大於他的知識萬倍，而他的審洞心理，又距離洞外的客觀環境甚遠，在這樣太不對稱的情形之下，他偏「不信邪」，偏要「無中生有」，愈碰壁，愈盲進，終於在他病發狂亂的變態心理中，形成了一種怪誕的「神學」，迷信貧窮就是善，機械的力量是紙老虎，搗亂破壞就是代表正義的革命，東風一定壓倒西風。摩門教相信世界是由光明與黑暗或善與惡兩種對立的力量所支配着的，他則迷信惡纔是善，黑暗纔是光明，纔都是無產階級的善與光明，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思想之下矛盾統一，而自覺其力量之大可以「與天公共比高。」他既集合中外古今地痞土匪流寇奸

臣暴君暴民及牛鬼蛇神的邪術暴行於一身，又怎能不狂想盲動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界，他既集合隋煬帝的自卑感自大狂虐待狂、秦始皇的忌刻殘忍、王莽的愚蠢虛僞於一身，又怎能不幹出各種不合理性全無人性的暴行怪事，無怪早已反對毛會的中共前主席張國燾下斷語說，「中共思想墮落至此，其政權怎能維持長久？毛澤東作了封神榜上的元始天尊，江青是黎山聖母，周恩來林彪是大師兄二師兄而已。」

他本此一套怪思想撰出一套怪幹法的怪總則是：襲用中國歷代流寇戰術，套上蘇俄「無產階級革命」名義為基本方式。以「逼上梁山」的「絕招」，利用游民製造暴動，再以暴動製造游民，使現狀都破壞，人民都破產，都成為可供驅使的無業游民，作為初步手段。再以「毛澤東思想」強迫灌入黨內外人腦中，使各人的大腦停止作用，大家鑽在他這種思想的硬殼裏，動彈不得，如或不服，就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辦法，把知識份子一概消滅，把文化根源澈底摧毀，作為主要手段。以回復原始人類「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酋長政治於內，鞭笞全體人類於外，相率共載他為至高無上，惟一無二的全球大皇帝，為其終極目的，這是多麼可驚的殘忍，可笑的狂妄！更是中國先哲所傳「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多麼正確的預言！毛酋今日正在燒起「文化大革命」的野火，要摧毀這類歷代先哲燭照順逆邪正妖祥的經傳，自無足異，亦無須為摧毀不了的中國文化傳統發愁，更不必為神聖莊嚴的思想一詞呼冤，只有對着恭維「毛澤東思想」的今世豎儒發怔。要是今世都是這類豎儒，或都是跟他跑的瘋子，他也許因為可以隨心所欲之故，不致更加乖張。無如現實和他的狂想完全相反，就只有加重他的精神病況，變成李爾王（King Lear）了。沙士比亞曾在同一戲劇中描寫一個因恐懼多疑幻想而失去理性的精神病國王之瘋狂行徑，而毛澤東就正是這種人。今世豎儒是否在準備向李爾王稱臣？

切實說，什麼是「毛澤東思想」，連毛自己也說不明白，當時給他戴上這頂「思想高帽子」的人亦不能自圓其說。開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辭的，是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進一步把這名辭列入其黨章中的是劉少奇。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在其幹部會議席上，要幹部研究「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他的秘書陳伯達即逢迎意旨，撰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辭。一九四二年二月毛發動整風運動、進行思想鬥爭時，更隱然自指他的思想至高無上，必須萬流景仰。一九四五年毛召開第七次大會時，劉少奇索性把它列入黨章，並稱它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是中國的東西，又完全是馬克斯主義的東西。」像這樣割裂附會，捧臀抱屁而捏成的「毛澤東思想」，顯然不通之至，既說是「中國的東西」，怎麼又說它「完全是馬克斯主義的東西？」既完全是馬的，則中國的在那裏？而且馬克斯主義的本質是國際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對立物，中國化後的馬克斯主義之內容是什麼？劉自然無法說出，亦不便老實說出是「流寇化的馬列主義」。如此自相矛盾而決不能統一的怪論，中共高階層人員和各級稍有知識的幹部亦都腹非而却不敢目笑。其後毛的另一政治秘書胡喬木爲了解決這些困擾，就硬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上，解釋其內容爲「以農村包圍城市，進而奪取城市，」這雖然仍是胡扯，却已在無意中露出了流寇行徑的馬脚。如此胡扯粉飾到最後，索性由陳伯達胡喬木等共同把毛吹到天上去，宣傳毛在共產主義哲學方面的見解超過前人：如毛曾批判恩格斯「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律」的錯誤，因爲既以一對立統一「爲核心，已是肯定了否定，怎能互相平行？又曾譏刺列寧既注重「對立統一，」却對恩格斯的錯誤並無批評。同時認爲史達林將唯物辯證法定爲「聯繫」「變化」「質量」「矛盾」四原則亦不成章法，遠不如毛「一分爲二」的創見，可將對立統一予以普遍化，所以獨有毛澤東思想纔是對恩馬列史



主義的「偉大發展和超越」。又宣傳毛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見解，亦是前無古人：如他所說的「兩個中間地帶」「帝國主義是紙老虎」，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十項矛盾的理論，及人民公社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佳路線，都非恩馬列史所能及。並宣傳毛在社會主義方面的見解，亦是後來居上：如他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總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一國決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這都是他對恩馬列史主義最大的發展。他們所以作此宣傳的目標，無非企圖在這套自撰的理論體系之上，除沖淡其流氓臭味以外，造成其足以奪取蘇俄領導共產國際的權力，一如其將過去世紀劃分為三個時期，指資本主義初期尚未形成帝國主義的時代為「馬克斯主義的時期」，「帝國主義走向沒落的時代為「列寧主義時期」，而在目前「帝國主義全面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全面走向勝利」的時代則為「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時期」而已。在他們尤其是在毛曾心目之中，真是恩馬列史也都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至於毛澤東和列寧一樣的本無什麼主義，祇有權謀策略，他們自然無須研究，只是把毛澤東當毛猴子耍，給他「沐猴而冠」，給他戴上這頂斑駁陸離、非馬非毛的高帽子，如老萊子的嬉彩娛親，企圖在「龍心大悅」之下，多得些封賞而已。最畢肖這件事的，還是莎士比亞在其一個劇本中，描寫衆獵戶和貴族共同戲弄一個喝醉了酒的補鍋匠斯賴，把他打扮鋪排成爲一個生活起居非常豪華的貴族，弄得他驚喜發瘋，居然相信自己原來是一個貴族，當年被劉陳胡等一羣共幹假意恭維的毛曾就活像醉漢斯賴。至於其後在這頂帽子裏倒出了「毛澤東語錄」來，引起不少趣事，如大陸學生在聽講「毛語錄」時，學會了睜着眼睛睡覺，緬甸邊界附近的喀欵人撕去「毛語錄」小冊子內頁，留其塑膠封面充作烟袋；像這些由恨毛而起的反應，雖早經日本記者訪明，仰光美聯社報導，蘇俄民間亦在傳述，但他們又何從料到？在他們之中或

已愧悔交迫的，也許是劉少奇吧，當年他撰出「毛澤東思想」，又把它列入黨章，現在毛就把其思想作為「請君入甕」的大甕，豈非悔不當初，亦確是「天道好還」。此外，「毛澤東思想」已成為毛酋瘋狂自殺的毒刃，也成為西方若干書癡喪失理智的迷藥，則亦由於劉的咎由自取，都不足哀，而最可哀的則為大陸人民。此在最殘忍的俄共亦已不忍前瞻，曾由其漢文電台廣播說：「毛澤東思想是五個不祥的漢字，從來沒有一次鼠疫，像毛澤東思想這樣奪取了中國人的生命，毒害人民的程度，比鼠疫還要厲害，」——它是一切最黑暗反動東西的化身。」

詹森政府必須用照妖鏡似的眼光，和耶穌似的野呼，使美國人民認識毛酋的原形，使美國姑息份子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纔能不再畏共媚共而都願剿滅中共。

一九、認清中共是流寇結合，並非政黨組織：詹森政府應接續使人民了解：陳獨秀、李大釗等創立的中國共產黨，被毛澤東搶奪到手以後，就完全變質，變得共產其名，流寇其實。其所以尚能倖存，主要在它以前靠外力成長，其後靠外力庇護。其所以必致被圍於外，火併於內，終必覆滅，則為流寇演變的定律。

毛澤東與其夥伴縱搶得一些權力時，就裹脅無業游民與無知農工在湖南的湘潭一帶，實行流寇式的「秋收暴動」，一被撲滅，即竄擾湘鄂贛皖邊區，成立井崗山寨；再被圍剿，又竄至陝北，建立延安巢穴。其後依靠各種外力竊據大陸，即益肆其匪性暴行，用「三反」「五反」手段，劫盡民間財產。不久又大躍進幾步，盡將農民騙進公社，視同嘍囉。要將知識份子趕盡殺絕，防他們反對。現更喪心病狂，進行「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想把文化變成匪化，夥伴盡成奴僕，便利它向國際社會騷擾劫掠。它在這四十年來的行動中，已充份現出流寇的三大特性，一、劫掠，二、竄擾，三、

火拼。劫掠竄擾，固是流寇本質，火拼則更是晁蓋與林沖火拼王倫、奪做梁山泊寨主的行爲。事實亦確是這樣，他們在逃上瑞金井崗山，投靠寨主王佐袁文才不久，就殺害王、袁，自充頭目。及逃往陝北投靠劉子丹高崗不久，又挑起劉、高爭權，自爲延安寨主。及延安巢穴又被政府軍攻破，便再由寨主變爲流寇，又由流寇成爲寨主，竟成爲攻陷北京、自稱「關王」、僭號「大順」的明季大流寇李闖。現在正以紅衛兵爲「關將」，彼此鼓勵他們火拼對方。

中共寇幫和中國歷史上所有流寇不同之處，却有兩點，而此兩點則爲過其去所以能成長，現在所以能尙存的主要因素。一點是，他們有馬克斯主義、列寧策略、史達林伎倆、三種現代新法術可供利用。其共產主義的名號既最投合貧民、青年、及好奇學者的心理，比漢末黃巾賊張角騙人的「五斗米道」，宋代梁山泊大盜宋江假造的「九天玄女天書」更有煽動力；其組織黨徒的方法，束縛黨徒的紀律，亦都比張角、宋江、李闖等所用的爲有效，所以它的成長發展遠大於舊式流寇。又一點是，它出生時既靠蘇俄羽翼，危難時既靠蘇俄支助，又靠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分散政府軍隊給它的圍剿，長大後更靠蘇俄把中國東北華北戰略要地，與日本遺留的巨量槍械偽軍，供其全面叛亂，最後並靠美國迫使政府與它和談，致它得以大膽叛亂，攫取大陸，它如此美好的外遇，實爲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所未有。

自陳獨秀被逼走以後，作爲中共頭目的毛澤東劉少奇那批人，未嘗不儘量採取蘇俄赤色的脂粉，裝點自己流寇的嘴臉，但總由於他們根本不懂馬列史那一套，就弄得顛倒衣裳，愈增醜惡。例如馬克斯制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程序，是從改善生產，調整分配入手，先穩定基層的生活程序，再改變人類上層的思想形態；他們乃反其道而行之，壓榨基層的經濟，作爲鞏固上層的資本。馬克斯認定鬥爭的成功，有賴於勞動羣衆在生產機構內的經濟鬥爭，結合知識份子街頭上的政治鬥爭，纔能發爲革命，

奪取政權；他們乃反其道而行之，只許勞動羣衆聽其壓榨，不聽命就給他們「三反」「五反」。只許知識份子爲其奴隸，不願爲就對他們一整再整至於五次整肅。列寧爲了攫取政權，雖會動用海軍，解散了民選的國民會議，成立絕對獨裁的蘇維埃聯邦政府，但並未把軍隊看成唯一的力量；史達林爲維持個人獨裁，雖不斷殺囚異己，却祇假手於特務，並未使用武力，尤其在最高權力的政治局中，到他死時還只有一個伏羅希洛夫元帥充任委員；他們乃反其道而行之，把軍隊視成鞏固政權的最大力量，而在其政治局的二十一名委員中，早已用了四個軍人，今除在「中央」早已高升林彪爲「國防部長」外，爲了奪權，也爲了壓倒劉少奇埋在各階層的軍力，又在地方「文革委員會」中完全任用軍人，並許軍人有優先接任各省區首長職務的特權，截至一九六七年十月止，新用的一百三十四名「官員」中已有一百十名是軍人。

像這許多反常行動，奪權派固明目張膽的幹，反奪權派亦推波助瀾，趁火打劫，足見匪行相同，很少分別。所以構成這些與馬克斯主義顯然不同的作法，則顯然由於他們比列寧史達林更不懂馬克斯主義，只懂革命就是暴行，就是亂幹，越暴越亂就越好，就愈可混水摸魚。馬克斯早在一八七一年致庫格曼函中，及翌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羣衆大會上演說中，一再認定英美荷法德等國可以和平革命，不必使用暴力。給馬克斯資本論作序言的恩格斯，並認爲必須利用原有「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實行和平革命。可是，他們全然不知，至少也是不理睬。馬克斯在其「資本論」中，曾承認資本集中的「股份公司」「得以愈益轉化爲實行社會結合。」恩格斯更在「愛爾弗特綱領草案批判」中，承認股份公司與托辣斯不僅已非「私的生產」，而是「許多人的協同利益的生產」，都會否定了資本論的結論；但如此，且根本否定了作爲資本論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承認「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

東西」，「不能說經濟狀況就是唯一能動的原因，其他一切都是被動的作用。」可是他們全然不知，至少也是不理睬。馬克斯與其同道的恩格斯固是如此，列寧也不例外，他在十月革命以後，即已認識小農國家的俄國工人，並不具備西歐無產階級的條件，亦無管理工廠能力，無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事實只是布爾什維克的專政。並且承認布爾什維克也「缺少文化」，「不會做管理工作」，「不是他們在領導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而是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在領導他們。」又承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一名稱，決不是表明承認現在的經濟制度已是社會主義制度。」更坦白承認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實祇是一個「軍事陰謀」。列寧十月革命和馬克斯資本論相反，與俄國並未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的這類事實，他們也熱視無覩。史達林雖會說他已經取消了列寧所行資本主義化的新經濟政策，但成為資本主義實質的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制度，則迄今依然存在，可是他們也相應不理。而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可以無所不為的權力，只在戴起馬列史的面具，爲了權力而互相廝殺，再無暇計及同歸於盡的結局，這不是流寇的性行是什麼？

正惟其爲無可改變的流寇，所以寇酋毛澤東對付異己的伎倆，亦比清季女主那拉氏的方式更差。那拉氏利用義和團排除國內外政敵的手段，雖甚幼稚野蠻，但仍比紅衛兵文明之處有十：一則義和團是早已潛伏在社會中的，而不是她自己組織的，紅衛兵則由毛酋誘脅而成。二則義和團是祕密結社，本不敢公然亂幹，紅衛兵則爲奉命造反，公開串連。三則義和團行動由下而上，由面而點，最後只猖獗於帝都，紅衛兵則由上而下，由點而面，直降禍及整個大陸，甚至他國亦被波及。四則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出於愚民自發的誠意，並帶有民族的情緒，紅衛兵的扶毛滅劉，扶馬列史主義而滅中國的文化，顯然是許多孩子被動的胡鬧，絕無民族思想的意味。五則義和團只反洋人洋教，不反中國傳統，

不反孔子，更不自反其主人那拉氏及與其並肩作戰的軍隊，紅衛兵則反四舊、反家庭、反宗教、反知識、反共幹、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反尾巴黨派，甚至反他的主人翁毛澤東及林彪。六則義和團是尚有倫理觀念習慣的成年人，祇是一羣頑固份子，紅衛兵則為生長於滅絕人性的暴政之下，早無家庭溫暖及良善教育的大小頑童。七則義和團猶有身家的顧慮，尚易回頭，紅衛兵則早無家庭觀念，更無家庭留戀，樂得隨地吃喝玩樂叫喊。八則義和團尚能服從西后一人的命令，意志集中，紅衛兵則可以聽共黨各派系的唆使，亦可以違反各派系的指示，離合不定，目標散亂。九則義和團份子生長在孔教社會，習於忠厚，紅衛兵則生長在仇恨一切的共黨風習教育之下，既給他們行兇的機會，就更會無人不仇，無物不恨。十則義和團與西后只迷信咒語大刀可以消滅國內的洋人，紅衛兵則迷信「毛澤東思想」及其粗劣的核武器可以毀滅各國人民的大部份，讓留下的一半中國人獨霸全球。最奇怪的是，毛如此亂幹，劉派亦如此亂幹，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輕而易舉，但其結果必然是同歸於盡，雙方均失其權，並亡其身，此理此勢，難道他們完全不知，知之而猶為之，就只有一個解釋，流氓脾氣而已，彼此以為仍可像以前流竄幾年再看而已，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是也。

流氓所以不能成事，倒不是他們的既寇且流，而是由於它們沒有不做流氓的知識，最後就只有覆沒在既無知識又只懂劫奪兩種情形惡性循環所造成的濁浪之中。無知識的人，就只敢用無知識的地痞流氓頑童走卒幫他殺人攻城，能攻不能守，嗜殺不知止，又如何能成事？中共寇幫在井崗山時期的編練紅軍，四出騷擾，在逃竄時期的利用「紅小鬼」，一路協助，攪得大陸後的不斷戮辱知識份子，與今日的彼此利用紅衛兵作打手，一切鼠竊狗盜鴟張鹿銜獸機門等等禽獸蛇行動，無一不與歷代流氓的行徑相同。且流氓窠裏無一不發生權力鬥爭的，亦未有不在內鬨之中垮台的，漢末明季滿清末葉

的流寇下場，都如出一轍，毫無例外。而中共寇幫成爲例外的，則在其已經瘋癲癲狂，已與一般流寇不同，一般流寇祇限於窠裏翻，他們却反遍了天下，其初用黨內人整肅黨外人，其繼就用黨內人整肅黨內人，今則用黨外孩子整肅黨內「大員」，並用軍隊整肅黨內幹部黨外孩子，再用小部份軍隊和黨幹去整肅大部份軍隊和黨幹，甚至用社會流氓地痞頑童和黨內暴徒近向港澳搗亂、遠向國際社會示威，這真使早已埋骨荒郊的歷代流寇要啾啾鬼叫着自愧不如。像這樣罪行滔天的中共寇幫如果可以成功，那麼張角、黃巢、宋江、韓山童、李自成、張獻忠、張總愚、白狼這些流寇就不會陸續被殲。如果靠烏合的頑童流氓悍軍嬖妾可以保江山，則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士比爾、丹頓、馬拉嘯聚的暴民，就早已不會使其首領上斷頭台，而明末李自成的孩兒軍與張獻忠的義子們亦早已畫像凌煙閣了。即使他們之中有人感覺危險，顧慮彼此懸崖勒馬，亦因在他們基本性格上與其瘋狂的心理上，感覺並無一人足以信賴，決不會真個低頭。何況客觀的形勢，已如獸走城，如山下崩，誰都不易着力，即使無外力擊入，而在內的民衆亦將羣起亡秦。又即使妄想借用幾次試爆的威力給民衆以嚇阻，而其相反的作用，亦正如秦之亡於建築萬里長城，隋之亡於開鑿千里運河。

又即使就現階段看，劉派可能尙非毛敵，毛尙未盡喪其偶像作用，尙有較多的軍隊與黨徒可供驅策，尙掌握特務勢力，情報系統，宣傳工具，又尙有熟習的詭計策略可施，特別是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尙未脫離封建落後形態，武力與偶像二者對其黨徒亦具威服作用。劉在各方的基層潛力雖然較大，知識份子對他的印像雖然較佳，但身被輾轉，已失去其指揮與統戰的自由。雖已策動紅衛兵互打，軍民進攻，但終因紅衛兵中有許多同派人的子弟在內，總難放手擊殺，故不易制勝。即使有外力加入，可使局勢改變，但無益於人民世局與寇幫前途則相同，劉勝則外無以阻蘇俄的得勢，內無以制悍軍的

叛變，毛勝則外無以止蘇俄的威脅，內無以消軍人的割據。雙方對於蘇俄的爲患，或不如軍隊爲患的如坐鍼氈，刻刻不安，但要他們放棄既得的黨權政權經濟權，真如與虎謀皮，唐代藩鎮之禍，民初軍閥之亂，勢必重現，而蘇俄之患，亦必卽在此時大得其便。此時民衆因受內憂外患的痛苦，無可再忍，都將如民國十七年前歡迎國民革命軍內除軍閥外抗敵寇的情勢自無二致。且無論何派得勝，其暴力統治的程度，均將與其爭權過程中所遇艱苦的深廣度成正比，毛勝固將益信其思想力量比原子能還大，更加狂進，劉勝則除不放棄其教條主義以外，亦仍須恃暴力鎮壓各方，立威固位，決不可能爲赫魯雪夫。假使毛劉均倒，異軍突起，又因其面臨的難題比赫魯雪夫更多，因爲史達林並未自毀其各級統治機構，只是用黨團與特工之力以整肅異己，毛却不然，則繼起者除用血腥鎮壓外，更無其他力量可以收拾分崩離拆的殘局。倘使其人爲善於敷衍遷就，如周恩來之類，則在綱紀既毀之下，只有更利各方爭權稱雄。歷史正在加倍重演，毛派演的既比清末西后那拉氏玩弄義和團更差，劉所遇的又比光緒載湉被囚瀛台還慘，周所爲的亦如從各種惡勢力夾縫中擠出的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到處叩頭，則那拉氏與載湉相繼敗亡及徐世昌權位仍歸辛亥革命成功時黎元洪副總統取回，最後卒被國民革命軍重光漢室，自爲一貫的結局。而主導歷史歸宿的力量，毫無疑問，自爲人類抗拒暴力，爭取自由生存一股本能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一經發動，勢必匯成洪流，不到淹沒全國狂暴力，沖刷外來侵略力，就決不會停止。且此種巨力愈遭壓抑卽愈高漲，正如物理上的反動力之於壓力。

不幸今世正有人尙想用安撫方式誘導中共寇幫改變暴行。殊不知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有時自可以接受招安，棄邪歸正，但如奢望過大，輕率將事，尙不免養虎貽患，何況俄共化而又瘋狂化的中共寇幫則雖瘋暴到其生命終了時，亦不會棄戈投誠。卽或重彈舊調，亦只是偽裝歸附。其以往的事實是，中



國政府雖包容感化它二十餘年，它還是叛變而去，他國人有何神通，反能使正在中瘋狂走的這羣寇幫革面洗心？其同類的事實是，姑不談蘇俄，而祇就中國明季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終不因安撫而不再叛亂的教訓看，即已够警惕。李匪曾在延綏與鄜陽兩處巡撫分道合擊之下，在漢中車廂峽自縛出降，張匪亦向商雒逃竄，只因隕陽巡撫陳奇瑜輕於縱敵，致遣返原籍的李部三萬六千人半途叛變，勢又熾起，終召甲申之變，及清兵入關之禍。又只因左良玉的別將陳洪範誤信張匪的假降，命其率部駐屯穀城，致其脅衆復叛，其後雖被押繫襄陽獄中，又爲襄陽太守王承曾悅其妻妾敖氏高氏之體而疏於防範，致被破獄而去，爲患至十六年之久，始被清兵射死於鹽亭。此實爲明室將吏祇圖苟安一時，不計貽患無窮的鐵證，也是今世短視者蹈襲陳奇瑜陳洪範王承曾等罪行的一面鏡子。至於國際大盜、毛幫恩人的蘇俄，其所以至今爲厲，不是由於國際間給它安撫的結果麼？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西方國家不予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主國不予援助，它就早已夭折在五十年前，最遲亦必土崩在二十年前了，蘇俄既不存在，怎有中共寇幫生長的餘地？

毛酋必亡，中共必崩，本無可懷疑。可懷疑的是，一些西洋專家仍用不正常的心眼去觀察紅衛兵的造反，初則像長崎廣島附近的日本人，在原子彈忽然投下之時，震驚得目瞠舌伸。及驚魂甫定，即又爭求解嘲，亂找解釋：或認紅衛兵造反是美國逼出來的反動，詹森總統須下詔罪己似的。或妄想反毛派可以外倚俄力，內順民心，逐漸撥亂反正，而竟忘吳三桂借清兵助平李自成終致佔據中國的史實。或認毛如得勝，可以牽制蘇俄，而竟不計中俄今後關係的演變，實非常理所能推斷。或認兩派相持不下，可以減少中共援助越共的機會，而竟無視蘇俄乘隙入越的同樣危險。或覺得修正主義派終將獲勝，和平轉變爲期不遠，而竟不察自一九五八年以來中共對外援助越共，爲患印尼，對內奴役人

民，發展核彈，均爲毛酋失權以後反毛派的表現。他們這些幻想的心理歷程，却也有趣，正如毛酋「圖窮七見」時對於紅衛兵的想法相似。在毛心中，正認爲用紅衛兵造反，作用甚大，既可表示他是受羣衆的擁護，而非個人的爭權，又可借紅衛兵羣衆的公意，推翻反對派，並可作爲人海戰術的鍛鍊與試驗，準備對外發展，一如希特勒的組訓衝鋒隊，自喜六轡在手，一石數鳥，却沒想到弄巧成拙，引火自焚，就只得動用軍隊。自以爲過去既靠軍隊奪獲江山，今亦可靠軍隊奪回權力，却沒想到中國古人所說的「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這個教訓，致倒戈四起，無法戢止。他這種全反常理的想法作法，比清末西后那拉氏將其王朝命運交給義和團和愚頑家將作一次大賭博，更爲瘋狂危險。這是正常眼光可以看出的定理，可是專家們却看不出，而其幻想的程度，却和毛酋的狂想同樣可打一百分。

尤可悲的是，在太平洋東西兩岸這股互相激盪的逆流，又各有其互相助長之勢。由於這類專家們偏蔽的言論行動，致使中共寇幫愈加意識迷離，精神百倍，愈自信其行動最正常，反把正常人的正常行動看成不正常，愈想反對到底。自知勢力不敵，即用詐術暴力以補不足。幾次僥倖成功，愈加積非成是，視此伎倆爲放諸四海皆準的常道。及邪不勝正的定理發生效效，使他們到處碰壁，心理即愈變態，行動即更反常，而其癡癡醉癡，眩亂反覆的表現，却又發生傳染作用，使一般譏解模糊，意志薄弱的人，暗受影響，頓感新奇，形成集體催眠，互相夢遊，益使他們認爲自己的思想行爲超羣絕倫，真堪造福人羣，否則就不會使美國人民有此情景，美國學者也爭相捧場。由此因果關係，遂使他們既得苟延殘喘，又能殭屍搏人，並能妖氛迷人，於是不少西方人，甚至當政者也就變成了「相驚伯有」的「陳人」，這真是今世最大的悲劇！今後史家如採用「正名」筆法，當可料定其必然也稱中共爲「流寇」，而不稱其爲「共產黨」，稱其爲「寇寨火併」，而不稱其爲「政治鬥爭」，稱所謂中共問

題專家者爲「書癡」而不稱其爲「專家」。

但懂得羣衆心理的人並不爲之驚慌，認爲若干學者的反常心理，只是一時的失察，這和本質反常的中共寇幫絕不相類。而懂得歷史的人則更不失望，認爲距今不遠的兩大篇歷史教訓，終究會使專家們猛醒。一篇是：六十九年前已經開到天津的八國聯軍，由於指揮官過度高估義和團的力量，遲延了一個多月纔開向北京，假使認識正確，行動迅捷，又何致因此增加中外人民的犧牲？又一篇是：十二年前匈牙利革命，已經發生反共行動，西方民主國家反都袖手旁觀，忍令革命志士最後只有悲痛喊出「你們必將自食自私與短視的苦果」，假使見義勇爲，見幾疾走，又何致東歐鐵幕至今尙存，德國分裂至今如故？

詹森政府介入越戰的政策本甚正確，其所以行動不夠積極，是被少數不瞭解中共，並茫然於紅衛兵情形的所謂專家與姑息份子左傾人士所牽制。如果向人民充分說明中共本是流寇集團，「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全是流寇作法，及其更招覆亡的定理成例，並說明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民族意識、是與共產黨政根本不能並存的理由，與羣起抗暴的情勢正在開展的事實，正常力常大於反常力的成果，則不但可以幫助這些人覺悟，更必能發揮全國力量，齊一全國步驟，與中越共以致命的打擊，共奏「撥亂反正」的宏效。

二〇、認清中共經濟敗落的主因及其事實：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民共同了解：經濟向爲福國利民的要素，今尤爲總體戰的主力，中共雖知其重要，却把早已破產的馬克斯主義與抓剝農村勞力的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公社路線，加上根本不成東西的毛澤東思想，作爲發展的指針，如何不使經濟建設成爲經濟破產。它已行過兩個五年計劃，每個都很少成功，現正進行其第三個五年計劃，照現狀與

趨勢看，將更失敗。

造成其失敗的基本因素，除最基本的思想觀念以外，則爲資料不正確，計劃者的習性多偏差，計劃本身的缺陷三者。其資料的錯誤是：一由於中共竊獲大陸之時，只注意搶劫武器土地，全不知收藏與經濟有關的各種資料，直至一九五二年纔設置「國家統計局」負責收集，所得資料已不完整，亦不一致。二由於統計收集人員與資料來源之間，因彼此炫功心切，常造成串騙行爲。三由於各人自炫其能，其實並無異能，致對相同的經濟活動，多採用不同的觀念及異樣分類予以處理。四由於統計報告的定義既各執己見，而「政治掛帥」的要求復居第一，經常誇大生產紀錄，致使每個計劃多以不正確的資料爲決定的基礎。其計劃者的錯誤是：一由於經濟的野心遠高於經濟的知識技術經驗，不管亦實不知經濟的客觀條件如何，只是狂想追上經濟前進國家的水準，一意訂立過大的甚至偏重的計劃，聊以自娛。二由於強調「超額生產」，並經不明經濟的共幹暴厲督促，致執行者與計劃者的構想，均與經濟的實際成長率大相逕庭。三由於部份計劃者心知其根據的統計資料不甚確實，根本不重視計劃，只是虛應故事；他們對於專家的意見，更以其不懂「政治掛帥」之故，經常予以輕視，致真正訂立計劃者大半是門外漢。其計劃本身的錯誤是：一由於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根本不適於經濟發展，而中共頭目提倡的繼續革命論，又不願使物質刺激超過思想訓練，益使計劃不切實際。二由於限制某些投資項目，致計劃本身缺乏伸縮餘地與關聯作用。三由於某項計劃如果超額完成時，其次年度的計劃生產目標即依此提高，其生產量較計劃落後者，亦責令其在計劃進行的後期必須補足，致每個新計劃根據的統計數字經常偏高。四由於生產者與計劃者互相勾結，故意誇報天災，爲降低下期計劃生產目標預作安排，致新計劃根據的統計資料更不確實。五由於臨時矯正缺陷，任意修改個別計劃，益使計劃

混亂，造成新的缺陷。六由於統計報導不正確與遲延，及不願承認錯誤，又使各計劃不能作出適時適度的調整。七由於資金不足，機器不備，物料不繼，勞動力常遭鞭策，甚至用違其長，致本不健全的計劃，經朝令夕改，妄求適應現狀之下，更變成支離破碎的一束廢紙。八由於蘇俄專家撤離後，雖發現其經濟缺乏彈性，却並不予以合理矯正，而反來一個大反動，索性採取儘量發展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的計劃，大躍進即屬前者，核爆便屬後者，致成為本末倒置的計劃，縱思調整而已為勢所不許。像這許多的各種錯誤，便很自然地造成其在經濟各部門的大失敗。且從當前中共政治情勢推斷，決不會採取「修正主義」的經濟路線，自必繼續失敗下去。

中共竊據大陸以後的經濟概況，已由一九六七年二月美國國會選集國內外專家的著述，列入紀錄。這些著述，是他們根據親赴中國大陸人士的查察與中共自己的統計而作成的。近數年來中共雖未正式發佈其經濟的全部情形，前所發佈的亦多誇張與隱諱，但每篇專文不致距離事實過遠，堪為最權威的報導，則已為美國國會所共認，亦即應使人民所共知。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一九六七年九月號刊載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高級經濟研究員鄭竹園所作的「文化大革命與中共經濟」，美國人想亦看過。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間，中共雖亦與戰後各國同樣追求經濟復原，但由於觀念錯誤，方針偏差，步驟暴烈，致壓榨民脂民力的投資，及使用蘇俄給予的軍經貸款，雖有幾許成就，但就固定資產的純值方面看，則甚少增益，並有若干生產毫無成長，雖然電力工業、鐵金屬工業、建築材料的成長率較高，但其生產值的估計，由於當時尚無統計機構，並無具備統計知識的共幹，幾乎從未公佈工業物品生產資料，亦無年度統計報告，即或發佈某些零星資料，通常是含混而矛盾，故其生產量值

的估計並不確實。即令公差不大，但其工業成長速率的獲致，其中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成份，均係獲自國民政府光復大陸三年多內即已復業生產的工廠，以及低廉的投資成本。且在開始時就跳向重工業途徑，不但無益民生，亦非當時財力物力人力所能勝任，起步既錯，前進自必蹉跎。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是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它曾自誇其淨產值的成長率為百分之九，其實照專家看，僅有百分之六，自誇每人每年的產值成長率為百分之六點五，其實只有百分之三點六，自誇其工業生產已達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倍，縱使確實，亦大部份屬於軍需成份的金屬加工業方面。即使這些成長率全為事實，但仍未及大陸被竊據前的水準。其成長範圍亦較前狹窄，祇突出在石油鐵金屬等方面。此一突出，已顯示其投資政策不顧民生，並已有事實為證：如紡織工業的成長率僅為百分之九，如農業成長率並未跟隨其掠奪式的資金累積速率上升，其糧食產量如持與民國二十五年三、七二九點三三億斤之數比較，不但一九五二年五三年及五六年中共都未達到，即其所謂最好的一九五七年之三、七〇〇億斤，亦較二十五年時為少。何況其一九五七年的數字雖一度吹出，終自覺其不實而即緘口至今，還不若二十五年的統計，係專家根據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卅六年九月發表的材料，及中共一九五二年經濟年報材料，共幹華恕吳碩兩人材料，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日北平大公報材料，乃至鄒秉文著作中的材料，美國學人卜凱教授（前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及喬啓明等估計中共糧產結論，綜合研判而致的準確。再如一九五三年的每人消費值，亦僅及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時代的百分之八十七，至一九五七年亦僅及百分之九十六。且上舉各項數字，中共已玩了魔術，它爲了誇大這一期間成長率之高，早就降低其復原期間劫自民間的產值數字，起點之低，自可襯出其終點之高。至於一九五七年人民失業情形的仍極嚴重，亦已由其自己洩露的若干材料中可以看出，城市爲工商業

比較發達之處，就業應較容易，但中共就十五個城市調查研究的結果，即發現從一九五三年起，「非生產的」人口佔總數百分之七十，「生產的」人口僅佔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縱使減除不能生產的老弱者，亦仍可證其失業者百分比之大，並反證其工商業不發達之狀。何況老弱亦並不能逃避其奴役，仍爲「半生產」者。其所以致此，主要在其將重工業的發展作爲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的盲進政策，根本則在其並不懂列寧主義。列寧在其沒收農民土地與私人工廠銀行以後的一九二〇年底，一見經濟崩潰，立即拋掉馬克斯的教科書，向後退一步，採取一項新經濟政策，在城市及農村鼓勵私人企業，終於使農工生產恢復了一九一七年的水準，而中共則一直在盲進。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爲其所謂「大躍進」期間。在此階段，它一脚踢翻了剛在進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硬用竭澤而漁的手段，自可驟然增加產量。其所自估的一九五八年增產值比上年爲高，或近實情，但如扣減其土法煉鋼所浪費的各種資源與因措施錯誤所造成的農業損失，以及低熱價值之煤亦應由其所宣佈的煤產量中減除，則又可知其實中有虛。以此類推，則其自稱工業產量年增率平均爲百分之二十，以及一九五八年穀物產量三億七千五百萬噸，或稱比一九五七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噸多一倍，顯屬誇大，至少亦須打個七折，中共頭目亦曾在一九五九年八月間認爲各地區統計數字的錯誤，於此又可覘各級共幹邀功飾績的一例。又即使真有躍進，但其進銳退速的事實，亦已可從其一九五八年總長成率的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九年即降爲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六〇年更降爲百分之四，而獲得證實。且由於其成長率最高者爲石油工業的百分之五十九，其次爲電力的百分之四十六，再次爲鐵金屬工業的百分之四十一，大半屬於軍需工業，而食品工業的成長率則最低，僅達百分之十五，愈可證明其漠視民生的酷烈。羅伯米琪·菲爾德（Robert Michael Field）在其一篇專論中指出，並已

列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幾句斷語，「大躍進的錯誤經濟指導政策，已犧牲其整個十年的工業成長」，確符事實。

其所以致此，則已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約翰·愛德(John S. Aird)一篇專論中指出，「大躍進乃是中共黨內某些非技術的高級政治份子的反動行爲，他們反對那些漸進主義者的悲觀天性，而被一項觀念所引導，認爲無限止使用勞動力與政治熱情的結果，可使大陸在隔夜之間，即可免除各方面經濟窘迫的痛苦。大躍進展開以後，農業方面紛至的革命性的成功報導，遽使中共一時認爲馬克思主義無限的勞工生產力理論，已在事實上成爲解救中國的法寶。這種報導係由新從城市下放而剛達鄉區的幹部所爲，無非是急於表現他們在鄉區工作的勤勞，以及急於宣佈農業方面的困難已經消除，而希望儘快被調回城市之故。」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爲其補救大躍進失敗的經濟重整期間。由於一九六一年整個工業生產的激劇下降，一九六二年的繼續下降，又由於蘇俄技術人員的全部撤離，許多新舊工廠陷於混亂癱瘓的時間甚長，復由於勞動力的疲憊枯竭，工業發展的偏頗失調，農業頹衰後的原料缺乏，糧食供應的普遍困難，自不得不重加整理。但總因元氣已損，邪風已成，不易補救。如耕地面積整理至一九六五年，仍比一九六五年減少百分之二至三。如一九六一年的牲口數字祇有一九五七年的半數，繁育至一九六五年，仍低於一九五七年的三分之二。如一九六五年的農產品增加率，即使其自稱的提高了百分之八全不虛假，然個人平均所得則已減低了百分之五，實無可抵賴。與此類似的情形，如一九六五年化肥的總產量，雖據其宣傳超過一九五七年的五倍，水泥木材及主要動力的產量約等於一九五八年的水準，然一九六五年整個工業的生產既未達到一九五九年的標準，輕工業的進度則更緩慢，特別是



棉布的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尚低百分之八十。即使依其「經濟報導」所說，在一九六五年內，已經有一百四十萬新紡錠投入生產，棉紗產量增加百分之十八，化肥產量估計約在五百萬噸左右，但人民細衣百結，糟糠不繼的事實，則為最諷刺的反映。更無可掩飾的，則為大躍進失敗以後的許多年間，很少新工廠設立，僅將有限資源資金投入武器製造方面，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核子試爆。尤其關鍵工業中之電力，至今尚未在其本身能力之內，發展什麼主要的電力設備或設計發電工廠，動力不足，自必致工業不前。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十七個年間，其經濟衰敗的情況已可以如此清楚的看出。其所以致此，原因甚多，除開始指出的思想中毒為其最根本的因素，馬克斯主義導於前，「毛澤東思想」繼於後，兩毒并注於經濟領域，不到喪命不會停止以外，而其由此衍生的如下所述的各種惡果惡因，亦可一一瞭解：如一由於其一意剷除資本主義的措施，致最能助長經濟的私人自由企業，已在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化私人商業的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期間，即有數百萬商人在「五反」中受到整肅，喪失舊業。其轉業至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其他國營經濟部門內的，亦多不願盡力。被剝奪的私人企業，名為公私合營，實際則是最足以敗壞企業的官營，反而因此更加降低了國營事業方面的生產總率。二由於開始即側重軍事工業，將有限度的資源與技術人員集中投入此途，則其他重要工業的發展勢必緩慢。三由於農村因土地革命、耕耘法改革，導致農民的額外工作，降低土地質量的保養。成立人民公社、農業合作社，又破壞一向有效的農村生活方式。四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突然擴展都市經濟，致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間，都市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務農人力即比例減少，穀物產量即相對降低。一九五七年雖迫令還鄉，但一九五八年間仍有一千萬農民流入都市各企業中，一九六一年被迫還鄉者雖達二

千萬人，一九六二年達三千萬人，但已無補損失。五由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的兩次歉收，致食物配給降至最低點，饑病交迫，餓殍載道，由農村苦況影響到軍隊情緒，復由軍隊情緒激高農村怨氣，愈使農民怠於耕稼，農業始終不振。六由於農民不能私有其尺地斗粟，工人的工資增加率不及其生產力增加率的二分之一，已斷傷其生產精神。加以大躍進期間，婦女被迫從事築路修堤造林等工作者，高達六百七十萬人。在公社生活與節育運動開始以後，夫婦被迫離居者，遍及每一家庭。如此違反生產習慣，摧毀家庭生活的措施，勢必逼成全部工農走入半怠工的狀態。七由於蘇俄技術人員與工業建設藍圖的全部撤回，致既成之廠不知運用，半成之廠難於完工，待設之廠須自設計，當時新建工廠全部停工的高達百分之五十，舊建工廠陷於混亂的高達百分之八十，生產率自必大量降落。當時工廠增加率的低於一九五七年，工廠價值在工業中所佔的比率尚不及一九五七年的半數，勞工亦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一半，導致一九六二年工業生產量直落到一九六〇年巔峯的最低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雖略見起色，但工廠使用率祇及於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〇年後投資於工業方面的數額雖佔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但畸形擴張的電力水泥公路鐵路無從充份利用，對生產的貢獻甚少。像這些由蘇俄人員大撤退造成經濟成長率普遍降低的事實，幾與其自己大躍進的損失相同。八由於就業人數與經濟失調，已形成惡性循環。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村人員就業於都市者，各年平均增加率為百分之四十，約一百八十萬人，都市人民為之失業者至少有四十萬人，各年勒令還鄉的人雖達數千萬，繼續強迫高中畢業生下鄉的人數雖亦不少，但仍未能提高都市人民的就業率，亦未能補救農村生產力的缺乏。一九六四年就業人數減少了一千四百餘萬人，總數降至三千零二十萬人，比一九五八年的最高峯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其中最重要的勞工人數，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間，亦僅及一九五七年

的半數，更顯出經濟成長率緩慢的原因與結果。

上述八端，已可見中共經濟所以致命之故，可是還不止此，尙有九至十一的三種不治之症。九即由於各種物品的生產量與對外貿易亦形成互相因果的惡劣關係，益使經濟建設走入坎坷之路。在一九五幾年的數年間，對共產國家的貿易額雖曾高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每年進口物資達十二億美元，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達十五億美元，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達二十億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雖爲生產設備與原料，但其賴以發展工農業的直接資金即比例減少。一九六〇年後雖減至十三億美元，但又由於以貴重物資折償蘇俄債務，復使進口提高至十八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六幾年數年間的進口物資，幾乎一半是農產品的穀類或化肥等物，一九六五年進口物資中的工業產品，已降至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半數。上述數宗，既顯示其農工產品的俱感不足，亦反映其工農發展資金因大量漏出之故，更加短絀。至其歷年大宗的輸出物均屬穀類，這種看似奇怪的現象，實則不足驚異，東聚民衆肚子的「饑餓輸出」而已。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專家們在一九六七年秋季的一項貿易報告中所說的「他們的營養水準很低，去年中共的糧食生產是十二年來最低的一年，由於世界市場的糧價高，他們竟輸出圖利」這句話，已經一語道破。且不但道破了中共在一九六六年的所爲，亦道破了他在以前各年的暴行。飲酖止渴式的輸入，加上殺雞取卵式的輸出，自必從根損害經濟的建設。十即由於其在一九五三年發動韓戰的消耗，及其在韓戰停止後給予北韓、北越、偽蒙、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古巴等六個共產國家約值十五億四千萬美元各種物品與技術人員的經援，與其和蘇俄經濟合作中，由於不平等協定的關係，至少又吃三十億美元易貨之虧。同時爲了收買共產國家與若干亞非國家的情感又耗去二十五億一千餘萬美元，祇此一筆支出，即比它得自蘇俄的經援總額還多一倍。如此「打腫嘴巴充

胖子」，怎不使經濟心臟更加貧血，經濟面目愈形乾癟？十一即由於其教育政策給予經濟方面的損害最為深遠這件事。中共自出世之日起，即以最能破壞農村經濟與都市工商業的黨徒為第一流人才，其後在經濟上的各種措施，亦洗不淨這種觀念，由此養成的各種幹部，自不能符合經濟建設的需要。一九五八年間進入社會的一千四百七十萬小學畢業生，與三百三十萬中學以上學生，及其後數年間經過短期訓練的大批青少年，大都是成業不足，敗業有餘的份子，即為「鹵莽滅裂而耕之，亦鹵莽滅裂而報之」的必然結果。各種企業組織中混入這類人以後，不但直接增加生產成本，並間接導致專家棘手，熟練技工灰心。更如雪上加霜的，則尚有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十年中，又有七百萬退伍軍人中的五百萬人，轉入農業部門，其餘二百萬中的殘廢者，非插入工礦機構，即恢復原職，益使生產單位增加混亂，生產資金增加困難。一九六〇年後工業投資率直線下降的因素雖不止一端，但「丘八」「丘九」成為生產戰線上的害羣之馬，自亦有其一定程度的阻礙力。今後更糟，學生變成紅衛兵，學校盡皆關門，即使強迫復課，教師亦已管不了學生，產業人才將愈缺乏。何況更將搞垮搞臭的噩耗，已由中共「人民日報」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刊出毛酋已決定將大學改成軍事管理化的「勞動集中營」，教師學生技師將編成「勞改犯」式的勞動隊，並設置「政治指導部」，加強控制全校人員的思想，除死啃政治教條之外，便是參加集體勞動，學習一些勞動的技術，成為終身被奴役的機械。考取學生的標準，亦仍是階級成分與政治思想兩項。這真是破產到底的教育，而其報酬當然是破產到底的經濟。蘇俄成立已五十年，一二二百多萬共產黨員差不多都是大學出身的知識份子，政治局員十一人中，九個是技術人才，柯錫金就是一個做過廠長的技師，可是搞到現在，儘管人造衛星滿天飛，人民還是生活很苦，蘇俄尚且如此，試想中共還有什麼生路？

以上的論述，都有事實根據，詹森總統儘可邀集統計專家核算，經濟專家公斷。倘其結論大致與此接近，就應使人民共同瞭解。否則必須請專家提出相反的評斷，但必須將民主國家今後直接間接給予中共各種援助的力量因素扣除。

二一、認清中共經濟破產的近因及其趨勢：詹森政府應緊接着使美國人都了解，前述經濟所以衰落的各種因果關係，尙祇是一九六六年前的表現。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造反之日起，就更使其調整了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稍見好轉的經濟局面，一落千丈，跌入破產邊緣了。其已外洩的或經其紅衛兵在大字報上發表的惡劣情形，尙祇是中共自己亦掩飾不了的一小部份，而其破壞經濟的惡果，亦不能在一九六七年內完全看出。事實是，大字報的消息若非由毛派通訊社供給，紅衛兵即無從寫出；開始時的文革惡浪，尙未觸及經濟邊端，其後纔被捲入。

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尙未軼出思想鬥爭的範圍，八月以後的紅衛兵造反，雖曾突各地，農民亦加入毆鬥，但至十月間即被禁止其進入工廠，串連農村，故其給予經濟的影響不大。及九、十月間進行全國大串連，侵入各種大企業，生產各部門雖開始混亂，尙不致重大妨害下年份上半年的經濟發展。一九六六年的投資總額，經其宣稱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八，爲一九六一年以來的最高額，工業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二十，爲三年來增加最多的一次，並宣稱對外貿易由上年的三十八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增至四十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可是他們却不敢說出增產必需條件的新投資數額，佐證這類顯著的進步，自可明其爲配合「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思想」的誇大宣傳，但亦可由此略知這兩年間的經濟行程，尙未全部打亂。惟農業生產則不然，因農民加入鬥爭或乘機輟耕，致一九六六年的播種面積，已較上年減少約一千萬畝，致大陸小麥收穫量較其估計數量減少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十，致一九六七年的夏收以前，廣東的佛山、梅縣，福建的永春、晉江、龍海，雲南的隴州、墨江等處，每人每月所配稻穀，較前減至六、七、八折不等，形成各地缺糧的嚴重問題。而動力資源的煤產量，雖據其自估爲二億七千五百萬噸，較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但比一九五九年的三億四千八百萬噸，仍然瞠乎其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以後，整個經濟情勢就江河日下了。反奪權派擺出關心民衆生活的姿態，掀起「經濟主義」的風暴，奪權派不甘示弱，即廢止紅衛兵不准到工農生產單位財經行政機構去串連違反的禁令，反奪權派立即乘機展開反撲，鼓動羣衆奮起，在城市掀起停水、停電、停工的「三停」鬥爭，在農村展開對公社糧食資金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運動，由文鬥進入武鬥，由政治鬥到經濟，由都市捲及農村，再由農村殺回都市，致公社的三級組織齊失控制能力，公社的公積金儲備糧大部份被瓜分；致農村勞力不足，種籽缺乏，積肥水利無人經管；致交通阻塞，原料成品無從轉運；致百貨更缺乏，物價均上升，本以工農產品作基礎的「人民幣」價值隨之下落。如此無政府的狀態，不但個別城市爲然，即中共頭目坐鎮的北平亦不能免，不但一般工礦農牧地區爲然，即中共大肆宣傳的工業標兵的大慶油田，農業標兵的大寨大隊亦不能免，其中只有軍人感覺興趣的核子部門沒有受到干擾。自一九六六年冬至一九六七年十月止，遭受鬥爭破壞的工廠礦場財經單位，已達五十五個主要城市與工業區；遭受鬥爭破壞的農村公社，已有二十一個省市的這類組織；財經領導機構中被鬥死被撤職被公開批判的人，已有三個兼任財經領導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經理，與二十一個部會中的正副負責人二十六名。

被奪回了權的省縣市各種機構，同樣糟亂。原設的領導機構一律廢棄，改由「革命委員會」代

行職權。未經奪權的地區，亦改行軍事管制。新組織既不能配合舊業務，新人員又缺乏領導能力，不懂生產管理，原有的專家都被閒置在顧問地位，原有的熟練技工常被胡亂驅策，在盲人騎瞎馬的亂跑之下，更使機器損傷、原料浪耗、產品既少又劣，如此冥眩反覆的病象，連中國人一向視為「首善之區」、行政最高權力所在地的北平，亦降為首惡之處，被北平大字報在五月十八日哀號着「四月份的生產比三月份又減少百分之七」，「北京日報」又在十月十三日公開承認北平地區的許多人民公社，最近發生農民拒絕向採購站繳納農產品的事件，北平尚如此，其他地區更可知。七月六日的「新華社」雖然宣傳着「全國夏糧總產量約比去年增長一成左右」，但許多地區農民忙着鬥爭，違誤農時的事實，却同時從鐵幕內傳出，河北、山西、山東、安徽、湖南、湖北、廣東等十二省的春耕時間，都比一九六三年延遲一月以上，迎面給新華社一個重大的反擊。再據一月二十九日紐約美聯社的報導看，「中共報紙與各地電台再度緊急呼籲農民，堅守農耕工作，視此工作與作戰準備和饑饉有密切關係」，並高喊「階級敵人煽動農民停止將穀糧送交國家，完全自行分配，此種現象實不能忍耐」，「同時報導中共已「命令產稻地區兼產麥稻兩造」，「中共曾向海外購米，但都失敗，只得再向加拿大澳洲及其他國家改購小麥」，則農業區遭受破壞和糧荒嚴重已到如何程度，更無待解說。同年十二月五日蘇俄官方電台在華語廣播節目中所說的亦確係實情，它說，「紅衛兵及被毛林集團提升起來的人，非但不學無術，亦不習慣於勞動，不守勞動紀律，他們奪取了生產上的領導職位以後，便把有經驗的幹部與業務領導人都撤了職，使工業生產陷於困難。」

其在對外貿易方面所受的損害，因共黨國家向不公佈確數，它們發表其宣傳式官樣文章的時期，又都和蘇俄一樣，總在次年的八月以後，故目前尚難窺其全貌。加以它過去的對外貿易政策，一向是

執行饑餓輸出，不論其內部經濟情況如何困難，至少都要維持貿易總額的平衡，甚至多少要製成一些出超的數字。但是紙終歸包不住火，一九六七年的情況就不同了。根據國際貿易界統計，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七月份爲止，中共向英國的輸出爲一千八百三十萬英鎊，而輸入則爲二千八百零三萬鎊，入超達九百七十三萬鎊；今年上半年對西德的貿易，輸出爲四千一百三十萬美元，輸入爲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入超達一億一千三百七十萬美元；對義大利的貿易，輸出爲一千萬英鎊，輸入爲一千六百萬英鎊，入超達六百萬英鎊。綜計其在此期間向英、法、義、西德、香港輸入的貨物約近十億美元，輸出約五億五千萬美元，其中輸出入額較一九六六年同期減少最多的是香港，已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三，對日貿易亦急劇下降。其所以致此，亦已由國際貿易界指出，一、不能如期交貨，二、合約履行困難，三、港務不能配合，四、貨色品種不全，五、裝船效率下降，六、品質不符規格，七、包裝放置欠當，八、季節不能掌握，九、貨運秩序混亂，十、上下之間脫節。輸入總額中仍以軍事工業物資如鋼材儀器及糧食化肥爲大宗，輸出則以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爲多，生產破落而仍有輸出，無非殺雞取卵，民生凋敝而仍輸入軍需物品，顯是「不要棒子要核子」，紅衛兵造反而一九六五年仍有四十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的對外貿易額，全年亦有相當的數額，無非如其以前顯示「大革命」的威力，今再表示「大革命」的成就。證以同年十月日本大阪大紅貿易商社長植野藤次郎對記者所說，中共會將紅衛兵從民間劫來的十餘萬件書畫古物，削價出售於日、英、法、西班牙、加拿大五國商人的這件事，實已無賴到極點。據這種窮到拍賣民族文化遺產的對外貿易，一到次年秋天，將必顯出其「大革命」的慘敗，更比「大躍進」爲甚，大躍進期間拚命發展外銷，曾使輸出直線上升，一到一九六二年時，就從一九五九年的四十二億九千萬美元貿易最高峯，下降到二十六億七千萬美元，便是前車之鑒。



就現階段爭權的趨勢看，毛酋似暫居上風，其將從事一項新的「大躍進」，以政治恐怖與軍事紀律指導經濟，藉以證明其「思想」的正確，已有蛛絲馬跡的徵候出現，則其經濟的澈底破產，當無可倖免。即令雙方暫作戰略性的退却，亦不能如大躍進的易退，因為大躍進運動，始終只是他們的單想思，民衆沒有願意加入，停止正合民衆希望；現正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則已引起民衆反毛反共的活動，亦已合民衆的宿願，民衆固不願聽命中止，反毛派亦無從爲力。即使被暴力鎮壓，並且仍被奴役，但因經濟元氣大損，已非十數年不能回復紅衛兵造反前的舊狀。而且這一推斷，中共頭目更有極悲觀的看法，表示以前希望十五年內可以趕上英國工業生活水準者，現將需要三十年至五十五年的時間，他們的這種表示，已在羅伯米琪·菲爾德（Robert Michael Field）所著有關中共工業生產狀況的文章中說出，並已由美國國會於一九六七年二月間列入記錄。同年十月二十二日英國「觀察週刊」刊出史第文斯（Robert Stephens）的專文中所說的「中共在生產方面也很落後，目前其總生產量約與加里福尼亞州相等，而等於日本的三分之一」，尤可作爲佐證。又即令劉少奇能收拾危局，則姑不論劉已失去其指揮黨徒的自由，縱能脫樊而出，而其本質亦並非真正爲民的經濟主義者，亦不是像赫魯雪夫那樣的修正主義者，而實是澈頭澈尾的共產主義者，不過「以暴易暴」而已。

且所謂「經濟主義」，原只是奪權派用以攻擊反奪權派的簡單口號，和他們用修正主義以攻擊赫魯雪夫的腔調相類。須知修正史達林暴政的第一人是馬林可夫，他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當權時，除修正獨裁制爲多頭共裁制外，即已修正國防需要的重工業政策，而兼事人民需要的輕工業建設，繼馬而起的赫，只是肅規曹隨，並非新創。又只是毛澤東恨赫不支持其侵略金馬台澎的行動，纔用修正主義去攻擊他，並要把他的共產集團領導權奪歸自己。這些均有史冊可稽，並有報誌可查的事實，怎

可被毛酋叫昏了頭，就不追究原委！而所謂中國通者同樣被毛酋攪得頭昏眼花的，尙有「經濟主義」這個很動聽的名詞，應知中共一得江山爲了推行其世界革命的終極目標，就採取一項經濟軍事化的計劃，今日反毛派的大小頭目，盡是當年決定這個計劃的人物，現在只是揀些動聽的口號，騙取工農的支持而已。不想毛派也攪昏了頭，竟把對方提出的許多口號與其表現的若干行動，一籠腦兒總名之爲「經濟主義」，反把這個美名奉送給自己的敵人，頓使他們受寵若驚，都在慶幸得到意外的收穫，亦真可謂「玷塊昏迷，語無倫次」之至了。毛派不足笑，可笑的則爲確認劉派是經濟主義溫和派的所謂中國通者。再退幾步說，即使毛劉兩派都能相忍爲黨，停止自殺，並再運用暴力騙術驅使人民跟他們走，然亦非厚仗蘇俄援助，即沒有從餘燼中恢復原狀的可能，此則何利於人民，更何利於西方？加以核武器的發展率既高，財物的消費率自大，此在經濟上言，正如逆水行舟，竭澤而漁，亦仍吃力，蘇俄則更將乘機而入，而一向恨俄入骨的中國人民，又如何甘心再受中俄共的聯合壓迫？則「爲劉氏者左袒」的中國通，更不知其如何說得通？

倘說使說中共經濟縱然如此糟亂，尙比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爲強，僅就經濟的兩項的動力即電力與鐵路方面看，就可證明。就電力方面言，一九六五年它的發電設備爲一千三百五十萬瓩，台灣現有一百四十七萬五千瓩，約爲九比一點七。自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的九年間，其發電設備的平均年增率爲百分之十五點八，台灣則僅爲九點六。一九六五年它的發電度數爲三百七十億度，台灣現爲七十五億三千萬度，較高五倍餘。這種比較，實在仍是大陸地大民多物富而台灣則無一能及的表面看法。殊不知大陸的發電設備與發電量雖比台灣爲多，但其用在軍事工業方面，尤其是用在發展核武器製造方面的電力，每年至少不會低於十億度，此與台灣以發展民生經濟爲主的發電價值相比顯然較低。如就每

平方公里發電設備看，則台灣已達四十一瓩，大陸僅爲一點四瓩。就每平方公里發電度數看，則台灣已達二〇九點一，大陸僅爲三點八五。就每人平均所得發電度數看，台灣則已達五百七十九度，大陸僅爲四十九度，且又未必有電可用，遠不如台灣爲配合土地改革，實施農村電化，供電系統已延伸至僻遠鄉村，在目前一千三百萬人中，已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人民享受廣用電力的幸福。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專家翰艾西頓（John Ashton）一篇論文中亦曾指出，「大陸電能消耗量相當低的事實，反映出一般工業、交通、及城市育樂事業的低度發展。一九六四年平均每人用電的總量約爲四十瓩——時，比同年印度每人則達五十四瓩——時尙差，鄉村根本上完全沒有電化。」何況大陸自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九年間的發電度數增加率，台灣平均已達十二點三，大陸則僅爲九點五，而其被發展核武器佔用的電力，又勢必隨年增加。若置此不問，而惟就表面數字以斷大陸電力開發的勝於台灣，那就無怪承認中共爲強大政權的皮相之論，甚爲熱鬧了。至於用同樣方式，說大陸鐵路主要幹線，截至今日，已有一萬二千零三十六英里，其中四千一百一十五英里均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內築成，台灣則仍係日據期間所建，其後並未增加。此就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物資產量等方面對比着看，則台灣鐵路運輸交通比大陸爲暢足，實亦與電力普遍供應的情形相同。此外尙須了解，中共所建鐵路幹線的百分之八十，均係依據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時代交通部長張嘉璈測製的建設藍圖，張氏早決定於戰後即着手修建一萬四千英里，於今中共竊據已逾十八年，雖驅大陸人民與工程師爲奴工，然至一九五八年止的九年之中，尙僅築就幹支線合計七千五百一十二英里，祇及張氏計劃的一半多，已可見其發展交通的能力是如何的低弱。何況紅衛兵造反以來的兩年內，各路阻斷，百物棄置，已如共軍在日本投降後到處破壞水陸交通，阻撓政府接收，而被人民稱「八路軍」爲「扒路軍」時期的慘象，不必說這已現

出很快極顯的因果報應，祇證以中國春秋時代單襄公料陳國必亡的事象之一，則中共之亡，恐亦只在今後二、三年之間。當時單襄公經陳往楚，目覩陳國「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便斷言「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也就是說陳靈公自己如不遭到凶禍，他的國家亦一定滅亡。果不出所料，在他離開陳國以後的第二年，靈公即被其臣夏徵舒殺死，又過一年，陳國即被楚國所滅。今日要殺毛酋的遍大陸，能滅中共的不祇中華民國，只要無人幻想其會變好，甚至助它棄死回生，則筆者亦敢如單子的斷言。

至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成長率與輸出額逐年增加，而大陸則適得其反的情形，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已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向全國製造商協會發表演說時指出，「中華民國自一九五六年開始，農業生活每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五，工業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二，輸出額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七，其進步情形，與中國大陸十年來生活水準的日形下降，恰成強烈的對比。」同日日本「經濟新聞」北平派員鯨島參觀北平郊外「紅星人民公社」後，報導「去年平均每人收入人民幣三百三十元，每月平均不足三十元」，亦甚可信。中華民國台灣省一九六七年平均每人所得為新台幣八千三百六十八元，折合美金達二百零九元，雖尚未及日本的七百多美元，但已與馬來西亞相等，居亞洲國家第二、三位之間，則已由專家初步估出。這種明顯的差別，不但美國製造商應該瞭解，美國全體人民尤其是祖共份子應該共同瞭解，詹森政府更負有使其人民共同瞭解的責任。

二二、認清中國民衆已瞭解如何反共並正在反共：詹森政府急須使人民都了解，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如失去人民的擁護，總必無從行一事，如已被人民怨恨，終將崩亡，而其崩亡的遲速，則視民怨深淺、動向岐正、及時空關係而定，更視知識份子對統治者的向背而定。被暴政統治的民

衆，初時各人雖都有痛苦及期求，其後雖又形成一種欲罷不能，躍躍欲試的傾向，但向何處行動，如何行動，則既無真知，亦無勇氣，更無決心。及本與統治者合作的知識份子，外受民衆憤懣心理的刺激，內感自身同遭壓迫的痛苦，相率運用各種各式的言論文章，以煽起民衆的怒火，並暗示其行動的路向，其中膽壯義憤的青年更怒不可遏，攘臂而起，則統治者既失去知識份子的支持，又遇民衆的反抗，而其惱羞成怒的措施，復如治絲益棼，火上加油，其沒落即成定局，且其傾覆之勢，又正如物體下落，愈下愈速。即使其稍減壓力，以平衆怒，亦將反使抗力更易伸展，正如養氣的助燃。

第一種情勢在歷史上的例證是：一七八九年七月攻破巴士提獄的羣衆，是饑寒交逼，備受壓迫的人。同年十月五日攻入凡爾賽宮的羣衆中，且有數萬婦女痛恨法王，竟奔向皇宮高喊「歡迎麵包師。」俄國革命爆發前數星期，列成索取麵包隊的數千人中間，由前線退回的許多傷兵也加入助威。在沙皇政府顛覆的前數日，索取麵包的人都變成革命的勇士。這法俄兩國羣衆暴動的原始目的，祇在吃飽肚子而已，並未想推翻專制帝王，待到知識份子予以指點領導，纔向關鍵處下手。這是人民經知識份子參加行動，抗暴即告成功的史訓。

第二種情勢在歷史上的例證是：羅馬帝國衰落時，安節羅斯、奧古斯汀、哲羅姆等知識份子，轉變其擁護政府之心而擁護教皇，終造成教皇的天下。俄皇尼古拉二世沒落前，多斯泰雅夫斯基、托爾斯泰的諷刺現政府，甚於其前閣歌兒、布斯金，其後克魯泡特金、閣兒基的毒罵現政府，尤甚於多斯泰雅夫斯基、托爾斯泰，最後至沙皇政府傾覆前的幾年中，簡直要找一個擁護政府的次等角色亦找不到，列寧就很輕易地攫取了俄國。這是知識份子向統治者倒戈結果的史例，亦是暴君下台速率愈過愈甚的史例。

第三種情勢在歷史上的例證是：發動法國大革命的羅伯士比爾、丹頓、馬拉，搞起戊戌維新的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及梁啟超，都是青年。尤其是致力國民革命的陳少白、尤少統、楊鶴齡、陸皓東、鄭士良、史堅如、鄒容、秋瑾、宋教仁、陳英士、趙伯先乃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無一不是青年。抗日戰爭中「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壯觀自更不必說。這是青年奮於前，民衆隨於後，終於推翻暴政悍寇的史例。

第四種情勢在歷史上的例證是：法國大革命前夕，巴士提獄的防守司令德勞奈，竟不知其三分之二的守卒已站在民衆方面，全不理睬其親信的警告，只是用暴力鎮壓，卒闖大禍。俄皇當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爆發之前，仍將早已同情於人民的軍隊留駐聖彼得堡，讓其親信部隊遠駐京外，並仍信任傾向革命的人繼續掌管全國鐵路職務，自以爲其專制手段帝王威風足以懾服暴民，終亡其政。這是剛愎自用，倒行逆施結果的史例。

第五種情勢在歷史上的例證是：宗教大革命不爆發於最無道的約翰十一世教座之下，而發生於較有道的黎奧十世蒞位之時。中國革命成功於宣統初政，百度維新之際，而不成功於清廷最昏橫的西后主政之時。此皆可證明民衆想推翻一種壓迫制度的堅強心理，往往高漲於那種制度的壓迫力較前減輕之時，而其最激烈的動作，亦常在壓力較爲稀薄之際。

今日中國大陸的情勢，已日益明顯。民衆不但早已激射法俄饑民渴求麪包的饑火，並反對集中營式的人民公社，猶過於法國人民的痛恨巴士提獄。知識份子不再歌頌中共，並已如羅馬與帝俄末年一羣文藝家的諷擊暴君。知識青年亦都傾向自由民主，正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期間的青少年。毛酋的更加羞怒愚妄暴戾，則猶過於尼古拉二世、德勞奈、那拉氏。劉少奇雖失去自由而其不願放棄共

產主義，則與戰術的迷信梁康主義相類。

中共頭目毛澤東從他的狂語暴行被劉少奇等推尊爲「毛澤東思想」以後，他已自忘其醜陋。及踏入北平舊皇宮，益覺名實相符，聖智天授，除立即恢復帝王時代「北京」的原名以外，又急忙在第二年間開「政協第二屆會議」中，詔令知識份子領導實行「思想改造」，即以「毛澤東思想」爲改造的標準。不久又把「毛澤東語錄」當作清帝的「聖諭廣訓」，印發幾千萬冊，當作清帝偏立於各州縣各明倫堂的「臥碑」，要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一體恭誦遵行。這種作法，已不是知識份子所能恭維；及發現知識份子陽奉陰違，便實行整肅了。

自一九五一年起，中共即壓迫黨內外文藝界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一九五四年更成立八個小組，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及唯心主義思想」的全面批判。一九五五年又發動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清算鬥爭。截至一九五六年底止，已有一百三十多萬知識份子受到「政治審查」，八萬多人被懲治，二千多文藝工作者被加上「反革命」罪名。一九五七年又搞「鳴放運動」，展開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一九五八年，更有系統地展開「反修正主義」的文藝運動；一九五九年又展開「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一九六〇年又發動「反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鬥爭；一九六三年又發動鬥爭「現代修正主義者」。一九六五年至今，更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下，繼續進行「文藝大整風」。據莫斯科電台一九六六年廣播，僅在文革初期，已有「一萬五千多人被送入監獄，並有反毛份子與其家屬兩共五十多萬人被迫下鄉勞改」。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又廣播，「在中共目前大革命中，已有五百萬人被鬥爭清算」。蟲蟻尚知惜生，這豈是人類所能長此忍受！

中共面臨中外歷史覆轍的事象，已展開在眼前：

(一)是知識份子已鼓起共軍抗暴。上述數百萬被整肅的人士中，很多是以前幫助中共推翻國民政府的「功臣」，其未被整肅的同類，乃羣起為抗暴反共的先鋒。他們憫人民痛苦，憤自身被辱，痛斯文將喪的表現，最初是鄙視，不久是嫉視，繼之則為諷刺，現在則為參加反毛行列以反共，最後則必為贊助反共勢力，奮起領導民衆，各以行動反共。而其逐步發展的情勢與其行動的結果，則已由毛派中尚未全失理智的人自己看出，他們把吳晗寫的「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田漢寫的「謝瑶娘」，孟超寫的「李慧娘」，視為「三大毒草」，又把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家村黑店」，認定這幾篇借古諷今文字如果傳播下去，則其影響所及，不但同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可畏，並將「亡黨亡國亡頭」。最使他們深感事態極端嚴重的，尚不止於這批知識份子的倒向民衆方面，並已在軍隊中起了作用。早在文革初期，「解放軍報」不但攻打其黨外文藝家播種的「毒草」，亦同時承認「軍隊文藝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便嚴厲批判攻擊「紅日」「抓壯丁」「逆風千里」「兵臨城下」等軍方作品，並指其總政治部文化部長李逸民、副部長陳其通為「鑽進軍隊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予以整肅。尤其使他感覺切膚之痛的，是知識份子不僅在誘掖民衆反毛反共，並且幫助其軍隊反毛，否則吳晗「海瑞罷官」的歷史劇，就無從獲得彭德懷在八屆六中全會內所散發的反毛文件作為其取材的背景，更不敢在肘腋之下結集筆陣。吳晗是知識份子反毛反共的代表，彭德懷是中共黨幹反毛的代表，馬列教條主義的劉少奇站在背後，成為反毛的首腦，則均為無可掩飾的事實。

(二)是反共民衆已得軍隊合作。截至一九六七年十月止，從各地大字報與「人民日報」等刊出同樣的消息（少數報紙的單獨消息不足信），中而得的直接證據是：是年二月八日「武漢軍區司令員



陳再道，「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竟指使其「二四八部隊紅色造反野戰軍」結合民衆在長江日報上攻擊文革。四月二十九日又號召一百四十萬人，名爲「百萬雄師」，向擁毛派流血武鬥至三百多次，延續至六月二十四日，死傷至一萬八千多人。七月二十日又指使其「八二〇一部隊」與大眾人民，把來自北平的「欽差大臣」謝富治王力毆辱遊街，而在參加行動的民衆手中，又握有各種武器，構成了影響力極大的武漢軍民聯合動作大事件。其繼此而起的同樣行動，已有四川、廣東、貴州、雲南、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浙江、新疆、黑龍江、西藏、北平、上海等三十餘省市，其中以廣州、重慶、北平民衆的行動最爲激烈。七月底廣州附近地區大羣農民奔集市區，參加廣州軍區黃永勝反對紅衛兵時，死傷達五萬人以上，並釋放英德、二水等地「勞改犯」三萬餘人；八月間的重慶民衆，在參加「一二一一部隊」的抗暴行動以後，並燒死活埋大批紅衛兵，且當街火煮紅衛兵人肉。更提心弔膽的則爲發生在臥榻之旁的北平事件，據謝富治五月十四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的報告：「自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日的十一天中發生的武鬥，五十人以上參加的計一百三十三次，總人數達六萬三千五百人以上，死傷達三千多人，活埋者二十八人」。這在稍懂法俄革命歷史的人看，則中共顯已面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那種危急的邊緣，其中都有知識份子的發踪指示，自無待言。

已知的反證是：如果反毛反共沒有遍及大陸各界，就不致被指爲「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並把這各界的力量與「美蔣特務、蘇修特務」並列，要其囉嘍「嚴防」。如果知識份子沒有繼續誘掖民衆反毛反共，就不會受到中共繼續至今的嚴酷整肅。如果民衆沒有因知識份子的誘掖而更反毛反共，中共就不會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革命委員會會議」中決議「發動羣衆、制止武鬥」，

「嚴禁挑撥農民進城武鬥」，且特別強調「武鬥往往是階級敵人挑起的」。如果軍民沒有大規模的行動，就不會在「九、一會議」中決議「更大規模的開展擁軍愛民運動」，並定出「正確處理軍隊和革命羣衆之間關係的總原則」，藉此安撫軍民。如果民衆沒有使用各種軍用武器裝備物資，就不會在同年九月五日發佈「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規定「任何羣衆組織和任何個人，不許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不許搶奪軍火倉庫」，「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船舶上裝載的武器」，並嚴令「一律封存繳還」。正因中共已自知其危險，自知這種行動不僅是幾十個軍事負責人的反毛，而已是許多中下級軍事幹部的反毛，並且是他們蓄意裝備反共民衆的聯合行動，是農民大衆已由使用拳頭、木棍、鐵棒、刀矛，發展爲動用槍砲、手榴彈，甚至毒氣、坦克車，並組織「街道聯防」，設置「戰略村」，建築「武鬥工事」，實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行動，是對尙守崗位的部隊，「直接把矛頭對準人民解放軍」的進攻行動，尤其是已經獲得反共非共國家同情與鼓勵的行動，所以慌忙應付，且警告其幹部要「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要「鎮壓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地、富、反、壞、右，一切反革命的破壞和活動」。

（三）是知識青年已身先民衆造反。青年的問題本不少，今被中共操縱利用的青年，更攪出許多無法解決的新問題，終將成爲顛覆中共的一億四千萬生力軍。四十年來中共只把青年當作工具利用，向未重視青年的需要，已使他們由初期的崇共親共，發展爲仇共反共。自紅衛兵造反以來，益使他們憤抗中共頭目對他們的欺弄，曾被毛酋面稱爲「好戰士」的女中學生宋彬彬，旋即加入中共「中央」高級幹部子弟組織的反毛集團，成爲「反毛悍將」，雖已被判死刑而仍不屈服，這個反毛集團亦未因此嚇倒，是一個最明白的證據。根據中共自己透露的資料以觀，第一、在最基本的思想方面，青年早

經存在的自由主義、風頭主義、享樂主義，已發展爲具體的行動，一如其上海「文匯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的社論中所說，「滋長着一種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有的甚至發展到誰的話都不聽」。第二、在最現實的切身問題方面，早在一九五四年用上山下鄉辦法也沒有解決了的升學問題，至一九五七年無法升學的歷屆畢業生即在湖北漢陽縣立第一中學舉行示威遊行，導發了當時有名的「小匈牙利事件」。演變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更全部停課，學生變成到處造反的紅衛兵。現雖強迫復課，但都已如北平「二十三中學革命委員會」在年同十月二十七日所說，「有的同學認爲目前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針方法，還沒有批深批透，部份老師也說舊的破了，新的還沒有建立起來，課怎麼上呢？因此部份師生有等待思想。」同日的「光明日報」更說，「老師普遍不敢下班講課，有的同學也責備老師落後保守，大部份同學總喜歡到外面去跑，感到復課鬧革命沒意思，不自由。」加以招生既重視階級成份，復課又側重軍事訓練，並以「毛語錄」爲第一教材，就愈使大批青年加重失學之苦。第三、與升學問題相關連的就業問題，同樣是中共的老問題，雖早已驅使他們上山下鄉支邊，總是逼得怒氣沖天。及大躍進後經濟蕭條，大革命中游蕩成習，更弄成如「人民日報」在同年七月八日的社論中所說，「大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離開生產崗位，湧向城市」，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第四、青年最感苦惱的婚姻問題，由於中共長期榨取青年的勞動力，與爲了減少人口膨脹的壓力，普遍推行晚婚，並以階級成份等政治條件限制青年結婚；已結婚的亦因中共故意分派夫婦在兩地工作，不能經常同居，復因收入微薄無法維持家庭生活，促成青年仇共反仇的激情。

中共以前尚能運用「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等各類組織，作爲控制領導青年的核心，但自「文革」以來，核心已經傷亡，原有的各種組織已停止活動，紅衛兵的組織亦無明確規定，造成

派系林立，行動散亂，各自鬥爭，互相矛盾的情勢，彷彿二千萬隻破窠的狂蜂，爭向各地亂飛亂刺。這爲數僅佔全國青年七分之一的紅衛兵青少年，如此猖狂，已激起七分之六的一般青年厭恨。加以中共一貫執行所謂階級路線，對於所謂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無論升學就業，較之所謂紅五類均被歧視，又加深了青年父兄反共的意志。尤其是紅衛兵青少年從事鬥爭纔一年餘，已鬥毀了許多中共高階層「官員」，他們不僅學會了怎樣鬥爭，也瞭解了鬥爭的方向，一向追求個人自由幸福的意識，逐漸進入反奴役反迫害反共產的步驟，行動雖尙凌亂，但其走在民衆前面的反共工作，已有許多間接直接的表現。而其目前所表現的破壞組織、攻擊頭目、種種無政府狀態，尤與十九世紀中葉俄國青年所組織的虛無黨相類，其結果將不但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的被刺，亦必將如俄國青年那樣的成爲革命的先驅，此點實最是中共的致命傷。

（四）是中共黨幹已反共。劉少奇派的反毛，尙祇是中共黨內派系的權力之爭，未必遽能動搖其黨的基础，而其黨內各級幹部已有不少人從反毛而進於反共，則其致命傷的嚴重，實猶過於青年的反共。青年與各界民衆雖已反共，如果各種各級的統治機構尙健全，仍有鎮懾收拾的力量，可是所有統治機構都已癱瘓。截至一九六七年秋季止，其黨的中委與候補中委一百七十二人（原一九五人，死亡二三人）中，已先後被整肅了一百二十人。地方的六個「中央局」中，已有五個被鬥。二十八省市區黨委中，已有二十二省的「第一書記」被鬥。在其「國務院」的十六名副總理中，已有八名被整肅，四名被批判。四十九個部會及三十個直屬機關中，已有二十七個「部長」級幹部被鬥。二十八個省市區「政府」中，亦只有七省市的權被奪回。在其軍事機關的十個「元帥」中，又只有林彪一人未被鬥爭。統治系統既如此殘廢，如何不導致全局混亂；而其混亂情勢，則已被英國記者舉出數端，如

英國「星期電訊報」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刊出康斯坦（Stephen Constant）的專文中說：「中共官方報紙首次承認勞工階級已分裂為兩個極端對立的陣營」，「中共情勢混亂，誰也不能分辨那些命令究係劉少奇抑或毛澤東所發」。英國「觀察報」於同年十月一日刊載英國記者布洛華斯（Dennis Bloodworth）發自香港的通訊中說，「中國大陸四十個主要城市，陷於與廣州相似的混亂情勢。十九個學生與工人的革命集團，彼此互相攻擊劫掠，每個集團均號稱代表毛澤東的真正思想。」混亂是土崩加上瓦解的現象，各級黨幹的被整治，則為內部瓦解的結果，黨幹反毛反共，則為造成黨外土崩黨內瓦解的因素，內外情勢既如此嚴重，已非較溫和的「大批判」，綑帶式的「三結合」，夢想般的「重建黨國」所能挽救。

且按之歷史，人性既已復活，知識份子既已無可再忍，文化傳統的三民主義既已大伸其感召作用，即使毛酋下詔罪己，亦已無從為力。僅就毛共自己所公開發表的供詞，已可瞭解其黨幹反共天良復活的一斑，它指責其幹部的罪狀是，「把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說成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幟」，「如果說是實行三民主義，人家都不怕，說是實現中共的最低綱領，人家就要害怕」，「把蔣介石作為革命的旗幟」，「為國民黨軍隊的忠勇愛民歌功頌德立傳樹碑」，這正是其幹部人性復活與三民主義呼喚的鐵證。中國知識份子向有一種極可貴的德性，便是「士可殺，不可辱」。中共在十年前的整肅，尚可略收淨化內部之效，因其刀鋒尚有範圍，鋒毒亦較輕微，此次的大革命大整肅，則已漫無限止，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與知識份子為敵的暴君尤為瘋狂殘酷，其幹部的知識品德雖不盡高，但終未完全泯沒其良知良能，多少尚殘餘中國文化傳統的士習，而毛婆江青竟指使頑童紅衛兵亂用公審、貼報、遊街、戴紙帽、挂紙條、磕響頭，和澆、燙、燒、

吊、踩、刺、剝、跪各種刑罰，橫施辱害，已比秦始皇的坑儒焚書更爲難受，如何不紛起反抗？

滿清政府傾覆的過程，尤其是中共敗亡的例證。清廷最後十年間政治的敗壞，人民的仇恨，國際的嫉視，尙不及中共今日之甚，但終因知識份子逐步離異，參加戊戌維新者離異於前，參加國民革命者又爭集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遂致武昌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四月，就結束了它二百六十年的統治。中共竊國十九年，迄未得人民擁護，而其屠殺囚奴役民衆與其殘辱知識份子數量之鉅，又爲清季所未有。其誘脅紅衛兵外仇列國內攻軍民的暴行，亦遠過於義和團。其經濟的破產，民生的慘苦，持與辛亥年前相比，則清季猶在天上。即使毛酋的奸狠過於西后那拉氏，尙能制劉少奇於一時，但劉的徒黨決非其能草薙禽獮。即使其敢於斃劉，一如那拉氏的謀斃清帝載湉，但其死亡亦將如那拉氏的僅在朝夕之間。又即使劉系獲勝，但由於民已反共，軍復分裂，知識份子更圖斬草除根，爲民除害，亦將如蘇俄三月革命時的克倫斯基政府，不及十月即被推翻。何況繼續推翻中共不達目標不止者，仍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及一九二八年推翻軍閥政府、一貫相承的正大力量，顯比鼠竊狗盜的列寧史達林力量光明健強的多。

總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是歷史的定律，無可改變，是上帝的意旨，無可抗拒。詹森總統如真能從這方面努力，則向視民意嚮背爲政權存亡標準的美國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必能從根改變他們對中共的觀點。

二三、認清中共軍隊倒戈的事實及其結局：詹森政府尤須使人民都了解：民主國家政權的轉變決定於民意，共產國家則經常依靠軍隊拱衛政權鎮壓民變，中共更是如此。可是中共的軍隊現在已經公然支援民變了，中共的各種權力現在又顯然因彼此爭奪而反落到軍人手中了。中共軍隊的倒

戈，原非始於今日，在距今十五年前，它們已經開始動搖，所以在此時期即有整肅「以高崗饒漱石爲首的反黨聯盟」之舉，一九五九年又有整肅「以彭德懷黃克誠爲首的反黨集團」之役，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者發動第三次鬥爭，只是對付軍隊反叛的最後掙扎。

若再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前已有的各種資料中看，更可確知其軍人倒戈範圍的廣大。如（一）在其最高軍政機構的「中央軍委」方面，十名副主席中已有五名背變，否則賀龍徐向前陳毅的職位不會被剝奪，葉劍英不會被批判，羅瑞卿不會被鬥爭。如（二）在其最高軍令機構的「總參謀部」方面，大部份高層人員已經背變，否則該部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副總參謀長楊勇張愛萍，動員部部長傅秋濤，副部長曹裕光，軍事訓練部部長張翼翔，副部長彭思陸任達真，作戰部部長王尙榮，副部長雷英夫，供應部部長萬毅，軍務部部長王光華就不會被整肅。如（三）在其軍隊政訓機構的「總政治部」方面，許多主要人員已經背變，否則該部的主任蕭華，副主任劉志堅梁心業，祕書長白文華，文化部部長李逸民、副部長陳其通李偉，保衛部部長史進前，青年部部長章國治，副部長蕭麥萍，組織部部長劉其人，幹部副部長朱先等就不會被整肅。如（四）在其「總後勤部」方面，亦已有不少幹部背變，否則該部的副部長唐天際周能全張賢得張令彬，政委李正奎、副政委饒正錫李躍等就不會被整肅。如（五）在其各種部隊方面，亦都有不少人背變，否則在其海軍中就不會有副司令員劉震成鈞、政委余立金及瀋陽軍區政委黃立清等被整肅。在其裝甲兵中就不會有司令員許光進副司令員張文舟及政委黃志勇等被整肅。在其鐵道兵中，就不會有司令員李壽軒副司令員郭洪濤副政委王集成及參謀長何輝燕等被整肅。在其砲兵中就不會有司令員吳克華副司令員趙章成及政委陳仁麟等被整肅。在其工程兵中就不會有副司令

員譚友林及政委譚甫仁等被整肅。在其通信兵中就不會有辦公廳主任江文等被整肅。在其高射砲兵中就不會有司令員楊毅方副政委王煇球等被整肅。在其公安部隊中就不會有副司令員吳烈，政治部主任歐陽平及副主任馬星五等被整肅。如（六）在其「中央軍委會」直轄的十三個大軍區與直屬軍區中，因背變而被整肅的人數亦很多：在「北京軍區」中已有司令員楊勇副司令員鍾偉及政治部主任吳岱、後勤部部長吳先恩、天津警備司令員朱彪等。在「內蒙軍區」中已有司令員烏蘭夫副司令員劉昌孔飛等。在「瀋陽軍區」中已有司令員陳錫聯及第一政委宋任窮等。在「南京軍區」中已有司令員許世友及政委唐亮副政委賴毅等。在「福州軍區」中已有第一政委葉飛等。在「廣州軍區」中已有司令員黃永勝副政委孫正乾及政治部主任王蘭西等。在「武漢軍區」中已有司令員陳再道及政委王任重等。在「蘭州軍區」中已有司令員張達志副司令員楊家瑞及第一政委劉瀾濤等。在「新疆軍區」中已有司令員王恩茂副司令丁盛及生產建設國政委裴周玉等。在「成都軍區」中已有司令員黃新廷副司令員李文清及第一政委李井泉第三政委郭林祥等。在「西藏軍區」中已有司令員張國華（後調成都）等。在「昆明軍區」中已有司令員秦基偉副司令員王啓明等。

以上被整肅批判的背變軍人，由最高統御指揮機構至各基層戰鬥部隊併合統計，剔除兼職的人以後，已達一百零八名，恰與梁山泊造反的「一百零八將」之數相符，所不同的是，梁山泊大盜是反貪官污吏，他們是反毛反共。

不但如此，反毛反共情勢的嚴重及其無法克服的窘狀，並可在外國記者的報導與其慌急的應變中可以看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華盛頓明星報刊出其記者克姆萊（Ray Cromley）的報導，與同年十月十日莫斯科電台統計相同的廣播都說：「在中共三百一十一名高級軍事指揮官中，僅有四十七



名表示支持毛澤東，省級司令員支持毛林派的不到百分之十。其餘的不是反毛就是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同年十月十五日「朝日新聞」記者發自北平的報導又說，「自武漢軍區司令率領八二〇一部隊百萬雄師反叛中共中央以後，昆明軍區與雲南軍區對立，重慶警備區的火併，江西六〇一一部隊與六八一〇部隊的衝突，以及廣州四三軍與林彪直系部隊四七軍的開火，都給毛林派帶來隱憂，在十三個直轄軍區中，未被指名爲反毛的軍區司令官，僅有三個軍區，」則毛林孤立與共軍變色的嚴重程度，已很明顯。

至其慌急應變而變將更烈的事實與趨勢，亦可在其大調部隊這一點上看出。從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林曾大規模調動部隊，被調動的有二十一個軍的番號，另外還有一個獨立師與一個不明番號的師，全部相當於三十四個師，估計在四十萬人左右。最爲突出的是，一向不調動的海防邊防部隊，也調換了約十三個師。其軍隊調動的地區，包括了江蘇、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廣西、廣東、貴州、雲南、浙江、江西、山西、山東、福建、吉林、旅大、寧夏、青海、察哈爾、綏遠、海南、西藏、南京、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二十七個省市及邊區，若非反毛反共勢力極大，則何須如此勞師動衆、趕調嫡系控制北平天津及外圍地區？又若非部隊亦不盡可靠，更何須如此調防，將有問題的部隊迫離原駐地，並派嫡系部隊就近監視？例如第一軍第一師爲賀龍的親信部隊，將有異動，便把它由洛陽調至信陽，另派兩師調駐礄山，就近監視。這些被調動的部隊，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不可能返回原防，而文化大革命的永遠不能勝利，即永遠不能結束，則均爲勢所必然，此爲憂懼中共介入越戰者最應予以正視的一個事實，同時亦爲他們痛號「亡黨亡頭」的由來。

再從其由文藝性的批判吳晗開始，然後進入政治性的「文化大革命，」再進入「軍中文革，」這

一由源及流的過程方面看，更可明瞭其軍人已由文人筆桿與民衆心弦的共鳴而爭自成爲民衆友軍的事實，如「北京市長」彭真竟敢在「輦轂之下」反對文藝整風，並搞毛派所謂「二月反革命軍事政變」，便是最具體的例證。尤其是高級頭目劉少奇羅瑞卿賀龍鄧小平等在發動這二月事變前，曾與中南、西南、西北三個「中央局」的軍政重要人物成立「攻守同盟」協議，造成各軍事機關各部隊中背變的一二等頭目已超過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更是質變量變、上下交變最清楚的事實。若非他們已有民衆爲後盾，就不會如此勇決。若非參與事變密議的康生效法袁世凱向西后那拉氏密告「戊戌政變」的故事，向毛酋出賣情報，則毛酋已倒，民情更爲振奮。

尤須看清的，若非毛劉都知中共本身已到軍民共憤的沒落階段，就不會除對權力作殘棋急劫之爭以外，並都現出「病急各找醫」的情態。然亦正由於毛只想用中醫春藥式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造反」來強神，劉則想暫用西醫綑帶式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以止血，就爭的更加激烈，縱明知其危險而亦欲罷不能了。情節亦異常明顯，一則劉毛即使都失權，黨尚存在，又何必不斷哀號「亡黨」？二則當權派並未失權，被毛派在各省市中奪回的權不但爲數有限，並正如華盛頓明星報記者克姆萊的報導「這些整肅、大部份僅是具文，大多數被整肅的軍官拒絕去職，」又何必怕「二月兵變」如果傳開，將更動搖軍心加強民變，便歪曲掩飾這一事象的基本性質，而避重就輕地僅說爲「黨內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復辟」？三則當權派根本沒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只是爲了巴結民衆，鞏固權力，做出一些市惠於民的事，使毛更被困，而並未放棄其共黨思想路線的基本目的，亦無須怕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且反毛派如果真正爲民，即使不在二月間搞軍事政變，人民亦早會饑不擇食地「爲劉氏者左袒。」原因是大陸人民處境正如劉邦所說「吾民苦秦法久矣」，從一九五一年中共

壓迫文藝界走「毛澤東文藝路線」起，知識份子即已開始不滿，從一九五二年向實業界厲行「三反」「五反」起，社會即已憤怒，從一九五四年整肅「高饒事件」起，軍隊即已危疑，從一九五八年「三面紅旗」破碎起，大陸各界人民與共產黨各級幹部更看透中共舉行的弱點，如果反毛派真是爲民而不是爲己，則民衆早已爭集麾下，何致用力多而成功少？既已雙方都在亂扯亂鬥，則性子最急的軍人與痛苦最深的民衆，終必無可再忍，聯合捲起漫天的暴風雨，實爲必然之勢。

必然捲起暴風雨的主客觀因素，約計有十二端：一是中共軍隊聽慣了中外革命的事，就都有革命興趣，紅衛兵尙可造反，他們自然感覺更有力造反。二是他們聽慣了「一切爲人民」的宣傳，但十多年來的事實絕非如此，自會由此日益滋長輕視命令紀律的心理，逐漸自由行動。三是他們既知人民被奴役屠殺的事實，終必會根據其「人民解放軍」的名義，採取解放人民的行動。四是他們既吃苦冒險爲中共打下江山後，總認爲可以稍享安樂，但事實則不斷驅迫他們向西藏印度韓國越南作戰，並要他們準備世界革命，縱使消滅一半人口亦所不惜，勢必迫使他们死中求生，各爲亡秦的吳廣陳涉。五是他們朝夜不得休息，既要上操，又要聽訓，更要學習，已經苦極，復要他們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執行「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等任務，反招人民厭惡，自必另謀出路。六是無論何派軍人都不斷鬥爭中受到直接間接的恐怖威脅，迄無一日寧息，一遇機會自必盡情發洩，以舒散其精神上的緊張，或報復其平日所受的鞭斥。七是他們耳濡目染中共各級頭目說謊使詐、反覆無常的伎倆多年，各派正在紛爭，自是他們一試身手的好機會，毛已命令軍隊支持其鬥爭，而仍未奪回多少權，便是他們都已學會了「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的反映。八是各軍本有派系，因介入奪權而更分裂，尤因後起的林彪忽居國防部長的高位而更立異。「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一野、二野、三野軍對四野軍的嫉

視，尙祇是變化的開端。九是從一九六〇年整肅彭德懷黃克誠以後，向爲他們權力骨幹的「湘西老幹部」既不存在，新幹部即失去重心，便於反側。十足武漢居全國形勝，爲易進取而難保守的戰略地區，並是林彪的基本地盤，如此重地尙能發生七月兵變，自必給予各部隊以極大的鼓勵，將在此地重演辛亥革命的歷史劇。十一月以後反毛反共軍民在廣州湖南福建湖北四川甘肅青海山東新疆西藏黑龍江等處廣及二十六省市第二回合的反攻，不但都很激烈，並都以破壞交通爲戰略，顯已成爲內戰蔓延的前奏，更是辛亥革命形勢已成的事實表現。十一是毛劉互鬥已過二年未分勝負的事實，具有極大的啓示作用，足使未參加的部隊看透雙方勢力不過如此，今後並更削弱，由此爭圖稱雄，先求保存實力，再事發展權勢。十二是中共的黨政系統固已分崩離析，卽專爲整肅軍隊而設立的「軍中文革小組」，亦因主持其事者各懷怨憤同情軍隊均被撤職，例如以劉志堅爲第一任組長，而不久劉卽以「破壞軍中文革」被黜，委任徐向前爲第二任組長，而不及半月徐又以「推行軍中文革不力」而被革，再改任蕭華、楊成武、謝富治三人共同負責，蕭雖爲林彪親信嫡系，並爲實際負責人，亦終被指爲「縱容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反毛活動」而使之去職，副組長三人亦同遭整肅。其後雖改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爲組長，總後勤部部长邱會作與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及林彪之妻葉琴爲副組長，並由江青加緊督導，則不但如中國舊小說「金瓶梅」描述土豪惡吏西門慶的老婆吳月娘所說的「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並且早經爭吵，江青要林彪的軍隊「支左」，林則以江的紅衛兵必須接受「軍管」「軍訓」爲條件。如此衆叛親離，無人可信，自必土崩瓦解，無從收拾。正如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Joseph Alsop）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長島新聞」發表的專文所說，「路易十四晚年，其情婦棉登嫩與私生子棉英，用盡全力，以保存他們得自路易十四的權力，並取得遺囑，但路易尙未死，遺囑卽已毀，何

況毛澤東更無路易緊握的絕對權力，則毛江倆的下場可知」。

凡此十二端，都已大於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所遭遇的危險。袁恃北洋軍力攫取政權，最後亦因北洋軍力的背離而倒斃。北洋軍人既知其力足以倒袁，亦即由此認其勢力足以自雄，於是割據中國，互爭雄長，而其最後亦即盡被消滅於「武力與國民結合」的國民革命軍之手。袁的資歷才望既比毛劉略勝一籌，而其政治亦比中共的殘暴為稍佳，即其恢復的帝制亦未全悖於革除未久的中國歷史傳統，不像今日中共本質及其一切所為的絕對與傳統不合，但尙因軍隊背離及與民主潮流衝突而倒斃於國民革命的潛力之下。北洋軍閥的奸狠自不及毛劉，但其中下級將士無革命的野心，無「學習」的勞瘁，無參加民間工作的麻煩，無憂憤家人親友橫被壓迫的需要，無遠征異域的危險，無遭遇核彈消滅的可能，一切均勝於共軍，然仍不能維持各軍閥於不亡，則中共更靠什麼？且北洋政府雖無力統治內部，但尙未開罪外邦，更未像紅衛兵的會對四十多個國家的使館發動攻擊，然尙不能自存，則中共怎能不亡？特別是當年各軍閥除極少數人外，其出身與行為並不同於流寇，都有幾分軍人氣息，亦有幾分好漢義氣。中共則是十足的流寇性質，自一月二十三日准許軍隊介入奪權鬥爭以後，就更露出流寇自相火併的本色，二月一日的「新華報」及紅衛兵大字報都已自供，紛起的「榮復軍」「戰備團」「八八團」「赤衛隊」「中國工農紅旗軍」「聯合行動委員會」，都會「砲打無產階級的革命司令部，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又都各自發出命令高喊團結，以對抗並混淆北平頭目的要求團結，弄得出動鎮壓的部隊與隊部之間，各難辨別對方究竟站在什麼立場，幾如越南的游擊戰爭，到處無敵人而又到處有敵人，如此混戰到七月底，已有十二省市的部份軍隊反毛，並有不少地區的軍人參加反共，林彪能控制的部隊，只有全部的四分之一。如此現象，顯然出於流寇的本質，稱為「軍隊叛變」，實仍不合邏輯。

依此本質與現象的發展，即使毛劉兩派都運用「修正主義」盡力修正其流寇行爲，但已不能改變軍閥割據的形勢及其敗亡的覆轍。事實是軍隊已取得實際控制大陸之權，由北平到各地，由行政機關到生產機關，由各工廠到田野到學校，都是軍隊在活動，既把十九年來賴以相安無事的「以黨統軍，軍隊不得控制黨」的桎梏砸碎，而讓虎兇到處據山爲王，又如何能使之再返樊籠？其已有的證據是，自軍隊介入鬥爭以後，凡衝突劇烈地區中反擊力較大的，並非劉派的反撲，而是復員職業軍人與現役軍人聯合工農羣衆掀起的反共怒潮。這股勢力，決無其他力量能予制止，其結果必然是各自割據，形成隋末民初的局面。其旁證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封建勢力既未革除，軍人且成爲政府的骨幹，憲法並規定軍部享有特殊權力，完全不受內閣的節制，而復興升爲貴族的封建地主携手控制全國的經濟，及戰勝中俄兩國以後，軍閥的聲望氣焰更爲之增高，在演成九一八的瀋陽事變以後，其氣勢愈益猖獗，所有駐德駐俄駐美駐「滿洲國」的大使，都由海陸軍將領出任，不但把內政一把抓，並包辦了外交，終於演成包圍首相官邸及政府機構，槍殺大臣的二二六政變，直至黷武於海外，被敗於盟軍而始結束。現階段中共軍人的勢力，既與戰勝中俄兩國以前的日本軍閥情況相似，雖無暇亦實無力敢向外逞雄，但其對內的行動，決難脫離二二六政變的範疇，而毛劉林周諸宿的將爲日本宮內大臣佐藤、大藏大臣高橋、元老重臣犬養、幣原等人之續，及日本全國淪亡之繼，亦均爲必然的歸宿。而其歸宿的過程，則亦已有例證存在：毛派所指的「黑色」部隊，既已公開幫助人民攻打其部隊與紅衛兵，是其情形已似距今五十二年前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北洋軍人。其中較和緩的灰色部隊，又正同於距今六十八年前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的保境安民，不理西后與義和團的亂幹。其變成黑色的結果，當然同於青天白日軍旗的取代五色國旗，而其變成灰色的結果，亦必然步入五色國

旗取代黃龍旗的末路，這都是歷史發展的定律。

詹森政府如能把上述中共政權全靠軍隊維持而今軍隊已大部份背變的事實，及其今後發展的趨勢與結局，向人民清楚說明，則人民必將共認爲中共能够存在的時日實已無多，而誤認中共終可與民主國家共存的說法，更是廢話，此不但有利於美國亞洲政策的進行，亦爲加強國民常識教育所必需。

二四、中共絕對不敢同時在南北東內四條戰線上作戰：詹森政府應根據上述中共危亡的情勢，使美國人都了解：中共所謂「槍桿子裏出政權」保政權甚至擴大政權的兵力，儘管近三百萬，却絕對不够分配在南防美，北防俄，東防中華民國，內鎮壓大陸人民四條戰線方面。其全部兵力如果分駐在北東南三條邊境戰線上，則廣大的內地即見虛弱，華美空軍如直擊其軟腹，或僅作游擊式的擾亂，則三條戰線均將發生動搖。北線破，則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即不能保，該地區的人民必將受蘇俄的策動，羣起倒共，中共頭目臨境的危險，必百倍於倉皇出走的西太后。劉少奇的下場也就如光緒的珍妃。東線破，則長江流域人民響應中華民國反攻的聲勢之大，絕非數字所能統計。南線破，則珠江流域岌岌震動。且北東南三戰線只須一線敗潰，其他兩線勢必在民心政治軍事各方面發生連鎖反應。此時號稱百萬的公安部隊，即使盡皆效命，亦決不能安定內地，使其出戰部隊絕無後顧之憂。何況自「文革」以後，軍權即不統一，民心尤爲怨憤，已非三數年前尚能指揮如意的情勢可比。

這些內憂外患，中共未嘗不知，亦未嘗不防，但其各種預防的計劃，反成爲加速敗亡的措施。如（一），盡力發展核子武力，企圖變弱點爲強點，結果則反使俄美側目，各圖動手。如（二），發動紅衛兵運動，企圖用其聲勢，內制反側，外威俄美，結果則自毀統治體系，形成自殺。如（三），多方建築坑道工事，將重要的國防工業建設在山嶽地帶，企圖躲避敵人海空軍的擊滅，結果則民力已竭，

民怨深烈，用以避敵的地下長城，變成焚毀自身的定時炸彈。如（四），用人民戰爭恐嚇敵人，企圖美俄相戒失色，結果則民非逃亡，即起抗暴，美俄亦都不爲其所欺。如（五），利用越戰牽制消耗美國兵力，企圖使美軍無力從南線進攻，此雖已收效於過去，但決不能長此箝制美國的行動於日後。如（六），叫囂美國如讓台灣進攻大陸，彼即大舉介入越戰，企圖由此發生嚇阻作用，結果則暴露其最懼國軍反攻的心理，此種色厲情怯的真相，終必爲美國所利用。

中共一切防患的措施既已自暴其爲最易擊破的弱點，如果決心力攻其所必畏，彼即自覺其不能敵，決不敢妄動一步。所謂力攻，是全力進攻，尤其是助中華民國全力進攻。要是僅用政治性擾亂性的小兵力進攻，則無論進攻其那一線，不但它都能擊退，並反使其各派系趨於團結，此則決非其所畏，而反爲其所利。如果僅以強大的陸海空軍作傳統性的進攻，而缺乏後續部隊的支援，並缺乏取得全勝的決心，它將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予以切斷殲滅，而決不在第一線決戰，此則越戰已吃其苦，必須注意改正。如果以壓倒性的陸海空軍進攻，所有新兵器一齊出籠，則其戰線立即破毀，雖欲後退而已不盡可能。如果毅然以核子武器與飛彈突然進攻，直接消滅其國防實力，間接瓦解其部隊鬥志，然後再用空降裝甲部隊楔進其重要戰線，用地面部隊佔領其戰略據點，則其除採用游擊戰外，所有戰線已不存在。但動用核子武器，既非美國所願爲，亦非中國大陸人民之福，事實上亦無此必要。且動用中華民國的部隊，其迅捷破敵的效力，亦堪與核子武器相等。

事實是，現階段中共固怕美軍進攻北越，更怕中華民國部隊進攻大陸，如果華美兩國同時進軍，則其佈置在北方漫長邊境防俄的兵力，已居於一對二的劣勢，決不敢抽調至東線南線。而中華民國對大陸的進軍，又顯比美軍直搗北越爲易，只要在空軍掩護、陸海軍奮擊之下，獲得幾處據點，大陸人民



即會響應，決非它百萬的公安部隊或兒戲的紅衛兵所能彈壓。它即使節節抵抗，企圖待國軍深入後予以聚殲，但處境並非孤立的國軍，顯不同於二十餘年前侵略中國的日軍，勢必能逐層突破其各地的防線。又即使其化整爲零，改用游擊戰以困我，但其據點已各個動搖，游擊兵更無人民掩護，至多只能回到其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地步，成爲流寇式的掙扎，圍剿流寇則中國軍隊早有成功的紀錄，亦比美軍爲擅長。又即使悉索敝賦，孤注一擲，轉向國外開闢戰場，以分散敵人的兵力，或竟把戰場移向俄境，外以迎合美國的心理，內以迎合中國人民的希望，則其軍隊已由其自己教導叛變，人民更欲與之偕亡，決不敢調走其保衛自身的極少數部隊到國外去闖禍，何況美國不爲其所給，俄軍更易截破其長逾萬里的北方戰線。又即使鋌而走險，動用其核子武力，以求一逞，但其設在蘭州包頭的核子主要工廠，必被蘇俄就近摧毀，蘇俄倘再用高速的特別設備，運送兩師兵力進攻新疆青海寧夏，彼更無力攔擊。在這盡是死路之下，它如龜縮蟄伏，則大陸人民更知其無能爲力，更必蠢起摧枯拉朽。且此種情勢，彼亦早已看清，尤其看清蘇俄比美國更可怕，大陸民衆比蘇俄更可怕，故急事清敵於內，嚇敵於外，演出極愚蠢亦並無他途可走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造反這一幕悲劇。

因此，只要瞭解中共本無可畏，彼且正在畏美，尤深畏忌中華民國，只須美國不自畏，善於利用中華民國特優的政治條件，助中華民國向大陸投入七至九個軍，則其力量將比美國在南線上投入同等的兵力大過二倍。美軍如配合進攻於南，則國軍從東線攻入的這份力量，更將大於南線美軍至三倍以上。美國與其在越南頭頂石臼唱戲，陸軍準備由現在的四十餘萬人加至五十萬人以上，海軍第七艦隊自現在的一二五艘加至一七〇艘以上，空軍亦加強攻擊及運輸力量，以防中共介入越戰，另增加海軍陸戰隊，以作游擊戰之用，並加強阿拉斯加空軍基地，以防蘇俄從北面進攻，這樣的到處忙於佈畫，

而仍無勝利可必，何如將對付越共防備中共增加的三軍兵力，移出其中所需的裝備物資軍費，改助中華民國直接進攻中共，攻其所最畏，擊其所必救，其結果不但能使其不敢出一兵一卒於北越，並可使其由此覆亡。倘認為這全是書生的紙上談兵，甚至認為這僅是中國人的自己打算，那麼我可以同莎士比亞名著「暴風雨」中樞密大臣剛則婁（Conrado）那樣，提出「五倍索償」的事例，除對今日的「那不勒斯國王阿龍索（Alonso）」白宮主人，高呼「陛下，不用怕」外，並敢立約打賭。

二五、論斷制毛無須聯俄，亦不可聯俄：詹森政府亦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美國所以陷入越戰的僵局，係成於不便決定如何應中俄共問題的困局，困惑如冰釋，僵勢即紐解。此所謂不便，則非由於政府的不知與不能，而是由於人民尚未辨識利害得失，政府未便擅主，亦未便明言。從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之日起，美國人在危疑震撼之下，已發生分化中俄共的構想，及中俄共衝突日烈，更徘徊於聯俄制毛或聯毛制俄兩條路線之上。其中坐觀虎鬥，準備不勞而獲者，亦大有人在。這從久與中俄共周旋的中國人看去，都是白費心機。若從今日形勢看去，這已不是聯誰制誰的問題，而是如何憑己智勇，乘勢攻弱的問題，亦即是已被比人強的形勢決定了的問題。

形勢已顯然，制毛無須聯俄。事實是由於中共各方重視奪取政權，已使軍力崩離，並已使其具有特殊動員效率之黨的統軍力量，不能復振。而其以紅衛兵發動人海侵略的謀略，即使勉強重現，但其結果的險惡，將較當年希特勒以黨衛軍取代參謀本部指揮權，致無力抗擊俄軍更甚。又即使無此自毀的一幕，而其正規軍與民軍，均遠非美軍之敵，則更無待複述。

若就蘇俄本身需要方面看，它正想美國助它制毛，因為它怕毛酋篡奪其共產國際領導權，尚在其次，它覺得已經禍在目前的，是中共迎頭趕上的核武力，又特別置在中國北方的核子庫，顯然是給西

伯利亞與中央亞細亞地區一個極嚴重的威脅，決不像遠處在西半球的美國那樣安全，這在其第六次氫彈爆炸以後，更爲敏感。但如白自己直接動手，定遭共產國家攻擊，如由美國發難，正是求之不得，美國如放過北越，逕攻中國大陸，推倒毛酋，並聲明其目的僅在維持亞洲的和平，它亦即不會反對。這種情勢，在中共氫彈爆炸以前，尙不清楚，今則已如指諸掌，亦如見其肺肝。即令其因懼美國勢力伸入中國大陸之故，乘毛將被擊倒之前，扶植親俄派以與美國抗衡，或別向他處動作，以牽制美國長驅直入之勢，但其前一行動，勢將被阻於中國人向恨俄而不恨美的民族力量。其後一行動如指向歐洲，則西德的勢力已不可侮，必先乘機以規復德國的統一。法亦非易與，戴高樂與中共建交，即在加強中共牽制蘇俄的力量於東方，期減少其雄長歐洲的阻力；而其同時親俄的作用，則在分化美歐關係，遂行其自爲歐洲盟主的雄圖，殊無進一步親俄交毛疏美的可能；故俄如侵歐，法必立即感覺其政策遭受打擊，必不顧德法世仇，而將立予還擊。英則因經濟關係，無論其願不願向歐洲共同市場投降，總必倚美支助；而其懼俄親美的傳統情感，且至今愈濃，必不會坐視俄在歐洲的所爲。至於東歐各國，雖標榜共產，然因現行經濟制度的失效，正走狄托路線，它們不願一惟蘇俄的馬首是瞻，亦意中事。這些客觀的情勢，蘇俄豈有不知而反冒險前進之理？其行動的箭頭如指向亞洲，則日本的不可侮，亦如西德，而其向與俄爲世讎，決不會坐視蘇俄勢力再度進入滿蒙重地，致又受嚴重威脅，更無待說。南韓軍隊的强悍善戰，則已表現於越南。且聯合國駐韓部隊未撤，俄如助北韓蠢動，是動天下之兵也，寧能無所顧慮。倘加強援越，則又與中共利害衝突，將更受阻於中共。何況俄之重兵仍在歐洲，調用於千里以外的東方，仍如二次大戰末期，頂快亦須四個月，豈無東不濟急，西有後顧之憂？俄如圖奪取石油產地的中東，則向奉回教的許多國家，固不願共產教滲污其聖地，而猶太教的以色列

更非易與，尤其歐美決不願聽俄所爲。何況蘇俄國內的鴿派勢力與其人民的急謀改善生活，富權派決不能無所顧慮。像這些外在的形勢，內在的牽掣，深算如俄，將不會明知故犯。

蘇俄更有一種傳統的軍事政策，極便利於美國的決策與行動，便是不爲天下先的戰略思想。其例證是：俄自一七八三年兼併其國境的西南部克里米亞作爲黑海艦隊要港以後，總想擴充其勢力於土耳其，在百年之內即引起兩次俄土戰爭，在第一次戰爭中，即大受英法兩國之圍攻，黑海既被中立，土耳其又從此加入歐洲方面，經此失敗的教訓，已對國際事務不敢輕於發難。其後再經一九〇四年對日戰爭的大失敗，就由此確定其以投機代發難的策略。十月革命的成功，即得力於投機，革命以後的外交軍事，更是循此策略取勝。其初與德媾和，破壞協約國的共同關係，以渡過其被英法日聯合國困的難關。其繼則看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的目的，不但在侵華亦在防共，即聲明對滿洲問題採取不干涉主義，一以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一以促成有利於已的中日戰爭。其後又利用中日大戰的機會，盡力培植中共，使它成爲蘇俄日後對日本的擋箭牌，及侵略亞洲的急先鋒。歐戰發生後，深怕希特勒首先揮出反共之師，即於一九三九年秋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使德安心西進，使英法與德互相消耗其反共之力。一九四一年夏，德既敗法，即圖攻俄，即又急與日本簽訂中立友好密約，藉以避免兩面作戰的危險。二次大戰後，中共攫取大陸，形成俄美衝突之勢，即又力助中共發展軍備，建立核子武力，使中共站在威脅民主國家的第一線，使自己退入第二線。及毛酋反俄，即一面高彈和平共存之曲，引誘民主國家不再與己爲敵，一面擴大渲染毛酋不兩立的形勢，使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敢於制裁毛酋，代替蘇俄打第一仗。五十年來蘇俄不打第一次的軍事政策，既無往不利，則其今日對於一切均居優勢的美國，自更不敢先將虎鬚，美國如對中共有所行動，蘇俄即作壁上觀，大有可能。

蘇俄尚有一種特殊的共黨戰術，同樣便利於美國的決策行動，那便是不走直線的戰術。此種戰術的特點，只要一比法西斯黨的作法，就軒輊呈露。尚極權，好侵略，是法西斯與共黨相同之點。而其大有分別之處，則一在共黨的行動是兩面性的，既狂熱，又冷靜，既猛烈，又溫和，既裸露，又隱蔽，既挺進，又規避，既果決，又謹慎，極盡其剛柔相濟，百變不離其宗的能事。蘇俄對德日兩國的先友後敵，對敵人進攻的以靜制動，對國際外交的以退為進，即為其兩面手法的充分表現。法國昂德勒、希格菲（Andre Siegfried）在其所著「西方民族性」一書中，對俄國民族性更有與此相關的描述，他說，「在俄國，在同一個人的性行上，我們可以考察出自卑而同時自傲，有理想主義而同時有大儒主義，有聖潔而同時有毛病，而這兩者的過程並無連繫，乃奇異的往復其間。一讀俄國小說，特別是朵斯泰雅扶斯基（Dostoevski）的，我們便普遍遇見這種矛盾的表現。我們還可以親身遇見這同樣的過甚的矛盾的特點，在國際會議裏的蘇聯代表席上，蘇聯代表能够同時將可愛與可怕，輕鬆與嚴重，柔和與強暴連合起來，正如同他跳舞，我們從來不知道用那一隻腳來跳纔好，有時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外交家，有時又是二十世紀所不經見的粗暴。」法西斯的德國則不然，說幹就真幹，毫不含糊，要幹就橫衝直撞的幹，決不迂迴，盡情表現其狂熱、猛烈、裸露、硬拚、果決的態度，雖死而不厭。二在滿腦子壓迫專橫殘忍顛覆侵略的蘇俄及和它同為共產黨者，都是說謊的能手，滿口自由平等博愛獨立和平，頗有世界主義的氣概，耶穌基督的口脛，用此統戰民主人士，麻醉反共國家。當它說盡好話時，卻在做盡壞事，當它裝盡猙獰面目時，常在躲避鋒銳，今日它對中越共的手法，就是如此。法西斯的德國則不然，認猶太人是賤種，就殺猶太人，認雅利安族是優秀種族，就獨尊雅利安人，認定只有德國人配行法西斯主義，就不希望其他國家民族亦行此主義。當時厲行此主義的只有德意兩國，（墨

索里尼只是法西斯主義的半吊子），不像共產主義的圖向全世界傾銷。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政府已覆亡二十餘年，而今日憎厭法西斯主義的人，尚過於畏懼共產主義，雖出於今人的錯覺，但由於一則走曲線，一則走直線，實爲其主因。蘇俄既爲走曲線的老手，並且行之有效，那麼它在現階段，既看清美國的力量比自己大，又遇上毛幫槍口對準自己瞄，美如挺身對毛，它又何苦搶先阻擋？即使它已感覺吃虧，但其忍受痛苦的民族性和其歷史的教訓，或亦會影響其政府的行動。俄語有名的一個字是「不要緊」（*nitchevo*），俄國人也常說「*nitcho, nitcho*」意思都是「這沒有什麼，這無關緊要，不管怎樣，我總活出來了」，這種完全是東方的哲學觀念，是他們經過若干世紀的苦難而養成的處世哲學，其用在處理國家大事上，正如其順應嚴寒氣象，接受暴君專制的同樣自然。又即使獨裁的克姆林宮可以違反這民族性以行，但一經挫敗，最後亦將如沙皇的被逐，何況其決不敢如此。以前史達林的經常注意輿論民情，尤其永遠不忘他們「在這一代中已經有過三次革命」的事實，且曾對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說出，其後赫魯雪夫的遽與人民接近，現在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的更加遷就人民的要求，又都是至今仍不走直線的明證。

且俄如直接表示願與美國共同行動，則反爲可畏，此則爲制毛不可聯俄的理由所在，必須略予指出。凡稍明俄國近代史者，誰都瞭解無論帝俄蘇俄都把奪得海口和海岸線定爲重大國策。從大彼得一六八九年即位時經營起，至世界二次大戰後美國援助土希時止，無論在西方的地中海海上或在東方的太平洋區域上，都被土英日美等國盤回。及中共繼起，本已假手控制了渤海灣及東海南海的海岸線，掌握了整個太平洋的西岸，沒料到中共離異，功敗垂成。美如遽與攜手，它正可遂行其企圖，不但收復其在中國喪失的海口海岸，並可藉北越以進攻東京灣，藉滇緬路的交通與緬共的合作以進入孟加拉

灣和印度洋，囊括東南亞全部，不但完成大彼得遺志，並貫徹列寧「共產主義在亞洲發展最短的路線是從北平到加爾各答」的政策。而其初步的行動，當爲移其已駐在中國邊境的部隊，佔據黃河以北的要地，另造傀儡政權，阻止中華民國軍隊深入，至少亦將如八國聯軍對付義和團以後的所爲，盤踞東北，獨不撤兵，或仍抄二次大戰末期驅逐日本關東軍後的文章，非逼到中美兩國政府接受其苛刻條件不走。且以近事證之，蘇俄鑒於美國渴望其能助成越戰的和解，便更積極援助北越，作爲其向美國提高交換條件的佈局。美國的希望未達而損失已見的事實，則已遍傳各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路透社報導五角大廈的最新統計：自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止，美國空軍和海軍已在北越與南越投擲炸彈一百六十三萬零五百噸，較二次大戰中在歐洲投擲的一百五十四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噸爲多，較在韓戰中投擲的六十三萬五千噸多出一倍有餘，較二次大戰中在太平洋戰場投擲的多出三倍。在此期間飛機的損失爲一千八百零一架，每投擲炸彈約九百噸損失飛機一架，其中九百七十三架被敵軍砲火擊落，八百二十八架在失事或其他非戰鬥原因中損失。這將近一年半來損失如此之大，不是蘇俄供應北越的火箭、野砲、米格機所造成的麼？再據美國軍事人員透露，一九六五年至六八年的戰費合計已達七百億美元以上，年耗二百億至三百數十億不等，日耗三千萬至七千萬之鉅，已造成美國歷史上歷次戰爭中損耗紀錄的第二位。八年來美國子弟傷亡的總數，亦超過立國二百年來除二次世界大戰外的所有戰役之總和。如依僅佔領達多主要山頭的激烈情勢以觀，美軍便已死傷一千三百人，南越軍死傷一千八百人，爲越戰六個乾季以來所未見，則今後美軍如在敵人多處並攻中死傷的數量，自必更爲激增。其戰期之長，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正式出兵至今，已進入第八年，成爲美國第三次的大戰爭。這些可痛可駭的紀錄，還不是蘇俄與北越及越共合力造成的麼？自然，中共亦是幫

究，但若非蘇俄養成中共幫兇的力量，又何致如此？蘇俄借刀屠美的毒謀，今後會停止麼？絕對不會，美國惠勒將軍在參院作證時已經指明，蘇俄總理柯錫金於一九六七年又更在莫斯科一再強調其「協助河內到底」的誓言了，要是美國仍不醒悟，豈非天下之至愚！美國有獨力對付中共的力量，現在又正是最好的機會，而竟不敢採取行動，豈不更令蘇俄輕視而竊笑！

總之，現在是翦滅中共最好的時機，美又有仗義興師的必要與力量，正宜及時進行。萬一真要與俄合作，僅須取得其諒解已足，殊不必要它出兵，並須婉辭其出兵。至於蘇俄可能接受美國的要求，則已有柯錫金與美國共同解決印度與巴基斯坦衝突，遏阻中共進入印度半島的事實為證，只要美國迎機善導，蘇俄也許同樣願意接受美國謀制中共的布畫。而其步驟的原則，則為明白表示願與蘇俄在東南亞協力造成一個中立區，從根消解蘇俄懷疑美國控制此一地區的成見，由此解決越戰。並在此謀取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盡力設法調和一切歧見，即使一時未必見效，但只要找住每一機會，主動進行，總可以發現若干共同的願望，逐漸達成共同的目標，詹森總統與柯錫金在玻璃鎮的晤談，雖未達成重要協議，却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這些事理事例，除白宮主人必須進一步促其發展外，亦須設法使美國人民有適度的瞭解，願作政府的後盾。

二六、應知制俄不宜聯毛，更無可聯處：美如自願用其力量制服共產禍根的蘇俄，則其志事功業自更大於華盜頓的抗英，林肯的解放黑奴，必受人類全體崇敬，但如欲聯毛制俄，則不但無用，且被累甚大，並為世所笑。

可笑之一是，很可能美國和毛酋握手的距離，遠如在天邊，而毛的死亡已在眼前；和這樣死在旦夕，早已只能發「亂命」而真正聽命者不到十人的精神病人去謀制強俄，豈非古今第一笑話！若證以一



九六七年十一月底華盛頓郵報及洛杉磯時報特派員勞伯·愛力根(Robert Leight)專文報導稱：醫藥及政治方面，已證實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共首腦毛澤東已患上了「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亦即是震顫麻痺病，跟着而來的是每下愈況的精神病，則「聯毛」雖欲不爲世笑而更不可得。患上此病的特徵，早經帕金森(J. Parkinson)博士(一七五五——一八二四年)指明，由於神經中樞破壞，致肌肉震顫，動作僵硬，神態癡呆，一切行動都不能保持聯貫性，更由此導致自卑感與偏執狂妄想狂，一經惡化，即近死亡。年來毛在天安門上幾次的形相，在文革中各次的作法，確與此症相類，誠不知其可聯處究在那一點？遙想慣於利用「賡餘價值」的最低級共產黨員也會竊笑美國人太「癡呆」吧！

可笑之二是，如果說聯毛就是聯中共，那就又同於癡戀身患梅毒將死的醜女，同樣可笑。中共本身的力量本來有限，今又被紅衛兵百般削弱，即令其神經上未患不治之症者願意「採陰補陽」，借美國以自營衛，但就美國言，亦僅能借此虛張聲勢，不能增加實力，且這種甚少內容的聲勢，仍如冬末之雪，見日即消，大陸上日益增加的反共勢力，就是消雪的烈日。即使尚可利用中共的「賡餘價值」，但亦必然是得不償失，如俄之因此抗美，與其所屬國家的因此一致反美，及各民主國家的因此不敢助美，不是反而貶損美國固有的聲勢，增加美國本無的艱窘麼？尤其嚴重的是，中國國內外人民，雖都知俄國是世仇，但更知中共是屠夫，無不想報血海大讎，而美國反欲勾結這瘋癲屠夫，去制裁爲患較遠的蘇俄，豈不被認爲最可恨的大幫兇？美如狃於中共人海戰的見地，認爲可以助美的即在此人海，而竟不明人海可變爲仇美的怒潮，豈非過於短視？又竟不明大陸反共的人海，將變爲中華民國救民的匯流，豈非過於反相？且仇美本爲中共的基本政策，仇俄只是它的暫時戰術，在它的歷史中，只有親

俄派，沒有親美派，它是否願與美攜手，實已大成問題。即中共，而反有所失的却是美國，不但美國永難滿足其軍械吐故智，伴爲攻俄，陰實襲擊美軍，以壯大其侵略世界的實力。時中國政府的大受其害，然又何以解釋聯合國早已決議譴責問題？是則在各方面鼓吹聯毛制俄主張者，無非二次大戰期間官力爭者，則必爲史迪威第二，殆可斷言。

究竟如何聯法？亦成問題。明與之聯，則如上述的一切合，但在其未諒解美國行動意義之前，禍迫眉睫之時，豈甘陽各地，及其附庸國家的頓生狐死兔悲之痛，共作先發制人已爲其所困，中國大陸人民更大遭其屠殺，目的本在聯毛則必至。倘暗與之聯，則中共更不會對蘇俄進一步的公開衝突中共如向他處蠢動，美已自緘其譴責之口，暗勸則更不生效。佈詹森勸他接受和談條件的私函，亦將密約公開，豈不更爲俄爲共禍之源，除之宜早，可惜爲時已晚。爲目的而不期，聯結尙未全敗的日本，制裁國力已衰的蘇俄，豈不更是亦比戰後至今的扶植日本，尤爲有力。俾士麥既認定法爲普委員長認俄終必爲中國的大敵，中國對日本尤須貫徹「以德持日皇制度，不求日本賠償損失，這都是可法的事例。爲日

動機則釐然有別，可惜美既失計於前，於今豈可再次失策，弄成失敗到底。

本此論思，聯俄制毛固如與虎謀皮，有害無益，而聯毛制俄，更如養病虎，召巨患，得不償失。美如自願努力或別有長策以制俄，就該獨自進行，或另聯其他可聯者共同爲之。否則急乘毛俄交惡的今日，挺身而起，先剪除蘇俄的羽翼，將中共的政權推翻，仍不失爲當前可行的上策。

所謂聯其可聯者，在歐洲爲英德，在亞洲則第一爲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其次爲日本爲泰菲澳紐及印度。英與美有血緣關係，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與美並肩作戰，美如決心制俄，英雖已無邱吉爾其人，但仍將與美合作。德正有分裂之痛，美如決計爲德國除禍，德人自樂於負弩前驅，且以由美發難之故，深信必能戰勝蘇俄，而不致復如希特勒的功敗垂成。中韓兩國則橫被中俄共肢解的痛苦相同，各執干戈以衛社稷，以盡本身之責，決不在德人之下。日本與俄爲世讎，尤恨俄在大戰末期對日本落井下石、乘火打劫的卑鄙行爲，而其經濟力量與武備潛力，則更強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時，當無不願與美共賦同仇之理。泰菲澳紐則已成爲美國在越南的盟軍，美如直攻越禍的始作俑者，諒無異議。印度固深苦中共的侵擾，亦痛感蘇俄給它的殷憂，美既動手，它亦不會僅作壁上觀。此皆可聯之國，聯之以制蘇俄，則略有政治頭腦者將認爲確是一呼四應一勞永逸之舉。反正此舉遲早不能免，遲則禍緩而難圖，早則禍急而易消，其間緩急輕重，可憑常識以斷。除非真能斷定蘇俄確已放棄其侵略主義，已願與美國共同消毀核子武力，不再發生對俄赤化世界的嚴重問題，否則明辨篤行，愈早愈妙。而所謂明辨篤行者，仍在辨明蘇俄最後的意圖雖不會輕易放棄，但亦未嘗不能運用外交耐心、政治藝術，及經濟力量，使蘇俄當權派逐漸認識武力侵略終不得逞，社會主義亦非其擅長，美國根本沒有爲了消滅共產主義而與蘇俄武力衝突的處心與必要，由此以德化代力服，變嫌隙爲親睦，並非絕無

可能。當一九六七年六月間以色列軍隊進入西奈半島之初，蘇俄曾向以色列威脅，必須在一個特定時間內撤退，否則將以一切力量加入作戰，美即除用熱線繼續通話外，並派遣核子裝備的第六艦隊駛近這個戰區，艦隊駛得愈近，蘇俄通訊的語調即愈和緩，便是外交與實力雙管齊下，一舉奏效的顯例。除如此運用以外，再運用各種方式，找住每一機會，使兩國各種人民經常往來，由基層的情意，促進蘇俄上層的合作，則尤為重要，更為可能。詹森總統如能根據此種見解與實績，並使人民共信共行，則制俄之道已在其中矣。此外均為不切實際的下策，毫無足取。

二七、今日制中俄共的上策是聯華：詹森政府更應使美國人民都了解：如真想消除中俄共的侵略勢力，只有自由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聯合中華民國進行，纔是萬全上策，此外則無一不是空費氣力的歧路，自趨顛覆的險路。敵情已甚清楚，蘇俄正在圖使美毛衝突進一步的發展，美勝則代它除患，毛勝則美自招禍，它都可以左右逢源，大得其利，中共亦無時不想挑起美俄的正面衝突，無論誰佔上風，都對中共有益，故無論聯誰制誰，都是白走的歧途。何況俄毛既如此想，而美亦如此期待，又各被他方所悉，勢必都變成各自等待，各不進一步行動的僵局，此在本質相同，而又共存長期侵略野心的中俄共兩方，並無所損，然於反侵略的美國，並已被中俄共陷足於越戰的美國，如又因走不通聯毛或聯俄兩條歧途之故而亦同樣觀望等待，則其結果更無異等待蘇俄乘隙再入中國，或等待中共的核武力為患世界，便顯然是自趨於顛覆的險路了。

處理極複雜微妙的國際問題，總要自定一個明智的方針，一套統籌全局的方案，堅持不捨的做去，使有利的情勢供我利用，險惡的演變被我控制，纔能經綸天下大事。如只在俄毛目前的矛盾中打滾，既想加深俄毛的衝突，又想穩定蘇俄以制毛，甚至想保全毛酋以牽制蘇俄，致一切失去主動，並

在自造矛盾，豈不甚愚？即使能在對方的矛盾之中，加入一些推進擴大的力量，爲效亦總是有限。且因爲蘇俄在它的矛盾情形之中，早已有整套戰略的部署，毛酋對外亦不是完全亂幹，則大利不屬於毛，即歸於俄，美則全無所得，此一必然之勢，又已有事實證明。中共已得其利者，是它在美俄雙方瞻顧之中，各送秋波之下，不但維持其殘喘，並已建設其核力。蘇俄已得其利者，是它鑒於美國既不敢進攻援助越共的中共，也就更加援助越共以遂行其消耗美國之計，並減少美國及中共與它爲敵的機會。中共與蘇俄之所得，即爲美國之所失，這不更是美國在事實上已誤入顛覆的危路麼？

除非美國從世界各地退出，否則在聯俄或聯毛乃至聯中共別一派系都行不去之下，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而這條路無論從美國的民族精神歷史光芒，及現代人類的期望，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任何一方面看，都是應該走、能够走的路。這條路，便是消除共黨極權侵略、保障民主自由和平的路。而其前進的步驟，亦已爲客觀形勢所決定，那便是第一步先推倒毛幫，再乘便推倒中共，第二步鼓勵蘇俄放棄侵略主義。如辦不到，即加強圍堵蘇俄。如尙無效，即聯合民主國家一致予以制裁，縱冒核子戰爭的危險，亦所不恤，反正核子武器只要存在一天，每天就都有發射的可能，趁美國尙佔優勢的今日，來個乾坤一擲，雖自己亦有重大犧牲，但總比以後勢均力敵時爲輕，亦比今後若干國家都用核子武器時犧牲的範圍爲小。如再就美國的核子力量看，美俄的核子戰爭殊不可能發生，因蘇俄必然明瞭，美國現有的核子武力比蘇俄爲強，蘇俄雖在追趕，但美國並不停止，必繼續加強一種經常壓倒蘇俄的絕對優勢，具有可以抵受蘇俄的核子突襲而不被毀滅的防衛力，與立即還擊的報復力，故蘇俄永遠不會有首先攻擊而又無後患的絕對能力。情勢既如此，即已造成雙方避免核子戰爭的事實。蘇俄更必明瞭，美俄兩國的核子巨力，因爲毀滅性過大，已同於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毒氣，彼此都不敢使用，除在政治

上發生嚇阻作用以外，在軍事上已不成爲兵器。亦正因事實如此，所以美俄雖已以越南爲戰場，雙方已處於間接交戰的狀態之中，並已形成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與以蘇俄爲首的共產集團之間的國際戰爭，但都未敢動用核子武力，則爲更具體的事實。

如或認爲蘇俄的鷹派可能亦如毛酋的發瘋，則亦儘有不冒大險而仍可以成大功的途徑在，便是假手中華民國撲滅中共與削弱蘇俄的這一方略，這無論從政略戰略地略三方面看，它都有獨具的五大優勢：第一是名義正大，它是平定內亂的行動，仍是實行以前的國策，他國都無權阻止。第二是氣勢磅礴，它是解放民族的義師，三軍既都如游子還鄉，全民又早望王師救命，裏應外合，勢如破竹，任何國家都來不及阻撓，新殖民地主義者尤其不能假借「維持民族革命政權」的理由予以破壞。第三是人地相宜，它最熟悉大陸地形人性風俗習慣語言，獨具地利人和兩個最重要的條件，絕對不是他國的軍隊所能及。第四是需費減少，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曾經指出，每一名士兵年需各費，美國爲四千五百美元，亞洲國家則僅需五百四十美元，差距甚大。何況國軍尚可因糧於敵，更得受援於民，需費更少。第五是績效宏遠，它既可以驅除美俄公敵的毛共，亦即可以由此解決越南的戰爭，撲滅足以燃起世界大戰的亞洲火源，消弭核子擴散的危機。

如認爲可能發生兩項削弱這五種優勢的情勢，一是中共團結抗禦的力量仍不可侮，二是蘇俄援助中共的行動尤爲可畏，則又未免過慮。事實是中共尙能抗禦國軍的力量，已僅餘擁毛的部份黨政軍人員，大部份反毛份子，則早已不聽指揮。即使停止閱牆，共禦外侮，但亦不能抵擋大陸人民乘機滅共的威力，秦隋王莽毀滅的歷史定律，必再證驗於今日。蘇俄縱思動手，甚至先推倒毛共，扶植修正主義者以爲之備，則中共修正派的同於汪精衛的傀儡組織，進入中國俄軍的同於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

主義軍閥，最後都必失敗，尤爲可證的近事。何況中共黨政軍高級人員中，尙有若干人曾接觸過歐美的思想文化，亦不會全忘蘇俄挾脅的教訓，豈願再一次自投羅網？同時他們雖恨毛酋，亦終未忘吳三桂借清兵擊敗李自成後喪失山河的痛史，以及今日民族意識的強烈尤過於當年的情形，何苦又認賊作父，愈招敗滅。這些情勢，蘇俄豈有不知之理？極其所爲，亦祇能視中共如北越，而予以各種武器的援助。若果如此，則中國縱不免在短期間內出現一九三七年前的西班牙共產軍與反共軍內戰的事實，而共黨勢力的終必絕跡，亦必與西班牙的歷史相同。何況越戰既因中共的自顧不暇而易於解決，美國即得以全力應付中國大陸問題，將愈使蘇俄有所顧忌。即使軍事政治最重現實利害，蘇俄縱明知結局可慮，還是會幹了再看，至少亦將用恫嚇手段，使美國狐疑龜縮，但美國如亦幹了再看，仍比不幹爲有利。因爲在蘇俄澈底覺悟以前，總是美國最大的敵人，與其讓它倒毛扶共合力敵美的形勢成就以後，與其待它本身武力發展到與美國完全相等以後，與其待它用哄嚇詐騙的伎倆，固結束歐各附屬國，操縱亞洲各弱小國，使美國更難應付以後，再起而應戰，決不如先發制人的較爲利重害輕。由這些角度看去，中共與蘇俄在國軍進入大陸後，雖有可能發生若干行動的因素存在，但由此產生的各種對消性因素，顯較強烈，殊不必鯢鯢過慮那時中共俄共的如何行動。

國軍進攻中共獨具的五項優勢固不致因中俄共可能發生的行動而變，而就美國全球性的反共戰略看，亦以資助國軍此種行動爲最有效，並最能利用蘇俄的弱點，此則 蔣總統在其「蘇俄在中國」的名著中，早經透澈指出。

第一、他認定消除大戰禍源最好的戰場在遠東而不在歐洲或中東。曾說：「西方國家如選擇戰場，不應在歐洲和中東直接與蘇俄作戰，最好的戰場是遠東。因爲這一戰場上的戰爭，乃是東方民族

反抗新殖民主義，爭取其國家的統一與自由而戰的民族革命戰爭。這一反侵略戰爭，當然是東方民族都能同情與支持」。（蘇二八七）

又說，「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蘇俄對西方決戰的後方基地，乃在於中國大陸及其亞洲心臟部。我們民主國家如果讓他這一後方基地順利建設，日漸強固，那將使蘇俄在未來的全面戰爭中就可立於不敗之地。」（蘇三五七）

又說：「今日世界反侵略集團，如以東方中、韓、越等國的民族革命戰爭為前衛，能在精神道義與物質經濟支持他們，使其能够自動的解放其本國被俄共奴役的同胞，而對守衛蘇俄後門的家犬——中共，一致反擊，那就是對蘇俄的後方根據地及其戰略資源的策源地加以間接威脅和根本解決，使蘇俄西進或南進的野心全都受到牽制。這樣，他自不敢發動大戰。而阻止蘇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方策，亦在其中了。」（蘇三五七）

第二、蔣總統認定這樣的戰爭一定能够勝利。曾說：「西方國家如被迫而在歐洲與中東戰場直接對蘇俄本土作戰，那莫斯科一方面還可激起俄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德國作戰的所謂『愛國戰爭』來抵抗他；另一方面在中東亦可利用亞洲民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來牽制他。如此則這一鐵幕中的革命力量和亞洲民族的力量，就不能參加反侵略陣線，反而為侵略者所利用。這一條是導入世界大戰，而且勝敗之數未可預卜的道路。反之，如果以我們東方反共為中心的目的，共同反擊，那麼，這一遠東戰場上的戰爭，就是民族自由戰爭，也是民主革命戰爭。這個民族戰爭，自將喚起全亞洲獨立自由的民族運動；而這個革命戰爭，更能激起鐵幕中的反共革命運動，而必將與我們團結一致，合力反攻，求得其本身的解放。那是無須西方國家直接參戰，而其民族的反共革



命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蘇三六〇、三六一）

從 蔣總統所說的這兩點看，更可明白一定可以消滅中俄共侵略勢力的正常途徑是在遠東而不在別處，其他各處都是歧路險途。

第三、蔣總統更認定這樣的戰爭，美國與西方國家不應捲入旋渦。曾說：「當然，美國今日在自由世界反共產反侵略的鬥爭中，有其領導的地位與責任，但這並不是必要使他直接介入戰爭。我認為美國本土應該主動的建立其為世界反共的兵工廠，而不能只是被動的準備其為反共戰爭的主戰場。所以美國必須積極的支持歐亞大陸上的反共國家，並協調非共國家與反共國家，鞏固其反侵略陣線，增強其反侵略的力量，充實其對共產集團備戰和作戰的供應，而不使其本身捲入大戰的旋渦，以免其本土變為大戰的戰場。」（蘇二八六）

「反之，西方國家如其正式軍隊在東亞參加作戰，將使共產集團以其反殖民主義的口號，轉變亞洲人民的反共革命運動，而為反西方的民族運動，這亦就是對於東亞反共戰爭最不利的所在，而亦就是韓戰不能獲致徹底勝利，以致毫無結果的實例。所以我並不贊成西方國家直接參加我們反攻大陸的戰爭，只要其在道義和物質上，以及武器和技術上能積極援助就夠了。」（蘇三六三）

他更進一步指明：「而且為了整個世界反共作戰的根本問題，美國本身就不應該捲入戰爭旋渦之中。惟有如此，整個反共戰局，方能運用自如，而不致限於被動地位。亦惟有如此，方能確保反共總兵工廠所在的基地安全，更可使反共鬥爭立於不敗之地。所以我認為美國對反共鬥爭，應該採取間接作戰的迂迴戰略。而民主集團對於反共戰爭的基本方略，就應該確定其三個原則：第一、只要俄共對美國不首先採取奇襲行動，或俄共本身並未在其他地區參加戰爭，則美國本身亦不應隨時隨地參加戰

爭。第二、反共戰爭必須在鐵幕之內或接近鐵幕的邊緣作戰，而不應在遠隔鐵幕的自由地區作戰。第三、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侵略，採取重點主義，應該預先選定地區，只要其共產集團無論向任何一國挑戰侵略，則自由世界仍照其預定地點主動反擊，而這一反擊，就不應該限定於被侵略的當地。」（蘇三七〇、三七一）

從 蔣總統所說的這點看，更可明白美國支援反共國家的戰爭是有效的正途，自己直接介入戰爭是無益有害的歧路。

第四、蔣總統又斷定這樣的戰爭，蘇俄不但不會參加，並會犧牲中共以自保。他曾就一種堅強的論據說：「在蘇俄最後突擊必操勝算的大戰準備沒有完成以前，我們可斷定他決不敢在東方民族革命戰場上，冒昧從事直接參戰。否則如其真敢參戰，那就無須等到世界大戰，而即可使他在遠東戰場陷入泥淖，招致根本的失敗。所以爲其根本利害計，他是不能對中國大陸反共戰場直接參戰，而重蹈日本失敗的覆轍的。」（蘇三六三）

又說：「各國共產黨的一切手段，無論是軍事的或非軍事的，都是爲了他本身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但各國共產黨的一切努力，其最後又都是爲了維護其共產主義祖國——蘇俄的政權爲第一，即使犧牲其他，亦所不惜。這是共產附庸政權，效忠蘇俄，認爲是他天經地義的職責，中共匪黨更是如此。所以我們斷定，不僅中共不能脫離俄共的控制，而且到了中共潰敗的時候，俄共爲了她保存本身的實力和安全，而以中共爲其犧牲品。這是俄共三十年來對中共的控制，乃是歷歷可數的。」（蘇三五六）

第五、蔣總統在十一年前發表的這種卓識，在今日尤合事實。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他在接見法國

「世界生活月刊」記者達柯時曾說：「毛澤東政權在中國大陸發生激烈權力鬥爭之下，刻正陷於分崩離析狀態，無法免於完全塌倒，」「工人刻在罷工，」「中國大陸的農民刻在怒吼，城市已被鄉村包圍，」「軍隊已被危難震撼，」「紅衛兵則不聽命任何人，」「其政權的瓦解，是無法挽救了的」。又說：「美國如跟中共作戰，將是愚昧的事。爲了擊敗中共，美國勢須動用可怖的摧毀力量，如此則會爲了消滅一小撮瘋狂的中共頭目，而使和平無辜的民衆以此喪生。」該記者並報導，蔣總統重申信念，認爲他手下的武裝部隊能够輕而易舉地擊敗中共軍。這更說明了不需要並不值得由美國動手。

蔣總統又對該記者強調說：「談到外人企圖佔領中國領土的事情，無人能够認真想及，中國有八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佔領中國的異族，歷來都是被中國所同化，韃靼人和滿人，結果都成了中國人。五百多年前，朝鮮國王曾對日本的無敵將軍豐臣秀吉說：『打算征服中國，等於想用蜆殼把海洋裏面的水潑乾』。有關世界前途而因我國引起的嚴重問題，其惟一合理的解決辦法，操在中國人手中，但這固有一項條件，即中國人不擬被迫在由共黨專政和受外力侵略兩者之間，作悖理而帶悲劇性質的選擇。將來（時間無疑很快便到），中國大陸人將會掙脫枷鎖，使本身擺脫恨的桎梏，而告再次找到自由友愛和容忍的道路，不會再使全球遭受驚恐。」這更指出倘仍有異族妄想侵略中國，亦終必遭中國民族的擊敗。雖然蘇俄迄未忘情中國東北的資源與戰略地位，尤其它在「十月革命」紀念日的前夜，其新任遠東區司令羅錫克大將特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透露，爲了加強反擊毛軍的準備，舉行大規模的野外演習，並可能在國際共黨大會後，中共發展中程長程飛彈之前，向黑龍江一帶動手，以援助劉派，但它如懂得歷史，就不敢一意孤行，中國所以並不引此爲憂。

且從反攻戰爭的態勢看，它既不是「諾曼第登陸」式的大戰，登陸地帶亦不止一處，而祇是赤壁

火攻式的到處引火，引發地雷般埋伏於各地反共抗暴民衆怒火爆炸的信管，在這種革命性的戰火全面爆發之後，中共固不能向處處撲救，蘇俄亦將自顧不暇，爲什麼？因爲整個鐵幕之內勢必趁火而起，蘇俄不能不防。即使冒險以部份地面部隊進入中國東北或西北邊境聲援中共，亦將反使中共提早崩潰，爲什麼？因爲民衆抗暴的革命戰爭，忽遭外力壓扼，必更憤火衝天，立即轉變爲一種抵禦外侮的民族戰爭，此時共軍受革命戰火更有力的刺激，必將全面投奔革命陣營，使中共不戰而自潰。這種反攻戰爭的態勢，儘可歸結爲兩個公式，第一個公式是：反攻！國軍登陸！大陸革命。第二個公式是：反攻！國軍登陸！大陸革命！中國民族革命。

從這幾點事實與理由看，可以斷言反攻戰爭如選定正途邁進，蘇俄不但不會支援中共，亦不敢支援中共，故 蔣總統盱衡世變，統籌全局的決斷，是值得異常重視的。詹森政府如別無較此更妙之策，就必須努力使美國人民都能信受奉行此策。

二八、今後安定亞洲及全球的上策亦是聯華：詹森政府應緊接着使美國人都了解：聯華不但是消除中共俄侵略勢力的上策，亦是奠定今後世界和平基礎的主要路線。其理由與事實是，中國是亞洲安危的關鍵國家，亞洲是世界安危的軸心地區，二次大戰後蘇俄勢力向世界各地發展的重大因素，在於其傀儡政權中共的竄據中國大陸，今後安定世界各地區的基本工作自爲重建中國的秩序，而此重建的責任只有中華民國確能勝任，此並非主觀的推論，而實由其傳統文化爲之基礎，及現在貢獻爲之證明的自然結論。反對侵略的王道文化，祈求世界大同的三民主義，已成爲中華民族淪肌浹骨的濃厚精神，並已爲熟諳中國民情國風的人士所共曉，無待詳說。至於其現在對世界的貢獻，則因其尚在「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的中途，未盡爲人注意。

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地居歐亞美中心、綰轂大西洋印度印樞紐的非洲，地利雖待開發，而三億一千萬人的智慧，若從冷眼觀察，則並不低於其他各洲的民族，其在未獨立時代所受英法等國現代文化的薰陶與刺激，又甚普遍深刻。今日三十九個獨立國家，個個都如乳虎出山，風威四射，即其在聯合國的席位，亦有舉足輕重之勢，絕對不容輕視。但其間無論何國，因飽受殖民地政府的壓迫，類皆存有疑嫉西方國家的成見，即對美國亦然，美雖予以經軍援助，他們則常抱「受援不受制」的原則與美周旋，此或為美尚未察及，旁觀者則早已看出。而在非洲的中華民國農耕隊員同情他們的觀感，他們亦對此同情報以好感，並互相瞭解此種心心相印，正如窮苦人民願與處境相同者往來而不甘與富貴人物相處的心理行為相同。任何人如對此有所認識，便都會看清今後能助美國交歡非洲人的，絕對不是英法等國所能為力，共產國家更不必說，美國亦不能直接取得，只有同病相憐，同氣相求的中國人纔能一拍即合。為什麼？因為除經常給他們製造麻煩問題的中共以外，中國向未幹過一件使他們不安的事，秉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憲法以行的中國政府，又一貫是同情他們獨立運動的政府，分佈在非洲的農耕隊，更是秉着「只予不取」的主義為他們解決衣食問題的事實表現。向過去看，他們對中國並無惡感，從現在看，他們對中國已有好感，往今後看，他們自然樂與中國交歡。今後以美國的經濟巨力，工業技術、科學知識，供其開發，而以中國的人情風儀導引於其前，貫合於其間，則美國縱使掩不盡其為人所惡的優越感，而亦終能被為人所喜的謙恭氣氛所沖淡，足令非洲人均有如登春臺如逢舊友之感。合美國人之力、中國人之情、非洲人之智之力，共同造成繁榮安定的大非洲以後，則歐亞兩洲杌隉不安的現勢，大西印度兩洋波濤險惡的危機，將必由此一掃而空。故敢斷言，無論從現在消極的作用及今後積極的鴻圖看，都以支援中華民國重建大陸政治為萬全的上策。

且全球形勢重點的變化，正如地心吸力的控引萬有，大海潮流的波及四週，中國大陸與非洲全境既已安定，則中東地區回猶兩民族的歷史糾紛，亦可歸於消解。爲什麼？因爲歷史上向無宗教之爭的是中國，向抱大同主義的亦是中國，發揮中國人「民胞物與」的襟期，不難共趨「殊途同歸」的境域。倘由此導致智慧特出民族重振其在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貢獻特異的精神，猶太民族仍本其創立耶穌教與列寧主義、安里斯坦相對論，回教民族仍本其穆漢默德創立清真教那種敏毅本領，印度佛教仍本其「悲智雙修」「普渡衆生」那種智仁勇氣概，萬弩齊發，百川歸海，用以朝向一切大同的世界邁進，則美國人的世界社會主義亦可由此實現，而中國人「一視同仁」「天下一家」的傳統文化，即可以呈現其最有力的啓發輔翼作用，然此亦非從中華民國重建大陸文化着手，即無他途可致，故採行蔣總統的籌策，實又爲萬利的上策。

又必須認清另一個事實：民族主義不可抗的力量，永遠是隨着各民族與生俱來並且至死不變的一種先天性力量，除被高度的王道文化經過長期的浸潤薰陶，自樂於同化以外，決沒有其他任何力量能使之甘願接受另一民族的統治。自信共產主義力量異常的蘇俄，尚不免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作戰時要利用民族意識，激發「愛國戰爭」去抵抗。今日以色列那樣極小的國家，遽能三次戰勝阿聯，主要亦是依恃猶太人的民族精神。緬甸、柬埔寨等這樣弱小國家的決心擁護其獨立，亦是民族主義力量的證明。蔣總統不主張美國直接介入遠東反共戰爭的旋渦，其理論與事實的基礎，亦即在此。

亞洲人的民族感，比其他地區的人民尤爲強烈。佔世界全人口五分之三的十八億二千五百萬亞洲人民，由於或多或少或久或暫受過西方民族蹂躪宰割之苦，一見白種人即感憎怨，此實爲主要因素。亞洲既已成爲今後世界安危的關鍵地區，美國又已成爲協助亞洲國家開發的主要國家，勢必與亞洲發

生長期關係，則其首先碰上的便是亞洲民族主義的堅銳矛頭。以前雖未在亞洲實行殖民地主義，但總由於其爲今世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即此已足引起東方亞洲國家的歧視。何況在協助防共與開發經濟兩件事上常採取自以爲是的領導地位，更使亞洲各民族普遍感覺不甚愉快。特別是在越戰開始期間，即協助法國重建其在越南的殖民勢力，早經共黨煽起越南人反抗「美帝侵略」的意識，迄今尚未獲越南人民完全諒解。如不警悟民族領域內的敏感性比厭惡共黨侵略尤爲尖厲，首先改變過去莽撞的作風，而以一個協助者並非領導者的態度與亞洲人平等往還，則即使消滅中越共，甚至翦弱俄共，亦終無從完成開發亞洲、安定世界的任務。

美國如真願成爲一個完善無缺的亞洲援助者，則若非與中華民國攜手偕行，仍不能使功果圓滿。此非由於中華民國現在的經濟軍事力量能對美國有所裨益，而是由於中國傳統的王道文化與追求大同的三民主義已爲亞洲人所了解。其在歷史上雖有臣服鄰近民族的紀錄，但亦只是遂行其「以大事小」的樂天主義，絕非榨取他國利益的殖民主義，除由比等國家歲納一些象徵性的土物以外，即再無其他要求，如說有，那便是反爲此等國家所歡迎的「興滅國、繼絕世」的善意行爲，正與美國今日援助他國抵抗共黨的顛覆行爲相同。何況自中華民國成立，此種德服鄰近國家的舊時行爲亦隨即取消，可在中山先生演講的民族主義中澈底瞭解，而抗日戰爭結束時即對日本採行「以德報怨，不念舊惡」主義，尤爲最具體的近例，今世共知的史實。故由中華民國協助美國重建中國大陸和平秩序，並由中國的和平安定推進亞洲及全球的和平安定，無疑是順理成章的程序，增美釋回的要務。惟造成此程序的入手處，仍在支助中華民國先收拾厲氣沖天的大陸這一方面，捨此即一切無從說起。詹森總統如真胸懷大志，心營八表，便當倡率美國人民從此處着手，而以反共老兵 蔣總統的籌策爲最準確的南針。

縱使詹森總統格於近憂，無此遠慮，亦宜準對目前越戰的需要，採行 蔣總統的深算，將剿滅越共、收復北越的任務交給越南民選政府，酌移援越力量支持中華民國軍隊向大陸作戰，使越戰從根本上取得勝利，纔是上策。今日美在越南的作法，則顯爲無可致勝的下策，即使再增兵七萬至十萬，亦僅能預先補充其後七個月至十個月的傷亡之數，對勝利殊少補益。即使越共的補充人數日趨減少，但並未斷絕，而且開入南越的北越部隊日見增多，又正改用分攻使疲、突襲使亂、猛攻使潰，新的游擊戰術。僅依照游擊舊式的數學公式，則對付游擊的理想兵力比例，至少是四對一，此已非五十萬左右的美軍所能應付。何況尚須在其中減除四分之三以上的後勤人員，所餘的真正戰鬥兵包括五萬五千名空軍與二萬五千名海軍在內，實際僅有十萬多人，更何能致勝？如支援國軍開闢大陸戰場，既可不再陷足在越南的山林狹區，又可粉碎越共恃無恐的心理，自易穩操勝算。如移用裝備新加美軍七萬至十萬的財物，以裝備南越部隊，乃至裝備韓泰紐澳菲部隊，則不但可成十倍於美軍的精兵，尙可由亞洲人自戰其地自任其役之故，堵塞反戰份子的藉口，解消支援越戰者感覺南越政府不够負責的錯覺。此種戰略的新部署，在麥納瑪拉第七次視察越南之時，越南元首阮文紹曾提出裝備越軍與經濟支援兩事，顯在期望美國改變政策。尤可因利乘便的，則爲泰國已派出戰鬥部隊一師以外，人民報名甘爲志願兵的並在二萬人以上，足證泰國政府人民都已有保衛越南便是保衛祖國的認識與決心。至於韓紐澳部隊亦有增加的可能，韓軍尤饒勇善戰。如以裝備越軍二十萬至三十萬的戰鬥兵員爲主，使其直接爲國而戰，以裝備泰韓紐澳數十萬盟軍爲副，使各間接爲其祖國而戰，無疑是事半功倍之舉，美國似亦正在進行。只是此種轉向，雖可減少美國客軍效命的犧牲，但仍無從阻止中俄共繼續給予越共及北越部隊的援助，仍非拔除禍根的上策。如真想一舉成功，那就仍應採取 蔣總統的戰略路線，力助



中華民國部隊進入大陸。中國大陸是越南反共的主戰場，凡稍懂敵情與戰略地略者均能認識。

二九：提供和談前的十六個歷史教訓：詹森政府亟應使美國人都了解：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爲首的許多民主國家似乎普遍染上與「恐共病」併發的「和談症」，雖然中國大陸因此斷送，紅禍因此擴大，却並未能從瞋眩中醒過來，反在越戰中時發高燒，致白宮亦不能不動心忍性，多方謀和，這真是一個極痛苦極尷尬的問題。

歷史上一般的和談，總在作戰目標確已達成之後，同於瓜熟蒂落，俯拾即是，自然和比戰易。要是戰爭尚未勝利，各方已望和平，則和比戰更難達成。又要是敵人的詐術與野心均爲前所未有，而與之周旋者復爲素講誠信的國家，則和幕揭開的一天，便是降旗自樹的時間。此絕非危言聳聽，而實由於與共黨交手，異常棘手，不僅其一向視和談爲另一種戰爭，即其平時所用的外交辭令亦別有含義，和談時則尤然，稍一不慎，便會誤入其語言文字的迷津深處，即使選用最不能改變其本義的言文說出寫出，它亦會在雙方的爭辯中或行爲上另起奇峯，使對方無可跨越，這在以前中國政府與中共歷次的和談紀錄中，在馬歇爾將軍的軍事調處紀錄中，在美國代表與中共代表一百三十多次的華沙會談紀錄中，例證甚多。又即使簽成明白如畫的協定，但墨跡未乾，已被破壞，最長亦僅數年即被摧毀的事例，則亦常見於俄共在二次大戰期間及其後對德對日對美和中共對其政府對美國的外交軍事行動之上。今日中共撕毀其與恩主蘇俄簽訂的許多條約，更是觸目驚心的新證。越共本以中俄共爲師，現尙自信其有力續戰，並表示以三十年的時間征服南越、統一全境，中俄共又皆須借刀殺美，分道支援，使其有恃無恐，在此情勢之下，美軍如不願像它們所喊的「滾出去」，就決無可能使它們「坐下來」。如從另一角度看，它們假使忽然表示可以坐下來談，就反成問題了，此時美國如不採取中華

民國與中共周旋三十年的痛苦經驗，必不能瞭解問題的嚴重性與其真正作用的所在。其作用是（一）擾亂世人的視聽，（二）鬆懈對方的戰志，（三）爭取補充戰力的時間，（四）挽救當前的絕境，（五）傷害對方的體面，尤其是（六）另闢更有利的戰場。所謂更有利的戰場是：自審已不能在兵戰上獲利，便改在舌戰上取勝，中共曾在多次的商談中，達成上述各項目的。美國如不取棄中國前車的覆轍，越南前途恐將成爲中國大陸的翻版。尤其是向未輸掉一次戰爭，却向未贏得一次和平的美國，更應從各種史訓中澈底認識達到和平的路由，循序邁進，一步錯走不得。

處理越南的複雜問題，如果在三十年前，自極艱險，而在今日則較平易，因爲已有血寫的新教本可供研讀。茲先扼要提出和談前最需要的歷史教訓十六點：

（一）和談不能解決軍事問題：史訓是：韓戰未經軍事解決，僅靠談判停止，故至今仍是兩軍對陣，危機日增。故麥克阿瑟將軍曾在一九五一年四月間斷言，「作戰的時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勝利。」故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狄克森其後又引述麥帥之言對記者說，「如果美國在未戰勝時即與敵人談判，等於沒有到和談桌上就已經失敗了，」並堅決主張「美國在越南應得到完全勝利以後再和談。」越戰本是韓戰的延伸，韓戰則更是中共竊據大陸以後的結果，中國政府前在中共全面武裝叛亂時期，毅然動員戡亂，原爲勢所必然，事所必需，當時美國如能仿行其在西歐支助希臘土耳其反共顛覆的政策，至少亦不勸逼中國政府以和談代替軍事，何致至今爲梗，直梗到對越和戰兩難，進退失據！歷史上向無廉價的和平，除侵略者被打到自知決不能靠武力擴張其領土或權勢，因此放下武器以外，任何方式的談判，或任何能幹的外交家，亦總不能替代戰爭的結晶，即使偶有小成，但跟着來的總是大戰，慕尼黑會議以後的二次世界大戰，雅爾達會議以後中俄共侵華侵韓侵越的戰事，都是血淋

淋的教訓。

(二)和談前必須以軍事勝利代替軍事壓力：史訓是：日本侵略兇鋒初試之時，羅斯福總統如果採取嚴峻態度，準備一戰，而不僅是對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的重申，及在軍艦噸位等問題上的論爭，祇圖以軍事與外交的壓力懾服日本，則可能不召致珍珠港事件，造成太平洋大戰。在一九五九年美軍繼法軍援越之初，如果獲得國會的批准，即用適度數量的陸空海軍予越共以迎頭痛擊，則越戰很可能早在一九六二年前勝利結束，何致纏鬥已達八年，尚無全勝把握。共黨只怕打，不怕壓，你如壓迫於東，它可以竄擾於西，反正它沒有固定的戰線而又隨處都是它的戰線，只有四面兜勦，三軍並進，它纔怕得要死，這是中國圍剿捻匪的舊經驗，是在湘鄂贛皖豫擊敗中共的新證據。今日美國雖已加強越戰，但其目的如仍在迫便和解，一般人民又無必勝的信心，以充實求勝的決心，則戰固不能壓使敵人罷戰，而且類於向敵投降，至多亦僅能如韓戰的暫時停止，並未簽定和約，豈非再次失策！

(三)和談前必須厲行政勢戰略：史訓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士兵如不急望復員，美國政府如不因此決定撤退南韓駐軍，並準備將南韓從美國的弧形防線中割去，而仍維持攻勢實力，至少是攻勢觀念，則蘇俄以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的心理，就決不敢冒險投機，指使北韓乘虛南侵，中共也就沒有「抗美援朝」的舉動，韓戰也就不會發生。烽火既起，美軍既以消防隊的身手介入，開始即攻其所必救，立即攻炸中國東北或打過鴨綠江去，韓戰也就不會拖上三年，最後也就可以簽成光榮的和平條約。越戰是韓戰中止的延伸，是改戰爲談的產物，如始終採取消極防守的戰略，則前已失之於東隅者，今必再失之於桑榆，不僅和談無實效，戰爭並將由越南延及其四週。有採行攻勢戰略的巨力而遽以守勢作戰待和，難道焦頭爛額還不够麼？

(四)和談前必須乘勝追擊：史訓是：一九五一年法軍新統帥拉特已在越南收復交通要區與鋼鐵工業重地的和平縣，勝利可期，其態勢正如中國戡亂大軍已擊敗林彪部隊逼近東北戰略要衝的哈爾濱，但終因沒有繼續追擊，反予越共部隊以整補反攻的機會，貽禍至今。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聯軍已進抵蘇彝士運河東岸，阿拉伯國家即將全敗之際，由於美國對蘇俄估計的錯誤，惟恐引起世界大戰，逼迫三國撤兵，而予阿聯以第三次攻以的機會，假使被攻者未能以速戰速決的戰略取勝，中東豈非更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區麼？美軍目前雖已轉守爲攻，但如值北越機場移往中國大陸，或其戰鬥機羣逃往中越邊境，而仍不敢追擊，則其後果如何？儘可考證史訓。二次大戰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已主張對越共部隊猛打窮追，他們逃到那裏，就追打到那裏，不問其爲寮東地區或中國大陸，此就戰略上言，尙是起碼的行動，而就其本身經歷說，也許是其已經覺悟競選總統時以韓戰結束爲諾言的失策，接任總統後急於簽訂板門店休戰協定的失計，遂有此哀今思昔的提撕，但就越戰需要看，仍不失爲補救前失今誤的起碼戰術，除本此厲行以外，切不可以小勝爲已足，更不可存和談在望的幻想。

(五)和談前必須攻破敵人的根據地與主力軍及與援處：史訓是：一九五一年美軍登陸釜山雖甚得策，但因國內外意見紛歧，致初則強令前線將士停足在鴨綠江邊，繼則急與敵人和談於板門店內，終令中共看透美國有限度戰爭的弱點，大膽支援越共侵略，同時策動寮東泰共作亂。又如一九五四年法國運用美國數年間援助的巨額軍費武器，開出裝備充實的陸海空軍，與越共劇烈戰爭，期望北越主力傾巢赴援，以便聚殲，終因北越甚狡，只向法國防線與陣地滲透，乃得保全其實力，猖獗於今日。現在北越正規部隊續向前進，河內日見空虛，此正美軍批亢搗虛之時，而爲法軍求之未得的態勢，若仍不敢攻破其政治中樞的河內，不敢封鎖其物資補給要區的海防，尤其不敢挑起中共出戰，更不敢實

行猛打窮追的勝算，而徒便利於其針對兵源艱澀士譁紛歧的美國，採用「兼弱攻昧」的政略，使亞洲共黨相率效尤越共與北越的所爲，則失機失策莫大於此。

（六）和談前總須及時擊敗侵略勢力：史訓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之初，如果及時阻止，以挫抑其兇鋒，則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可能不敢侵略捷克，慕尼黑姑息會議可不至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可避免，最低限度亦可延遲。尤其是當德軍攻入俄境之際，如已認定蘇俄是比納粹德國更爲可怕的侵略勢力，而讓希特勒捕蟬於前，英美則挾弓矢於其後，一如莊辛之爲楚王畫策，預除暴秦東侵之患，則二次大戰後的世亂，何致如今日之烈？更追悔莫及的是，自一九五六年十月起，美國未乘匈牙利與蘇聯士運河同時發生事變，東德波蘭及蘇俄本身亦都陷不安，史達林的繼承人又未鞏固其統治權之時，世局正值轉捩之際，毅然有所作爲，而反背棄英法盟友，竟與蘇俄一致行動，終致親美者寒心，並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地帶蘇聯土地峽永失控制，造成中東地區至今不安的嚴重形勢，任何人都拿不出亡羊補牢的長策。倘仍蔑視這幾幕的大教訓，戰既不力，和反苦求，即使北越可以走向議場，而其侵略的勢力則仍散據戰場，除非美國情甘接受同於迫降的北越四項主張和越共的五個條件，否則決無和談可言。

（七）和談必須在反侵略戰爭完全勝利以後：史訓是：韓戰未全勝，中共未全敗，各方都望和談，結果都遭不幸。真實的和平本與完全的軍事勝利有絕對的因果關係，一分勝利只能得一分和平，百分之百的勝利纔能得百分之百的和平，其間絕無邀倖的可能。但所謂「全勝」，必須以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茲所說的「只殲滅敵人主力而未消滅其戰鬥意志，未能謂爲勝利，」作爲衡量的尺度，不能打一些折扣。因此，艾森豪猛打窮追的主張，尚有一間未達，猶未說雖有限度戰爭的範疇，亦即尚未

消滅敵人自信永不失敗的意念。更有相似的一個近例堪爲比證：在以阿第三次戰爭爆發前夜，蘇俄一面以黑海艦隊在地中海示威，一面阻撓聯合國停火會議，以便埃敘約三國圍殲以軍，及一見戰局全出意外，又慌忙向安理會提出限期停火的建議，前倨後恭，判若兩人，即可明軍事勝敗影響和談如何之大，並可推知現在越共北越的心理，猶處在埃敘約三國依恃蘇俄艦隊期間的狀態。若再證以上年十一月美軍肅獲越共軍官一本筆記簿中所記北越勞動黨幾點指示內的一點，「和談與作戰是殊途同歸的，雖然手段不同，但最後摧垮敵人的目標則一樣，這就如同一九五四年越盟與法國人談判，和一九五三年韓境板門店談判的情形相同，」更可明敵人的戰志未消，和談的時間尙遠。

（八）和談不可在作戰時進行：史訓是：一九四五至四七年間，中共曾用佯和實戰的策略智取大陸。一九五四年中越共都看清英法兩國內心都希望和解越南戰局，即將計就計，佯示願和，實則力戰，法軍乃慘敗於奠邊府，由此退出了東南亞。當時美國不立即參加作戰，曾增加法國的恐慌，加速法國的慘敗。今日美國雖已介入越戰八年，並正在逐步加強戰力，但如目的仍在以戰迫和，而竟忽視共黨均視戰爭爲生活藝術，視邊談邊打爲制勝民主國家的最高戰略，豈非既使南越爲二十餘年前的中國，並自甘爲十餘年前的法國？醫生治瘤如一面用洗割的手術，一面又打養瘤的針藥，雖如笨豬的小兒猶覺怪異，何況兵凶戰危的大事，豈可既令前線作戰而在其旁其後則經常作出墮落士氣的言論行動，竟如治瘤庸醫的所爲！

（九）和談不能顯示出自己急需而成：史訓是：中共鑒於馬歇爾將軍急望和談成功，不惜多次踵門懇求，更不憚八上廬山，促使中國政府委屈求全，乃故意自高身價，加倍留難，終於使馬歇爾鐵羽而歸。蘇俄鑒於美國急望其出兵攻日，並鑒於英美兩國急想解決波蘭問題，乃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

雅爾達會議中，特意提高條件，堅持英美必須讓其在中國東北取得許多權利，同時又以不干擾東歐各國自由選舉爲餌，終於爲其所紿，既害中國於東，又失東歐於西，造成美國東西兩海岸的巨大威脅。中共對付第三者馬特使的態度尙且如此狡狠，何況其對於已居越戰主要地位的美國。蘇俄對於戰勝強敵、功蓋全球的羅斯福邱吉爾尙且敢於欺弄，何況其對於正感越戰煩苦的今日白宮主人。倘復自甘示弱，急於求和，則蔣森總統的三度東來，麥納馬拉的九度訪越，雖其目的或別有所在，然在中俄越共看去，將與以前馬歇爾的奔走，羅邱的遷就相同。要是遽在敵我各異的這種心理基礎與各別的態度表現上貿然進行和談，則敵方條件之苛，伎倆之狡，及其不轉瞬而即唾棄成議之速，至少亦將與以前中俄共的行徑相類。

（一〇）和談不能期望於敵人：史訓是：中國政府前因抗日勦匪難於並進，雖明知兩者都是敵人，並已狼狽爲奸，但仍本知其不可爲而爲的精神，幾度嘗試與中共或日本進行和解，結果都只是徒費精力。由此可明敵人的所以構成，全由於雙方是非利害的根本衝突，除非維護人類正義國際和平的一方，願意犧牲其崇高的原則，不惜割肉餵虎，如最近美國參議員馬卡錫主張將越南某些地區割讓給越共。且此種作法，如寄望於僅迷信武力而不迷信一種頑固主義，並無與之共迷同一種主義至數十國之多的國家，尙可因現實利害關係，接受一些類於今日美國的期望，然決非可望於迷信一種頑固主義已達半世紀，並有志同道合的與國多至數十個的中俄越共政權。何況它們正以破壞亞洲和平秩序爲急務，而美國則以維護此一地區的和平秩序爲安定世界的要圖，雙方的利害顯然敵對，無論從現在及將來看，都不可能期望它們在此地區與美國和平協作。即使它們表示願意商談或竟願意讓步，那亦仍是遂行其「邊談邊打」的戰術，與「退一步進兩步」的政略而已。

(一一)和談不可期望於自私自利的友邦：史訓是：在韓戰緊張期間，英國首相兩次訪問華府，要求即時開始和談，停止擴大戰爭，並以繼續戰爭將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為恐嚇，致網開一面，釀成今日的越戰；這正與其在此以前根據重歐輕亞的觀念，勸使美國不再過問中國事，終於造成中國大陸淪亞洲赤禍蔓延的事實，同出一轍。今日英首相的棲棲皇皇，奔走越南和平，雖在尋常國分勞，然亦為其自身利害打算，其用意又正與一九四七年英國勞工黨左翼阻撓英美兩國支援希土政府相似。國祭間只講利害不講道義本是古今一律，原不必深責，但在今日則必須深計，共產集團的內部雖各有利害衝突，但其對外則步驟齊一，呼應相通，而民主陣營則不然，一次大戰後，威爾遜總統因獨戰於巴黎和會席間而齎志以歿，二次大戰後，美國數任總統又因孤軍奮鬥於壇坫之間而成就甚少，已為無可補救的大損失，今日豈可再蹈覆轍，致十萬子弟在越南戰場上死傷的血，忍被「血濃於水」的錯覺所抹煞！

(一二)和談不應進行於敵氣囂張之時：史訓是：假使中國在東北被侵略後幻想與日本真能和解，美國在珍珠港事變後尚想與日本進行和談，自由法國在巴黎被佔領時覬覦與德國協商，英國當倫敦被狂炸時匍匐與德國談判，則其結果不但當時四國主政人的名望地位均將一落千丈，致國內外憂慮無所託命，並將助長侵略，嚴重影響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假使杜魯門當俄共援助希臘土耳其共黨攫奪政權之時，不明白宣佈其嚴重性，立即馳援，而徘徊於鷹鵠兩派的夾攻之中，則杜魯門個人固不能在一九四八年大選時獲得勝利，而民主陣營的旗幟必更黯然失色。現在詹森總統的聲望已大不如前，而越共及河內氣餒的高漲，則比一九四七年時希士兩國的共黨更甚。其更甚的新證據是：北越總理范文同曾對美國一位記者說，「美國在停止轟炸與美軍全部撤走之後，可以得到初步的和平談判，」



並悍然說，一無論如何，我們不信任詹森或魯克斯，只要他們在位一天，我們就不與美國政府簽訂任何協約，」且明白表示，「假如舉行和談，須以我們列舉的條件為基礎，參加者將為華盛頓與河內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西貢不得參加，」——走向和平解決的第一步，將是在南越舉行大選，禁止阮文高祺政權的候選人參加。」（見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世界論壇社的倫敦訊）這在被認為比較溫和的范文同，其主張的蠻橫，態度的狂傲，尚且和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對政府一樣，他既視在越制共的美軍如同中共視戡亂的國軍，非撤退即不能開始和談，他既視美國總統與國務卿如同中共視中國政府的蔣總統，非去職即不能達成和約，他既視越南民選的總統與軍事負責人如同中共視中國民選政府中人都是「戰犯」，不能再參加政府，則除華盛頓與西貢一齊投降外，尚有什麼和談可言？

（一三）和談不能進行於敵人正在實行長期鬥爭之時：史訓是：日本正謀進行其統治亞洲的長期國策，而羅斯福總統尚與其特使在白宮商談，反張其軍閥的氣焰。德國正圖進行其宰割歐洲的長期政策，而張伯倫首相反與其在慕尼黑妥協，更助希特勒的成功。中共在其組黨之時，早已決定長期鬥爭的步驟，而國內外不明其野心的人，常迫使中國政府與之和談，終於助成其攫取大陸。近事是：北越與越共早決定其「長期鬥爭」「和戰並進」的策略，更有中俄共給它撐腰，比日德軍人還要險狠，它如何願和？證據是：最近二年內鹵獲的幾種文件，一為北越勞動黨（即共產黨）第一書記黎筭給北越中央政治委員會阮志清的一封信，二為北越陸軍副參謀總長兼民族統一委員會主席阮文永對南越共軍司令部談話的日記，三為一九六七年八月間一個越共鈔錄勞動黨決議的筆記本，四為一九六七年冬季黎筭給南越境內共黨指示的文件。在這四項資料中，都載着相同的作法，（1）戰爭與談判同時進行：就是阮文永對越共所說的「在北越進行談判時，南部可能繼續作戰，亦可能南部參加了談判而又繼

續作戰。」就是越共筆記的「正如一九五四年一面在奠邊府作戰，一面越共與法國又在日內瓦進行談判。」（2）侍戰勝的力量迫使美國接受其條件：就是阮文永對越共所說的「戰場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必須在戰場上取得重大勝利，藉以逼迫敵人接受我們的條件。」（3）用總攻擊與總暴動的策略澈底消滅美軍：就是越共筆記的「這是革命戰爭最後階段，當敵人面臨崩潰時候」的行動。（4）舉許多邊談邊打的事例，以加強越共必勝的信心：這在越共的日記本或筆記簿及阮志清的信上，都引述在中國大陸、安南、朝鮮、阿爾及利亞等地區談判獲利的前例，並反對歐洲共產國家所提在和談完成之後，再用政治鬥爭征服越共的建議，認它們爲「完全不顧越南的利益。」（5）隨時準對美國情形，修正其行動：就是黎筍給越共的指示，「要把邊談邊打的計劃，作爲一九六八年的新戰略，進行到是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再定次一步驟」。也就是勞動黨的決議，「美國雖有六十萬軍隊在越南，我們的行動總綱領仍然有效，但如美國增派更多的部隊，則將重新檢討這個立場。」敵情既如此顯著，則除針對其所憂「美國增派更多部隊，」並採行艾帥「猛打窮追」的計劃以外，實在沒有其他途徑能使頑敵走入議場。

（一四）和談不可違反人民的公意以行：史訓是：中國政府從瀋陽事變起至蘆溝橋事變止，多次與日本商談，原只在爭取備戰時間，可是輿論的反映迄不甚佳，何況美國人民實贊同其政府的越南政策，僅不滿意越戰的消極。在一九六六年春季的一項民意測驗中，美國人民主張派兵五十萬往越南肅清局勢，但在未實行前，不應限制中華民國部隊往越南，毋使河內海防變成庇護所的佔百分之六十。同年五月八日美國 *Denver Register* 週刊社在四十八州中，向九百六十九個不同職業的人測驗結果，主張加強各種武力以爭取勝利的達六百零九人，主張即使因轟炸北越引起與中共作戰亦在所不計的亦

有一百零三人。一九六七年春季的全國民意調查，主張對北越加強軍事壓力的佔百分之五十五，支持繼續轟炸北越政策的達百分之六十七。同年十月間美國政壇元老杜魯門、艾森豪、艾契遜、布萊德雷等代表廣大民衆組織團體，大聲支持越南政策，更是民意的共鳴。魏摩爾將軍於一九六七年冬季從華府返越途中所說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都支持我們在越南的努力」，真是實情實話。詹森總統亦早瞭解民情如此，所以在聽到蘇俄記者對彭岱、哈里曼、羅斯陶等表示擴大越戰會使蘇俄採取相對措施後，即對其一位助手說，「難道他們不知道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國人民要求我們擴大越戰麼？」若既知之而仍圖遷就極少數人的和談主張，難道不慮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民會重新考慮詹森自身的繼任問題麼？

（一五）和談不應違反主權國家的意志：史訓是：美國以前脅迫中國政府與中共和談，其後又強逼韓國政府與韓共和談，其結果都是慘敗。現在美國對越戰的負擔雖比南越爲重，但其性質仍是助戰，仍居於客人地位，倘使真到和談時期，一切都自作主張，則其結果一定會在敵人挑撥操縱之下，造成主客情誼乖離之勢。此時美國如一怒而去，一如白皮書一筆勾銷中國，那真是敵人求之不得的事。倘又改和爲戰，則主客既已貌合神離，何能同仇敵愾？要是在和談開始時即已察及此種進退兩難的情勢，特別加強對敵姿態，藉以安撫南越官民，則和談更難成功。且其中復有一項無可解嘲的問題，南越已是美國鼓勵成功的民選政府，如此大事反由美國擅專，既對此民主政府無從解釋，亦使此政府無法向人民交代，主客的尷尬，便是敵人的利益，敵人已早受有限度戰爭的厚賜，何故又使南越再遭無限度喪權的隱患？何況范文同既對美國記者表示不以西貢政府爲談判對手，倘美國又竟擅主一切，豈非更長敵人的氣勢，更墮敵人的圈套，更傷西貢的威信！更何況一九六七年底南越政府因聞美國地下

人員祕密與北越政權接洽和談，已大起反感，則美國客串的和談，即使有所成就，又如何能使主權國家欣然接受？故此中利害是非，美國必須從每一角度切實計較。

（一六）和談結果必須懲前毖後：史訓是：美國由於太愛好和平，沒有在一九一七年蘇俄政權成立之初，內訌正烈，民苦正深，外又被聯軍包圍，美軍亦正駐在海參崴、阿克里奇亞地區之際，乘便推翻這個怪誕政權，於今回想，應感失察。其後又從一九三三年起，老羅斯福政府感覺日本在遠東戰爭的禍患，尤甚於德意對歐洲的侵略，乃與蘇俄建立邦交，更造成人類無窮的災難。又其後爲了急於結束全球性的二次大戰，小羅斯福政府遽與蘇俄簽訂密約，致便利蘇俄勢力擴張於中國，遍佈於東歐，致美國至今尙苦戰於南越，分神於北韓，招架於中東，疲力於西歐。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歷二次大戰而至於今的一連串失敗教訓，已够嚴重慘痛，如猶不知儆戒，幻想蘇俄會促使北越和談，甚至會幫助美國制裁中共，則其後果如何？豈待細思。

詹森政府如能將十六個歷史教訓，毫不保留，更不諱言，一一提示於人民之前，則人民自亦會毫無保留的贊助政府給共黨猛打到底，對姑息主義者反對到底。

三〇、提供和談時的五個歷史教訓：詹森政府應接着使美國人了解：照上述十六個歷史教訓行去，還只成功一半，祇建成和談有利的基礎，尙須在實行和談時謹防失手，其要點有五：

（一）和談原則必須確立：史訓是：一次大戰的目標，本在維護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但當時美國卻因內外情勢複雜，便與世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者結合一起，並以祕密方式分割其他國家民族及整個的一洲，致造成日俄的侵略勢力。二次大戰的目標，本在把人類從極權主義之下解放出來，但當時美國爲了減少犧牲與負擔，便與一個更主要的極權國家結爲聯盟，遂使其勢力伸展到東歐及亞洲心臟

地區的中國，致東歐一億人民及亞洲七億人民置於其間接控壓之下。兩次抹煞原則的戰略與和局，實已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禍根。今日越戰的起因，主要在於二次大戰期間及其後若干行動的自毀原則，而其本質則顯然是維護亞洲和平秩序的戰爭，倘使越共與北越表示可以和談，總須抱定原則與之周旋，原則即是反對其侵略顛覆滲透，維護亞洲的和平安定，決不是承認越南的現狀及侵略的果實。若把原則放鬆一步，即將步入一、二兩次大戰和議時及和議後的覆轍。

(二)和談法據必須切當：史訓是：中國在日軍侵佔瀋陽後，立即根據一切國際公法公約要求國聯及各國制敵侵略，終使日本在蘆溝橋事變前已失敗在法律與輿論之前，這比羅斯福總統徒喊「隔離侵略者」的聲音，及其由國會連續通過一九三五、三六、三七年的中立法案切實的多。因為隔離敵人祇是各圖自保的呼籲，中立法案則更因名詞錯誤，含義浮泛，致運用結果，功效相反，不但對於中立權利沒有提供任何保護，並形成美國自身放棄其中立國家戰時使用公海的一切權利，不但禁止軍火運出的法案致反侵略國家亦無從購入，反助長侵略國家的氣焰。上述事例，已可看出法律基礎影響力的一斑。假使與越南敵人和談而竟依日內瓦協定進行，則其和談的法律基礎即已不够堅強，因為其在本質上是法國在越南戰敗求和的產物，是除承認並保證「南越人民共和國」以外，同時保證寮國與柬埔寨地位，造成現在「胡志明走廊」的協定，要是敵方根據這個協定首先打擊美軍威脅寮東地位，便很麻煩。又因其在事實上美國並未簽字於這個協定，敵人亦早把它撕毀，更無援用的價值。再從東南亞公約的效力看，美國前既根據此約介入越戰，此約又為維護東南亞和平秩序，共同反抗任何侵略的專約，即應據此以與敵人談判。倘竟棄置不用，則美國介入越戰的法律根據即先自毀壞，不但自認師出無名，自承侵略，並使談判不能理直氣壯。可是美國反多次聲明可依日內瓦協定與敵方和談，

何以利害不分如此？

(三)和談對象必須單一：史訓是：在二次大戰進行中及結束時，美國與其盟國在亞洲沒有承認偽滿州國與偽南京政府及在歐洲沒有承認維琪政府為交戰團體與和談單位，而惟以日德為對象，故戰則能擊中要害，殲厥巨魁，和則能責令敵人約束其軍民，都不敢在簽訂和約時猶作軍事行動。今日在南越作戰的「民族解放陣線」，明明是北越的支隊，它卻始終宣傳其為代表南越人民的唯一組織，美如承認其亦為和談代表之一，則第一無異承認其與西貢作戰為南越的內戰；第二無異美國自認為參加越南的內戰，是在乘機向越南侵略。第三無異幫助敵人否定由依據憲法產生的越南民主政府。第四如竟接受其在和談以後組織過渡的聯合政府之條件，則無異使南越居於一對二的劣勢，即南越一權對越共及河內各一權。第五無異便利越共與北越的此談彼打，此允被拒，此則擴張勢力於議場之外，彼則提高條件或推翻成議於會場之內，致彼此都不負責任，戰爭永不能停止，和談永不能成功。中國政府前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尚且吃足「民盟」暗助中共之苦，何況越共早已表示其與北越為兩個組織，尤可名正言順的分別操縱。可是外電曾傳出美國可考慮「解放陣線」的和談代表問題，難道竟不考慮上述的五大後果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九年前法國曾自悔承認胡志明政權的失策，曾宣佈其為「臨時局部的協定」，想不買前帳，但已無可挽救其會場及戰場上的失敗，於今美國如再承認越共，何能避免加倍的失敗？

(四)和談態度必須堅定：史訓是：一九五四年四月法國既以皮杜為日內瓦會議代表，即不應使孟德斯代其職，皮杜不但是外交老手，並熟曉莫洛托夫與艾登的個性及作風，較能泛應曲當。孟德斯則因資望高而顧慮反多，又值法國在奠邊府新敗之後，情緒很壞，乃遽因全國騷然，意志動盪，謬然

臨陣易將，致其把國內憂惶的氣氛，帶往折衝的議場，致蘇俄中共代表看透其弱點，操縱會議，致艾登亦愛莫能助，急求妥協，並致周恩來個人聲價與共匪地位頓時升高，增厚侵害世界的資本。當時法國態度不堅定的貽患如此，假使越南的和談就在明天，那麼第一須堅持原則，勿稍遷就對方。第二須全國爲後盾，勿干擾代表行動。第三須維持西貢政府威信，切忌越俎代庖。第四須重視代表人選，倘由魯斯克出任代表似比高柏德爲勝，因魯對越戰態度較爲堅強，高則由於在聯合國周旋已久，總不免帶些外交家遷就現實的作風，但開始接觸時，必須避免高階層官員出馬，此則願如張良的借箸代籌者。

（五）和談開始即須提高警覺：史訓是：以前中國政府對中俄共的交涉儘管如臨深淵，如履虎尾，但仍不免吃了百密一疏之苦。美國的對共經驗自不及中國，但在進入議場時便牢記五點，總可減少錯誤。第一點是，如果自覺尚未在戰場上擊滅越共與北越的主力部隊，或雖已擊滅而尚未剷除其控制鄉村的勢力，則敵人任何點頭的表示，其實就是毀約的前奏，有此警覺，纔能免蹈陷阱。第二點是，站在越共背後的中共，早視到處求和的美國一如沿門求食的乞兒，很可能教唆越共故意扔出一片和餌，待到「美國乞兒」伸手迎接時，就一腿把你踢倒，使你顏面掃地，它就借此驕其同人，搞其統戰，此則必須嚴防者。第三點是，蘇俄爲使中共不至在韓戰中崩潰，即首先在聯合國大會提出韓戰和解的議案，越戰和談如由蘇俄促成，亦須防此一着。第四點是，越共胡志明前曾以點詐手段，騙得法國自信其力能打敗越共，便迫使留在越南的中國軍隊撤回，卒以孤軍作戰而大敗。今日俄越共都以美軍撤退爲和談的先決條件，如不取鑒前車，終必蹈法國的覆轍。第五點是：敵人已在戰場上用拖延戰術疲憊美越戰士，自必在議場上用疲勞談判困擾美越代表，彼乃得以機敏的心手，戰勝昏疲的對方，即使美方不爲所亂，牠們仍可時生枝節，使美方招架不暇，此爲列寧訓練其徒「游擊談判」的要則，並爲

中共多次與政府商談中一貫施展的伎倆，更爲天真性急的美國人最易被撓的一點。前車既覆，來軫孔道，總必須切戒疏率。

詹森政府如真能使美國人都了解與共黨和談，遠比與它作戰爲困難，並了解「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真理，由九十里走到一百里的艱苦，實與由一里走到九十里的艱苦相等。而此由九十至一百里的階段，亦卽是和談進行的階段，這階段的不容易走，實同於其前作戰的全部階段，本此警惕，庶幾可以安抵目的地。倘使錯覺崎嶇遙遠的九十里尙能走過，而此平直寬短的十里更能走完，毫不顧慮的放大脚步走去，那就必然跌進陷阱，空走了其前九十里的路程。

三一、中共問題專家的程度如何：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都了解：美國國內外的所謂「中共問題專家」「亞洲問題專家」或「中國通」之類，由於其在這些問題方面研究的資料不足不實，便不够正確深刻。他們據以研究中共問題的資料，都不出五種來源：一是中共書報中特製的宣傳文章；二是二、三十年前曾在中國擔任學校教育或教會工作者的舊聞；三是近年來到過亞洲或中國大陸的商人記者及親共國家使領人員的傳述；四是根據片斷見聞的演繹；五是根據其研究中國數千年歷史，特別是近百年歷史的推斷；憑這類資料去研究現代正常國家的內情，尙不免淺陋殘偏，何況情形特殊的共產國家，更何況尤其特殊的中共。至於用這種以古證今、由源察流的方法研判現在的中共，自亦不免刻舟求劍，但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仍未盡離封建範疇，不似歐美工業社會現狀及其發展的全變故步，故循中國近代史以揣中共動向的研究方法，雖其結論多所錯誤，然尙未可厚非。加以美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在以前已比他國人困難，因爲他們與華人往來不到百年，雙方利害衝突的交涉又比英日俄法德意等國爲少，自不可能對中國有較深切的了解。現在又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東方的中共，並以共產主義的



原義，去衡量變質更甚於俄共的中共，已經距離事實過遠。及中共原形畢露，野心日大，又產生一種「赤禍」的恐怖，及紅衛兵造反，更增加一種「黃禍」的驚懼。在如此不寧靜的心理基礎上，根據平日胸中的成見與身旁不實的資料及中共特製的心戰材料如大字報之類，作為研判中共的門徑，自必轉側門外，無從深入。今日尚都還有人誤以為中共的第二代可能轉變，誤以為大陸七億人口仍然是它可以控制的戰爭資產，誤以為只要和中共坐下來談，就可以減少它的恣睢暴戾，誤以為只要限制中華民國討伐國內叛逆的行動，就能苟且姑息於一時，像這許多錯覺幻想，無一非由此種心理的事實的種種新舊因素所造成。美國政府如竟據之以作決策的參考，自必誤盡大事。有些專家們雖已漸悟前非，或已承認朶斯泰雅夫斯基所說的「共產黨人的統治，由無限止的自由，到無限止的專制，共產黨人的思想過程，由忠於共產主義而拋棄共產主義」不無道理，但仍不免誤於一念之私，他們眼見其政府與人民對於紅衛兵造反的急求理解，而自己又早被社會尊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倘亦一言不發，豈不喪失名望，也就只有根據其過去的一些知識，參考之以上述的五種資源，嘗試加以研斷，以慰各方之望。他們的處境，自與身負實際政治責任者不同，魯克斯國務卿可以在他蒞臨中華民國之時，在機場對記者這樣說：「我對中共現在進行的整肅風潮，還不十分瞭解它的真實意義。它到底是權力鬥爭或思想整風，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作適當的判斷。但我對此正保持濃厚的興趣，並密切注視其未來的發展。」他們就有所不便，這真是專家的苦惱悲哀！

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們，尚有一種可悲處，但亦為其可愛處的，那就是他們所抱名實一貫的觀念，總以為有其名，即必有其實，用此觀念以衡量美國的大部份事，自不致發生大錯誤，但移用在共黨國家，勢必全盤皆錯，一錯到底。共產國家與民主國家最大的差別，本不全在經濟政治制度的優劣

方面，主要就在名實乖離這一點上。凡生活在民主自由國家的人，總感覺其生活的情趣，恰與民主自由的意義相融合，而共產國家人民所感受的，則與共產主義大異其趣。此則由於共產主義早已名存實亡，絕不同於民主自由的名實一致之所致。且其乖離已不自今日始，馬克斯筆下的唯物史觀、唯物論、唯物辯證法，以及政治經濟學，本是放棄黑格爾辯證法屬於觀念世界的高級部份，而祇竊取其低級部份，再雜揉之以費爾巴哈的唯物論，由此構成其庸俗淺薄的一套產品，其作用本在使人容易錯認它是生活急流中可憑以進入天國的一塊「漂流木」。這塊漂流木流到列寧手裏，就再變質而為魔棒，因為列寧根本沒有什麼主義，只有策略，亦不是什麼革命家，只是縱橫家，自然只有把「漂流木」作為迷騙貧苦大眾的魔術棒。史達林與毛酋則更狡猾，索性放棄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另造一套符咒，務使人跟着他們機變百出的魔術棒盲進，走入距離共產主義更遠的地獄底層。這在轉側於惡魔脚下的人民，自會感覺迷惘而痛苦，可是遠居在鐵幕以外的人，怎能體驗及此。特別是這些具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氣質或思想的書呆子，則不但無此經驗，且常想超越現實，塑造某種美麗的遠景，而史毛的魔術，又正暗合其憧憬，自易不加思索，茫茫然從共黨騙人的宣傳上去了解共產主義，而很少從共產主義去了解共產黨，竟像急色兒是的迷戀魔女屍骸，變成了盲目的愛情。其間雖亦有人對共產主義逐漸發生懷疑，並厭惡共產黨的行為，但是仍因他們對此道的研究，連門徑尚未摸着，永遠只從走熟了的民主自由的路徑上去摸索，又怎能怪他們永遠讓自己的腦府作共黨宣傳的跑馬場，被跑得頭昏眼花，囁語百出？

最可憐的是，世界已變，而他們麻痺破碎了的腦子已不能變。儘管由於這時代技術革命的結果，不但使資本主義一詞完全變質，帝國主義已不再為歐洲人所喜悅，即馬列所改造的共產主義亦與目前

蘇俄實際進行的情形完全不同，而社會主義的解釋及社會組織的型態，在美俄英法德日南斯拉夫等國尤各有差異；但是在這些專家的讀書時代，何從想到竟會發生如此各種的新觀念新情形？又何從使他們確實具備認識現代變化的適應力？

費正清巴奈特等研究中國問題自最努力，只因其根據中國歷史去看中國今日中共問題，就不免牽強附會，求合舊跡。美國研究中國或遠東問題的公私組織雖甚多，但由於得不到今日中國大陸的真情，就總是捕風捉影，遠離事實。中華民國人士認識中共的所以特別深刻正確，並常痛惜外國此類專家的幼稚，就由於他們具有與中共鬥爭的長期經驗。他們所以反對西方專家們所說的毛酋蠻幹是由美國所逼成，便是鑒於過去左傾份子硬說中共叛變是由政府激成的荒謬。所以痛惜美國少數人的反對越戰運動，便是鑒於過去中國少數知識份子反內戰的糊塗。所以批駁由西貢河內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便是鑒於過去美國壓迫中國政府與中共成立此種政府的痛史。所以指責姑息份子的要求與中共和解，便是鑒於過去美國朝野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共停戰和談、政治協商的覆轍。倘使缺此經驗，則雖生活在俄共境內的高爾基，亦會被史魔欺弄的如愚童，直到被史魔毒殺纔止。當時曾有人把奴工營的悲慘生活及所在地點偷告高爾基，高詢之於史，史堅決否認，並允高去實地考察。待高到達那個靠近北冰洋的某一場所時，一個鞭撻、哀號、饑餓、疾病、死亡的奴工地獄，已經過趕工改造，變作愉快、活潑、健康、自由的勞工教育營，出現在高的面前，高大為滿意，並給它到處宣揚。及一九三六年大清黨案發生，史便誣指他是勾結帝國主義的叛國賊，買通醫生給他注射慢性死亡的藥物，死後却又在他的靈前作「光榮的守靈人」，這一狡毒的黑幕，非至赫魯雪夫向史魔鞭屍，誰能明白？以一個具有慧眼俊才的世界大文豪高爾基，史魔尚能運用其隔離飾騙的伎倆，使他五體投地，至死不悟，則並非生

活在蘇俄的知識份子，如法國的原子物理學家居里博士，當代藝術大師畢卡索，美國名作家德萊賽與福克納，英國科學世家海登博士，名政治學者賴斯基，這些國際知名學者嚮往蘇俄的左傾思想，也就不足爲異了。其並未到過今日中國大陸的學者如費正清、巴奈特之流，自亦在不足爲異之列。至其識解更不及這些世界頭等學者，並比費正清、巴奈特爲差的傅爾布萊特，足跡既未到過亞洲，問政亦在韓戰以後，則更屬「自郅以下，無足譏焉。」西方大儒學派對人生有個比喻，說生命像一匹面前懸了稻草的驢子，一直被誘進市場，牠除了那束稻草，什麼也看不見，這一比喻，雖堪爲美國的這些專家們寫照，然終不忍出此。

詹森政府固知其國人最崇拜各種專家，並自痛其對中越共的政策與行動，雖時受這些專家們阻撓，然亦未嘗不了解這些專家們並非真不愛國，而只是由於認識不足；事既如此，就只有本諸哀矜懲創的心情，逕向國人說明此類專家的學識經歷，纔能使全國人民恍然大悟，不致仍被蠱惑，亦纔能讓這些專家們棄其舊而開其新，不復被共黨一再欺騙。如再能就地取材，現身說法，引證極精幹的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尙因其並非軍用飛機專家之故，致錯認T F X戰鬥機的性能，不理軍令部長安德遜的據理反對，而堅持製造此型飛機，及事實證明其果不適用於母艦作戰，纔知理解不足，亦纔使同樣不是軍用飛機專家的總統發現當時同意麥納馬拉決定的失察，如此措詞，更可使人民了解真正專家的可貴與半專家的危險，並可使那些號稱中國問題專家者相悅以解，不致惱羞成怒，執拗到底。

三二、中共問題專家的性格如此：詹森政府應使美國人再了解：這種專家不但無知，並有偏愛，一有偏愛，便有偏惡，至少也會偏廢。明明是一項公認的事實擺在眼前，只要不合於他們的情慾，便如以不見不聞爲上乘的老僧。有時雖已被識者指出其原來的看法想法說法與事實不符，却仍抵

死不變，以爲如此這般，總比痛改前非要鬆快的多，並以爲一偏到底，還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他們既戴上這副情感衝激、意底牢結（ideology）合成的眼鏡，聊以自娛，如聯合國祕書長宇譚，雖是較爲瞭解亞洲問題的亞洲人，亦不會想不到越南如淪陷，其祖國緬甸亦終不免於赤化，但他竟說越南對西方國家並無戰略上的重要性，總想美軍退出越南，便顯然是犯此毛病。又如美軍轟炸河內近郊，原爲阻止越共向南滲透所必需，但美國左傾份子却痛罵美機炸殺無辜市民，而於越共在西貢市中心爆炸美國使館，反悶聲不響，這就偏愛到視敵如父，視己如仇，毫無理智，語無倫次了。

在具有這種偏愛癖的專家們，在思想上既傾向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便在言論上自然同情實際全是宣傳性的共產主義，對於共產國家的各種罪行，就總認爲是暫時的偏差，甚至認中共的一切作爲並不會錯，自有他的老謀深算在。本此觀點，作爲他們全部推論的小前提之一，恰如在一片「毛澤東思想」的星法院裏，接受怪異的幻想體驗，（星法院是英國古代設於威士敏特宮的法庭，以濫刑武斷名於世。）又恰如中國人譏笑英國人的所以愛戴獨眼眼鏡，在看他愛看的，避不看他不愛看的。而更正確的，則爲俄共始祖列寧和其嗣主史達林的指稱，列寧曾將自由世界中替共產主義辯護的人稱爲「聾啞人」，史達林則稱他們是「有用的白癡」。

加以毛酋善佈各種疑陣，以欺豎儒。例如他匿居瀟杭，久不露面，故意使人認爲他病倒或已死，並以欺弄其黨內的政敵，便利其捲土重來的佈局。忽又扮演游泳長江，使人震驚他仍健在，依然可畏，繼又數次現身天安門，却不說話，使人認爲他已瘋癲，更以神祕色彩，直接怖弄孩子兵，間接惑亂黨內外敵人。又如他用進退皆利的攻心宣傳戰術，企圖達成並揭露美國對待其友邦的雙重標準，使人不敢與美國合作，越南如被他攔得，他就說美國沒有積極履行其對越南的諾言，並證實美國是紙老

虎，美國如仍繼續助越作戰，就更努力於造成美國人的厭戰心理。再如他用幾次核爆，使失敗主義者更加慄慄危懼，振振有詞。又如故意淆亂觀念，將和平與戰爭兩個名詞對立起來，使人誤解這兩個概念的絕對排斥性，贊成和平的便應反對戰爭，主張戰爭的便是反對和平。又將安撫、投降、和平連在一起，使人誤解贊成和平便應避免戰爭，改走安撫甚至投降的路，由此觀念的混亂，再造成輿論與政策的混亂，以遂行其混水摸魚之計。其中極易看透，但有嗜痂癖者却又偏中其計的，如他過去誣蔑國民政府出賣中國給日本，真正抗日的則是他們，實則他們纔真是勾結日本者。又如日本投降後，他們惡意攻訐政府貪污，以遂行其全面叛亂的障眼法，致國際左傾份子竟忘却美國南北戰爭時，南部的艱危如中國，北部的貪濫亦如中國，到處滿目瘡痍又如中國，更不辨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即太平無事，不像中國的還須戡定內亂，由此健忘與昏憤，乃造成鄙棄國府，袒助中共的悲慘結局。中國大陸不亡於中共的軍事，而亡於中共的詐術，尤其亡於美國左傾份子的無知與偏愛，今後史家將必如此論斷。毛酋雖如花菓山中專變形相的猴子，而其統治的魔術，又最長於組成一個「印象幕」，勾起觀眾的幻想，覺得幕裏很美，真是無產階級的天國，不吝為它讚禮歌詠，為它的實現而禱祝，但只要觀眾好惡正常，總會看穿它是個大騙局的，惜乎「有所好樂」，就「不得其正」了。

這種專家們又最怕死，不像中國儒者正氣凜然，臨大節而不可奪，寧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寧赤毋死」的怪論，最能代表西方這類學者卑怯的人生觀。凡最怕死的人，又最怕人笑他怕死，便曲解事實，想出許多聊以解嘲的話，好先發制人。如他們故意說成越戰是內戰，用以阻撓美國的反侵略戰。又如負責籌備飛彈防禦與發展制度委員會的麻省理工學院，反而主張暫停反飛彈的防禦線，否則將使蘇俄感覺是「不友好的行動」。再如聯合國祕書長宇譚的蔑視聯合國

宗旨與自己的權限，竟說「越戰不能以戰爭解決」，「美應光榮的撤退」他都像是共黨集團祕書長是的。又再如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認釋智廣策平常事，曾說「當一個國家要建立一種新制度時候，常有這種動盪紊亂」格，看越南的怪事。更甚的是，原來發起圍堵政策的肯南，忽言「如果美抗」，「世上的事，沒有一件是值得我們拚命的。」爲什麼這些知識份論？一言以蔽之，怕死而已。因爲怕死，所以認爲越南在美國國防上並不地，回到美洲，造成西半球的直布羅陀，不管別洲的事，國家可以節省很送命。因爲怕死，所以會背棄其開國元勳華盛頓的遺教，不理睬其所說的些人就要犧牲生命財產，但是我們這些犧牲，可以爲我們後代子孫保存自解教皇保祿六世在復活節的講演以及他的詔書，教皇本在譴責共黨游擊隊全世界政治上的負責人重視正義，可是代表怕死心理的一些報紙，就斷章義的義師，要越南政府放棄其防衛侵略的戰爭了。由於自己怕死，就更怕後，會造成長期的戰爭，影響自己生活的安定。同時也怕一切有關的問題文章可做，稿費可得，便不惜故意把問題弄得特別複雜模糊以保持他們說是我無端糟塌專家們，而實在是書爲證的事，美國不是有具備大量研究要能作出震驚一時的論文，就立即可獲巨金，一如寫作「康隆報告」的人撥的三十萬美金。並且早有中俄共的不少外國社團散佈在民間，不怕不「他們「利令智昏」「臨難苟免」的背景與心理麼？

他們既怕死怕到極點，已如毛酋的中瘋狂走，你如提醒他幾件歷史的教訓，亦無用處了。西班牙內戰時期，阿斯提將軍不是怒吼「打倒知識」「死亡萬歲」麼？明末張獻忠不是怒擲億萬金寶於大浪中，叫大家不能享用麼？希特勒最後不是要毀滅全體德意志人麼？毛酋不是更要在核子大戰中，毀滅世界全部人口及中國一半人口麼？他們又怎獨能逃此浩劫呢？可是他們好像逞快一時，死也值得是的，這和毛酋的拚命奪權，已是異曲同工了。

更奇怪的，他們自毀名譽，偏又愛惜名譽。他們自知其各種言論主張已被識者痛責，未便繼續堅持，但爲了維護其專家地位，即又不得不杜撰各種理由，以文飾其非。如曾爲其政府拉票通過授權法案的傅爾布萊特，却對於東京灣事件的發生仍說成「可能是美國的挑釁。」再如越共早已在法國二度統治越南時期侵略南越，吳廷琰總統則產生於越南共和國人民的選舉，其後亦未獲美國支持，可是摩根索却說，「今天越南的戰爭是美國造成，當年吳廷琰總統也是美國造成的。」最大膽又最危險的文飾，則美國竟有姑息主義者認爲「容許中共獲得能與美國核武力相抗衡時，中共便可變得像蘇俄那樣對核武力及軍事作戰，採取更爲審慎的態度，使世界維持在戰爭邊緣的和平。」最自炫而實是自誤到底的，則在中共紅衛兵造反，敗象已明以後，他們也和毛酋一樣的各在胡亂掙紮，毛在爭權，他們則在爭名：如美國以前駐日大使賴紹華認爲美國需要一個強大富足的中國，應該取消禁運政策，使中共不再向外擴張侵略，並有力量牽制蘇俄，竟無視中共贖武侵略的本質。又如費正清雖已自感不便繼續恭維毛酋是中國儒教思想的繼承者，並已咒詛其爲暴君的化身，但他仍說繼毛而起者仍將用共產主義重整江山，仍未改變其寄望於中共下一代的舊想法。再如住過中國的賽珍珠女士則更在胡扯，她說「造成中國今日大陸的災難，基督教要比共產主義負更大的責任，」竟認博



愛平等的基督教教義比獨裁奴役的共產黨暴行還壞，作佛頭着羹式的論斷，企圖淆亂美國人的視聽，而爲中共洗脫罪行。他們所以用如此離奇玄妙的說辭，無非藉以炫示其博學深思，僞示其客觀公正，維持其專家名望而已。

他們的性格和作法，誠如 蔣總統夫人所說，「那些親中共匪幫專家們，曾把共匪無數次的失敗悲劇，歸因於歷史、傳統、心理、外國帝國主義，總之，歸因於每一個人與每一件事，祇把共匪政權除外。他們又把責任推到蘇俄和其他不喜歡北平政權的共產份子身上。」「這些中共問題專家們，因爲過去一直大謬特謬，爲求不致再被人發現其謬誤起見，仍然流露出一些樂觀情緒，借用含糊的比較之詞，例如他們認爲目前紅衛兵在中國大陸廣大地區進行血洗的報導，大都被蘇俄及其他不喜歡北平政權的共產份子，過於誇大。」

詹森政府既把專家們「半瓶醋」的學識暴露於美國人民之前，人民當然會看不起這類專家們，若再說明他們如此這般的性格，人民就更會唾棄他們。這類專家們被推倒之日，就是詹森政策大行之時。

三三、中國通的思想言論不夠通：詹森政府仍應緊接着使美國人都了解：像費正清、巴奈特教授的言論文章，確有歪曲中國歷史，爲中共辯護，或忽視中共本質，寄以幻想之處，而其謬誤各點則如下述：

費正清在最近二十年間，曾研究中國清代的制度政教文化社會史實，便在美國享有「清史專家」的榮譽。他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雖有「中國對西方的反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東亞：現代的轉變」(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東西：偉大的傳統」(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以上兩書係與美國日本問題專家 Edwin O. Reischauer 合著)：「中國沿海的通商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和「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等書，然皆不出於清史的範圍。他對於中共本質、作風、野心的研究，大都以中共的宣傳資料與聯邦調查局業經公開的情報為主，然後根據其研究清史所得的觀點，構成結論，自不免發生錯誤與幻想。

例如他認為中共是繼承中國儒家德治主義傳統政治的政權，它的敵視西方，是中國近百年來迭受列強壓迫的反響，顯係錯覺。中國的讀書人或日本的漢學家，都知道中國傳統政治的原則是仁政，傳統外交的原則是王道，中共所承繼的則為馬克斯、列寧共產黨的傳統，所模仿的則為史達林的暴行，顯然是違反中國仁政王道傳統的特殊政權。又都知道中國人民雖會痛恨列強的壓迫，却一向重視美國的友誼。中共則不然，它從佔據大陸起，便認美國為主要的敵人，盡力迫使人民反美，而必欲埋葬之，顯然是違反中國的王道外交，尤其違反中國人民傳統的親美精神。且「反響由於壓迫」這個前提如果成立，則中共首先敵視的應該是英法兩國，而決不是美國，更不應該反和英法兩國先後訂立邦交，為什麼費正清反要美國「必先自視為葡萄荷英法那些最初從海上入侵東亞的擴張主義者的後繼人，」像他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為什麼北京政權認為我們美國人是惡棍」一文中曲意代中共辯解呢？且在此文中，既指出中共「以邪惡和不平來闡釋歷史，」「今日越戰在幾項基本精神方面，迥異於古老的帝國主義戰爭，」又既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我們和俄國人所有的人類，多多少少都是根據着國際交往的法則行事，而中國則完全是在和國際秩序背道而馳，」並提及「孔子要人安份守己這種有關社會秩序的遺教，」為什麼自己却又如此的曲解歷史，而且不恤「逢君之惡」呢？尤其錯

誤的，是他祇知「孫中山主義雖不像毛澤東主義那樣激烈，但他對於中國近代遭受外力憑陵，亦描寫得淋漓盡致，」却不知在孫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中，只希望中國人以美國爲師，根本不會教唆中國人以美國爲敵。他又祇憂「在近代歷史上中國人和美國人在經驗方面的逕庭歧異，是會令任何中國的愛國之士義憤填膺的，他們的憤恨對象，可能是中國的命運，也可能是我們美國，縱令沒有共產主義，我們今天也可能遭到中國人的敵視，」却不知只要中共一倒，中國人不但不憤恨美國，而更會師法美國，親睦美國，並會永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和平相處的，其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宣言中所說的對外方針爲「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

費正清如真瞭解中國文化傳統及中共一貫政策，當可知中共仇美的唯一原因，並不在中美兩國經驗方面的歧異，而在中共決心要破壞亞洲的安定，便利其在亞洲稱霸，美國則決心要維護亞洲的秩序，要貫徹其門戶開放的政策，此乃是真正歧異之處。現在雙方衝突的焦點，則在越南與台灣，中共深知美軍如不退出越南，即必阻礙其對亞洲的獨佔，美軍如仍協防台灣，即根本威脅其政權的存在，所以它非仇美不可。

費正清這些錯覺的起因，如僅從他的著作上看，原只是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有限問題，他不過根據其舊著「東亞之現代的轉變」，「東亞之偉大的傳統」兩書中的論點、演繹而成的結論，應予諒解。他在「現代的轉變」中說到「中共承襲中國歷代統一政權的偉大傳統」，「中共一切作爲所採用的新方法，是綜合近代梁啟超倡導的公民理想，孫中山先生的民生福利，與蔣總統的國家榮譽，」既把匪行如此美化；並在「偉大的傳統」中說到「中國古代保甲制度，在一家之中每個人對彼此行動負

責，在社會上每一家應彼此負責」，並說到中共強迫人民的「坦白」，源於孔子「反省」的理論，又把它迫使人民互相監視告密的極權統治，牽強附會到保甲制度上去；自然更會擴大其觀點，並綜合其斷語，給它的一切暴行盡情辯解，且盡情辯解到如「現代的轉變」中所說的「愛國的中國人憎恨近代中國的不幸遭遇，一九四九年此種心理達於高潮，中共即把『美帝』當作中國苦難的主要根源」，更進一步的認為即使沒有中共存在，中國人民亦將是反美的。更盡情辯解到如「美國與中國」中所說「一俟美國人在心理上能適應的時候，我們要與中共和平相交，承認中共的存在，並不是外交的承認，……必要時要採取兩個中國的政策」。如此交互錯綜的錯覺幻想既盤梗在胸甚久，則他在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發表許多左袒中共的言論，自然不足為奇。

不過甚覺奇怪而仍需要略予指出、一併辯正的，是他曾說到「毛澤東甚至自以為他是馬克斯列寧與史達林的繼承者，但在實際的事實上，他更像在北京統治中國直到一九一一年為止的皇帝」，「他所面對的問題與所用的方法，大部份也是由中國歷史繼承而來」，「中共的誇大狂，是承襲中國皇帝奄有四海，要令外夷磕頭進貢的傳統」，這些論斷，亦只說對了一半。毛有帝王思想，確屬所見不謬。但忍不住要先請教的却有兩點：其一，費正清既和其他幾位教授及參議員一樣，要美國政府不孤立中共，要和「中共」多方接觸，是否包括向中共「磕頭進貢」的方式在內？要是中共竟因「不孤立」而強大，那時間美國官民是否都願意向中共頭子「磕頭進貢」？其二，費正清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中共新思考」一篇文章中，曾說到改造毛澤東不容易，但從技術着手，從重視其國際地位和威望上着手，並由他國慢慢做去，美國不予阻撓，或有希望，則如此做法，美國早已做過，結果總是碰壁，他國有什麼力量能使中共點頭？費正清自己也沒有對此下半句斷語，他國又怎敢着手？且在事實

上英國已下過苦工十多年，所得何在？

至於沒有說對的一半，則在其忽視了兩端：其一，則在毛澤東周恩來自己早已說明，並已被前任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森在衆議院外委會作證明時所引述，勞勃森曾說，「毛澤東早在二十五年以前，即爲他的目標訂下了藍圖，其明晰的程度，一如以前列寧和後來的希特勒所作的一樣。在廿世紀四十年代，當駐華的某些外交官員及觀察家報導毛及其囑囑並非真正共產黨徒，而是土地改革的民主革命者時，毛曾自述『我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在莫斯科領導下，獻身於赤化中國及世界』。一九四五年夏季的某一天，周恩來在重慶對我說，『何以美國人來到這裏而回去報導說，我們不是共產黨徒，而是土地改革者？應知道我們是共產黨，並且以此感到驕傲。』周並斷言『毛是一個十足的列寧主義者，是史達林思想的門徒。』」毛與周既說得如此斬截，而反不予採證，那就很奇怪了。其二，則在中國人民的傳統思想非常咒詛窮兵黷武好勤遠略的帝王，而毛澤東的思想則完全與此相反，在他的「沁園春」詞中，尚嫌秦皇漢武宋祖唐宗成吉思汗的武功太小，他今日「不要褲子要孩子」的做法，更是他絕對違反中國人民傳統思想的自畫供招。可是費正清偏又裝作不知，仍說它是承襲中國文化傳統，豈不奇怪！

更費解的是，他在「中國新思考」文中，胡說「中國人不相信人類平等！」（The Chinese did not believe in the equality of all men）他們甄擇優秀，施以正宗教育，授以官職，樹起軌範，要求人民尊敬，這與共產黨選拔幹部，灌以毛澤東思想，使治人民，有些類似」。這個說法，如僅在給中共的獨裁奴役辯解，中國人自然不須理會，否則就太輕視中國人的人格及其傳統精神了，「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是中國人家庭中的平等，所謂「絜矩之道。」「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是中國人社會上

的平等，所謂「推愛之道。」「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人國際上的平等，所謂「大同之治。」「有教無類」則是中國人教育上的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則是中國人法律上的平等。費正清既會研究過中國文化，為什麼竟把它一筆抹煞？此外，他說「史書記載的德治是神話，」則由於他始終是反對孔子學說，尤其不願正視孔學早經深入中國人心這個事實的一個外國人，自不足深怪，但他反沒半句話說到「無所不能的毛澤東思想」是神話，那就可異極了。

若深一層看，則費正清的用心亦似有問題。我本不想作誅心之論，但其真相既被他本國的衆議員阿希布魯克公開揭穿，自願表示同感。

阿氏在衆議院發表的演說中，指出「正當美國十五年來對北平的堅定政策獲得成功，毛澤東政權因而發生嚴重問題之時，却有一批宣傳家企圖改變我們對中國的政策，使北平政權獲得喘息的機會。」他並指出下述各人是中共游說團的代表，在學者方面有費正清、巴奈特、摩根索，在國會議員方面有傅爾布萊特、羅拔甘迺迪，在報紙方面有紐約時報、紐約郵報、華盛頓郵報，在學術團體方面有亞洲協會、亞洲學生聯合會、檢討遠東政策美國人協會等。他總結說，「由這些主要份子組成的中共游說團及其出版物，雖可能出於效忠國家的善意，但他們的游說活動，正在幫助及鼓動世界上所會看到的最殘忍最獨裁的政權，一定不可讓他們意見代替政策，一如在四十年代時協助完成的改變一樣，」證以費正清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之時，用了許多親共份子，分任處內處外各種要職，這些份子，今在北平紅朝工作的還很多。再證以他在「中國新思考」這篇文章的開頭，就抱怨「國務院十幾年來，對於中國問題只作盲目探求，開除了第一手經驗的職員，致在事人員對於中共多半毫無認識，」則其思想似乎根本就有了問題。退一步說，至少也是思想糊

塗，因為既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什麼連中國史中流寇的一貫行徑尚未搞通？更爲什麼到了寇酋毛澤東公然稱紅衛兵爲「閹將」而自比爲明末大流寇李闖的今日，尚認爲紅衛兵造反是中國歷史上自然演變的一種革命行爲，並希望美國多與往來，認爲它能變好？這除認費正清的心理上似乎有些毛病以外，實不易找到別的解釋。

巴奈特教授在中國大陸淪陷前，曾在北平研究中國問題，一九六五年曾至香港及台灣搜集中共資料，其用力的重點與方法和費正清差不多。故他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共黨中國與亞洲——美國政策的挑戰」(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一書中，強烈主張美國應重行檢討對中共的政策，主張承認「兩個中國」，雖然他知道這個主張不會被中華民國及中共所接受，但仍認爲這是「百年大計」，將一切希望寄託於中共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變，並以蘇俄之變爲例證。他的論點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課堂上引起中國學生的駁斥，但是他反問說，「你們認爲這個辦法不是比扔原子彈或在中國大陸從事大規模戰爭要好些嗎？」他在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提出「圍堵而不孤立」的建議，主張承認中共爲中國大陸事實上的政府，即爲其錯誤而又幻想的見解之一貫表現。他對中共情形亦僅爲「半通」的一個人，亦已顯然可見。

事實很清楚，從中共自絕於人民與世界的結果這方面看，它這一代已沒有不隕越的可能，根本就沒有第二代繼起的可言。即使這一代暫時不滅亡，但繼起的亦只是第一代中的第二層人員，而決不是第二代。又即使第二代人物或有突起的可能，但亦只會亂，不會變，亂纔可以從互相鬥爭中摺得繼承權，變就無法維持他們已經獲得的大權，因爲變後，就已不成其爲共產黨，即已喪失其爲共產國家與其在共產國際中兩重資格，此爲他們所最不願見的事。又因爲共產黨本是暴力鬥爭的黨，中共從組黨

至今四十年來，始終在互相鬥爭之中，毛澤東便是依靠鬥爭攫得大位，任何一代人都須經過權力鬥爭，纔能稱孤道寡，又都須更加擴張權力，纔能維護其新得的權力。現在毛酋尚未斷氣，他的第二層人員已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何況在其身後。又即使由於中華民國救民水火之師，尚被歐風美雨所延阻，致中共第一代的暴政苟延到第二代，或第二代中尚有未被第一代的少數派利用第三代或第四代在文革中鬥垮的人存在，而仍能在其各派鬥爭中崛起，但既有崛起的能力，則其必具有更奸險悍暴的氣質，必更無所不爲，可以想見。何況中共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經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長文中，已公然對西方幻想者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酋又接着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羣衆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鍊中成長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其「中央軍委會」發出的八條命令中的最後一條，更明白指令「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改造世界觀，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接班人。」他不但如此說，並已在如此幹，大風大浪的紅衛兵造反，除擴張其本身的權力以外，便是他鍛鍊接班人的社會教育；限定絕對實行毛澤東思想的「紅五類」子弟，纔有升學高中大專學校的資格，便是他造就接班人的學校教育。且又因紅衛兵只喜造反，不聽任何命令，不但生活腐化，並已行爲惡化，已由周恩來予以指出，則在此中產生的接班人，實已顯然走上「其父行劫，其子必更殺人」的道路，亦顯然要使得巴奈特之流大感失望。美國國務院與五角大廈似已看出中共只會亂不會變，正在想用政治攻勢加深擴大他們的亂，冀以減輕美國



全球戰略的負擔，自比教授們的見解高明一些，只是這種策略與希望，恐將和巴奈特一樣的落空。又即使如所期望，中共真變，那亦只有變到仍與蘇俄和好，決不會變的與美國共處，若變到這個境地，問題可就更大了。

其他幾個教授，如摩根索、林德貝克、萊特夫婦等在國會的證詞，以及一百九十八位「中國問題專家」用「亞洲學會」名義討論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於他們的理論，大部份是與在場的費正清、巴奈特相應和，無用再辯。小部份的錯誤，則不值一辯。

詹森政府當知道由於費正清、巴奈特等的門生故吏遍國中，他們的言論主張自較有相當的影響力，要是任他謬種傳流，就中國文化傳統言，自不會因他們的曲解而即損毀其固有的價值，但就美國對越南對中共對亞洲的政策方面看，已顯然蒙受不利，所以願將「如數家珍」的見解，供作「它山之石」的攻錯。

三四、難道他們是中共的議員：詹森政府更應使美國人民都了解：費正清、巴奈特這些教授們的「處士橫議」，畢竟因為對中共問題所知有限，且係被人利用，情有可原。惟代表民意的議員，並與政府為同黨，居然立異鳴高，且立異至於利用國會的議場，作反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戰場，假借一百九十八位學者的聲勢，提出五項原則，為姑息主義者張目，那就太不應該了。

美國民主黨內新孤立主義份子，左翼參議員傅爾布萊特、摩爾斯等，在外委會攻擊政府的越戰政策，經國務卿魯斯克等擊退後，就請羅拔甘迺迪參議員親自出馬，這位參議員也就請了費正清、巴奈特等教授齊來助戰，這是了解政治內幕的人所共知的事實。

羅拔甘迺迪身家富厚，志氣不凡，本是一位有政治前途的人物，缺點是太幻想，亦太性急。他組

織了一個民主黨的反對派，主張美國與越共和談，壓迫南越政府和越共組織聯合政府，主張姑息中共，作今後二十年大局的布畫。他這套主張的想法是：利用中共的力量去牽制蘇俄，即使中共的索價過高，亦應議價收買，即使他們這一代的人不會買帳，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終會接受，即使現在進行這種賣買異常艱苦，但只要能够保持一些關係，便可以不把中共逼到驅使大陸七億人口向世界發展，並和蘇俄修好，共同對付美國，更可以在中國大陸及越南全境乃至中南半島全域開闢市場，增加國力，以便更有同時對付蘇俄中共的力量。他覺得這樣做，總比費力費錢擊垮中共以後，尚須負起救濟中國大陸殘破貧乏的大包袱合算的多。

羅拔甘迺迪基本的錯誤，在於認為中共終歸會變好，不要使它孤立，讓它進入聯合國後得受愛好和平國家的感染，是重要的途徑，同時也是導致它裁軍禁核、親美疏俄的重要步驟。竟不細想下列的若干情事：如第一、孤立本是它狂暴行爲的結果，絕非來自國際不與它往來的原因，正如柬埔寨的施亞努親王所說，中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自取孤立。」且以前和它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曾有四十多個，其中究有那一國能對它發生影響力？在一九六四年法國承認中共時，也曾說明要中止中共的孤立，可是成就何在？它的並不理會這些好意，且更自絕於其友邦，又正如施亞努親王在同年九月十三日的演說，「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中共只賸下兩個朋友，一個是阿爾巴尼亞，一個是柬埔寨。可是在本年九月四日以後就只賸下了一個阿爾巴尼亞，因為它又失掉了一個柬埔寨。」第二、聯合國本是維護國際和平安全的國際最高組織，若先自破壞聯合國的憲章來換取中共的加盟，則中共入會以後是否更可援例破壞聯合國內的許多組織與定章及決議案，更給它製造機會來實行其多年聲稱要「改造聯合國」的威脅？且它既以進行世界革命爲目標，是年七月十三日它的人民日報又說，「推廣毛澤東

思想是中國海外工作人員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自稱有權干涉他國內政，那麼它今後是否更易狐假虎威，假聯合國名義去胡亂干涉他國的內政，要他們一體推行「毛澤東主義」與「紅衛兵運動？」第三、它已經表示得十分清楚，在共產主義未能獲得整個世界勝利以前，不能裁軍，並且說過，「聯合國根本沒有能力解決裁軍問題或國際間任何重大問題」，則讓它進入以後，是否會嚇得他國更不敢裁軍？第四、既怕它發動中國大陸的七億人海去侵略世界，爲什麼反不怕它併吞東亞以後更可以增加三億七千萬人口，給予世界更大的威脅？第五、既怕負擔救濟中國大陸的大包袱，爲什麼反不怕搶救東亞與世界時期所負的包袱更爲重大？第六、既感覺終止越戰便可取得東南亞的廣大市場，即使欲罷不能，亦採應取有限度的軍事投資，爲什麼不考慮這樣拉緊政府兩臂、拖住軍隊兩腿的作法如果繼續下去，能否保證今後的消耗會比以前減少？取得東南亞市場的代價更比以前爲鉅？時間亦比以前爲遲？第七、中共爲了奪取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尙且會與培植它的恩人蘇俄鬧翻，豈能與它視爲根本敵人的美國友好？且中俄共赤化世界的共同目標均未變更，而其在非洲的陰謀，却比以前更密切合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美國「人間事週刊」刊出史各脫（Paul Scott）的專文中明白指出，「南非聯邦的情報方面說，已有強力證據顯示蘇俄和中共目前在非洲的戰略地區似乎是（1）地中海，（2）東北角，（3）剛果——桑比亞——坦桑尼亞區域」。又指出「一個投奔西方的前中共駐蒲隆迪外交官員曾說，蘇俄和中共都確認剛果是非洲的首要中心，任何大國祇要控制了剛果，終將控制整個非洲，蘇俄已把非洲中部與南部各地區讓給中共去滲透，中共已接管坦桑尼亞的桑西巴島，不過該島上以及非洲中南部地區訓練游擊隊的武器與金錢，都仍由蘇俄供應」，鐵證如此，又怎能望它永與蘇俄斷絕一切關係？此雖爲局部行動，但又誰敢斷定他們不會進於全面合作？

要是依據商人交易經驗，認為中共所提「漫天討價」的條件，並不缺乏「就地還價」的餘地，那除非中共自願毀棄它賴以存在發展的基本立場，否則美國就只有接受它的要求，先從越南和台灣撤退，再從泰國菲律賓韓國日本以及整個亞洲撤退，纔有講價的可能，試問中共願意自毀它的生命線，或美國願意接受中共的支配麼？倘認為美國不妨假投降，以換取中共與美國共同對俄的真合作，那麼能否逃過蘇俄的眼力和破壞力呢？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地略學家史派克曼主張扶植戰後的日本，使它牽制蘇俄勢力的擴張，並在他著作的「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一書中強調其見解，這就投降後的日本與戰後後的蘇俄看，原是較易行得通的謀略；現在羅拔甘迺迪覺得美國戰後的遠東政策傾向於核子時代的新均勢主義，又歎美大英帝國過去採行均勢政策的明效，更感覺蘇俄雖為美國主要敵人的後患，便想以毒攻毒，以中共制蘇俄，這就由於中共不是投降後的日本，蘇俄也不像戰後的疲弱，不僅此計行不通，而且會反被中共所利用，並被世界所訛笑。今已有人視魯斯克的十點計劃與這些學究們的五項原則係一鼻孔出氣，且疑美國政府國家主義的基本立場即是如此，已顯出世界疑議訛笑的一斑。周恩來在魯斯克開出十點計劃以後，即報以四點聲明，其中除第一點係自知力量太弱，表示不主動對美國發動戰爭，無須解釋以外，第二點則已繼續表示美國武裝力量必須從台灣海峽退出了，第三點更悍然表示決以全力抵抗美國在亞非或其他地區國家的任何行動了，第四點更兇悍表示中共和美國的戰爭，決無地區的限制了，是則美國姑息論調的被中共利用，並被它硬索高價的情形，亦已得到證明。

羅拔甘迺迪令人更感奇怪的是，他連乃兄約翰甘迺迪曾經大聲疾呼的話，亦置若未聞。其兄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初，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曾以衆議員的身份，在麻薩諸塞州的薩勒姆發表一篇極

沉痛極有啓示性的演說，會對當時美國政府壓迫中國國民政府和中共組織聯合政府的錯誤及其後果，予以極確當極明白的指責。其中最足以供今日借鑒警惕的幾句話是，「這是我們曾一度爲維護其自由而戰的中國的悲慘故事，我們的青年所挽救的，竟爲我們的外交官員和我們的總統輕易失去」。「當局者未能一貫執行美國既定的外交政策，促成了盟邦的災難，也危及到我們本國的安全。我們看到一個共產敵對勢力，在原是我們堅定盟邦的境土內生長，我們也看到共產帝國主義將其影響力量，擴及於全世界，我們更看到我們成千成萬的青年，因盲目推行基於誤解歷史和此一敵對勢力而制訂的無效姑息政策，白白犧牲了他們的性命」。他更鄭重提出，「我們應當找出並暴露那些對我們現在困境應負責任的人，這是我們當前的急務」。麥克阿瑟將軍在引述他的許多沉痛話時，並說，「將美國前已答允中國提供的支助留住不發的決定，乃是我們歷史中所犯最大錯誤之一。」因爲「這一下，確把從海約翰時代以來所辛勤建立的一切，喪失淨盡。這是我們在亞洲大陸勢力崩潰的開始，有名的『紙老虎』也由此而來。其後果將遺害好幾個世紀，對自由世界命運的最後影響如何，尙有待將來事實的展現。」

如果羅拔甘迺迪認爲美國現在和中共往來，不會像以前所犯的那種錯誤，那麼勞勃森的話，最可供他及所有美國人參考。勞對毛酋是具有長期周旋經驗的，他曾肯定地說，「有人認爲可以藉或此或彼的策略，使他們放棄他的目標，然而照他們自己的標準看來，他們是劃一不二，始終不變的人物。」「依我看來，不論我們怎樣做，要期望這個瘋狂政權變得溫和，那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而且該政權並不代表中國人民，人民如能以石頭擊柄或者他們所能檢起的任何武器來和槍炮與炸彈搏戰，明天就會把它推翻。」要拉攏這樣一個極不穩定，天怒人怨的政權，去對付比較鞏固而且強大的蘇俄，而

這個政權又偏不就範，而羅拔甘迺迪却偏想這樣幹，豈不是錯誤加上錯誤！

又如果羅拔甘迺迪認為他的令兄那番話，只是競選演說，不恤自毀家聲，那就需要再提出其令兄當選總統後一件言行相顧，生氣虎虎的事。一九六一年他在維也納直接聽到赫魯雪夫口頭的最後通牒說到「我將在冬季之前，用武力奪取柏林」，便用冷峻的口腔回答說，「如果你志在必行，那就將會有一個很冷冽的冬季了。」他一回國，就徵召後備兵服役，終於阻止了從克林姆宮向柏林吹襲的冷氣團。他又料定赫魯雪夫遇有機會，可能施展障眼法，仍去奪取柏林，果不出所料，一種威脅美國安全、轉移美國注意力的裝置飛彈在古巴的事實，不久即被發覺，並又被他立即決定採取冒核子戰爭危險的行動，把蘇俄嚇退了，你能議他只會說，不敢做麼？總之美國的最高行政者會因選舉而變，而中共的侵略本質則決不會因美國的示好而變，如果今後的白宮主人竟實行不合理的對共政策，以臨決不會變的中共，則可以斷言，白宮將有變成「赤宮」的危險。

這些新舊事實和堅強理由，詹森政府是亟應使美國人民澈底了解的。前總統甘迺迪早經說過，「促成我們戰時盟邦中華民國陷於險境，而具有決定性的全部史實，從來沒有告訴過美國人民。」現在如再不把美國對越南對亞洲政策的正確性，以及若干學者專家政客錯誤的認識與主張，全盤托出，那就是現政府本身的錯誤了。不過有沒有信心勇氣作此項說明，還請詹森總統先自反省。要是魯斯克的十點計劃，麥納瑪拉的「搭橋」構想，尤其是史派克曼地緣政治的國家利益觀點，詹森本人及五角大廈的將軍們亦都心嚮往之，正如施亞努親王明知中共狂暴可恨而仍繼續和它維持邦交，甚至在一九六七年聯合國大會中繼續領先要求中共入會，那就頗成問題了，不但對於費正清、巴奈特等書生一孔之見，及傅爾布萊特、摩爾斯等議員紙上談兵之論，認為無用辯正，而對於羅拔甘迺迪雄心勃勃的政

略，反將認為是統一主和主戰兩大派的最高指針了。假使果真如此，那麼麥克阿瑟將軍的長號於地下，與其對生前一句話「其後果將貽害好幾個世紀」的雖死而不忘，反將不成問題了。

### 第三章 詹森總統的時代使命

詹森總統應先了解自己業經站在全世界全人類安危生死的最前關頭，同時也是最後關頭，轉危為安，轉死為生，實無可以卸責的餘地，再無可以拖延的時間，更無任何顧慮的必要。至於能否洞識其非常的急迫性，則在澈悟下述各事的無可改變性，及其必然成功性。能悟就必能行，能行就必能成。

一、一舉而成七種劃時代的關鍵工作：中共政權的所以急須予以消滅，實與七種世界大憂患有密切關係，一是中共已將共產主義運動與亞非等洲的民族主義運動聯合發動。越共武元甲所說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南越是民族解放的一個典型，美軍一敗，則世界任何地區的這種民族戰爭都可勝利，」最可作為中共觀點的說明。故中共一經消滅，不但越共隨之瓦解，而新興國家盲目狂熱、走入歧路的民族主義運動，亦將隨之改正。二是中共靠流寇式的游擊戰起家，史達林亦曾對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南半島進行游擊戰。今日越共的戰術，固是傳襲中共的衣鉢，即在阿聯基地上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向以色列滲透的游擊隊，亦受中共的組訓支援。更明顯的是，中共外交部長陳毅曾對新聞記者西蒙·馬雷（Simon Malley）預言將有「更多的越南」。他列舉北平所支持的地游擊戰說，「革命的解放戰爭，已經在泰國、南阿剌伯、葡屬赤道幾內亞、安哥拉、莫三鼻給、委

內瑞拉、波利維亞、瓜地馬拉、哥倫比亞等地熱烈展開」。美軍擊敗越共這種戰術以後，則中共正以全力作最後試驗的游擊戰教條，從此滅絕，其結果將同於中共在韓戰時期使用人海戰術的傷亡慘重，連中共自己亦不敢再試。三是中共一面用世界革命口號，革命輸出工作，向自由世界擾亂，一面用紅衛兵運動向共產世界威脅，又一面用文化大革命旗幟向其黨內外人屠殺，均帶有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浪漫氣息，一旦中共消滅，則此種毫無理性、不負責任的全球革命活動，將由此絕跡。而現代青年只求快意一時，不知禍延各方的浪漫行為，亦由此滅絕其誘發力。四是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在越南戰爭的勝負，將為兩方最後疆域及圍堵政策最後試驗的分水嶺，並為能否避免別處更大戰亂的決定點，而中共的存亡，則為世界安危的主要環節，此節一碎，全局可以立即改觀。五是中共憑其人多而怕犧牲的觀點，終將不理美俄核子禁散禁試的運動，會有亂幹的一天，消滅中共，即可以消滅此種危險。六是威爾遜總統苦心締造的國際聯盟，既被剛性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者擊垮，而羅斯福總統匠心經營的聯合國，又正被柔性侵略的共產主義者所癱瘓，致應負世界警察任務的前後兩種國際最高機構，均不能順利發揮其功能，致美國獨負世界警察的重任，並且不知獨負到何時纔止，已成為最吃力又最危險的任務。今惟有先消滅中共，纔能嚇阻俄共，亦纔能維持並伸張聯合國的威力，達成其消滅侵略的目標，而使聯合國永存於世界。其尤其是七，關係更大：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眼光短淺，抱負不大，處理失當，致俄共政權乘間崛起，第二次大戰將終結時，亦由同樣因素，致中共政權乘隙樹立，此實美國歷史上最無前例的最大失策。第三次世界大戰顯已局部出現，這正是美國補過圖功的最好機會，必須從越戰的勝利，產生壓服蘇俄消滅中共的結果，由此改變兩次大戰後的世界形勢，使美國一百八十年的歷史由此發射史無前例耀及後世的極大光芒。這七事，都是劃時代的關鍵工



作。這工作，現正如「八方風雨會中州」，奔集在白宫主人的肩上，白宫主人必須向此大關鍵處，用巨掌去撥轉它，用鐵肩來承負它，使它一齊走上福利人類安定世界及光榮美國的大方面。

這工作亦並易成功，只須認識中共的看家本領是決不打硬仗的游擊戰，而其基本原則則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針對它的原則下手，它就黔驢技窮。明白說，只要美國經常保持前進的攻勢，它就只有經常退却。只要美國永不退轉，它就永遠無從追襲。只要美國瞭解它在軍民協力時期，倘未能利用人海戰術取勝於韓越，就不必顧畏它在軍離民怒的今日，再敢用人海戰唬人，冀以擴大其游擊兵的聲勢。只要美國察知它的內門正殷，無論誰勝誰敗，總是內憂未已，自顧不暇，就不必怕它真會大規模介入越戰。只要美國知道中共會瞭解，如果南韓向北進軍，美太平洋艦隊封鎖中共的全部港口，美空軍由沖繩基地出動空襲，中華民國軍隊由台灣攻入，美航艦飛機出襲海南島基地，美軍在海防以北、龍州至蒙自以南，內擊外禦滲入北越境內的中共軍，駐泰空軍轟炸中共的補給線，並摧毀羅布泊及其他原子設施基地，則中共政權即有全部覆亡之憂，它既明白其後果，就決不敢四出闖禍。即以越共論，只要美國長驅直入，搗毀其游擊兵的策源地，同時堅壁清野，圍剿其游擊隊的竄擾區，越共就只有進退無路，陸續投降。越共既敗，北越既定，中共用以試驗其游擊戰術，民族解放運動，浪漫革命方式，到處放火策略的最後基地之越南，即被民主國家從根粉碎，而其終想最先投擲的核彈，亦由此冰消。且從中共的心理上觀察，它最怕北越在短期間內即被美國擊潰，若自己出兵救援，又正予美國以摧毀其核子設備及直攻大陸的藉口，這確是它「怕得要死」的大事。周恩來既對一家法國雜誌記者說及中共在必要時派兵入越助戰，不久即又否認，更顯然是它怕得要死的明證。它一怕美國擴大越戰，不得不嚇唬美國。二怕北越接受和談，不得不予以打氣，並予以提兵前來監視的恐嚇。

三怕世人看出它只是宣傳戰，不得不否認這項訪問，免得到時不能兌現。要是美國反怕它，豈不是自毀創造時代的大業；而反便利於中共的闢大禍？

要是不放心蘇俄，那也是白操心機。蘇俄除在太空競賽，稍能與美國並駕齊驅以外，其他任何方面都落在美國之後，只要美國不怕它，它儘管積極援助越共，甚至用地對空飛彈火箭等最新武器想擊毀美越的軍事目標，乃至美國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還是威脅的成份居多，試驗其產品的作用亦不少。要是它真有意在越南和美國一較高下，視越南如以前共產主義力量與法西斯主義力量在西班牙的纏戰，則美國如果意志堅定，態度強硬，如甘迺迪總統的對付蘇俄設在古巴的飛彈基地，不惜站在大戰邊緣，亦可同樣懾服蘇俄。即使僅說一句冷峻的話，如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對赫魯雪夫所說的一句話，亦可使蘇俄不敢向柏林冒險一樣，不敢逕向中南半島冒險。並且美國如真把越南看成古巴，就比嚇退蘇俄在古巴的飛彈設備這件事更加氣勢雄壯，立場正大，堪與保衛柏林的冷戰媲美，因為這是爲了全亞洲的和平秩序，而不祇是消滅自國後門之災，在美國是「師直爲壯」，在蘇俄則顯然是「理屈爲老」。在事實上，蘇俄最不能耐的，是怕中共搶奪它對共產集團的領導權。最看得清楚的，是怕兩敗俱喪的核子大戰。最不敢輕易改變的，是它向不打第一回合的軍事策略。如能由此瞭解蘇俄和中共同樣的不足畏，則斷然用雷霆萬鈞之力，擊敗越共背後的中共於美國幾千哩外而於美國本土無所損毀的地區，剷除其核子設備，無寧爲蘇俄樂觀其成。要是仍認爲中共已喪失理智，可能對外冒險，那亦正是美國求之不得的事，正是予以迎頭痛擊的絕妙機會。要是認爲蘇俄終是民主自由的公敵，它與其同情美國的痛懲其敗子，不如示惠於其敗子中共而使之回頭，那麼支持西歐國家負責對付蘇俄，美國則和亞洲民主自由國家盡力對付中共，並支持中華民國軍隊就近前驅，總比美軍膠着在越南有利的

多，更比等候中共有力量發動核子戰爭時期始採取行動尤有利的多。明智如詹森，必能善爲抉擇，而不致一日縱敵，造成數世之患，並可由此一念之轉，爲世界根絕七大之禍。

二、以心理建設永絕十六幕悲劇：美國今日最優越的，是科學造詣，工業成就，與經濟力量，而最感缺乏的，是國民的心理建設，此一缺陷的由來，則與科學造詣，工業成就，經濟力量的優越有因果關係。這在世界和平時期，最多亦僅能影響美國自身的前途，不致涉及全人類的禍福，惟在正與最懂得攻心戰術的共黨爭勝負之時，則成敗即可立見，並已有在華在韓在越在其他各地的許多事實可證，凡稍留心二十年來世局的人，都很容易舉出如下的十六樁美國敗於中共之手的事例，亦正是人類共望美國能够懲前毖後的十六樁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急求和平，不願再見戰爭，便表示願與國民政府協商解決爭端，並發動國內外姑息份子幫它吶喊，致和談氣氛一時瀰漫中外，尤以政治協商會議時爲甚，於是中國政府應有的而且是必需的戡亂政策，便被短視者譏爲不識時務，好戰黷武，美國且取消軍經援助，以資壓迫，大陸即由此淪陷了。這是美國不懂中共的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一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一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不懂它們在會議中慣用的策略，只熟習本國議會政治的常軌，便在國共代表各一人、美國代表馬歇爾一人的三人會議中，肆其簧鼓之舌，誘得馬歇爾倒向他們，輕易推翻了一「東北不在停戰協定範圍內」的成議，它乃得調動其散在東北各地的部隊，振振有辭的發動攻勢，致業已敗走至哈爾濱附近的林彪殘部，死灰復燃，捲土重來，東北一失，關內即逐步淪亡。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二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二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厭恨政治不清明，便一面加緊宣傳其延安政權的廉能，一面擴大攻訐國府政治的貪劣，同時唆使美國在華公使領事教授記者商人牧師等作它的擴音器，說成中國政府一無可取，好像比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及其結束以後文武百官更貪污是的，於是美國國務院的對華白皮書中，就特別強調中國政府貪污無能，把它一筆勾消了。這是美國不懂中共的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三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三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重視軍人紀律，更不許軍人濫職貪污，便特別製造事實，把它們劫掠民間強搶國庫的錢，向蘇北魯東一帶一小部份的政府軍隊，高價收買其美援彈械，並予以誇大傳播，務使美國感覺其軍援大半轉入中共之手，反成禍患，殊不值得，而美國也就信以為真，不再究問其因，詳察其事，居然停止軍援，而更便利於中共的叛亂。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四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四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喜歡的是政治民主，言論自由，而其自己最怕的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政制，而是法西斯主義者對付他們的作法，總想用一種威脅箝制的方法，使對方不便採用法西斯主義，所以從對日抗戰時期起直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被竊踞時止，繼續不斷的宣傳國民政府如何用警察特務強迫人民服役出財物，兵役糧政如何敗壞，人民如何痛苦怨恨，又如何箝制社會輿論，如何檢查日報雜誌，如何監視收毀其發行的新華日報，並發動國內外左傾份子與其同路人，一致慫恿美國新聞處長指揮其大小官員，齊起攻擊，直把國民政府比作希特勒政府墨索里尼政府，美國政府在這樣的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下，也就不辨真假，益感憎惡，不明用意，誤入陷阱，於是 蔣總統只得引退，政府中樞就此癱瘓，三軍士氣一落千丈，幣值下瀉，物價高升，舉國皇皇不可終日，其後果的嚴重，實比越南總

統吳廷琰的被殺更甚。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五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五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重視人民自由選舉，便在國共十次商談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堅持須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以便其操縱。同時自誇其在「解放區」內由人民選出的地方各級官員如何合法而廉能，倘政府不照它的辦法改選總統選舉人，又不承認它已經選出的官員，它就決不參加政府改組，以示它將自立政府，而在不明其奸計一些人，亦竟做了它的應聲蟲，助之張目。它復在政府依照憲法選舉立監委員與補選國大代表時，多方破壞，直和它當時破壞和平秩序一樣的起勁，直和它現在指導越共破壞越南的製憲和選舉一樣的惡毒，所不同的是，美國今日已比從前乖覺，所以不再在越南上它的當，而在從前則否，只是乖覺仍嫌不足。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六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六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重視知識人士的意見，便百計收買美英等國左傾的盲目的社會名流學府教授國會議員報館記者助它宣傳，對不受物質引誘的清介人士，則利用其好名心理，隨時獻媚拉攏，總使他們鋒利的筆舌，成為射擊中國政府的子彈，使中國政府既得不到美國政府的軍經援助，正處於劣勢的期間，而它反得利用美國社會的援助，更加囂張，於是國府在缺乏物質的道義的援助之後，一蹶不振，它乃得一舉成功。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七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七事。

例如中共和美國最重視軍人服從命令，便在對日抗戰後期，盡力宣傳史迪威如何服從 蔣委員長，如何能幹，一以反映 蔣委員長的孤行己意，剛愎自用，一以酬報史迪威主張裝備一百萬中共部

隊（甘迺迪總統任衆議員時曾據以指責其政府）的厚愛，假使不是羅斯福總統明察萬里，則中共在中國的叛亂，早已熾烈，美英在東南亞的處境，將更艱辛。其後在韓戰期間，中共又認定麥克阿瑟將軍的戰略，足致中共的死命，即又誇張其人海戰術的兇猛，並利用美國政府重視軍人服從命令的心理，使杜魯門總統知難而退，臨陣易將。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八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八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人都有生意眼，都計較本小利大的交易，又都重視中國大陸的市場，且都享樂怕死，便利用美國人這種現實主義的弱點，加意宣傳其「人民戰爭」的威力，以唬嚇美國人，又誇張中國大陸在戰後建設如何需要外國資金物資器材技術，以勸動美國人，又盡力宣揚其土地改革如何成功，以及如何與第三國際無聯繫，務使美國誤信它標榜的雖是共產主義或「新民主主義」，而實際是社會主義者，其叫喊的雖是向蘇俄一面倒，而在事實的需要上則必須賴美國投資；此種錯覺，至今未改，所以有「搭橋」的主張，大陸雖已鐵幕深垂，而美國人仍想「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九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九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最怕蘇俄介入戰爭，便在中國政府剿共期間，直接間接渲染蘇俄的軍事力量革命策略，後在韓戰中亦然，今在越戰中則更激使蘇俄盡力援助越共，總在加深美國的「恐俄病」。美國以前不敢贊助中國政府的戡亂政策，不敢批准麥克阿瑟進攻鴨綠江以北的戰略，今日不敢立即採用魏摩蘭摧毀越共庇護所與策源地的建議，致美國在亞洲戰場上今昔都陷於進退兩難，彼反得攻守皆利，皆由於此。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十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事。

例如中共既知美國最怕蘇俄，且已經它證實，即又加強宣傳它和蘇俄的歧見與利害的衝突，使美

國的姑息份子天真學究，誤以爲中共畢竟是外強中乾的弱者，是利令智昏的可以爭取者。且以爲它的援助越共，僅在與蘇俄爭奪共產國際的領導權，並防止蘇俄勢力進入它的西南疆，並非真敢與美國爲敵。而美國也就深信不疑，加重其可與往來的癡想。只有蘇俄洞悉其賊心賊意，一面在旁暗笑，一面和它鬥智，各在越南比賽神通，致美國蹣跚於事齊事楚的迷津，混蕩於謀和謀戰的越局。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疊惑被撓敗的第十一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一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人都有優越感，而在被外族統治已久的越南人又都有自卑感，便指導越共宣傳美軍在越南如何驕奢淫逸，如何糟塌越南婦女，賤視越南人，甚至旁若無人，喧賓奪主，擅代越南政府在軍事政治上作出各種主張，用此以投合越南人的心意，加深美越人的歧見，致越軍不甘於退作綏靖後方任務，越南政府深怕其自主權的喪失，並懷疑美國遲早終有出賣越南政府的一日。美既不自檢點，又以爲美軍在越苦戰，不應再約束他們的私人生活，致離國的中下級軍官，雖處在貧窮的越南國家，仍如生活在富裕的美國都市，動作於最重男女之別的東方社會，仍如活躍於戀愛自由的美國本土，致越民的反感日深，中共的得意日甚。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疊惑被撓敗的第十二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二事。

例如中共知以前中國的蔣委員長殷望實施憲政，選舉政府負責人，知今日的詹森總統希望獲得連任，便把以前施於中國的謀略如法泡製，一面利用美國人的厭戰情緒，特意把越戰拖延下去，使美國人厭棄詹森，一面又故意使越共放出可以和談的空氣，使各國政客競作奔走和談的勾當，致美國人民懷疑好戰者不是越共而正是詹森，詹森也就只有到處轉託謀和，以祛除人民的誤會，至於墮士氣，誤大局，幾無暇多計，直與以前蔣委員長的遭遇與痛苦大同小異。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疊惑

被撓敗的第十三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三事。

例如中共知美國人性情剛躁，缺少忍耐力，便對凡有美國人參加的任何會議，總是針對此一弱點，想盡辦法與美國人纏鬥，好使它在美國人急求了事的情勢中，獲得利益，更在美國知難而退以後，便利自己大幹。以前它給馬歇爾糾纏，纏得他不斷壓迫國府遷就中共，終致一事無成，廢然而返。在此以前，它已和國府糾纏十多年，從對日抗戰起，直到戰爭結束以後，迄未停止。國府官員雖相忍爲國，始終和它耐心商談，它總是節外生枝，使你疲於肆應，同時使你代負無誠意和談的責任。在此以後，它又在日內瓦到華沙會談中，和美國糾纏十多年，雖已談了一百三十多次，還是沒有一些結論。今後如果和談越戰時，它亦必指導越共給你如此的疲勞轟炸，炸得你心煩意亂，只得與它妥協了事。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十四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四事。

例如中共最怕美軍介入中國政府的勦共戰爭，它當時憂懼的程度，顯然遠過於今日美軍的參加越戰，不做到驅走美軍不止。又深知美國士兵愛頑女人，而中國人則最重貞操，便決定在這個矛盾中做手脚。恰巧北平發生女學生沈崇被奸殺案，於是立即借題發揮，推波助瀾，攪撥學生聚衆遊行，報館記者大肆渲染，激起社會趕走在華美軍的怒潮，以貫徹其孤立國軍的蓄謀。至於此案是否係中共栽贓或導演，願於日本故意使藏本隱匿深山，誣指爲中國人所殺，製造成「南京事件」，則因那時逆流排空，怒濤襲人，中美兩國政府都來不及偵查，而美軍的逐步離華，也就由此開始了。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十五幕，亦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五事。

例如中共知一切謀畫，尤其是如上述的各事，由自己進行，決不如使他人發動，由無名小卒開端，決不如使名望素著的知識人士發難或者響應。又知這類知識份子，大都好虛名，喜新奇，缺少主



見，極易動搖。就是美英等國的政府官員，亦因為重視現實，往往背棄原則。便大搞其統戰工作，先把這類知識份子統戰過來，再慫恿他們去製造輿論，包圍政府，然後玩弄各國政府於其股掌之上，以遂行其各個擊破之計。各國明練的官員，雖已吃一塹，長一智，不再盡受其愚弄，而所謂好名好奇的這些人士，則迄今昏迷如故，此在美國爲尤然，於是中共進行上述各種陰謀，便如操左券，無不立償了。這是美國不懂中共攻心戰術而被蠱惑被撓敗的第十六幕，亦是佈成各幕的樞紐幕，更是美國必須懲前毖後的第十六幕。

但中共雖極狡毒，總敵不過對方的一個「知」字，它知對方如此如此，對方亦知它必然如此如此，它就作賊心虛，黔驢技窮了。孫子兵法所說的「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詹森政府就是吃了「不知彼，不知己」的虧。孫子兵法又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詹森政府却又犯了不知「伐謀」之失。如果前事不忘，迷途知返，則中共的攻心戰術，即無用武之地。如果堅壁清野，別立營寨，亦臨之以心戰，則以美國「得道多助」的優越條件，進攻「失道寡助」的中共，它就更無還手餘地。堅壁自固，心戰必勝的方案，亦甚簡明。即一面努力於國民的心理建設，凡被共黨看透利用的弱點務使它不再存在，並使它變爲強點。一面務使國民都瞭解，凡是共黨所說的話，所作的事，所簽的約，總把它從反面去看，從側面去想，從四面攻防。但詹森政府如無移風易俗的抱負，而又司空見慣國內的情景，不覺得向以個人主義爲中心的社會，散漫自私的風習已深，適與擅長組織紀律的共黨以可乘之隙。又復茫然於共黨思想滲透，社會腐蝕，青年蠱惑，羣衆暴動的厲害，則更使它如入無人之境。而人民對宗教的信仰，又因朝夕徵逐於物質享受而日趨淡薄，即對於法律的遵守，亦因生活色情化豪華化商場化與黑社會勢力的猖獗而日益破

壞，則提防已潰，殷憂更深。若祇是隨共黨的「大社會」主義以改善極少數人的窮困現狀爲急務，而不知大眾心理思想的建設，更急要於社會經濟的建設，即使能做到人人生活優裕，亦恐「飽暖思淫慾」的人愈多，愈與共黨以腐化惡化的便利，這實是輔世長民的白宮主人應有的覺悟，應負的重任。

兵法貴攻心，教育重革心，不能倡率人民革心而獨自對共黨攻心，終不免事倍功半，甚至勞而無功，更甚至功不敵過。孫中山先生曾將心理建設作爲實業開發的前導工作，雖中美兩國社會的貧富不同，而步驟則一，且美國更較急要。中國孟子說得透澈，「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倖矣」，今日美國明明有敵國外患，並已處於戰時狀態，而國內的酣歌恒舞如故，政府放棄其維護正義人道的原則之事不少，社會破壞法治之舉尤多，道揆法守，上下均不重視，其資格地位同於君子的知識人士，思想言論又不免譁衆取寵，爲虎作倀，犯義極了，倘將來終不免與大敵蘇俄一戰，這不是在今日已自敗了一半麼？如說美國國力雄厚於敵人，不憂戰敗，則甚願其結果真如此，可是羅馬爲什麼覆亡？總該借鑑一下吧！

三、速利用稍縱即逝的大好時機：大好時機不常有，而在核子時代尤然。傑佛遜在一八〇一年派海軍去打巴巴瑞的海盜，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出兵冰島，杜魯門在一九五〇年參加韓戰，以及艾森豪參加利巴嫩戰爭，甘迺迪進攻豬灣，都未經國會同意而即獨斷疾進，就在認定最有利的時機亦最易消逝。無論從何方面看，現在正是一分一秒也不可充份利用的最要最好時機，再過一年半載，是否會更好？則國情勢變化多端，就很難說。

第一、就越中共現勢看，現在確是最可利用的大好時機。越共人員物資彈械的補充已經不如以前之易，北越與越共的主力部隊已大部出動，不但其在南越各路襲擊，最後掙扎的苦戰很難得勝，只

有被聚殲的危險，決不能在重要的戰略據點贏得夤緣府式的戰績，尤其他們的後方日見空虛，此正是美軍登陸北越猛攻的有利機會。要是中共部隊或其志願兵竟敢填補北越防地，又正是美軍求之不得的事，正好給以迎頭痛擊，並可追擊至中國大陸。何況中共現在的處境，比北越更為危急，北越既無內亂，尚有外援，一旦失敗，猶可以寮東與中國邊境為遁逃藪，其首領亦可獲得俄法兩國的政治庇護。中共則不然，外與世界為敵，內與人民為仇，既已自絕於內外，顯然更危於越共。復因其反對民族傳統的習慣風俗文化，更使大陸人民殷望中華民國的反攻，此一可供利用的情勢，亦為南越所不及。但其鬥爭的結果，恐將在今後一年半載內分曉，不會纏鬥過久。不論其最後勝利的屬何派系，均非自由世界之利。只有現階段，它正如已經熟爛的大毒瘤，只須刀一碰，便皮破血流，全身昏厥，而最鋒利又最接近的刀，則為中華民國的反攻軍，這都是已被兵法所謂「善戰者求之於勢」「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原則所決定的客觀事實，而非主觀的測斷。以前未能利用蘇彝士運河事件和匈牙利革命機會解放東歐，尚可諉為情形曖昧，敵氣猶強，不利於勞師遠圖，今則中共內亂外患的情形甚明，如仍束縛中華民國之手，不讓它操刀一割，殊無理由可言。中華民國政府人民與其在大陸的民衆，自不免憂慮千載一時的機會或將消逝，但更為美國及世界擔憂的，則為中共的急進派如敗，將再出現日本投降後蘇俄操縱中國的局面，不知美國如何應付？世界更大的危機如何消弭？急進派如勝，則其所為，必比推倒克倫斯基的史達林更為可怕，不知美國有何術對付這個更兇狡的「史達林」？世界有何幸運能逃避更大的劫難？那時美國儘管自悔今日的坐失時機，又究有何益？

人能料定後必自悔，當然不易，但如能回憶今日以前之失，總可減少今日以後之悔。美國今日是否已追悔登陸於諾曼第地區的失算？亂用白皮書勾銷中國的失策？坐視不理匈牙利革命、蘇彝士事件

的失計？則因其事已遠，且均非出於今日白宮主人之手，不必追問。可是當前不健全的對越政策，就顯然有悔改的必要。假使美國在參加越戰之初，就動用現在的兵力，則戰事早已結束，今日是否有噬臍莫及之悔？假使美國子弟早已從越南奏凱而歸，則以前中途選舉的結果，民主黨勢將更加勝利，詹森總統的人望亦將如日之升，今日是否有噬臍莫及之悔？在一九六八年度預算中，國防費高達七百三十多億美元，已超過韓戰中最高峯的四百九十億元，比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高峯的支出，亦僅少三十億元左右。其中用於越南的軍費，年達一百五十餘億元，幾佔全部軍費預算五分之一，為和平時期的最高紀錄，假使移以援助中華民國部隊反攻大陸，直接摧毀北越與越共的根本，何致殺死一名越南的敵人，平均須耗三十二萬二千美元的鉅大代價，而尙渺無勝利的時期可指？又如在越南戰場上，每日出動的飛機架次，與消耗彈藥的數量，不獨數倍於韓戰，且比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多，可是效率則相反，並不能消滅化整為零、夜襲晝竄的越共，更不能懾服北越。而北越來自中俄共供給的飛機飛彈高射砲高射機槍及地對空火箭飛彈，用以防衛河內海防的這些火力，已比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勒防守柏林的還强大三倍，美軍的犧牲率因此相對提高。假使越戰早在三年前了結，或中國大陸已由中華民國部隊攻入，是否越南戰場的情勢，決不像現在這樣的嚴重？假使美國不僅在毒瘤表面的越南開刀，而讓中華民國向亞洲毒瘤的要害處直接刺入，是否不致形成當前的局勢？這在稍懂得「圍魏救趙」或「伐亂」一「伐喪」戰略的人，總必能立辨其中的利害得失。假使再放過機會，再讓這毒瘤裝上核子牙，那麼在中共或可以靠此帶病延年，而在美國恐將如緊急計劃局所預料的「在核子戰爭爆發時，美國將有六千五百萬人口罹難，僅三分之一人口與百分率甚高的工業得以倖免」，那時美國雖後悔，可是支出的後悔教育費，不僅太大，也太過殘酷辛酸了吧！「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願詹森總統三復這句中

國的哲言。

第二就共產集團現勢看，今亦爲擊滅中共最難得的時機。這個集團的盟主蘇俄，正在劍拔弩張，欲得毛酋而甘心，雖不願坐視整個中共崩潰，但其竊望美國制毛，則已昭然若揭。且共產集團日趨沒落的情勢亦甚顯著，除毛俄衝突日益尖銳外，東歐各共產國家的獨立傾向，與其經濟制度的日益與英美接近，及其對於亞非新起國家的已經失去吸引力，又盡爲事實。在此階段，只須美國在越南採取麥克阿瑟越島攻擊日軍的戰術，跳過北越，而逕攻擊中國的西南地區，並支援中華民國向大陸進軍，彼此取得初步的勝利之時，則這些與蘇俄貌合神離的東歐各國，及地廣人窮的非洲新興國家，立即給華美兩國搖旗喝采，或暗送秋波，殊有可能。全世界的形勢既變，豈止越共氣餒，即蘇俄亦將頓感進退失據，狼狽萬分，一如其在阿聯第三次被以色列擊敗後的處境，美國於此時再仿行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及在阿聯慘敗後的經營，給蘇俄以某種程度的安排，則天下事大定於「迅雷不及掩耳」之中矣。

第三、就美國現勢看，亦已進於雲消日出，苦盡甘來之境。人民與各州長及百分九十以上國會議員擁護詹森的對越政策，而不贊同詹森的搖擺態度，則已在幾次的民意測驗中，幾次的通過越戰軍費案中，一次的州長會議中，及最近由杜魯門、艾森豪、布萊雷德、艾奇遜、貝爾納斯、陶格拉斯等一百多位最知名之士組織的「美國人民促進越南和平與自由委員會」對詹森總統職權的支持，一一證實。尤其自詹森下令大舉轟炸北越之後，過去的反戰派均平靜無譁，傅爾布萊特且警告北越勿低估美國的決心，費正清巴奈特等學究更如寒蟬仗馬，噤不發聲，或已改變論調、比中共已到秦隋王莽的末年，這般鷹揚於天，鴿伏於地的景象，充滿於五十一州之中。

反對越戰者雖有六種之多，其實每種都如小兒吹放的肥皂泡，全無實力。（一）如極左的進步勞

動黨 (Progress Labor Party) 這一小撮偏激的紅色人物，除了譴責美國政府的越南政策外，并會鼓動紐約的一羣狂熱黑人，去刺殺民權運動中態度中和的黑人領袖，又會當中共宣佈氫彈試爆後，致電申賀，貌似可怕，其實只是肥皂泡而已。(二)如美共和美共青年組織 (Du Bois Club)，自然也是反對美國參加越戰的主力之一，但根據哈瑞斯的民意調查，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國人感覺到在歷次反戰遊行背後，都有着美共的支持，則他們已如飛揚在民衆眼前的肥皂泡沫，實在經不起撲擊。(三)如左派學生組織，如以芝加哥為總部的民社學聯 (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便是一個代表。其中頹廢放肆的年輕人，本在反對美國社會的「冷漠殘酷與物質化」，他們的反對越戰，僅是反對美國的一個題目。這種「嬉痞」行為，更如頑童的亂吹肥皂泡沫，雖在逃避兵役，甚至焚毀國旗與徵兵卡，實在並無什麼力量可言。(四)如天真的文學家藝術家和人道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反對一切戰爭，因其理想往往與現實脫節，最後常被現實制勝，只是浪漫作家繪畫的肥皂泡而已。(五)如政見與美國政府不同的自由派，大都以為美國現行的越南政策不合美國的利益，諸如名政論家李普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漢斯、摩根索，便屬此類。這更是吹大氣的書生，雖不似天真小兒的喜吹肥皂泡，但天真則相同。(六)如各教會中的少數人，儘管各大教會組織不願對越戰表示意見，而且約束所屬教堂避免正式觸及此一問題，但是他們卻組織「Clergy and Laymen Concerned about Vietnam」一類組織，公開反對美國參加越戰，希望賺取「和平主義者」的美名，此則更不足為異，只是截取耶穌教義的一二節當作肥皂泡吹而已。總之，這六種人的反對越戰活動，粗看似乎聲勢不小，其實極端反對越戰者合起來也不過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而已。

這極端反對越戰者僅佔全民百分之六的比率，是根據哈瑞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民意調查算出的結

果。它會把美國人對於越戰的看法，分爲四類：（一）即爲上述主張無條件停炸北越並自南越撤軍的極端鴿派，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六。此外則爲（二）大體支持政府對越政策，但盼望戰爭逐漸降低，以誘使北越參加和談的中和鴿派，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六。則爲（三）大體贊同政府對越政策，但主張戰爭更加升高，以壓迫敵人參加談判的中和鷹派，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則爲（四）認定爲自由而發動的戰爭不是罪惡，極力主張發動全面戰爭，以澈底解決越南問題的極端鷹派，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八。同一民意測驗更表示贊同繼續轟炸北越的人，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反對的只佔百分之十五，無確定意見者百分之十三。

從這兩個測驗可以清楚看出：第一、政府的對越政策，誠然有着百分之二十四的反對者，但是其中的四分之三是反對政府作戰不力的極端鷹派，而主張撤軍與停炸者不過是其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全人口的百分之六。詹森總統也曾說過：「政府的最大壓力，不是來自主張廢棄戰爭的人，而是出諸要求加強戰爭之輩。」第二、絕大多數站在中間的美國人，大體同意美國現行對越政策，其中包括百分之四十的中和鷹派和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和鴿派，合計達百分之七十六，如把這兩派的中和性加減乘除，則可證明百之七十二人贊同繼續轟炸北越的測驗甚爲正確。第三、如果再把越戰擴大，自必能得更多人民的擁護。向受人民崇拜的二次世界大戰中五星上將艾森豪、布萊德雷主張猛打窮追越共，更是美國軍民及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共同心聲的代鳴。第四、就國外現勢看，與美軍並肩作戰者已有越韓紐澳泰菲六國，用各種方式援助越南者已有三十餘國，組織反共聯盟者已遍及於亞歐非及拉丁美洲的人民，聲勢之盛，方興未艾。

蘇俄與中共尙懂得它們處境的險惡而各謀出路。蘇俄忍痛採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用和平的偽裝

暫求自保，等待國際變局中有利機會的出現，再進行其征服全世界，奴役全人類的世界革命政策。中共則不顧一切的仍取左傾機會主義，用「文化革命」「紅衛兵造反」向國內外冒險狂進，作最後的掙扎，企圖由此造成起死回生的一線機會。蘇俄潛伏的危險性與中共顯現的威脅情形雖然不同，但它們各找機會各造機會的企圖與努力則無分彼此。它們無機會而在找機會造機會，美國則有機會而坐失機會，甚至授予它們以機會，豈不是使「得道多助」的佳境，將變為「失道寡助」的敗局，又蹈以前的覆轍？自一九五六年十月起，美國未乘匈牙利與蘇聯士同時發生事變，東德波蘭及蘇俄本身亦都既陷不安，史達林的繼承人又未鞏固其統治權之時，世界正值轉換之際，毅然有所作為，甚且背棄盟友英法，而竟與蘇俄一致行動，終至親美者寒心，並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地帶蘇聯土地峽永失控制，而第三次埃及與以色列的戰爭，及蘇俄在戰前戰後援埃的事實，亦由此種因，其事猶如在眼前。在二十三年前，羅斯福總統尙能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不贊成參加歐戰的逆境中，竟做到全國人民渴望出征，硬要他取消一九四〇年競選時向人民提出「如不被攻擊，即決不參戰」的保證，詹森總統豈有反不能在全國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民支持其所為之時，進攻北越之理？且據一九六七年三月蓋洛普民意測驗，全國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民已認定最威脅世界和平的為中共，則又為什麼不能對中共來一個應天順人，茭夷巨患的行動？是不是由於缺乏羅斯福那種旋乾轉坤的雄才，並缺乏杜魯門那種執着的牛勁，甘迺迪那種豪邁的氣慨？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齊國人常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則最好的時勢已呈現在詹森總統面前，誠不知今後是否尚有比現在更好的勢可乘，更好的時可待，甚願詹森總統有以語我來。



四、向着越過國際港汊的唯一捷徑開步走：民主與共產集團的立場根本相反，除非另有辦法能使它們改變，否則遲早總不免一戰。今日美國不敢乘機逞揚越共奧援的中共基地，或非憂慮中共真敢以全力介入越戰，當由於尚未完全看透蘇俄有無決心與能力使越共脫離中共控制？越共如親俄疏毛，蘇俄又作如何行動？將來美國軍事力量如進展到北越乃至中國大陸某部份時，蘇俄是否挺身干涉？干涉到什麼程度？並是否向南韓或歐洲或中東行動？那時法國會否與蘇俄攜手對付西德？英國的態度如何？又美國有無機會充分運用西德乃至日本這兩份力量？

美國所已知的，諒不外五端：一是蘇俄雖已改走曲線侵略路線，與中共的直線進行不同，但其資本主義的不變則無不同。二是蘇俄反毛不反共，現在惟圖推翻毛曾政權，將來仍圖控制中國大陸。毛曾志在掌握共產集團，僅反蘇俄今日的統治人物，不反整個俄共。三是蘇俄想由越戰造成美與中共的軍事衝突，中共亦想由越戰造成美與蘇俄的軍事衝突，各作損人利己之圖。四是蘇俄中共都想延長越戰以消耗美國的實力，加深美國與其盟邦間的歧見，加強亞非地區的中立，造成不結盟國家對美國的疏遠。蘇俄除此以外，還想激使中共調置重兵於越境，以減輕其對邊境的威脅。五是蘇俄與中越共都想攫取全越，作為侵略亞洲基地之一。中俄共這五種大企圖，同具一個總目的：「併吞全世界」。亦只有一個基本敵人：「美國」。

美國對付中俄共，只有一個原則：「兩害相權取其輕。」只有一個警惕：「需者事之實。」

第一、蘇俄所以明白指出毛曾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的主要目標在反俄，所以調兵駐中俄邊境，並公然鼓勵反毛份子，顯在造成國際聯合攻毛形勢，然後仿照帝俄利用義和團排外機會、瓜分中國的策略，扶植大陸親俄派，獨自控制中國大陸。其計如舊，則其勢更大，更不利於民主集團，此時

抗禦八萬萬人加核子武器的共產集團及蘇俄之艱苦，將百倍於今日。

第二、蘇俄此計如被阻於毛酋反修運動之下，則無論現代的毛共或下代的中共，其侵略氣勢必更猖狂，首當其衝的是亞洲，終受其害的是全世界。雖其暴力遠遜於控制中國大陸以後的蘇俄，但其禍害則較急迫，豈祇今日的越戰更易解決，而整個亞洲的火燄，尤使美國窮於撲滅。屆時蘇俄趁火打劫，更難防止。

第三、蘇俄經濟力量與科學工藝的精深，遠不及美國，既無力供應其東歐附庸國家急需的機械化設備與高級消費品，各附庸國的迫使蘇俄對美為某種程度的修好，以便恢復其對美與西歐的貿易，則已有跡象可指。至其不直毛酋所為，雖已見諸辭色，然亦未甘向蘇俄一面倒。美國如在此時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猛向中國大陸進擊，不但越共懼伏，即蘇俄亦因內憂尚多之故，未必敢與美國周旋於疆場。

第四、俄圖倒毛，急於侵美，這不但休於毛酋的威脅最迫近其國境，亦心知美國崇尚民主和平，歷史上只有美國支持俄國的記載，如一九〇五年俄敗於日時，美曾壓迫日本降低其對俄國的要求，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又大量援助蘇俄的所需。歷史中向無美俄大戰的一頁，今日尤無覆滅美國的大力，撫今思昔，儘可將圖美的遠略擱在後日。而衆叛親離的毛酋，較易擊潰，則已為美俄所共知。即使蘇俄深忌美國勢力伸入中國大陸，將調防毛的兵力，移以對美，將急扶親俄的潛力，以張其勢，可能造成雙方的軍事衝突，但總比日後蘇俄羽翼已豐，據點已固，合力攻美的氣勢要弱小的多。且今日攻其所不救，顯與今後攻其所必救的形勢相反，更是決定美國行動的客觀情勢。

第五、俄美雖都反毛酋，但目的大小不同。美僅在解決越戰，即使達成，亦很難避免助成蘇俄實

現其中立東南亞的政策，種下亞洲更大的禍根。蘇俄的目的則在重新控制中國大陸，如竟成功，美即更難過問中國事變及東南亞局勢。目前蘇俄的和美，在借美制毛，不在聯美反共，與美國反共先反毛的步驟迥然各異，美願與蘇俄長期全面合作，斷不可能，所可能者僅現時在反毛及反核子擴散兩大事上。且毛如倒而中共的核試設備仍在，則蘇俄不但會推翻禁散禁試成議，更會進一步聯合中共的設備與美國競賽，打破核子僵局，獨佔核子優勢，以爲其橫行天下的憑藉。勢既如此，則美國急速利用現在與蘇俄共同之點，巧妙避免或縮小與蘇俄分歧之處，乘蘇俄公開反毛之際，先摧毀中共核子設備，已爲無可再退的步驟。若能資助中華民國動手，自然事更簡利。

第六、蘇俄總想開成國際共產會議的作用，不外三種：一即共制毛酋，二即同援越共，三即準備在西歐或西亞（即中東）分散美國升高越戰的軍力。第一種作用的成份較多，第三種作用的成份則更多。蘇俄因爲「中共蘇俄友好條約」尚在，不便與中共正式斷絕關係，只得在國際共產會議中明正中共罪行，藉以打破難關，此種策略雖已爲中共覷破，且正在阻撓，但蘇俄並未停手，故其企圖達成第一種作用的成份顯然可見。第三種作用則更廣泛深刻，最不利於美國：一因蘇俄僅須誇張集團聲勢於外，調部份俄軍於邊，濟之以顛覆操縱技術，即可逐漸達到它倒毛之目的，無須直接訴諸武力，致自貶國際共產領袖的威信。倘所料不謬，則以暴易暴，且如虎附翼，於美何益？二因積極援助越共，不但運輸困阻，並不免與美軍發生衝突，但如出沒萬變，虛張聲勢，亦可使美英等國的姑息份子危疑震撼，紛起困擾白宮。此時由東歐共軍突襲西歐，由韓共突襲南韓，在中東挑起回猶爭戰，則南救越共，東困美國，使美國更不能全力對越，當爲蘇俄應有的策略。即使蘇俄暫不出此，則越共在俄毛不兩立的現勢之下，亦必選擇一途，它如親俄，則可使美國沉酣於望俄促和的夢境，愈受拖延之苦。它

如親毛，而美仍不速戰速決，則亦坐失難得的機宜。它如仍俄毛並親，當非蘇俄所能耐，亦即爲美國軍事行動最有利的機宜。

第七、美如希望蘇俄助成越南和局，則蘇俄以戰爭爲目的，和平爲手段，美國以和平爲目的，戰爭爲手段，不但彼此志趣相反，無可與謀，並因越國鄙遠，亦爲蘇俄力量所難及。且爲長遠利益計，毋甯竊喜毛酋反美，便利於其貫徹拖垮美國的謀略。即爲其目前反毛的利益計，亦不希望結束越戰，致使毛酋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自己，其分散毛酋力量的需要，殆與其需要分散美國的力量相同。故希望蘇俄共同反毛則易爲力，要蘇俄共同勸阻越共實少可能。即使毛酋自斃，越共轉向，然因蘇俄聲勢已由此高翔之故，美所得者雖不同於法國在奠邊府的撤退，終無異於作西貢城下之盟，此後欲再樹立威信於遠東，比今日猶難百倍。今日中共支援越共侵略，美國尙難對付，他年中俄越共三大暴力聯合行動，更將如何狼狽？現在越南小範圍的戰爭，美國尙可望蘇俄從中斡旋，他年由蘇俄領導的世界大戰，更請誰去謀和？

第八、美如急求脫離越戰，不惜多方聯俄，並遷就越共，或可達到目的，問題在是否願意失去歐洲重心的西德，默認蘇俄永裂德國的主張？是否會激成西德國家主義勢力的發展，或促成西德與法俄相互間的新關係？又是否再失去亞洲重心的中華民國，不惜重犯簽訂雅爾達協定的錯誤？即使不高談國際間最需要的正義和平，亦不細究西德今後的動向，及蘇俄要挾的條件，而僅計及美國的利害得失，則亦早有往事可資參鏡。羅斯福因急於敗德，讓俄軍直進柏林，德國遂分爲二，歐洲亦遂一半關入鐵幕，歐非南美各洲亦遂不斷發生各種事變。又爲急於敗日，讓俄軍進佔中國東北，整個大陸遂落入蘇俄臣僕之手，韓越戰火亦遂彼滅此起，至今未熄。詹森總統急於謀和的結果，那當然是「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

第九、蘇俄不敢直接進兵攻毛，非止顧慮附庸國的不安，主要怕毛會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美國進軍中國大陸時，英國自不會同情法國的歐洲主義，坐視法俄朋比爲好，因緣爲利，但俄必求法如此幹，中國大陸人民亦難免不受毛酋煽起，却不可忽視。若美國資助中華民國北伐，則爲戡亂的內戰，爲救民的義師，爲防止共黨侵略，保衛民族獨立，堂堂正正之舉，絕非蘇俄所能假借，更無理由阻撓。美在世界雖有歷史上的信譽，自不患師出無名，但總不如中華民國獨具與衆不同的先天資格，國軍一旦入境，不但大陸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雨，如屠牛熟手的動中竅要，亦遠過於以色列對阿聯兩次戰爭以小勝大，以寡勝衆，所至皆呈破竹之勢，並可使美國面臨西德與蘇俄間左右爲難的情勢，與法國可能利用中俄共困擾美國的異動，及英國或先中立觀變，徐作調人的態度，凡爲美國所憂者，均可因中華民國自復其國的行動，一一擊破。如此順理成章，事半功倍之役，當爲深嫺政略戰略地略的大政治家所樂爲。

第十、美俄決無長期和平共處可能，這不必從共產主義看，僅就俄國人的特性看，亦是如此。從古代到現在，從政府到人民，他們總視西方人爲間諜，今雖已爲西方機械文明的門徒，但最不相信西方，並且最恨西方，總覺得自己無法在西方文明的原則裏堅固的站立起來，這在百年前的辜斯丁即已注意到此點，而在今日則更甚。故美不圖俄，俄終必圖美，並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起，一直以顛覆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首腦的美國爲要務，只因至今仍無力量直接向美國作軍事行動，纔與美國及西方暫圖苟安。美只須認清這一點，則除確有把握能用其他方式使蘇俄與自由民主國家和平共處到底以外，就自然產生並很容易決定一個立即動手的對策，遲則蘇俄的經濟力量已够作總體戰，

雖不能制勝於旗鼓相當的核子戰，並甚懼其本國的犧牲更大，終不敢冒此大險，但足以支持其長期傳統戰的經濟力量，則已在和平共存的口號掩護其滋長之下，可以具足，倘毛酋已倒，則其力更增。事既如此，則以實力本強，再加上「先下手為強」的兩種強力去制服蘇俄，顯然是僅有的一條必勝之路。除此以外，對中俄越共三方面，與對西歐各國方面，無論採何種策略，無論如何周旋，總無萬全之策，祇有徒喪時機之失。且只在考慮進攻北越乃至中共時則蘇俄及各國的行動如何，亦未免所見者小。若真從大處着眼，並從大處下手，則不但不會注意這些枝節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亦已無發生的時間。倘見不及此，只從這些枝節問題上左思右想，那麼本來不及形成的這些問題或情勢，就反有使它形成的時間了，這就是前所說的「需者事之賊」。

在以前各章節中，析述現在及今後國際局勢之處已甚詳，此處則為扼要總結，斷然指出世局雖甚錯綜複雜，同於紛歧灣疊的港汊，但如看清其中利害輕重大小之別，擇其較輕小之處，集中力量對之躍進，則一切現有的及將起的國際形勢，會被凌厲磅礴的氣勢壓倒而顯得輕微渺小，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前，一一辟易於後，而其力的巨大，勢的銳捷，惟有最猛速的核彈火箭堪與相比。倘或不信，可在越南戰場上先試驗之，一試見效，立即續此前進，進到確信今世大敵已經懾服為止，此實為美國應採的並為能行的躍進戰術，麥克阿瑟將軍試行其越島戰術於太平洋而曾有效，今日美國為何不能？不能在心膽而不在戰力，何以故？在被中共俄共越共迷失判斷力之故。亦即美國決策階層妄想中俄共火拼，或妄想聯毛制俄，或聯俄制毛，甚至妄想俄共抑制越共，致事實上形勢本較簡單，而心理上反弄得複雜，並影響及於全國民衆心意亦由迷亂紛歧而至於畏共畏戰，更使決策者不敢決定其有效的行動之故。八年來躊躇不前的癥結在此，今日則無論從內外情勢觀察，已到破除此一癥結的機會，只看

躍進的尺度如何了。

五、勉爲一言興邦的巨人：白宮主人總比他人更清楚，美國人民對國際問題的瞭解總很遲鈍，需要反覆啓發，甚至要到事象呈現以後纔會醒悟。此種情形尤以對俄問題爲然，例如在四十多年前，認爲蘇俄政權不出五年會垮台，到它年復一年的延續下去，纔知預料錯誤。在三十多年前，又認爲只要西方給俄人以足夠的鼓勵，他們就會隨時推翻其統治者，直至俄人始終沒有動靜，纔知認識錯誤。在二十多年前，不信史達林會有侵略陰謀，直到共黨在捷克發動政變，蘇俄又封鎖柏林時，纔知三年前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所言蘇俄想赤化世界確有見地，並知當時一些人要求罷免其大使職務實在荒謬，又纔佩服二年前邱吉爾描述歐洲已由鐵幕分割爲二的名論卓識，而感慨當時攻擊邱相的紐約、密蘇里若干美國人的愚昧狂妄；但尙不知對俄採取行動，必待到馬歇爾計劃與大西洋聯盟出現，纔開始有了反應。及赫魯雪夫上台，又以爲蘇俄可從此與西方國家和平相處，直到他把飛彈裝在古巴，纔又明白對俄的知識還是不夠。美國人固然如此，被關在鐵幕裏的蘇俄人民自更懵懂。克姆林宮的首腦也好得無幾，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到現在的當權派，總認爲美國是由銀行大亨和工業鉅子所控制，是與蘇俄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溝通美俄兩國人民的觀念，確實是關係到今後十年廿年人類禍福最基本最重大的一個問題。

這件大事自然需要先向美國民間做起，其治本工作當然是學校教育，而其治標急務則首先落在白宮主人的肩上，因此當今總統詹森先生的言論態度就有極端審慎的必要，至少不可有損己利敵的言論，而中國孔子對魯定公所說的「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這句話，是值得深深記取的。爲什麼？因爲以前美國高階層人員的隨便說話，已發生許多流弊在案。

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真相與怪論，前已指出，但竟怪誕到敢於侮蔑自己國家的歷史事實與元勳遺訓，則顯然是被華府要員引起的。例如「圍堵而不孤立」，「搭橋與中共往來」，「中共政權已趨穩定」，「今後將變得溫和」等怪論，何嘗自今日始？不是甘迺迪總統早就聲明，「如果中共要向我們買穀物，美國就考慮出賣」麼？不是一九六四年商務部長又宣佈，「自四月一日起，放寬對中共貿易，非戰略物資准由外國公司售予中共」麼？不是一九六三年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何思曼已一再聲明，「美國打開門戶，以待中共態度可能的改變」，及一九六四年又解釋其聲明「並不是什麼新政策，我只是明確闡述了我多年來一貫奉行的政策而已」麼？不是主管政治事務助理國務卿江森接着說過「中共控制已非常有效」麼？不是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史蒂文森早說過「中共政權已趨穩定，這是我們多年來所承認的事實」麼？不是一九六四年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巴賴特早說過「美國人一定準備大陸政權可能變質的」麼？不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間美國派往波蘭與中共談判的新任大使格羅諾斯基，就早提出向中共搭橋的主張麼？像這些總統和大官的主張，不都是早在傅爾布萊特舉行聽證以前就公開表示的麼？及聽證會以後，就說得更露骨了：首先是副總統韓福瑞說，美國不願「把中共從人類的家庭中孤立起來。」接着是國務卿魯斯克也改變論調，曾在衆議院外委會作證時列舉十點方案的最後六項中，除阻止中共入聯合國外，其他均與左傾姑息份子很少差異。又接着是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亦公開響應「搭橋」的聲調。至於國務院批准密西根州民主黨議員范芬前往中國大陸之舉，則和美國在華沙與中共長談至一百數十次同樣是事實活動。尤明顯的是，一九六六年意大利等六國向聯合國提出設立委員會研討「中國代表權」問題一案之前，若非白宮早已點頭，高德柏便不會公開支持於後。更有極危險的想法是，白宮一方希望中華民國政府等到大陸出現全面反共行動時，纔配合進軍，



他方又想予並已予中共以某種程度的援助，使它發生牽制蘇俄的作用，同時坐觀中俄共正式決裂後的勝負誰屬，再作計較。姑不論等待更好的反攻機會無異等待機會溜走，其結果同於等待中共下一代的埋葬美國的下一代，亦不論坐觀成敗同於容忍蘇俄控制中國大陸，並不論助毛同於養虎自衛，而只就美國政府竟把這些幻想作為決定政策的基礎，並且見諸行動這一點看，也就不必多怪所謂專家們的想法入非非，其聲喑喑了。

還有可笑的是：尚未認識對方而即貿然承認其地位，不到被承認者暴露其侵略舉行動，便決不會自己認錯的情形，不發生於所謂專家，而推出於高高在上的政府。例如在希特勒政權成立之初，英法等國即相率予以承認，必待至數年後希特勒進攻波蘭，纔認識其政權的性質。在中共竊據大陸之初，尼赫魯即搶先予以承認，並盡量予以讚譽，必待到數年後中共侵入其邊境，纔認識中共的真相。英國承認中共雖略後於印度，但其不認識中共之咎，則因其文化高於印度而加甚，其今日在香港的備受中共狂攻，英女皇的玉照亦受到污辱，更是咎由自取。美國今日的構想與作法，又何以異是？英語（Recognition）「承認」一詞，本兼含「認識」一義，尚未認識而即予承認，似乎比所謂專家的知識份子更差勁了吧！

文過飾非，政府要員有時亦比所謂專家更甚，而其惱羞成怒，形諸行動，似亦過於「專家」。例如美國在不行動與行動之間，往往從自由主義的倉庫裏，搬出大批陳腔濫調。在蘇聯土事件中，美國所採取的反西方行動，被艾森豪總統及其助手解釋為「人類平等」「放棄武裝侵略」「增進聯合國權威」等觀念的勝利；爲了避免和蘇俄直接衝突，幾乎變為合作。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國採取消極態度，却大肆鼓吹「人民不死的精神」「專制政權必崩潰」以及「自由、真理、公平、和平的未來勝

利一等爛調，除如此空喊以外，什麼都不做。這樣的掩飾過失，豈不被專家們認為是「好同志」？尤可笑的，傅爾布萊特竟似成爲死鬼王若飛的後人，他用「希特勒墨索里尼」字樣形容詹森的一幕，直和一九四五年中共王若飛在國共商談中詆罵國民政府是「希特勒政府墨索里尼政府」的措詞相同，可是詹森總統的雅量，又似乎比當年蔣主席及其代表爲差，一氣之下，便在某次招待議員的名單上，狠狠勾銷了傅爾布萊特之名。政府首長與其高級僚佐的表現尙如此，則既無知，又偏愛，且怕死，更沽名釣譽，並有各大基金會大量學術研究費可得的學究們，爲什麼不冒充專家？又爲什麼不組織「中共游說團」，並利用「教會聯合會」「民主行動委員會」等民間團體爲外圍組織，明目張膽地爲中共說話？中國人自能想通這些專家們所以不明中國問題的原因，而想不通的則在白宫爲什麼始終不忘與赤魔勾搭？本不通者自詡爲通，尙不足異，本通者偏說出許多不通的話，幹出許多不通的事，豈不可怪而又可痛！

曾被政府教得更會鬧天宮的一羣在參議院內外的猴子，現在已不再鬧，其中贊助政府的亦日多，可是直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前，詹森政府仍少改變行徑，似仍昧於舉國一致的政府與人民足以嚇阻中俄共的動武。難道不知下列的各種事實麼？例如傅爾布萊特是本來嫌惡吳廷琰總統的，但從西貢事變一發生，就與共和黨領袖狄克森同樣認爲「把吳廷琰毀滅是一個錯誤」；他本是主張美國應從越南撤回的，但今已感覺美國只有打下去。又如史卡拉賓諾是本不同意美國的亞洲政策，主張與中共妥協，且爲一九五九年「康隆報告」起草人的，但從一九六五年起，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並在聽證會上挺身爲政府辯護，甚至曾是共黨的同路人，或一向是史達林的親信黨徒亦有回頭的，如美國著名的左傾記者路易斐雪，法國的名作家安德烈瑪爾路，都在一九三九年史達林簽訂俄德互不侵犯條約後，由

親共而變爲反共。又如擔任蘇俄「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學院」院長，本爲史達林親信的瓦爾加教授，即在一九四五年前後，著書盛贊羅斯福的新政，修正其左傾的立場。詹森政府終究也會憬悟下述的事實吧：美國的強教運動，類於一九三三年英國牛津大學的「牛津聯合會」，當時雖曾決議「不替英皇或英國打仗而殉職亡身」，被邱吉爾首相在他的回憶錄中指爲「很可恥的決議案」，但爲時未久，通過這個決議的學生們又都參加了「光榮的戰爭」，且變成爲英國近世紀中最好青年的模範。又如一九四一年間，英美兩國都有不少和平團體，從事和平運動，反對政府參加戰爭，但是一到日軍偷襲珍珠港後，這些團體就都變爲同仇敵愾的大血輪。這類人的可變性，今更見於一九六六年底在金山舉行的中國問題討論會中，如一向僅稱中華民國爲「台灣」而不稱中華民國，對中共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稱爲中共的費正清、史卡拉賓諾、拉費維等，都改變了他們習慣的稱號，正確地稱中華民國，不再稱「台灣」，稱中共，不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卡拉賓諾的分析中共情形亦比以前深刻正確，改變了不分黑白的態度，已認定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嚴重分裂，任何一派都無法有效控制全局，如軍方得勢，必將繼續強硬對付蘇俄，若不能取得絕對最高權力，更可能流爲分區對峙局面，一如以前軍閥的割據。他這種業經改正的觀點，以及他在聽證會上一口咬定南越共黨是由北越支持，而中共又在北越幕後的指責，有前後輝映、相得益彰之妙。

除共黨外，誰都會欣幸媚共者逐漸轉變的事實，但誰也不免或多或少懷疑詹森總統等對專家們的想法作法，例如在珍珠港事變二十五週年紀念日那天，國務院成立了一個中國問題研究小組，十人有費正清和與他唱同調的三幾個人在內，是否反而提高他們的身價，更使他們放言無忌？如用意在借此使他們窺見許多祕密資料，拉開他們的眼皮，塞住他們的嘴巴，則局外人或可爲有條件的同意。條

件之一是，政府先須堅定主張，不再爲外間的異議所惑。條件之二是，應着重研究中國大陸幾億人民及美國多數人民對中越共的真意，不應僅看其表象，尤其不應僅從「大字報」與中共御用報中去看中共統治的浮面與變化，務必由此產生深入而較正確的觀點。條件之三是，政府人員的腦筋，先作劃時代的改變，不再滯蕩於舊窠臼之中。要是自身仍沿襲甘迺迪政府時代即已開始設法另闢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路線，要這十個人擬就走法，爲政府鋪路，彷彿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陷時艾奇遜即借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如費正清等和工商界領袖的聯合討論爲幌子，作成符合其放棄台灣承認中共的結論，則其做法與結果，恐將與毛酋的利用紅衛兵相似。且在珍珠港事變的紀念日而成此研究機構，亦未免令人預感其不祥。當年白宮正在與日本特使二人商談妥協，夏威夷雷達站則已察出日機在編隊起飛，而珍珠港守將却反不信它是前來突襲，但是事實如何呢？這個二十五年前血淋淋的教訓，從美國方面想，顯比一千七百多年前中國的「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則已渡河」的悲劇來得親切呀！

給美國政府提出這樣的棒喝，自會被認作是危言聳聽，但總不能不承認中國人的瞭解中共比美國人正確的多。要是仍不服氣，且舉一件小事爲證。當毛酋每次現形在天安門上，沒有一次講話，美日英等國的專家不都是在亂作解釋麼？有的說那只是毛澤東的替身，有的說毛已患喉癌，都以爲自己的判斷不錯，曾使得中華民國的情報人員暗笑不已。他們的暗笑，是確有根據的，第一個根據在中共的報紙上。就十九年來中共各報的紀錄看，毛除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佈其政權成立的大會上講過一次話以外，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每年十月一日的大會上，他雖都參加，却都沒說話，由此已可斷定站在天安門上的確實是毛澤東，他亦並未害什麼癌症，他的不開口，只是自造其爲傳奇人物的一貫手法。第二個根據，則爲史達林的榜樣。據「基督科學箴言報」特派員艾德蒙·史蒂芬一九四九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的報導，史達林的「每一個公開演說態度，都經過仔細推敲捉摸，以求適合傳奇中的史達林。他與大部份的日常政務脫離關係以後，僅偶爾從半退休的隱居狀態中，出而提醒人民他還健在——通常是經由新聞公報，用精心選擇的詞句、發表一篇演講。自從一九四六年二月史達林對選民們在最高蘇維埃舉行選舉時發表過一次演說後，便從沒有發表過公開演說。每年他都延長他在蘇庫密黑海岸邊別墅內渡假的期限，通常是每年八月離開莫斯科赴蘇庫密，到第二年五月再返回莫斯科，趕上「五一節的大遊行。」第三個根據雖是推斷的，但亦不無道理，那就是癌症不會使身手顫顫，亦不會使神經錯亂，而從電影紀錄片上從大字報上看，毛酋是震顫而又錯亂的，若真害重症，則決非癌症而是一「帕金森症」。僅舉此一小事，也就可以明瞭美國人的瞭解中共遠不及中國人了。詹森政府如以為然，那就最好邀請中國專家學者新聞記者及各黨派領袖到美國去，或勸美國人到中華民國來，從事客觀研析大陸真情，這定比祇在國務院內聘請十個美國人紙上談兵的功效要鉅大的多，至少亦可幫助詹森總統等不再像以前的輕易說話。

六、改造地球尤急於登陸月球：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直至今後五十年的這一時代，是空前的大時代，正在大轉變的大時代。變的好，海水變淡，沙漠變田，荒山為秀，化工成糧，世間無廢物，宇宙換新裝，人類咸登天堂，萬國好似一邦，星際亦易來往，不知戰爭為何事，天災是何象，貧苦是何味，彼此之分是何意。變不好，地球盡成火山，人類燒毀一半。這一時代決定全世界人類生死禍福的巨大與確實，比登陸月球的務廣而荒，好高而虛，並被憂疑月球將成為下擊地球的軍事基地之所為，實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地球上各部份如被禍世魔王共產黨攪得水深火熱，雞飛狗跳，那麼一片荒漠的月球，亦決不是「避秦」之所。何況起飛處既變為一片火海，又從何處向月宮高飛？其中本末

先後，灼然易辨。今日美國已居於世界轉變的中樞，白宮主人已掌握世界轉變的魁柄，詹森總統應把問鼎月球的那股魄力，多多用在改造地球的這件大事之上。但如共黨禍魁蘇俄準備在月球或太空軌道上使地球盡變赤色，美國也就只有雙管齊下了。

變好變壞，只分別並開端在兩個主題方面：一是能否將殺人的核子彈盡變為利人的原子能？又一是能否將不久就會爆炸的世界人口漸變為各盡其能，各樂其生的大動力？前一事則又為決定後一事的關鍵工作，這留待後文專論。茲先指述今後百年內甚至是五十年內的世界危機，與其轉變的路向路由及其可能性，並且是必然性。

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數十個新興國家，剛在開發，但其人口的增加率，則都過於資源的開發率，都遠過於已經工業化國家的生育率，這種趨勢如繼續下去，則今天三十三億左右的世界人口，至一九八〇年將增加到四十四億左右，其中四分之三的增加額，即在這開發中的國家之內。要使增加的人口，差能維持現在的消費水準，則正在開發地區的每年糧食增產率，至少要提高百分之四。若要使愈趨於工業化愈減少農產品的國家，仍能維持其今日的食糧需要量，則百分四的提高率尚嫌不足。可是就這些地區過去五年的糧食增產率看，僅稍高於百分之二。如果這種趨勢不能改變，終將導致無量數的人類跌進饑餓線，這已是一大危機。再加以剛纔獨立的這些開發中的國家，尚未忘懷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所受的痛苦，尤不滿意以前國界的劃分，共匪已乘隙而入，用民族主義與民族解放的旗幟，提高他們的憤怒，指揮他們的行動，其間雖遭挫折，其勢依然未變，在非洲在東南亞的近事便是明證。

在過去二十年中，蘇俄用各種形式的暴力，去變更他國疆界與政制的行動，演進至柏林封鎖時期

達於頂點，因西方實行柏林空運而勢殺，其後又因古巴飛彈基地的撤走而漸改故態，今雖恃其人造衛星與長程核武器的聲勢，又復威脅西方，但其避免與美英各國正面衝突，只敢繼續其冷戰的行動，則今仍如昔。只有中共依然如故，在其擴張勢力達於最高峯的介入韓戰雖被抑止，在其他各地亦遭遏阻，但其力助越共作戰，堅阻其與美越和談，並正在中東放火，則均爲事實。故中共不除，世界永無寧日，消滅中共，殆同於消毀核子武力的急要，而消毀中共的核子設備，則又爲消滅中共的首務。

處理國際大事，只要有膽識，有手腕，有韌力，縱使阻力迭起，亦終有成功之日，回顧二十年歷史，並已有初步成功的紀錄在。其在西方，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北大西洋公約，若干區域組織，俱已擊退了俄共的兇鋒。其在東方，經美國與聯合國的努力，已粉碎了共黨在許多地區的游擊戰與在臺灣海峽的砲戰，削弱了越共的南侵勢力，壓縮了泰寮緬東共黨的顛覆行動。尤其是英美調兵備變，已嚇阻了蘇俄在以阿第三次戰爭時躍躍欲試的意態。其在非洲，因美英與各新興國家好合無間，共黨少可乘之隙，大致安定，剛果事件的處理，尤爲顯例。其在拉丁美洲，則自飛彈事件以後，卡斯楚的古巴已日趨孤立，蘇俄雖未盡放棄其明嚇暗助的行爲，但白宮主人如遠之取法一八七七至七八年英德合力援助土耳其抵抗帝俄侵佔達且尼爾海峽的往績，近之取法杜魯門總統以原子彈威迫蘇俄撤出土耳其及伊朗戰略據點的勝算，或至少擺出甘迺迪總統強硬對付古巴飛彈事件的氣概，則正有事於中共的蘇俄，當不致反而強狠於前。由此可見想用武力或顛覆政策去改變他國疆域與政治制度或政治人物的運動，均遭敗北。何況禍首史達林已死去，那些苟延殘喘的小妖魔，如毛澤東、卡斯楚、胡志明、恩克魯瑪之類，若仍想發展他們的領土慾，則顯與別人的民族主義發生正面抵觸，並與其本國內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要求絕不相容，其結果都將和毛澤東目前天人同憤、草木皆兵的境遇相同，必遭

強烈的抗拒。凡此共黨的失敗，當然是美國的成功。這種成功，不但有其必然性，並且有其繼續擴大性，不斷進步性。

馬歇爾計劃，杜魯門第四點計劃，其在西歐的成功，是必然性的證明。一九五〇年以前幾年美國對他國的援助，原祇限於其承擔安全義務的地區，如在土耳其、中華民國、南韓等處，其後即兼顧到開發方面，並設立各種機構，如「開發貸款基金」「美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易償貸款制」「國際開發協會」「美洲進步聯盟」及許多國際諮詢組織等等。尤其是原只為復興歐洲而建立的「歐洲經濟法合作組織」擴大為「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並由日本加入，成為檢討先進國家間的經濟關係機構，而使原有的「國際貨幣基金」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這一類關於貨幣與貿易政策的國際組織，愈能發揮其互助合作的精神。及「國際合作與開發組織」成立，這種精神更易發揮。凡此設施，都是繼續擴大的明證。再如原為着重軍援，其後即改重經援，並由一般性的援助，進為固定目標的開發援助，便是不斷進步的明證。由於此，拉丁美洲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及巴西南部的經濟，已引起飛階段，日本已躍入現代工業化，中華民國經濟突飛猛進，南韓、菲律賓、澳洲、泰國亦急起直追。而亞洲開發銀行的迅速成立，十個亞洲與太平洋國家組成亞洲暨太平洋理事會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合作，及非洲各國趨向於經濟政治的區域結合，亦即受此鼓勵。由於此，並可斷言現在的區域組織，亦必能在國際組織之下，日趨進步。西歐統一運動曾被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阻礙的情勢，亦將會在全球集體安全與共同開發的大架構之下成為天下一家。縱在進程中需要克服一些積習，但前進的時代齒輪終必能碾碎一切，尤其人類已察覺到前途的光明，決不甘退回黑暗之域。

在這光明的遠景中，自將產生不少可喜的事實，大之如由於區域合作，共同市場的出現，足使人



類更進於同享樂利的世界社會。次之足使正在開發中的許多國家，因互相結合之故，自覺堪與先進國家的勢力相稱，不再有自卑之感，亦使美國不再被疑爲氣勢凌人，更得放手助人。尤其非洲大部份人力物力的資源，將由此發揮其功用，不再引發人多物稀的禍患。並足使這些國家在民族主義方面的衝勁，移用在經濟開發方面，使共產國家不能再用民族主義煽動那些新興國家，以遂行其滲透顛覆的陰謀。再次之，開發中國家如希臘、土耳其、以色列、伊朗、中華民國、南韓、泰國、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率，既超過人口增加率，導致政局穩定，更足振奮援助國家的慷慨精神，美國不必說，今後他國所出的援額，勢將比一九六〇至六五年間百分之八十的增加率更高。最後則足使西方的最大問題如德國的分裂，終歸於統一，東方的最大問題如中共的侵略，終歸於消滅，美俄間的核子武力競爭，亦歸於終結，何以故？不需要再分裂，無從再侵略，不必再競爭之故。

不過一向違反時代潮流而盲進的中共，既不願與先進國家經濟合作，即無從消弭其人口膨脹，終於向外侵略的巨禍，此則仍非用軍事力量予以擊滅不可，而其任務則仍落在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肩。上。中共不存在，則最易盲動的侵略勢力不存在，核子武力紛起競賽的形勢不致發生，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基礎可以由此建成。倘中共不除，則美與西方國家儘管努力於世界經濟的開發，各種國際組織的建立，亦將橫遭阻力，韓戰便是前車之鑒，杜魯門總統不是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即成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其第四點計劃擴大實施的全盤方案麼？不是因韓戰突起而致延擱數年，纔有一「開發貸款基金」「美洲開發銀行」「國際開發協會」的設立麼？今日南越後方綏靖工作，經濟建設的不易進行，更是一面新鏡。

由區域集團而進於世界社會，由經濟合作而進於政治文教的全面合作，由毀滅性的核子彈競賽而

進於建設性的原子能利用，自不能在短期內成功，但其成功可必，則已述於前。如此大事，自須各國通力合作，但其導引支助的責任，則非美國莫屬。擊滅中共，與消滅核戰同等急要，自非中華民國能獨力擔任，但必須助成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建立一個和平進步的現代國家，則為安定亞洲乃至推進世界安定的樞紐工作。從詹森總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的國情咨文看，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他曾說到「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巨大轉變中，從狹隘的民族主義轉變到國際合作，從冷戰的肅殺氣氛轉變到有希望的境界，希望這個騷擾而有危險的行星，變得可以和諧相處」，所以極願引申其義，高喊出「改造地球尤急要於登陸月球」！「要在三十年內，為下一代人造就福門」。但又必須再次聲明，如果蘇俄仍努力在太空建築核彈發射基地，而美國又無法使之停止，那就是開始所說的一句話，雙管齊下。

七、必須為萬世開太平：現代人類最恐懼的是毀滅性的核子大戰，最祝望的是原子能、太陽能、地底熱力、三大能源的廣泛利用，在現階段則為建設性的原子能之利用，而最能為今日人類消災降福，為萬世開太平之局的，只有今日的美國，詹森總統則正逢此千載一時之機，肩此人類共同之望。雖然茲事體大，須恃不同尋常的努力，纔能完成，但只要能從極平常的事理上想去，向極現實的問題上解決，即可以為大於微，弭禍於易。

人類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起，就已站在不是全毀滅就是更幸福的關頭。為什麼？因為這一年的這一天，是美國首次完成核子連鎖反應的一天，也就是人類禍福生死開始大轉變大決定的一天。這個從亞當·夏娃以來向來沒有發生過的大問題，在人類沒有看到聽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廣島長崎被原子彈炸毀的大慘狀以前，尚未覺得，至今則已擔憂了二十三年。在一九四九年蘇俄幾次進行核

子試爆及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蘇俄宣佈製成氫彈以前，人類的恐怖尙小，亦可說並不恐怖，從是年八月九日起，就對着報紙發慌了，但是還好，禍世魔王史達林已在三天前死去。一到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宣布其試爆消息，就連蘇俄在內，也覺得局勢不妙，大禍將臨。

第一個完成原子能分裂的美國，早知原子本身並無善惡可言，上帝賦予人類的這個東西，全視人類自己決定其應用的方向，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美國便制定了國策，要爲人類福利去發展原子，並支持以此目標爲主的國際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艾森豪總統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時，即建議成立國際和平應用原子能計劃及國際原子能機構。不出三年，兩項建議均已實現。目前美國已和五十個國家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以及歐洲原子能集團共同合作，推進原子能和平應用工作。

並已在一九六三年和其它一百餘國，共同簽定結束大氣層、外太空及水下進行核試的條約。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正式控制美國的原子能工作。雖然當時的工作幾乎完全集中於武器方面，但到一九六六年該委員會的經費與精力已平均應用於國際與原子能和平應用方面。由於朝向福利人類的大目標走，至今應用在醫藥發電及若干工程方面的巨效，已很可觀。爲紀念史無前例的技術革命，並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日，在芝加哥大學舉行「原子時代」的盛大慶典。該校體育場看台下一個粗糙的實驗室，實即爲距今二十五年前驗定原子能異常巨大的場所，早由美國政府於一九六四年時宣佈其爲國家歷史名蹟。詹森總統躬逢其盛，繼此邁進，自亦必能成爲史無前例的世界歷史偉人。

只是造福必先除禍，禍不除則任何福利人類的成就，都可被毀於俄頃之間。今日最想毀滅他國人民的是中共，故當前首須剷除的是中共的核子設備。今日核子國家面對中共這項設備雖然如芒刺在

背，但蘇俄則顧慮共產集團的譏責，能動手而不敢動；英雖欲解除其國協澳紐印的威脅，法雖憂慮其聲光被中共壓低，都願動手而不能動；無核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雖都畏懼中共的核子敲詐，都敢動手而都無力量動；美國則不然，具有動手的力量，亦無顧慮的事項，這是極平常極易明的事理。剷除中共核子設備所以成爲最迫急的現實問題，亦極明顯，它的核子武力目前雖尚粗劣，但其急起直追的速率，與其侵略世界的野心，及妄動冒進的行爲，都早有事實證明，它自己亦不諱言。在它這種的心理基礎上，發射其初級飛彈於接近大陸周邊五百哩半徑以內的國家，已足造成巨大的傷亡，美國雖能給以數倍的報復，並不能補救已經傷亡的事實。即使它懼此報復，尙存戒心，但其發展「飛彈外交」「飛彈統戰」「飛彈宣傳」的攻勢，不但使美國無從報復，連招架亦不容易。而其由此導致的禍患則有十：一是破壞美俄的嚇阻力量與圍堵政策，二是加強其「人海戰爭」「革命戰略」等反嚇阻的威脅力量，三是加深姑息主義者與反戰份子「恐共病」「畏核病」的程度，四是更大膽的到處放火，五是動搖美國對付中越共的原定步驟，六是蘇俄因美國窮於應付，可能重新考慮其和平共存的現行政策，七是各民主國家可能因美國處境的困擾，態度的游移，各自另謀出路，八是亞洲小國家，非洲新興國家，將漸離美國，轉附中共，九是尙無核子武力而已能製造的國家，將紛起作核子競賽，弄成世界到處是火藥庫，十是中共很可能採行希特勒的閃電戰，用潛艇發射核彈，轟擊美國的西海岸，使美國反戰份子更加叫囂，使越戰更加拖延。在這十大禍患中，自以加重人類「核子過敏症」的作用爲最大，事實是中共由於技術的限制，很難造成洲際飛彈，其目前的核武器，根本尙在原始階段，它看清人類怕得要死，也就把姿勢擺得過兇了。

但也不應過份輕視它的發展，莫以爲中共粗劣的核彈，終究追不上美國的精品，應知它從一九六

四年十月第一次試爆起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即已達六次，它正在迫使人民不穿棉子，原子科學家絞乾腦子，不要命的狂趕。莫以爲中共導向飛彈火箭的完成，須在五年至十年之內，美國尚有一段設法對付的時間，應知縱爲十年，但其時間亦並不過長。莫以爲中共經濟科藝的力量，不能支持其核子武器與發射系統的完成，應知竭澤而漁，殘民以逞，本是「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中共起家的手段，決不能斷它今後變幹的結果比過去爲小。莫以爲十年以內毛酋會死亡，其繼承人會變好，應知其繼承人仍是「要核子不要棉子」的亡命之徒。莫以爲美國的諜報衛星，儘可作爲判斷與決策的依據，應知以前美俄英日各國對中共核武器發展速率的偵察結果，就都有偏差。莫以爲中共核力與美俄相比，實不足懼，應知它在沒有試爆以前，各國尚深感其威脅，美國亦不例外，何況它既有核彈以後。莫以爲它的核彈在軍事上的效用終歸有限，應知其在國際政治上人類心理上的影響力量，已比核彈本身的力量爲大。莫以爲遲早總可使它參加禁試禁散的行列，應知法國尚在拒絕，蘇俄亦未必守約，何況本是孤行己意的中共。更何況它的居心正與禁散的用意相反，它認爲擴散以後可產生三種有利的結果，一使各種國際問題更無法解決，便利其混水摸魚，二可嚇阻美國進攻中國大陸，三可在核武器偏佈各國之下，美俄即喪失其獨強的地位，有此三利，它就可以使用暴力，推銷革命，所以它正企圖將核武器儘量擴散，其範圍越大越好。

在過去，美國已經在原子問題上幾次走錯了路。如讓蘇俄搶先進入柏林，把可貴的德國科技人才搜載而去，由他們給蘇俄製造核武器，是第一錯。如不在獨佔原子彈時期，改變東歐形勢，剷除蘇俄擴張勢力的根據地，是第二錯。如不堅阻趙忠堯、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擁有美法等國大學高級學位者進入中國大陸，致他們幫助中共製造核力，其嚴重性尤過於戰略物資的輸出，是第三錯。如

美國發展核武器的脚步總是跟在蘇俄後面走，並且是隨着蘇俄的手勢動。初則爲了防制蘇俄核武器的突襲即全力發展核子戰略轟炸機。次則在韓戰時期，顧慮蘇俄將以核武力保衛中共，遽棄優勢的核武器而不用，而只用劣勢的人力與中共打傳統性的戰爭。繼則由於備受持久消耗戰的痛苦，雖已感覺發展戰術性核武器的急要，却又因蘇俄戰略性核彈轟炸機的出現，即又回到戰略性核子轟炸機的發展路線。又繼則因蘇俄發射長程火箭，即又減少空軍經費，集力發展洲際飛彈。其後又因蘇俄搶先發射人造衛星，繞在火箭與各類型的核子飛彈方面急起直追，追的結果，據倫敦戰略研究院最近研究所知，美國洲際飛彈的數量雖比蘇俄多一倍，但核子彈頭的威力則已較差，如「義勇兵」型飛彈核子彈頭的威力僅大於一個米格噸，「天帝二型」亦僅大於五個米格噸，而蘇俄最小的核子彈頭則亦在五個米格噸以上，像「瘦傢伙」飛彈即超過三十個米格噸，此外的多數均在十至二十個米格噸之間。核子潛艇用的「北極星」飛彈數量，雖比蘇俄所有的多五倍，但其彈頭的威力亦略遜於蘇俄。自然美國人有不服輸的勇氣與實力，終必能彌補這些差距，但不足之點已經存在，則無可否認，除非倫敦戰略研究院的報告不確。美國對於反飛彈系統的建立，亦是跟隨蘇俄走，初則望其停造，繼則觀其所爲，及國人紛起叫喊，纔用區區五十億經費去造極稀疏極狹窄的屏障。如果已決定發展新型的攻擊性飛彈，如所稱「多枚獨立發射的核子車」之類，並決定造成「超地平線雷達」(Over-the-horizon radar)，使一離開發射架的蘇俄飛彈或火箭，立即被此種具有環繞地球的曲率的雷達所偵知，並即在軌道上予以摧毀，那亦必須搶在蘇俄「局部軌道轟炸系統」(Fraction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之前完成。如再被蘇俄所給，或仍自信依然趕得上，那就是在第三錯以後，不知繼續錯了多少次了，狠毒的蘇俄，可能不會再讓美國仍有趕上的時間的。

在過去，美國在處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事務方面，亦幾次走錯了路。不採行邱吉爾進軍東歐的政略，是一錯。與美俄簽訂雅爾達協定，是二錯。不在戰後對亞洲採行國家安全與國家開發雙管齊下的方案，使亞洲國家也和歐洲一樣，都得以站穩脚跟，是三錯。在韓國僅作有限度戰爭，是四錯。不積極援助匈牙利革命，是五錯。除這幾件彰明較著的過錯以外，其他較小的錯誤尚多。這些錯誤，都非由於實力不足，而是由於識解不周，恰和一次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犯錯的原因相反，威可原諒，而二次戰後四位總統的失算失策則難得世人同情。今如再犯錯誤，有力量剷除中共的核子設備而不動手，坐待瘋狂的中共手握核武器睥睨全球，擇要突擊，導使全人類墮入萬劫不復的地獄而不以為憂，那就真將如專欄作家丁尼茲在一九六六年對詹森總統的譏笑，「保持你的冷靜吧！到一九七六年，也許你已壽終正寢，就再沒有什麼憂慮了」，可是，其如人類何？

且今世最會看風色的是中共，它已盡知美國對蘇俄對他國的許多錯誤事例，它又已用「飛彈測驗」測知美國不敢對它動手。它早知美國握有幾種極厲害的殺手鐮，但不知何時纔會動用，會借試爆這件事上，試探美國有無進一步的反應？是否跟着使出殺手鐮的一種或幾種？而試探的結果，則更自信其看美國是「紙老虎」的看法不錯，更想向世界狂進。它所看到的美國殺手鐮有兩種，一種是軍事性的殺手鐮，就是支援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或炸毀中共的核子設備，對越戰實行「圍魏救趙」的戰略，為世界採取根絕禍源的政策，可是美國並沒有用。雖自一九六三年春，早已偵悉中共即將開始試爆，並計劃毀滅中共的核子工廠，但從甘迺迪至今，迄未敢動手。又雖曾估計一九七〇年中共將會完成中程飛彈，一九七四年會完成洲際彈道飛彈，並會提早完成飛彈潛艇，且認為一九六八年會製就百枚左右的原子炸彈與飛彈彈頭，原子彈的威力則與美國投擲在日本廣島的相等，亦會同時改進發射

系統，但亦都止於認識，迄未敢予以摧毀。又一種是政治性的殺手鐮，就是簽署具體有力的協定，用核子傘保障亞洲各國的安全，使這一區域的自由陣線，更願意亦更努力和美國在越南並肩作戰，對中共厲行「合縱亡秦」的政略，可是美國也沒有用，只是對中共試爆一次，就警告譴責一次，給無核的亞洲國家空言保證一次。它已經由夜行人怕鬼吹口哨的方式，與轟炸機黑夜投擲照明彈的方式，從「飛彈測候」中得知美國對它的態度，便不再憂怕美國使用這種殺手鐮。不但如此，它更運用「惡人先告狀」和「外侵先內淨」的策略，一方囑着美軍要在青島登陸，叫着美俄正在聯合行動，作「師出有名」的準備，他方忙着整肅反毛反共的知識份子，急着清除意志動搖的各層幹部，作「堅壁清野」的工作，可是美國也熱視無覩，任其擺佈，這真所謂「長敵人的威風，損自己的志氣」了。

對付沉驚老辣的蘇俄，自較不易，但對付正在瘋狂亂幹的中共並不困難，而「伐亂」「伐謀」的起碼兵略，則尤易知易行，今日則更爲行此起碼兵略最有利的時機，亦是最能矯正歷史行程的大好時機。前由美國簽訂雅爾達協定致改造成當前世界禍源的中共，今則由美國擊滅中共而消滅世界禍源。前由美國投擲原子彈於日本而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今則由美國摧毀中共核子設備而夷平最能引起三次世界大戰的亞洲火山。前由美國首先使原子能成爲殺人的兇器，今則由美國首先促成原子能和平用途的世界。前由美國威爾遜總統倡導民族自決主義而致各殖民地民族均得獨立建國，今則由美國擊滅中共，削弱俄共，而導引民族主義運動的衝力於經濟開發及世界建設方面。把走錯了的歷史行程扭轉過來，豈不懿歟盛哉。中國宋代大儒張載所說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最能總括這種鴻圖，亦最堪移勉詹森總統。

八、至少亦應以殺止殺，勿再被殺謀殺：爲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大事，詹森總統也許議讓未



遍，敬謝不敏，但亦應以毒攻毒，以殺止殺，始終保持優勢的核子武力，使蘇俄中共不敢妄動，他國無須恐懼。萬一蘇俄中共用格別烏屠殺其國內敵人的辣手，竟使用核力去屠殺其國外的敵人，則美國根據人道主義的全面觀點，就不應坐視，就該毅然屠殺一小撮專事殺人者，以拯救全世界的善良人類。倘仍如過去那樣的甘受蘇俄愚弄，願挨中共辱罵與輕視，並被國中少數官民蠱惑，則美國最後必被謀殺。

曾任美國聯合參謀總長泰勒將軍，在其近著「既不自由又不安全」一書中已指出，美國對於冷戰的戰略有兩條路：一為自行逐漸裁軍，希望共產國家亦隨之裁軍；二為維持超級優勢的軍力，藉以遏阻侵略。他認定美國如繼續目前所走的前一條路線則將無異自殺。其實冷戰終將變為熱戰，並極可能為熱核子戰，應直捷名為「再戰的兩條路」。又其實「自殺」如就美國少數官民方面看是對的，倘就白宮主人和絕大多數官民方面說，甚至對人類的前途說，則應名為「謀殺」。只是處在內外共同或分別謀殺的陰險環境之中，而全體美國人仍不悔改以前若干的錯誤行動，那麼還責為自殺，亦不為過。

使美國陷入險惡深淵的，主要是美國少數科學家，和平份子，及學院派的迷夢者所結成的「反核幫」，與國防部的若干文官，其次則為蘇俄，因為美國這些人如不自殺，蘇俄就無從謀殺，故正名定罪，應列這些人為主犯。這些人的罪行是：他們不信蘇俄今後真會埋葬美國，甚至認為具有挑戰性的美國優勢軍力，應負以往二十年緊張情勢造成的責任，如果美國先自降低其戰略性的大軍力，低到與蘇俄相等，或竟低於蘇俄的程度時，蘇俄便會停止軍備競賽，和平也就可以降臨。在這一幫人中，則以若干科學家為首。他們既滲透到國防部國務院乃至白宮的高級幹部之內，在烏煙瘴氣之下，連國防部的高級文官甚至部長麥納瑪拉也被鬼迷，於是原居於優勢地位的核子武力，便停滯不前，反令蘇俄有後來居上之勢了。

他們一行構成的經過情形是：最初勸阻杜魯門總統製造氫彈，終因戴勒博士的力主製造而止，假使沒有戴勒的反對，則美國至今可能尚無此彈，而永讓蘇俄製成於先了。其後他們又外受蘇俄欺騙，內對白宮國務院蠱惑，誘使政府接受自我約束、停止核子試爆的主張，當時雖經戴勒領導的科學家與負責的軍事幕僚共同堅持必須設置國際監察機構，然一經蘇俄反對，美國的反核幫亦拾其牙慧，說美國核子的技術優於蘇俄，儘可放棄相互監察條件，白宮亦信以爲真，遂與蘇俄互作「自我約束」的君子協定，坐便蘇俄經過了三年的偷試，大有所得，乃於一九六一年突然片面撕毀協定，在高空大試其一系列的核子爆炸，美國雖已上了大當，但當局迷夢如故。

最不可解的是，蘇俄試爆核子的效果雖經空軍參謀長李梅將軍組織的「核子軍事專家委員會」研討以後，要求甘迺迪總統立即恢復高級核子武器的研製工作，但仍因其科學顧問韋斯納博士等反對而止，他們反對的理由，依然是美國仍須將核子武力優勢，後退至與蘇俄相等，免使蘇俄疑懼美國進攻這一套。及再過一年以後，蘇俄已因一系列的高空試爆，在技術上已超越美國很多，便同意與美國簽訂所謂「局部禁試核爆條約」，藉此凍結了美國的高空試爆，而使蘇俄得以永遠保持其軍事技術的優勢，其計之狡毒，並世無雙。此時美國如堅持其「就地視察」的要求而不爲蘇俄接受，亦即恢復高空試爆，則至少尚可瞭解核子高空試爆的威力如何，與地上試爆有何差異，由此亟籌對抗方法，却未計及此。特別是美國在一九六四年雖已發現並經試驗證實X光與反火箭武器製造關係的祕密，却因顧慮高空試爆的約束而不敢進一步試爆，又令蘇俄猛着先鞭，證實X光在高空確具擊毀彈道火箭的威力，立即從事製造。可是這些貽誤，反核幫至今似仍未醒，尚在阻撓：韋斯納博士且建議詹森總統與蘇俄商訂「完全禁止核爆」條約，不但對「相互視察」，主張採取富有彈性的態度，並主張停止一切核子

原料的生產。連高德柏也曾一度夢囈，竟提議如果蘇俄能消毀其核子武器原料的三分之二，美國即願消毀此等原料的全部，這或許是他身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外交詞令，不得不如此。最怪異的是，身膺國防重任的麥納瑪拉部長，似乎僅本其所知的企業管理的成本原則與比較效益原則，以裁決國防問題，在軍備上常打其經濟算盤，如拖延「進步的人駕駛戰略飛機」(AMSA)的研究製造，如一九六八年度預算中雖已列入裝置奈基X反飛彈系統的費用二百億美元，却只用五十億元從事建設，都是使人難於瞭解的事。美國在征服太空的競賽方面，亦使蘇俄步步領先，最先載人到太空飛行，最先拍攝月球照片，最先在月球表面降落，最先環繞月球飛翔，最先從事人類太空漫步，最先達到金星，這一連串的最先，似乎並未引起美國介意。特別是赫魯雪夫早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已宣佈「環球飛彈」的製造，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蘇俄飛彈司令員里薩夫即宣稱已能從人造衛星發射飛彈，及在距今兩年前，蘇俄在莫斯科紅場檢閱軍隊時，更公開亮出這種飛彈，美國星際科學研究會副會長賈蘭德也說，「一般相信蘇俄祕密發展一種軌道炸彈，已歷時五年以上，」美國似乎又未注意。最怪異的是，甘迺迪總統早在一九六一年親自決定，計劃在一九六九年內實現太空人登陸月球再安返地球，可是在局外人看去，似乎這個計劃已隨其人而逝去，早使人在不安的背景之下，認為美國不再打算搶在蘇俄之前奔向月球，而祇是一拐一跛的走向月球。危疑震撼的氣氛，籠罩大地，不但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上將公開反對麥納瑪拉的忽視建立反飛彈系統，衆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李瑞斯與參院軍備委員會主席史坦尼斯亦與麥氏的意見對立，攪得詹森總統不能不批准麥氏的辭職。並且由於這種有氣無力的態度，益令本位主義的言論滿天飛，如世界著名腦功能研究家之一，曾獲諾貝爾獎金的伊克里斯爵士即說：「征服太空，是絕對的浪費金錢，人類不能永遠離開地球而住在其他的地方。」其後

他又在芝加哥生物醫學研究院接見記者時，不但重申其「人將永遠不能到達最近的星球」那種絕對性的論斷，而且說：「在任何星球找尋生命的機會，也微乎其微。」並說：「我對浪費於無用的太空研究之時間和金錢，非常惋惜，人類腦功能的研究，比較更有意義。」連核子物理學家拉普博士眼見用於太空研究的七十億美元，與國家科學基金會撥給在其他方面如天文學、海洋學、物理學、化學等五千科學家的七十六百萬美元相差太遠，也悍然說，「那簡直是瘋癲的！我們用於土星的比較用於研究地球的錢更多。」如讓此種論調也竟得逞，豈不又讓蘇俄獨佔太空的優勢！

麥納瑪拉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卻又突然宣佈蘇俄正在試驗一種「局部軌道轟炸系統」(FOBS)，並預料其明年可能完成作戰準備，但又表示並無特別可怕之處，比它的洲際飛彈更不準確。像這些讓敵佔先的事實，即使美國已有「袖裏乾坤」，然在乾坤未亮出以前，至少也會使人懷疑美國在這兩方面爭先的決心，自由民主國家人心的動搖，實為美國最大的損失，將使蘇俄坐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巨效。

幸好，就在麥納瑪拉亮出「紅燈」以後的第六日，也就是蘇俄完成兩個衛星的會合與鉤接技術之後的第十天，美國「測量員六號」太空船，乘着「農神五號」火箭安登月球中部並安返地球，在十二小時之內，獲得火箭與太空船兩大成就。並經專家解釋，農神五號火箭的動力，比蘇俄最大動力的火箭尚大幾倍，而蘇俄又未能在其「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的十一月七日，將第一個太空人送上月球，作為紀念，這纔使關心世局的人如釋重負。但仍感不足的，則為美國的攻心戰術。麥納瑪拉如已斷定十一月九日有偉大的表現，那就無須有三日的宣佈，徒亂人意。如無法確知其必然成功，而作此宣佈的目的，祇在防止蘇俄在其五十週年紀念中，突然大肆宣傳，致對不明實情的人，產生震眩的效果，則

麥氏的宣佈亦仍嫌偏缺，應像蘇俄那樣的立即填補缺憾。蘇俄因爲由人操縱的太空船在太空會合尙成問題，而美國則早已成功，致不能在其五十週年紀念日表示其煊赫的成就，便於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紅場檢閱時擺出其「機動發射飛彈」，並由其戰略飛彈部隊副總司令托魯布上將告訴塔斯社記者說，「這種高度機動性的火箭發射台，是敵方太空偵察機所看不見的，」又說，「在地球上沒有蘇俄洲際飛彈所達不到的區域。使用這些飛彈時，亦不需要依賴自然氣候條件。」它是否機動到這步田地？抑或又是自欺欺人？且不管他，但其宣傳作用似乎是達到了的。蘇俄尙且在「擺烏龍」，爲什麼美國不拿出貨真價實的東西來，緊接着宣佈近數年來美國征服太空顯較蘇俄進步的許多紀錄？如就太空人飛行時數比較，美國是一九九四小時，蘇俄僅五〇七小時。就太空人數比較，美國是二十六人，蘇俄僅十一人。就太空船數比較，無人駕駛的美國是四二二艘，蘇俄僅一八四艘，有人駕駛的美國是十六艘。就太空船在軌道停留時間比較，美國「雙子星十二號」是五三七小時，蘇俄「東方五號」僅一一九小時。有這許多家當不提，是否有意助長蘇俄的威風？又即使蘇俄確有此物，則爲什麼不再緊接着宣傳美國將有更厲害的防禦彈，是一種能在地球大氣層之上攔截敵方來襲飛彈的「分光彈？」紐約時報尙可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宣稱，「這種分光彈自一九六四年起即在進行研究，並曾在內華達州一個試驗場從事多次地下試驗，它是一種革命性的X光熱核子飛彈，彈頭的爆炸力約達一百萬噸黃色炸藥的爆炸力，將由一枚斯巴達式的一節飛彈載着，其爆炸出來的巨大X光，足粉碎一切來襲的核子彈頭。這是美國國防部一位最高級官員向參院裁軍小組委員會所作證辭、經過新聞嚴謹的紀錄、及從原子能委員會獲得的資料、作成的報導，」爲什麼國防部長反自隱諱？由此可證明美國的政治藝術心理作戰比科學程度低得太多，致科學家的成就，形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現象。

在這樣稚弱的政治才能之基礎上，美國自然不易揮動仁心的辣手。但事實的需要是，美國即使不願「以殺止殺」，更不忍使用優越的核力去殺專事殺人的共黨惡魔，亦總應不斷宣佈其在核彈方面火箭方面太空方面的成就，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成就，使蘇俄中共自覺永遠追趕不上，不敢再靠殺人來立國處世，這纔是應有的政治戰略。美國政治家當已瞭解，一方面核子兵器已如毒氣一樣，已不能成爲一種戰爭的工具，祇成爲政治上心理上的一種嚇阻力量，且已成爲一種單純的技術競賽，它與莫斯科高唱的「共存」、亦只是「競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作用相同。他方面西方的社會與心理結構比東方的較爲易毀，故亦更害怕這種技術競賽，更須擴大這種技能競賽的心理攻勢。然而在這兩方面的被忽視，美國又似明知故犯是的。

面對惡魔猖狂的美國，仁心有餘，而仁術則不足，並不够精巧，流爲婦人女子煦煦之仁子子之義，這顯然不是居於強權世界，尤其是核子世界太空時代的適當態度。今日反核幫及麥納瑪拉的所爲，殆類於其前美國在蘇俄被迫撤回其在古巴裝置的中程飛彈以後，即宣佈撤回其佈置在土耳其義大利英國的彈道飛彈，並不再製造流動性的彈道飛彈，以供北約盟國防禦侵略之用，致它們都裸露在蘇俄中程彈道飛彈射程威脅之下的所爲。這種進一步退兩步的表現，豈非和蘇俄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完全相反，而正便利其爲所欲爲。如此失計，美國又何嘗不知，知之而仍爲之，則亦由於有仁心而無仁術而已。而其直接的證據，則亦擺在面前，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坐讓蘇俄的「金星四號」直接降落在金星表面，致美國的「水手五號」太空船爲之失色，致自由世界又疑美國征服太空的能力不及蘇俄，引爲憂慮，這顯然不是「水手五號」沒有瞄準金星的能力，而是因爲美國想到金星上也許有高等生物，却無抵抗地球上細菌的習慣，如太空船帶上若干最易繁殖的細菌，則將使其中的高等生物爲

之滅種，故仍堅持其探測有生物的星球時一貫的心術所致。問題是如長此抱持僅有「止殺」仁心而無「止殺」仁術的態度，與心術更比科學技術兇惡的蘇俄相處，自由世界如竟因此遭殺，豈不是同於美國的間接謀殺，而其最後結果又豈不是美國本身的慢性自殺？

九、發展智勇貞信心力、解決軍事外交難題：由於共產集團險狠，核子兵器猛厲，新興國家稚弱，三種新因素的並起交激，二次大戰以後的世界已因此大變。過去的軍事外交政策技術已不盡適用，心理戰思想戰意志戰已成爲決定軍事外交勝敗的主力戰。精析深思國內外各種複雜問題的真相及其因果關係，明辨各種政策技術短期長程局部整體的利害得失，慎擇消弭巨禍解決難題最有利的途徑方式，無一不靠各種專家明察秋毫的細心研求。敏斷各種情報建議的正誤優劣，立即準對當前微妙時機，奮勇邁進，不稍猶豫瞻顧，全靠政府最高領袖乾坤一擲的決心行動。堅持目標，善負責任，不計勞煩毀譽，長期沉着奮鬥，務求完成神聖使命，須靠政府人民強毅不變的耐心進行。灼知細心決心耐心的協成力，終必能凝成本國及世界人民的共同力，逐步達成創造新世界的大事業，須靠政府人民純一不貳的信心織成。這四種屬於智勇貞信的心力，本是拓荒開國的美國人民所固有，但正被三種新因素所沖刷，只要任何一種心力不足，終將導致幾億人民的毀滅。

軍事方面急須細心研判，決心實行，耐心求成，信心克難的複雜問題，從二次大戰至今積累下來的已經很多。在核子戰爭方面的問題是：怎樣纔能消弭明知彼此毀滅而仍有其發生的各種可能性？例如怎樣防止不顧人命而敢於冒險圖利的共產國家突用核彈襲擊？如遇這種情事，怎樣使全國沉着反擊，並確能在此豪無經驗的攻防戰中減少犧牲？怎樣明辨敵人核子戰爭的威脅是真敢作戰或僅是敲詐，並予以擊敗？怎樣克服雷達屏上的投影，因時間急促而在情報方面發生的傳達研判等困難？使不

致誤真爲假，坐招犧牲，或誤虛爲實，竟成浩劫。又怎樣解決使用核子兵器最後決定權的兩難問題？如操在後方，則因不知前線突變情況，致坐誤機宜；授權前線，則因不明全局情勢，致鑄成大錯。

在核子與傳統戰配合方面的問題亦甚多：例如怎樣練成部隊都能使用兩種兵器，而又能使其不致在傳統作戰情勢危急、精神緊張中擅用核子武器？怎樣解決傳統戰須集中部隊而核子戰須疏開部隊的對立問題？使能隨時攻防由傳統戰突變爲核子戰的敵人。又怎樣消除核子戰開始時需要部隊敏捷機動，傳統戰進行中則需要部隊接受嚴密控制的衝突情勢？怎樣堅忍抗禦侵略者先用傳統兵力侵佔弱國領土，再用核戰威脅圖保既得利益的行爲？並能避免由局部侵略局部抗戰而導致全面核戰的危險？怎樣強固兵民意志，耐心對付敵人用核戰的威脅，以遂行其用傳統兵力，作長期消耗戰的戰略？怎樣克服爲使敵人增加計算及增兵的困難，自須隨時移動飛彈部隊的地點，但却由此減少已方制先打擊能力的矛盾？

在有限戰爭與無限戰爭關係方面的問題亦不少：例如怎樣使有限戰爭在逐步擴大之後，不致構成無限戰爭，甚至進入核子戰爭？怎樣適度表示，纔能使敵人在確信我方決不使用核子兵力之下，不搶先使用這種兇器？如表示極度鄭重真實，則如何防止敵人誤認我方爲怯弱以後的強硬行動？如表示不够明朗堅決，又用何術取得敵人確信？如不被敵人確信，而又無迅速調配部隊的決心，甚至並無實力可以配備，又如何防止敵人更加冒險進攻？倘雙方都不敢進入核子戰爭，又是否將因核戰的威脅愈少，有限戰爭的擴大愈易？並如何克服在此情勢之下，敵人到處挑起有限戰爭的危險？

在軍備管制方面的問題又甚多：例如怎樣考慮全面或局部管制的範圍？如係全面管制，則如何防止會受軍訓的民衆與維持治安的警察轉變爲正規部隊？及民用飛機船舶與工業資源設備變成軍用？如



全部停止天空地下海底的核試，則美國的核子設備是否由此癱瘓，核子專家能否不全體轉業，反使習慣於控制一切的蘇俄因此增加其對民主國家的威脅，無核國家更因此增加不安？倘係局部管制，則如何規定預備與常備兵力的數量？怎樣辨明國家與地方部隊的性質？並如何防止預備與地方兵力變成常備與國家兵力？又如何釐訂海島國與大陸國的安全標準？如何溝通各國都不相同的安全感，並消除各小國常憂強鄰威脅的心理？倘首重核子兵力的管制，則如何防止擴大傳統兵力的競爭？倘首重傳統兵力的管制，又怎樣防止各種核子兵力的發展？倘二者兼顧漸進，則又如何使之均收實效，而不致一事無成？

無論全面性或局部性的管制，都須實行監察，怎樣養成數萬名懂得核子資源設備及各種兵力性能的監察人員？如何始能將港口海洋山谷城鄉都列入監察範圍之內？更如何始能辦到各國都接受監察，並能防止蘇俄密將其核彈與設備移置於其附庸國內及組訓資助其附庸國的民兵？即令是較易管制的傳統兵力，又如何能使各弱小國家不憂強暴國家的侵略，而願意讓其兵力更加削弱？倘由美俄兩國共同擔保，又如何祛除其淪為被保護國的恥辱感，並樹立其對於蘇俄集團的信心？

在現階段嚇阻性兵力如何運用方面的問題，更為複雜微妙而衆多：例如當美俄兩國兩種兵力大致相等之際，怎樣防止具有侵略野心的蘇俄進攻他國或突襲美國？在兩種兵力都有差距，而蘇俄的野心却可彌補其不足，其迫使人民忍受犧牲的控制能力亦特別高強，倘選擇被認為有利的地區冒險圖逞，則如何予以有效的嚇阻？在雙方的意志力與使用核彈的權力不相上下之時，如何消弭蘇俄的過度自信，竟把嚇阻兵力變成射擊行動？在核子兵力較強而傳統兵力較弱的對方，如運用核子攻擊威脅弱小國家，製造既成事實，逼使接受的情形發生，則美國又如何對付？如決心耐心都差，又如何防止對方

不再使用此種戰略於其他小國？在核子兵力較弱而傳統兵力較強的對方，如先用傳統兵力攻擊他國，再威脅之以核子兵力，使被攻擊的國家在感覺無可抗拒之下，不惜投降的情形發生，則美國採取的行動如何纔能有效，並能使對方不至惱羞成怒，憤然進行核子大戰？在酷愛和平的一方，如何矯正全國陶醉於現狀的樂觀心理，致造成爲敵所乘的危機？或時覺核戰犧牲慘重，產生更加不敢使用此種兵力的畏懼心理，致增加爲敵利用的弱點？在軍事政策戰略思想側重防禦的一方，如何策定整套的行動計劃，強大其報復兵力，並適度顯示，使敵人覺得制先攻擊並無勝算？如何研判顯示的程度與技術，纔能使敵人不覺其太具敵意或並無決心，致搶先攻擊？在向來重視地緣戰略戰略的一方，如何顯示其全球性的新目標，及達成此種目標的實力與意志，纔能使敵人不致攻襲其自認爲對方較不重視的地區？在都具有侵略世界野心，而又較易齊一行動的共產集團方面，如威脅較重自由亦較有理性的民主國家時，如何使之瞭解在民情憤激之下，即使最能冷靜最具理智的國家元首，亦會喪失其控制局勢的能力而採取激烈的行動，使敵人覺然而悟？又如何做到使國內外偷安畏戰的姑息份子，瞭解已被逼到非強烈行動不可的境界，藉以加強激烈行動的態勢，使敵人畏葸而止？如敵人悍然不顧，又如何動員世界輿論，把挑起戰禍的責任歸諸敵人，藉以加重其精神上的負擔？並如何立即振奮被威脅國家的精神，同時提高其理智，使其不再感覺實力過小而屈服，或忽覺有恃無恐而闖禍？

上述在核子戰爭方面，在核子與傳統戰配合方面，在有限戰爭與無限戰爭關係方面，在軍備管制方面，在現階段嚇阻兵力運用方面，像這些方面的各種難題，究應如何解決始能有效，無一不涉及心理的觀念的意志的實力的既複雜而又微妙的問題，其間需要具備何種程度的細心研判與定策，應有何種程度的迅速決斷與迅速反應？須賴如何長期的堅忍苦幹？須持如何堅定的信心必其成功？又

如何輔導全國都能各盡其力爲政府後盾，爲人類服役？這種遺大投艱的重任，早已擱在美國肩土，詹森總統更義不容辭。

外交家急須細心研判，決心實行，耐心求成，信心克難的複雜問題亦同樣繁多，而其重點則在對俄問題方面。就軍備管制問題言，例如蘇俄既承認核子禁試極難監察，爲何又力主推行此制？倘真積極談判，如何始能使其願意打開鐵幕？蘇俄既未改變赤化世界野心，爲何又屢倡全面裁軍？倘與之認真商談，則全面的範圍是否包括一切國家的一切兵力？如何迫他提出解決這種內容複雜，牽涉過廣問題的具體方案，以破滅他的宣傳魔術？並如何自定一套分類分期裁減的切實計劃，逼使他不得不接受？如不被首肯，又如何不使他在羞憤退席之下，致使此種最須認真談判的大問題，永遠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如他仍存以退爲進，一本萬利的企圖，與玩弄先進後退的討價還價伎倆，又如何認定目標，細心進行，耐心周旋，而不被其弄亂步驟，攪亂觀感，反把破壞談判及和平的責任推在美國身上？

就歐洲問題言，例如怎樣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兵力，確能強固於華沙公約集團的力量，堪與外交談判相配合？如何商談蘇俄所提統一德國的建議，而仍能商定一種互相尊重德國民主獨立的方案，使久被控制的東德人民，確能與自由的西德人民同樣在選舉中表達其自由意志，以自決其政制？倘不能成立協議，則如何另籌長策，以消除西德深憂美國退出歐洲的心理？並如何防止其狃於曾經兩次戰敗而仍能復興的經驗，貿然採行親俄的下策？倘蘇俄認爲統一後的德國可以採取中立主義，則又如何使蘇俄辦到華沙公約國的兵力，能與北約國的兵力撤退至同等遠近的地區？並如何使德國不再重整武備而仍能感覺安全？更如何防止法國乘虛圖霸歐洲的行爲，及蘇俄改用顛覆戰術盜竊德國的舉動？

就亞洲問題言，則美俄在此地區需要經由外交途徑解決的問題雖甚多，但主題則較歐洲爲簡明。

如何使蘇俄接受不控制中國大陸亦不致危及其國家安全的觀點及辦法？如何使蘇俄確信美國決無推翻蘇俄及其附庸國家共產政制的誠意，並確信美國力能保證自由民主的中日兩大國今後願與蘇俄和平相處？如能在此信心的基礎上，進一步商訂美俄和平互助盟約，實為安定全球的第一要務。若能辦到此點，則改變中共政權既易合力進行，而韓越泰寮緬柬等國的赤禍亦都失去支援。亞洲既無問題，則盤根錯節的歐洲問題亦將迎刃而解。但如何始能建此巨功，則有賴於高明的外交政策，精明的外交技術，耐煩的外交精神，虔誠的外交信心。

就新興國家問題言，例如怎樣由美俄兩國商定共同尊重他們的獨立，援助其經濟開發，不直接間接威脅其安全？如何公平協助處理他們之間的糾紛，使不致動輒發生戰爭？更如何扶正他們建國的起點工作，使能善定方向，耐心前進，不致因目標模糊，誤入歧途？其中最須細心瞭解，耐心輔迪的是：他們都是習慣於被權力統治，不甚瞭解自由意義民主制度的民族，如何幫助他們掃除這方面的「文盲」狀態？他們社會的安定因素，過去向恃建封的勢力；今後如何纔能使他們在經濟文教的開發中，不因舊秩序的急遽破壞，新秩序的尚未建立，致形成動亂現象？而其領袖人物，都由鬥爭產生，又都有強烈的表現感，如何導引他們移用其表現慾望於建設方面？使不致各爭權力於國內，爭出風頭於國外。他們心目中的新國家，是兼有舊權力與新勢力的結合體，並非現代國家的型態，並視此種構想比過去的環境更為現實，認為必可以實現，如何啓發他們在此方面的新知識新努力，使他們不感覺歐美的公私生活水準不可及，而直覺馬克斯的「神話」與蘇俄暴進的作法及其成就，反適合於他們的目標？他們又都急進，把一切問題予以簡單化，如何扶助他們細心研判，耐心漸進，而不致飲鴆止渴，揠苗助長，致受共產國家的拐騙？各新興國家之間，缺乏共同的文化語言，即其國界亦成於殖民

主義者的任意劃分，自不免紛爭時起，甚至以兵戎相見，如何化除他們這種強烈的離心力，使能團結合作，共禦外侮？他們更易被共產國家動搖的，則又莫過於蘇俄太空競賽長程飛彈的着着爭先，及其威脅利誘的無孔不入；並因其急求解決目前問題，無暇細思日後禍福；更因其感覺得罪蘇俄，禍將立至，失歡美英，並無大患；如何矯正他們這類的錯覺，使不致倒向共產集團方面？又如何不待他們商請援助，即主動進行，使他們不再感覺是在蘇俄壓迫以後的臨時救急；並痛改以前「施主」般的嘴臉，與商人講價式的手法？更如何鼓勵他們為世界和平前途努力，而不以爭取他們一時的歡心與合作為已足？

就外交的觀念政策技術等方面言，需要轉變之處亦不少：例如怎樣細定現在及將來的整套目標與進行方略，主動向關鍵及當事國家提出主要次要問題的商談，鏗而不捨，務求有所成就？倘再如過去的臨時被動應付，在會議前，對重要問題無縝密的研討，無明智的決定，只是在危機發生之下，慌忙湊拼人員，折中各種意見，擬定簡單的對策；甚至對於極重大的問題，例如核子與傳統兵力，全面與有限戰爭之間的輕重性關聯性，迄無定論，軍備管制與和平安全之間的各種觀點，經常混淆，而在盟邦之間的歧見則更甚。在會議時，因為並無一種全面性的目標意識，自不免一切隨人俯仰，致被俄方代表先在程序問題上攪昏頭腦，再在實質問題上頻生枝節，致最重要的外交目標，始終不成為辯論的焦點。如此所為，則又何能制勝？

既不能制勝於增站之間，自必在各方造成一連串的失敗，至少也是嚴重的錯誤。其最顯著的事例：一如感於代表團的不能成事，便改用個人外交，艾森豪總統的屢訪各國，即基於此，但其結果除激使蘇俄愈加蠻橫輕視，美國威望愈加降低以外，甚少成就。二如懲於目標迷惘之失，便採取剛性外

交，杜勒斯國務卿的對俄強硬態度，即出於此，但除激使蘇俄更加强硬或巧施其以退為進的手段以外，何嘗結束冷戰，又何嘗減低赤焰？三如由以上各策略仍都失敗，便在怕與蘇俄談判的心理之下，形成等待政策，且不但坐待蘇俄變得溫和，並坐待各新興國家自行覺悟。這種根本取消外交作用的政策，是否真認為蘇俄歷屆領袖的作風已逐代走向溫和？其形於外的笑臉即代表其變於內的野心？是否錯認為蘇俄工業化後即會趨於文雅，而不悟其更有力量侵略？是否終覺蘇俄已從大衛營會議後放棄威脅，而全忘赫魯雪夫不久就在布達佩斯復萌的故態？是否竟認為緊張情勢的鬆弛就是世界真正的和平？現狀的穩定就是人類最大的期望？局部的烽火決不致燎及全球？是否覺得談判就是目的，就已完成外交任務，而竟蔑視蘇俄「宣傳性外交」的作用？是否覺悟由於過份關心蘇俄國內的轉變，已造成外交態度的剛柔皆失？是否瞭解由於對俄認識的粗淺不深，對俄政策的舉棋不定，甚至對自己國勢的觀察亦多出入，已使蘇俄更易乘隙操縱，並使白宮的對俄行動不易獲得全國及盟邦的支持？是否思及新興國家的下代人物並無艱苦奮鬥的經驗，僅有盲動躁進的性格，今後將更使美國不易應付？

倘以為所有對外行動均經專家顧問細心研析，當不致發生這些錯誤，但曾否想到專家或顧問的組織，都是平時雜湊、臨時增加的人員？他們能否避免只重分析個案而不瞭解全局，只顧目前而不計將來之失？是否具備開創膽識，而改變其拘泥先例，甚至怕失歡於行政官吏的交差作風？他們的建議，是否成於各種意見的協調，只包羅一切利益，而輕視各種惡果的作品？又是否是僅能造成決策者迅速武斷的一種簡報？

上述在對蘇俄對歐洲對亞洲對新興國家各種複雜微妙的外交問題，及對美國本身的外交觀念政策技術問題，與外交行動的構成問題，無一不需要細心分析，虛心反省，決心改善，耐心進行，信心克

難，誠心求成，誓爲正在動盪轉變的世界，善盡撥亂返正的職責。詹森總統自一九六七年秋季開始，曾在對越問題上，多次表示爲美國爲世界爲歷史負責的勇氣與決心，故願進此責備賢者之言，弼成盛業。

一〇、比拿破崙所說三M更重要的三SC：如果一對一，那麼就現在看，美國一國的力量就能對付蘇俄一國而有餘，何論中共，更何論越共。要是一對多，那麼蘇俄有與國，美國則有更多的與國。如果不自信本身力量的優越，與國的衆多，常被反戰姑息份子所淆惑，陷入「自家傳染」「自家中毒」的心理狀態，自縛前線將士之手，而不許其進擊北越，又縛中華民國之足，而不允其進入大陸，不惜自縊，又忍心縊人，則在國際和平人類正義上固說不過去，對自己亦未免太自暴自棄了，「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一千六百年前中國文豪韓愈如果地下有知，更將高吟他生前這兩句詩，並慚愧其自己並未做到像蘇軾讀他的「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的這個地步。

詹森政府急應使美國人了解的三十四件大事，已如前所述，但如自己不自信其急要，又怎能使人共信其急要？自己既自暴棄，又怎能責人不自暴棄？今世最有資格自信的是美國，最無資格自信而祇是夜郎自大的的是中共，最不應自信而祇是靠偷搶嚇逼成功的是蘇俄，可是它們也居然不可一世，敢與美國分庭抗禮了。靠什麼？靠迷信。蘇俄迷信馬列主義是最好的主義，毛澤東迷信其自己的思想是無所不能的思想，只憑此一點，尙能橫行於一時，何況確有許多可以自信之處的美國。證之於昔，羅斯福總統所以能擊敗軸心國家，固恃優越的國力，然亦恃其「四大自由」的信念，杜魯門總統所以能擊退中共的侵韓，固恃「火海」的燒乾「人海」，然亦恃其「全世界不應一半自由，一半受奴役」的信念。若缺此信念，則國力雖大而不敢動用，火海雖烈而不敢縱放，勢將與今日的冷藏核子武力一樣。

不敢之來，來自不自信；不自信之成，則成於恐懼心與阿好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威爾遜總統因爲僅求國際聯盟的組成，遂放棄其賴以戰勝侵略國的道義力量，遷就英法意等國的無理要求，致巴黎和會變質爲分贓會議，並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種下禍根，便是阿好國聯心理過甚的結果。當時國會議員無聊政客對他挾嫌中傷，致他憂讒長譏，頓感曲高和寡，孤掌難鳴，則是他恐懼過甚，自喪所信的明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惟恐人民犧牲過重，遂急求蘇俄出兵抗日，不惜改變其抵抗侵略的一貫主義，並蔑視中國的自主權，擅與蘇俄簽訂雅爾達祕密協定，便是恐懼心過甚的結果。他在國內遭遇共黨的包圍，人民的厭戰，又顯然是使他流於阿好，自棄所信的明證。當路在勇者自信心的邪正存亡，有時小之關係其自身的榮辱，大之涉及到全人類的禍福。羅斯福成功於其在歐洲的擊敗德意，而貽患於其在歐亞兩洲的造成共禍，杜魯門成功於其在歐洲的挽救希土淪陷，而失敗於其在韓國的採取有限度戰爭，這羅杜二人一時心理的轉變，遽使兵連禍結，至今未已，更顯然是自信心與恐懼心自相消長，彼此易位所致。艾森豪總統亦然，他的急於停止韓戰，不惜自棄其競選時期標榜的解放政策，先導致北韓人民仍淪鐵幕，次坐視匈牙利反共人民永受浩劫，再次容忍古巴卡斯楚與蘇俄狼狽爲奸，禍及美國，又再次聽任寮共與中共俄共越共聯合破壞寮國中立，最後使波蘭東德中共的鐵幕愈固，阿聯的野心愈熾，無一非成於恐懼心的作祟。而他的急於造成板門店和談，自與其爭取總統的偏好心理有關，則亦未便爲諱。甘迺迪總統在任甚短，無從看透其信心是否堅定，但豬灣一役，半途悔約，坐令反攻義師，潰不成軍，卡斯楚聲勢大振，赫魯雪夫且乘隙建中程飛彈於古巴，其後雖乾坤一擲，逼使蘇俄捲甲而去，但其對古巴反共義士的失信，對金馬無固守價值的失言，對寮國問題處理的失策，對倒斃吳廷琰事件的失態，對容忍姑息主義者的失算，無一不是喪失自信心的



表現。

自威爾遜至甘迺迪五個總統信心動搖造成的種種禍患，詹森總統都會親見其事，感觸自必特別深切。尤其最近一年多來對越南採取外柔內剛的態度，堅持不屈不撓的立場以後，已使亞洲若干國家恢復其信心及勇氣，印尼陸軍將領推翻共黨的政權，結束對抗馬來西亞的僵局，中越共環伺的寮國亦未崩潰，特別是使中共侵略的兇鋒備受挫折，使亞洲今後的政治發展，將循着合理與有望的途徑推進，縱然從長遠的前途看，有很多事情仍視越戰的最後結果來決定，但現在的收穫，實已可觀。要是這一年多來，心旌搖懸，行動搖擺，則其中可能的變化，真將如詹森自己在芝城所說的「與此事有關者，不獨南越小國的一千四百萬人民，其他百餘小國，均在靜觀其結果，假使美國不信守對越的承諾，則其他四十餘盟邦亦將懷疑美國對它們的承諾。」詹森總統以前說過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自由人的失敗，並不是武力方面有所不逮，而是精神意志方面的疏忽，我們絕不容許這種失敗重現於目前的六十年代」，更可移作芝城一番話的解釋。詹森總統既如此說，本用不着旁人再說什麼，祇是信心如果更加堅定，則其影響力的成就必不止於此，更不至於使美軍在越南作戰的情形，仍顯得不够積極。這其間的關係，是否由於決策階層「精神意志方面的疏忽」，亦即信念不够堅定？更是否由於國會學府中人已經看出決策階層的心理狀態，遂乘隙而入，發表許多洩氣論調，形成連鎖反應？急應自反，更應自勵。尤其必須立即自反自勵的，是一個眼前的事實。在一九六七年冬季，越南各鄰國中不論是中立主義的緬甸，主戰的泰國，敵視美國的柬埔寨，以及寮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希望詹森奮鬥到底，至少亦相信美國必能保衛它們的獨立，而日本首相佐藤強烈支持美國的越南與亞洲政策，尤屬空前，與中華民國相差無幾，華盛頓明星報記者羅文已有報導。可是一到美國正在考慮南越民族解放陣

線」爲和談份子並參加越南聯合政府的消息傳出，它們的信心就開始動搖了，南越不必說，韓國已表示不再向越南增兵，泰國則更建議召開包括中越共在內的全亞洲會議，如此轉變迅捷的事實，還不够警惕麼？

最足以引起自勵的往事，即爲美國前賢的懿行。美國立國至今的總統已不少，可是任何一國的小學生能够不需思索而立即說出其名的，也只有華盛頓、林肯、羅斯福三人，勉強能被說出的是杜魯門。此無他，因爲華盛頓是抗英壓迫的開國之父，林肯是解放黑奴的成功者，羅斯福是領導盟軍戰勝德意日侵略的英雄，杜魯門則是第一個敢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硬漢，至今還只有他是用過這種武器的唯一硬漢。今日美國已萬事齊備，只要詹森總統有志氣，有抱負，決心不讓這幾位總統擅美於前，並自信必能媲美前賢，就一定可以成爲幫助人類脫離共黨壓迫的另一個華盛頓，同時可以成爲解放「赤奴」的另一個林肯，又同時可以成爲領導反共非共國家戰勝共產國家的另一個羅斯福，也同時可以成爲使用核子武器去摧毀中共巢穴，或掃蕩中共核子設備，使它由此倒下的另一個杜魯門，一舉而完成這四個總統分別成功的大勳業。要是出於全人類的意外，竟不能利用可以大有爲的一切條件，竟放棄千載難遇的唯一機會，則前文所列舉的種種覆轍，在越南，在美國，在全球，固然不易避免，而詹森總統個人的資望、榮譽、歷史，豈不被中共直接間接所消滅！

師法前賢，福被後人，是詹森總統無可推諉，不能延誤的時代使命。而在主宰一切的精神方面最須效法的，則爲林肯總統強毅的意志力，及其發揮正義力量的責任感。林肯總統曾說「要信任正義的力量，而本此信念，勇於盡我們的責任到底。」所以當他宣讀「釋奴宣言」草案之時，他知道他的政府是不同利益不同見解的複合體，又自信祇有自己應負並能負最後的責任，便莊嚴果決地說，「我把

你們召集在一起，聽取我所起草的文件，我並不希望你們對於主要事項有所進言，因為我自己業已決定了。」當他經過好多時熱烈和衆人周旋以後，當他準備簽署宣言之際，卻又說，「如果我會名垂史冊，那將是由於此項法案，我的全部心神都寄託於此。假使我簽署此項宣言時，我的手若顫抖，今後所有檢討此項文件的人就會說，『他遲疑了』」。但林肯總統的手並未顫抖，所以解放黑奴的行動，十分英勇，終於成功。林肯總統這種勇於負責的風範，甘迺迪在競選總統開票前六十小時（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即引以自勉，詹森總統自比我們知道的更清楚。又相傳林肯總統與閣員討論某一件事時，州長都反對他的主張，他立即宣佈，「我一人贊成，你們都反對。我的主張通過，因為真理站在我這方面」，這故事，想詹森總統更明白其內容，且必能在如數家珍之下而引以自豪。倘使認為林肯時代的情勢不完全與現在相同，今日難於取法，那麼前衆議員周以德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已說過，「杜魯門總統曾五度採取強硬立場對付共黨擴展主義，艾森豪總統亦五度，甘迺迪總統二度，此種重大的對抗措施，使共黨知難而退，結果使世界緊張情勢的危險性趨於和緩」，這不都是可法的最近事例麼？中國孟子曾說過，「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上帝因為要降大任於林肯總統，所以既把黑奴問題擺在他的眼前，又把錯雜紛歧的衆人意見拂亂他的心志，要他自已抉擇。上帝又要降大任於詹森總統，所以又把「赤奴」問題擺在他的眼前，並要他不理各種的書生之見與政客之論，而自作主張。詹森總統若要不辜負上帝的期望和付託，並不難，只在一念的轉變，一個逼迫中共出戰、忍待中越共求和大策略的決定，一套殲滅中越共侵略勢力乃至俄共勢力大政略大戰略的釐訂，一道實行這套大政略大戰略統帥命令的下達。在這一念的轉變時，只要從頭排除中共或蘇俄將會大規模參加北越作

戰或在他處縱火的顧慮，並從根認識鴿派鷹派對越戰的見解雖然不同，而其渴望迅速解決越戰的目的則一，就會很自然很合理的轉變。在簽署這道命令時，只要自己的手不顫抖，則一可保證毛澤東的身必顫抖，所有共徒的脚必動搖，他們的政權必跟着轉變。即使毛酋尸居餘氣，狗急跳牆，把對內整肅的大事件，同時作為對外侵略的大準備，但因心旌先已動搖，陣脚先已紛亂，譁潰必更迅捷。二可保證越南和亞洲各民主國家都不致再踏中國大陸的覆轍。尤其可在中越共潰敗求和之時，將會如距今二十三年前中國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那天所說的「要贏得戰爭，並且要贏得和平；所謂贏得和平，是要確實保持勝利的成果，建立世界和平的秩序，永絕侵略戰亂的根源」，由此避免美國在兩次戰世界大中都贏得勝利，而在巴黎和會及在舊金山會議波茨坦會議中却都失去和平的覆轍。三可保證共黨陰謀暴力消滅以後，人類將共享善用原子能的福利，世界永絕各種戰爭的禍害。四可保證美國人民應付國內外大事最需要的細心決心耐心信心已漸次漸減的情勢，由此轉變，而復返於拓荒開國期間元氣淋漓的盛況。

著者有此自信，今世三十餘億具有理智的人類亦都有此共信，而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述革命成敗的經驗談，更是有力的保證。他曾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又曾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這種自信心在美國，在詹森，實比拿破崙所說戰勝敵人的三個條件，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金錢，第三是金錢的三M更為重要，因為美國有的是金錢，而在處理國際事務或從事國際戰爭方

面往往不夠的，則第一是自信心，第二是自信心，第三是自信心，這三個最關重要的 S. C. (Self Confidence)。如果詹森總統自信必能彌補這種缺憾，那麼今日人類必能共信真正的 D 日即將到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登陸諾曼地擊敗納粹的這一天，曾被稱為 (DAY OF DESTINY) 決定人類命運的日子者，旋因共禍蔓延，烽烟四起，迄未能符合人類的期望，現在能彌補這一缺憾的，只有美國和美國的總統能够做到。駕輕就熟的詹森總統固然最能做到，假使其後任是新發於硯的總統當亦很少軒輊，亦未便軒輊。

詹森總統已成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風雲人物；並成為二十世紀後期最受批評的問題人物，無論走到那裏，總會有人舉牌遊行，或追着他喊「戰犯」，正像華盛頓的被人罵為「惡徒」，傑斐遜的被人罵為「殺人犯」，林肯的被人罵為「狒狒」，這還足以自豪，中國人有一句顛撲不破的話，「不遭人忌是庸才」，詹森能和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同樣的挨罵，正顯出其同樣的不是庸才。只要也能和這三位總統同樣的為自由平等博愛而硬幹到底，甚至為了造福世界人類，不惜更進一步，敝屣個人的一切，即可在事功上得到證實其為美國最偉大的人物，誠能如此，那麼著者準備將書名加上一個字，寫成「和談覆轍僅在中國」，並寫成「知難行易不在美國」。

本書勘誤表（字數包括標點符號計算）

頁	行	字	誤	正
目次				
六	一五	三	衡	衡
本文				
三	七	五	一	一
四	八	二五	飭	飾
四	九	一七	堅	艱
一〇	一一	四、五、	儘有著裏	著裏儘有
一四	一五	一三	調	彈
一五	一三	三四	憤	憤
二七	五	二四	合	全
頁	行	字	誤	正
二七	九	一九	屬	辱
三〇	一五	二八	只有過之而不及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一	五	三〇	輪	輪
三一	一六	二六	產	麼
三二	三	三六	國民政府乃	國民政府乃
三二	一三	九	對我乃毀	對我政府以及
三五	一八	二九	爲	如
三六	一四	一五	製	制
四一	二	二五	附	咐
九六	三	七	中山四路	中四路

一八〇	一五六	一五五	一五三	一四五	一三八	一三四	一二二	一二三	一〇五	一〇三	頁
七	一二	一四	一八	一四	三	三	二	八	七	五	行
三八	一	三六	三八	一八	一二	一二		三	二八	七	字
場	以	美	廬	府以國 爲主民政	三	三	(漏排地點)	國家與之 統一	踏	中山四路	誤
國	所	華	澈	府以國 主席爲政	一	一	應加一 路德安里一 〇一號	與國家之 統一	蹈	中四路	正
三二三	三一一	三一一	三一一	三一一	三一一	三一〇	三〇五	三〇五	二二〇	一九六	一八〇
一三	一五	一一	九	八	八	四	一四	三	七	一二	九
二五	二四	三一	二七	二二	一八	一	一二	四〇	一九	一七	三八
易	北	檣	質	呢	同	跛	擊	徒	東	職	場
突	白	橋	資	麼	通	蹙	劫	步	果	聯	國
										也多，出言	

三三三	三三〇	三六四	三六〇	三三四	三三五	三三五	三三一	三二一	三一六	三一六	三一三	頁
一三	一〇	七	一三	四	一二	八	三	二	一一	一一	一八	行
六	一	九	一一	一三	四	四	一	四	三四	一九	二	字
美國的	心	類	理	五十萬元	掠	譏笑軍的	本質與標準	主義的教是 真理的育	祇說了	早就誤信	成	誤
美國人的	必	願	里	五十元	撈	譏笑美軍的	是真理的本 質與標準	主義的教育	所以祇說了	也許早就 誤信	順	正
五〇六	五〇六	四八一	四四〇	四二三	四一六	四一二	三九四	三九四	三八四	三七九	三七九	頁
八	八	二	一二	一一	一七	五	一八	一八	八	一七	八	行
三四	二六	八	一九	一二	一七	一七	二二	一一	一五	一〇	九	字
止	止	待	造	具	〇	兇	個	共產黨內	共主義	鴉	憤	誤
制	制	持	作	其	⊖	凶	國	共產國家內	共產主義	雅	憤	正



頁	五〇六	五〇六	五〇七	五三
行	二二	二二	八	一三
字	二八	二〇	二四	四二
誤	源	魯克斯	素	紮
正	料	魯斯克	索	扎

頁	五二四	五二三	五三九	五四三
行	一八	七	一	六
字	二〇	四	四	二四
誤	西	確	提	Democretic
正	亞	破	堤	Domocratic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 和談覆轍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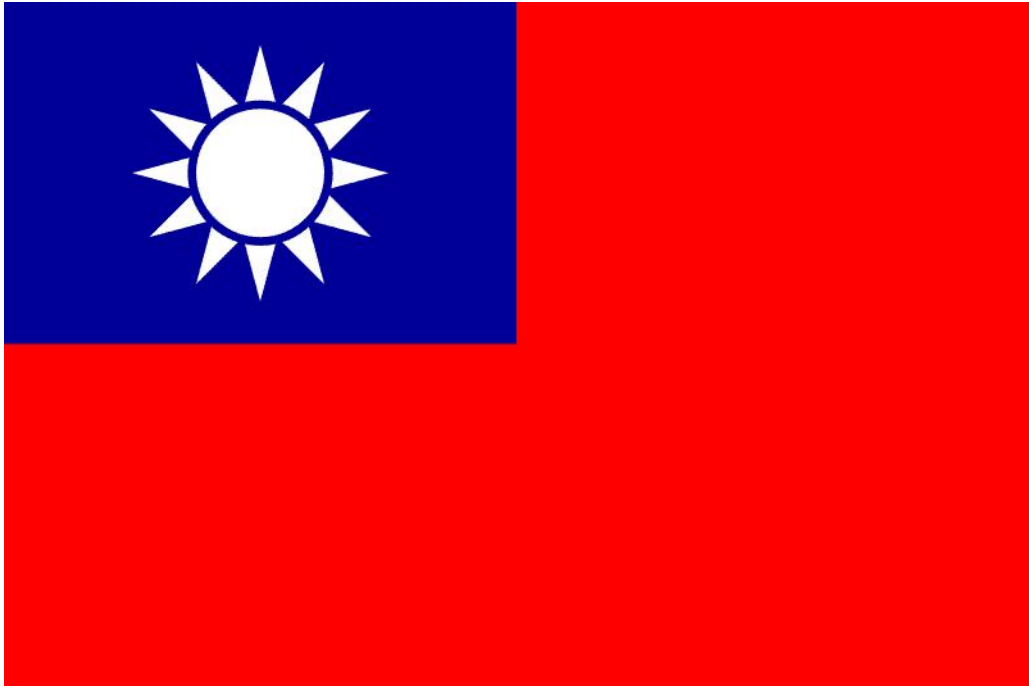
張九如著

(民國五十七年)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